

猎巫

塞勒姆
1692

STACY
SCHIFF

THE SALEM 1692 WITCHES

[美]
斯泰西·希夫

著

浦雨蝶
梁吉

译

《时代》
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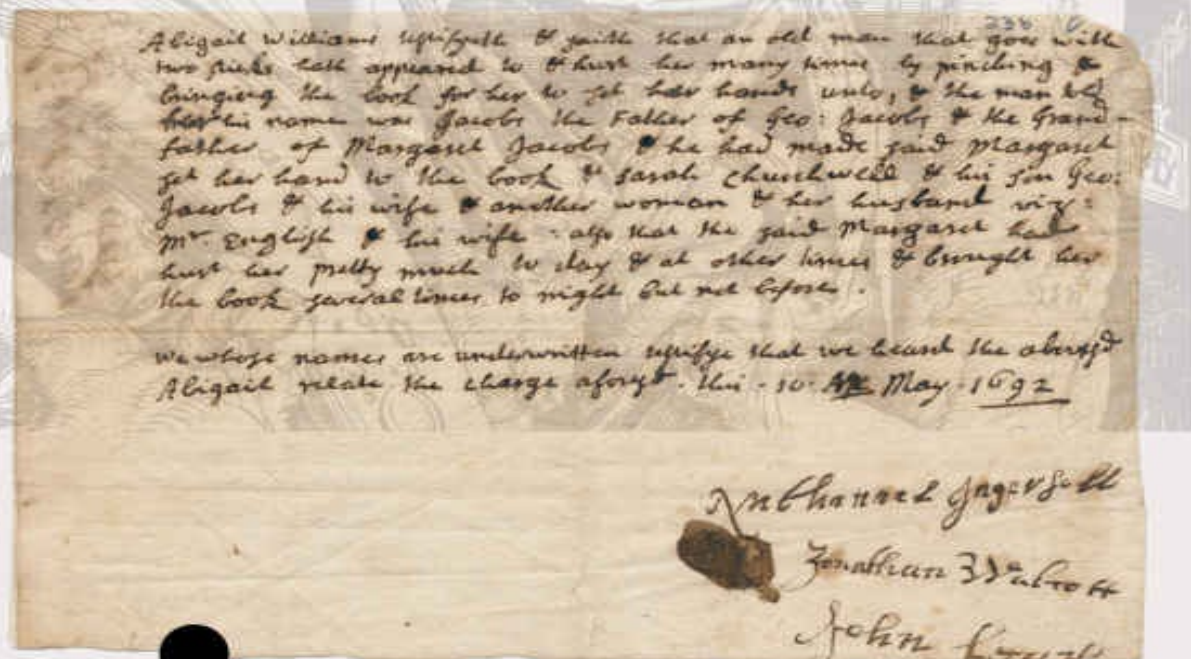
彭博社
年度最佳图书

《华盛顿邮报》
年度非虚构佳作

《今日美国》
年度十大好书

《波士顿环球报》
年度最佳非虚构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
年度最佳好书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妻子告发丈夫，女儿检举父亲，侄子构陷姑母……
一个为了自保而彼此陷害的时代，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

文匯出版社

[illegible]

塞勒姆 1692

STACY SCHIEF

THE SALEM 1692 WITCHES

〔美〕
斯泰西·希夫

著

浦雨蝶
梁吉

障

《时代》
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彭博社
 年度最佳图书

《华盛顿邮报》
年度非虚构佳作

《今日美国》
年度十大好书

《波士顿环球报》
年度最佳非虚构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
年度最佳好书

236
Abigail Williams testified that an old man that goes with two picks came appeared to thrust her many times by pinching & bringing the tool for her to get her hands into, & the man by whose name was Jacob the Father of Geo. Jacobs & the Grandfather of Margaret Jacobs & he had made said Margaret get her hand in the book & Sarah Churchwell & his son Geo. Jacobs & his wife & another woman & her husband viz: Mr. English & his wife - also that the said Margaret had been her pretty much to day & at other times & brought her the book several times to night but not before.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signed certify that we heard the above
Aligail relate the charge aforesaid. This 10th May 1892

Michael Jager
Johann Jager
Johann Jager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妻子告发丈夫，女儿检举父亲，侄子构陷姑母……
一个为了自保而彼此陷害的时代，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

文匯出版社

猎巫

塞勒姆
1692

STACY
SCHIFF

THE SALEM 1692 WITCHES

[美]
斯泰西·希夫

著

浦雨蝶
梁吉

译

《时代》
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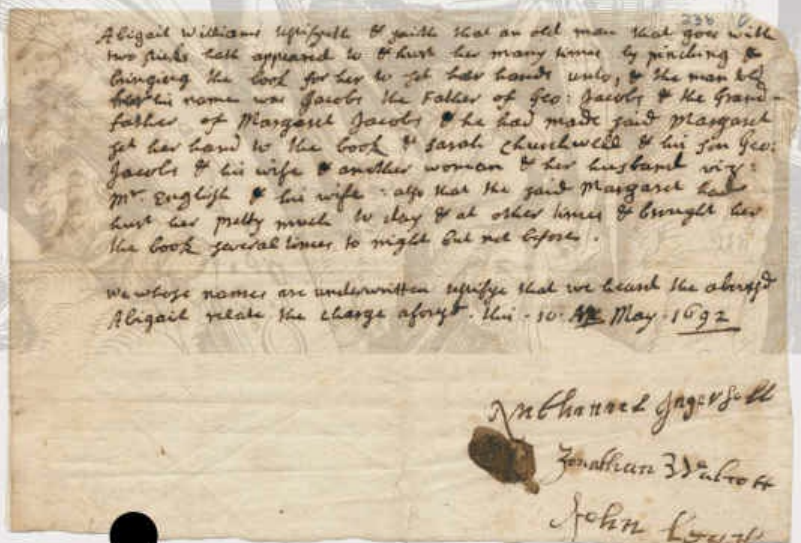
彭博社
年度最佳图书

《华盛顿邮报》
年度非虚构佳作

《今日美国》
年度十大好书

《波士顿环球报》
年度最佳非虚构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
年度最佳好书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妻子告发丈夫，女儿检举父亲，侄子构陷姑母……
一个为了自保而彼此陷害的时代，一场全民参与的歇斯底里

文匯出版社

塞勒姆：1692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美] 斯泰西·希夫 著

浦雨蝶 梁吉 译

版权信息

书名：猎巫：塞勒姆1692

作者：【美】斯泰西·希夫

译者：浦雨蝶；梁吉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ISBN：978754963147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惊惧的病症](#)

[第二章 老骗子](#)

[第三章 怪异之事](#)

[第四章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第五章 巫师](#)

[第六章 地狱的边缘](#)

[第七章 现在他们宣称总共有七百多人牵涉其中](#)

[第八章 在地狱集会中](#)

[第九章 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

[第十章 出版以防误信](#)

[第十一章 那个黑暗而神秘的季节](#)

[第十二章 一连串的悲惨后果](#)

[人物表](#)

[致谢](#)

[参考书目](#)

斯泰西·希夫

Stacy Schiff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终身成员。早年曾在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任职，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

作品包括《圣埃克苏佩里传》《薇拉》《克利奥帕特拉》等，屡获好评和殊荣，被誉为“当代美国最具诱惑力的非虚构作家”，2000年获普利策奖。

2006年，希夫获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授予学会文学奖，2019年当选学会终身成员。2017年，获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学会颁发历史及传记类终身成就奖。2018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

浦雨蝶

1993年出生，浙江海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译有《芭贝特之宴》《命运轶闻》。

梁吉

1994年出生，江苏南京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从事外交工作。

献给温迪·贝尔兹伯格

第一章 惊惧的病症

我们要坦白地说，这个世界没有所谓黑白分明。唯有愚者和吹嘘者才知晓一切。

——安东·契诃夫

1692年，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巫术是在1月突然出现的。第一次绞刑发生在6月，最后一次在9月；随后，那里便陷入一片死寂。对幸存者来说，使人难堪的不是巫术的诡诈，而是司法监管的拙劣。有些人似乎真的是被无辜绞死，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誓言总有被遗忘的一天，把这九个月置之脑后似乎是对待它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也确实奏效了，却只维持了一代人。从那以后，塞勒姆不断地萦绕在我们脑际——它是所有美国人的噩梦，是捕风捉影又添油加醋的小报故事，是我们过去的反乌托邦篇章。如同明灭闪烁、哔剥作响的残烛，它在美国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晃动着身影，若隐若现。

没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没有接生婆丧生。^[1] 先登场的是一名伏都教徒，由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陪着；接下来是一名流淌着一半黑人血液的奴隶，伴随他的是朗费罗；最后便是阿瑟·米勒的林中咒语了

（有一部电影还真展现了鸡血和沸水翻腾的大锅）。^[2] 在故事中，学识比无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真有五十五人承认自己实施了巫术。在被处以绞刑的人中，还有一位牧师。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具体有多少人被指控“邪恶、蓄意和残忍地”参与巫术，可在人心惶惶的巫

术案结案前，人们在二十五个村庄和城镇中找到了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八十五名巫师，他们均有名有姓。据说，在马萨诸塞上空飞翔过的巫师就超过七百名。而受指控的巫师更是数不胜数，连目击者都分辨不清。后来，即使是细心的编年史家也会错把一位原本无关的女性归到飞行女巫的行列。

最年幼的女巫仅五岁，最老的几近八十。女儿指控她的母亲，母亲转而指控外祖母，而外祖母则控告了一位邻居和一位牧师。妻子告发丈夫，女儿告发父亲。还有，丈夫把妻子拉下水；侄子构陷姑母；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姊妹亦相互指控。在这场危机中，只有父亲和儿子能安然无恙地挺过去。曾有一位女性前往塞勒姆自证清白，却在傍晚前就被带上镣铐。在安多弗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每十五个人里就有一人遭到指控。镇上的老牧师发现，自己与至少二十名巫师有牵连。连鬼魂都逃出坟墓，在法庭飞进飞出，比巫师更让人紧张不安。这起事件涌现出一些问题，勾起了我们不可触碰的恐惧：谁在阴谋暗害你？你会是个巫师，自己却浑然不知吗？无辜的人也会有罪吗？夏末时分，人们不禁想问，还有人会自认为安全无虞吗？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自建立起只历经三代——何以成为这样一个黑暗之地？用以解释塞勒姆巫师审判的理论，几乎与解释肯尼迪遇刺案的一样多。这个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个真实犯罪故事起于诸多原因：塞勒姆在代际、男女、贫富、教派和阶级等方面的种种冲突；从英格兰带来的地域敌视；食物中毒事件；严寒气候下的宗教狂热；青少年们的歇斯底里；欺诈、税收及阴谋；政治动荡；印第安人的袭击及其带来的创伤；当然还有人归罪于巫术本身，而无视上述更为合理的看法。^[3]你也可以怪罪大气条件或天气：在历史上，对巫术的指控通常会在晚冬剧增。那些年间，不同派系的人都充当过反派角色，只是有些人扮演得更

让人信服。塞勒姆的村民也在搜寻这些“罪犯”，试图解释是什么遣使携带逮捕令的治安官来到这里敲打房门。对于将犯罪归因于巫术这种神秘现象的思维模式，村民们不比我们了解多少：它涉及借贷纠纷、交头接耳的憎恨、长期累积的怨恨，以及几乎被遗忘的厌恶情绪。甚至在当时就有人清楚塞勒姆这个故事背后另有玄机，其潜台词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玩笑一样让我们捉摸不透。

塞勒姆就是笼罩在美国上空的一小块恐怖夜幕，它代表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一些短暂时刻：烛光被吹灭，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精彩故事就此开演。这恐怖的短暂时刻极易被人夸大歪曲——唯独这场悲剧被年复一年地纪念，尽管人们所关注的与事件的真相没多大关系——也极难被人所理解。这个故事被藏于密室，尘封多年，但正是它的神秘，才使我们无法抵抗诱惑，不断回顾。三百年来，我们没有完全看透马萨诸塞这九个月的历史。如果我们更了解塞勒姆，或许就不会那么在意它，我们无法解开的谜团就是：起初，是什么使他们陷入了女巫恐慌？让我们夜不能寐的，有时是我们的良心发现，有时则是我们心底的秘密，有时是我们的恐惧，而让我们恐惧的故事常常变换着版本。如同17世纪的女巫之于村民，让我们如坐针毡、肌如针刺、不能喘息的，往往是隔壁屋里悬而未决的谜案。

1692年，新英格兰的人口数也就刚够坐满今天的洋基体育场。几乎每个人都是清教徒。那些家庭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漂洋过海，远走北美，正如一位卷入巫术案的牧师所说，他们来这里追求“更纯洁而没有危险的信仰”。他们相信宗教改革不彻底，英国国教也不够纯粹，他们打算在北美完成改革。他们承担着上天的使命，希望重新开创历史；他们具有从头建立文明的优势——1689年，一位牧师将这种文明称作“英国人的新以色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是双重的异见者，前后反叛过

两次。这使他们不受待见。他们倾向于分裂出不同宗派，发表强硬观点，显露义愤填膺的态度。就像任何受压迫的人一样，他们用冒犯自己的东西定义自身，这赋予了新英格兰坚毅的特点，也有人认为这哺育了美国的独立。作为严格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此处，遵从自己的意愿寻求信仰；他们无法忍受与自己行事相左的人。他们殷勤热忱，处事泰然，极其善于逻辑，并不完全像今天的美国人，和这片大陆上以往的文化也不同属一类。

曾有个游客宣称新英格兰人“无论讨价还价，还是开玩笑，最后都必然要背诵一段圣经”，虽说有些夸张，但也离事实差不太远。如果新英格兰人的家中只有一本书的话——当然，也一定会有——这本书必然就是《圣经》。这些早期的现代美国人能在圣经的文本及意象中思考、呼吸、做梦、自律、易物和发呆痴想。为了追求一位美丽的寡妇，巫术审判官塞缪尔·休厄尔曾用讲经中的词句来表白，对方则引用使徒保罗的话拒绝了他。^[4] 新罕布什尔的副总督引用《哥林多书》的话抱怨人民宁愿饿死他也不给他工资，他的选民则用路加的话来反击。因土地纠纷而激烈争论时，坎布里奇人可能会说出施礼者圣约翰的话。一个犯人在自我辩护中会引用《申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当有人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被一只飞到窗口的夺命猫扼住喉咙，压伤胸膛时，他就会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祈求以吓走它。随即，这动物便跃到地上，跳出窗户，而他推断那是暴躁的邻居披着猫的外皮前来造访。在另一个村庄，一名车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太阳刚刚落山时，空气潮湿，刮着大风，一只黑狗突然扑向他的喉咙。车匠手中的斧头竟毫无用处，逃命时全靠念上帝的名字才躲过一劫。

新世界沿袭了旧世界的形式，又与它有着重要的差异。从玛莎葡萄园岛延伸到新斯科舍，再到今日的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

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圣经共同体已延伸至荒野的边界。从一开始，它就与美国的另一要素纠缠不清：魔鬼般的野蛮人，后院里深肤色的恐怖分子。哪怕是殖民地中不那么偏远的居民点都觉得自身很脆弱。一场暴风雨把塞勒姆最好的房屋之一的屋顶掀翻，而屋子里还有十个人正在睡觉。连容纳着会众的教堂也摇摇欲坠。早期的美国人不仅住在边远地区，在许多事上也落后于时代。一位外国君主能在前一分钟死亡，后一分钟又复活过来，可见消息是多么不可靠。马萨诸塞湾的居民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效忠于谁。1692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政府的条款。此前，他们已连续三年不受任何政府管控，直到1691年底新特许状的颁布才结束这一状况。^[5] 在一年中，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确定自己生活在哪一年。因为教皇批准了公历的使用，而新英格兰却抵制公历，固执地继续以3月25日作为新年的起始。^[6]（巫师们第一次在塞勒姆袭击受害民众时，北美处于1691年，而欧洲已是1692年。）

新英格兰人居于偏僻之地，他们的房内昏暗阴沉、烟雾迷蒙，唯有炉火透着光亮，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人们听觉更为敏锐，感受更加强烈，想象更为生动，神圣和神秘的事物都在此处发荣滋长。早期美国人的恐惧和幻想与当代人相差无几，尽管他们眼中的女巫与我们今天想象的尖帽女巫的区别，就像真实的索马里海盗和胡克船长的区别一样大。然而，他们身处的黑暗是截然不同的黑暗。新英格兰上方的天空是乌鸦般的黑色，油漆般的黑色，圣经般的黑色，以至于人在路上寸步难行，一排树木可能被随意移植到另一处；在黄昏时，你可能会被一头狂躁的黑猪追赶，身上血迹斑斑，分不清方向，只得匍匐着回家。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眼镜还十分罕见，烈性苹果酒却是人们首选的饮品。在塞勒姆的审判庭上，就算是深思、虔诚而颇具学养的新英格兰人，有时听上去还是像处于轻度幻觉一样。

在整个新英格兰，很难找到不相信超自然事物存在的人，超自然现象同撒旦一道渗透进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故事向你诉说，就像今天的许多人一样。我们都曾撞见过诡秘之事，哪怕并不信奉。巫术危机过去一年后，科顿·马瑟这位美洲最有学识的人出访塞勒姆。在那里，他丢失了布道的笔记，一个月后，这些笔记被发现散落在邻镇的街道上。科顿便推断是恶魔的代理人偷走了它们。人们不会怀疑巫术的真实性，就像他们不会质疑《圣经》字面上的真理一样；如果怀疑，那就是在质疑正午耀眼的太阳。除了信仰，巫术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惹人讨厌、令人困惑、让人蒙羞的事物都溶解在这个大锅里。除了夺命猫，它亦解释了不幸与恐怖，解释了孩子为何患病、黄油为何腐臭。一位丈夫耸了耸肩表示，还有什么能让他妻子手臂上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呢？

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的角度解释一些困扰17世纪新英格兰人的事物，但仍有些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曾相信许多事物——牙仙，冷核聚变，吸烟的好处，免费午餐 [\[7\]](#) ——最后发现它们并不存在。我们都怀有荒谬的信念，只是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此外，众所周知，我们更喜欢阴谋而非事实；我们否认眼前的证据，赞成虚妄的想法；我们以理性之名行疯狂之事；我们极易从正直坦率滑入自命不凡；我们将私人恩怨投入公共水井；我们沉浸在小小的错觉之中。我们都相信别人除了整天暗算自己，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17世纪的世界看上去让人无法理解，可与自动化、透明化、不断程序化的现代世界并无二致。

我们虽然不会认定是恶魔偷走了我们的笔记，但每天也会感到困惑，也从困惑中持续获得乐趣。我们仍然乐于听闻这样的故事：当闪电击中正在做祷告的人，它带走了《圣经》中的《启示录》章节，却丝毫没有损坏其余部分。即便是无法达到清教徒精神高度的人，也会被马瑟

所说的“惊惧的病症”（diseases of astonishment）所影响。我们总是渴望着奇迹的出现；我们仍希望世上还存在着超越我们认知的事物。我们希望找到我们拥有却不自知的神秘力量，就像桃乐丝被葛琳达告知脚上的红宝石鞋具有魔力。^[8] 事关女性时，我们总希望她们只在危急关头施展魔力；最佳女主角往往最出人意料。在审判的前后，新英格兰传颂着勇敢女性的动人故事，传颂着女人们在印第安人攻击下展现出来的英勇。那些俘虏叙事文学作品^[9] 为巫术提供了一个样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俘虏叙事文学，我们今天称它们为“回忆录”（memoir）。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思想的俘虏。某种程度上，塞勒姆这个故事正讲述了当无法回答的问题与不假思索的回答碰撞时会发生什么。

塞勒姆危机中充满变身的人类、奇异的飞行、草率的祈求、受难的仆人、恶毒的后母、被下蛊的干草和被施法的苹果，因此也像17世纪另一种文学类型：童话。它发生在荒野上——在那里，猎人受命取你肝肺时才会带你去；在那里，狼群会跟随着你回家。塞勒姆所触及的事情如梦幻般奇异，但绝非子虚乌有；它的核心是未满足的愿望和未明说的焦虑，是关于性的潺潺暗流和原始恐慌。它在离奇和荒谬之间那片梦一般的沃地上徐徐显现。先前也有过新英格兰女巫被审判，但没有一个案子是由着了魔的少女和女孩所引起的。和童话一样，女人——意志坚强的女人和胆小顺从的女人，正直的妇女和任性的少女——在塞勒姆这个故事里也举足轻重。占据绝对数量的被告女性中迸发出令人不安的女性力量，塞勒姆的故事包含了对这种力量不言而喻的敬意。一群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年轻女子引发了这场危机，展现出谁也无法遏制的力量，至今仍令人惶然。女性身处险境的故事转变为有关险恶女人的故事，或许与这种力量有关。

在这些童话中，女性扮演的是反派角色——若你骑着代表卑微的家

务职责的扫帚飞走，藐视社区的界限和万有引力定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而这些童话同样受到青春的支配。塞勒姆在每一层面上都与青春期密切相关，在这个极端的年纪，既脆弱又坚强的我们漫不经心地在这理性和疯狂之间兜兜转转，对宗教和超自然事物兴趣高涨。这场危机始于两个女孩，并且很快就牵扯到一帮青少年，人们认为她们被素未谋面的人施了魔法。女孩们来自一个强烈要求自治的村庄，一个自身还在痛苦挣扎中成长的殖民地。多年来，英王都想要强化其在新英格兰的权威，而马萨诸塞的领袖——包括几位未来的巫术审判官——前不久才颠覆了它。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英国人保护他们免遭印第安人的劫掠和法国人的诡计。但是，这些定居者在哀叹自己的脆弱时——他们是“孤儿殖民”——也在憎恨监管。从一开始，他们便做好了应对英国干预的准备。当它到来时，他们发誓抵制这种干预，而到真的遭受牵制时，他们自觉受到羞辱。他们和祖国的关系演变成接连不断的争执；有一段时间，本该保护殖民地居民的人却似乎是要迫害他们。（相比之下，伦敦方面则认为新英格兰人“既暴躁又敏感”。）马萨诸塞的官方机构也遭受着另一种焦虑的困扰，这种焦虑将会对1692年的事件起到一定作用。每一次，他们带着钦佩回首神圣共同体的创建者，赞美那最伟大的一代人时，他们自己就变得渺小一点。

历史的真相会随着时间而水落石出。人们对塞勒姆真相的了解充其量也只是捕风捉影，而且还添油加醋，使其面目全非。清教徒热衷于记录历史，不喜欢事情被人遗忘。但在1692年中期，如果你从现存的档案来看，马萨诸塞没有人——包括最狂热的日记作者——习惯记日记。塞缪尔·威拉德（Samuel Willard）教士的《神性全览》（Compleat Body of Divinity）——这部纲要过长以至于新英格兰没有出版社能将它印刷成

书——意外地跳过了从4月19日到8月8日的历史。在1691年或1693年，威拉德没有省略任何月份。1692年夏天，一位受人尊敬的塞勒姆牧师给长子写信，说他的妹妹被她可恶的丈夫抛弃了。可牧师没有提到，她也恰好因巫术指控而被拘留。在追求显贵的道途中，二十九岁的科顿·马瑟主要居于波士顿，但之后他在塞勒姆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把自己都带进故事里。1692年，他的日记多为事后所写。我们眼前的塞勒姆，因17世纪的删改而满面疮痍，又被19世纪的胡编乱造所装饰。在正义缺席时，我们倾向于重新审视国家的裂痕，而有些区域对此的热情比其他区域更高。（1860年前后，美国南方地区最热衷于讨论马萨诸塞的过失，除了曾在1707年左右囚禁一位女巫一年多的南卡罗来纳州。）犹太大屠杀使玛丽恩·斯塔基 [\[10\]](#) 在1949年关注塞勒姆巫术案，而后者的创作则给了阿瑟·米勒在麦卡锡危机之初写《圯圯》的灵感。除了米勒，纳撒尼尔·霍桑 [\[11\]](#) 的创作也大量借用塞勒姆的故事。

现在，当年巫术审判案的开展已经无迹可寻。我们知道有很多场审判，但没有它们的记录；留给我们的只有初步的材料——证词、诉状、供状、请愿书——以及两张死刑执行令。塞勒姆的记录簿被摧毁了。当时的北美殖民地还没有报纸流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尽管那些被施咒的人吸引了全神贯注的观众，但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只能从法庭记录员那里了解他们的话，然而记录员做事不周、怀挟偏见，有时甚至不当庭记下所听到的陈述。他们破坏被告的发言，对原告也同样不上心，没有将他们的所有陈述都记录在案。我们只有少数预审听证的记录。证人们草草说完证词，法庭里一片混乱，观众也不可能听清。他们很难确切地辨别那些话语出自谁口。记录员很快就放弃如实记录，仅是添油加醋地做些概括。有个记录员只提到一名被告“言行举止充满邪恶”。还有个记录员停下自己的工作，大喊一名嫌疑犯为骗子。一段时间后，法庭记录中不再详述被告人的抗辩，因为人们认定

被告要不了多久就会因崩溃而招供。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证词是经过宣誓作出的，但证词中也满是荒诞事，除非你恰好相信——有一位女士在供认中发誓说自己只道真相，完完全全的真相，除了真相外别无他物——她与教会执事及另外两个人乘着木棍飞去参加了邪教的洗礼，而在上个星期一，她在自己的果园里与一只邪恶的猫商议后，带着她的牧师的魂魄一道飞行。证词由上百位记录员记下。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此类训练，记录的水准时好时坏、令人恼火。即使记下回答，他们也不总是费心去记问题，虽然我们很容易推断，当面对一生中会遇到的最威严的三个人，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大喊“我说！我说！”继而对使用巫术供认不讳时，她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指控者混淆了嫌疑犯；后来，记录者又进一步把他们混为一谈。一些人还被记成了相同的名字。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那些令人难堪的审讯中瞥见个体的存在，而这些审讯通常由反感被告的人所记录，后者还会在一些案件中充当证人。我们对她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她们被控施用巫术或是招认了这一罪状。在这一点上，她们也像童话人物一样，因为我们仅能从唯一的细节认出她们——穿着的癖好，言语措辞，或是一次内心的震颤。这使我们勾勒出了她们单调的特征：玛丽·沃伦美貌迷人；阿比盖尔·霍布斯不知廉耻；乔治·雅各布斯幽默快活，塞缪尔·帕里斯则相反。我们想要那些涉案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她们供认自己在空中飞行或闷死邻居；或是指证一个神志清醒、坚称自己对巫术一无所知的女人；或是与被定罪的男巫共处一个牢房；或是站在绞架旁，看到被她们指控施用巫术的男人快咽气时还在坚称自己的清白——在这些时候，她们在想些什么呢？塞勒姆的恶魔身在何方、又在干什么勾当呢？有些人又是如何找到力量抵抗住恶毒的指控？他们到死都相信女巫确实存在。那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巫术虽可能是真的，但审判却是假的呢？他们的故事从一个小事件开始越滚越大，意义远超广为流传的篝火传说，

也绝不仅仅是通往《宪法》途中的一次哥特式撞鬼事故。猎巫运动成了一个蛛网遍布、众人参与的警世寓言，正如一位在这场危机中格格不入的牧师所言，它提醒着人们：极端的正确会在无意间沦为极端的错误。

很多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两个互相指控对方施展巫术的人是如何在同一间狭小牢房里连续相处数月？如果她们是母女关系又会怎样呢？鬼魂和幻影有什么不同？以下三种情况哪种更恐怖呢：你家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巫术出现在你的家中；你判处绞刑的男人或许根本不是巫师？我们一遍遍回溯他们的话语，想要从清教徒干瘪的散文和紧闭的嘴中获得答案，解开一段插曲的含义；这段插曲源于寓言，又突然变成——如同一本惊人的立体书——炽热的历史，而这只是为了重新变回寓言。我们寄托在祷词、咒语、书籍中的希望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顺序整理他们的话语，那么地平线就会明亮起来，我们的视野也会更加开阔，而且——不确定性得以缓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1] 在欧洲的猎巫史中，常有被视为女巫的人被处以火刑，也偶有接生婆恶意杀害婴儿的故事，而这两种情况均未在位于美洲殖民地的塞勒姆发生。——本书带数字序号的脚注均为编译者所注

[2] 此处是在梳理关于塞勒姆女巫的各种历史解读：伏都教（Voodoo）是一种流行于贝宁、多哥、加纳等非洲国家的宗教，后随非洲黑奴贸易传至海地、多米尼加、古巴及美国等美洲国家及地区，这里的“伏都教徒”是指在塞勒姆审巫案中最先被指控的新英格兰女奴提图芭（Tituba），有说法认为她此前是居住在中美洲的原住民；“19世纪的历史学家”是指曾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及塞勒姆市市长的查尔斯·W. 厄普汉姆（Charles W. Upham, 1802-1875），他在其两卷本著作《塞勒姆巫术》（Salem Witchcraft）首次采用了详尽的原始资料，

并为事件起因提出了除宗教狂热以外更广泛的理论；“朗费罗”是指美国作家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他在其剧作《塞勒姆的贾尔斯·科里》（Giles Corey of the Salem Farms）中将提图芭描述为“一个凶猛的黑人之女”，即“流淌着一半黑人血液的奴隶”；美国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 1915-2005）在其剧作《坩埚》（The Crucible，亦译为《塞勒姆的女巫》或《萨勒姆的女巫》）中将女巫在林中念咒语这个情节经典化，亦在此后的文学作品、影视剧及戏剧中被重复引用和改编。

[3] 大多数因素只起到了部分作用。一位支持仅归因于巫术的人承认：“在20世纪的美国大学里，某些院系之间的仇恨历史，就像塞勒姆的派系仇恨一样悠久和严重，结仇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各种荒谬的行为，只不过不涉及巫术。”——本书中带星号的脚注均为作者所注

[4] 为了使十七岁的女儿对前来的求婚者有所准备，休厄尔还给她读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事实证明这不如预期的那样令人宽心；为了躲避来访者，他的女儿躲进了马厩里。

[5] 1684年，新英格兰清教徒拒绝遵从英王指令，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特许状被撤销，虽然詹姆斯二世在两年后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新任命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 1637-1714）为总督，但殖民地在法理上仍处于特许状被撤销的不稳定状态。因新政府的统治不得人心，波士顿于1689年爆发起义，安德罗斯被逮捕，之前的殖民地自治政府恢复统治，直至1691年由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颁布的新马萨诸塞特许状才重新确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地位。

[6] 当时英国及其殖民地均采用的儒略历，直到1752年才开始采用改良后的格里历（即公历）。

[7] 牙仙、冷核聚变、吸烟的好处、免费午餐均为美国本土流行过的传说、谎言或炒作事件。

[8] 桃乐丝和葛琳达均为美国童话《绿野仙踪》中的人物。

[9] 俘虏叙事文学 (captivity narrartives, 亦译为囚禁叙事、被俘叙事) 是一种美国本土特有的文学体裁, 通常有事实根据, 讲述新英格兰人被“野蛮人”俘虏、克服困难和诱惑并最终获救的过程。

[10] 玛丽恩·斯塔基 (Marion Starkey, 1901-1991), 美国作家, 著有多本马萨诸塞女巫事件相关作品, 其中《恶魔在马萨诸塞》(The Devil in Massachusetts) 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11]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美国作家, 代表作为《红字》。纳撒尼尔·霍桑的曾曾祖父约翰·霍桑曾在塞勒姆女巫事件中担任过审判官, 前者为此感到羞愧, 并将原姓“Hathorne”改为“Hawthorne”; 此外, 纳撒尼尔·霍桑也在小说创作中描写及反思女巫事件, 其中以小说《七个尖角阁的老宅》最为有名。

第二章 老骗子

但谁知道今年我会看到什么奇迹呢！

——科顿·马瑟，1692年

掠过橡树丛、长满青苔的沼泽以及纵横交错的溪流，安·福斯特乘着长杆，跨越了树梢、田野和篱笆。在她的口袋里，装着的是面包和奶酪。这是1692年5月中旬，潮湿的春天刚刚过去，空气中还弥漫着寒意。福斯特的杆子前头坐着玛莎·卡里尔。她的年龄只有福斯特的一半大，已是一位养育五个孩子的勇敢母亲，也正是她策划了这次飞行。她说服福斯特与她同行，并了解飞行的路线。向着东南方向，她们飞越伊普斯威奇河，飞过红枫林和百花盛放的果园，成片的草地和山丘在下面徐徐展开，清风拂过脸庞，一轮明月挂在空中。多年来，这对同为苏格兰后裔的近邻去的都是位于马萨诸塞安多弗的同一间教堂。

她们极速飞行，瞬间便穿过大片土地，这段路程需要一匹好马跑上三个半小时，而在不久前，这里的路面还遍布着石头，高低不平，在夜间无法通行。她们在飞行中也同样会遇到意外。前一分钟，她们还在空中，下一分钟就发现自己正在自由下落——在靠近密林时，她们乘坐的长杆突然折断，两人掉到地上。年老的福斯特双腿发软。她本能地张开手臂，紧紧抓住卡里尔的脖子。就这样，福斯特后来解释道——她的描述从始至终都一字未变——两人再次起飞，随后安全降落在塞勒姆的草地上。集会尚未开始，她们还有时间靠着树坐在草地上野餐，福斯特还去了附近的溪流跪着喝水。她们所遭遇的不是历史上的第一例飞行故障。二十年前，瑞典的一个小女孩赶去参加一场草地上的重大午夜集

会，在途中，她也突然从高空掉了下来，摔得“身子一侧极度疼痛”。

福斯特和卡里尔在人烟稀少的地带飞行了十二英里 ^[1]。没有人看见她们飞行，这倒是合情合理。可没人听见她们坠地的响声，这就让人吃惊。在新英格兰，声音会在空中回响和反弹，在人们的耳朵和想象中产生放大的效果。海狸用尾巴拍打河水的声音可以在半英里外听到。肥胖的黑熊“咆哮出的可怕噪音”会传向四面八方，就像绞刑台倒下时人群的尖叫声那样。每一场骚乱都得有个解释。内陆深处的海上巨响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一群鸽子飞落到了树上。那么怪异的低吼声呢？那是波士顿的塞缪尔·休厄尔家的奶牛发出的哀嚎，它被狗咬伤了。每个晚上，狗还会向着四处觅食的狼群嚎叫。但有时候，那疯狂的吠叫，那拂晓前树木折断的声响，表明了某种更为不祥的征兆。有时是邻居们正一块板一块板地拆除隔壁的房子，巧妙地解决着激烈的房产纠纷。可谁又会猜到，那听似洗衣妇在森林深处捶打亚麻织物的声音，竟会是巨龟在繁殖呢？

你也没有必要一定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候，夜间的拖步声和跺脚声是身着光鲜制服的外国人发出的。他们留下清晰可见的足迹，然后就消失在麦田、果园、湿地里。这些人可是全副武装，但经过神经紧绷的两周后，归来的六十个伊普斯威奇（Ipswich）民兵声称这是无中生有。人们认为那些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幻影。 ^[2] 这种解释要好过另一些解释。在夜间，你或许被一阵骚动闹醒，继而发现一窝欢腾的猫。明亮的月光很容易就照射出在窗上摸索的是苏珊娜·马丁，她撞向你的床，坐在你的肚子上，手伸向你的喉咙。安·帕特南的叔叔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布拉德伯里夫人消失在自家的院子里，几秒钟后又变成一只蓝色野猪重新现身。当那只小牛从烟囱落进厨房时，有个淘气的少年在附近悄然出没。那深夜壁炉里闪闪发光的水母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至少有十

二只，吓着了埃利泽·凯泽。连女仆也看到了它们！母马前一分钟还在那里，后一分钟便消失不见。还有，在星期六的月夜，是谁移动了路标，让一个埃姆斯伯里的男人在离家三英里的灌木丛中蹒跚而行，又落入一个本不存在的大坑里？十八岁的苏珊娜·谢尔登揉了揉眼睛：一个茶碟自己飞出了门外。而那把放在苹果树下的扫帚又在做什么呢？

模糊的影像从黑暗中显现，分解成不同的实体。沙滩稍远处的那队人马其实是一个肩上扛着渔网的跛脚印第安人。休厄尔家里的小学徒在门外棒打一只狗时，他实际上是把棍棒对准了一个九岁男孩。塞缪尔·帕里斯牧师的奴隶提图芭撞上一头长着翅膀和长鼻的生物，它毛发旺盛，高达三英尺 ^[3]，正在牧师家中一间暗室的炉火前取暖，提图芭便很自然地以为它的真身是坏脾气的莎拉·奥斯本。事实上，她发誓它就是莎拉。来自贝弗利的约翰·黑尔牧师的推测或许更为准确：当有东西掀翻烟囱，在屋顶上撕出八英尺大的洞，把白鐵器皿震得嘎嘎作响，又把他的手臂弄得麻痹不堪时，他猜测这是闪电所致。几位颇有名望的牧师试图协调感知与理解的关系，在一个4月的炎炎午后，他们在翻新的厨房里讨论为何“天上的大炮”格外钟情牧师的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是某处有人故意而为之的——就在这时，冰雹倾盆而下，撞碎崭新的窗户，砸落到地上。邻居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堆破碎的瓷砖和玻璃。它们隐约显露出某种启示。清教徒不会放过任何一场灾难。

在那次雹暴发生的三年前，安·福斯特就曾乘着长杆飞向塞勒姆。她不需要目击者来证实自己的空中遭遇，也有理由清楚地记得那次飞行的细节，甚至记得草地边沙径上的一串蹄印。此外，这次飞行还让她的脚伤了好几个月。

在新英格兰，有两种事物比这两个安多弗女人还要飞快。一是冲出森林并悄无声息地潜入村庄的印第安人。这些“可怕的方士和凶恶的巫师”，看上去他们才像是真正的黑暗之王 [4]。无须敲门或打招呼，四个全副武装的印第安人就可能出现在你客厅的炉火旁一边取暖，还一边挑逗你，而你却只能拿着编织物缩在角落。你从波士顿旅行回来后，会发现你家已灰飞烟灭，家人也被俘虏而去，这一切都是拜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所赐。“找到他们比击退他们更为艰难”，科顿·马瑟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金发牧师如此写道。 [5] 他们躲藏着，潜伏着，飞快掠过，犯下暴行——然后又销声匿迹。甚至，他们的棚屋都能在一分钟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人看不见敌人，不能朝他们开枪。”坎布里奇的一位少将悲叹。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争端持续了五个月，直到1678年，菲利普王战争 [6] 才宣告结束。战争摧毁一百个新英格兰城镇中的三分之一，击溃那里的经济，夺走十分之一成年男性的性命。每一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居民——特别是塞勒姆所属的埃塞克斯县居民——都失去了朋友或亲人。1692年，殖民者将那恐怖的几个月称为“上一场印第安战争”，这是因为另一场战争已经显现端倪。一连串极具破坏性的袭击预示着同瓦巴纳基印第安人 [7] 及法国人的新冲突，在这场欧洲战争的延续中，法国人已和印第安人结盟。冲突的前线不久前已推移到距塞勒姆不足五十英里处。

谣言则化为另一名机敏的旅人，他潜入地板，飘过窗户，无视污泥、积雪和疲劳，迈着轻盈的脚步摆脱笨拙的真相。一个17世纪的书商认为，“全人类都爱打听消息，为此心痒难搔。”这种情况在缺乏报纸的时代更为严重，新英格兰人只能靠手头有的勉强凑合。消息无法穿过栅栏上的洞口或没有窗帘的窗户时，就要靠巧言来骗取。一对塞勒姆夫妇把他们的奴隶告上法庭，原因是后者监视他们，售卖他所了解的信息。

考虑到共用的床和狭窄凌乱的住处——在塞勒姆，一个家庭平均有四个房间及六口人，还包括客厅的牛肉和厨房的织布机——就会知道隐私在新英格兰是稀罕物。不少马萨诸塞居民被咯咯的笑声唤醒，却发现这笑声恰是来自于自己的床上。

小城镇破坏了神秘之事与秘密之事的自然比例。在人口数不超过五百五十人的塞勒姆村，居民们了解前者多于后者。通过添油加醋和反复传播，传闻总是经久不息。1692年，安多弗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安·福斯特三年前曾遭遇一次严重的创伤。有天晚上，福斯特的女婿和女儿在土地买卖问题上起争执，最终做丈夫的割开了妻子的喉咙。当时，妻子正怀着两人的第八个孩子。谋杀者在绞刑架上忏悔，公开表明家庭和谐大有裨益。（这一说法亦是传闻，但至少出自牧师之口。）同样是在1689年，福斯特的孙子不可思议地从印第安人的伏击中幸存。他被剥去一部分头皮，本应命不久矣。福斯特的飞行伙伴玛莎·卡里尔在结婚前就与丈夫——一个身无分文的威尔士仆人——生下孩子，此事也搞得众人皆知。1690年，卡里尔一家患上天花。安多弗居民命令他们离开，他们拒绝了。当地的委员会便对卡里尔一家实行隔离，担心——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他们会“因疏忽大意而传播瘟疫”。而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谣言称玛莎是一个女巫。

到了1692年1月下旬——那时，印第安人凶残的攻击把缅因的约克县夷为平地，让身负重伤的牧师死在自家的门阶上；那时，解冻期刚使新英格兰从异常寒冷的冬天复苏过来；有消息传来，在海的另一边，马萨诸塞的新总督亲吻了威廉三世的戒指，他将携带新特许状起航，有望让殖民地摆脱无政府状态——传闻不胫而走：塞勒姆牧师塞缪尔·帕里斯的一家很不对劲。

一开始是超过七个黑夜的刺痛。第一个遭受折磨的，是牧师十

一岁的金发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很快，同样的症状出现在九岁的贝蒂·帕里斯身上。这对表姐妹抱怨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先是痛苦嚎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也感到眩晕。她们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又时不时变得僵硬。两个姑娘都没有发烧，也非患有癫痫。身体失去活动能力，双手却疯狂摆动。女孩们突然开始说“愚蠢、荒诞的话，她们自己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她们躲在角落，或钻到椅子和凳子底下，别人很难拉她们出来。其中一个掉到井中。阿比盖尔还试图飞到空中，她甩着手臂，发出飞起来的响声。两人似乎没有祈祷，虽然到了1月，她们又都变得乖巧懂事，彬彬有礼。一到晚上，她们睡得就像婴儿似的。

之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四个颇明事理的孩子——波士顿一个虔诚砌砖匠的儿女，他们“性情温和又举止得体”——患上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症。“他们像狗一样相互吠叫，又像猫一般咕噜叫唤。”科顿·马瑟在1689年观察约翰·古德温家的孩子后如此记录。孩子们像鹅一样飞扑着，有一次扑腾了二十英尺。他们躲避着无形的棍杖，尖叫着自己被刀割裂或被铁链禁锢。疼痛落到他们身上的速度超过了观察者能记录的速度。他们扭曲着身体，既不能穿上衣服，也无法脱掉。他们还试图扼死自己，下巴、手腕和脖子都脱了臼。“孩子有时听不到，有时说不出，有时看不见，而这三种情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马瑟记录道，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对青春期的完美定义。父母的谴责令他们极为痛苦，家务活也让他们厌烦不已。他们愿意擦一张干净的桌子，却对脏桌子毫无反应。家里的种种小意外都会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在世界上，”马瑟写道，“没有什么能像宗教活动一样让他们心神不安。”一提及上帝或耶稣，他们便会陷入“无法忍受的痛苦”。玛莎·古德温读得懂《牛津笑话集》（*Oxford Book of Jests*），但每当读到证明女巫为杜撰的内容或马瑟的神学著作时，她便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个夏天，科顿·马瑟带走了十三岁的玛莎，帮助她恢复。她曾乘着她那匹“空气骏马”在马瑟家附近一路狂奔，在家庭集体祷告时发出嘘声，并攻击任何一个企图在她面前祈祷的人，她可以算是史上最糟糕的客人了。在同一季节，塞缪尔·帕里斯和妻子伊丽莎白搬到塞勒姆；正当他们还在熟悉这个村子时，在波士顿的玛莎把书砸向科顿·马瑟的脑袋。1692年，帕里斯本应立即想到古德温一家，并从马瑟那本不断重印、记录他们故事的《难忘的天意，关于巫术与附身》（*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 and Possessions*）中了解马瑟家的种种试验细节。他的牧师看过那些身体扭动的孩子，也支持书中的观点。“焦虑、扭曲、摔跤、颤抖、打滚、吐白沫”，这些行为也同样出现在这个塞勒姆家庭，而且情况更为严重。阿比盖尔和贝蒂哭喊着细针戳着她们的身体，皮肤像烧伤般疼痛。在一幢四十二英尺长、二十英尺宽的二层牧师住宅里，帕里斯一家无法摆脱尖叫声，这叫声从远处也能听到；他们唯一感恩的，就是这幢装有护墙板的尖顶房屋离道路很远。这家人的孩子还有十岁的托马斯·帕里斯和四岁的苏珊娜，两人未受折磨，却似乎都已惶恐万分。

虽然有两个印第安奴隶，提图芭和约翰，帕里斯家还是有理由认为自己遭到的现实困境和他们的精神危机一样严重。一个清教徒姑娘如果不在饲养家畜、修剪花园或生火，又不在烤面包或制蜡，那就理应在做针线活。孩子到五岁，就可以自己缝床罩和纺亚麻了。女孩们身体失控，便也彻底扰乱了家中日常生活。她们不能单独待着。当楼下一片混乱时，帕里斯也不能在楼上若无其事地准备布道演讲。哪怕他那两位最具天赋的同僚，对付布道也得花七个小时聚精会神地准备；其他人则用一整周的研究来应对布道，阅读并沉思敲定的主题。如果说清教徒牧师花大量时间分析沉默，那么帕里斯遭受的考验却恰恰相反。他得一边工作，一边忍受刺耳的尖叫。过去，他习惯人们为请教他而登门拜访，现

在他的女儿和外甥女夺走了人们的关注。

一直以来，牧师的住宅欢迎各方来客；但到了2月，屋里几乎人满为患。在17世纪，疾病是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疾病更是受到大范围的关注。好奇者和祝福者都蜂拥而至，但看到眼前的场景，他们的手臂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吼叫及怪异的扭曲姿态尤其引人注目，让人大为不安。这些症状让人落荒而逃，毛骨悚然，难以置信，甚至昏死过去。有几回多达四五十人挤入病房，多为常来的访客和热心的邻居，他们来帮忙照看和管制疯狂的孩子。也有个别邻居没来拜访，但经别人提醒后很快便会登门。还有人则千里迢迢地赶来，坐在帕里斯家那烟雾缭绕、天花板低矮的昏暗客厅里。他们在祈祷的间隙唱起赞美诗，之前古德温家也有一大群人连续几天如此。有时候，情况比他们想象中的还棘手——孩子不仅辱骂牧师，还会粗鲁地对待访客。^[8]

作为一个天生的清单爱好者和记录者，塞缪尔·帕里斯既急躁又严谨，可他没有贸然行动。受折磨的迹象悄悄从他那混乱的家中潜入他定期——周四一次，周日两次——进行的布道里。帕里斯本是个思想守旧之人，过去所讲的都未免乏味，然而现在有了新鲜事发生在他身上。他还是没有明显偏离先前的主题，详细讲述基督升天，以及他本人如何调解上帝和人的关系。2月，帕里斯主要求助于禁食和祷告。他还向牧师同行请教。他的侄子——米尔顿（Milton）的时任牧师——也许对他帮助甚多，前者的女儿早先身患痉挛。塞缪尔·帕里斯的家中挤满了祝福者，他和伊丽莎白·帕里斯用苹果酒和蛋糕招待他们。大家一同热心祈祷。但是，等到帕里斯受够了“怪异的姿势、滑稽的动作”和各种胡言乱语，也明白仅用圣经不能缓解女孩们的异常症状时，他请来了医生。

多年以后，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认为，波士顿的医学疗法具有

致命的危害；而在1692年，塞勒姆镇及其邻居——即有女孩抽搐和崩溃的小塞勒姆村——的医生都没有上过大学。当时的基础医药箱与古希腊的仅有略微不同，其中包括甲壳虫的血、狐狸的肺和晾干的海豚心脏。蜗牛作为一种药材出现在很多药粉或膏药中。至少，它们远比独角兽的角容易获得。烤刺猬的脂肪可滴入耳内，作为一种“针对耳聋极具疗效的药物”。那时，殖民地最见多识广的医生认为硝石可以治疗麻疹、头痛和坐骨神经痛。科顿·马瑟相信六十片薰衣草和一口姜饼能治愈失忆症。狼皮腰带据说对癫痫有惊人的效果，具有同样疗效的还有每天服用五次由烧过的黑奶牛粪便或由青蛙肝脏制成的粉末。在1692年以前，瘰症已经被妥善归类。在塞勒姆，医生用公猫耳朵的血混合母乳来治疗它。

塞勒姆约有九十户人家，到那年1月仅有一位执业医生，那就是初来乍到的威廉·格里格斯，他在离牧师住所一英里半开外的地方购置了一个农场。作为积极而虔诚的公民，格里格斯抱怨过礼拜堂附近的酒馆，亦出面指证不去做礼拜的人。他拥有九册医学文稿，能够阅读却不能写作。他是为女孩们做检查的合适人选，或说合适人选中的一位，因为很明显，帕里斯联系了好几个人。多年以前，格里格斯是帕里斯在波士顿的教会成员；他们与同一教会的几户塞勒姆人家很熟。至少有一个有力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帕里斯请来了七十一岁的格里格斯：格里格斯把传染病带回了家。还有一些游历过更多地方、经验更丰富的医生诊查过古德温家的孩子，后者脸色发青，痛苦地声称自己被放在看不见的烤肉杆上受着灼烧。强烈的痉挛持续不断，并被归因于恶魔；遇到这种情况的受害者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被施了魔咒吗？”有位医生约二十年前诊查过一个勒住自己脖子的格罗顿（Groton）姑娘，他给帕里斯家姑娘的初步诊断为消化紊乱。第二次出诊，他便拒绝再提供治疗。当时瘟热的情況极其糟糕，这位医生还嘱咐全镇人禁食。只要是诊查过阿比盖尔

和贝蒂的医生，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超自然的解释无疑已在街头传开。“‘恶魔之手’是‘邻居们迅速接受的’诊断。”黑尔教士记载道，他是唯一一位观察到女孩们开始拧捏和刺痛自己的编年史作家。这种超自然的解释很可能吓坏了这对表姐妹，使她们的症状进一步恶化。

在超自然领域，黑尔颇有经验。在孩童时期，他跟随过一个代表团探视一名被监禁的女巫，那天正是她被执行死刑的日子，代表团希望能诱导她认罪忏悔。这名嫌犯是黑尔的邻居，亦是马萨诸塞第一个因巫术被绞死的女人。直到上绞架前，她都否认自己有罪。另一位被控告的女巫在接到1680年的缓刑令后亦与黑尔有过交谈。当时黑尔五十六岁的，为人和蔼，正在附近的贝弗利负责宗教事务，他将自己视为帕里斯最亲密的同僚之一。同那时新英格兰的大多数人一样，哪怕他不相信天使、独角兽或人鱼，他也会相信有女巫存在。那么帕里斯本人是怎样接受恶魔才是病因的呢？也许，他对此并不觉得惊讶，而是感到宽慰。“这是来自地狱的破坏。”他这样写道，消除了任何对女孩们灵魂的怀疑，也卸下了自己的责任。比起上帝的不满，他完全有理由更倾向于是魔鬼在作恶，哪怕恶魔附身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9] 这一诊断令人担忧，也让人紧张得心跳加快。巫术影响巨大，在清教徒中极受欢迎。可在此之前，它从未在一位牧师的家中出现过。对于牧师来说，恶魔的侵袭至少比一个私生孙子的降生更让他们兴奋，后者正是科顿·马瑟后来得应对的污点。马瑟比帕里斯年轻十岁，1692年时，他才二十九岁。那时，他已经声名在外，正逐渐成为新英格兰最有名望的人，而一切都在此时发生：你生来高大英俊，天赋异禀且不懈努力，十一岁时你就进了哈佛，十六岁开始第一次布道，并主导了两起马萨诸塞早期传道的奇迹。

在这出绝妙的大戏中，帕里斯无意逃避，每一幕都能看见他的身影；在每次不幸的背后，都可以窥见神圣之爱。在着了魔的家宅中，他

待在楼上的书房里，继续思考《诗篇》（Psalm）第一百一十篇。他警告教区里的居民，上帝“愤然派出了破坏者”。必须坚持到底，“我们在受磨炼时，要当心晕厥”，必须要勇敢反抗“所有的宗教敌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解释足以让人信服。强调对抗恶魔本就是一种反常的自夸，而且也为雷击——穿过窗户、沿着烟囱的晴天霹雳——找到了理由。“我被撒旦攻击，”马瑟暗自思忖，听起来近乎自负，“难道是因为我做了太多对抗敌人的事吗？”或者，正如古德温家那位当父亲的所说，在这场蒙承天恩又险象环生的游戏中，危险的境地就意味着将在精神上有所收获。“我们想要受苦，我们就能拥有苦难，而神圣化的苦难更是最好的宽恕。”这位虔诚的石匠总结道。与此同时，石匠还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同样的疑惑肯定也曾萦绕在帕里斯的心头：招致这种来自上帝的责难，他都做了些什么呢？牧师的家理应是“虔诚的学校”，而非“魔鬼的窝巢”。

从之后发生的事情中，塞勒姆村接纳这种诊断的方式变得明晰。2月25日，帕里斯和妻子冒着倾盆大雨离开了塞勒姆。在此期间，家里由一位近邻上门照料。帕里斯夫妇可能请了玛丽·西布里来照顾阿比盖尔和贝蒂，后者已经乱吼乱叫了一个多月。玛丽·西布里有六个月身孕，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当地家境较好的夫妻中，她和身为修桶匠的丈夫可算是教会的中流砥柱；每次有财产需要处置或契约需要担保时，丈夫塞缪尔·西布里就会介入。在帕里斯家中，玛丽·西布里很是怡然自得。她感到不那么舒服的是牧师解决这一谜题的速度，于是，她安排了一个秘密实验。问题已不再是什么事物在折磨孩子，而是何人所为；西布里决定，要揪出一个女巫。在她的指示下，帕里斯的印第安奴隶约翰将女孩们的尿液混入黑麦面团中，放在炉上烤制。随后，西布里把这蛋糕喂食给家犬。这种反魔法（countermagic）的方式令人困惑——不知是将女巫引向狗那里，或将咒语转移到狗身上，还是以此烫伤女巫——

但这一古老的英式秘方据信可以揭示罪恶的一方。

帕里斯听说这个实验时气得脸色铁青。牧师之家绝不能容忍反魔法。他决心不让祸患从他家流出；波士顿的牧师们也替他着想，费尽心心地压制人们对所谓的女巫的指认。西布里还招来了更大的危险。相比宗教，她更崇尚迷信行为；对此，帕里斯强烈谴责，认为迷信“为反对魔鬼而接近魔鬼”。她的干预引发了鲜为人知的神秘力量，树起一根撒旦式的引雷针。一个月后——其间的一切都混乱不堪——深陷困境的牧师把她叫到书房，厉声斥责了她一顿。她哭泣着，低声下气地道歉。她解释自己的行为未经过任何思索，“这法子是她从其他无知者或更糟糕的人那里听说的”。以后，她会倍加谨慎。帕里斯给她念了篇严厉的训诫文，这本来是他打算在礼拜日布道之后与会众分享的话。她的蛋糕惹来了大麻烦。“魔鬼（似乎）就是以此出现在我们当中的，”3月27日，帕里斯在派发圣餐前宣布，“他的愤怒极为可怕，而只有上帝知道他何时被钳口。”他警告集会的人时刻提防“撒旦的诱骗和诡计”。在布道坛上，帕里斯身穿深色长袍，露出白棉平领子，请求他们集体见证玛丽·西布里的罪行，让“我们的姊妹为所做之事深感羞愧”。他请求人们举手表决，所有人达成了一致。帕里斯转向挺着大肚的西布里，假定她已承认并忏悔罪行，询问他们可否听她亲口认罪。公开赎罪是必不可少的。西布里抽泣着向公众道歉，情绪十分激动。帕里斯继续说：“兄弟们，如果这令你满意，请举手证明。”在场的每个（男）人都举起了手，这是大家在1692年的村庄礼拜堂里最后一次达成共识。

在家里，帕里斯也责备了他的奴隶。责备完后，空气中弥漫着愤恨之火。然而，牧师帕里斯那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尽管他的外甥女和女儿发出大量噪音，他也不可能去分辨她们究竟想要说些什么。可蛋糕中的恶魔之术奏效了；几天之内，贝蒂和阿比盖尔说出了几个名字。

有三个而非一个女巫在塞勒姆活动。女孩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们。在潮湿的2月底——整个星期阴雨绵绵，冲刷着田地，泥流遍布整个村庄——那些女巫就乘着杆子在空中飞行。

塞勒姆村得以存在，一定程度上多亏了对于遭受伏击的恐惧。作为马萨诸塞湾最古老的居住地，塞勒姆镇早在1629年便得以命名，还差点成为新英格兰的首府。这个繁荣美好的社区绵延一英里，空气中弥漫着海水咸咸的味道和浓烈的松木清香，被视为殖民地中最宜居的地方。塞勒姆港口的繁荣程度仅次于波士顿；它与欧洲和西印度群岛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塞勒姆殖民地建在一座半岛上，被绿绵绵的山丘和恬静的小海湾包围，有着繁荣的渔场和修船厂。1685年，当英国新国王登基，波士顿全城都在欢呼和庆祝之时，塞勒姆也发布了公告，它是马萨诸塞殖民地除波士顿以外唯一一个拥有超过两千人口的镇子。塞勒姆更为安静，也不及波士顿国际化，但它与波士顿一样精致，这里分布着一排带山墙的多层彩色房屋，还有大量新涌现的财富。

早在1640年，农民就开启了向北部和西部的探险之路，他们远离繁荣的港口和镇上绵延的山丘，去寻找更适合耕种的土地。这些人零零散散地居住下来，定居地便形成了塞勒姆村，即我们今天称为丹弗斯

（Danvers）的地方。很快，那些胆识非凡的村民——在当地被称为塞勒姆农民——开始争取自组社区机构的游说活动。虽然家人不喜欢他们冒着风雪跋涉五至十英里去参加集会，可他们有额外的考虑。在1667年，村民们位于波士顿的殖民地议会提出了请愿：他们长途跋涉，到塞勒姆镇轮班站岗放哨，这种行为真的有意义吗？路途对他们来说着实太远，入夜以后的任务更是繁重，“未被开垦的荒野草木杂乱，道路曲折难行”。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住所与最近的邻居相距足足一英里。农民的

离开使他们的妻子胆战心惊，“在丈夫不在身边的夜晚，尤其当她们想到从前这片土地上由印第安人（还有其他人）引发的可怕事件”。

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严谨的逻辑继续质问：在和平时期全副武装地跑去看守镇子，这难道不是亵渎上帝的行为吗？老社区的人们坚称，危险是不会停息的（社区领袖还不愿降低税基，也不肯减少领土）。可是，农民们——他们居住在乡间五十个分散的农场上，村子的中心甚至没有一座礼拜堂——这难道不比住在塞勒姆镇的人更弱势吗？那里密集的商业街区上人口更多，房屋鳞次栉比。很显然，少了村民，塞勒姆镇也能守护好自己。领袖们反驳道，就在最近，一艘法国船只不知怎么地就在夜幕降临后设法驶入港口，没有被人发现。这怎么可能呢？农民们对此大声讥笑，他们深知这艘无意冒犯的船在天黑前已经被发现。村民们身居前线，让镇民守卫村民岂不是比让村民守卫镇民更为合理？由于“狠狠侮辱和谩骂”了镇上官员，参与游说的村民们还被罚了款，不过他们当中有纳撒尼尔·帕特南，他可是最富裕的村民之一。

几年后，因为塞勒姆镇提议建立一座更大的礼拜堂，双方再次陷入剑拔弩张的境地。我们不会为此付钱，村民反抗道，除非你们出钱帮我们也造一座。为争取到独立教区反复游说，村民们终于在1672年的最后一天成功了。塞勒姆镇提供了一个老旧的布道坛和一把执事座椅，或许和教堂靠背长椅一样是用开裂橡木做的。塞勒姆村和塞勒姆镇继续相互激怒对方：前者必须在法律上求助于塞勒姆镇，却很难得到帮助；后者因为村民一直与他们争执不下，无法解决争端。同时，塞勒姆镇似乎不堪忍受村民们提出的关于教会事宜的恼人问题。他们能不厌恶彼此吗？不，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吞灭对方。就在帕里斯一家住进牧师宅邸后不久，塞勒姆镇的领袖们就让村民别再去镇里骚扰了。

从1672年起，塞勒姆村正式雇用了他们的第一位牧师。十六年后，

他们雇了第四位牧师，也就是塞缪尔·帕里斯。四位牧师都卷入了1692年的事件中，他们不期而遇，每个人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尴尬。一位牧师被那些诉讼案困扰，另一位则记录了这一切。还有一位将以一名法力强大的男巫身份再度出现。1671年10月，刚从哈佛学院 [\[10\]](#) 毕业的詹姆斯·贝利第一次在塞勒姆布道。他二十二岁，数周前刚结了婚。社区并非全员一致地喜欢他。贝利资历尚浅，举止无礼，粗枝大叶，自以为能长期担任牧师这一职位。有位在他家里住了三星期的客人在法庭上发誓，她从未听到过贝利同他的家人朗读或解释《圣经》的任何部分。无疑，他家还有些财务紧张。教友们原本商定为他建一栋牧师住宅，但这事最后告吹了。牧师自己建了栋房子，可在1677年之前，他和新婚妻子就在那里失去了两个女儿。其间，社区分裂成了不同派别。当有些问题过于棘手时，教区居民甚至连该谁去仲裁问题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时，有三十九位教会成员支持贝利。十六位成员反对，其中包括数位在社区中最有势力的人。

贝利的任职带有一丝塞勒姆村的特色。他妻子十二岁的妹妹也跟随他到了塞勒姆，后者会在十七岁时嫁入显赫的帕特南家族。她的丈夫是小托马斯·帕特南，是村中首富的儿子，也是老纳撒尼尔的侄子。在塞勒姆，帕特南家族是大家族，个性冲动的面包师玛丽·西布里和威廉·格里格斯医生都与帕特南家族有姻亲关系。两对年轻夫妇——贝利一家和托马斯·帕特南一家——往来逐渐密切。这并没有阻止帕特南家族的其他人攻击贝利，甚至使他们更受鼓舞。1692年的一个礼拜天下午，就在家里突然陷入混乱不久前，塞缪尔·帕里斯已经在布道坛上观察到“深仇大恨往往从最亲密的关系中滋长出来”，并深知自己该说些什么。他选择《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二节作为布道的经文：“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塞勒姆的农民愤怒地指控塞勒姆的母教会，最终闹上法庭，他们难以平息自己的怨恨。与此同时，贝利提起了诽谤诉讼。法庭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决定让他继续任职。但是，法庭不能强制执行这个决议；尽管贝利的大部分教友都继续支持他，到了1679年底，他明白自己在塞勒姆已经没有前途。他搬离了塞勒姆村。不出一年，教会委员会选定乔治·伯勒斯作为继任，此人一头黑发，矮小英俊，虽然年龄比贝利大，却比他晚从哈佛毕业，因为他在那里获得了硕士学位。作为一位颇有名望的牧师的孙子，伯勒斯在多个边境地带的教区任职牧师，在他上一个任职的地方，他还英勇抵抗了一次印第安人袭击。上任塞勒姆时，伯勒斯二十八岁。

又一次，帕特南家族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681年，伯勒斯和他的家人与帕特南家族的一户人家共住了很长时间，直到那年秋天才搬进牧师的住所——即未来帕里斯一家的住处。伯勒斯此前敏锐地察觉到，新英格兰的牧师常会被冲突和失望之事惹怒，于是在自己的合同里附加了一项仲裁条款。他任职的条件是“万一将来出现任何分歧，双方都要服从议会，以求和平解决”。尽管如此，他还是上了法庭；一个教派的责任，似乎就是让另一个教派所选择的生活变得痛苦。从最开始，伯勒斯就没有拿到过工资。搬进新建的牧师住宅后不久，他年轻的妻子就过世了，但他却无力负担葬礼的花费。1683年4月10日，村民们在县法院上提出抗议，伯勒斯已经一个月没有讲道了。后者匆匆忙忙地打包行李准备离开塞勒姆——他希望自己就在那一周离开——但拒绝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之所以不情愿留在那里，或许跟约翰·帕特南有关，帕特南借钱给伯勒斯，当他意识到伯勒斯无法还债后，便威胁要逮捕伯勒斯。塞勒姆村该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首先是它没有支付牧师工资。）伯勒斯还是不作回应，他不想再插手这个暴躁社区的事务。“我来到这里是想问你，”一位过分直率的陶工解释道，“如果兄弟间相互冲撞，邻

里间相互冒犯，所有人彼此争吵攻击’，村子还怎么繁荣起来呢？”陶工提醒伯勒斯，牧师应当是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人，是理智之光。伯勒斯此前一直不愿意组织私下会面，也不愿意安抚村民们的情绪。他只按自己的喜好来布道。因为直接但无礼的分析，陶工还受到了法庭的警告。在那个春天，伯勒斯离开了塞勒姆。

1684年2月，塞勒姆教会将尊敬的德奥达特·罗森神父请到了塞勒姆。罗森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出生于英国。大约五年前，他从诺福克郡（Norfolk）来到了这片殖民地，他的父亲在坎布里奇接受教育，后成为诺福克的一位牧师。罗森生来就背负着成为牧师的使命——他说他的名字“德奥达特”（Deodat）意味着“献给上帝”——尽管未获得学位，他接受的也是正规的教育，能熟练、地道地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作。罗森出身名门，在伦敦，他的家族关系让他受益匪浅。在17世纪70年代早期，他曾短暂地做过一位富裕的五金商人的学徒，移居美洲前，他甚至还短暂地担任过御医。罗森本该在玛莎葡萄园岛担任七年牧师，但实际任期不超过两年，1682年，他返回波士顿过世俗生活。随后，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定居塞勒姆。那时，他三十出头。他的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孩，生于塞勒姆村，却不幸在那里夭折，也正是在那里，他又突然失去了妻子。他有一对敏锐的耳朵，能分辨戏剧性口吻和官方措辞之间的细微区别。他为人务实，会做家庭祷告，只要过程不过于冗长乏味。“上帝不会被长篇累牍的祷告感动。”他如此说道，尽管有人希望罗森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在1692年的事件中，罗森提供了唯一一份实时记录。

村民们投票决定为他们的新牧师运送柴火，但最终却给了他一笔钱，劝他自己去搜集柴火。即使这决定令人气愤，罗森也没有留下任何怨言。他更愿意讨人欢心。在上任两年后，社区为他的前途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如果他被任命为牧师，塞勒姆就会最终建立一座许诺过的

教堂。它也会交出牧师宅邸所在的土地，这是新英格兰的一个症结。帕特南家族支持这一任命，其他几个家族出于神学立场提出反对，因为罗森有些令人失望，或者只是因为他是帕特南家的人。农民们又一次将这件事递呈给了头脑更冷静的塞勒姆镇民，那里的官方机构声称他们为看到这么多“刻薄的表达”及“固有的偏见和断然的敌意”而感到悲痛。他们为什么非要折磨彼此呢？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塞勒姆镇的神父们再次恳请互不相让的村民不要来打扰他们。“如果你们毫无理智地烦扰自己，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得寸进尺来折磨我们。”他们叱责道。罗森选择在村民们的关系完全破裂前离开。村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尴尬。他们投票决定销毁记录簿，虽然托马斯·帕特南在1687年重写了记录簿，但略去了伯勒斯和比利在任时纷争不断的十年。人们认为，这些不良记录可能会在未来产生危害。

因为没有独立的教会和自己的公民机构，塞勒姆村在解决公众分歧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它在教会政治上麻烦不断，但这并非个例。有人说，牧师和教徒就应该像丈夫和妻子。这个问题就像烈性酒一样惹人争议。清教徒对调查和审问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并以相似的态度对待牧师。很多牧师在他们的任职协议里添加了免责条款。英克里斯·马瑟，最惹人注意的新英格兰牧师和科顿杰出的父亲，在协议里声称若他被上帝召唤去往别处，或报酬不足，或遭到会众的“迫害”，他可以随时离开波士顿教区。工作难觅，工作保障也一样；牧师会遭到解雇，任职日期也会被耽搁。有一位耐心的牧师等了二十七年才得以上任。在1720年的一场圣职授予仪式中，有人因不满任命安排而从旁听席上泼水、扔东西。即使会众喜爱他们的牧师，争论也时有发生。约翰·黑尔，这位与帕里斯一家在比自己家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子里一起守夜的贝弗利牧师，曾在此前两年被委任为随行牧师，为抗击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魁北克远征队伍服务。他的教众反对这一任命，案件上了法庭。最终，黑尔

还是和民兵一同出航。

牧师的年薪从六十到一百英镑不等，如果能顺利发放，这笔钱绰绰有余——在堂区的居民中这算是顶尖收入。捐助牧师工资原本是自愿的，后变为强制摊派，这使社区里的很多人深感愤怒，其中少数人还是教会成员，他们都缴过税金。收取捐助金的治安官常被恶语中伤，有时甚至遭拳脚相待，他要小心避开斧头和开水的袭击。塞勒姆的治安官着实接到块烫手的山芋。^[11]人们不愿意支持牧师，这着实打击了牧师的信心；在1693年，马瑟还为此大发雷霆：牧师们自觉上当，忍饥挨饿。在这场持久的工资保卫战中，托普斯菲尔德的牧师在镇民大会上说，他希望牧师住宅被烧成灰烬——连带着某些会众。牧师们十分清楚自己挣了多少钱，忍不住把它作为自我价值的体现。科顿·马瑟一度会计算每日的工资。牧师和教徒双方都承载了过高的期望。在他们相互指责的情形下，很难说是募集牧师工资先遇到了困难，还是说教众先对付钱听布道产生了抱怨。他们一方认为对方忘恩负义，另一方却认为对方在敲诈勒索。

塞勒姆一位活跃的陶工曾质疑过伯勒斯，谴责牧师只按自己的喜好布道，而社区却要为此买单。这话反过来说也没错。堂区居民会把手头上的任何东西当成捐助金，可以是一桶牡蛎、一蒲式耳^[12]豌豆、一磅^[13]亚麻布或一个蜂窝。^[14]教会成员也会付出劳动，为牧师种豆或宰牛。这使统属关系变得模糊，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它十分明确。“先生，您是服务于此的牧师吗？”一个前往邻镇罗利（Rowley）的过路人问道。“先生，我是统治此处的牧师。”牧师答道。尽管社区居民在牧师走进礼拜堂时会起身站立，尽管牧师一家会坐上专门的靠背长椅，尽管农民们会被他们博学的牧师唬住，但究竟是谁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牧师到底是会众的雇员、精神伴侣还是

从“遥远朦胧的教会星系”来的代表，这一点还不明晰。

尽管科顿·马瑟谴责使牧师挨饿的野蛮行为，他也不得不承认——在为牧师们争取费用时——他的一些有心的表述“可能在描绘牧师应得的报酬时言过其实了。”虽然牧师的数量已过于饱和，但很多讲道还是乏善可陈，仍然有许多教徒在长椅上昏昏欲睡。清教徒对自己精神的状态十分警觉，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可到了聚会时，他们并非总是如此。英克里斯·马瑟不屑地评价道，有些教徒会“坐在长椅上，听着世间最美妙的讲道打盹”。毫无疑问，在马瑟这场1682年的布道中，也有人睡着了。（坦白讲，对新英格兰的农民而言，或许已经没有比这更好的休息之处了，毕竟他们鲜有机会闲下来。）玛丽·罗兰森，这位因记录下自己在1675年被印第安人俘虏的经过而使整个新英格兰为之振奋的人，也会偶尔在丈夫的讲道中打盹。

塞缪尔·帕里斯在上任两个月后开始抱怨堂区居民的惰性，以及当着面所做的蠢行。他责骂他们“悄声谈论无聊的话题，还会打盹小睡”。他指出了“毫无理由的来回张望”，但还有一些他没有提及的事物：从旁听席中飞出来的核桃，楼梯上的滑稽举止；人们吐唾沫、大笑、挑逗和削木头；捅到肋骨的手肘、碰到背部的膝盖和偶然间向鼻子挥去的拳头；因为邻居不腾出位置而往邻居腿上坐的女人。新英格兰的礼拜堂是个庄重而热闹的地方。那年春天，玛莎·卡里尔在唱赞美诗的中途，粗鲁地推搡了一位十二岁的女孩。正是在宗教聚会中，你明白了你姐姐为什么哭得双眼红肿，你得知有名海盗已经被俘，还有只狮子在安多弗被杀。布道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事情，它代表了社会和精神的标准。它作为共同交流的唯一常规手段，也承担着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在新英格兰，去做礼拜的人一生中平均要听超过一万五千个小时的布道。这么多人意见一致的时刻很少见。很多人会在布道中记笔记。其他人在

其后的几天里都在讨论布道的内容。帕里斯在讲道坛上讲话，观众们在台下听着，零星的内容将会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流传开来。但他们的注意力并非总能如此敏锐，当邻居在另一排打呵欠时，他们没有注意到邻居舌头下的魔鬼印记。

塞缪尔·帕里斯第一次在塞勒姆布道是在1689年11月。他初到村子的时候资历尚浅。1653年，他出生于英格兰，在巴巴多斯（Barbados）度过绝大部分的少年时光，他的家庭在那里从事种植产业，经营相关生意，过着富足的生活。尽管牧师职业或许曾是帕里斯的选择——他在哈佛上过几年学，却因为父亲去世而于1673退学——他的过往经历却与商业沾边。20岁时，他继承了一个种植园和七十名奴隶，便回到了巴巴多斯。他日子过得不错，努力维护着一百七十英亩 ^[15] 的土地和从他叔叔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几年之内，他贱卖了这些财产。1680年，他又一次出现在波士顿，自称为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当时，他已经结婚了。一开始，他的生活颇为安定富足，但是，尽管马萨诸塞的经济形势比巴巴多斯更有利，他的事业却开始走向失败。有一年，帕里斯为了一次颇具争议的贷款而数次进出法院。他渐渐习惯商业竞争，就像习惯交易一样。机会时常降临，但他每次都抓不住。

1688年，塞勒姆教会的代表团找到他时，他是波士顿第一教堂的成员，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没有人清楚他决定当牧师的原因和过程；更多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牧师会离开讲道坛，走上经商之路。早先，他认为自己是商人和绅士，足以拥有自己的小肖像画 ^[16]。他相貌堂堂，面庞硬朗，眼距较宽，嘴唇丰满，一头黑发蓄到了肩头，十分引人注目。他是唯一一个我们能把名字和脸联系起来的塞勒姆村人。他的兄

长是英格兰的牧师，有位叔叔在波士顿第一教堂讲道。帕里斯曾服务于马萨诸塞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还在一些非正式的祷告小组发表演说。他与几个当地的神职人员很是亲密，其中包括他在米尔顿（Milton）的表亲。塞勒姆向他抛出橄榄枝，帕里斯却迟迟不做决定。“这是一项重任。”他解释说。在必要的时刻，农民们会决定他的命运。哪怕他对塞勒姆的历史毫无所知——当然这不太可能——他也有各种理由产生顾虑。他的前一任牧师德奥达特·罗森是同一波士顿教会的成员，两人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里，塞勒姆的有关人士都对帕里斯——当时连哈佛文科硕士都找不到神职，这位学士学位都没有的候选人却不情不愿——大献殷勤，向他大肆吹捧塞勒姆村，及此地未来的牧师。但他们彼此都非对方的首选。

双方最终开始了协商，过程漫长而艰难。尽管没有经商的天赋，他也很享受协商过程。相比先前被村民们弄得精疲力竭的牧师，三十岁的帕里斯更加老练。他见过更多世面，可缺乏在落后地区的生活经验，他称此地为“可怜的小村庄”。波士顿与塞勒姆村比起来显得光彩夺目，这个繁忙城镇拥有八万人口，是清教徒的聚集地，人们在那里身穿挂着绸带、镶嵌着银色蕾丝的外套和深红的衬裙，而塞勒姆村呈现的色调则截然不同：柔和的绿色、暗淡的紫色、深沉的褐色。它们都与巴巴多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塞勒姆村根据当时的行情给出了最优报价。作为老练的谈判者，帕里斯丝毫没被打动。他认为这些条款“与其说鼓舞人心，不如说令人失望”，便就此提出八个条件。其中，最难以执行的条件与柴火相关。如果说牧师为赢得尊敬所做的斗争变成了对工资的商议，那为争取柴火所做的斗争则成了引爆点。对于地方而言，运送柴火是一种重负；只要柴火无法送达或不达标准，就会招来抱怨。“这不就是些软木吗？”后来的一位牧师在教友卸下柴火时说。“难道我们听的布道有时不也很疲软吗？”教友回敬道。

帕里斯希望有人能给他运送柴火。而村民们仍希望募集资金，好让他自己安排。他们没有自己的村议院，木材便很难获得。到1692年时，本就稀缺的木材成了新英格兰人长期关切的问题。木材的使用、采伐和出口都被严格管理。村子里，提议和反对随之而来，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帕里斯为人固执，自我意识过强，没有办法协调现实条件与自身的利益追求，便拒绝了村民首选的募资提议。而且，柴火的价格将来很可能会上涨。1689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争论不断，英国王室强行施加给殖民地的圣公会总督 [\[17\]](#) 在那年被推翻，紧接着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与印第安部落间的小规模冲突不断加剧；马瑟的《难忘的天意》出版，其中包括对被施咒的古德温一家的记录。“在被多次催促以后，”帕里斯记得，“我回复说将按他们的方式尝试一年。所以，双方在这件事上的争论就此结束。”

协商还在进行的时候，帕里斯、伊丽莎白、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奴隶就搬到位于村子十字路口的牧师住宅。那是一幢坐落在两英亩土地上的房子，大烟囱的周围配置了四个壁炉。帕里斯在四间刷白的房间后搭建了一个大披屋；据推测，孩子们和佣人们住在楼上。十八个月后，这家人失去了一个和他们一起搬来的年轻黑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村子里刮着大风，帕里斯在几个邻村牧师的见证下——其中包括约翰·黑尔和塞勒姆镇的两个牧师——接受任命，这对塞勒姆村和它的新牧师来说都是重要的一步。帕里斯的演讲提及了约书亚，展望了新的时代。帕里斯上任以后，塞勒姆村就可以举行至关重要的圣事了。他承认村民生活艰苦，便发言安慰他们：荒野岁月已告一段落。那天，上帝会收回他的责备话语，农民们可以携手共进。这位新牧师把自己也纳入这个诺言中。他的工作很繁重，但在实际行动中充满热情。他承认自己会遵循古法，给一些人甜头，给另一些人苦头。“你们要爱我。”帕里斯命令会众。他以不那么正统的方式寻求人们对他的敬意。“你们确实要爱基督

耶稣的每一个牧师，但是（如果可以，尽管我只是众多牧师中的一个），你们还是要最爱我。”

有些人遵循帕里斯的命令，有些人却没有。他没能轻易达成目的。很多镇子都使牧师的生活变得十分悲惨，但还是有少数几个牧师像帕里斯一样严肃地与会众打交道。他有时表现得沉闷、固执、郁郁不乐。可他有自己的标准，他喜欢妥善处置事务。他在细小的事情上投入很多精力；他倾向于有条不紊的状态，但这种状态也会造成混乱局面。1690年初，裁缝以西结·奇弗的妻子即将分娩，奇弗不经邻居的同意，就冲动地从后者的马厩里骑走一匹马，想必是要去找产婆。他的邻居对此表示抗议。解决这个问题重任就落到了帕里斯身上，他要求用三次集会以了结此事。他要求奇弗公开道歉，因为他既冒犯邻居，也辜负了教会。奇弗很爽快地道了歉。帕里斯却认为他在“装模作样”，便命令这位新晋父亲下周在礼拜堂里重新忏悔。帕里斯就是这样一种人——相信自己一个人就能胜任工作，随后又抱怨没有人来帮忙。他会耍小心眼，不像任命他的塞勒姆镇的老牧师，人们从帕里斯那里听到的“安慰就像露水一样稀少”。

帕里斯试图在布道时夹带自己的议论，他会喋喋不休地谈论某件事。他时常觉得有心无力，但不愿就此服软。放在圣餐台上的锡制酒杯很是碍眼（当时更富有的会众使用银制圣餐酒杯），就不能被换掉它们吗？他把很多在塞勒姆村少有的物件带进了牧师住宅：他自己的银制酒杯、一张写字桌和一面镜子。他还拥有一个盾徽，在马萨诸塞的牧师当中都很罕见。帕里斯是在巴巴多斯长大的，那里是最富裕的英属美洲殖民地，正处在鼎盛时期。他见识过那里的富贵人家和他们慷慨的款待方式。塞勒姆看上去则破旧不堪，而且——如果考虑到巴巴多斯的人家雇用的仆人数量——此地对帕里斯来说也无疑是穷乡僻壤。他很快就开始

游说争取牧师住宅和那片土地的所有权。这一要求并无不妥，但当时提出还为时过早。塞勒姆镇只会把它授予长期服务的牧师，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

任职不到一年，帕里斯就收集了很多抱怨，他把它们一一编号，试图读给会众听。但因为在气头上，他试了两次都没能念完这些话。最终，他得以在一次特殊的集会中大发一通牢骚。无论是房子、篱笆和草地，还是工资和木柴供应，通通都没有让他满意。牧师住宅已建立了八十年之久，急需修缮。他的篱笆已经烂得快要塌了。灌木丛侵占三分之二的草地。没有工资，他无法维持生活。至于柴火问题，他留到了最后才说。在遭遇了麻烦不断的三个星期后，他才收到两小车木柴。此时已是10月底，他警告他的会众，如果再没有木柴，他们就不会再听到他诵读圣经。“不做研究就没法布道。没有柴火就没法做研究。不做研究就没法安静生活。”帕里斯解释道。他要求他们尽快考虑，“许诺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式回应”。冰凉的空气裹挟着怨愤、忧虑和沮丧，他的家人全因此感到不快。他们招呼那些不满的访客，听他们不断提高的嗓门和愤慨的跺脚声。牧师发现他的会众极度无礼。在他的请愿书中，帕里斯在签名处附上一句不容分说的自怜的话：“让我补充一句，如果你们再这么吵下去，不是会把我吵进坟墓，就是把我們吵去他处。”他明白，这些教友对待前任牧师的态度更为友善。没有一位前任表现得像他这么糟糕，也没有一位像在热带住了近十年的他一样对冷空气如此敏感。

村民们屡次集会讨论牧师的困境。在他任职的几个里，他的工资遭到拖欠；早在1690年秋天，一项解雇他的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负责募集工资的委员会在1691年底投票决定不再进行募集工作。柴火仍然短缺。幽怨的情绪在他的布道中浮现。同时，正如他在布道坛上所强调的，牧师住宅变得越来越冷。10月8日，他告诉会众，要不是来访的塞

勒姆镇执事在最后一刻雪中送炭，他早就冻僵了。他没有恳求他们对他的家庭实施救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已受到挑战，也只好在极端天气中哆哆嗦嗦；当时正值大雪纷飞、狂风呼啸的11月。帕里斯告诉月初来访的委员会，他们最该关心的不是别人，而是他。11月18日，在铲除了成堆的雪后，他抱怨“自己的木柴只够烧到明天”。1691至169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圣餐盘里的面包、钢笔中的墨水和壁炉里的树液都冻住了。凛冽的寒风从烟囱里刮进来。在帕里斯的布道对象中，有的此起彼伏地咳嗽和打喷嚏，有的因脚上生了严重冻疮而拖着脚走路。1692年1月3日，为了让大家舒服些，他缩短下午布道的时间。天气着实太冷，实在难以继续。

除去村里的争吵，帕里斯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抱怨。他的工作繁重，他之前对此几乎没有准备。他需要同时承担几项工作。前一分钟，牧师还在“小村庄”里研究神学，后一分钟就在给他的母马修剪毛发了；为了主持一场祷告集会，他不得不停下花园篱笆的修复工作。在哈佛期间，帕里斯曾将旧约翻译成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同样也要忙于种芜菁、做苹果酒、捕杀松鼠这类事物；也许，他在村里时也会在住宅挂张世界地图，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既要做牧师的工作，又要管理农场，这太让人为难了。”一位马萨诸塞的牧师悲叹道。帕里斯——这位做过房地产投机买卖、后又照料自家土地的人——应当会有同样的感觉。单是无休无止的牧师工作本身，就已经相当艰巨。“天底下没有一座教堂会像新英格兰的一样期望牧师提供这么多不同的服务。”科顿·马瑟悲叹，他并不为田园之旅而兴奋。在家里进行宗教指导后，帕里斯会呼吁教友提问。他是抄写员，是审判官，是顾问，亦是他们的密友。他恪守斋戒，也为教徒洗礼；他安排讲课，也与附近教堂的会众交流。他安慰病人，和痛失亲友的人，包括在1689年夏天因印第安人袭击而失去儿子的四户人家。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一位牧师算过，自己一

连八年都在勤恳工作，没有休息过半天。情况好的时候，牧师也有可能累得精疲力竭，何况帕里斯所面临的情形还那么糟。他已经做好了被冒犯的准备，越来越执迷于谈论耶稣遭遇的创伤。在1691到1692年那个无情的寒冬到来之前，他似乎更适于招致灾难而非担任神职。

除了其他事情，这家人的礼拜行为也使他们像贝利家一样陷入麻烦。每天早晨和傍晚，帕里斯和他的家人都会做祷告、读圣经，他的仆人也需要跟着做，他们的灵魂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召集家里人到壁炉前唱赞美诗，每周做一次教义问答。很多牧师的孩子们都会在星期六晚上听到次日布道的预演；安息日结束之时，牧师会在家中回顾白天布道的要旨。帕里斯强调教会的基本准则，重视契约规定的职责。人生而有罪，为得到主的恩典踏上朝圣之路。争夺灵魂的战争已经打响，虔敬者与罪人必将分开。教堂圣礼至关重要。在清教徒父母对孩子的养育中，宗教教育应贯穿始终，像马瑟就会为他的儿女策划仪式。尽管帕里斯不比马瑟有创造力，但他也非常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与他们的精神健康密不可分。在女孩们开始紧张、抽搐之前，她们的灵魂被密切监督和日常审查；在新英格兰，年轻人全神贯注。帕里斯虔诚地期望堂区居民们都能有所警惕，担心他们不当回事。他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观念，即家庭秩序正在瓦解：今时今日的孩子是怎么了？在坎布里奇的一次牧师聚会上，他带头要查明为此可以做什么。

伊丽莎白·帕里斯比她丈夫大五岁，婚前是波士顿第一教堂的成员，现在则在塞勒姆的教堂长椅上与帕特南家的五位夫人齐坐，可能还要帮丈夫分担工作。人们都期待她能一直保持虔诚，关爱邻里。在1692年发生了那扰乱人心的事件之后，她的责任又加重了；她要负责孩子们的教育，也正是她教会他们读书，无论如何，她都该与家里的孩子阅读和讨论圣经。自1647建立学校的法令出台后，基本的读写能力就成了新

英格兰人的需求，马萨诸塞卓越的教育当归功于此。同时，这一法律也是一个防御措施。众所周知，“撒旦这个老骗子的头等要事就是让人远离圣经的知识”。问题的关键是要以智取胜，避免恶魔的袭击；哪怕是在严冬时期的新英格兰，他炙热的呼吸也能拂过脸颊。塞勒姆镇上，没法教孩子读写的父亲会在礼拜堂的门上读到一纸通告，上面说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可教授读写的人家去做仆人。尽管基本的读写能力是必要条件，但还远远不够。一位后来成为牧师的人在六岁前就已经看过三遍《圣经》。至于在青春期前看过十几遍《圣经》，或将其中的长篇大论熟记于心，都不算是什怪事。

一个理想的清教徒妻子是谦虚自重的，伊丽莎白·帕里斯有责任成为这样的人；与她有关的记录鲜有留存，除了印着她姓名首字母的黑锡盘碎片。至于帕里斯作为父亲的模样，我们能看到的也不多。他曾警告他的会众：“明智的父母可不会让孩子糟蹋食物。”还有，贤明的母亲会对孩子进行“杖责和管教”。也许，他在布道台上的声音听起来会比在餐桌上更暴躁，但我们很难相信，他的孩子能在争辩中战胜拥护行为标准及拒绝道歉的父亲，连堂区的居民都很少能赢过他。帕里斯明察秋毫，能打探到秘密的问题，在可以提出三个观点的时候从不只提一个。1月，他在一次简短的布道中又显现了为人父的作风。当塞勒姆的村民弯起又张开疼痛的手指和脚趾时，当百叶窗被风吹得咯咯作响时，帕里斯选读了《圣经》中关于痛苦的文字，启发昏暗礼拜堂里的教众。它使人更加警惕，也使人变得谦卑，着实教导了众人。上帝传递痛苦时所秉持的精神与父母一样，帕里斯说道，父母在“看到他们年幼的孩子无畏于火或水”时，就会“带他们靠近火，或把他们托举在水面上，好像要烧死或淹死他们一样”。当然，没有父母真的打算这样做。他只是在努力，帕里斯解释，“让他们感到敬畏和恐惧，那么他们以后就可能与之保持距离”。^[18]

很快，寒冷的牧师住宅就会笼罩在敬畏和恐惧之中。可它并非孤例。2月，就在女巫蛋糕把阿比盖尔和贝蒂的折磨者曝光之前，或与之同时，十二岁的安·帕特南——帕里斯忠实的拥护者托马斯·帕特南的女儿——开始不断发抖，呼吸困难。在这条路另一方向的三英里外，格里格斯医生十六岁的外甥女伊丽莎白·哈伯德也出现了抽搐的症状。2月，在她办完差事回家的路上，一只动物冒着风雪一路跟随着她。现在，她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一匹狼。这四个女孩都将斩钉截铁地说出是谁在拧捏和捶打她们。在1692年的余下日子里，塞缪尔·帕里斯再也没有提及过柴火。

[1] 一英里约等于一点六公里。

[2] 当时北美正处于“威廉王之战”（William King's War）期间。这场战争从1688年持续至1697年，是英国等国与法国在欧洲进行的“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在北美的延续，亦是英法之间的第一场北美殖民地战争。1692年6月中旬，马萨诸塞的港口城镇格洛斯特有居民声称自己目击到法国士兵及其原住民盟友出没，其后亦有相似言论出现，关于格洛斯特即将爆发战争的谣言四起。在经历人心惶惶的两周后，一支六十人的伊普斯利威民兵队伍被派往格洛斯特，他们经过巡视后发现此事实为谣传。该事件显示了当时新英格兰居民的惶恐心态及舆论氛围，亦被视为审巫事件的前兆。

[3] 一英尺约等于三十厘米。

[4] 黑暗之王（Prince of Darkness）指撒旦。

[5] 马瑟引用了凯撒形容斯基泰人（Scythians）的话，他认为美洲原住民是斯基泰人的后裔。还有人则认为，原住民可能是一个希伯来

部落的后代。

[6] 菲利普王战争 (King Philip's War) 发生于1675年至1678年，是印第安原住民和新英格兰移民之间在北美殖民地上爆发的一次大规模战争，以新英格兰取胜告终。

[7] 瓦巴纳基 (Wabanaki) 是由北美五个民族和部落组成的原住民联盟，曾活跃于今天美国东北部及加拿大南部地区，在威廉王战争中与法国殖民者结盟以对抗新英格兰。

[8] 在1692年康涅狄格的一个案例中，一个浑身抽搐的女孩的父亲鼓励他人前来拜访；重点在于，访客们必须亲自看到这些诡异的事情。这位父亲希望明确一点，没有人是在演戏。

[9] 假如有这么一场区别巫术和附身的严肃讨论，我们也会对讨论内容感到不解。并非每个人都能区分两者，或有意图去区分它们，因为巫术和附身带来的症状基本相同。马瑟注意到，两者“关系密切”，甚至在《难忘的天意，关于巫术与附体》的标题中将两者结合起来。巫术和附身互为因果。负责格罗顿案件的牧师说：“由施巫导致的附身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一点上，他遵循马瑟父亲英克里斯的观点，英克里斯相信人可以同时遭受巫术和附身带来的痛苦。）帕里斯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很早就暗示了恶魔的附身。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被附身者不会受到肉体上的伤害，而女孩们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很快，幽灵的出现支持了巫术的存在，帕里斯有理由倾向于这一诊断。合谋造成了两者间的不同：不洁寄住在被附身者的身体里，因此被附身的人是有罪的；而被施了巫术的人则是无辜的。

[10] 哈佛学院 (Harvard College) 为哈佛大学的前身，以“新学

院”（New College）之名成立于1636年，是美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

[11] 许多人和一位家在塞勒姆村北面的农民有同感——他的家横跨了托普斯菲尔德和伊普斯威奇的界限。当治安官从一个方向走近他家收取捐助金时，农民就会跑到另一边。（治安官怀尔兹用武力解决了这件事。他请几个体格强壮的朋友帮忙，抓走农民的一只优种猪，宣布收款完成。很快，这位治安官就会发现，抓捕女巫并不像此事这么件简单。）

[12] 一蒲式耳约等于八加仑或三十六升，但该单位也会针对不同农产品而变化。

[13] 一磅约为四百五十克。

[14] 哈佛学院四年课程的学费约为五十五英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支付的，最常见的是以麦子和麦芽支付。偶尔也有新英格兰父亲将儿子送到坎布里奇，以欧洲萝卜、黄油和山羊肉作学费。一块一百一十镑的牛肉就足够支付一年的学费。从另一方面来看，四年的学费相当于一幢小屋的成本。

[15] 一英亩约等于四千平方米。

[16] 在当时，只有上流社会的精英才有钱请画师为自己画像。

[17] 圣公会即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于1534年正式成立，至今仍为英格兰国教。此处的总督是指埃德蒙·安德罗斯，他担任殖民地总督期间强行推行圣公会，打压清教徒，引起波士顿起义。

[18] 同样，科顿·马瑟觉得有必要在自己即将去世之前，为八岁

的女儿安排好一切。他却比她多活了十二年。

第三章 怪异之事

我见过的世面太多了，不会不知道一位女性的印象或许会比一位分析推理家的论断更有价值。

——阿瑟·柯南·道尔

在玛丽·西布里的女巫蛋糕实验之后，暴风雨席卷了埃塞克斯县，冬雪融化，河水上涨。大水漫过河岸，淹没家园，冲走牲畜，冲毁磨坊和桥梁，淹没刚耕作过的农田。这个村庄已经完全变为一个沸腾而泥泞的沼泽。2月29日，托马斯·帕特南在与牧师商量之后，同三位朋友一起冒着暴风雨骑马赶到塞勒姆。女孩们现在明白是谁在折磨她们；星期一，几位身披溅着泥水的斗篷的中年农民找到两位塞姆法官，正式提出针对巫术的控告。几个小时以后，村里的治安官手拿着镶铜尖端的黑色棍棒，敲开一扇房门，那座房子位于牧师住宅西南的一英里处。治安官携带着搜捕莎拉·古德的令状。第二天早上，古德需对法官交代，自己在过去两个月里折磨了帕里斯家的两个女孩、托马斯·帕特南的女儿和格里格斯医生的女仆。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罪孽（sin）和罪行（crime）就是近亲，当时的死罪清单则来源于《圣经》。

莎拉·古德是半流浪的乞丐，对当地构成了某种威胁。要不是格林兄弟还未出生，她似乎就是直接从他们的童话里蹦出来溜进村子的。若追溯她的过去，那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向下流动的冷酷故事。十八岁时，她法国籍的父亲——一位富有的客栈老板——自杀了。他的一大笔财产全都转到她的继父手里。二十多岁时，她的丈夫突然去世，为她留下一笔债务。紧接而来的是一系列的诉讼，使她心生怨恨，又一贫如洗。她

和家人长期靠着在谷仓和田地之间乞讨度日，让规矩而勤劳的邻居感到惶恐。她和第二任丈夫威廉并不经常一起生活。最近，她出现在牧师家里，她五岁的女儿也被拖在身边。帕里斯给了孩子一些东西。古德随后扬长而去，途中还小声嘀咕着什么。帕里斯一家因为遭遇这样衣冠不整又大吼大叫的邻居而心绪不宁。在马萨诸塞，对穷人的救济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那里资源匮乏，而无所事事会让人们心生疑惑。大家都希望把穷人驱逐出去。这几个星期里，两处塞勒姆都在应付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菲利普王战争留下大量寡妇和孤儿之后，问题变得尤为急迫。塞勒姆的农民想知道——他们再次为自己的独立讨价还价——如果他们施舍穷人，镇里可以免除他们的公路养护费吗？

碰巧莎拉·古德早已让塞勒姆的人家感到不安。三年前，她和家人无家可归；一对好心的夫妇为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古德却向他们展现了“她的情绪多么难以控制，她怀有恶意，而且心术不正”，于是六个月后，房东就把她撵走了。他们一刻也不能忍受她的存在。古德侮辱他们的孩子，恐吓这家人，以此来回报他们的好意。那个冬天，房东家的牲畜开始莫名其妙地病倒和死亡。古德听说了这不幸的事故，却表示自己根本不关心他们失去了几头牛。当另一位村民因为担心她携带天花病毒而拒绝她进入家门时——古德身上显然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她责骂并诅咒对方。如果哪户家人不打算款待她，她就会愤怒地表示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果然，第二天早上，那家人的牛就“突然离奇死亡了”。古德还向治安官赫里克的兄弟寻求收留，后者把不断低声抱怨的她拒之门外。她继续在他家附近徘徊，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务必让她离谷仓远点。考虑到她对自己那支烟斗的热爱——她并非唯一一个抽烟的马萨诸塞女性——她很可能会放火烧了谷仓。而且，古德保证赫里克一家会为他们的冷漠付出代价。或许，她当时只是做了些模糊的暗示；而我们所知道的她的言论，都出自他人之口，而非听她本人所说。当然，她也绝不可

能让人感到舒服。此后，赫里克家几只最好的奶牛也消失了。这三户人家都有理由马上去检讨他们倒霉的遭遇。

3月1日早上10点，治安官将莎拉·古德送到英格索尔家的酒馆，审讯将在这里开始。如果说这个村庄有一个中心，那就非英格索尔酒馆莫属。它离礼拜堂仅几步的距离，就在牧师住宅的南面，沿着塞勒姆——安多弗路往北走就能到达。在星期天布道的间隙，帕里斯的会众就在这个酒馆歇息。那一天上午人满为患，唯有缺席者值得注意。莎拉·古德的邻居，正直的玛莎·科里决定不参加审判。她还试图留住丈夫，准备给丈夫的马解下马鞍。但她还是失败了，贾尔斯·科里一分钟也没有错过审讯。小镇的法官到达后，英格索尔酒馆显然无法容下这么大一群人。于是，审讯就转移到村里简朴的礼拜堂，它有一个椽木屋顶，在鼎盛时期也只是间昏暗的屋子，多年来一直未受重视，现在愈显阴暗和惨淡。塞勒姆的农民迟迟不加补葺，仅用木板封住破损的窗户，任凭其他地方暴露在空气中。这个地方过于黑暗，几乎无法使用。但是，激动人心的节日气氛仍弥漫其中。殖民地没有剧院这种被认为是“可耻的虚荣”的场所。尽管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都存在于世，人们在北美却找不到哪怕一册——十九年后，这里才出现第一架管风琴。那个星期二，惯例和所有等级制度都消散在了躁动不安的空气中，正如几个星期后，禁令、义务和宵禁都完全消失了一样。农民们原本对自己在黑木制长椅上的位置再清楚不过了——在所有争议中，座次问题几近恶劣，它取决于一种考虑到年龄、地位和财产的算法，往往伤人自尊且充满竞争——可那天早上，他们都没坐着。

在讲道坛前的桌边，主持审判的是治安法官乔纳桑·科温和约翰·哈桑。他们算是最早来到塞勒姆镇的人，颇受人们尊敬。黑头发的哈桑是位成功的土地投机商，也是个机敏的民兵上尉，住处是一栋华美的豪

宅。哈桑从1684年开始审理案件，他审问时总爱摆出一副严厉又老练的样子，就像他父亲在他面前所做的那样。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但他对青春期的女孩毫无养育经验。科温则开了数家锯木厂，其中几家是与哈桑合开的。科温的父亲是塞勒姆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他继承了一笔财富，还娶了另一位富商的女儿。两位法官都五十出头，不仅是亲密的盟友，还有姻亲关系。两户人家仅相距一个街区。他们一起坐镇塞勒姆镇的礼拜堂时，通常由哈桑挑大梁。前不久，他们还一起去缅因边境评估防御印第安人的工事。他们两人虽然没有法律背景——受过正规法律培训的人通常不会移居到殖民地，因为那里没有法学院——但知晓社区里的所有事务、罪犯和罪行。五年前，哈桑所任职的委员会曾劝说村民们不要对塞勒姆镇心怀怨恨，还曾投入大量时间来裁决帕特南家族的纠纷。毫无疑问，他们参加帕里斯的圣职授予仪式时都松了一口气。科温曾于10月的紧急关头给帕里斯一家送去木柴，把他们从寒冷中解救出来。

开场祷告后，哈桑负责审讯长桌后的莎拉，这张长桌平常是帕里斯和他的执事用来进行圣餐礼的。“莎拉·古德，”哈桑问道，“你认识什么邪灵？”她回答：“一个都不认识。”哈桑根据准备的笔记继续发问，好像她说的是反话一样。她和魔鬼签约了吗？她为什么要伤害这些孩子？她雇用了什么生物来做这些事？他更像是治安官而不是法官在进行审讯；他的职责不是查明指控背后的真相，而是坐实嫌犯的罪行。八年前，一个受到指控的小偷落到哈桑手里，他开口就问：“你星期几偷了伊丽莎白·拉塞尔的钱？”第二个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偷的？”再下一个问题是：“你在哪儿偷的钱？”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辩论。尽管犯过轻罪，但除了控告继父外，古德此前从未出庭，直到那个湿漉漉的早晨站在哈桑和科温面前——双方相

距几英尺远，中间隔着齐腰高的栏杆。这种对峙，能使尽责可靠的人也开始胡言乱语。不管怎样，哈桑还是未获得一点进展。古德依旧阴沉着脸否认一切，她在他人门阶上的言语有多过激，那她在法庭上就有多守口如瓶。哈桑尝试了不同方法。你在牧师住所附近嘀咕些什么？她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感谢帕里斯牧师的施舍。她是被诬告的。她对魔鬼一无所知。哈桑指示那四个坐在一起的女孩站起来。是这个女人伤害了她们吗？四个女孩不仅都作证她伤害了她们——其中三人在那天早上还遭受她的虐待——在华盖笼罩的讲道坛前，她们与古德正面相对时甚至开始剧烈地扭动身体。哈桑没有办法，只能让人带走她们。“莎拉·古德，你难道没看到自己做了什么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你为什么这样折磨这些可怜的孩子？”他大声斥责。女孩们仍在痛苦地扭动着，翻滚着，古德不禁同意确实有东西在折磨她们。但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尖刻地问道。和其他人一样，她知道哈桑还逮捕了另外两个女人。他认定其中必有元凶。

当哈桑第四次或第五次问是谁对这些孩子施魔咒时，古德给出了回答。她说出了莎拉·奥斯本的名字，当天下午莎拉就被逮捕，她的房子被前来找证据的人翻了个底朝天。恢复过来的女孩们澄清说，奥斯本和古德一起折磨她们。哈桑又把话题扯回了“咕啾”——古德从人家的房子附近悄悄溜走时，她在咕啾什么？他暗示说，她要么是在念咒语，要么是在与她的恶魔同谋商讨对策。咕啾意味着话中有话，在新英格兰更是嫌犯和破坏分子的象征。这个词有一丝罪恶和叛乱的意味。它会直接造成无政府状态——窃窃私语的人一多，暴乱也就不远。据被印第安人俘虏过的人回忆，印第安人总爱咕啾。科顿·马瑟那时写道，“窃窃私语”就是“魔鬼的音乐”。

往好里说，古德是个刻薄的人，往坏里说便是粗鲁无礼。“她的回

答充满恶意。”一位法庭速记员这样写道，他转而运用第三人称叙述，用自己的评论代替了古德的声音。毕竟古德看上去就令人生疑，她饱经风霜，浑身脏兮兮，看上去和她的名声一样凄惨。人们看她几眼，会以为她已经七十多岁。实际上，她才三十八岁；就在三个月前，她还刚生了孩子。她继续抵抗衣着考究的审查员，而他必须套出她的回答。最后，她在咕哝问题上终于败下阵来：“如果真的要我说，那我就说吧。”一开始，她说自己是在默念《圣经》中的戒律。但因为被逼讲述细节，她又改变说辞，这回变成了一首赞美诗。在支支吾吾解释前（一位速记员认为她是在“喃喃自语”），她还停顿和沉默了好一阵子。“你为谁效劳？”哈桑的追问来得有些突然。“创造天地的上帝。”古德回答，虽然她说出主的名字时勉强而犹豫。她可以解释自己为何在礼拜日缺席：她没有合适的衣服用来参加聚会。

就算她刺耳的回答没有决定她的命运，她的丈夫也会对她落井下石。屋里有人主动站出来，声称威廉·古德曾对自己的妻子表示怀疑，说她“要么是个女巫，要么马上就要变成女巫了”。哈桑急切地要这个倒霉的织工提供细节。他目睹过什么邪恶的行径吗？没有，但妻子对他满是恶意。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不得不承认“她是一切善行的敌人”。那天房子里也许不乏倒吸凉气的声音，但它们并不会被记录在案；以西结·奇弗，那天在职的记录员之一，没有理由保留它们。长期以来的贫穷生活对婚姻没有益处；莎拉·古德对招待她的人家的牲畜缺乏同情心这件事，也正是她丈夫报告的。妻子被捕的前一晚，威廉·古德透露，他发现她的右肩下面有一个巫婆画下的符号，那是魔鬼给新支持者的印章。她以前从没有这个印章，他想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见过。哈桑将古德还押候审。

他同样严格地盘问第二名嫌疑犯——中年的莎拉·奥斯本。和古德

一样，奥斯本一直在追讨一大笔遗产，那是她丈夫在1674年去世后留下的。这笔钱的追讨进展很慢。与此同时，她开始与一名爱尔兰农场工人交往，不久后便结了婚。关于她的谣言流传多年，而最近的一则是她早已卧床不起。哈桑再次听到被告人的断然否认，比起古德，奥斯本更加和善和体面。奥斯本拒绝把古德牵涉进来，她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后者，而且两人也只是萍水之交。但莎拉把你卷进来了，哈桑刺激她。奥斯本没有上钩。又一次，哈桑让女孩们起立。她们能指出证人吗？每个女孩都积极地指认了她。她们说，当她对她们又掐又勒时，她穿着和审讯这天下午一样的衣服。在被捕后，奥斯本意识到自己身处是非颠倒的困境，有人听到她感叹道，与其说自己是个女巫，不如说是被人下咒。这引起了哈桑的注意。他问，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奥斯本讲述了她时常做的一个噩梦。在睡着时，她看见或梦到自己看见——这一表述的区别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一个形似印第安人的身影。他掐住她的脖子，扯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前门。至于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大多数马萨诸塞的女人早已考虑过。玛丽·罗兰森在其畅销故事作品中指出，在她被印第安人绑架前，她时常断定自己宁死也不愿被野蛮人活捉。^[1] 所有人都听过野蛮人将婴儿撞向树木，挖取怀孕女人内脏的传闻。虽然村民们对穷人很不耐烦，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捐了一笔钱，以救济先前被印第安人俘虏的人。2月，这个村子募集了三十二英镑，这是帕里斯（未付的）年薪的一半。

礼拜堂挤满了人，有些陈年旧事又被人主动提起。在女孩们扭曲的姿态和一连串爆出的证据之间，哈桑的审判室在深冬微光中全然没了秩序。即使是从记录在案的文字中看，审讯过程也显得一片混乱；有一位研究17世纪的学者就指出，我们如今喊“法庭内保持肃静”并非出于偶然。奥斯本提出，自己似乎听到过一个可疑的声音。是魔鬼在跟你说话吗？哈桑问。“我不知道你说的魔鬼。”奥斯本平静地回答。她认为自己

曾听到一个声音，建议她不要参与教徒聚会。她没有理会。哈桑的问题仍持续不停。“你为什么要屈服于魔鬼，乃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去做礼拜？”他质问道。奥斯本一直在生病，帕特南家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她是有段时间没做礼拜了，可她被卷入了一场与村里望族的诉讼，这比她缺席礼拜的时间还久。她的第一任丈夫在遗嘱中将托马斯和约翰·帕特南定为遗嘱执行人，后者成了她十年诉讼中的敌人。她的现任丈夫精确地指出她已经连续十四个月没有参与教会的聚会。那天，或者是第二天，酒馆老板的妻子为寻找女巫记号检查了古德和奥斯本的身体。

治安员赫里克在逮捕奥斯本的同时，尽职地搜寻任何与巫术有关的图像、膏药和器具。他似乎大受鼓舞，而实际上，他的搜查令不包含这样的指示。但在有个地址，他的搜查一定很尴尬。十二岁的安·帕特南提供了第三个名字：提图芭，牧师的印第安奴隶。她至少从牧师一家住在波士顿的时候就跟随他们了。当帕里斯还在巴巴多斯时，她可能也服侍过他。值得注意的是，牧师的女儿们——提图芭与她们一起生活、祈祷、吃饭，晚上还可能一起睡觉——没有给她取名。帕里斯也没有。他还两次指出，约翰——人人都知道他是提图芭的丈夫——按照玛丽·西布里的指示烤制了女巫蛋糕。提图芭很疼贝蒂，而且精通圣经，绝非寻常的嫌疑犯。许多奴隶和佣人都会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她却从没有过。她从未被送上过法庭。多年来，提图芭在帕里斯家的壁炉前唱赞美诗、背诵教义；可以说，古德当初被赫里克一家拒绝得有多彻底，提图芭在帕里斯家的生活就有多顺利。对于困扰社区的种种麻烦，她一向无从得知。而且，古德和奥斯本都住在郊外，对参加教会聚会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传统上来说，女巫通常是边缘人：她们身处局外，行为异常；她们脾气暴躁，爱责骂别人，会因为生气而直跺脚。他们一般不会是有人种。从各方面来看，提图芭都不符合真正的女巫形象。然而，她还是被指证身怀魔力。

哈桑再次推定提图芭有罪。“你为什么伤害孩子？”他质问道。提图芭显然不是在用她的母语回答（“我不害她们根本”），她否认了自己做过这样的事。那又是谁在折磨这些女孩呢？哈桑继续问。“据我所知，那一定是魔鬼。”她答道——很快，她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开始描述他。莎拉·古德有多唐突无礼，那提图芭就有多开朗健谈，比起神话中的替罪羊，提图芭更像是邪恶版的山鲁佐德 [2]。她从清教徒的剧本中提取出大量恶毒的角色，活灵活现地将他们、作为他们同谋的动物及他们的超能力说给众人听。她口才了得，很会说服别人。

就在前一天，她清扫牧师家的披屋时，来了一个穿着深色呢大衣的白发高个男人。他指使她伤害孩子。他有四个共犯，包括古德和奥斯本，其他两人是波士顿人。男子威胁提图芭，如果她不去折磨女孩，他就杀了她。那这个男人此前有没有以其他的伪装出现过？哈桑问。毫无疑问，提图芭给帕里斯家厨房里磨粉剥豆的无聊日常带去不少生气；当她讲到兴头上时，她的故事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3] 她报告的内容生动且煽情，耸人听闻又欠缺考虑。早些时候，女孩们还在剧烈地扭动和尖叫，现在却没人弯曲身体，或发出一丝声音，她们得以减轻痛苦，被归功于提图芭的供认。

她的访客有一只黄鸟陪着。他还以两只红猫、一只大黑猫、一只黑狗和一只猪的形态现身过。如果她为他效劳，她就能得到黄鸟。前一晚，在祷告后不久，两只猫已经进过帕里斯家，它们抓住她，几乎把她逼进壁炉，命令她去折磨那些女孩。莎拉·古德也正是在当晚全家人祷告时出现的。她手里有一只黄色小鸟，身边跟着一只猫。她企图与提图芭讨价还价，还堵住了她的耳朵，让她听不见经文。此后的一段时间，提图芭还是听不到声音。即使她生活在对帕里斯的恐惧之中——仆人和奴隶可能会时常遭到牧师或他人殴打——她也更害怕那位穿呢大衣的访

客。他先后来过四次，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提起他，他就会砍掉她的脑袋。古德和奥斯本则伪装成幽灵的样子，让她为她们忙前忙后：她们派她到医生那里，让她去掐十六岁的伊丽莎白·哈伯德；又差遣她去帕特南家折磨十二岁的安。她们还命令提图芭用刀杀死安·帕特南，这一证词很快就得到确证；座位上有人说，安曾抱怨折磨她的怪物试图砍掉她的头！在大雨滂沱的一个星期里，提图芭出入过许许多多幢房屋，最远飞到了南部的波士顿。她十分善于讲故事，浅显的陈述表达更是让人信服。她的口音可能也起到一些帮助。在描述半透明的猫时，她的头脑保持着清醒，说出的话也合乎逻辑。而且她非常热情，法庭对她的审问时间足足是莎拉的五倍。没有人提出质疑，比如当她前一天在棚子里谈话时，或者那个早上她掐伊丽莎白·哈伯德时，她都是被关押着的。没有人问那位访客为何让她关注牧师四子中的那两个，也没人指出她是在女孩们经历第一次疼痛后才碰到那个访客的。但是，似乎也没有人想打断她。终于，他们有了些进展。

提图芭是如何飞行的呢？哈桑想知道这一点。“我骑了一根棍子，古德和奥斯本就跟在我身后。”她供认道，把这一切讲得明明白白。在飞行的时候，她们胳膊挽着胳膊。她说不清楚她们是穿过树林，还是从树上飞过，因为她们的速度过快。对她们来说，时间和距离毫无意义。提图芭的个子应该不高，她好几次请法官相信古德和奥斯本可以抓着她，带她远行。她还阐明了其他一些神秘之事。尾随伊丽莎白·哈伯德的狼？那是莎拉·古德变的。在帕里斯家的炉火前取暖、长着翅膀和长鼻的生物？那是莎拉·奥斯本。她声称不知用什么词形容这只生物，实际上却描绘得栩栩如生。她说不出高个男人同谋的名字，却了解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女人，她能认出她内衬为白色的兜帽。提图芭滔滔不绝地描绘各种细节，也在顺着哈桑的诱导性问题进行回答。如果他提到一本书，她就可以描述它。如果他询问魔鬼的伪装，她也可以说出具体的例

子。那天早上，她恰好有时间与古德和奥斯本谈谈。她几个星期以来都想着、担忧着、关心着贝蒂和阿比盖尔。她喜爱这些女孩，她对主人既言听计从，又有一丝害怕；牧师对自己孩子的关爱总是多于威慑，对仆人则是威慑多于关爱。提图芭和其他人一样渴求案件的最终结果，她的生活已完全被颠覆。这是一场无人入睡的表演。她刚说完证词，女孩们就又开始抽搐。“你看现在是谁在折磨这些孩子呢？”哈桑问道。“是莎拉·古德。”提图芭肯定地说。女孩们表示同意。她们依然大声叫喊，但提图芭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她连一个发音都发不出来。“我现在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在3月1日的审判即将结束、人们要做最后一次的祈祷前，她提出了抗议。

到了傍晚，提图芭和奥斯本就被关进了塞勒姆的监狱。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一天过得跌宕起伏，令人兴奋。法官离开后，一些琐事随之而来。镇民大会本该在1点召开，实际上很晚才得以开始。塞勒姆村民仍然就他们的职责问题与塞勒姆镇的人争闹不休。很显然，他们之间的分歧无法调和。农民们决定向议会发起请愿，他们委派一位治安官带头行动，要求塞勒姆村完全自治。他们还投票否决塞勒姆镇用公路维修服务来换取扶持贫穷村民的提议。慈善就是奢侈品，他们负担不起。

那天天黑之后，一阵神秘而持续的响声惊动了村里的修筒匠和务劳工：威廉·艾伦和约翰·休斯。当靠近响声时，他们发现地上有只“奇异且少见”的怪物。他们一走近，它就在银色的月光之下溶解；突然，两三个女人从中显现，即刻就飞走了。几乎就在同时，伊丽莎白·哈伯德在格里格斯家中开始呕吐。“莎拉·古德就站在你旁边的桌子上！”她向塞缪尔·西布里喊道，塞缪尔是玛丽·西布里的丈夫，在哈伯德生病期间照料她。古德光着脚，胸膛和大腿也毫无遮掩，着实吓了塞缪尔一跳。“要是我手上有家伙，我会杀了她！”塞缪尔·西布里一边咆哮，一

边伸手去拿手杖。他的手杖击中了这个幽灵般的女乞丐，一把压住她的手臂。很快，哈伯德的描述就被证实为真。当晚，莎拉·古德本来被治安官约瑟夫·赫里克关在自家的农场，以便第二天押去伊普斯威奇监狱。但是，这个暴躁的犯人竟设法躲开警卫，一度消失在黑夜中，她带走了三个月大的孩子，未着鞋袜。第二天早上，赫里克的妻子注意到古德的手臂从手肘到手腕都被划伤了，而前一天晚上还没有任何伤痕。显然，塞缪尔·西布里的打击伤到了她的要害。

本来，赫里克手下的警官可轻松地将这个女巫嫌疑犯送到伊普斯威奇，行程只需花几个小时，但他被她折腾坏了。她坐在马鞍后面的轻鞍上。那天下午，马骑得很慢，她三次从马背上跳下来企图逃跑。她怒斥道，她不是女巫。她也不会这么承认的。他们只听了提图芭的话。古德抗议说，相信一个巧舌如簧的奴隶，这是多么荒谬啊！但同时，她又担心确实有人会这样相信。她诅咒地方法官。她头昏脑乱，还试图自杀；她从提图芭的催眠表演中突然觉醒，很难说谁会对此更害怕些。3月2日，星期三，当局将古德关进伊普斯威奇监狱，即使以古德的标准来看，这个地方也是脏臭无比，污秽不堪。那天晚上，约翰·休斯去了西布里家，毫无疑问，他们讨论了莎拉·古德的古怪举动，也讨论了他遭遇飞兽的事。8点左右，休斯离开西布里家，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一只陌生的白狗跟踪了一段时间。他躺上床后，一道刺眼的光线突然从紧锁的门后射来，照亮了房间。他坐起来，发现一只灰色的肥猫蹲在床脚边。二十二岁的修简匠威廉·艾伦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莎拉·古德身上闪闪发光，落到了他的床上。她坐在他的脚上，他一踢过去，闪亮的她就会突然消失。这一切听上去就像提图芭给大家分发了致幻剂。她对1692年事件的贡献将是她那迷幻且可怕的供词，而不是传说中的伏都巫术。

第二天，小安·帕特南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桃乐茜·古德——流浪者莎拉的五岁女儿——不是她还能是谁呢？这个小女巫掐住安，一直怂恿她和魔鬼签署契约。与此同时，哈桑继续审问狱中的嫌疑犯，提图芭过去四天在那里持续揭露更多事迹。她曾与魔鬼达成协议。她说：“他告诉我，他是上帝，我必须相信他，并侍奉他六年，他会给我许多好处。”“他还说了什么？”哈桑问，几乎忍不住要给她提供答案，正是他第一个提出魔鬼契约的。他曾暗示古德和奥斯本，她们也与魔鬼签约了，但她们谁都没有注意。“他有说你必须写些什么吗？他向你提供任何文件了吗？”他问提图芭。是的，他有过。她告诉他，她不能接受他成为自己的上帝，之后企图跑上楼与帕里斯牧师商量，但访客阻止了她。他来的时候还带着帮手。他强迫她去折磨女孩们，还要了一个花招让帕里斯既看不到他，也看不到提图芭。提图芭熟悉圣经，对其中的意象有正确的认知；即使她内心不服从，她也明白如何做出表面上的服从。在随后的一次来访中——魔鬼往往在祷告时分到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要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书上。隔壁房里的帕里斯夫人恰巧在那一刻呼唤她，因此她得以脱身。本来，提图芭还打算以血立契，但她说不清事情是如何安排的。哈桑问，那本书里有多少个签名？提图芭确凿地说：“有九个红色或黄色的签名，莎拉·古德和莎拉·奥斯本的签名在上面一清二楚。”被拘留的古德承认签名是她的，而奥斯本却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

提图芭透露，在她一开始作证前，那位高个男人再次现身，警告她不要泄露风声。否则的话，他会砍了她的头。被逼说出其他人的名字时，她感到绝望，开始语无伦次，或者至少说，呈现她证词的记录是条理不清的。提图芭至少能说出那九个人的住处？“可以，有些住在波士顿，有些就在这镇上，但他不告诉我他们是谁。”她答道。这个消息和带血的签名及共谋的迹象一样令人不安。提图芭已经目睹了每一个村民

都听说过且深信不疑的事：与魔鬼签订契约。

贝弗利牧师约翰·黑尔做事缜密，他的住处就离村子两英里远。他曾去过绞刑现场，也视察过监狱，他了解这些女巫。他见过帕里斯家的女孩们第一次痉挛发作的情景；当哈桑在狱中审问提图芭时，他也在现场。地方法官审问了她四次，这比盘问其他任何一名嫌犯都频繁。有三个人做了翔实的记录，他们不敢错过哪怕一个狂热的词汇。提图芭坚称自己不是女巫，虽然她曾为女巫效力。她的女主人教过她如何辨别女巫和避免受其蛊惑，但显然，她忘记了她的教导。在狱中，她被重新检查身上是否有可疑的标记，事实证明她确实有嫌疑。他们有必要搜集进一步的证据，因为正如黑尔和法官们所见，提图芭开始痛苦地扭动身体，尖声惊叫。由于她的背叛，凶残的同伙开始折磨她。

被捕一周后，莎拉·古德、莎拉·奥斯本和提图芭被送到波士顿监狱等待审判，古德的婴儿也随她们同行。即使没人跳马，那天的行程也要整整一天才能走完。她们此前相互指控，路上的氛围必然十分紧张。而她们的目的地，波士顿监狱，更是臭气熏天，尘土飞扬，虱虫遍布，可谓“活人的坟墓”。波士顿监狱的守卫约翰·阿诺德因残忍而臭名远扬，据说他为人顽固，就像他用来束缚嫌犯的枷锁一样。他所用的枷锁没有钥匙，唯有铁匠才能拆开。与此同时，阿诺德为这些女人的花销新设了账目，以便让她们收到账单。不久后，他就要为同样被关在地牢里的犯人孩子买毯子。锁链是马萨诸塞监狱的缺陷，可也是女人们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证物。人们知道，女巫可以通过不同手势控制受害者；那如果她们无法动弹，巫术就不会被施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监狱里总会定期发生越狱事件。在伊普斯威奇，有个囚犯头顶着木板就溜出监狱，全程无人察觉。有一次，塞勒姆的囚徒不仅拆除了门，还把牢房的整面墙都摧毁了。一年前，有两个犯人要求赏一壶酒喝。等到监狱守卫的妻子

送来酒时，犯人们已经划着独木舟回归自由了。

如果提图芭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套证词，那她一定被吓得不轻。即使是一个固若金汤的监狱，也无法抵挡那个高个男人来砍她的头。法官认为她的话完全可信。在供认之后，她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她后悔了。她所说的细节精确无比，与巫术报告中的说法完全吻合。自始至终，提图芭的话都连贯一致。“人们认为，如果她伪造证词，她不能完全记住她的回答。”黑尔后来解释道。值得玩味的是，骗子确实需要更好的记忆力。提图芭已经吸取了帕里斯所传授的教义，但是她充满激情的叙述中显然缺乏对宗教虔诚的宣言，她仅提过一次上帝。作为一个落入冷酷审讯者和可怕刽子手的手中之人，她在讲述中竟胸有成竹，算得上是应对得异常冷静。讽刺的是，如果她不那么愿意配合，一切都可能截然不同。很少有人会承认使用巫术。可整个过程令人信服和满意，称得上那个世纪最生动丰富的事迹了——提图芭改变了一切。这件事使当局确信自己走对了路。嫌疑犯的人数成倍增加，她加重了调查的紧迫性。他们招来了一个危险人员参与这起事件。“这件事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黑尔平静地写道，在他笔下，此事似乎就是一个不温不火的本土新闻，就像塞勒姆镇的老牧师暗示的那样：它平淡无奇，令人乏味。

女巫到底是什么？17世纪的任何一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告诉你。虽然哈桑和科温、法官、被告及原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但他们对女巫的形象都有着同样的想象——她就像2月的洪水一样真实，可能还更为恶劣。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杰出的英国学会院士和博物学家——那里得出了定义。格兰维尔毕业于牛津大学，权威不容置疑，他已证明巫术如光和热一样显然存在于世。他为其下过定义：“凭借与恶灵的联盟，女巫可以或似乎可以做奇异之

事，已知的技术和自然之力对此无能为力。”巫师通过签署契约获得将自己变为猫、狼和野兔的能力。他们对黄鸟情有独钟。巫师不限性别，但通常为女性。英国女巫尤其会养一群同居的“小妖精”，这些邪恶之物会服从女巫的命令。它们可以是猪、海龟或黄鼠狼。猫和狗也是常见的同伴之选，但最受女巫喜爱的是蟾蜍。在关于巫术的文献中，关于蟾蜍的描述比比皆是：烧焦的蟾蜍、爆裂的蟾蜍、跳舞的蟾蜍、作为宠物的蟾蜍、成罐的蟾蜍、人造的蟾蜍，还有伪装成蟾蜍的猫。有个十六岁的仆人把一只圆胖的蟾蜍塞进家里的奶罐，她想传达的信息不言而喻。

女巫会在自己身上打上记号，以此象征她与吸引她的恶灵之间建立了奇特的契约。那些标记可以是蓝色或是红色，正向或是倒立的。它们就像一个乳头，或是跳蚤叮咬留下的疤痕。它们会显现，也会消失不见。基本上，所有深色的印记都可视为女巫的标记，若它出现在生殖器周边，那更明确地表明当事人有罪。正如提图芭以血立契，将自己和她的主人——她已宣誓侍奉的魔鬼——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的主人将不同的好处给予不同的人，以此吸引他们为他办事。巫术通常在家族的母系支线中蔓延。女巫的力量是超自然的，她的罪行却是宗教方面的。人们认为，她本可以结巴地念出《主祷文》以吓退魔鬼，她却选择了用咒语或油膏来施展巫术——这个说法给塞勒姆的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带来莫须有的罪名，后来的女仆打算揭发主人，因为她总在手上抹一种臭烘烘的绿色油膏。有时候，女巫会借助木偶来远距离地施展巫术，赫里克警官为了这形似娃娃的木偶已经将奥斯本和帕里斯家的橱柜翻了个底朝天。那么，女巫和那些疯狂抽搐的塞勒姆孩子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可以说，每个英格兰人都熟知人被施巫后的样子。根据1692年还在通行的塞勒姆早期律法指南，人被施咒后会失去知觉，四肢瘫痪，全身痉挛，下巴会咔咔地响或扭曲变形；他还会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剧烈地晃动身体。指南的作者也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出现这种症状时，请

在诿罪于邻居前先咨询你的医生。

新英格兰在诞生之时就开始受到女巫的侵扰。她们把公牛溺死在水里，让牛跳离地面四英尺多高，把长柄锅扔进火里，把干草倾倒入运货的马车，给啤酒施上魔法，击碎提桶又让水壶跳起舞来。她们在空中投掷苹果、椅子、灰烬、烛台和粪便。她们放出没有躯干的生物，人头白猫尾，躯干却空空如也——这是只比路易斯·卡罗尔还要早好几个世纪的柴郡猫 ^[4]。（必须补充一点，殖民地有很多酒馆。在服务设施健全的塞勒姆镇，共有十五家酒馆，每一家都能容纳八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5] 女巫交替着施展咒语、毁坏物件。哈桑突然问提图芭，她对科温法官的儿子是否有所耳闻。虽然哈桑心里还有其他嫌疑人选，但他怀疑极有可能是提图芭弄瘸了科温九岁的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科温就陆续埋葬了自家的三个男孩。女巫能同时出现于两地，也能走过潮湿的路段却依然浑身干燥。哪怕走在松动的地板上，她们也能做到悄无声息。她们还可以火速到达一个地方，占卜出未开封信件中的内容，制作异常美味的奶酪，知晓漂白布匹的奥秘，闻到他人口袋中的无花果味，从楼顶摔下后却毫发无伤。女巫可能是爱发牢骚和争论的不满现状者，但也可能强大或者聪明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确，她们常常因为比邻居聪慧而犯下死罪——1656年，牧师就是这样形容马萨诸塞第三个因巫术而被处以绞刑的女人的。

新英格兰女巫相比欧洲女巫更为温顺，她们的力量较为寻常，丝毫不显得神秘。她们专门破坏谷仓和厨房，还会使自然法则暂时失效，而这通常与农业相关。不过，她们没有能力招来暴风雨或其他坏天气，也不能祈求一场瘟疫，或是将波士顿烧毁。 ^[6] 欧洲大陆的女巫要快活得多。她们用手走路。她们把孕期延长至三年之久。她们把敌人的脸上下前后颠倒。她们在国与国之间肆意飞行。她们骑着鬣狗到森林深处饮酒

作乐。她们让刺猬成为自己的妖精。马萨诸塞女巫的妖精——她们会像母亲一样喂养它们——则都是本土的动物。她们不会去远方冒险。即使在接连犯事的时候，她们也恪守清教徒的清规戒律。她们很少享受与魔鬼的媾和。^[7] 她们在夜间拜访男人时似乎只喜欢拧断他们的脖子。1692年前，新英格兰女巫很少飞去参加不正当集会，这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更常见。虽然新英格兰有许多喧闹作乐的狂欢场合，但这在女巫的夜半集会上很少出现，集会上没有舞蹈、堕落举止和豪华蛋糕，也很少在光天化日之下举办。甚至，欢宴者还会在那里聆听布道！（塞勒姆的集会菜单主要包括面包、葡萄酒和清炖熟肉。）女巫的最终目标——所有戳刺和拧捏的行为皆是针对这一对象——是灵魂，而非肉体。虽然她们有神奇的魔力，却没有越狱，要知道，许多弱小的新英格兰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点。

很多证据都证明了女巫的存在——这些证据十分必要——其中一个 是《圣经》中对女巫的禁令。“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这句话出自《出埃及记》，但“行邪术的女人”一词颇有争议；在希伯来语中，它更确切的意思是“投毒的人”。男巫和女巫以魔法师和占卜师的身份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当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献出现时，这个群体也就发展得愈加壮大。人们所知的第一起诉讼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当年的罪状在今天看来就是无证行医。（那个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医生是男性。）那时，潘神的远古祖先恶魔本身还未出场，他的形象脱胎于凯尔特神话中的角神和日尔曼民间传说。撒旦随着《新约》的问世而现身，可《新约》里还没有关于女巫的记载。《圣经》没有把二者联系在一起，这项工作后来就落到教会身上。任何提出撒旦契约的人都会提到宗教，这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更为普遍。你得先证明你有灵魂，才能将其出卖。

13世纪，巫术与异教联系得更为紧密，塞勒姆想象中的女巫也随之成形；很快，女巫便从一个流行的传说变为普遍的混乱局面，她们全然露出本色。1326年，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命令他手下的裁判官清除所有的魔鬼崇拜者，接下来两个世纪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经发现，女巫会被活活烧死，裁判所“调查”发现，女巫常常犯下两桩罪行。欧洲大陆的女巫参与纵欲狂欢，这种印象产生于15世纪阿尔卑斯山以西地区；同一时期，也许是在德意志，女巫开始会飞，有时乘着扫帚。“魔法师”（magician）这个词演变成“巫师”（witch），后者——之前是一个中性词汇——又演变成“女巫师”，她们更容易被撒旦的友好姿态所感染，因此本质上也就更加邪恶。《女巫之槌》（拉丁语：*Malleus Maleficarum*；英语：*Witch Hammer*）一书在描述这一主题时最为草率，它用很多古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女人独自思考，所思皆为邪恶。”针对女性及其能力问题的解释往往异乎寻常，此书中的阐述亦是如此。难以抵挡恶魔诱惑的女人，可能表现得很不安分，贪得无厌，颐指气使。根据《女巫之槌》这本必读之书，即使没有超自然力量，女人也是“友谊的敌人、注定的处罚、必定的罪恶、天生的诱惑、勾引人的灾难、家庭的威胁、迷人的祸害”。

15世纪——圣女贞德的世纪——开启了基督与魔鬼之间的大斗争。接下来是宗教改革，无所不能的上帝需要一个无所不能的敌人，女巫正是在这时出现的。显然，如果没有女巫，魔鬼无法完成罗森所谓的“恶毒活动”。疯狂的诉讼始于15世纪末《女巫之槌》的发表，这本书让女人成为“必定的罪恶”；巫术文献和诉讼总是同时出现。虽然敌对的教派以崇拜撒旦的罪名相互控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鼓足了劲辱骂彼此——他们一致同意对女巫的诉讼。^[8]对他们来说，女巫促进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联合。她们频繁出入天主教和新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堂区，但驱魔仍为罗马天主教所独有。女巫没有自己的偏爱之地，她

们不一定是英国人，亦非仅仅是欧洲人。

很难说哪个国家的猎巫行动最为盛大，因为当中的竞争十分激烈。德意志一开始迟迟没有开始控告，后来却陷入狂热之中。一位洛林的检察官吹嘘自己在十五年里清除了这片地区的九百个女巫。另一个意大利人更胜一筹，他一年内杀死一千个女巫。一个德国的小镇一天之内就将四百个女巫置于死地。1580年至1680年期间，大不列颠清洗了四千多名女巫。塞勒姆事件爆发的若干年后，至少有五名遭到指控的女巫丧生于苏格兰，只因一个十一岁女孩的证词。英格兰的埃塞克斯郡是很多马萨诸塞湾居民的出生地，它不像塞勒姆那样迅速地将女巫赶尽杀绝，而是以稳定的速度给女巫定罪，当地人沉浸在因诉讼而起的欢乐氛围中。在众多受害者中，有几位出乎意料，包括一只恶魔般的公鸡，一位德意志市长，以及数位英国神职人员。多数情况下，英格兰女巫会被绞死，法国女巫则会被烧死。1617年，有三个女巫登上位于海峡群岛之中的根西岛，情况因此变得颇为棘手。最终，这三人先根据英国法律被处以绞刑，而后再根据法国法律以大火焚烧。

女巫几乎安然无恙地从英格兰到了北美洲，一同移居的还有盎格鲁——撒克逊式小妖精。同样的，契约相关的元素——魔鬼的印记、书、协议——也是新教徒关心的事。夜半集会和飞行一样源于欧洲大陆，不过少了英格兰女巫不感兴趣的飞天扫帚。那个从棍子上跌落的瑞典小女孩，正是在去狂欢集会签署撒旦之书的路上。在她撞向牧师的那一刻，是魔鬼猛扑过来救了她一把，但也让她“身子一侧极度疼痛”。^[9]（魔鬼在新英格兰就不这么乐于助人，安·福斯特在1692年就未受此等援救。）除了签契约或施巫术，魔鬼平时也都很忙碌。他暗地里倒行逆施，用不正当的手段诱人上钩，向怀疑论者保证巫术并不存在。他熟知《圣经》，懂得从中引述能达到其可憎目的话语。他在布道会上给人催

眠，阻止他们听到牧师的启示。他还妨碍科学的进步。作为一名天赋异禀的医师，他比任何人都更懂疗愈方法。他称得上是最出众的学者，严格遵循勤奋工作的准则；他思维敏捷，性情多变，从不缺席，总在招兵买马。他熟知每个人的秘密。而且，他干这行已有六千年的经验！正如早期清教神学家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所指出的，他可以让你相信毫无根据的事情。（1692年，很多忧虑的马萨诸塞居民都会自问：我会不会已经变为巫师却仍不自知？这个问题在春夏之际变得更为迫切。）这些经新英格兰居民大规模传入的观点，主要源于格兰维尔和珀金斯的作品，前者的看法收到英克里斯·马瑟的响应，后者的则遭到科顿·马瑟的抄袭。殖民者立法后，偶像崇拜成第一项死罪。至于第二项，那便是巫术。“如果男人或者女人成了巫师——即他们拥有妖精或与妖精勾结——就都应被处死。”1641年的法律如是写道，它引用了《出埃及记》《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的话语。第三项死罪是亵渎神明，接下来是谋杀、投毒和兽交。

法律上虽然没有恶魔的名字，但他很快就现身新英格兰，开始他的捣鬼把戏。第一个坦白与撒旦签下契约的人曾祈祷他能帮忙处理家务琐事。于是，助手出现了，他清理炉膛里的灰烬，赶走田野上的猪群。这一案件引起了异端邪说，而非伤害；1648年，这个康涅狄格的仆人因“熟知恶魔”遭到起诉。科顿·马瑟——他无法抗拒任何灾祸，无论它是否超乎自然——发布了关于她所签契约的指导性报道。早期的新英格兰巫术案件里还没有飞天扫帚、魔鬼聚会及抽搐的女孩。它们呈现的是被施咒的家猪和不安的牲畜，以及因此遭到践踏的礼节和受到侵犯的财产。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过分热心的熟人，或像莎拉·古德这样被拒之门外的乞求者。大多数案件都涉及难缠的小镇关系中由来已久的过节。许多指控都带有一些童话气质：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涉案人纺织出的毛线比平时要多，完成家务的时间也创造了纪录；他们还会迷感动

物，过于热切地关心邻居的疾病，或是奉上有毒的药剂。

自从新英格兰制定法律后，已经有一百多名巫师遭受控告，其中男性占四分之一。马萨诸塞此前最近的一次审讯，是关于古德温家又飞又叫、抵制宗教的孩子们。这起案件中的罪犯被确定为附近一名女洗衣工的母亲，洗衣工此前被古德温家的大女儿指控为窃贼。老妇人暴跳如雷，怒斥玛莎·古德温说假话；然而，这位少女立即就开始抽搐。一个星期里，她的三个兄弟姐妹都不断呕吐和尖叫。在听证席上，被告人无法用英语背诵主祷文，因为她只会说盖尔语。她的房间里搜出木偶；她通过翻译招供了罪行，虽然在魔鬼方面她闪烁其词。^[10]（数年前，老妇人的丈夫就曾控告她施展巫术，他构造出一个多年后又在塞勒姆重现的女巫形象。）1688年11月16日，这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巫师被处以绞刑，她在绞刑架前警告众人，孩子们的痉挛不会随着她的死亡而减弱。她是对的；他们开始更加剧烈地抽搐。有时，玛莎还是会踢牧师，或者骑着想象中的马儿飞奔。

有个荷兰游客如此形容17世纪晚期的波士顿：“没有哪个地方像波士顿一样有如此多关于巫术和女巫的传闻。”确实，女巫和巫术诊断都是当地热议的话题。那里的第一批居民都是从英格兰移民过去的，而当时正值英格兰猎巫行动的巅峰时期；而且，大部分移民还是来自着魔最深的郡县。刚到镇子上的人若看到一个抽搐的孩子，可能就会善意而同情地告诉他的家人有女巫住在附近。他们可能不会同意他的说法，竭力让他相信邻居都是典型的虔诚信徒，但他更明白：“你有个邻居就是女巫，她和你妻子吵过一架，她心中觉得你的妻子是个傲慢的女人，便通过这个孩子来打击她的傲气。”3月，莎拉·古德、莎拉·奥斯本和提图芭被戴上镣铐，与另一个受到指控的女巫汇合，后者自去年10月以来就在牢里受尽折磨。巫术很好地适应了新英格兰的环境——这片荒僻的旷野

上常有恶毒的法国人和撒旦般的印第安人出没——也很好地适应了清教徒的行为和教义，这一教义令人沉浸其中，同时也令人不安，这个几经迫害才得以存活下来的信仰即使不会带来彻头彻尾的灾难，也会带来冲突。尽管如此，在1692年前，新英格兰的审判像母国一样开始逐渐减少。相比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更容易受到女巫的困扰。这个殖民地在17世纪60年代早期就处决过一批女巫，随后该地就大发慈悲，再也没有对女巫执行过绞刑。猎巫案件只是偶有发生，没有再疯狂井喷。

新英格兰也并不特别急于给女巫定罪。“我们倾向于更宽容的方式。”1680年，约翰·黑尔在一次富有争议的缓刑判决后写道。当时，恶魔伪装成一名女子制造了几起伤害事故，但法院拒绝将那名被假冒的女子定罪。法官们行事非常谨慎；地方法官会驳回案件，或推翻陪审团的定罪。有一个受到指控的女巫因说谎而被罚款，另一个则因与魔鬼聊天而遭到鞭打。一个普利茅斯的女子发誓称，她的邻居以一只幽灵般的大熊形态出现在她面前，她为此接受严密的审问。“这只熊的尾巴是什么样的？”一个精明的法官问道。女人说不上来，因为大熊是扑面而来的。法官提醒她，熊是没有尾巴的。因为捏造事实，她要在接受鞭打和公开道歉之间做出选择。在塞勒姆案件之前的一百零三起新英格兰女巫案件中，判罪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波动。1692年前，马萨诸塞总共仅绞死六名女巫。在塞勒姆审判第一天，有个帕里斯的波士顿会众将一本威廉·珀金斯的名作交给村里牧师，那时，除了折磨古德温家孩子的三个女人，二十五年来没有人因为巫术被处决——那三个被关在伊普斯威奇的女人也一定放心地记得。

1692年前的几十年里，有关巫术真实性的大辩论席卷整个英国，诉讼在那里已经基本停息。参与讨论的多为精英阶层，女巫成了学者和有学识的牧师的讨论话题。在塞勒姆案发生的整整一个世纪前，不乏怀疑

者争论巫术问题，但对约瑟夫·格兰维尔来说——他在17世纪70年代末写道——他仍相信几乎所有聪明人都会支持他。所有人——无论老少，无论聪慧与否，无论是信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什么教都不信——都认同女巫的存在。鬼魂显然可以让人在空气中飞行，就像大风无疑能将房屋夷为平地。背叛信仰的第一步总是试探性的。总有理性主义者反对珀金斯，但没人比他更有力地为巫术辩护了。他承认，其中固然有各种各样的欺诈、谎言和伪造的现象，听上去就像妄想狂心中的圣歌变奏曲。可是，欺诈行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巫术就不存在！相反，它证明了一点：没有真身，哪来的仿造。科顿·马瑟重申这一观点，正如他呼应了珀金斯的多数观点一样。巫术无法解释所有可疑之事，但有些事亦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解释。^[11] 正如珀金斯所指出、马瑟所重申、马萨诸塞所相信的那样，怀疑巫术的效力就是在怀疑正午时分闪耀的太阳。

格兰维尔详细阐述珀金斯的论点，认为我们不该因为有人不理解某个事物，就否认它的存在。格兰维尔说道，我们同样也不知道灵魂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女巫不存在，为什么《圣经》要告诫我们提防女巫呢？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词来形容这些人。他们怎么会为不存在的人物命名呢？此外，还有太多人认罪。同其他领域一样，对女巫存在的证明也是靠一致性来达成的。格兰维尔坚称：“我们有上千个证人的证词，他们中不只有容易受骗的平民百姓，也有庄重而敏锐的智者，而且，没有利益可以迫使他们同意撒下同一个谎言。”“想象力是世上最多变的东西，若它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在重复一个同样的幻想”，这是多么难以置信啊！证据是难以找到的，但绝非不可能找到。一位王家院士——那个时代思维最敏锐的人之一——认为，按照同样的逻辑，如何才能证明凯撒大帝建立了罗马帝国呢？这个问题触及了认知的本质。（在马瑟的版本中，这就是在把大不列颠的整个历史等同于堂吉诃德的故事。）拒绝相

信，就是将历史贬低成小说。

事实上，女巫的形象总是惊人的相似，抽搐、尖叫、扼杀和催眠的情况也是如此。新英格兰人知道女巫长什么样，就像我们今天（可能）虽从未见过矮妖精或者吸血鬼，我们也可以辨别出他们。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存在。马瑟辩称，你没有在路上看到劫匪，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有怀疑者坚称，巫术是荒谬且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认为它是由“小骗子”散播的幻想。格兰维尔反驳道，这正是问题所在。巫术是如此让人难以置信，如此荒谬，如此不可靠，因此它更必定是真实的——你不可能编造这样的事物！集体妄想的不可能性，是让人们相信巫术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有人借用《女巫之槌》扉页的话来说明：“不相信巫术就是最大的异端。”在17世纪，怀疑者被当成妥协分子。“浮华招摇的人会模仿这些事情”，马瑟在1702年如此抨击“咖啡馆里自视聪明的学问人”，后者是那个时代喝着拿铁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清醒者并没有嗤笑那个不可见的世界，尤其是考虑到证据的时候。马瑟已经非常接近他父亲在1684年所著的《显赫的天意》（*Illustrious Providences*）中展现的庞大主题，这本书充斥惊人的预兆和奇迹，称得上是本超自然版的《里普利之信不信由你》^[12]。没有神秘事物，就没有信仰。否定巫术，就是否认宗教，这一说辞距另一个更为挑衅的断言只有一步之遥：否定巫术，就是拥护巫术。

那位已有六千年作恶经验的狡猾角色呢？他可是能控制事物显现或消失的伪装大师，不仅知道你的秘密，还能让你相信子虚乌有之事。关于他的问题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珀金斯认定魔鬼以具体形态存在，但没有对他展开描述。新英格兰人似乎都不太清楚他是谁、长什么样。他们没有看到蝙蝠的翅膀或叉状的尾巴，虽然塞勒姆有人声称目击到恶魔露出的裂蹄，还有人称他以猴子、人和公鸡的合体现身。他的性别更是不

为人知。有个遭受控告的女巫想知道他当时究竟是扮成了老鼠，还是变为迅速爬行的海龟。如果说魔鬼有肉身存在，那么新英格兰人心目中的魔鬼就是一个“小黑人”“黑皮无赖”或“黑猪”。在1692年算得上官方的一个版本中，他几乎没有一根手杖高，有着黄褐色的皮肤和深色的直发，头戴一顶尖帽子。他十分厌恶《圣经》——那位瑞典女孩从空中坠落的原因就是她在飞行中说出了上帝的名字——但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语言，连科顿·马瑟也不知道。然而，他无处不在。空气中遍布着他的手下。马瑟们警告，世界上魔鬼的数量远多于人类。我们一呼吸就能把他们吸进去。

魔鬼的邪恶军团无处不在，而他自己也常常现身。在大雪纷飞的1月，黑弗里尔（Haverhill）有个人殴打了他的妻子，还把她赶出了家门，他吼叫着说他的妻子“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披着女人衣服的恶魔”。有天深夜，这个年轻妻子被发现睡在他人的床上咯咯大笑。她以“说谎的小恶魔”为名被判有罪。在伊普斯威奇，有人现身作证称，他的粗鲁邻居“身上有太多魔鬼的印记，对邻里来说是一大折磨”。恶魔经常出现在激烈的争论中——“魔鬼带走你”听起来恰好就像今天那两个刺耳的短音节 [\[13\]](#) ——虽然这并非必要前提。对于新英格兰的不适气候，他也能坦然接受；自然，印第安人是崇拜撒旦的，这和贵格会一样。 [\[14\]](#) （这使他们有理由占用贵格会在塞勒姆的土地，并于1692年在那里建了监狱。）据一项1675年的法庭判令所说，塞勒姆村民的“好辩天性”会为魔鬼提供一臂之力。不止一位马萨诸塞教士指出，宗教上的包容算得上是撒旦思想。科顿·马瑟曾警告，牧师们一挨饿，就可能会让撒旦趁机接管这片土地。 [\[15\]](#) 带着奇特帽子的外国人也是魔鬼。他是多数刑事控告中的共同被告，光临多场布道并接近牧师，如同牧羊人身边的披羊皮的贪狼。帕里斯的堂区也不例外，虽然魔鬼出现的频率并不高。1692年1

月3日，帕里斯记下村里的教堂似乎基础稳固，同时也发出警告：“魔鬼的主旨就是推翻教堂。”

在新英格兰的转折期，牧师们发现上帝有时刻意派遣魔鬼来压制反对者的声音。这是马瑟从古德温事件中吸取的经验。他发誓要充分利用那次袭击和《难忘的天意》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轻拍书脊，对公众推出他的小书——这是本臣服于伟大英国著作的仿作，作者本人也如此看待——以此向人们保证魔鬼们仍然逍遥法外。马瑟从格兰维尔的书中提取素材，马萨诸塞居民因此知道了瑞典小女孩及其飞行事故，还有不具英式特点的秘密草地聚会、生死契约和戴尖帽的男人。马瑟记录道，马萨诸塞会受女巫的困扰一点也不出奇。他引用格兰维尔信徒的话，而这位信徒也在大西洋彼岸引用马瑟的话，双方略有互相吹捧之意。马瑟质问道：“除了憎恨自己外，恶魔还会在哪里显露最深的恶意呢？”魔鬼的现身几乎就标志着一种荣誉，进一步证明新英格兰人是被神选中的子民。魔鬼像显灵的闪电一样，降落在牧师家的屋顶上。他并非完全遭人厌恶；如果魔鬼已在附近，上帝也就不远处。《启示录》里预言上帝会与“邪恶的魔鬼”一起降临；马瑟还一直留意着《圣经》所述的末世，新英格兰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就被预言即将迎来末日。到了1692年，魔鬼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他成了狂妄自大的阴谋家，为推翻上帝的王国而奋力工作，以完成此前从未在马萨诸塞达过的壮举。

当马萨诸塞女巫起飞时，欧洲的猎巫行动已近尾声。荷兰和日内瓦分别于1610年和1632年取消所有诉讼。三十年后，法国的路易十四驳回了所有巫术案件，尽管仍有牧师在1691年被处以火刑。在波义耳、牛顿和洛克（他们都相信巫术）的时代，全欧洲的诉讼都慢慢停息。质疑巫术的文章早已存在，但在1692年前，你无法在波士顿读到任何质疑此事的文本。信仰和严格受控制的新闻环境使马萨诸塞移民与外界隔绝；和

她们的英国前辈相比，1692年的新英格兰女巫大不相同，她们更为真实。你在马萨诸塞能读到的仅是些抨击巫术的长篇大论，科顿·马瑟以此压制那些质疑者，尽管这些文章中鲜有证据。这就像研究神创论文献的狂热者，却从不知世上还有达尔文这号人物。为此，马瑟详细地分析了古德温的案例。他只写那些自己亲自看到的或可以明确作证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不容置疑的，他倒想看看还有谁能否认巫术。如果仍有异议，他绝不相信对方。

马萨诸塞的牧师都同意，想要对付魔鬼，祷告是唯一具有效力的办法。1692年，帕里斯正是接受了这个办法。早在1651年，马萨诸塞就通过全殖民地禁食来抵制巫术。帕里斯便也在家里、村庄以及附近的集会中举办一系列禁食活动。3月11日，星期五，牧师们聚集在帕里斯家里开始一天的祷告。女孩们都很安静，但黑尔记录道——他自己有三个不到七岁的孩子——每次祷告结束后，“女孩们还是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说一些可笑的话语”。金发碧眼的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在痉挛发作后，她的四肢完全扭曲。之后，帕里斯决定将孩子们隔离，他选择送走的是自己的女儿。这个选择或许出于实际考虑，帕里斯一家需要阿比盖尔给他们当帮手。于是，九岁的贝蒂被寄养在镇法庭书记员斯蒂芬·休厄尔家，他很快将要夜以继日地与这些扭曲的年轻女孩们搏斗。作为远房表亲，他算得上宽宏大量，他们夫妇自己就有三个不到四岁的孩子。贝蒂仍然会全身抽搐，这让休厄尔夫妇灰心丧气。月底的时候，提图芭提过的“黑巨人”来访，给贝蒂提供她渴求的任何东西。他说会带她到梦想的城市去，那里显然既不是塞勒姆村，也不是塞勒姆镇。^[16]“那是魔鬼。”休厄尔夫人解释，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如果他再回来，孩子应该告诉对方，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骗子。

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巫术展开；早上一醒来，他们就开始讨论昨夜发生了什么，以及受害者又遭遇了什么。在这种时刻表达怀疑是不合适的，正如在这一时期，无论谁的预感成真，也都是不合时宜的。从波士顿狱卒将塞勒姆的三个嫌犯关进牢中开始到3月12日期间，一个新出现的幽灵开始掐小安·帕特南。女孩的父亲忧心如焚，他向兄弟爱德华·帕特南和兼任马倌及法庭记录员的以西结·奇弗寻求帮助。作为教会执事，爱德华·帕特南是最先对巫术提出控告的人之一。3月12日，星期六上午，他们兄弟俩决定去拜访折磨安的人，那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会成员。南行之前，他们在帕特南的农场停下来与安谈话。这个十二岁的女孩是不是弄错了施虐者的身份呢？她能形容一下她的衣服吗？不幸的是，那个下午，安虽然能与女巫交谈，却看不到她的样子。幽灵蒙蔽了安的双眼，直到晚上，她发誓要对付安。然而，她这样做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名字。

访客到来时，玛莎·科里正独自待在位于塞勒姆西南部的家中。她满面笑容，邀请他们进屋。她还预料到了他们的问题——这是一大错误。帕特南和奇弗还未坐定，她就开始郑重地说：“我知道你们为何而来。你们来这里是想说我是个女巫。”她并不是。“可我没法阻止别人议论我。”科里耸耸肩。爱德华·帕特南透露，他那被施咒的侄女确实提到了她的名字。科里已经做好准备，或者说她认为自己已准备妥当。“但她有告诉你我穿什么衣服吗？”她问。她的来访者听到这如此具有预见性的问题，不免大吃一惊，请求她再重复一遍问题。他们解释道，十二岁的女孩未能看清衣服，因为科里“蒙蔽了她的双眼，还说在夜晚降临前，她都无法看到你，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你穿了什么衣服”。科里只能笑对这一托词。她向拜访者保证，她没有理由为此忧心忡忡。她是个虔诚的女人，“早已公开了对基督的信仰，也总是欢欢喜喜地去听上帝的话语”，两个男人也都知道这是她所坚持的事。她的执事提醒她，信仰

的宣言不足以消除她的嫌疑。几个世纪以来，教会潜入了不少女巫。双方似乎都没有提及科里身上唯一显眼的污点：在第一段婚姻之前，她在塞勒姆镇生下了一个黑白混血儿，现已成长为十几岁的少年。

奇弗和帕特南没必要重提那段十五年前的往事，因为在那天下午，科里蒙受了新的污点。她很重视她的教义，并乐于找到机会论述它。她称自己为“福音女人”。她为自己开脱，解释了为何在无法阻止丈夫去看女巫审判后解下他的马鞍。她对审判很是反感：这样的事怎么会带来好处呢？在这一点上，她是正确的。她的丈夫说，那些女孩通过衣着来辨认幽灵，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奇弗和帕特南强调了控告的严重性。科里依然无动于衷，她一心要制止那些闲言碎语。她不一定相信世上有女巫存在，这种观点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煽动性的，现在更是一种谬论。帕特南和奇弗提醒她，提图芭已经对巫术供认不讳。一切证据都已确凿。

屈于压力，科里有些改变主张，但她所承认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盲目。她承诺“让地方法官和牧师开眼”，这一言论尤为不明智。他们三人又交谈了一番；科里口齿伶俐，立场坚定，惯于用训导的语气说话。她也是一个细心的聆听者，向对方转述了牧师的末世观点：愤怒的魔鬼已经降临在他们中间。至于提图芭、古德和奥斯本，如果她们三人被证明是女巫，她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她们懒惰成性，没有头脑。”科里气愤地说。但是，她的情况完全不同。她的虔诚之心坚不可摧，相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在回家的路上，两位拜访者经过帕特南的家，他们发现安恢复了平静。直到那天夜里，安的痉挛再次发作，持续到第二天，当时在房间里有另一个来历不明的幽灵闪烁着微光。安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指出那是个面色苍白的严肃女人，曾在教堂长椅上坐过安的祖母的老位置。

两天后，玛莎·科里骑着马一路向北到帕特南家，想必她是被托马斯·帕特南召唤而来。他或许想当面指控她。她一下马走进屋子，安就开始透不过气来。她用听起来快要窒息的声音控告来客，牙齿紧紧咬住伸出的舌头，手脚还扭曲得变形。恢复说话能力后，安指向在科里的中指和无名指，两指之间停着一只正在吮吸的金丝雀。“我要走近点看它。”她宣布道。“那你来。”科里边向她叫板，边揉搓指间。那只鸟消失了，安的眼睛也突然失明。她在靠近科里的过程中瘫倒在地。安控告道，科里在那个星期的集会上使另一个女人也失去了视力，她举手示范，此后双手再也没有从脸上挪开过。她描绘道，在科里的监督下，有个男人被插在闪烁着幽光的烤肉扦子上烘烤。没有其他人看到烤肉扦子，人们都是从古德温家的孩子那儿听说的。帕特南家有个十九岁的女仆叫默茜·刘易斯，她当时听到安的控诉后便出手干涉，挥舞着棍子向那恶灵击去。不料恶灵消失，棍子竟弹了回来。她再次出击。“如果你爱自己就别这样做！”安大声警告，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默茜的手臂受到一记重击，使得她后退了一步。“你用铁棒打了默茜·刘易斯。”安对恶灵的真身科里说，后者一定和其他人一样震惊。但她并未让步：她没有看到什么烤肉扦子。女孩们痛苦不堪，于是帕特南一家强行要求科里离开。默茜的状况不断恶化。那天晚上，她坐在炉火前，她的椅子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推向炉边。三个成年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救回来，那时，她的双脚正被推往火焰。一个男人在帮忙时发现了默茜皮肤上被叮咬的伤口。她一直抽搐到深夜11点。

因为女儿和女仆都遭受了折磨——她们俩人绝不符合科顿·马瑟在1692年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即“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大声抱怨”——四天后，老安·帕特南仍忧心忡忡。还是孩子的时候，她跟随贝利教士来到塞勒姆，后者是村里的第一任牧师，与她的姐姐结了婚。老安时年三十，这些年来，她失去了那个姐姐和另一个兄弟。去年春天，她又失

去了母亲。最近，她还输掉了一场重要的官司。这场官司打了十年之久，她最终还是失去了父亲的大笔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包括数个岛屿、数座牧场和一艘渡船。十三年来，她生了七个孩子，小安·帕特南是长女。12月，她在失去了一个八周大的婴儿后再度怀孕，这让她又有了新的负担。3月18日，她声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原因便是“要照料我备受折磨的可怜孩子和女佣。下午3点左右，我一躺到床上小憩，就感到自己几乎要在重压之下窒息而死了”。不久后，玛莎的幽灵现形，把安折磨得难以形容；如果没有家里的男人，她早就被撕成碎片了。科里在殴打安的间隙“递给她一本小红书和一只黑笔”，命令她在书上签上名字。

第二天，即星期六的早上，法庭下令逮捕玛莎·科里。直到安息日之后，科里才被逮捕，这让她有时间与指控者一起参加礼拜。那个场合无疑引起了轰动；通常，教徒们不会和一个活生生的女巫一起祷告。更何况她已经加害了数人，包括帕里斯的外甥女和格里格斯医生的女仆。星期六晚上，七十岁的贾尔斯·科里——他也不算什么模范公民——和虔诚的玛莎一起坐在火炉旁。她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两人在七年前结婚。她劝他快点上床睡觉。他想先做祷告，却说不出话来，甚至连嘴巴都张不开。玛莎对此有所察觉，便服侍他睡下，随后魔咒就被解除了。她的被捕似乎唤起了丈夫的记忆。五天后，他向塞勒姆镇的一位牧师吐露，科里的农场在那个星期发生过一些“怪异之事”——塞缪尔·帕里斯的书房陈列着威廉·珀金斯的一本书，书中亦将某些事称为“怪异之事”——他的牛染上了怪病，还有一只猫举止古怪。玛莎还建议他帮牛摆脱痛苦，这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他回想起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妻子总会在他就寝之后起身离开。“我能感觉到，她就跪在炉边，就像在祈祷一样，但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若有所思地说。这些过往无人知晓的话，几乎就像支离破碎的嘀咕声一样，足以证明涉事者的罪行。一个女人为什么要在深夜沉默地跪在炉边呢？科里暗示她在施展法术。另一

种可能是，他的妻子开始失落地疑惑：在两个星期前执事登门拜访之时，她说的话是否过于直率？

[1] 在大多数印第安人俘虏的心中，只有一件事比被俘虏更加糟糕。一个英格兰来的移民宁愿用斧头砍自己的脑袋，也不愿亲吻十字架；在当时，天主教牧师就像是今天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一个饥饿的年轻人因为担忧自己的灵魂，甚至拒绝了圣饼，将它埋在一根木头下面。

[2] 山鲁佐德为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讲述者。

[3]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反复审讯下，很多难以获取的细节开始如开花一样显现，变得更加茂盛。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早先的“可憎之人”圣女贞德身上。

[4] 柴郡猫（Cheshire Cat）是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作品《爱丽丝漫游记》中的角色，它掌握一种奇异的笑，身体会消失不见。

[5] 一个新英格兰巫师自己差点击沉一艘开往巴巴多斯的船。这是个男性巫师。

[6] 英克里斯·马瑟曾与总督进行过一次尖锐的对话，总督声称，北美洲的居民在半年之内的醉酒次数甚至比英国人一生的还多。随后，英克里斯就在日记中指出：“难怪头儿在拜访新英格兰时会如此精力充沛。”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克里斯的儿子抱怨道波士顿的每一幢房子都是酒馆。塞勒姆镇的牧师也对此表示担忧。这位新英格兰的访客忍不住将清教徒认定为假装圣洁的伪君子，他发现他们是“最糟糕的酒鬼”，一天结束时，他们浑浑噩噩，但还能滔滔不绝地讲经文。由于不同原

因，所有这些事都有所夸大。尽管如此，烈性果酒仍是17世纪新英格兰不变的特色，就像巫术信仰一样。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不必说烈酒，如果哪位‘清教徒’看到（或想到）啤酒或葡萄酒就不寒而栗，那他一定不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居民。”

[7] 即使女巫承认与魔鬼的媾和，新英格兰牧师也几乎无法想象这种事情的发生。当英克里斯·马瑟注意到数个类似的案件后，他坚持说是魔鬼埋下了错误的记忆——那些可怜的女人产生了幻觉！

[8] 魔鬼也会炫耀自己是天主教的产物，正如在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写于1937年的故事（指短篇小说《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编者注）中，魔鬼就提醒丹尼尔·韦伯斯特：“北方人确实称我为南方人，而南方人称我为北方人，但我既不是北方人也不是南方人。我只是一个像你一样诚实的美国人——而且出身高贵——因为说实话，韦伯斯特先生，虽然我不喜欢夸耀这件事，但在这个国家，我的名字比你的名字更为古老。”

[9] 在17世纪，人们在特拉华发现了一本用瑞典语写的书，上面记载了一则警告：在扫帚上刻十字可以防止它被女巫抢走。

[10] 科顿·马瑟也将此归于巫术。她曾经能用英语很好地与雇主交流。显然，有一个同伙对她施了咒语，“阻止她讲故事，只让她说一种‘但愿没有人能理解的’的语言。”他自然没有听明白，需要通过口译与她交谈。

[11] 逻辑在巫术领域产生了一些奇效。德国有位权威人士辩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靠恶魔的力量完成的，而我们无知地把它归于自然原因。”

[12] “里普利之信不信由你！”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是一家美国文化公司，推出大量以神秘事物为主题的同名文化产品，产品形态包括游戏、书籍、漫画、电视剧集等。

[13] 根据上下文推测，“两个刺耳的短音节”应是指英文脏话“fuck you”，这个短语听上去也和“魔鬼带走你” (the devil take you) 中最后的两个音节相似。

[14] 贵格会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因受到迫害而与清教徒移居美洲，后又受到清教徒的迫害。贵格会教徒和印第安人并非撒旦信徒，两种说法均为清教徒当时的刻板印象或刻意扭曲。

[15] 有个巴恩斯特布尔 (Barnstable) 男人持相反观点，他认为支付牧师生活费的法规是魔鬼所为。

[16] 这能说明新英格兰奴隶和牧师女儿的相对期望是什么，魔鬼答应给提图芭“漂亮的東西”和一只金丝雀作为宠物。他以参观“黄金之城”为由引诱贝蒂。

第四章 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有两种错误：（1）从字面上把握一切；（2）从精神上把握一切。 [\[1\]](#)

——布莱兹·帕斯卡尔

第一个试图追究真相的人，是塞勒姆村的前牧师德奥达特·罗森。3月19日傍晚，他到达塞勒姆，那时距玛莎·科里的逮捕令的发布已过几个小时。他只待了一个多星期。在波士顿重新定居后，罗森就去帕里斯先前所在的教会帮忙做事。他经常光顾当地知名牧师的家，包括科顿·马瑟。他离开塞勒姆已有四年，但仍像其他人一样了解那些村民，还有他们挚爱和反感的事物；若不是他们的愤怒和咆哮，他也许仍与他们在一起。他所看到的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在他把所见之事写下来的三个星期前，塞勒姆就已经猎巫成灾，说它“或为一个时代里最罕见的历史事件”并不为过。

如果没有帕里斯特意邀请，罗森本不会回到塞勒姆村，他在其他地方的讲道坛上也一样压力过大，劳累过度。那年春天，他只保留零星的布道记录，在3月末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他更是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整天都在参与审判。他依然没得到报酬。他的家庭为生计忧心忡忡，而他长期驻留法庭，这两件事消耗他大量的精力，他一定觉得自己像在挣扎着用卷起的报纸来控制火势。关于塞勒姆受难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他那里，虽然消息传播的速度不及他的上一个家园。恶魔突袭已成波士顿街头巷尾谈论的话题。罗森平静地指出，“在我离开他们之后”，村里就爆发瘟疫；他这话没有针对具体的人。他在这个暴躁的群体中仍然很受欢迎。

迎，而他声称自己是出于关心朋友才回来的。他曾在英国接受过基本的医疗训练，二十年前，他在那里担任——至少是装模作样地担任过——御医。他做了专业的记录。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是这项工作的完美人选。他对此也有自己的动机。有一名早期的受害者声称，巫术在1689年杀死了罗森的妻女，她们的鬼魂在附近游荡着想要复仇。如果他的家人确实是因为“邪恶力量的恶意操作”而牺牲，罗森还想了解更多情况。波士顿法庭的相关成员也想获得更多消息，便鼓励他前去调查真相。

星期六，罗森前往纳撒尼尔·英格索尔的客栈，它也是一个小酒馆。他刚放下提包，就接待了玛丽·沃尔科特的来访，她是村里民兵队长的女儿。乔纳森·沃尔科特是帕里斯家和帕特南家的近邻，曾担任罗森的执事。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老安·帕特南和热衷女巫蛋糕的玛丽·西布里都是玛丽的姑姑，而且玛丽就住在安·帕特南的家中。这个十六岁的姑娘和牧师交谈了几分钟。她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却突然停下来。她被咬了！那时已是傍晚，房内一片昏暗。罗森手持着蜡烛对玛丽做检查，他更记得她还是女孩时的样子。他发现两组清晰的伤口。有动物用嘴紧紧咬过她的手腕，两边都留下了牙齿印记。

那天傍晚，罗森在英格索尔的妻子陪伴下，一路向北走到牧师家里。在一楼客厅，安息日祷告已然开始。帕里斯几乎不需要描述前几个月发生的骚乱，因为阿比盖尔已经向罗森做出了生动的展示。这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在房间里来回奔跑，“做出她会飞翔的样子，把双臂尽可能高地伸展开，数次高喊‘呼，呼，呼！’”。汉娜·英格索尔试图制止她，但没有成功。阿比盖尔就像着了魔一样指着一个其他人没看见的人影，“你没有看到她吗？”她问，“为什么她站在那里？！”他们真的不能清楚地看出老丽贝卡·纳斯站在客厅里吗？即使两位牧师在场，纳斯也敢给阿比盖尔一本书，而十一岁的阿比盖尔此前已多次毅然拒绝

它。“就我所知，这是魔鬼的书。”她责骂幽灵。纳斯向吓呆了的年轻人保证，她不需要签名，只要摸下书卷就够了。丽贝卡·纳斯是一位虔诚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这是罗森第一次听说她的邪恶事迹，那天，她还出现在了其他地方。在古老的教堂，安在长椅上瞥见的第二个若隐若现的幽灵也正是她。阿比盖尔跑到壁炉前——提图芭就是在同一个壁炉前遇见长着翅膀飞行的生物——开始拿大块炽热的木头。她忘乎所以地把它扔在房子周围。罗森认为，她想要爬上烟囱，他听说她已经试过很多次。正是在那天晚上，几英里之外，贾尔斯·科里在客厅的壁炉前准备张嘴祈祷时，一股邪恶的力量阻止了他。

帕里斯安排罗森第二天进行布道。虽然布道的经文内容不可能像其效果一样让人难忘，我们还是对其一无所知。礼拜堂的长椅上坐着五个身体扭曲的女孩和女人，玛莎·科里也坐在那里，她心里越来越惶恐；所有人都知道，她将因参与巫术被逮捕。哈桑、科温法官和至少两位镇上的牧师加入集会。罗森开始布道，而扭曲身体的女孩们会打断进程。牧师们已习惯在干扰下讲道，木板上的跺脚声、屋椽下的鸟鸣、婴儿的号啕、狗的呕吐乃至会众昏死过去都不能打断他们。然而，女孩们的抽搐却使罗森戛然而止，他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圣咏唱起后，一切才恢复正常，他从讲道坛的座位上起身准备布道。寂静之中，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站起来，说出你的经文！”这是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发出的命令。罗森讲了几分钟，第二个声音响起：“够了！”这是拔书亚·蒲柏在大声发话，她今年四十岁，是最近的受害者。懂礼节的帕里斯为之羞愧，满脸通红。在宗教集会上，女人们既不能讲庄重之语，也不能说无礼之言。打断牧师需要受罚，代价是五镑罚款或当众罚站两小时。上一次敢这么做的，还是贵格会的女信徒，她们异常大胆地喊出相似的批评。“牧师！你的讲道太长了！”一个人喊道。“牧师！坐下！你说的已经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了。”另一个人说。在简陋的礼教前面，帕里斯的

外甥女在罗森按她要求说出经文后，发出了同样的抱怨：“经文太长了。”

那天下午，她的表现也不够好。罗森从讲道坛上宣读当日教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教义，”她反驳道，“即使你说过，我也忘了。”她继续扰乱罗森的布道，用手指向令人惊异的景象。所有人的目光都向玛莎·科里的方向投射过去。阿比盖尔又将会众的注意力转向头顶上方。“看！科里坐到梁上了！”十一岁的她指着屋顶的椽子大叫道，“她在给指尖上的黄鸟喂奶！”年轻的安·帕特南揭示了更危险的事情：金丝雀停落在罗森挂在讲道台上的衣帽架上的帽子上。大人们急忙伸手制止两个女孩。这样的打岔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692年，帕里斯的很多场布道都经历了同样的遭遇，教区居民后来纷纷埋怨那些着魔的人“发出扰乱人心的吵闹声”。

第二天，玛莎·科里站在礼拜堂前，一如她两年前成为正式教会成员时。这一次，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走廊和讲道坛的楼梯上也人满为患。塞勒姆镇的牧师尼古拉斯·诺伊斯大腹便便，他以罗森形容为“中肯又无力的祷告”开场，宣布审讯开始。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地方法官。科里一家不仅是教会成员，也是当地的大地主。一开始，哈桑温和地提出问题。她为什么要折磨这些人？如果她没有这样做，又是谁在捣鬼？玛莎以请求祷告作为回应，遭到法官的拒绝。她依然坚持要求。“我们不是请你来做祷告的。”哈桑干脆地告诉她，他们聚集起来是为了讨论巫术。科里坚称，她一生清清白白，与巫术毫无干系，并再次声称她是“福音女人”。她呼吁主“让法官和牧师睁开眼睛”，好让他们能够逮捕真正有罪的人。哈桑为玛莎的故作虔诚感到不快，也为她暗示他毫无见识的话语感到恼火。他愈发刻薄地提出让大家心神不宁的问题：如果她不是女巫，她怎么知道安·帕特南会打听她的衣服？科里正要回

答，记录员以西结·奇弗就打断了她。他警告她最好不要说谎。帕特南也随之附和。“你撒谎。”在科里试图解释时，她的执事辩称。她的丈夫已在早先的讯问中告发了她。哈桑转向贾尔斯·科里。他真的提前跟妻子透露过衣服的事吗？他没有。“你不是说是你的丈夫告诉你的吗？”哈桑不断刺激被告。帕里斯在他的记载中留下了一片空白——如果不是她无言以对，就是他无法在骚乱中听清她的回答。

即使科里参与过提图芭的审讯，哈桑的语气也会令她措手不及。他的口吻已从严厉变为恶毒。他提醒她是站在当权者面前。“我期待真相，”他缓慢庄重地说，“你发誓过的。”提前预知执事的问题，这十分可疑。哈桑反复提及此事，严厉地要求科里给出解释。女孩们几次打断他的问讯，表示有个男人正在科里耳边低语。“他对你说了什么？”哈桑问。科里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到。但是，她冒险提出忠告。“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心神不定的孩子们的话。”她的主张又使她们感到一阵痛苦。哈桑与意志坚定的嫌犯为了“心神不宁”的定义纠缠不清，她在几分钟之内三次提到这个短语。哈桑指出，心神不宁从本质上来说是转瞬即逝、变化无常的。而女孩们的表现始终如一。只有她认为她们疯了。哈桑和塞勒姆镇的一位牧师提醒科里，“所有在场之人都认为她们中了魔法”。

她无法解释关于烤肉扞、书册、金丝雀或从她家里搜出的油膏的调查报告。在法庭上，不知情会被继续当作蔑视、违抗，哈桑劝她认罪。“如果我有罪，我会认的。”她回答。科里令人敬畏，但不够沉着冷静；在讯问——初步审讯中最耗神的流程——过程中，她紧咬嘴唇，攥着双手。她站立了很久，间或被作证澄清或遭受折磨的证人打断发言；在一阵阵骚乱中，帕里斯断断续续地做着笔录。“现在，告诉我真相，好吗？”哈桑说，“你为什么说法官和牧师被蒙蔽了双眼，而你会让他们

睁开眼睛？”这样的问题让科里感到荒谬。她回答时不禁笑出声。哈桑无情地推动审讯进程，使被告提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一个无辜的人会有罪吗？”

全体审判人员似乎都期望她施展魔力，但她没什么可以展示。你说我们被蒙蔽的双眼，哈桑对她发出质疑。“因为你说我是个女巫。”科里愤怒地说。他请求她解释清楚，因为她似乎已经打算交代。如果不行，他还有别的问题。“你用什么打击了托马斯·帕特南先生家的女仆？”哈桑问。“我从来没有打击过她！”科里喊道。两名证人反对她的言论。她难道没有铁棒、小妖精和魔鬼契约吗？她没有。她当真相信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吗？“我和巫术没有任何关系。”她发誓，房间里陷入一阵骚乱，哈桑提出了3月1日审讯时的问题。她为什么要阻止丈夫参加女巫审判？“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她回答。狭窄的教堂长椅上响起一个不同的回答：玛莎·科里不想除掉女巫。她笑着看自己的意思被这样故意曲解。哈桑训斥她；女孩们的遭遇很可笑吗？“你们人人都反对我，我忍不住想笑。”科里坦白道。她不相信有女巫吗？她无法肯定。但是提图芭已经供认了，哈桑提醒她。“我没有听过她的发言。”她冷静回应。

人群被激怒了。科里表现得越来越轻率（“如果你们要绞死我，我又能怎么办呢？”），女孩们也變得愈发大胆。她们厉声尖叫，嘲笑她的回答。她不是福音女人，她们窃笑着说。她是福音女巫！观察员们告诉哈桑，他的嫌疑犯紧咬嘴唇时，原告们的手臂和手腕上就会透出牙齿印。随后，法庭职员更密切地关注科里的行为。果真，每当她紧握双手时，女孩们都会战栗。她转移重心时，她们会不由自主地跺脚，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如果她倚在被告席的围栏上——她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或许快有两个小时——她们就痛苦地瘫倒在地。尽管拔书亚·蒲柏没有在罗森回来前提出控告，但现在，四十岁的她也感到女巫正在钻入

她的肠子中，好像要把它们从体内撕出来。她痛苦地嚎叫起来，把暖手筒往科里身上砸去。这个房间有三十四英尺长，二十八英尺宽；施虐者和受虐人仅距彼此一英尺或两英尺远，近得令人难堪。在狭窄的长椅上，她们身体的扭动和痛苦的尖叫在近观之下就像巫术一样可怕。拔书亚的暖手筒没有击中目标，她俯下身来脱掉鞋子，用力地投掷出去，不偏不倚击中了玛莎的头。她很难保卫自己，为了保护受害者，她的手当时似乎被捆绑了起来。

哈桑准许科里的控告人质问她。现在她们已经有了十人，妇女和女孩各占一半；她们从四周抛出一连串的问题。科里为什么没有随其他女巫在礼拜堂前集合？她与魔鬼签订了多长时间的契约？（她们为她做出了回答：十年，而她已经为他效劳了六年。）哈桑提出了一个教理问答中的问题。科里回答正确，但是罗森认为她答得有些古怪。在女孩们的指示下，官方人员检查了她的手。金丝雀有在她的指尖留下痕迹吗？一枚她曾用来扎一名受害者的针，出现在孩子的头发里。审讯结束前，诺伊斯牧师宣布自己确信科里在他们面前施展了巫术。

哈桑感到万分沮丧。他一心想要科里认罪，现在招供看上去没戏。他只听到毫无意义的尖叫声和跺脚声，嫌疑犯依然时而困惑茫然，时而自以为是。他提醒她，这个案子已经一目了然。难道她没有发现，那些受害人就像她们的邻居一样理性冷静吗？那时，科里显得有些茫然。她告诉塞勒姆的法官，他们无法证明她是女巫，而他们——就像一开始就态度强硬的诺伊斯一样——相信她无疑已经给出证明。那天下午，一位治安官把这个所谓的福音女人带到镇上的监狱。接下来的六个月，她将被戴上枷锁，等待审判。

那天，受难者们没有再见到玛莎·科里，但她们仍觉得不安宁。第二天早上，老安·帕特南醒来时看到了一个访客。当时正值黎明，原来访客是丽贝卡·纳斯，她只穿着亚麻内衣，向老安猛扑过去。她随身还携带着一本小红书。两人互相扭打了整整两个小时，纳斯否认上帝和基督的力量，还威胁要把老安的灵魂从身体中抽出来。与此同时，乞丐莎拉·古德的五岁女儿在村里到处飞行，她咬了玛丽·沃尔科特和小安·帕特南。她们展示了她小小的牙齿印。小桃乐茜·古德瞥了一眼，就让女孩们痉挛发作。她掐她们的脖子，拧捏她们，逼她们在魔鬼之书上的签名，书中涌现塞勒姆村村民的大量信息。

或许是在同一天，一个代表团集体访问了纳斯的农庄。虽然丽贝卡和丈夫弗朗西斯·纳斯不是最早的移民，但他们也已在村里站稳了脚跟，他们从一位波士顿牧师那里买下他所继承的三百英亩农场。结婚五十年来，他们养育了八个孩子，还抚养了一个沦为孤儿的贵格会男孩。这个家族兴旺而团结，夫妻俩的婚姻坚不可摧。所有的孩子都活下来了，他们对彼此都毫无敌意。弗朗西斯·纳斯是一名木工，也是塞勒姆的活跃居民之一，担任过陪审员和治安员，也会评估财产、勘测边界和仲裁土地纠纷。他是当地委员会的成员，正是这个委员会对帕里斯主动示好，尽管两人的关系在结识后就逐渐恶化；不久前，纳斯所在的委员会还扣留了帕里斯的工资。富有的纳斯广受尊重，他与西布里家族及社区的多数人都关系亲密，这一点从3月末的代表团阵容中就可以窥见一二。代表团包括村里另一个显赫家族的三名成员和纳斯的姐夫彼得·克洛伊斯。他们都与被施咒的女孩或最初的控告人没有牵连。（代表团中有哈桑法官的妹妹伊丽莎白。）有人——最可能是帕里斯或哈桑——已经派出一群人去梳理丽贝卡可能掌握的近期事件的信息，了解她对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的反应。

他们来到纳斯宽敞的家中，发现七十一岁的丽贝卡卧病在床。她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敢出门，但她向来访者保证，她觉得她在虚弱之下与上帝更加接近。她询问近邻之中那些抽搐的女孩们的状况，特别是帕里斯家的女孩。她没有拜访过牧师的家。她认为这是自己的疏忽，但也有她的理由：她年轻时也饱受痉挛的折磨。她解释说害怕自己重新患病，还迷茫地轻轻点头，对这种病的传染性表示认可。她确实感到悲痛，也为邻居们祈祷，因为她知道症状的严重性，所以更是倾尽心力地做这些事；她听说，他们见到此症时都极为震惊。她也满怀担忧，因为她知道有像她一样无辜的村民被指控施行巫术。访客尽可能温和地大声说出消息——纳斯已经几近失聪——实际上，她也被指控了。老妇人目瞪口呆，静静地坐了一段时间。最后，她认定自己“就像未出生的孩子一样清白”。访客满意地离开了，在他们揭露消息之前，她对他们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

如果代表团打算证明纳斯的清白，他们自己就会立即陷入麻烦。似乎就在第二天，罗森牧师拜访了老安·帕特南。她躺在床上，被探望的人们围绕着。星期三是新英格兰的烘焙日，新鲜面包发酵的味道替代了潮湿粉尘中的酸味。老安看到她从前的牧师，显得异常高兴，她很喜欢他。这对夫妻请求罗森与他们一同祈祷，安勉强还能祷告。她跟着罗森祈祷了一会儿才感到背部僵痛。祷告结束时，她丈夫试图将她从床上抬到他的腿上；她的四肢过于僵硬，没有办法坐起来。她还在剧烈抽搐，胡乱挥舞着胳膊和腿，她紧闭双眼抗议，唯独能看到丽贝卡·纳斯的身影。“走开！走开！”她命令纳斯，“我对你做出过什么伤害之事吗？”她发出恳求。她知道纳斯想要什么。她得不到的，老安告诉这个幽灵，她在恍惚中与她争论了审判日的问题。纳斯坚称圣经的章句是不存在的。老安挣扎着讲话，她怪异地扭曲着嘴巴，呼吸起伏不定，四肢弯曲变形。最后她终于成功开口。她心中想的是广为流行的《启示录》第三

章，想看看纳斯能不能忍受她的诵读，便吁请身边的牧师。罗森犹豫了。他不认为自己能胜任这个任务，他为房间里的多股力量而震惊，担心还有更多的魔力会被释放出来；他几乎就要用圣经来占卜了。他在看到这位聪明却痛苦的朋友挣扎了整整半个小时后，决定冒险做个小实验。他快要读完第一节经文时，老安·帕特南的眼皮颤动了一下，她睁开了双眼。她完全复原了。床边的人告诉他，从前的情况也是这样，她在痉挛下说出的经文——她的选择无规律可循——会立即消除她的痛苦。塞勒姆镇发出了对丽贝卡·纳斯和五岁的桃乐茜·古德的逮捕令。

第二天早上10点，老丽贝卡·纳斯站到了哈桑和科温面前。哈桑首先转向帕里斯的外甥女和小安·帕特南。这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还会重复控告吗？阿比盖尔声称，纳斯就在当天早上攻击她。安发出一声惊嚎。哈桑请其他人前来提出他们的控诉。两个女孩和一个前治安员上前一步。“你与巫术毫不相干吗？”哈桑问纳斯，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她正要回答，老安·帕特南突然大叫：纳斯曾带那个黑人到她家，怂恿她反抗上帝！“哦，主啊，帮助我！”纳斯哭喊道，她的手臂指向天空。她这样做的时候，女孩们四处乱撞，胸膛一起一伏，喘不过气来。哈桑问她：难道你没看到当你乱动双手时，会让别人遭到多大的痛苦吗？

那个星期四，哈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宽容的。他面前站着的是最不可能的嫌疑人。哈桑的妹妹可能为纳斯作证，她可能还不知道纳斯是个女巫，早已被引入歧途；他承认，自己也不确定要如何看待这些微弱的幻影。但是，他面前的证据让人无法反驳。哈桑心想，提图芭——她仍在波士顿监狱里掌控局面——声称自己喜爱贝蒂·帕里斯，同时却在折磨她。纳斯难道不认识什么邪灵吗？就像科里一样，她既看不到黑人在她身边耳语，也看不见女孩们所指的屋檐下的鸟。哈桑感到羞愧：正直

的教会成员被控施行巫术，这是多么可悲啊！“这件事确实可悲。”扔鞋的拔书亚·蒲柏附和说，她又开始抽搐了。他们激起了一连串激烈反应。纳斯认为她们所受的折磨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哈桑企图引出答案，她却表现得犹豫。哈桑把问题抛给其他人。如果丽贝卡·纳斯认为女孩们作假，那么她“一定将她们视为杀人犯”。这是句分量沉重的评论，他本认为他已经比过去几年的审判更宽大了。现在，他们正在考虑死刑。

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绝望，纳斯一度把头垂到胸前。伊丽莎白·哈伯德的脖子仿佛自动地被折断了一样。阿比盖尔·威廉姆斯警告，如果纳斯的脖子没有被扶正，伊丽莎白的脖子就会断掉；几位村民走上前纠正老妇人的姿势。十六岁的伊丽莎白立即恢复原状。帕特南的表妹玛丽·沃尔科特尖叫着向众人展示身上新出现的一排牙齿印。咬噬和拧捏扰乱了房内的秩序。在审讯过程中，老安·帕特南的身体变得像木板一样硬邦邦，她的丈夫带她离开了。她走后，屋内陷入一片混乱。罗森没有看到她离开，因为他为了准备布道，在审讯开始两小时后就离开了。他离礼拜堂有段距离，但尖叫声和怒吼声还是能飘到耳边。哈桑与他半聋的嫌疑人却几乎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即使两人离得很近，有人对此提出另一种解释：纳斯没听清哈桑的问题，是因为那个黑人在她耳边低语。

屋子里，许多人都因恐惧而哭泣，但纳斯依然没掉一滴眼泪。哈桑认为这一奇怪的表现可以证明她的罪行，尤其是因为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女巫是不会哭的。（更准确地说，只有她的左眼会流出三滴眼泪。）村民们也称为她的冷漠所震惊。哈桑继续旁敲侧击地打探，他的提问不如先前的有效。她为什么不拜访帕里斯家？究竟是什么使她得了病？“你相信那些备受折磨的人是被施咒了吗？”他最后问道。“我相信。”她放

眼审视当下骚乱的场面。面对四肢脱臼、精神错乱的受害人们，罗森自己也目瞪口呆，像村民们一样心存敬畏，后者窃窃私语“担心坐在身边也会被巫术影响”。他几乎可以听到他们的心怦怦直跳，感受到他们脖子后面耸立的头发，以及喉咙里的恐惧感。无论如何，恶灵正在蔓延，他们处于其中，正如他在星期四的布道中承认的那样。丽贝卡·纳斯被排除出了需要重新审讯的人之列。有几个人声称，自己目击到她曾与不明身份的黑人骑马经过礼拜堂。在去塞勒姆镇监狱的途中，她对事情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到目前为止，这场危机引起的行动远远多于分析。罗森曾试图平衡两者，可村民们渴求安慰和解释；几个小时之后，在人群拥挤的简陋礼拜堂里，罗森试图在发言中安抚他们。他深知自己正坐在火药桶之上，向法官、塞勒姆牧师、患者和被告的家属发言，为此他已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罗森用了帕里斯的修辞和文法，提出魔鬼就在他们身边肆虐。他对撒旦做了简短的介绍，让他得以展现自己对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了解。暂且不说博学，他口中的杂种生物——它有“巨蛇的敏锐、龙的凶恶、狮子的力量”——听上去就像提图芭在帕里斯家的客厅里遇到的那只毛茸茸的暴躁野兽的表亲。那只野兽尤其热衷于“刺激、迷惑和毁灭人”，这点不足为奇：人们越是虔诚，撒旦对他们的迫害就越猛烈。罗森特别为他陷入困境的同事说情。在任何时候，帕里斯牧师都值得他们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尤其是现在，他和家人面临如此糟糕的情况，他却仍在奋力工作。

罗森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撒旦专门攻击塞勒姆的其他动机。村民们可能要考虑，上帝挑选他们的住址供恶魔相会，是否标志着“神的不满，他要以此扑灭你们中间争论的火焰”。那天下午，在微亮的长椅上，有三人曾于1687年在塞勒姆镇劝告村民搁置仇恨的信上签名。他们对罗森

的说法再同意不过。罗森也猛烈抨击了魔咒和迷信，他知道女巫蛋糕的来龙去脉。他明白村民们需要答案，但这样的实验只会让魔鬼感到满足。他补充了一个与疫病相关的解释：撒旦“传播传染病的感染原子”，就是为了更快地毁灭他们。罗森告诫大家要提防虚假指控，不要过早下结论。只有一种解药可以对抗古老大蛇的恶毒手段：祷告！

罗森告诫道，在这次挑衅中，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应当郑重自省。所有村民——不仅仅是那些看到被施咒者而悚然惊醒的村民——都要自我反省，追随信仰。应当以大量的祷告去对抗众多魔鬼。罗森的话如抒情诗般抚慰人心，但他的语调是激昂好战的：撒旦已经全副武装降临到他们中间。他为此鼓舞人心，村民们也正开始为这场灵魂之战做准备。他们应该用好每一件神圣的盔甲，这将是他们有生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他们一定也应当感到害怕。与此同时，罗森请求法官们尽其所能“制止和谴责撒旦”。他们应该显现如何“对作恶之人施以惩罚，让其胆战心惊”。针对撒旦是否会借用无辜者的皮囊这一问题，他呼吁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和坚决的诉讼。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可能都在严肃地自省，但刺痛与咬噬也并未消停。正是在那个星期四，玛莎·科里的丈夫向镇上的一位牧师承认，他怀疑自己的妻子涉嫌巫术。科里是第三个认为妻子是女巫的男人。丽贝卡·纳斯——她的丈夫没有站出来——继续折磨着小安·帕特南，她花了半个小时用一根隐形的链子抽得她皮开肉绽。一触即痛的环状伤痕布满这个十二岁女孩的皮肤。那个星期，村里村外的多数议论都与纳斯的证词、罗森的布道、莎拉·古德的女儿桃乐茜被捕有关。在罗森和镇上的老牧师约翰·希金森的陪同下，哈桑和科温前往监狱审问那个孩子。她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变成瘸子，着实令人惊讶，即使有几个人抓着她的头，她也能设法做到。桃乐茜承认她也有一只小妖精，那是一

条小蛇，就养在她食指下关节处。她伸出手展示那个蚤咬红斑大小的小红点。那个黑人给了她蛇吗？法官问道。没有，五岁的女孩回答道，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她将持续戴着沉重的铁链。蛇是她妈妈给的。

3月24日，在“恐惧、惊奇和震惊之中”，罗森恳求所有人都能施予同情和怜悯。尽管两位牧师密切地交换意见，援引相似的意象，三天后，帕里斯还是在礼拜堂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那个星期日，他一直在纠结如何定义魔鬼。他可能是堕落天使或邪灵，可能是邪灵们的头领，或者只是“卑鄙邪恶之人，他们因为恶行与不敬神而最像魔鬼和恶灵”。罗森会引用约伯的话语，而帕里斯更倾向于提及犹大。他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作为引用的经文；门徒之中有一个魔鬼，同样的，“在这间基督的小教堂里”也有魔鬼存在。他对指控反应强烈。“你们当中有一个魔鬼。”帕里斯训斥紧张的会众，他非黑即白的态度过于极端，让大家都无路可退。他的话立刻得到响应。“我们要不就是圣徒，要不就是魔鬼，《圣经》没有给我们折中的选择。”帕里斯说道。他也打消了在另一个问题——哈桑仍为之困惑——中形成的疑惑，那就是魔鬼是否能以无辜者的形态显现？但牧师对此很肯定：魔鬼不能。帕里斯没有区分与魔鬼立约的人和被附身者。

这番话显然是说给某些人听的。帕里斯一宣读完经文——“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四十四岁的莎拉·克洛伊斯就站起来，冲出礼拜堂。会众惊讶不已，要么不是她自己猛地关上身后的外门，要么就是她离开时风带上了门。那扇厚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金属门闩发出吱嘎吱嘎的摩擦声。克洛伊斯是丽贝卡·纳斯的妹妹，她丈夫则是探望纳斯代表团的一员；她将错过玛丽·西布里下午的含泪忏悔，但她已经听够了。所有的目光都追随着她，但是，直到三个星期后才有人将帕里斯布道中关于阴

谋的暗示与她的离开联系起来。很多村民理解她因为愤怒而跺脚，却只有一个眼尖的十一岁孩子看到克洛伊斯在礼拜堂的门外向魔鬼行屈膝礼。

罗森离开塞勒姆村之前，一些疑团浮出了水面。大概是在3月25日早上，六十岁的酒馆老板兼农夫约翰·普罗克特与玛丽·西布里的丈夫进行了交谈。普罗克特在进城接女仆玛丽·沃伦的途中停下来喝了杯酒，玛丽将会成为不同寻常的原告证人之一。普罗克特是个真诚直率的正派人，他对审讯和磨人之事都毫无耐心。他吼道，他宁愿自己给玛丽报酬，也不愿让她参加审讯。“他为什么这般抱怨？”西布里问。普罗克特解释，玛丽也曾痉挛发作，但他很快就放弃治疗她的病症。他让她坐在纺车旁，威胁她如果再捣乱就会狠狠揍她。只有他不在时，她才会重新发作。他现在打算“揪出她体内的魔鬼”。（他取得了些许成绩。玛丽很快就表示女孩们都是在演戏。）普罗克特告诉大为震惊的朋友，如果装病的人继续这样，她们最后都会闹着指控巫术。这帮女孩们才该被绞死！西布里尽责地将他的慷慨陈词一字不落地汇报给他们的牧师。

那天早上，在莎拉·克洛伊斯砰的一声带上门离去后，丽贝卡·纳斯的女婿乔纳森·塔贝尔只身前往托马斯·帕特南家。他有很多问题要问这户人家的女人们。从这一点来看，审问和对审问的审问在塞勒姆村频频发生，很难相信晚饭还能被准时端上餐桌。在挤满祝愿者和小孩的家里，塔贝尔问帕特南一家：第一个说出他岳母名字的人是小安·帕特南吗？毕竟，女孩最初只提到折磨她的人是坐在她祖母长椅上的苍白女人。她无法辨别女人的身份。女仆默茜·刘易斯当时为了小安向幽灵出击，她证明是老安·帕特南最先提出丽贝卡·纳斯的名字。而老安·帕特南声称是默茜这么说的。三十八岁的塔贝尔说，似乎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同一天，一群年轻人在英格索尔酒馆边喝酒边谈论新的指控。几个

遭受折磨的女孩也在现场。突然，有个女孩突然喊道普罗克特的妻子伊丽莎白就正在屋内——她是个女巫！她该被绞死！有人表示反对，他什么也没看见，女孩是在撒谎。英格索尔的妻子斥责了女孩，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少女以相当确凿的口吻地承认是自己口误：她这样做是了“寻开心，他们得有些事消遣”。那天，两个年轻男子——他们帮忙照看被施咒的帕特南家人——声称自己无意间听到帕特南家的人正在教唆十九岁的默茜·刘易斯说话。

不久以后，罗森回到波士顿，记下了恶魔降临之事。他错过了3月31日的禁食活动，那是个星期四，农民们为受难者祷告。随后的一个月里，指控快速地席卷整个村庄，甚至蔓延到村外。3月，五个女巫遭到控告。到了4月，被指控的人数将达到二十五个。在更多人聚集在塞勒姆镇更宽敞舒适的礼拜堂之前，波士顿的地方法官先组织了又一次审讯。新近逮捕的人中有莎拉·克洛伊斯和伊丽莎白·普罗克特。

罗森于4月5日完成关于塞勒姆女巫的报道，很快就被出版。对故事的渴求不仅仅是进取的书商的工作，尽管本杰明·哈里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把这十页的小册子宣传为对“来自地狱的神秘袭击”的记录）。渴求故事是清教徒的倾向，是这些热衷逻辑又思想死板之人的本能反应，他们喜欢琢磨和痴迷因果关系。《圣经》奠定了新英格兰法律的根基，也是其最基本的经文文本，所有答案都能从中找到。众所周知，经文可以使你恢复元气、充满精力；当你身处道德或现实的十字路口，你应该做的就是随意翻开一页经文。与此同时，上帝沉默不语，莫测高深，令人暗自气恼。悟其意志、解其目的是清教徒毕生的事业，他们要解决处于信仰中心的不解之谜：人在出生前就被选中将会获得救赎还是遭受诅咒，那么他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呢？这个疑问令清教徒紧张不安地，向内

反省自我，担忧自己在世间的路途。早在3月的布道之前，罗森就是一个激情且洞察一切的观察家，一个强迫自己内省的人。

观察——无论是指仰望星空、追寻自我还是端详邻居——即是敬神大业的核心。这个词出现在所有教会的公约中。牧师自己是先知和守望者。教区居民也对彼此保持着“神圣的警醒”。结婚五个月后便诞下孩子的夫妻终会明白，世上少有不被察觉之事。对于船可以不动声色地停靠塞勒姆镇码头的说法，村民们完全有理由嗤之以鼻。所有人、所有事都受到了监督；除了围栏观察员和小麦勘测员外，每个社区还资助了一支由治安官组成的监察队伍。这个队伍监视众多家庭和酒馆，要是有人喝酒过于肆意，他们就会出面干预（冒着被人用椅子和柴架攻击的风险）。他们是税务员、卫道士、执法人员和线人。他们会审查任何晚上10点还在外逗留的人，鼓励人们在家进行教理问答，还没收宗教聚会中乱抛的核桃。他们观察着印第安人，也在星期天密切留意有犯罪倾向的教区居民。这些镇上的看守也要轮流着监视彼此，一星期值班两次。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族群，居住在变幻莫测的荒野的危险边缘，当他们眯眼看向客厅的阴暗处、望向森林、直奔不安分的灵魂，他们永远也不会太确信。

救赎取决于公共美德，正因如此，玛丽·西布里和以西结·奇弗才向整个村庄道歉，也正因如此，指认女巫时的犹豫不决也许就会被认为是支持魔鬼的表现。“如果被选中的圣徒的邻居有罪，那么圣徒也难逃罪责。”马瑟提醒教徒。因此，你越来越熟悉邻居的着装、夙怨、性情、遗产、癖好，以及他的苹果酒供应情况和牛耳朵上的烙印。没人像孩子那样受到如此密切的监视，他们的道德健康水平尚未得到保证，往往也很难得到保证。监视并非总是有害的。在一个秋日的傍晚，若不是一个路人盯着马瑟波士顿家里的窗户，他可能就不会注意到马瑟女儿的帽子

着火了，而独自在家的女孩或许数秒后就会被火焰吞噬。^[2]

马萨诸塞的清教徒也知道——或者说虔诚地希望——自己在被监视。如果你住在山丘之城^[3]，那么你所站的位置就是个舞台。凝视并没有使定居者感到不适。用参事会前副主席威廉·斯托顿——他帮助殖民地界定自身，随后还界定了塞勒姆巫术——的话来说，监视使他们形成一个文明社会，伟大的事业将可能在这里得以实现。“如果世上有人已经升上天堂享受特权，”斯托顿强调，“我们就是那群人。”这只是一家之言，有位现代历史学家提出了更为朴素的说法：新英格兰人横跨了三千英里，他们“愿意冒着失去生命和财产的危险来到荒野，因此，他们才能在星期天坐在透风、幽暗的谷仓里的长椅上，一连坐上三到六小时，听《圣经》以它应有的方式被传布出来”。换句话说，这种结合是理想化的。清教徒做事谨慎，警惕性很高。他的信仰使他安于清贫，时刻保持警觉。如果你想生活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之中，等待着突袭和自然灾害——时刻提防着侵入者的每个信号，就如一则1694年的记叙中所写的从“恶狼般的异端”到“野猪似的暴政”——那么17世纪的马萨诸塞这片原始而荒僻的旷野就是你的归属之地。

上帝已经全然展现了马瑟在3月所说的“来自天堂的怒斥”。自从1630年清教徒抵达后，全能的上帝向他们送来暴雨、霉烂、毛虫、蚱蜢、干旱、天花和大火。几十年来，他一直只表达不满。前两代殖民者认为虽未被法律承认，他们实际上已独立于英格兰，这导致查理二世于1684年废除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特许状，这一文件具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就这样，几十年的繁荣兴盛猛然停止。定居者执拗倔强，时常制造混乱，他们铸造自己的货币，罔顾航海法案，迫害贵格会教徒。他们似乎相信英格兰的法律没有跨越大洋；他们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承担起筹建自治共和国的责任。几年后，英国政府强加给马萨诸塞一位王家总督

来处理殖民者的不正当行为，消解殖民当局之间的“细微差异和强烈仇恨”，协调防御工作。1686年，埃德蒙·安德罗斯抵美领导自治领政府，对从缅因到新泽西的所有领土具有绝对的权力。他削减塞勒姆镇的宗教集会次数，废除马萨诸塞的立法机构。他还质疑清教徒的领导权和土地使用权——3月的时候，他还占用礼拜堂举行圣公会仪式，让波士顿的会众在门口等待数个小时。对许多新英格兰人来说，他既是异端的恶狼，也是暴政的野猪。

1689年3月，身穿制服的安德罗斯和一大群随员穿过塞勒姆。他挑衅地问意气风发的老牧师约翰·希金森，国王是否合法拥有新英格兰的所有土地。希金森的言论常被形容为“天堂之光”，他为人灵活，常能给出让来访者满意的答案。他答道，他只能以牧师的身份发表言论，而安德罗斯提及的已是国家大事。铁腕的总督坚称，所以他更要听到答案。希金森承认，他认为这片土地属于居住在此的人，属于为它与印第安人做出交换的人。定居于此的两代人付出巨大代价才征服这片荒地。他们驯服的是被早前的访客称为“遥远偏僻、岩石嶙嶙、贫瘠荒芜、灌木丛生、野树茂盛的荒野”。塞勒姆牧师和王家总督你来我往，权衡和考虑神圣法则和英国人的法律。希金森表明，定居者到来之前，国王与北美的土地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安德罗斯对此勃然大怒，他提出另一个二元选择，虽然这在八十七年后才派上用场：“你们要么做臣民，要么做叛徒。”

直到1689年4月，安德罗斯被殖民者在一次武装起义中被赶跑。人们在波士顿牧师的鼓动下揭竿而起，三年后，许多起义者也将参与清洗女巫。叛乱前夕，英克里斯·马瑟甚至秘密驶往伦敦——他险些遭遇逮捕——去阐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恳求颁布新的特许状。这场谈判历经近三年时间，其间，马萨诸塞的居民不知道是谁在掌控统治大权。到了

1692年4月，新政权才从托普斯菲尔德牧师所谓的“恐惧和麻烦”中成立。一位心怀不满的官员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评价：想在马萨诸塞建起一个能运转的政府，就像要建成巴别塔一样；当时，当地的民间形势依然混乱不堪。人们担心，他们即将面临来自王室的惩罚，英国国教将被强制推行。马萨诸塞不堪一击，尤其是在海湾殖民地遭到的灾难被视为上帝的审判后。当上帝皱起眉头——无论是以冰雹、瘟疫、专横的英国官员还是巫术的形式显现——人们都认为，他这样做自有原因。

1692年，除了四处劫掠的印第安人和真实存在的法国人，定居者还留意到许多事物。他们关注那份恢复他们权利的特许状，以及他们不可或缺的交际家马瑟的回归。他们等待造成他们痛苦的解释，以及从痛苦中获救的办法。一段时间以来，科顿·马瑟和其他人密切留意着耶稣再临的迹象。新英格兰面临多重灾难，使耶稣再临迫在眉睫。塞勒姆巫术的出现进一步证明时间所剩无几；马瑟推算出未来五年将是耶稣最可能降临的时期。他的严谨表明了17世纪人类思想的另一特点。这种特点被形容为“不协调的怪异混合物”，离奇地包含了学识和迷信。^[4] 自然事物会显现近乎超自然的力量——一位颇有名望的牧师收到消息，他妻子生产时不是由接生婆，而是由上帝接生的——就如医学与占星术、科学与荒谬言论之间一样界限模糊。

许多牧师都涉足炼金术，却猛烈抨击魔法；民间的法术是一回事，社会精英的法术是另一回事。两边下注、左右逢源的应付方式仍大行其道；你的虔诚不意味着你在端上女巫蛋糕前会犹豫不决。就像任何接受了宿命论的人一样，清教徒对占卜痴迷至极。提供占星知识的历书总是畅销不衰。^[5] 1683年，哈佛学院还因日食而推迟毕业典礼。无论如何，清教徒离厨槽现实主义^[6] 还很远；上帝以滚滚雷声、巨龙喷烟的声音和闪烁的彗星与他们对话。据说，当其他人在留意雷电时，塞缪尔

·休厄尔（他的兄弟收留了小贝蒂·帕里斯）则在密切寻找彩虹的痕迹——抚慰人心的彩虹，伟大完美的彩虹，《启示录》里记载的彩虹。休厄尔还在家门安上了天使的头像作为防护。在令人焦虑的黑暗中，宗教有时似乎是在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折中。

在1692年前，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许多人都能在缺乏书籍的情况下解析句子，这十分罕见。塞勒姆村的大多数女孩即便不会签名，也都能阅读（小安·帕特南是少数会签名的人之一）。在他们的社会中，最有文化的人也恰巧最缺乏想象力。新英格兰牧师曾收集一些关于超自然事物的证据，以抵挡理性主义汹涌的力量。在1684年的《显赫的天意》中，英克里斯·马瑟记载了神童和征兆的种种例子，此书激发他儿子写了《难忘的天意》，瑞典飞行和恶魔救援的故事便是通过后者传遍新英格兰的。《显赫的天意》蕴含幽灵、财产、地震、沉船和飞行的烛台等元素，是民间传说与学识的绝妙融合，这一创作是为了让牧师们满意——1681年，他们要求有一份收录“大量巫术、不义之财、著名判决”的合集。这些“当地的奇异故事”亦有政治目的，在面对英国王室入侵时，它们重申了上帝对新英格兰的承诺。

凭借着征兆和符号，清教徒不会错过任何蛛丝马迹。当一个人手持枪械去沼泽地猎杀水鸟为晚餐，他家最好的猪却紧跟其后，这必然意味着什么。狂怒的冰雹会击碎休厄尔新厨房的窗户，也带来了上天的旨意（马瑟向他郁郁不乐的朋友保证，这次破坏是末日的预演）。对意义的渴求导致了对因果关系的痴迷，解释成了清教徒生活中常见的特征。彗星从不仅仅是彗星。亚麻布的燃烧充满意义。当古德温家的孩子痛苦地扭动身体时，他们的父亲自然认为他正因自身的罪孽而受到惩罚。假如帕里斯从他抽搐的孩子身上领悟到谴责的意义，他也不会公开此事。然

而，结论已经显而易见。当另一个女儿在他危险的家中跌进火堆时，科顿·马瑟也推断出同样的结果。

人性的弱点被视为导致恶劣天气的原因；无论是牙齿打战，还是脚趾麻木，马萨诸塞的清教徒都有充分理由相信显然是自己犯了罪。这种过度之举导致许多人受害；英克里斯·马瑟曾提出，菲利普王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他们过多佩戴假发和穿着丝绸衣物。一位康涅狄格的神职人员写道，他成为鳏夫是因为与妻子的性生活过于频繁。还有人将孩子的死亡归咎于自己对他们的溺爱。不作为被视为许多事的主要原因，对于深信自己地位低下的那代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不如父辈那般虔诚，美好恬静的田园时代已然过去。嗓音嘶哑的坎布里奇牧师因为差劲的布道而受到谴责。英克里斯·马瑟在他六十四年牧师生涯中的第三十四年头——那时女巫开始在空中飞行——有过左膝受伤，他想知道是否因为他对上帝的事奉不够勤勉用心（他每天花不少于十六个小时的时间学习经文）？做人千万要小心为上：科顿·马瑟在晨祷时意外遗漏了一个女儿的名字，他在结束时得知，保姆在一个小时前无意中闷死了她。1690年，塞缪尔·帕里斯将新英格兰的苦难归因于家庭在宗教敬拜上的疏忽，他带着问题前往坎布里奇的牧师聚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马萨诸塞的牧师要竭尽全力号召每一个教区居民“根据每户人家的情况互相询问、指示、劝导、警告，乃至控诉”。

清教徒对因果性的全然接受使他们走向两个似乎截然相反的方向。一方面，这让他们成为热忱的诉讼者。在17世纪90年代以前，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没有律师，但也没出过什么意外。凡是能想到的罪行都会被送上法庭，似乎大多数马萨诸塞居民都会不禁被这种想法所吸引——在事态崩溃、破灭、出错或误入歧途时——必须有人担责任。^[7]（我们所熟知的正直的塞勒姆村民，大部分都来自法庭记录，那是一连串违法行

为的目录。这本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册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违法行为，称颂着过度膨胀的理性。）17世纪的马萨诸塞居民并不比其他年代的人更惯于违法，只是他们更热爱正义。哪怕官方记录被他们重新改写过，他们还留下了分类账簿和还债记录。作为一个将救赎寄望于公开忏悔的见证民族，他们天生就是目击证人。似乎从不缺少人来自愿汇报人们曾说过的话，或者他们所听到的上一代人的言论。在法庭上，相互监视听上去可能是另一回事。1692年，科顿·马瑟劝告会众保持敏锐、相互监督时，威廉·坎特伯雷的妻子对此的理解可能和马瑟所想的有偏差——那时，她正趴在树上，邀请一位朋友一同监视女邻居，后者把坎特伯雷从她家中轰了出去，还接连向他砸去各种东西。

虽然殖民地定居者很警惕，但仍有许多事物逐渐消失——从母马到篱笆再到美德。债务和醉酒是流行且合法的癖好，但紧随其后的是各种形式的非法侵入。当时，土地许用的划定方式毫不令人惊讶：“从树桩向东走过四根杆子到篱笆桩”为范围，或“向东以公路旁山脊上的大黑栎树”为界。即使边界是精准的，牲畜也不会选择尊重它们。新英格兰每一代的猪都肆意妄为，对当地造成严重破坏；似乎，邻居的猪永远都在用鼻子拱豌豆。星期六早晨，当邻居的猪出现在自家的花园里，性格平和的丽贝卡·纳斯终于勃然大怒。她叫儿子带枪过来。（不久之后，猪的主人就去世了，这对她的案件可没什么帮助。）帕里斯在请求村民修复他腐烂的篱笆时，将烂篱笆形容为他与邻居间的“诱饵”。每年春天，他的牲畜都会冒险跑到邻居家，而邻居的猪牛羊也会奔向他的农场。每一年，塞勒姆村民都会讨论牧师家草场的篱笆，他们将这个新英格兰的共同难题塞进三个词来概括：对不敬、饥荒和侵略的恐惧。

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锁似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人们可以肆意踩踏边界，越过门槛。塞勒姆村民完全有理由将妻子独自一人时的恐惧公

之于众：当丈夫下地窖取苹果酒时，妻子都会面临着邻居侵犯的危险。男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溜到不属于自己的床上。（有趣的是，在1692年那一整年中，女幽灵经常上床骚扰男人，而在可见的世界里，情况却往往相反。）黑暗的谷仓尤其危险。纽伯里（Newbury）有个女孩被人引诱进牛棚后，手中的蜡烛被对方击落，她告诉袭击者“她宁可被奶牛顶伤，也不愿被像他那样的流氓玷污”。怨言如火般不断蔓延；双方之间的气话常常使彼此亲戚间产生更多口角，怨恨世代相传，变本加厉，酝酿郁积。就这样，数十年来，帕特南家族与托普斯菲尔德数个家族之间的夙怨远近皆知；丽贝卡·纳斯家和帕特南家族在一场漫长的土地纠纷中相互控告和反诉。法庭依照英国的程序，以惊人的速度高效执行。那时，监禁还十分罕见。常见的处罚是苦役或是赔偿，要不然就重新开庭。

尽管处罚手段很有创意，但种种罪名却并不新奇。仆人们常遭受言语和身体上的虐待。他们搜刮藏酒、偷水壶或在床上藏石头来报仇。有个仆人穿上主人的鞋子，骑上主人的马逃之夭夭，走前还告诉女主人“她就是个随便的妓女、烧烂尾巴的母狗、跳上跳下的蟾蜍”。很少有人像那个将蟾蜍扔进牛奶罐里的女孩一样富有创造力。塞勒姆商人托马斯·莫尔曾被多次告上法庭——他有个令人恼火、贵格会教徒才有的工作习惯，那就是在安息日要求仆人工作（人们通过他家商店的窗户目击此事）——1681年，他因虐待女仆而被控告。他用马鞭对着她裸露的背部抽打了三四十下，导致她之后两个星期都在吐血。莫尔被问道，他本可以轻易地卖掉那个女孩，又为何要如此残忍地打她呢？“因为她是个好仆人。”莫尔如此答道。他在1692年的事件中袖手旁观，但在事后则毫不讳言。

法庭未必总是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有时候，人们一味追求理性，却

发现最好的解释超脱了世俗。新英格兰最显赫的牧师们指出，只有这一个解释。显然，这个解释是最万能的。有个当丈夫的会将自己的性无能归咎于林中的女巫。如果莎拉·古德没有迷惑那群牛，又该怎么解释它们的死亡呢？巫术将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归于同源，解释了为何有人与邻不睦，有人专横武断，有人恐怖神秘。正如塞缪尔·帕里斯所发现的，它转移神对人类的审判，消解个体的责任。魔鬼不仅让人忘了理智，还清楚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意思；尽管情节荒谬，动机却合乎情理。你无须反思自己做过什么才引起魔鬼对你的厌恶，只要将其归于上天的责难——或冷漠。当你开始关注邪恶的阴谋，它们很快就会为你所见。巫术打破了问责制中的逻辑死结。它使怨恨受到认可，使轻蔑得以消除，使焦虑得以缓解。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它给出一个无懈可击的解释。

在塞勒姆村，没有人独自生活。但突然间——就在德奥达特·罗森的警告和帕里斯煽动性的布道之后——他们似乎更不孤独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模糊的踪影。帕里斯举报称，4月6日傍晚，约翰·普罗克特到牧师的家中袭击了他的外甥女。他还对帕特南家施以相似的惩罚。星期三，在数英里之外，一个名叫本·古尔德的二十五岁农夫醒来时发现贾尔斯和玛莎·科里正站在他的床边。他们狠狠地捏了古尔德两把，随即在第二天晚上的返程，普罗克特就紧紧跟在他们后面。由于疼痛，古尔德好几天都无法穿鞋。他是第一个提出控告的年轻男性。现在，人们在他人身上施展巫术，却尽量避免在法官面前相互攻击。在宗教集会上，他们没有再抵挡无形的幽灵，只有一次例外。在4月10日，帕里斯的布道被他的奴隶约翰·印第安打断。同其他人一样，约翰知道提图芭已经入狱五个星期。当他坐在长椅上时，幽灵莎拉·克洛伊斯突然袭击

了他；她一口咬住他，用力将他咬出血来。她还袭击了十一岁的阿比盖尔。布道结束后，在英格索尔酒馆，帕特南家的女仆又一次抽搐不已。恢复知觉后，她已经无法辨认出折磨自己的人。一份嫌疑人名单被提交上去，人们脑中都浮现相同的名字。女巫会是年迈的丽贝卡·纳斯吗？还是拒绝妥协的玛莎·科里？莎拉·克洛伊斯似乎是更有把握的人选，逮捕她的指令已被发放。那天，在二十五英里外的波士顿，科顿·马瑟告诫教徒，为了上帝的到来，他们要戒掉罪恶的睡眠，严防魔鬼，因为“惊心动魄的革命”已然临近。

关于塞勒姆神秘事件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波士顿。因为哈桑和科温认为自己需要增援，或者是因为那些增援人员认为必须亲自调查那些怪事，又或者是因为第一次有男性嫌疑人出庭作证，副总督托马斯·丹福斯亲临塞勒姆，参与4月11日的预审。随他一同前往的还有包括波士顿法官兼商人塞缪尔·休厄尔在内的多名官员。作为殖民地最有名的公职人员之一，丹福斯时年六十九岁，曾在哈佛学院干了数十年的财务和管理工作。同时，他也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任职。他曾奋力保卫过殖民地失去的特许状，还参加了反对安德罗斯的政变。他在起义时出尽了风头。出于将他带到塞勒姆的某些相似原因，4月的审讯转移到镇上更精致明亮的礼拜堂，它几乎是乡村礼拜堂的两倍大，里面有宽敞的新建走廊和雅致的专席长椅。那个星期一，丹福斯指定帕里斯为法庭书记员，让牧师亲自记下其奴隶对自家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帕里斯的笔速很难跟上口述。对塞勒姆的记录员来说，庭上的话语常常说得太快。因为羽毛笔和墨水完全不适合在快节奏、立体声效的场景下书写，记录员便放弃直接引用，改为转述，把法庭上难以辨认的声音当成幽灵之声，大半时间还要注意和记录说话者的语气变化。纸上的墨渍表明了他们工作的辛勤，保持笔墨流畅并非易事。他们一边记录，一边修正错误。他们会总结庭上的言论，并在一旁加入自己的评论。（对帕里斯来说，形容

痉挛的词语可以是“可怕”“极度”“可怖”“悲惨”或“痛苦”。) 另一个记录员托马斯·帕特南会在审讯结束后再强化某些证词。有时候，停下笔来要轻松得多，只需宣称被告的话不值得被转述，因为巫术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们证词夹杂着大量谎言和矛盾。记录员会留心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事情（无礼、笑声、干涩的眼睛），却省略了自认微不足道的事（拒绝承认罪行）。指控的逻辑往往胜过不在场证明的不合逻辑。纸上呈现的内容不总是记录者听到的内容，而是他所记得或相信的内容；不过，鲜有记录员会像帕里斯对提图芭的供词那么挑剔。4月11日，帕里斯在躁动不安的人群中没法一直听清和看清。于是，他的记录便不知不觉地出错。

托马斯·丹福斯安排一次合唱，每个饱受折磨的人——那三位成年女性也加入了女孩们的队伍——都跟着唱起来。很快，一些真相就浮出了水面。首先，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和莎拉·克洛伊斯都分别先后去牧师家里找过约翰，她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又掐又咬，差一点就使他窒息而亡。她们还坚持让他在本子上签名。气宇轩昂的丹福斯没有哈桑那般苛刻。他在1659年取消了一桩巫术案，两次推翻了陪审团的裁决。现在，他想确定的是，约翰·印第安能认出那两个折磨他的人吗？奴隶回答自己当然认得。他指出其中一人就是莎拉·克洛伊斯，她在房间前闪现。克洛伊斯清楚自己受过不少苦：她躲过了印第安人的袭击，作为寡妇还养着五个孩子，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她过得远比姐姐丽贝卡·纳斯艰辛。“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你？”她争辩道。“很多次。”约翰回答。“噢！你是个大骗子！”克洛伊斯大声喊道。

克洛伊斯的审讯过程比姐姐的更为紧张，她很大可能还参加了后者的审讯。大部分的证词都出自女孩之口。“阿比盖尔·威廉姆斯！”丹福斯喊道，他早就了解过事件的概况。“你是否目击到有一群人在帕里斯

的房子里吃喝？”“是的，先生，那是他们的圣餐。”她是第一个提到“圣餐”这个词的人。恶魔集会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禁食日。在那场牧师住宅后面举办的仪式中，克洛伊斯和古德担任了执事。这是牧师家第二次被传出恶魔集会的细节；帕里斯将听到女巫聚集在他家外面，这个说法或许会巩固他在社区里的地位——它清楚地彰显了他的正直——也可能使他蒙羞。无论是哪种情况，当人们突然对他那篱笆损坏、受到侵占的草地产生兴趣，他都有必要感到畏惧。何况，主持大局的还是一个令所有女巫战栗的白人。阿比盖尔说出了一个甚至比饮血更令人不安的细节：当时大约有四十个女巫出席！就在这一关头，克洛伊斯提出喝水的请求，接着瘫倒在座位上——“就像昏死过去了一样”，帕里斯记录道。曾有个失望的塞勒姆陶工告诫村民：若不停止争吵，那么这个村庄永远不会变为城镇。此时，距他发出警告已经过了十年。

丹福斯转向四十一岁的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她刚怀了第六个孩子，但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事。正是她这里，法官遇到了困难。有个女孩提出异议，称她先前从未见过伊丽莎白。还有两个女孩一时无法开口：在被问及伊丽莎白是否折磨过她时，帕里斯的外甥女将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医生的外甥女则陷入长时间的恍惚。女孩们要么是乱了头绪，要么是屈服于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丹福斯可能当场吓怕了她们；作为十二个孩子的父亲，他知道如何与孩子交流。约翰·印第安也帮了他一把。约翰透露，衣着暴露的伊丽莎白·普罗克特曾掐住他的脖子使她无法呼吸。丹福斯两次问他是否确定她的身份。约翰表示确认。现场大部分的女孩都渐渐恢复过来，讲出伊丽莎白和魔鬼之书的更多细节。

可能就是那沸沸扬扬的时刻，帕里斯的外甥女和小安·帕特南伸手要打被告。如同奇迹般，阿比盖尔的拳头在半空中松开。指尖拂过老妇人的头巾后，她开始痛苦地嚎叫。她的手指被烫伤了！这两人一停止发

作痉挛，就取代约翰成了房里的焦点。女孩们就会像被施咒的人一样郑重地说：“看她！她马上要抽搐了！”有的时候，她们会发出警告：“我们都要跌倒了！”接着，七八个女孩便会疯了似的跌落在地板上。由于她们的预测能力，这两个分别为十一岁和十二岁的女孩很快就被称为“预言女孩”。她们指向礼拜堂的横梁：伊丽莎白·普罗克特——那个男巫的妻子——就稳稳地站在那里。很快，她们就发出警告，普罗克特——他曾宣称女孩们的说法是一派胡言——会让扔暖手筒的拔书亚·蒲柏漂在空中。就在那一瞬间，蒲柏的脚从地板上抬了起来。他对此如何解释？丹福斯质问约翰·普罗克特，后者突然就成了受审人。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阿比盖尔就指向两个更年迈的女人：普罗克特要来攻击她们了！两个女人开始痛苦地扭曲身子，阿比盖尔也哭了起来。“你看，魔鬼会欺骗你，”丹福斯警告意外出现的嫌疑人，“在女人受伤之前，孩子们就能看到你将要做什么。”他极力劝告普罗克特改过自新，撒旦不过是在玩弄他。“哀哉，哀哉，哀哉。”那天傍晚，波士顿法官塞缪尔·休厄尔在日记中用拉丁语这样写道。在敏感问题上——例如有关妻子的春梦或岳父的批评——他会转而用拉丁语写作。直到后来，他才把“巫术”这个奇特的词加到日记里。

普罗克特想凭一己之力让人们恢复点神志。他与丹福斯是同代人，讲话很直接，却十分亲切。他有十一个孩子，其中五个是与年轻的妻子伊丽莎白养育的，伊丽莎白还帮助打理他家的酒馆。他们还拥有七百英亩的农场。普罗克特立即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包括在他的操纵下漂浮起来的女人的丈夫）说，如果帕里斯允许他与约翰·印第安一起待上几分钟，“他立马就能击败约翰体里的魔鬼”。约翰的话与他以前听过的胡言乱语一样。帕里斯可不会接受这种威胁，对他来说，魔鬼可不是这样就能被击败的。然而，至少还有一些人同意普罗克特的观点。那个下午，塞勒姆一个叫爱德华·毕肖普的农民骑马将约翰·印第安接回村里。这个

奴隶开始剧烈地颤抖。他突然向前一倾，死死咬住前面的骑手。毕肖普用树枝打他，这才解除了咒语。约翰保证不会再犯，而毕肖普坚定地向他担保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并发誓要用此法治好所有被施咒的人。

第二天早上，在镇上的礼拜堂，帕里斯试图起草一份文件，如实记录下前一天的惊人事件。但他不断遭到干扰。约翰和阿比盖尔在他身边咆哮和扭动。帕特南的十六岁女仆玛丽·沃尔科特本来坐在一旁安静地织毛线，突然间就眼神呆滞地望向前方。她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后，证实了阿比盖尔唐突的判断：约翰·普罗克特就坐在执法官的腿上！约翰·印第安纠正她：普罗克特骑在牧师的狗上，他们就在帕里斯正在扩写法庭记录的桌子底下。约翰哄那只动物——可能就是它吃了女巫蛋糕——从桌下钻出来。随后，他向隐形的莎拉·克洛伊斯喊道：“噢，你这个老巫婆！”然后便开始疯狂抽搐，四个男人都无法使他安静下来。玛丽·沃尔科特还在织毛线，她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注意到普罗克特夫妇和克洛伊斯在一起折磨奴隶印第安。约翰和阿比盖尔都被带离了现场。玛丽在帕里斯向法官宣读记录时留了下来。帕里斯说完后，她一手织着毛线，一手指向房内的人——或者说，房内的所有巫师——古德、普罗克特夫妇、纳斯、科里、克洛伊斯、古德的女儿——都聚集在这里。那天，所有她叫出名字的人都被送到波士顿监狱，包括普罗克特，他可能没有经过正式逮捕就面临监禁。贾尔斯·科里骑马跟着被捕的妻子玛莎，到塞勒姆的渡口后却无法继续前行。他身上没有钱渡河。他对妻子发誓会在下一周与她会合，但他无法兑现这一承诺了。在下个星期一，他也将被拘留。

不同的基本规则已经开始出现，其中有些更是前所未见的。巫师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可以是流浪的乞丐，也可以是富有的农民，可以年轻，也可以年迈，可以是正式的教会成员，也可以是外部人员。

正如贾尔斯·科里将会发现的那样，为配偶被判有罪——即使你从前中伤过对方——而表示同情也是不明智的。相比之下，告发被更多人所接受；像威廉·古德就从未遭受审判。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受到监视。除了帕里斯一家，约翰·印第安是最近距离目睹被控告的女巫和控告者的人，他或许已经推断出，明智之举就是要在任何人提到他前先公开点出他人的名字。当然，比起被指控，当受害者可安全得多。在异常平静的一个星期后，种种猜疑又开始肆意涌现。所有的事情都处于悬置状态。丹福斯的审讯，和女孩们对“女巫集会”的指控，都是如同闪电般的预示。现在，雷声终于传来，连一只待在礼拜堂桌下为主人暖脚的狗也变得危险。

一名女孩指出幽灵，其他人也随即看到它——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塞勒姆村民在视力方面愈发敏锐，记忆力也显著提升。当清晨的燕子宣布春天到来时，赫里克警官又逮捕了四个巫师；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四处奔波，搜集证词，逮捕嫌犯。丹福斯为起诉提供了合法性，除此之外无其他变化。唯一确定的是，哈桑从上级停手之处重新开始，修改了开场策略，使4月比3月时更为中立。或许，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

4月一天的早上8时，四名嫌犯中的第一名走进礼拜堂，他便是有过七十多年精彩人生的贾尔斯·科里。对一些人来说，他与妻子的渡口之约像是一场邪恶的共谋，但他之所以成为明确的目标，亦有其他缘由。一年前，他成为塞勒姆镇礼拜会众中的一员时，有人就提到他声名狼藉的过去。半个世纪前，科里曾在仓库偷过小麦、亚麻、烟草和大量其他物品（仓库属于科温法官的父亲）。当轮到他担任看守工作时，他却跑去出售装满一艘独木舟的木材，还为此在法庭上撒谎。他还与当地的男

教师打架，往后者身上泼了一盆脏水，并因斗殴和扰乱秩序而被起诉。1676年，他用棍子狠狠打了一个小偷，一连打了近百下，随后假装那个年轻人是自己摔倒的。几天后，小偷因伤而死。

科里会拔除篱笆，会恐吓马匹，还会在卖东西时像莎拉·古德般刁难人。他曾警告邻居，对方果园的篱笆今年会着火，如果没有，明年也会烧起来的。不管怎样，邻居的果树都长不出果实。（巧的是，那个邻居的儿子娶了科里的女儿。正是这个二十五岁的女婿讲了这个诅咒的故事，还出庭作证指控科里。）科里的另一个女婿也举报了岳父，他称科里偷过木头、干草、木工工具，以及十二蒲式耳苹果。科里也对这个女婿下诅咒，使得邻家的锯木厂无法再运作。这些年来，科里累积了一百英亩农田，哪怕让最和谐可亲的人来管理，也免不了尖锐言论伤人自尊。所有的记录都显示——包括由哈桑父亲在法庭上记下的伤人案件记录——科里是一个“极爱争论的坏邻居”。他的名字常与失踪的母马和死去的猪一同出现。科里家早就承受着很多敌意，厄运埋伏在他们的房子周围。

十五年前，普罗克特家的屋顶冒起大火，科里似乎就是罪魁祸首。当有人提到房子可能“被魔鬼之手”点燃时，科里差点没能躲过又一项指控，他没有理会有关巫术的说法，证明了自己那晚正在床上睡觉，最终被宣判无罪。不出所料，他反诉约翰·普罗克特诽谤。他们后来在路上相遇，科里拖着一堆木头，天性直率的普罗克特打趣道：“贾尔斯，你怎么就离不开你的旧业呢？你的车上还装着我的木头呢。”科里对此表示承认。他们后来去喝了杯葡萄酒，与对方言归于好，开始互相打趣，体现出“深厚的爱”，一位目击者回忆说。这种爱迟早会派上用场，他们即将共居一间斗室。

在4月19日的审讯中，许多旧时的恩怨浮现出来。科里尽力推卸它

们。“你们当中是谁被这个人伤害了？”哈桑问道。四个女孩走上前来。科里否认了指控：他没有与魔鬼签订契约。“你受到过什么诱惑？”哈桑问。“我一生从未受过诱惑。”科里不悦道，当长椅上有三个人举报称早上目击到科里在谷仓里惊慌失措时，他也同样脸色阴沉。“是什么使你受了惊吓？”哈桑询问道。“我一辈子都没怕过。”科里反驳，他让原告们突然开始发病。为了保护她们，哈桑要求执法官绑住科里的手。是不是平时使用巫术还不够，哈桑训斥科里，“你非得要现在面对着法官施展巫术吗？”哈桑似乎受到了冒犯。“我只是一个可怜人，我也无能为力。”这个平时脾气暴躁的老头答道。他的话竟然能让人产生同情，这是那个春天最不可能出现的转变之一。

科里双手被捆着，尽力为自己辩解。他不记得自己在牛棚里受到惊吓，也解释不清玛莎被逮捕时身上的绿软膏。软膏是邻居给的，而邻居的丈夫在科里眼里是一个“该死的、恶魔般的流氓”。其他人也跟着说了些同样难听的话。科里似乎一度打算自杀，借此构陷一个亲戚——对于一个被姻亲在法庭上指控的人来说，这并不令人意外。但你说你没有受过诱惑，哈桑刺激他。“我是指巫术的诱惑。”科里澄清。“如果你能接受自杀的念头，就一定会屈服于巫术的诱惑。”哈桑责骂道。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无疑预示了科里可怕的结局。

那个星期二，另一名嫌犯——四人中唯一一位在更早的时候就正式受到巫术指控的人——表现得更目中无人。布里奇特·毕肖普是塞勒姆镇的中年居民，大约五十岁出头，有过小偷小摸的经历。她和前任丈夫曾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她弄得满脸鲜血；还有一次，她全身都是瘀伤。1677年，她因为在安息日称丈夫为老流氓和老魔鬼而站上法庭；八年前，这对夫妇因同样的罪行遭受鞭打。后来在一个训诫日，两人又因打架而受罚：嘴被堵上，背靠着背，在公设市场上站了一个小时，额头

上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列举了他们的罪行。此后不久，毕肖普的丈夫便离奇死亡。八个月内，她便债务缠身，还与邻居和继子争吵不断，最终因巫术而受审。当时是个11月，有个奴隶在骑马穿过树林时突然受到惊吓，掉入冰冷的沼泽中。万分震惊的旁观者宣称，马被施了巫术。一个星期后，奴隶走进谷仓时发现透明的布里奇特·毕肖普正稳稳地站在横梁上。当他伸手去拿杈子时，她凭空消失了。

这些场景——以及毕肖普一家的争吵——足以让人铭记，所以她的控告者仍叫她布里奇特·奥利弗，这是她前夫的姓。“他们说你将你的第一任丈夫蛊惑致死。”哈桑追溯起过往的流言。“尽管这种说法合阁下您的心意，我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她摇头回答。帕里斯在记录里暗示，她回答时充满敬意。奇弗则认为她很生气。此前她应付过同样的问题，所以她的声音听起来极其耐心。在两人的记录中，她每次转头，女孩们都会猛地抽搐。当她面向上天寻求帮助时，她们的眼睛向上翻起。毕肖普争辩，她既不认识魔鬼，也不认识控告她的人。事实上，她从未住在村里，不认识法庭上的任何男人、女人和孩子。原告们提出反对。帕特南家的表亲玛丽·沃尔科特掌握了更有力的证据：当毕肖普的幽灵袭击她时，她大喊了一声，她的哥哥拿剑刺破了毕肖普的外衣。玛丽还听到衣物撕裂的声音。她的大衣上有洞吗？哈桑问嫌疑人。毕肖普向他保证没有。哈桑下令搜查。衣服上出现了两处裂口。治安官赫里克——他没奉命逮捕女巫嫌疑人时是一名家具装饰工——插嘴提了一个问题：毕肖普是如何在有天早上设法溜进他的卧室的？（马萨诸塞巫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与众不同：赫里克声称，她出现在那里是为了问他是否有窗帘出售。）

毕肖普的言语即使不挑衅，也带着逗弄的声调；不明智的是，她的声调中还透露着怀疑。她无法说出是什么使女孩们得病，也不认同有形

似她的邪灵在外面招摇过市。她不是女巫，甚至说不出女巫是什么。她运气不好，碰上了一个出色的逻辑学家。“那么，你怎么知道，”哈桑反问，“你不是女巫？”她不明白他的意思。“你不知道女巫是什么，又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女巫？”哈桑继续问。毕肖普大为恼火。她答道，如果她是女巫，哈桑就会知道她的力量。哈桑一听这句话，就认为其中带着威胁。他不会忘记它。难道她不知道别人已经在那天招供了吗？她不知道。有两个男人上前气急败坏地说，他们已经专门告诉过毕肖普大部分的经过。“唉，你撒了个弥天大谎！”哈桑训斥她。

在哈桑审问毕肖普的那个星期二，他先前受理的两个嫌疑人都大有进展。一个是美丽的玛丽·沃伦，她的第一次痉挛是普罗克特通过鞭打治好的。哈桑试图用同样的方式逼出真相。自从普罗克特打她后，两人就被卷入了一场决绝之战。因为瘰症得到缓解，她依照惯例在礼拜堂的柱子上贴了一张感谢笺。礼拜堂的柱子相当于今天的社区公告栏：你在那里能知道谁是新的围栏观察员，谁因没有正确教育孩子而被判服役。这封公开信涉及家里的混乱，普罗克特一家为此感到愤怒。玛丽当时二十岁，性格冲动鲁莽，是同辈人中的叛逆者。在康复过程中，她从受害者变成了嫌疑人，可能中途还控告她的朋友欺诈。很快，她就会承认巫术，接着又再次屈服于被下咒的痛苦。似乎，她是想把所有角色都揽到自己身上。

玛丽走近护栏时，被施咒的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哈桑问她们是否玛丽在伤害她们，但她们无法说话。格里格斯医生的女仆伸长身子，设法够到那位年长的女孩，确认她受到了玛丽的伤害。约翰·印第安和扔暖手筒的拔书亚·蒲柏也加入她的行列。“不久前，你还是备受折磨之人，而现在，你折磨他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哈桑问。玛丽哽咽着以利于自己的口吻陈述。她似乎不确定自己站在哪一边。有些时

候，她神态恍惚地站着，然后含着眼泪，开始绝望地道歉。尽管她还不清楚自己在向哪一方道歉，不清楚自己要说什么，她还是承诺会告知所有人。每次她试图说话时，她都痛苦地扭曲身体。哈桑多次让她离开房间，慢慢平静自己；最终，牧师和法官私下里让她宣誓作证。

在狱中度过一晚后，这名二十岁的姑娘变得更加乐意提供信息。在她张贴便笺后的那晚，是伊丽莎白·普罗克特把她从床上推起来。后者告诉玛丽自己是女巫——塞勒姆女巫的介绍常常很正式，阐述亦言之有物，一开始就会递上自己的证明 ^[8]——她的女主人读过很多书，玛丽因此可能以此推测。伊丽莎白是有许多书，出门时还总会放一本在口袋。玛丽还将贾尔斯·科里牵涉进来，详细地形容了他的衣着，使法官大为震惊。科里虐待她，可能是因为他想要买玛丽主人的草场时，她建议主人抬高价格。她还描述了4月21日发生的一次同样棘手的精神交易。她承认，尽管自己抵住了各种不同的鼓动行为，她还是在了一本看似不详的书上签了名字，这是她在雇主的餐桌上喝苹果酒时被他们敦促着签下的。她的手指在书上留下一个奇怪的黑色污点。法官们花了三天才从她身上获得这些细节；玛丽还哭喊道，如果她暴露了他们，她就会被“撕成碎片”。普罗克特在私底下确实欺侮过她，哪怕他如她所言的那样，声称要焚烧她来治她的痉挛，要淹死她或推她撞向篱笆，他这样做也可能并非因为巫术。他显然很信任她会谨慎，向她透露过妻子让他很恼火。他的自信或这种亲密关系，都将成为负担。玛丽心里还藏着另一种恐惧。她已经屈服于普罗克特的要求在书上签了字，因为他警告她，如果不签，当她又一次陷入火中或掉进水里而痉挛发作时，他就不会救她。她所用的语言正是帕里斯用来形容这类家长的：在危险面前，他们摇晃孩子来拯救他们，通过假警报来教育他们。

那个星期二，哈桑的第二个嫌疑人带来了最为丰厚的奖赏。邻镇托

普斯菲尔德来的坏女孩，十四岁的阿比盖尔·霍布斯，就住在村子的边界处。有段时间，她会吹嘘自己的童年和清教徒沾不上边。夜里，她会在林间嬉戏。她还嘲笑对她倍感绝望的继母。几个星期前，有个朋友斥责来访的阿比盖尔粗鲁无礼：难道她不知道羞耻吗？霍布斯让她闭上嘴，否则她会大闹一番。她宣称自己无所畏惧；她已经把灵魂出卖给撒旦，现在什么都不怕了。在与提图芭相似的证词中，她已经接近一个正在形成的、统一的塞勒姆理论。她还曾引起一场雪崩。如果受害的女孩能安安静静坐着，你明白自己正在获得进展；而当年轻力强的阿比盖尔出庭作证时，她能让所有人都不敢乱动。“我实话实说，”她开始说，“我一直很邪恶。”她曾与恶魔对话。为了换取艳装华服，她同意去拧捏那些女孩。狗、猫，还有半人生物，都敦促她那么做。她签署过几份契约，第一份是光天化日之下在树林里签的，但不是托普斯菲尔德。阿比盖尔将哈桑带到一个重要之地：她是在向北八十英里、属于缅因省 [\[9\]](#) 的卡斯科湾（Casco Bay）订立的契约，她三年前在那里经历过印第安人的突袭，最后得以幸存。她又说了几个名字，包括一名托普斯菲尔德治安官的母亲，后者拧死了一个拒付税款的农民的猪。她缺乏提图芭描述细节的天分，但通过讲述猫给她送来的书，她也达到了目的。女孩们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阿比盖尔讲得筋疲力尽，人们似乎再也听不见她的说话声时，女孩们才第一次哭喊起来。阿比盖尔睁大眼睛，却看不见东西，但她竭力补充了最终的解释：乞丐莎拉·古德让她闭嘴。

哈桑只可能感到如释重负。伴随着恼人的插话和乏味的重复，他的审讯在幽闭的空间里缓慢继续。法庭记录的文字也零零碎碎。他有家庭，也有自己的业务；也许，巫术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负担。阿比盖尔阐明了很多事情，在狱中也仍不停手。第二天，她描述自己是如何应对幽灵带来的刺痛的：魔鬼给她荆棘，而她将其嵌入木雕像中。她是否曾

偶然将刺扎入受害者的腹部？哎呀，她做过！虽然在审讯上，她表示自己对集会一无所知，但第二天在监狱里，她就清楚了。她参加过大规模的女巫集会，其间吃了红面包，喝了红酒。她说，那里由九个司仪主持，这也使提图芭提到的数量得以确认。在帕里斯家那带着邪气的草场上，她们遇见了彼此。

次日晚上，一个新出现的大胆幽灵奚落了小安·帕特南。一天过后，他再一次现身。4月21日上午，在叔叔训诫前，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在酒馆外与英格索尔的养子本杰明·哈钦森搭讪，本杰明大约比她年长十岁。他当时拿着干草叉，阿比盖尔突然指出，路边站着一个邪恶的矮男人。她指出，矮男人有着非比寻常的力量，他的种种事迹也使她惊讶：他杀害了三个女人，招募了九个塞勒姆女巫！他还可以单手持最重的滑膛枪开火！他在哪里？哈钦森勇敢地问道。阿比盖尔用手指了指，哈钦森于是举起了干草叉。她抽搐起来，但马上恢复过来，以确认年轻人打中了目标。她听到入侵者的衣服撕裂了。一个小时后，这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又在酒馆主厅里找起了哈钦森；她既不羞于让年长的男人为她辩护，也乐于吸引他们的注意。“他就站在那里。”她告诉哈钦森，目光却扫向四处，哈钦森便舞起轻巧的刺剑，像是捉迷藏游戏的变体。这时，幽灵已变成一只灰猫，哈钦森照打不误。阿比盖尔向他保证，他已经占了上风。她看到女乞丐莎拉·古德的幽灵带走了那只动物。

中午时分，两人前去听帕里斯的训诫。不到4点，阿比盖尔又在酒馆里找起了哈钦森，这次是和哈钦森的表亲玛丽·沃尔科特一起到的。她们举报说，玛丽被一个托普斯菲尔德的女人咬了，刚说完，两个女孩就开始哆嗦。她们平静下来后指着一张桌子：女巫的丈夫就站在上面！哈钦森将剑刺入他认为折磨者所在的地方。他刺入剑后，才知道房里挤满妖精，他们之中有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大黑妇”。在被施咒的女孩指

引下，哈钦森和朋友疯狂地左袭右击，女孩们为她们的保护者描绘了屠杀的场景；他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当女孩指出一个想象的人物时，你认为她是正确的，而你一无所见。撒了细沙的地板很滑，那是因为上面有血。在外面的小山上，女孩们还发现了一群参加集会的女巫，其中三人已经死亡。

4月21日，法庭发出了逮捕九名女巫嫌疑人的令状，她们大多数人都住在托普斯菲尔德；指控向城镇边界蔓延，一起地方事件发展成了区域危机。当局计划在周末前逮捕他们，包括塞勒姆镇最富有的商人的妻子，丽贝卡·纳斯的二姐，阿比盖尔·霍布斯的父母，以及一名黑人奴隶。托普斯菲尔德的治安官尽职尽责，亲手逮捕了自己的母亲。各种指控迅速积累，以至于嫌疑人都很难辨清。即使对细心的黑尔牧师来说，塞勒姆镇的布里奇特·毕肖普和托普斯菲尔德的莎拉·怀尔兹就是同一个人。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里，共有五十四名女巫被指认。

托马斯·帕特南的名字最先出现在4月中旬的抱怨声中。4月21日，他认为有必要亲自写信给塞勒姆法官，提出他的建议。在对他们“高度的关心和所承受的痛苦”表示感谢后，他恳求法官们继续“以恐怖手段严惩作恶者”。村民们会尽己所能帮助他们。他给予他们支持、祝福，但也提到了其他事。事件正在迅速发酵；他知道法官马上就会得知惊人的最新消息。帕特南警告，有一个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轮中套轮，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他的措辞应归功于圣经里的先知以西结和耶利米 ^[10]，还有曾将“耳鸣”和“以恐怖手段严惩作恶者”纳入3月下旬布道里的罗森牧师。 ^[11]

帕特南的信提醒大家留意幕后之人，对这出戏剧做出了及时的调整。他有处理轰动性事件的天赋；在他手里，巫术受害者从来都受

着“痛苦的煎熬”“可怕的折磨”。他总共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指控，几乎是总数的三分之一。他将出庭作证指控十七名嫌犯。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他认为有必要在星期四的诉讼中来点猛料。他可能是从马瑟家学会这一技能的；你预测了灾难，就迟早要制造一场灾难。帕特南没有提到他生病的妻子、女儿或他自己的连连厄运：他的羊逃走了，一头奶牛死了，他最爱的马也死了。最近，他还失去一份遗产，被同父异母的弟弟抢走了。他出来发声是为了社区，或者暗示其他人迟早也会这样做。他只给出些许阴暗的线索——如耶利米预示了即将来临的灾难——便决定不再透露更多耸人听闻的细节。他把“强劲且可怕”的消息留给那些能看见异象的女孩去传达：此事背后有一个诡计多端的操纵者。

[1] 此处译文引自帕斯卡尔著，《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 如果邻居没有透过窗户窥视，威廉·莫尔斯家里的闹鬼秘密——猫、猪、勺子、石头和椅子不时就会飞过他家——可能永远不会解开。当莫尔斯在认真祈祷时，是他十几岁的孙子把鞋扔到了祖父的头上。老安·帕特南从小就在附近长大，她本该知道这个由来已久的谜团的每个细节，这个谜团则引发了早期的巫术指控。

[3] 山丘之城（City on a hill），指世人向往的理想社会。“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

[4] 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们并没有多么不同。罗伯特·波义耳曾提议采访矿工，因为他们在挖矿过程中会遇到“地下的恶魔”。牛顿把他的部分时间用在神秘学，部分用在物理学，他曾研究、尝试炼金术，

还撰写了三十万字以阐释《启示录》。因此，凯恩斯称牛顿为“最后一位魔法师”，他还被认定为敌基督。约翰·洛克则用占星术来保证草药的收成。

[5] 1692年的年历提醒，3月行星的排列预示着争斗和冲突：“简而言之，人类总是在这个时候倾向于暴力。”

[6] 厨槽现实主义（kitchen-sink realism）是一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英国文化运动，其载体包括戏剧、小说、电影等，以体现英国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为主。此类作品中常会有底层人民聚集在酒吧谈论社会问题的经典场景。

[7] 很少有新英格兰人认同塞缪尔·休厄尔起诉自家岳父一事，后者曾于1674年说过：“我发现法律就像彩票一样——收费高昂，收益却很少。”

[8] 出现在圣女贞德面前的圣徒们也会特意显示自己的身份。

[9] 缅因省（Province of Maine）并非一个官方名称，而是指一块存在于17世纪的北美洲拓殖地，1691年后被并入马萨诸塞。

[10] “轮中套轮，凡听见的人的人都必耳鸣”这句话引用了《圣经》的两个异象：“轮中套轮”引自“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作法好像轮中套轮”（《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凡听见的人的人都必耳鸣”引自“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第三节）。

[11] 帕特南有意无意地服从着两位进入过出神状态、看到过异象的先知。

第五章 巫师

我见了这样一个人影实在害怕，可是一想到刚才明明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更加害怕了，因而我先是从它跟前逃开，继而又向它跟前奔去。等到弄明白那儿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那份害怕才真叫害怕到了极点。 [\[1\]](#)

——查尔斯·狄更斯

就算帕特南的暗示对法官们来说晦涩难懂，疑惑也只持续了两天。哈桑领会话中的要义后，便下令逮捕更多人。过去的六个星期里涌现了大量矛盾，他快速审查当中的每一起，以及每一个涉事人。若有不可信的指控出现——曾有人指控格里格斯医生的妻子——它会随即消失。提图芭口中那个从波士顿来的大个男人也在混乱中消失了。他再次登场时，将变为来自缅因的矮男人。

哈桑从未要求活泼的阿比盖尔·霍布斯展示魔鬼承诺她的华丽服饰，也遵守每一本法律指南的建议，没有隔离女孩或单独审讯她们。他不打算用牙科学来处理牙齿印的问题，这本可以带来出乎意料的结果，当时也已有人指出，其中一名被告“嘴里的牙齿无法咬人”。哈桑似乎毫不质疑，尽管遭受拧捏、掐喉、啮咬、殴打等残忍手段，被施咒的女孩们看上去依然非常健康。尽管自己无法看见中年教友穿着短裙站在大梁上，他还是相信她们看到了幽灵。他对巫术侵袭的观点与科顿·马瑟一致：这一事件“是在想象中处置的，但应该不能被称为假想之事”。 [\[2\]](#) 女孩们的说法自相矛盾，说话时前言不搭后语，他却对此视而不见，主动

抛弃那些不能解释这个反常案件的事实。无论是放在嘴里的拳头、适时出现的恍惚神态还是玛丽·沃伦对女孩们伪装的指控，都不能阻止他。所有迹象都表明，法官一心想要追求一个预先决定的结果。

在审讯和监狱审问中，尼古拉斯·诺伊斯牧师都坐在哈桑旁边，他是一位体型圆胖、态度强硬的诗人。^[3]十年来，诺伊斯是塞勒姆的常住居民，为人活泼风趣，可谓绝佳伴侣。他拥有当地最好的图书馆，那是马萨诸塞著名的地标。作为埃塞克斯县法官的儿子，这位四十五岁的牧师上了法庭也能应付自如。诺伊斯与帕特南一家关系要好；休厄尔兄弟也将他视为密友。他扮演了直言不讳的角色，在嫌疑人发表证词前向他们发出质疑、验明证据、提出内行意见，而且绝不让嫌犯插嘴。有一次，他在法庭上用燃烧的玩偶进行实验。他可以对付所有企图援引《圣经》来捍卫自己的嫌犯。诺伊斯和哈桑似乎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当毕肖普压在她的受害者身上，几乎使他窒息时，他身旁的妻子没有看见她？为什么被魔鬼抓走的孩子从未从家里消失？有些事情不合逻辑。有些则几乎完全不合情理。例如说，为什么提图芭要乘着木棒飞往一个在自家后院举办的集会呢？

哈桑无情地审问嫌犯，直接将他们监禁起来。如果你过去犯过罪，他会掘地三尺将罪行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深受欢迎的是“交叉、迅速的询问方式”。4月22日，所有出现在他面前的嫌犯——无论拒不认罪的，还是供认巫术罪行的——都被送进了监狱等候审判。一方面，哈桑并不冒险。如马瑟所说，塞勒姆的人家回响着“孩子和仆人的哀叫声”。他们神经紧张，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他们语无伦次、疯疯癫癫的状态扰乱了一切事务。此时，地上的冰雪已经融化。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正在临近，是时候开始耕犁种植、为播种印第安玉米种子挖洞、剪羊毛和洗毛料了。另一方面，哈桑有理由带着谨慎继续行事。巫术可是被视为

最严重的罪行。真相十分简单，取证却困难异常。这其中有三种可能性：女孩们被施了咒语；女孩们在伪装作假；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情况着实令人费解。就像所有令人费解的事情一样，这件事看上去既难以解释，又显而易见。哈桑选择了相信巫术的存在，决定将它斩草除根。有些人并不认同他的信念。在严酷的审讯下，第一批嫌犯中有人同意是某种东西使女孩们得病，但不承认那是巫术。哈桑继续我行我素，仿佛他对一切心知肚明。毕竟，一个女巫在证人席上还可能说什么呢？而且，他手头掌握着——已经整整掌握了七周的——无法反驳的证词，那是关于巫术的唯一确凿的证据。“女巫招供并非罕见之事。”一位常驻塞勒姆担任顾问的英国法律专家评论道。提图芭证明了哈桑确有道理。小桃乐茜·古德和疯狂的阿比盖尔·霍布斯也证实了他的观点。

哈桑仍抱有一点点困惑和怀疑。在收到帕特南费解的神秘信件后，他在4月22日设计了一个实验。那是个星期五，塞勒姆举行了两场不同寻常的集会。哈桑的审讯没有另一场那么轰动，后者揭示了大量的信息。村礼拜堂里，仍有大量人群聚集在昏暗的长椅和走廊处，挡住了窗户和帕里斯的视线。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原告眯着眼睛，伸长脖子试图看清人们的脸。哈桑拿着完整的待审诉讼人清单，没有任何介绍就安排执法官开始对第一位被告的审理。“默茜·刘易斯，”哈桑质问站在房间前的十九岁女孩，“你认识被告席上的人吗？”女巫越来越多，或许已让哈桑感到惊恐。或者，证词中的反常言语已经开始触动他；他可能是因为帕特南家的女仆迟疑不决，才先挑选了她。默茜可能是大女孩们的头目。她无法说出嫌犯的名字。^[4] 哈桑叫下一个原告上场，八九不离十是帕里斯的外甥女，年轻的阿比盖尔。她也吓得哑口无言。

小安·帕特南挽救了局面，她认出了阿比盖尔·霍布斯的继母，蒂丽芙伦斯·霍布斯^[5]。安声称，这个来自托普斯菲尔德的女人折磨了她。

哈桑转向被告，提出了一系列常规问题：为什么霍布斯要伤害这些人？她是如何施用巫术的？如果不是她干的，那她认为是谁？他试图给女孩们使绊子。成功之后，他继续审理。与此同时，在微弱的光亮下，嫌疑犯搞起了桌灵转 ^[6]。她自己也受到了折磨！一个星期前，她在一个房间看到了鸟、猫、狗和一个人形幽灵——她正是帕特南的女仆默茜·刘易斯。蒂丽芙伦斯·霍布斯拒绝接受哈桑的所有提示。没有幽灵向她介绍书，或要求她签名。一场拉锯战开始了，整个故事脱离了哈桑的控制，让他变得烦躁不安。他刺激蒂丽芙伦斯，对她在短短数日就从折磨者变为受害者而深表怀疑。女孩们的断言使她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两个最小的女孩兴奋地指着天花板——那一刻，蒂丽芙伦斯不在被告席上，她们根本看不见她，相反，她正在她们的头顶上，站在礼拜堂的梁上。对哈桑来说，这更合乎情理，他用回了熟悉的询问方式。他没让受到牵连的默茜·刘易斯继续解释，后来此事便不了了之。

蒂丽芙伦斯对他们头顶的幽灵有什么话说呢？如果她承认签了契约，会受到谁的威胁呢？哈桑提出各种问题轰炸这个托普斯菲尔德的女人。她再次突然转变态度前，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什么都没做”。即使在她改口时屋内发生了什么，帕里斯也没有记录下来。也许，蒂丽芙伦斯认为以计谋胜过哈桑是徒劳之举；许多被告承认自己曾被地方法官吓倒。她曾在争执中输给自己的继女。现在，她突然脱口而出：两个晚上前，托普斯菲尔德治安官的母亲莎拉·怀尔兹给她带来了笔墨和一本书；她自己利用针和图像折磨那些女孩；她还结识了“一个身材高大、戴着高帽的黑人男性”。哈桑开始向上帝告解。很快，他就取得了更大的进展。接下去的二十四小时内，蒂丽芙伦斯为阴谋添上严密的逻辑，将村里的折磨、帕特南的预言、提图芭的黑人男性和阿比盖尔对缅因树林的模糊描述联系在一起。

蒂丽芙伦斯还弄清了前一天下午发生在英格索尔酒馆的血腥战斗。在她陈述完证词后，哈桑私下问她有没有在那个星期四感到难受。她说她的右侧有刺伤，现在依然很痛。法官命令几名妇女检查她的身体。蒂丽芙伦斯在紧闭的门后脱下衣服，露出被剑刺过的伤痕。现在，她知道自己是怎么受伤的了：她似乎就是哈钦森——在阿比盖尔的指示下——在酒馆用利刃刺伤的女人。至于威廉·霍布斯，他从那场战斗中恢复过来，并于22日在哈桑面前作证。他声称自己如新生婴儿一样无辜。哈桑问他，他如何解释自己能用眼睛击倒别人？阿比盖尔听闻，便大喊威廉·霍布斯想要攻击默茜·刘易斯，后者已经开始痛苦地扭曲身体。威廉·霍布斯真的能否认自己参与了巫术吗？哈桑问。“我至死都不会承认。”这个中年农民发誓道，他亦是托普斯菲尔德最早的定居者之一。可他的妻子已对施用巫术供认不讳，而他任性的女儿也出庭指控了他，声称他在家里从不读《圣经》。他不曾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个女巫吗？哈桑问。他不知道。他同意有超自然事物使女孩们得病。“你认为她们是被施了咒语吗？”哈桑问。威廉无法回答。那天下午，赫里克治安官将阿比盖尔的父母和其他六个嫌犯送进了监狱。^[7]

第二天，法官们在狱中审问蒂丽芙伦斯。监狱空间十分狭窄，被关在近处的其他人想不听到都难。这个托普斯菲尔德女人不断忏悔，描述了那个星期五塞勒姆的另一场聚会。一群女巫受到邪恶的号声召唤来到村中，照着样子举办了荒诞的圣餐仪式。蒂丽芙伦斯最终说出了十一个名字。具体人数从未达到一致，却一直稳步上升，从提图芭说的九个升到德奥达特·罗森听到的二十三或二十四个，又上升到阿比盖尔说的四十个。出席人数后来被通报为一百人，这个数字随之又升到三百零七人，最终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五百人，这几乎就是村里的总人口。这些女巫聚集在帕里斯的草场上，没有放弃她们的邪恶目的，即蒂丽芙伦斯透露的：她们将蛊惑每一个村民，她们受到指示可以逐步完成目标。帕

里斯的外甥女恰巧从牧师家里出来，看到女巫们聚集在长桌前，手里握着酒杯。他们为圣餐准备了“红面包和像血一样的红酒”。蒂丽芙伦斯·霍布斯证实，先前被指控的人都参加了集会，只是省略了已经招供的女巫之名。

最关键的是，蒂丽芙伦斯解释了继女对缅因边境的言论以及小安·帕特南在其父写信前遇到的来访。一个身穿黑衣的恐怖幽灵已经降落在村中。“什么？牧师们也是巫师吗？”安问幽灵。他掐住她的脖子，几乎把她撕成碎片，然后，他才介绍自己。他谋杀了几个女人——他仿佛是个受雇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特工——还杀死了一些边防士兵。他谋杀了罗森的孩子和妻子，还对帕里斯的外甥女施了魔咒。他透露自己的使命十分可怕：本应教导孩子敬畏上帝，现在却来“劝说可怜的人们将灵魂赐予魔鬼”。女巫不仅会跟受害者自我介绍，还带着一丝炫耀，就像“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中的反派，他们会列出自己制服猎物所使用的酷刑清单。

在英格索尔酒馆外被干草叉刺中的人，安·帕特南见到的自怨自艾的牧师，女巫集会的执事，托马斯·帕特南所指的阴谋的幕后策划者——原来都是同一个人。安·帕特南警告，此人不仅仅单纯是个巫师。新英格兰的孩子对等级制度高度敏感，这并非毫无理由：等级制度无处不在。在4月拜访安时，这名访客就吹嘘自己位居女巫之上。比这更强大的是，他是一个魔法师。（几天之后，他对阿比盖尔介绍自己时列举了同样的资历。）恰巧，住在树林里的小黑人也是他。此人强壮、狡猾、无所不知，同时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人。小安·帕特南眼中的他是嗜血的魔法师，她在四岁时就曾见过他。默茜·刘易斯眼中的他是前雇主，她曾于80年代服侍过他家。阿比盖尔·霍布斯知道在1688年印第安突袭前，他是缅因省卡斯科湾的重要人物。哈桑则明白，此人是自己的

前连襟。每个塞勒姆村的人——在那里，他从未给会众执行圣事，他们也从未任命过他——都知道，他们是他们的前牧师。4月30日，法庭发出了逮捕乔治·伯勒斯——罗森牧师的前任——的令状。一个星期后，当一名治安官将乔治·伯勒斯从缅因的边远地区送到塞勒姆后，后者却无法被关进监狱。此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伯勒斯临时住进塞勒姆镇一家酒馆楼上的房间，并受到严密监督。尽管他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他还是被允许接见访客；这位英俊、倔强的牧师在埃塞克斯县仍有朋友。当地的民兵上尉催促埃利泽·凯泽前去拜访牧师，但凯泽反复推辞。这个四十五岁的制革工吓坏了，他坚信伯勒斯是“所有因巫术遭到指控的人的首领或头目”。迫于无奈，他见了伯勒斯，还大胆瞥了一眼那能力超人的主谋。伯勒斯目光坚定地瞪了回去。到了傍晚时分，有十二只在黑暗中发着光的水母出现在凯泽家的房子里，哆哆嗦嗦地游向壁炉。他激动地叫来仆人，后者歪着头，惊奇地看着这些生物飞向大烟囱。凯泽的妻子却看不见它们，这证明了它们是“邪恶的幽灵”。

当凯泽在壁炉前平静下来时，伯勒斯第二次以幽灵现身帕特南家——此前，还是凡夫肉体的他从未在那里受到全然款待，毕竟他取代了老安·帕特南的姐夫，贝利牧师。5月8日，伯勒斯警告十二岁的安，他的前两任妻子很快就会出现，告诉她很多谎言。她没把她们当回事。果然，两个面色煞白、身披亚麻裹尸布的女人现身，打破了空气中的宁静；按现在的说法，鬼魂可以自由地在男巫和女巫身边飘来飘去。这两个鬼魂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好像鲜血就要从脸上喷出”，要求讨回公道：伯勒斯应当“被投入地狱”。正当她们在说这话时，牧师就消失不见了。前妻们解释，是他谋杀了她们。她们中有一人解开裹尸布，展示左臂下方的致命伤口；第二天早上，安还见到德奥达特·罗森死去的妻子

和年幼女儿，她们生前也都是安的朋友。而杀死她们的，也正是伯勒斯。两个星期前，阿比盖尔在找哈钦森和他的干草叉时，就提及过这一罪行。

至于伯勒斯为何允许安同他那能说会道、报仇心切的亡妻们交谈，没人讨论其中的原因；他的行事风格奇怪又神秘。记录中也没有收录忠实可靠的民兵上尉的话语，是他坚持要凯泽拜访伯勒斯，还向凯泽担保伯勒斯一点也不可怕，因为他们的前牧师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选中的孩子，上帝会解释他的清白”。

从魔鬼许诺给女孩的事物中，我们得以窥视到17世纪少女梦寐以求的东西：华美服饰、出国旅行、时髦书籍、休闲时光、黄金、丈夫，以及家务上的支援。这些女孩的渴望不同于那些无父无母的农家半熟少女，后者被搁置在风暴频发的荒凉土地上，在那里，家禽会误入暴躁邻居的花园，邻居会走到你家门前大声抗议，还会打伤家里的大人。这些女孩敢于做梦，在新英格兰的苍茫冬天快要结束时，她们会梦到异国之旅，梦境可谓色彩明艳。从提图芭作证开始，塞勒姆的证词数量便急剧增长。它们涉及蓝鸟、金丝雀、黄狗、红老鼠、红肉、红面包和红书本。不过，物质短缺自有局限性。即使有定期的禁食日，人们并不渴望食物（或以食物诱骗）。无论是女儿、侄女和表亲，还是仆人或奴隶，没有人的愿望是配南瓜汁的烤牛肉、美味的苹果布丁或杏仁糖。相反，这些女孩们渴望色彩，渴望使她们证词变得出彩的表现主义渲染，渴望近乎魔幻的红宝石鞋。

在被撒旦法术蛊惑的人中，小安·帕特南（十二岁）和帕里斯的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十一岁）最为年幼，而帕特南家的女仆默茜·

刘易斯（十九岁）和普罗克特家的胆小女仆玛丽·沃伦（二十岁）最为年长。这四个人都没有留下日记，其他的清教徒女孩也没写下只言片语。哪怕女孩有笔且会写字，也鲜有机会这样做，因为她整日都要挤奶、绕线、制黄油、除草、洗衣、做蜡烛。只有魔鬼出现时，女孩们才能清晰地说出她们的愿望，而这些愿望通过法庭记录员呈现给我们；在威逼之下，我们隔着距离看到女孩们的渴望。^[8] 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着了魔的女孩会直接向我们叙说，她们的话听起来就像是舶来的句法和词语。可疑的是，格里格斯的外甥女会说安多弗的主妇“以最严酷的手段折磨”她，其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更值得怀疑的是，她和玛丽·沃尔科特都用了同样的话谴责同一个女人，两人都称对方为“极恶女巫”。（这两份控告都由擅用状语的托马斯·帕特南起草。）暂且不论这种一唱一和，被施咒的女孩有着非同寻常的能力，这些幼小和温顺的孩子取代了高大和强劲的成年人。历史上桀骜不羁的年轻女性并不多见，除了圣女贞德和少数几个未成年的女君主外，很难找出另一个被十几岁的少女统治的历史时刻，她们历来是脆弱、缄默、被剥夺权利的群体。从最开始，塞勒姆的女孩就让人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到了4月，由八个女孩组成的核心群体假传神谕。她们抽搐、推搡，在案件中扮演了猎犬、预言家、民间医生、道德权威和殉道者的角色。

从众多神职人员那里，我们得知清教徒女孩的理想形象。她应该谦虚、虔诚、勤勉，且不知疲倦。她说话时既不唐突也不啰唆。她每天会读两次《圣经》。她父亲是她的君主和法官，有绝对的权威。她对父亲言听计从，在二十多岁后对新婚丈夫同样如此。父亲是一家之主，是家族的灵魂，是掌管一切的统治者。他通常是活跃而忙碌的家长——坐在病房里守夜，或为孩子的身体和灵魂而苦恼。不难想象，他的缺席将会有多大影响。多数被施咒的女孩都失去了父亲，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印第安袭击中丧生的。这即使没有令她们渴望男性的关注，也给她们的婚

姻和继承添上了不稳定因素：1693年，有个被折磨的女孩恳求在床边向她道晚安的年轻人留下来——如果他离开，她就会死去。另一个女孩在魔鬼多次提及此事时，直接向他挑战：“那么，如果我没有父亲会怎么样呢？”母亲几乎不见踪影，但同样掌握权力。英克里斯·马瑟警告道，蔑视母亲的年轻人将会“被绞死在绞架上，让乌鸦和老鹰啄食”。尽管重视惩罚，也会控告犯错行为，17世纪对青少年还是有许多温柔的处理方式。柔性权威的拥护者科顿·马瑟主张：“诱导新英格兰的孩子，以让他们敬畏上帝。”罗森也劝阻人们不要在养育子女时过于严厉和拘泥。虽然帕里斯相比前任牧师更加严格，他也不提倡“严酷的惩罚和出于愤怒的击打”，而是拥护“由父母之爱产生的轻抚”。的确，新英格兰有一项针对青少年不服从父母的法令：十六岁以上的孩子若攻击或诅咒父亲，就会被处死。但这项法令从未被援引。

1680年，有位母亲在送走女儿时提醒她：为人要恭敬、负责及冷静，还要定期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勤勉工作。人们应当尽可能勤奋，因为懒散的头脑会让魔鬼有机可乘。^[9] 如果将马瑟的话当成衡量标准，人们从一开始就要坚持关注年轻人的心灵状态，到了小安·帕特南和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的年龄段就要进一步加强，因为这时候的孩子更善于推理，同时又更不理智。一般而言，十四岁是诽谤行为的分界年龄。过了十四岁，人们就会变得理智，正如一位父亲对要去哈佛读书的儿子提醒道，“别再做幼稚的事情”。通常，男孩七年的学徒期也始于十四岁。十四岁的阿比盖尔·霍布斯表明了，对于违逆行为的严苛手段——例如提醒人们避免轻浮以及抨击巫术魔法——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清教徒的理想。17世纪，马萨诸塞的女儿们忙于纺纱织布，在一天结束后，她们有时会去酒馆，即使是牧师在那里也可以放下严苛的规矩；而收税的警官可能会被告知，人们宁愿被绞死，也不愿为塞勒姆老牧师捐助薪资；无论有没有细长的刺剑，那里都上演着许多打情骂俏的故事。

完美女性的梦想——虔诚、勤劳、腼腆、顺从的女性——如同17世纪的医疗箱一样珍贵。早期新英格兰女孩的不同处在于她们的噩梦。1696年的一个冬日傍晚，塞缪尔·休厄尔回到自己装饰华丽的家时，看到妻子已在门口焦急地等着他。十五岁的贝蒂·休厄尔在晚饭后突然大哭，搞得兄弟姐妹心烦意乱。在她早慧的头脑里，《约翰福音》中有句话反复出现，马瑟书中的几页内容也萦绕在她心头。她断定自己会下地狱，她的祈祷未被听见，她的罪孽未被宽恕。（这一纪录也出自她父亲笔下。）这不是贝蒂第一次因恐惧而叫喊。她在七岁时就被《以赛亚书》中喧嚣的审判日场景所吓倒。她的兄弟也同样焦躁不安，因为他十一岁时被告知命不久矣。

在贝蒂受《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一节 [\[10\]](#) 困扰时，休厄尔请来了波士顿第三教堂的牧师——著名的塞缪尔·威拉德。威拉德为贝蒂祈祷，为她的想法和长期的恢复感到困惑。六个星期后的一个黎明，她找到父亲，告诉他自己注定要下地狱。休厄尔在床边问这个忧心忡忡的少女：他们该为了什么而祈祷呢？贝蒂不受魔鬼影响，道出了一个罕见的愿望，希望上帝“给她一颗全新的心”。父亲和女儿都眼含泪水，跪倒在地，恳求上天。贝蒂的悲伤状态仍在持续。8月，她被送到塞勒姆，在叔叔斯蒂芬的家里休养，几年前，斯蒂芬就接收过一个为其他事遭受痛苦的女孩——当时九岁的贝蒂·帕里斯。（可休厄尔没将一个孩子低沉的哭声与另一个孩子刺耳的尖叫联系在一起。）整个11月，贝蒂·休厄尔都在哭泣。她是个堕落之人。她应该爱上帝的子民，但她没有。她警告父亲，她丝毫没有得到救赎的希望。

痛苦并非全然不被接受。“比起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我宁愿看到我的孩子们在角落里祈祷，因为爱戴上帝而哭泣。”一位牧师在一篇广为流传的讲稿中这样写道。贝蒂·休厄尔不是独自承受痛苦，痛苦是

清教教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1] 生命是一场从罪孽到恩典的朝圣之旅，这一信念对人的性格养成期来说不是个好兆头。拯救一个人的堕落，沉思死亡和天谴，都应尽早为好。早期新英格兰为数不多的儿童读物都记述了青春期前的圣洁生活和被视为楷模的殉道：四岁的小女孩为她永生的灵魂哭泣，九岁的男孩为自己的罪孽忏悔。绝望的情绪是日常之物；一个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比其他时代的人更清楚人皆有罪。在1688年的那场巫术之乱中，约翰·古德温对处于痛苦最初阶段的女儿的记述有些被人所遗忘。就在发生幽灵骑马事件的前几个星期，这个少女呻吟着说，她的灵魂处于黑暗之中，她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个格罗顿的十六岁孩子猛烈抽搐，在短暂的喘息时刻，她告诫聚集在周围的人群，要利用时间做比她更好的打算。

虔诚与读写能力有关；特别是在宗教家庭，母亲会教孩子、仆人和奴隶阅读。写字则教得较晚，甚至没有。伊丽莎白·帕里斯有书写能力，她可能将它教授给了家属。村里的女孩们可以随意解读被呈给她们的恶魔之书。玛丽·沃伦的读写能力就很优秀，足以将自己（短暂）恢复的消息写下来贴在礼拜堂的柱子上。年轻人的头脑里充满她们最熟悉的书本的语言和画面。令人不安的布道在继续进行，凶险的前景也不断被提及人们有意维持这种状态；年轻人身上躁动的末日之马和呕血之龙可不那么容易驯服^[12]。对自身悲惨境况的关注不会招致大错，放松警惕才会。棘手的清教徒式悖论如常悄然浮现：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得到救赎，恰恰证明他不配得到救赎。有位近代学者就指出：“显然，一个人若能不被吓倒，这种状态表明他要么精神迷乱，要么愚蠢，要么两者兼有。”^[13]

一个正统教徒的童年尤其可能与恐惧相伴；很难说虔诚的家庭养育出的孩子会更加紧张，毕竟留下日记的人都是牧师。当然，塞勒姆村的

女孩会特别觉得拘束，因为在帕里斯的期望和村里的关注下，她们有着更高的标准。他们为自己造了一座山丘小城，哪怕帕里斯不像马瑟那样不断发明各种仪式。他到哪都爱讲圣经里的寓言故事，和孩子交流时总会提出训诫。孩子们的生日，在他看来是提出“生动且尖锐的忠告”的时机：她们在尘世的使命是什么？她们应如何完成使命？他警告五岁的凯蒂准备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告诫作为孤儿的她应为更重大的死后审判做准备。^[14] 像任何被围攻的少数派一样，清教徒极其关注子孙后代，他们通过后代延续自己的生命。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不禁写了很多想法。

除了末日的意象和地狱的生动描述（若整夜牙痛令人难以忍受，不妨想象一下年复一年承受永恒之火的煎熬是何种滋味！），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恐怖故事，如玛丽·罗兰森的传说，它对敏感的年轻人来说像是一部殉道色情片。人人都听过分尸或绑架的故事。那些抽搐的塞勒姆女孩尤其了解这些故事，她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在“上一场印第安战争”的侵袭中成为难民或孤儿。比如帕特南家的女仆默茜·刘易斯，她的人生遭受过两次悲剧，瓦巴纳基人在她三岁时烧毁缅因镇子、绑架妇幼，而第二次袭击更是让十六岁的她变成孤儿。（就在那场危机前，她与撒旦签署了契约。）当时，两岁的孩子可能会背诵圣经里的故事。可是，三岁的孩子已习得了成人的焦虑，据说有个小孩从摇篮里发出警告：法国人——他们在1689年与英格兰开战——即将到来。

恐惧隆隆作响，渐渐逼近，不时爆发。一个头顶地毯的邻居走到门口，会让孩子惊恐万分，发出的尖叫穿过屋子，传到母亲的耳中。接二连三的危险正向家中靠近。作为新英格兰的家长，当母亲的会体贴周到，但也无法事事兼顾。孩子会吞下针，掉入水井，倒在冰地，钻进桶里，躲在马下，架在刀上，困于火中，跳进池塘或洗衣盆。家长会做有

关孩子的噩梦不足为奇。（1695年，塞缪尔·休厄尔梦到除了一个孩子外，自家的所有孩子都死了。他在梦里埋葬八个孩子。）他们虽然比同时代的英国人健康，却也常被疾病击垮；在塞勒姆当母亲，会预想自己将失去两三个子女。在这个规律面前，丽贝卡·纳斯是个非同寻常、或许也是让人难以饶恕的例外。

清教徒在取名上很省事，往往只重复使用几个名字；家中的孩子可能会用父母的名字。与过世的兄弟姐妹共用一个名字的情况也不少见。

[15] 如果这没有让你觉得自己是可替代的，你的弟弟妹妹或许会让你这样认为。十二岁那年，安·帕特南常常得不到母亲的关注，后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弟弟妹妹身上。她曾为婴儿的尸体守夜，参加他们的葬礼，最近的一次是1691年她六周大的妹妹的葬礼。虽然这类事情时常发生，他们的伤感仍然不减半分；比如休厄尔家的孩子，他们安葬完自家的小弟弟，在归来的途中放声哭泣。村中女孩描述棺椁中的死者时毫无困难。

新英格兰女孩正值青春年少，却穿着暗褐色的衣物，在细致的肖像画中与她的母亲十分相似。被兄弟姐妹环绕，等待她的是无尽的生育、看护和埋葬。很多孩子在母亲分娩过程中便成了孤儿，他们的出生杀死了母亲，这使他们愧疚不已。这又导致了一种世俗的恐惧：恶毒的继母。继母会利用有用的手段，重新排列每个孩子的受喜爱程度和错综复杂的继承顺序。贝利牧师和帕特南家族控告安·帕特南的继母，原因便是她骗走丈夫留给女儿们的遗产；这桩麻烦事始于葬礼当晚，此后持续整整十年。（安得到了二十英镑，而她本应获得的遗产估值为一千四百英镑。）为了养家糊口，鳏夫很快就会再婚。有时，继母不比家中长子年长很多。蒂丽芙伦斯·霍布斯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才让阿比盖尔那么对待她——阿比盖尔向蒂丽芙伦斯泼水，然后说继母这个异教徒终于受了洗。科顿·马瑟将一个女儿送走，以躲避脾气暴躁的新妻。乔治·伯勒

斯被捕时，他在缅因的家中有七个十六岁以下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继母只抚养自己的亲生女儿，让其他人自谋生计。

马瑟的女儿不是唯一被他人照看的人。像是帕特南家举目无亲的女仆默茜·刘易斯，还有普罗克特家那个无父无母、躯体异常扭曲的女仆玛丽·沃伦，她们都是无家可归之人。在第一批原告中，只有安·帕特南和贝蒂·帕里斯住在自己家中。出于一些当时合情合理却没完全解释清楚的原因，三分之一的新英格兰孩子离开家乡、借宿他处，他们通常在六岁时就出门当仆人或学徒。（仆人没有合同；学徒一般要任职七年。）因此，大多数家庭都有几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孩子。男孩们会学到一门手艺，而女孩们掌握的技艺则是——用针对后来的九岁孩子的宣传语来说——“家务的艺术、技巧和奥秘”。人人都会被送去让除父母以外的成人管教；据说，他们在别处可以学到更好的礼仪举止。这种被称为“契约学徒”的现象，在社会各阶层都会发生。丽贝卡·纳斯的丈夫为人上进，但他一开始只是个仆人，不少未来的牧师亦是这样起步，至少有一位巫术案的法官也是如此。通常，孩子们去的家庭不会比自己家更有权势。有些人更是含着泪离家。（休厄尔家的一个孩子甚至晕倒在地。）代理家庭会采用新的规则，提出新的期望；这种分离就像是——或许是有意让人觉得是——为未来更痛苦之事而进行的实践。如无意外，针对处于热血激昂、自我陶醉、颠覆叛逆、极其执拗的年龄段的个体，“契约学徒”制度强化了他们应有的纪律性。有人说：“人会在青春期第一次体验到疯狂。”

“契约学徒”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女孩成为仆人后，还要避开猥亵的双手和强制的拥抱——来自好色的猪倌、家里的男主人和男访客；令人震惊的是，这类事也会发生在年纪更小的女童身上。她们与世隔绝，犹如孤儿，不知道谁会保护自己或是在黎明为自己祈祷；塞勒姆有个地方

法官，他的女儿们——其中最大的那个才六岁——两年来常常遭遇主人的性侵犯。她们搬到一个正直教友的家，却再次受到骚扰，持续到长女十岁时。法庭记录了详细的骚扰方式——从偷吻到突如其来的身体接触，比比皆是。性侵犯常发生于家中成年女性外出的时刻，如去收获亚麻、出借独木舟或骑马去给行凶者的妻子接生。有个十九岁的男仆就曾试图强奸同屋的十岁女仆。到了晚上，女人们上床休息时会被地板上的衣服堆绊倒，还会发现床上多了个陌生男子。她们会咬侵犯者的鼻子。有个马萨诸塞男人就被罚坐在笼子里，脖子上挂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已婚男人在自家与女仆通奸。”

虐待亦以其他形式出现。男主人和女主人殴打女仆，理由多种多样：她们不懂礼貌、毫无秩序、谩骂他人、面色阴郁、粗俗轻佻；或是因为她们没照顾好女主人；或是因为比懒惰还要轻微的错误——考虑到她们所做之事很多，懒惰也必定是个相对的说法。恼羞成怒的丈夫会为妻子对待女仆的粗暴行为辩护：那个女孩自甘堕落，天黑后就悄悄溜走，爱睡懒觉，从未学会给奶牛或山羊挤奶，就连喂猪这样的任务也不能放心地交付给她，“她又胖又讨厌，什么活儿都干不了”。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有个传道者只要稍受刺激，就会鞭打女仆，让她不能开口，也无法逃走。帕里斯的至交撒切尔牧师雇了个女孩来照顾婴儿，她在当值时让婴儿摔倒了，结果被牧师用结实的胡桃木棍殴打了一顿。仆人们会逃跑，却又会被快速抓回。逃跑是很难成功的。^[16] 若她们向法院申诉，更可能获得成功。很多时候，法院判决对她们很有利。

17世纪90年代到处都在发生反抗，新英格兰少年所面临的问题，只是殖民地所面对的问题的模糊缩影。几十年来，马萨诸塞就因种种不当行为而名声在外。伦敦方面指责定居者倾向独立，以此对他们施以惩戒。一位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商人大骂繁琐的贸易条例，抱怨他们别无

选择；如果他们遵守英国人的所有要求——以那种束缚帕里斯在波士顿的业务的限制程度——“这片孤立的种植园就会被征服”。在推翻了安德罗斯后，殖民地的定居者却整天闷闷不乐，他们期望生活能恢复正常。但这迟迟没有发生。遥远的政府无法理解他们，而他们也认为那个政府难以捉摸。撰写1691年小册子的作者想知道，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不诚实、不肯施惠”，上帝才把灾难降于他们身上、让他们“被残忍的野蛮人折磨和屠杀”吗？这些脱离母国的新英格兰人脆弱而倔强，常因抗命犯上而备受指责，他们争取赢到自尊，尽力在自治权与无能当局的要求之间达到一致——当局与其说是仁慈的监护者，不如说是勒索保护费的无赖。

仆人和孩子以不同的方式获取家里的秘密。他们传播谣言，使邻里之间长久不和——这是子女行孝和仆人效忠的形式。仆人会吸收秘密，这并不出奇；孩子则知道得太多，这会危害到他们的心理。约翰·普罗克特虽然鞭打玛丽·沃伦，却还与她商量了一笔土地交易，甚至向她抱怨自己喜怒无常的妻子——这个女人差点逼得他自杀！仆人——最终十三个被施咒的女孩中有七个是佣人——知道存钱的地方：整齐的床罩，燃烧的火炉。她转而让房子里的孩子感到恐慌。1678年春天，约翰·黑尔神父发现他的一个仆人一直在偷东西。晚上，她悄悄送走赃物，其中包括面粉、黄油、珠宝、金钱、燕麦、蜡烛、丝绸和彩色绸带。他的妻子认为，面对这个目中无人的女孩玛格丽特·罗德，最好是把厨房的刀子藏起来。他们调查后发现，十二岁的丽贝卡·黑尔一直知道玛格丽特的盗窃行为。每一个黑尔家的孩子都知道。玛格丽特扬言，如果丽贝卡走漏一点风声，就会把她扔进火里，或吊在谷仓的椽上。她让丽贝卡相信，她有一本书可以召唤魔鬼，而魔鬼会杀了丽贝卡的小妹。她挥舞着斧头，大声问是否应当谋杀黑尔夫人；孩子们乞求她重新考虑。她还曾威胁要用炽热的熨斗烫黑尔家的另一个孩子。不过，丽贝卡可没那么好

说话。“我告诉她，如果她杀了我，就会暴露一切。”据丽贝卡的说法，玛格丽特的回应暗示殖民地的执法并不出色，“她说那是在英格兰，在这里不会被轻易发现”。到了5月，当玛格丽特的帮凶之一出现在塞勒姆巫术案的法官面前时，人们将看清这双恐怖魔爪的更多细节。

牧师们会将布道献给派活人道的主人和乐于奉命的仆人。一位波士顿的牧师提示听众里的学徒，七年并不算漫长。至于女佣，如果她们表现良好，女主人就可能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这明显是女佣所渴望的事。然而，当她们被叫到漆黑的房间里，男主人慌乱地指着烟囱时，并不是每个女仆都能看到那儿有发微光的生物。当然，女孩被主人召至房间，也可能因为其他目的。事实证明，轻佻的女佣和无礼的女儿并非马瑟在布道中所说的安静无声之人，她们只是被更有权力的人扼住了喉咙。无论是在自己家中还是寄人篱下，她们被内疚、羞愧和自我厌恶纠缠，陷入困境之中，像阿比盖尔·霍布斯那样漫不经心的女孩很少见。十来岁的女孩敢对父亲无礼，还有个十八岁的孩子整天抱怨，还冲人发火：“发自内心地祈祷吧！爸爸，你聋了吗？”黑尔形容盗窃犯玛格丽特“极度沉迷于撒谎，固执地为自己的谎言辩驳”。本应去参加宗教集会的她，会突然出现在谷仓。她会在外面待到凌晨2点才回家。她还有同伴躲在猪圈里，只为吓唬孩子。马瑟家还有一个女仆怀了孕。显然，哪怕天气恶劣、工作繁重、父母看管严格，女孩们还是商定在当地的酒馆集合——男主人可能会去那里接她们回家，而在巫术审判的漫长间隙中，她们也会在酒馆转移合意男性对象的注意力。在波士顿狱卒给古德、奥斯本和提图芭套上链子两天后，普利茅斯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对孩子——“她们沉溺于感官享受、放纵、长期拖延、饮酒、钻空子”——进行教育改造。

在新英格兰建立之初，成年女性也成了此地的麻烦；她们担任着异

端分子和反叛分子的角色。从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开始——这位魅力超凡的宗教领袖鼓励女人远离布道，还质疑教会教义——成年女性直抒己见，或被称为扰乱治安。安·西宾斯（Ann Hibbins）在1640年的审判中引用《旧约》，她称那段经文告诫丈夫要听从妻子。她也采用过相反的策略：十六年前，她拒绝在法庭上回答原告的问题，因为上帝要求女人保持沉默。直言不讳的贵格教徒玛丽·戴尔（Mary Dyer）公然反抗要求她离开马萨诸塞的命令，最终她被施以绞刑。一位塞勒姆的教会成员声称，她希望自己活得久一点，这样才能撕烂哈桑法官父亲的尸体。新英格兰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她们不投票，也不担任陪审员。虽然没有官方赋予的发言权，她们还是用了很多方式发声——她们需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根据法庭的记录，她们威吓、尖叫、争吵、责骂、咆哮、辱骂、告密和怒斥。[\[17\]](#)

马萨诸塞的女人漠视将她们逐出教会的牧师，还告诉判她们绞刑的地方法官，她们宁愿被斩首。她们喝酒喝到“不能分辨酒和墨水”；有个从塞勒姆回来的女人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不清楚自己是“用头还是脚”走回来的。她们把男人从酒馆拽走，或对着塞勒姆市场监督员的胸口一阵捶打，直到他喘不过气来。她们殴打和抓挠丈夫，还发生过妻子用一壶苹果酒击中了丈夫脑袋的案子。她们还会拼命讨好年龄比自己大一倍的丧偶牧师，心神不宁的科顿·马瑟在妻子去世三个月后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她们撕毁逮捕令，就当着负责移交她们的军官的面。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因为其中一个叫另一个“烂荡妇”，嘲笑她只穿一件衣服，后者的女儿跟着一起用棒子反击。她们抓伤女婿，对婆婆扔石头。她们频繁地出入法庭，这一趋势在17世纪90年代有所上升，那时——暂且不提塞勒姆的一系列事件——有女人参与的犯罪活动，比其他任何一个十年的都要多。即使她们没有于深夜在窗台上摸索，或以光球的形象现身，她们依然会设法使活生生的男人感到窒息和麻痹。

尽管女人被认为意志更加薄弱而更易受到巫术影响，但现有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有贾尔斯·科里这样的男性，就有玛丽·沃伦这样的迷人女性，前者违抗妻子、装上马鞍前去围观巫术案审讯，后者则和男主人争论自己是否能参加审讯，并赢了这场争论。女性本就是具有创造力的魔术师，能把牛奶变为奶酪，把细线变为花边，用干苔藓制出布丁。她们经营酒馆，协助当鞋匠的丈夫，与工匠讨价还价。她们与丈夫商议土地交易，在法庭上当他们的代表。波士顿法官塞缪尔·休厄尔将家务事托付给妻子管理，认为妻子“比我更有能力管理家庭事务”。女性为财产起诉父亲、兄弟和继子。在劳动人口少、工作量庞大的地方，她们可以展示自身的价值；女性一旦缺席、生病或入狱，家庭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父亲繁忙之时，母亲带领家人做祷告；马瑟指出，这一做法在圣经中就有先例。当一群伊普斯威奇的男人请求获得建立礼拜堂的权利时，他们的妻子却靠自己建了一座。

和往常一样，社会在动荡时期最具弹性。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当印第安人的突袭毁灭整个城镇时，是女人在河对岸筑起了堡垒，以保护波士顿免受侵袭。1690年，在波士顿，有三十名女人被允许锯木材、制造钾碱。那一年，镇上近一半的客栈老板是女性。在1692年的一次袭击中，驻守缅因韦尔斯（Wells）的女性向敌人开火。她们制服了卫兵，击打、砍杀并肢解了两个被五花大绑的瓦巴纳基俘虏。7月的一个星期天，当一个印第安人出现在门口时，敏锐的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女仆已经把孩子们藏到铜壶下面；随后，她把一铲铲燃烧着的煤块砸到他脸上。印第安掠夺者当着汉娜·达斯汀（Hannah Dustin）的面杀害了她的新生儿，而她随后用印第安战斧砍死了他们。在逃跑前，她还剥下了对方的头皮——或者至少科顿·马瑟说她这样做了。俘虏叙事文学美化了那些令人敬畏的女性，以及她们大胆的表现。在天崩地陷之时，她们以屠龙者的身份介入干预。

牧师虽然很少关注母亲的角色，却往往密切关注女性的虔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足以令人信服：会众中的大多数人是女性。在马瑟的会众中，寡妇占了两成。虽然清教徒总是有理由责备自己，但有迹象表明，女性会发现自己的信仰比男性的信仰残缺——如果她们不总像贝蒂·休厄尔那样激情地表现出自己的虔诚的话。通常，相信自己罪孽过于深重而选择自溺于水洼之中的是女性，担心自己得罪圣灵的是女性，害怕自己“所处的环境比蟾蜍更糟糕”的也是女性。她将个人信仰看得格外私人化。1727年，有个女人自责道：“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女人不足二十岁，和我一样年轻，却承受着这么多的罪责。”男人指责他们的罪恶，因为它们腐蚀了自己的灵魂；女人则怪罪于自己的灵魂，即她们自己。塞切尔牧师悲痛地指出，他的妻子因为在怀孕期间被椅子绊倒，“已经做好了接受致命结局的准备”。^[18] 有个年仅七岁的女孩无法进食，只因害怕自己被诅咒。

在尖叫声冲破塞勒姆的牧师住宅之前，女人是俘虏叙事文学的主角，俘虏叙事中印第安人的绑架故事激发了大众的想象。那些故事充满骇人听闻的细节，对性的描述如暗流涌动，将邪恶的野蛮人和最匪夷所思的对手并列：勇敢女性遇到——也克服——种种困难。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如果被改写为宗教寓言，必须要用女性主人公，用男性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故事里的主人公被石头刺伤，被冰雪冻得瑟瑟发抖，就像汉娜·斯沃顿（Hannah Swarton）描述她于1690年在卡斯科湾经历的悲痛遭遇时指出的那样。乔治·伯勒斯也从那次袭击中幸存。马瑟最初在讲道坛上传播过斯沃顿自述被邪恶的印第安人带过高山和沼泽的故事，1697年，他又把它写进了书里。（这里的叙述已不是传统的童话形式。俘虏叙事文学将解救公主的故事前后颠倒，以歌颂足智多谋、坚忍不拔的女人，而不是困境之中的少女。）塞勒姆这场1692年的残酷打击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坚强的受害者和她们的压迫者都是女性。在新英格兰的首例

案例中，女性的声音如此威严，以至于在法庭上作证的两位亡妻的幽灵能击败伶牙俐齿、受过哈佛教育的牧师。

4月30日，波士顿当局发出了对乔治·伯勒斯的逮捕令。伯勒斯当时住在塞勒姆以北七十英里、缅因边境的韦尔斯。缅因和新罕布什尔的警官虽然“全速”行动，却还是花费数日才把牧师押送到村里。他于5月4日抵达。哈桑和科温在等待期间已经发出了十五份逮捕令，女巫嫌疑人的数量因此增加了一倍；在这个时期，你会比平时更有理由担心自己良心的污点或是心灵的瑕疵。据说，小安·帕特南有个叔叔让一匹马始终装着鞍具。指控又一次跨越了城镇的界线；在5月初被逮捕的人中，就包括贝弗利的几个嫌疑人。塞勒姆法官加班加点，处理控告、证词和囚犯。法官们一定和牧师一样饱受困扰——后者被赶出自己的家，在岩石密布的马道上被以最快的骑行速度送到从前的教区，哪怕他并不情愿。

在伯勒斯骑马南下、蒂丽芙伦斯·霍布斯被关进监狱（现位于塞勒姆的华盛顿街）之时，哈桑和科温审问了几个新的嫌疑犯，他们都是被村里的女孩指控的。五十八岁的多卡斯·霍尔是法庭里的熟面孔。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手相家，曾预言过死亡和疾病。她总是在人们就要患病前出现。几十年前，她参阅过一本借来的算命书；当被约翰·黑尔发现后，她便向他道歉认错。那时，她还没和牧师家里的盗贼女仆合谋，这个女仆后来对霍尔尤为忠诚，甚至尊称她为“母亲”。女仆还恐吓黑尔的女儿，声称如果她揭露她们盗窃，老多卡斯就会杀死她，或给她施咒。丽贝卡·黑尔令人信服地说出了霍尔巫术的要点；她在黑尔家施过各种巫术。霍尔是个长相奇异的中年女人，她剪短了灰发，扎着一个四英尺半长的黑色马尾辫，着实符合女巫的角色。即使对牧师来说，她的头发看起来也似“精灵的卷发”。霍尔的丈夫是个渔民，在去年冬天突然去世。当验尸官团体要求验尸时，她辱骂他们，跺脚表示抗议：如果他们

把她当作杀人犯，他们就是无耻的混蛋！霍尔与莎拉·古德一样失去一大笔遗产，生活每况愈下。

5月2日，当她走进礼拜堂时，迎接她的是抽搐的女孩们。她们解释，她承认自己谋杀了丈夫，还吹嘘说自己杀了一个波士顿女人。一个新的原告加入了女孩们，那就是十八岁的苏珊娜·谢尔登，她与默茜·刘易斯和阿比盖尔·霍布斯一样在缅因边境长大，印第安人曾两次驱逐她的家人。在那期间，她失去了父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叔叔。哥哥的尸体被找到的时候已被剥皮和肢解。1688年，谢尔登一家的幸存者在塞勒姆定居，村里为他们提供了援助。多卡斯·霍尔疑似曾带着她的书和两只黑猫去拜访苏珊娜。霍尔否认了一连串的指控，于是两个女孩大喊称，有一只蓝鸟融进了霍尔的体内。一位执法官向空中猛烈出击，好几个人看到一只淡灰色飞蛾飞过礼拜堂。

那个春天的星期一，哈桑遇到了两个最好斗的嫌疑人。女孩们在描述多卡斯·霍尔的猫和书，以及在她耳边窃窃私语的黑人时，霍尔勃然大怒地说：“哦！你说谎！上帝会堵住说谎者的嘴。”哈桑训斥她：“你不能在法庭上这样说话。”霍尔不为所动。“只要我活着，我就会说真话。”她啐了一口。哈桑谴责她“极为厚颜无耻”；但与铁匠的遗孀苏珊娜·马丁相比，霍尔便是小巫见大巫。苏珊娜·马丁时年七十一岁，身材瘦小，来自埃姆斯伯里，她几乎没有把哈桑的诉讼当真。几十年前，她就被指控施用巫术。她的丈夫对诽谤提出诉讼；他赢了，但指控却仍然存在。据说，马丁施咒使一个女人发疯，谋杀了自己的婴孩，生下了一个小恶魔。更平淡无奇的传闻说她指控一个男人偷窃，还无所顾忌地与自己的孩子吵架。她质疑自己在礼拜堂的座次。她因为先后被继母和内侄剥夺继承权而起诉，却没有成功。5月2日，马丁接替霍尔的位置时，八名原告都扭曲了身体；尽管如此，安·帕特南还是尽力朝这名老妇人

扔了一只手套。马丁咯咯地笑出了声。“什么？”哈桑惊讶得倒抽了一口气，“你是在嘲笑吗？”马丁讥讽道：“没错，我当然会嘲笑这种蠢事。”哈桑训斥她：“这是愚蠢的吗？这些人遭受的伤害也是愚蠢的吗？”马丁争辩道，她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时，默茜·刘易斯突然跌倒在地。

对于姑娘们的荒唐举动，认真且自信的马丁只是一笑置之。“你不觉得她们中了魔吗？”哈桑问。“不，我不这么认为。”马丁答道。哈桑要求她给出更好的解释。她说，她们也许听信了黑魔法。难道，哈桑不记得隐多珥的女巫 [\[19\]](#) 了吗？她也把自己伪装成圣人；而魔鬼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任何形态。马丁的好斗引起更大的骚动，人群里发出一阵嘲笑声。“你白天来法庭要花不少时间，但如果晚上来的话，你的速度才够快。”帕特南的女仆奚落道。“不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妇人答道，她使诉讼多了一层罕见的讽刺意味。如果他们向她扔手套，她会用言语回击。“你对这些受着折磨的人丝毫没有同情心吗？”哈桑问。“是的，我没有。”她厉声说道。人们相信，如果女巫碰到了受害者，她的咒语就会像电一样流回她体内。法官命令受害者靠近马丁。有四个人依令行事，约翰·印第安走上前时还发誓要杀死女巫。他被她的力量击退，瘫倒在地上。

哈桑告诉马丁，整个社区都相信她有罪。“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被重新翻出，摆在她的脚边，她对此嗤之以鼻。巫术被有序地实施：她不仅对奶牛施魔法，还淹死公牛，把自己变成黑猪。十八年前，在最潮湿泥泞的季节，她徒步数英里，鞋子却几乎没湿。（原告问，她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走完这段路程，她的膝盖上都应该沾满泥！马丁一向就事论事。她不喜欢被沾湿。快速、灵活的出行——尤其听起来像是飞行——值得怀疑。这是印第安人的出行方式。但

马丁的罪行更加恶劣：沉重、沾湿的裙子让女人守规矩，而她却行为失范。）在一个晴朗月夜，马丁以火球的形态现身。她把一只狗变成了小桶。也正是她乔装成猫，从窗外跳进屋里，把一个男人勒死在床上。这个老人七十一岁了，似乎比任何人更能让在野外、森林或夜间床上的男人魂不附体。她真的相信女孩们是伪装的吗？哈桑催促道。她说不上来。但她相信吗？“即使谎言会拯救我的性命，我也不敢说谎。”马丁回答，再次表明谣言到了5月会变得极为危险。其他人也有相同的想法——那个星期，治安官第一次找不到嫌疑犯。星期一，塞勒姆商人菲利普·英格利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位富人躲藏了近一个月。

哈桑将伯勒斯的审讯安排在5月9日。对此，牧师的幽灵早有预料，疯狂地四处飞行。伯勒斯会对着凯泽的壁炉施魔法，也会用一本时装书引诱默茜·刘易斯——她发誓，在她服侍他家的时候，他的书房里没有那本书——又将她带到了一座巍峨的山上。在她下面，“世上的万国”徐徐展开。幽灵承诺，只要她愿意签字转让自己的灵魂，这一切就都是她的。（伯勒斯很会教导刘易斯：她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马太福音》中摘取了关于魔鬼诱惑耶稣的描述，罗森在3月24日的布道中引用了这一经文。）^[20] 伯勒斯还袭击了医生的外甥女，她是少数从未与他谋面的原告之一。三十六岁的莎拉·比伯为了早上的审讯赶往村里，伯勒斯穿着暗淡的牧师长袍，捏了捏她，提议她陪他一同前往。那时，莎拉·比伯还不认识他。他没有承认自己是魔法师或巫师，直到在礼拜堂里，她才意识到这个陪伴着她、身着深色衣服的人是谁。

审讯伯勒斯的前一天，帕里斯执行了村里的圣餐礼，他警告那些吃过魔鬼食物的人不要从上帝的杯中啜饮。整个夏天，他都提醒会众，世上的人只有两派：“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队伍。”他的警告毫无必要。正如他家里的人都知道，社区里的成员不是支持他，就是反对他。整个

村庄正处于紧张的大战之中，魔鬼和他的军队极尽所能发动攻击。到了秋天，帕里斯将他们的围攻与圣经中的审判比较，他历数敌人，从希律王说到路易十四，后者在七年前废除《南特赦令》，剥夺了新教徒的自由；清教徒的魔鬼敌人确实很享受与法国的联系，无论是和法国国王、龙骑兵 [\[21\]](#) 和牧师合作，还是身着法国服饰。帕里斯谴责所有怀疑这一阴谋的人。“如果过去有过巫师，有与魔鬼签订盟约的男男女女，新英格兰就应该会有很多巫师。”恶魔占据了最为闻名或最为偏远的地区。他们从传统形态开始一步步变化。从前，骚扰其他地方的或许是“些愚昧的老妇人”，但现在是博学而表面虔诚的男女巫师在折磨定居者，这种情况最为险恶。

不到二十四小时，乔治·伯勒斯就两次走进同一间椽子外露的房间，他虽然没有套上具有其职业特色的平白领，但还是穿着朴素的黑色套装和背心。两年多来，他每个星期有三天都在这个礼拜堂里布道，对每一块木板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不可能对这个建筑留下美好回忆。九年前，在一次争论中，他占帕特南试图和解，达成一次双方都难以满意的协议。在那次会面中，帕特南促使善变的执法官向伯勒斯收钱，因为伯勒斯住过帕特南的家。伯勒斯对此不屑一顾。除了身体，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偿还。于是他挑衅道：“那么，你要对我怎么样呢？”执法官转而向帕特南求助。“我能怎么办呢？”他问道，在牧师面前有些胆怯。托马斯·帕特南向他的兄弟示意，两人走到外面商量。回来时，他们神情坚定。“执法官，”约翰命令，“把这个犯人带走。”他将伯勒斯囚禁在英格索尔的酒馆里过夜。最终，冷静明智的酒馆老板挽救了局面——英格索尔说服了帕特南一家，让他们相信伯勒斯的债务将会被还清。没有人预料到，伯勒斯会再次踏入村中的礼拜堂，无论是作为牧师还是巫师。

对于伯勒斯1692年的这场审讯，哈桑和科温的应对方式与以往不同。在5月9日质询他之时，他们已经收集了正式证词，还另外安排了两位新的法官。一位是四十岁的塞缪尔·休厄尔，他圆脸薄嘴，小眼睛闪闪发光，留着一头灰棕色卷发。他的兄弟斯蒂芬收养了帕里斯的女儿，就住在离镇礼拜堂不远的街上。第二位是威廉·斯托顿，马萨诸塞的前治安官助理。这两个人的在场说明了情势的严重性，而他们也使情况变得更为棘手。伯勒斯和休厄尔在哈佛时就认识彼此。这些年来，他们互有往来；休厄尔还曾借钱给伯勒斯。哈桑和科温都在1690年缅因之行中认识了伯勒斯。

伯勒斯的爷爷在剑桥毕业，是英国萨福克郡的教区长，而他的父母移居到了美洲的马里兰，这也是他成长的地方。这个小家庭的人常常四处奔波。伯勒斯是独生子，他母亲1657年加入了罗克斯伯里教堂，他便随母亲搬到马萨诸塞。他的父亲是商船队的成员，走遍了各个海岸。1670年，伯勒斯从哈佛学院毕业，比休厄尔和塞勒姆村第一位牧师贝利晚一年毕业。（他差点就没见到帕里斯，后者来到坎布里奇的时候，他正要离开。）他的父母都回到了英格兰，留下伯勒斯一人生活。至少在最初，他就结交了马萨诸塞的当权派。直到1691年，休厄尔一直会去听伯勒斯的演讲，没想到十八个月后，他开始坐下来审判他。1674年，伯勒斯已经结婚，还在当教师，之后便加入罗克斯伯里教堂成为神父。此后不久，他接受了卡斯科的牧师职位，那是比塞勒姆村更小一点的繁荣村落，如今是波特兰市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差事。东缅因人和清教当权者的关系逐渐变得冷淡。随着缅因神职人员对各式各样的信众让步，那里的布道开始变得没有规则。在大海湾区，在连绵数英里的农场和沼泽地中，伯勒斯为集中在一起的圣公会教徒、浸礼会教徒和清教徒服务，为拓荒者、航海商人和新移民服务。伯勒斯搬到罗克斯伯里时，这些边陲小镇归马萨诸塞管辖；这一期间，他们用宗教自由换取

军事保护。但他们仍需要因资源稀少而求助地方当局。尽管很多殖民精英——包括塞勒姆法官——在缅因渔业和木材业中拥有众多经济利益，马萨诸塞也只是不情不愿、断断续续地提供援助。官员们一次次拒绝管理脆弱的边境。 [22] 1690年，科温和哈桑建议马萨诸塞撤军，而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卡斯科无法为伯勒斯提供一个组织严密的教会，他也从未收到正式任命。它也无法给他一幢房子，而前牧师的房子已被印第安人摧毁。不过，小镇的确给予伯勒斯两百英亩的肥沃土地，三面被岩石海岸环绕，可以看到壮丽的朦胧海景。他在岬角处建了一座房子。袭击仍在继续——在缅因，瓦巴纳基人是英格兰人的六倍——但伯勒斯没有改变主意。1676年8月，印第安人再次袭击卡斯科，将小镇夷为平地，那时，他正值二十五六岁。伯勒斯设法带领十个男人、六个女人和十六个孩子来到一个丰饶岛屿，依靠鱼和浆果艰难度日。一段时间后，他们被转移到安全地带。这场袭击过后，三岁的默茜·刘易斯也跟随家人暂时逃到塞勒姆。伯勒斯向北走了二十英里，到达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他依靠临时牧师的职位竭力维持生计，直到塞勒姆村民找到他，将他安置在帕特南家里。

伯勒斯的顽强可以从他在帕特南家经历的不幸之事中看出来，他还为此回到塞勒姆，提议用自己的身体偿还债务。1683年，他以同样的决心重新定居卡斯科。他从前的教区由衷欢迎他回来。 [23] 六年后，卡斯科——现在，它的面积已经大于塞勒姆村——再次因威廉王之战而被围困。1689年5月英国向法国宣战之前，来自法国和英国的定居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那年9月，四百多名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吼叫着来到这个小镇。伯勒斯加入了一场在田野和果园进行的七小时的战斗；一位波士顿的老民兵队长称赞了这位意料之外的参与者。那次袭击使装备简

陋的定居者损失惨重；他们中有二百五十人被杀或被俘虏。正是在那次袭击中，十五岁的默茜·刘易斯成了孤儿。她搬进了伯勒斯家里，伯勒斯的家人当时见到的她，一定比在哈桑面前的她还要痛苦。这些袭击使塞勒姆到处都是难民。伯勒斯又一次丧偶，且仍未受到任命，他沿着海岸撤退到波士顿以北七十五英里的韦尔斯，当时它算是边界地区。韦尔斯以东的一切都被摧毁了。

美丽的韦尔斯是缅因防守最严密的城镇，河里的鲟鱼和鲑鱼成群，两岸散布着两层高的坚固碉堡式房屋。这种设计可谓幸运，因为1691年的夏天将出现一场持久的围攻。在那个夏天，伯勒斯跟在哨兵队的后面，附近的定居点都被大火烧毁。正如一位游客提到瓦巴纳基人时所指出的那样，“不靠任何帮助，他们也能屠杀光整个区域里的野兽，而这也是理所应当的”。6月中旬，在那场持续的围困中，他们杀死韦尔斯的牲畜，践踏了田地。（也正是靠着具有生意头脑的殖民地定居者，他们才能全副武装。有位访来訪者指出，若一个印第安人手头没有两把枪，那他就很可怜。）1691年7月末，伯勒斯在一份低声下气的请求中签字，希望马萨诸塞委员会提供所需物品。9月，他再次恳求委员会提供衣物。他们衣衫褴褛，无盐可吃；靠着储存的玉米，他们仅能再撑六个月。每一天，他们都在等待敌人出现。有个十七岁的孩子被印第安人抓捕，他在那个星期冒险外出只为寻找木材。到了冬天这个痛苦的季节，一切都越来越糟；在1692年2月5日黎明前发生的突袭中，一百五十名印第安人洗劫、烧毁了富裕的约克镇，那是距离韦尔斯最近的镇子。当天下午，伯勒斯向地区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末日景象的描述。当第一个巫术指控在距当地以南五十英里处出现时，约克镇有一半人被印第安人杀死或带走，五十个俘虏被带着穿过雪地，向加拿大行进。印第安人还屠杀牛、马和绵羊。在和一个脱逃的年轻人交谈后，伯勒斯描绘出了地狱般的画面：“烟柱、无情的烈火、异教敌人的侮辱、叫喊声、枪击声、

砍杀（印第安人毫不顾及男人、女人或儿童最恳切的乞求，后者以最卑躬屈膝的方式尖声哭泣，留下苦涩的泪水）、拖走他人（没人敢出手阻止）。”

这场灾难使他想起《撒母耳记》中的章节，大卫和追随他的人发现他们的家人在洗革拉被扣为人质。他们看到被夷为平地的焦黑城市，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伯勒斯还回忆起耶路撒冷的毁灭，转而提起《耶利米哀歌》：“耶利米说，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他认为，这场浩劫是神的斥责。“上帝仍在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不满。”他在被捕前的三个月写道。“从前伸手帮助我们的人，甚至写下怨愤的话语攻击我们。”最后，他改写了《耶利米书》中上帝关于拯救的承诺，希望引起马萨诸塞委员会的共情：“如果你们仍留于此地，我必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我必栽植你们，必不拔出。”伯勒斯强调定居者所处的“糟糕环境和危险境地”。韦尔斯是下一个目标，他们很快就将别无选择，唯有投降。此外，约克遭遇的袭击带来了重大伤亡。细布业·杜默（Shubael Dummer）是缅因唯一被任命的牧师，也是休厄尔的表亲。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他刚走出家门，就在自家门口遭到杀害。据一位目击者称：“他被野蛮地脱光衣服，乱刀砍死。”杜默的妻子也因此死去。她无法再坚持活下去。

科顿·马瑟也在一篇关于新英格兰风俗礼仪堕落的演说中提到了约克。其中的细节和暴行完全一致。许多家庭遭遇屠杀，人质处于被活活烧死的危险之中。马瑟讲道，人们的心会为这场大屠杀流血。但是，会众也应该一开始就意识到约克的警告。马瑟写的是寓言，伯勒斯则提交了蕴含着圣经典故的紧急求助信息。他像莎拉·古德一样激进且贫穷，既是能挥舞火枪的牧师，又是热心助人的恳求者。他应该不难发现，受人厌恶的安德罗斯比驱逐他的无能当地政府更能保护缅因；暴动和随之

而来的混乱只会助长敌人的士气。波士顿撤走军队，留下伯勒斯这样的人乞求保护。有些人甚至在波士顿政变后向国王请愿，在临时政府的领导下，“新英格兰丧失了和平、秩序和安全”。

哈桑和科温向十六个人征集证据后，对伯勒斯提起了证据翔实的诉讼。他们还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就是私下将嫌疑人免职。问讯在英格索尔酒馆举行，但这一次，六十岁的酒馆老板——他很了解缅因的冲突，他们家也是因此逃往南方的——无法出手为他的前牧师辩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能从伯勒斯的否认中推断出他受到的指控。第一个指控最为严重，必然对他十分不利——他们指控他弑妻。5月9日早上，法官们问伯勒斯，他上一次领受圣餐是什么时候？缅因边境人烟稀少；在那里定居的英格兰人不到四千人。他们并不总想为了安息日出行，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下，因为印第安人不会在这一天停止伏击。仅从宗教的必要原则看，伯勒斯的确不如他的审判官们正统。如果不是他直率到了自毁的地步，就是记录证词的帕里斯让他看起来如此。他上一次领受圣餐是什么时候？伯勒斯回答，那已经过去太久，他记不清楚了，不过在最近的一个安息日里，他上午参加了波士顿的集会，下午则去了查尔斯敦的集会。他仍是罗克斯伯里教堂的正式成员。在塞勒姆牧师住宅最早的居住者中，他只给过最大的孩子施行洗礼。帕里斯没有注意的是，牧师所住之地距离所有他可能为他人施洗礼的地方都很远。 [\[24\]](#)

审讯迅速从正统之事转向神秘之事。伯勒斯的第二任妻子曾抱怨晚上显现的灵物。那从屋顶上窜出来，沿着烟囱飞奔，又飞下楼梯的可怕生物是什么呢？一个奴隶发誓那是头白色牛犊。还有一次，莎拉·伯勒斯躺在丈夫身边，床边有东西沙沙作响，她感到它对着她吹了口气。当

他醒来时，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伯勒斯否认他的房子闹鬼，但是——他不通情理的习惯招人质疑甚至惹人生气——他忍不住补充说，房间里有蟾蜍。他听起来似乎一直在自娱自乐。他没有特别的理由会认为自己易受攻击；而女巫都是些性情乖戾、处境卑微的女人。再说，她们往往被宣判无罪，而不是被定罪。此前，马萨诸塞没有因为巫术审判牧师；他也仍有自己的拥护者。就在三个月前，他还半饥半渴地躲在一个虱子滋生的驻防地，周围是数英尺厚的积雪，眼前就有一个凶狠的敌人。他还两次险些丢了性命。他还目睹过一些可怕的景象：他见过耳朵和鼻子被砍下后被塞进嘴里的情形。至于那些恶魔般的蟾蜍，他才没有时间去处理。

接着讨论的就是他的亡妻。伯勒斯家的女人死后会在塞勒姆四处飞蹿，谴责牧师，这是有原因的。帕特南家——牧师在他们家留宿了数周——不止一个人现身作证，“他对妻子非常严厉”。在缅因，莎拉·伯勒斯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这种恐惧与被施了法的白色牛犊毫无关系。她丈夫无情地责骂她，对她过度控制。他使她相信，他能听到他不在时她说的每一句话。据说，在与莎拉和姐夫采摘草莓归来后，伯勒斯就消失在灌木丛中。他的同伴大声叫喊他，却怎么也找不着人。他们便骑马回家，突然，他却又走在了他们前面，手里拿着一篮浆果。后来，他的妻子趁他不在说他坏话，他竟不知如何得知消息，痛骂了她一顿。他的姐夫坚称魔鬼都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伯勒斯神秘地回答道：“我的上帝向我透露了你的想法。”^[25]

伯勒斯在妻子生完孩子一周后，让她起身听他训斥。当他的女儿将由此引起的疾病归咎于他时，他也责骂了女儿。（伯勒斯被审讯的前一个晚上，谢尔登作证说，幽灵巫师告诉她，他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对了解这家人的人们来说，这一指控似乎很合理，因为女儿们都站在继

母一边。) 尽管伯勒斯既没有掐死也没有闷死妻子——或像其他人坚称的那样刺伤她们；这些出入往往会被忽视——动词的选择饶有趣味。伯勒斯相信秘密，但在一个热衷于互相监视的社区里，秘密是不合时宜的。他甚至想让女儿倾诉的女性对象闭嘴。如果他的妻子没能活下来，邻居就不会提及斥责的事情。伯勒斯可能也虐待了默茜·刘易斯；她对前雇主的描述中出现了特别的暴力元素。她坚称，“如果他把我扔在一百个干草叉上”，她就不会在他的书上签字。1692年，塞勒姆到处都是复仇女神。

一种相当一致的形象出现了，要么是绑架女孩、将她们的手按在恶魔之书上的邪恶黑人男子，要么就是专制的丈夫。他和第一任妻子住在帕特南家的时候，曾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因此请求主人仲裁。（这个请求可能只是出于礼貌。即使在帕特南宽敞舒适的家里，私下里争吵也是不可能的。）又一次，不安分的伯勒斯想要保守秘密，或者希望能保守秘密。他坚持要妻子签署协议，保证不会透露他的私事，这一要求听起来就像有罪，在签署文件被视为邪恶污迹的当时就更是如此。那天早上，他也有同样的发现。法官们已经做好了功课：他是否让妻子发誓，她只会给父亲写获得他批准的信件？伯勒斯否认了这个哈桑格外感兴趣的指控。至于伯勒斯的第二任夫人，莎拉·鲁克（Sarah Ruck），现在正穿着裹尸布四处飘荡，她同时也是哈桑兄弟的遗孀。^[26] 她的父亲住在塞勒姆，即将担任大陪审团团长。

塞勒姆执法官带领矮小健壮、一头黑发的伯勒斯进入礼拜堂，在那里，他被命令只能看向法官。缅甸的难民苏珊娜·谢尔登比其他女孩埋葬过更多亲人，她的父亲就在几个月前刚刚去世。她供出了她与伯勒斯两位亡妻的谈话。法官要求伯勒斯面对离他几英尺远的原告。他转过身来时，所有或是几乎所有被施咒的人都尖叫着倒向地上；连帕里斯都没

法准确描述这片混乱。法官们问，伯勒斯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同意他们面前“出现了意想不到、震撼人心的天意”。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肯定引用了《圣经》；他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精通《圣经》中的神迹，帕里斯没有理由在记录中专门指出这点，诺伊斯牧师也竭力隐瞒它。伯勒斯确实指出了一个不合常规之处——“你们中或许有人发现，他们开始要说我的名字时，却说不出来。”他对原告们说——但他的声音被掩盖过去了。

接下去是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指控。有几个人作证说伯勒斯很强壮。这一证词颇为传奇，因为他是个矮小的男人，高挑的科顿·马瑟甚至认为他是“非常孱弱”的人。伯勒斯能用两根手指举起一桶糖蜜；单手开七英尺的猎枪；当同伴去堡垒寻求帮助时，他卸下了一整条船的物品。1689年9月，这位强大勇敢的领袖发挥了自身的作用，许多人都钦佩他的毅力；当时，牧师因卡斯科战斗中的表现赢得了称赞。“我们谁都做不到他能做的事。”一名四十二岁的塞勒姆织工回忆说，织工自己曾试图举起猎枪，但即使用两只手也无法拿稳武器。当时让人敬畏的事情，现在看来却像是巫术。许多人从他人口中听说过伯勒斯的功绩；还有人则是听他本人亲口说的。他和他的幽灵一样展现出惊人的自夸能力。他曾经可能会索求那些赞扬的话语，现在却竭力否认自己的功绩。（他解释说，他只是把猎枪靠在胸前。）这些故事的背后可能是与他关系最大的指控。在每一次毁灭性的印第安袭击中，他都能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阿比盖尔·霍布斯、默茜·刘易斯和苏珊娜·谢尔登就没有那么幸运；其他本可以作证说明伯勒斯如何不可思议地挥舞重型滑膛枪的人，却都无法作证了，因为他们已不在人世。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在外面高傲地夸下海口，与此同时在家里十分残暴——伯勒斯设法对内施行虐待行为，在外创下非凡壮举。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是坏男人，也是好巫师。

虽然伯勒斯被直接从审讯现场送到波士顿监狱，他仍将困扰着那周的庭审。第二天，当白发苍苍的乔治·雅各布斯弯着腰，拄着两根手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审讯庭时，伯勒斯可能还在途中。雅各布斯少说有七十岁，有可能已近八十岁，在邻居眼中，他已是耄耋之辈。作为一个富裕的塞勒姆农民，雅各布斯听上去就像个老流氓。他在审问官面前放声大笑，说起俏皮话。法官们介绍原告时，雅各布斯邀请那些女孩大胆发言。他急切地等待她们说出故事。帕里斯的外甥女提供了她的证据。雅各布斯唯有大笑。当被要求为自己的动机辩解时，他质问审问官：“阁下，你们所有人都相信这是真的吗？”他们的轻信使他感到难以置信。他没有回避挑战；如果他们能证明的话，他就会承认自己施用巫术！

像乔治·伯勒斯和不择手段的约翰·普罗克特一样，雅各布斯对他的仆人也很严格，他很可能打过仆人。一个十六岁的男孩随后作证说，雅各布斯曾威胁要淹死他。这个指控引起了共鸣。二三十年前，雅各布斯就因淹死马匹、用棍棒和石头将它们困在河里而被起诉。（他声称自己只是试图将擅自侵入的动物赶出他的庄园。）在审讯的两天里，他们发现幽灵雅各布斯用手杖殴打了女孩。有几个人还掏出了老人扎进她们手里的针。他的前任仆人莎拉·丘吉尔（Sarah Churchill）敦促雅各布斯坦白。“你听说我会用巫术吗？”他问道，目光没有留在她身上，而是按照指示看着地方法官。“我知道你过着邪恶的生活。”莎拉斥责道，似乎这样说就足够了。

雅各布斯会做家庭祈祷吗？哈桑和科温问。他不做。没有祈祷的房子是会闹鬼的；地方法官要求老农民对自己的疏忽负责。雅各布斯解释说，他不与家人一起做礼拜，因为他不识字。这不是障碍；“你能念《主祷文》吗？”法官提醒他。“念出来让我们听听。”人们都知道这几

句话是驱散邪恶的护身符。雅各布斯多次尝试，却每次都说得磕磕绊绊。几乎每个出现在哈桑和科温面前的证人都是这样的表现：一星期后，另一个巫师紧张地打趣道——他自己说话时也一团糟——被告似乎和原告一样被施了魔。^[27] 否则，背出来对雅各布斯并非难事。他与法官们开玩笑。他担心自己无法帮助他们调查。他们可以烧死或绞死他；他就是对巫术一无所知。他的罪行不比审问官多。“我是巫师，你们可以向我征税。就算我是秃鹰，你们也可以向我征税，”他抗议道，“我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刘易斯曾被老农夫打得鼻青脸肿，被催促着在书上签名，还收到了金子和许多好东西——这些都发生在他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或没看到他的非自然本性之前——她给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1692年，女人比那些声称女巫飞进他们卧室并趴在他们胸前数小时的男性更为危险。刘易斯发誓：“我坚信乔治·雅各布斯是最可怕的一个巫师。”那一周，雅各布斯和另外九个女巫在伯勒斯之后进了波士顿监狱。在那里，杖打女孩的老人和虐待妻子的牧师有机会熟悉彼此，伯勒斯甚至可以看到官员们在雅各布斯右肩下发现的女巫的三角形奶头。

牧师被监禁后，指控的数量急剧增长；举行审判和监狱录口供的速度几乎无法跟上指控发生的速度。默茜·刘易斯带头作证，成了最活跃的原告。最终，对她下毒手的人数达五十人。她记忆超群，将赞美诗和训诫的话语编入幽灵显现的故事中，提供最富有想象力的证词。（缅甸难民苏珊娜·谢尔登则会揭发谋杀案。她着重指控那些给鸟、无毛小猫、猪和海龟喂奶的巫婆。暂且忘却了自己那些死去的婴儿，她的女儿揭发了新的嫌疑犯。）不知何时，刘易斯搬到治安官乔纳森·帕特南的家里，后者刚刚失去了一个小婴孩，全家人都认为是巫术所致。就在伯勒斯回到塞勒姆的那一天，普罗克特的女仆玛丽·沃伦与人闲聊，人们听见她说，地方法官可能会听信凯泽的疯女儿的话，就像听信其他任何受害女孩一样。不到一周，她又改变了方向；她将成为控方最博人眼球

的证人。她从身上取下针。她在礼拜堂里吐血。她的舌头一直伸在嘴外面，时间一久竟变黑了。她的腿盘在一起，就连最强壮的男人也无法将其分开。法庭记录员没有详细描述这非同寻常的调解方式：几个成年男人试图分开一位二十岁女孩的膝盖。

与此同时，幻觉和恐惧混合在了一起。老安·帕特南举报说她的床边有乳白色的人影。其中两个是鬼魂，但第三个是她那黑发的邻居约翰·威拉德。显然，威拉德帮助围捕了最初的几个嫌疑人，但他已厌倦那些女孩，他发誓说她们都应该被绞死。他以幽灵形态现身，向安吐露他至少杀害了十三个村民，她一一说出了受害者的名字。一连串不幸的解释使所有人都争相重新审视家里的不幸和神秘之事，而不幸和神秘之事从不稀缺。在埃塞克斯县，胃痉挛、膀胱问题、麻木、耳聋以及各种各样的异常行为——包括意料之外的仁慈——突然都有了意义。

并非所有的恐惧都是凭空出现的。在5月10日的审讯中，乔治·雅各布斯的主要指控者莎拉·丘吉尔哭着离场，双手焦虑地绞着。她将自己的悲痛讲给英格索尔的外甥女听。她抽泣着说，自己虽然发誓说曾碰到过恶魔之书，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她的证词“全都是假的”。她的密友不接受她公然放弃原先的证词。丘吉尔流着泪坚持现在的说法。年长的女人问，她究竟为什么说谎？莎拉解释，法官们威胁她，要把她和伯勒斯一起关在塞勒姆的地牢里。她宁愿做伪证，也不愿与巫师一起锁在漆黑的洞里。塞勒姆的问题不在于盲从，而在于不信任：只要她向诺伊斯牧师承认一次她签了魔鬼之书，他就会相信她，“但如果她说实话，说她没有把手放到书上，就算她说一百次，他也不会相信”。

5月下旬，当八十一岁的塞勒姆农民布雷·威尔金斯准备骑马前往波士顿时，他孙女的丈夫前来拜访。威尔金斯会为他祈祷吗？这个年轻人——帕特南的邻居约翰·威拉德——已经失去理智。他受到了指控。威

尔金斯尽可能客气地把他打发走了。这两个人长期不和；威尔金斯家族不喜欢威拉德。几天后，在波士顿，当布雷·威尔金斯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威拉德竟又出现了。他对这个家族长者投去“邪眼”（evil eye）^[28]；随后几天，老人便患上了严重的尿潴留。威尔金斯痛苦地回到塞勒姆——他觉得自己“像个受酷刑的人”——请求默茜·刘易斯帮助。到了5月，女孩们已经成为猎巫的老手；患病孩子的父母以朝圣之心向她们请教。她们可能只有十一二岁，但在帕里斯的指导下，她们可以解释社区的几头牛是如何在过去六年里冻死的。默茜清清楚楚地看到威尔金斯的孙女婿压在老人的肚子上。

那个月，巫术造成了第一例死亡案例。5月初，布雷·威尔金斯十七岁的孙子丹尼尔也怒不可遏地抱怨约翰·威拉德。威拉德殴打妻子，而丹尼尔可能是知情者之一。他或许已经听到了关于巫术的传闻。他赌咒发誓说威拉德应该被绞死。几天后，这个少年就病倒了。很快，他就无法说话和进食。医生将其病归因于超自然的原因，这得到了默茜·刘易斯的肯定。黄昏时分，在丹尼尔的床边，她看到透明的威拉德在折磨这个毫无生气、神志不清的男孩。后者困难地喘着气。第二天，刘易斯、玛丽·沃尔科特和小安·帕特南都举报威拉德曾扑向丹尼尔，掐住他的喉咙。威拉德的幽灵还与三个女孩说了话。5月14日星期六，他宣称，“如果可以”，他很快就会谋杀丹尼尔。他解释说，他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会向伯勒斯求助以恢复力量。星期二，幽灵发誓要在无月之夜杀死威尔金斯。三个小时后，男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帕里斯在村庄教会记录中写下这名十七岁男孩的名字，并在后面写道，“被施咒致死”。

罪犯潜逃近一个星期，终于在四十英里外露面。他的逃跑似乎坐实了他的罪行；他在看管室里引起骚动，治安官别无选择，只好把他铐起来。一片慌乱后，治安官敦促法官们加紧调查，以防更多伤亡。哈桑和

科温迅速对嫌疑人进行审问。他们质问道：“你对谋杀、蛊惑你的亲戚这一点，有什么要说的吗？”威拉德坚持说他不希望任何人受伤害。女孩们的证词被大声宣读。她们的证词——包括殴打妻子的指控——听上去都很熟悉。几个亲戚——指证威拉德的人几乎都是他的家人——回忆起他打妻子时折断的棍子。他把她打得蜷缩在楼梯下；她不指望自己能从毒打中恢复过来。在审讯中，鬼魂在房间里飞来飞去，聚集在威拉德周围。他相信女孩们被施了咒吗？哈桑问。“我相信。”威拉德回答，他也念不好《主祷文》，足足背了五次。

正是那一周，体弱多病的莎拉·奥斯本在监狱里悄然离世，在2月被从病床上拽下来——她曾担心印第安人会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下床——后，她的名字只是偶尔被人提起。在一年中最冷之时，在寒冷恶臭的牢房里戴着沉重的镣铐，依靠稀少的口粮生存了九个星期零二天，她的灵魂是多么坚强啊。5月10日，波士顿监狱的看守将奥斯本的尸体从目睹她悄然离世的村民中移走，1686年，人们把位于法院街的这所监狱描述成“地狱的边缘”，现在没有村民会对此有所怀疑。当时，没人将她的死归咎于巫术。塞勒姆的第一个遇难者不是威尔金斯，而是奥斯本。

[1] 此处译文引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略有改动。

[2] 或者正如邓布利多向哈利·波特保证的那样：“哈利，这当然是发生在你的脑海里，但为什么就意味着它不真实呢？”

[3] 曾有人说过：“尼古拉斯·诺伊斯的诗句能奠定他在美国诗歌界有史以来最具天赋和才华的大师的地位，不过是在英语写作的最堕落可鄙的诗体方面。”没有证据能反驳这一说法。

[4] 刘易斯认识霍布斯，这种不情愿就显得尤其奇怪。显然，承认自己说不出名字比假装无知带给她的损失更大。我们也如同在白炽灯下眯着眼睛观察此事，哈桑法庭上的事项比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要多得多。

[5] 蒂丽芙伦斯 (Deliverance) 并非常规名字，在圣经中意为“拯救”“救恩”，指神借着耶稣的代死和复活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与神恢复了正常的关系。

[6] 桌灵转 (table-turning) 是欧美一种古老的灵异现象，人们围坐桌边，手放桌上，若桌子自动旋转或浮于空中则意味着有幽灵出没。

[7] 一名长发、满脸麻子的托普斯菲尔德男性随后被释放，因为女孩们无法一致同意他是她们所讨论的巫师。他被当局带到礼拜堂外面，那里光线更好。女孩们仍在犹豫。“你们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哈桑质问她们，他对她们的优柔寡断感到迷惑。“他自己没有告诉我，是其他女巫告诉我的。”其中一个女孩解释道。此人叫尼赫迈亚·阿博特，时年六十岁，是唯一一个被指控为巫师、却能从哈桑的审判中被无罪释放的人。

[8] 除了帕里斯、奇弗和其他少数几个人的作品，书面记录是一种具有语音特性的采样器。适当的称谓会以各种你能想象到的变体出现，如同词形变化。“提图芭” (Tituba) 确实可以有八种不同的拼写方式 (其中三种出现在同一天)，可连“霍林沃思” (Hollingworth) 也出现几乎同样多的拼写变化。总督及其妻儿会用不同的方式拼写“温思罗普” (Winthrop)。有些人提交的证词则表明了它们的作者“对标点符号毫无意识，称得上是拼写改革的先驱者”——这是人们形容的伯勒斯

指控者的话，伯勒斯的指控者有时还会将“伯勒斯”（Burroughs）写成“伯勒”（Burrough）。拼写体系就像塞勒姆——托普斯菲尔德的边界一样易变。

[9] 1689年，科顿·马瑟警告说：“当魔鬼发现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时，他就会召唤出更多帮手，‘出来！出来！这儿有份大奖，人人有份！’”

[10]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一节）

[11] 贝蒂的痛苦不会是虔诚的休厄尔家最后的灾难。1713年，一个仆人在午夜后敲响了主人的卧室门；那天的布道使她惶恐地睡不着觉。休厄尔一家在炉火前安慰她。她描述了塞勒姆常见的一种现象：幻象——无论是窒息的女人、撒苹果的小妖精还是复仇的鬼魂——往往出现在安息日，那时人们已经（或者应该）在教堂里。

[12] 末日之马（apocalyptic horses）是指圣经《启示录》中“四骑士”的坐骑，分别代表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呕血之龙（blood-vomiting dragons）则源于早期新英格兰人目击及记载的异象。

[13] 印第安人的童年则不大一样。印第安母亲生更少孩子，给予他们自由而非惩罚，会为失去孩子而放声哭泣。甚至，孩子们还能拥有闲暇时间！清教徒熟知她们的纵容。“不要让英格兰父母像他们所报道的印第安人一样放纵、疏忽。”马瑟警告说，他对这个问题存有戒心。不少印第安人的白人俘虏会选择留下。有个男孩不肯回去，人们不得已

将他的手脚都捆起来送回去。但他很快就逃走，重新回到印第安家庭。

[\[14\]](#) 据马瑟一个儿子的记忆，马瑟不愿意与孩子们分享邪恶天使的故事，免得他们“对魔鬼的幻影产生可怕的幻想”。

[\[15\]](#) 截至1692年，乔纳森·科温法官就埋葬了七个孩子，其中三个男孩名叫约翰。

[\[16\]](#) 佣人们毫无消失的风险。一位胡格诺派移民发现，一旦有人失踪，你只要告知印第安人，他们只收取微薄费用就能帮你找到失踪者。而且，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逃跑都是很罕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此处人走过的路并不多。”

[\[17\]](#) 马瑟在晚年抱怨女人们对他的责难超过对世上所有人的责难，他承认了她们强大的力量。他很好奇，波士顿从未“卑鄙地谈论过我”的女人有超过二十人吗？

[\[18\]](#) 希拉里·曼特尔（英国小说家，著有《狼厅》——编者注）回忆起六岁时的自己：“我所经历的是悔恨的开始，但这是罪恶意识的觉醒，还是女性气质的开端？”

[\[19\]](#) “隐多珥的女巫”（Witch of Endor）语出圣经《撒母耳记上》。面对敌人的危险时，以色列王扫罗无计可施，只能求助于居住在隐多珥的女巫；但由于先前禁止国内交鬼及施巫，扫罗只能乔装打扮去见女巫，让她召唤出先知撒母耳以获得指示。

[\[20\]](#) 默茜·刘易斯和描述和这段经文极为相似：“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八节，第九节)

[21] 龙骑兵（dragoon），欧洲历史上的骑兵兵种，配备火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动用龙骑兵镇压国内的新教徒。

[22] 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1692年秋天，新上任的新罕布什尔副总督急于讨论该地区的防务，他向王室抱怨，尽管敌人就潜伏在树林中，但他“在漫长的等待之后，却不能从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菲普斯那里得到任何答案，得到的只有忽视、轻蔑和责备”。1693年4月，他警告说，“你将从即将抵达的船只上听到马萨诸塞和汉普郡之间发生内战的消息。”

[23] 为了鼓励其他人在废墟中安顿下来，镇上官员问伯勒斯是否可以让出他那块滨水土地的四分之三。作为交换，他们可以提供位置更远的一百英亩内陆土地。伯勒斯出于好心，便割让了比原定土地更大的部分。他接下来的举措对于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尤其是一位拖家带口的牧师来说更是史无前例——他拒绝了附送额外土地的提议，选择继续住在那块仅剩三十英亩的沿海盐沼地。

[24] 如果伯勒斯真的这么说，他就错了。他给第二个孩子施洗的时间是1691年。

[25] 1656年，安·西宾斯的罪行——她在因巫术被处决后，人们说她“比邻居更机智聪颖”——在于她知道别人何时在议论她。伯勒斯同样炫耀并展现出了他那看似能未卜先知的超群才智。

[26] 莎拉·鲁克的爱情很是不幸。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同一时间结了两度婚。1664年，她与他合法解除婚约关系后，嫁给了哈桑法官的哥哥威廉·哈桑。伯勒斯是她的第三任丈夫。

[\[27\]](#) “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句话引起了怀疑。伊丽莎白·普罗克特还发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听上去就像一个狡猾的诅咒。

[\[28\]](#) “邪眼”，也称为“邪视”，指一种通过眼神就能诅咒对方的超自然能力，出现在全世界多个地方的民间传说中。

第六章 地狱的边缘

地狱似乎比天堂更适合我虚弱的头脑。这毫无疑问，因为地狱更为世俗。

——弗兰纳里·奥康纳

在那个意识形态方面布满焦虑的时刻，一群儿童患上了失能症。困惑不解的家人疯狂地四处求医；与此同时，症状在观察下却仍在加重，病情也不断蔓延。一个由牧师组成的专家小组介入其中，一个无法核实的解释大获支持，指控方兴未艾，有七十人被关进不通风的牢房里，他们被指控犯下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罪行。这些事不只发生在17世纪。但是，在1692年，最终定论尚未出现。哈桑可以调查指控，监禁嫌疑人。但在代理总督允许塞勒姆案件进入正式审判程序前，他和马萨诸塞的所有法官都不能进入下一步——大陪审团审判和正式公诉。作为一位八十九岁高龄的温和派政客，加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代理人，总督似乎已经选择暂缓审判。十六年前，他赦免了一位被指控的纽伯里女巫。在获得赦免后，约翰·黑尔曾提及过她。殖民地在不同政府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政府和无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它等待着正在途中的特许状。它等待着它的新总督。一切都处在停滞状态。亚瑟·米勒在1953年指出：“塞勒姆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有开头、中段和结尾的戏剧之一。”随着恐慌加剧，埃塞克斯县的监狱里挤满戴着镣铐的女巫，戏剧的中段拉开了帷幕。

5月14日黄昏时分，拯救——或至少是司法救济——通过曾经的缅甸牧童以一种浮夸且离奇的形式降临了。^[1] 星期六傍晚，马萨诸塞新

任总督威廉·菲普斯（William Phips）爵士一路驶过浪花飞溅的岛屿进入了波士顿那雄伟的港口。他还没上岸，就听到新英格兰云杉的枝叶在微风中噼啪作响。这座城市建在三座连绵起伏的山丘的斜坡上，镇子——其中有漂亮的教堂、宽敞的码头、一幢两层高的镇公所，还有遍布着商人和精美商店的集市——四周几乎都被水围绕。波士顿很小，你可以轻松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寻找丢失的奶牛。有斜屋顶的砖砌宅第已经开始从密密麻麻的木质房屋间拔地而起。尽管如此，在狭窄的街道上，你碰到一只猪的可能性比遇到一辆马车要高。临时政府官员聚集在码头迎接菲普斯；祝福者将鹅卵石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声欢呼喝彩，与庆祝的炮响交相呼应。与新总督一同前来的还有英克里斯·马瑟和新修订的殖民地特许状。三者共同前来拯救马萨诸塞这个“摇摇欲坠的地区”，使其脱离后安德罗斯时代的无政府状态，摆脱困扰其人民的“万千困惑和纠葛”。

在几百个举着旗帜的民兵陪同下，粗犷英俊的菲普斯向镇公所走去，有人挥舞着长枪和滑膛枪，有人穿着胸铠和厚重的紧身皮衣。他时年四十一岁，不像是适合此职位的人。他魁梧英俊，作为军械工的儿子，菲普斯早年在缅因的偏远地区生活；在二十二岁时，他以造船工的身份移居波士顿。他生性粗豪，野心勃勃，不甘心只是成为美洲历史上第一批白手起家的人。当塞缪尔·帕里斯在隔壁开设新店铺时，菲普斯决定外出寻找财富，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去找沉没的宝藏。最初的远征带来的仅仅只有两次暴动，他还赤手空拳地镇压了第一次。而在第三次旅程中，他在海地的海岸上发现了一个藏着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地方。英国赞助人资助了那次航行；菲普斯带着三十吨白银驶向伦敦。几个世纪后，凯恩斯写道，他的壮举“看似不可能却大获成功，是最非比寻常的记录之一”。这个结果改变了英格兰未来的金融状况，引发早期的股市繁荣，直接导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在一个五百镑就算是一大笔钱的时候

代，菲普斯的股份就值一万一千镑。^[2]

虽然这一功绩为他赢得了勋章和爵士头衔，却丝毫没有改进他的举止。一位牧师在1688年对哈佛毕业生说，菲普斯或许能与摘取金羊毛的伊阿宋相提并论，但他仍是一个粗鲁卑鄙的拓荒者，靠的是发达的肌肉、咄咄逼人的气势、各种形式的越权和猛烈的武力手段，他的这种做事方式也引来许多人的指责，包括他现在所取代的那位年迈的代理总督。十年前，在波士顿的一家酒吧，治安官试图驱逐菲普斯的手下，双方僵持了很久。他为了手下的利益插手干预。当治安官威胁要通知当局时，菲普斯怒吼，他“不关心臭狗屎总督，因为他拥有比总督更大的权力”，在其他场合，他会更不得体地表达这种观点。在接受审判时，他会将宣判决书扔回给法官。（当时在法庭上对他进行罚款的法官，正是即将要成为副总督的斯托顿。）连混了很久的老水手，都会钦佩他咒骂人的能力。财富也不能抑制他对贿赂和勒索的欲望。

将蛊惑人心的冒险家变成天使费时费力，但新英格兰杰出的神话缔造者成功做到了这点，后来，在关键时刻抵达波士顿的菲普斯被形容为“从天而降”。这种和神迹挂钩的说辞让他的同代人够呛，但他到来的时间点却更成问题。“我们每天都期待威廉·菲普斯爵士的到来。”塞缪尔·休厄尔提出——他说这话的时间是在近四个月前，当时，帕里斯家的女孩们第一次痉挛发作，新总督离登船上任还有几周时间。^[3]而菲普斯带来的特许状从颂发起已有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马萨诸塞这个“贫困、衰弱又破败不堪的地区”每况愈下。

菲普斯尽管轻率鲁莽，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后来居上者。他二十二岁才学会读写，但仍不能娴熟掌握这两种技能。^[4]他显然无法区分书上的荷兰语和英语，也可能无法辨认自己在1691年12月被授予的官

职。他被王室任命为总督；而根据旧特许状，他的职位需要通过竞选产生。1689年3月，菲普斯从伦敦奔赴波士顿，传递英国光荣革命的消息，在这场革命中，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斯二世，新教国王取代了天主教国王。在船上，菲普斯想到他将亲自罢免饱受诟病的王家总督安德罗斯，便欢呼雀跃；他到达后，发现这项工作在六个星期前就已经被完成。一年后，菲普斯来到北方教堂，科顿·马瑟在那里为他施洗，敲定了他的政治前途。这项仪式的延迟在他的履历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马瑟也解释道，毕竟缅因没有固定的牧师执行这任务。

1690年，菲普斯率领一支海陆远征军队攻打法属加拿大的首府魁北克。关于瓦巴纳基——法国联盟的传言一直、也将继续在新英格兰流传；有消息说，敌人打算摧毁殖民地的所有城镇。此前，菲普斯成功打击了新斯科舍的法国前哨部队，这一成就因其部下在当地的掠夺而略显肮脏。1690年远征行动的计划草率，且一再被推迟执行；法国人用猛烈的炮火迎接他。在这场耗资巨大的战役中，他牺牲了数百名战士，伦敦方面认为这是“可耻而懦弱的失败”。菲普斯亦在转变北美金融历史中发挥了作用；殖民地没有资金支付回程的士兵、水手，或者招募新兵，于是便发行纸币。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贸易停滞，法国预计就要实行报复，波士顿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波士顿的一位访客指出，“这些可怜的人已经做好啃食彼此的准备。”这些情况都没有阻止菲普斯驶往伦敦，请求威廉三世提供资金将法国人彻底赶出北美洲。缅因的毛皮贸易和渔场岌岌可危。（定居者认为，如果法国人染指马萨诸塞的造船厂，英格兰也必定会后悔不已。）正是在这次出行中，菲普斯在特许状谈判中与英克里斯·马瑟联手。

那个晚春的星期六下午，菲普斯从波士顿码头走出来时，天上的光亮全然消失了。全城一片寂静。在镇公所的阳台上，他的演讲进行到一

半——上帝派他保护他的国，所有先前的法律和自由都将沿袭——他就停了下来。当时，天光都消失了。他决定不再违反主日休息的传统。欢呼和致敬便留到星期一再举行。民兵们借着烛光陪他来到现今位于塞勒姆街和特许状街拐角处的红砖宅邸，房子的布置美轮美奂，远处则是壮丽的海港风景。人群继续向英克里斯·马瑟的家走去，菲普斯的任职要归功于他。星期一上午，当局在柱式结构的镇公所重新集合，他们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讨论菲普斯受任之事应从先前中断的地方开始宣读，还是应该重新宣读，政治与宗教在这点上相互冲突。而在同一个典礼上，六十岁的威廉·斯托顿宣誓就任副总督，此人为政府工作了二十年，经历四代政权的更替。

特许状在两天后被公布，它并没有实现所有殖民地——今后就是一个省——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殖民者终要为僭越权力付出代价：王室扩大马萨诸塞的边界，却限制它的权限。特许状摧毁了最初几十年的政治基础，对所有人（除了天主教徒）都表现出宗教宽容。唯有高收入者——无论是否是教会成员——才可以投票。殖民地居民丧失了选择总督的权利；菲普斯就任是英克里斯·马瑟在伦敦想出的折中方案。马瑟知道国王更希望由军人来掌管马萨诸塞，他解释道，如果新总督是新英格兰清教徒，这个省必定会忽视王室的委任。与此同时，王室的各个顾问都在为与他们有共同利益的人选游说。最终，菲普斯被各方接受，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人。他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取代了马瑟口中“只会在草叶茂盛的种植园废墟上发家致富，除此之外别无打算的一群人”。现在，这个省可以依靠更完善的保护了。看来，权力真空带来的破坏性比来自王权的侵犯更大，前总督安德罗斯就是“外来的梦魇”。最重要的是，特许状结束了三年来恼人的不确定性。

英克里斯·马瑟开始积极兜售特许状；他知道自己提供的是一份不

完美的条约。^[5] 他的同胞可能会奇怪，他为何没有争取到更多。他自己则宣称，现在争取到的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的确，自治已成过去。但总督和副总督仍都来自他们的阶层。马萨诸塞摆脱了王室强行安插的英国贵族，得到受过马瑟洗礼、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子弟。新特许状确有缺陷，但聊胜于无。在春天的一场布道中，马瑟如是肯定。财产权得到确认，宗教权利得到保证，政治自由和镇上的定期集会得以恢复。他们的总督不能像安德罗斯那样单方面推行法律或征税，后者的法庭已沦为笑柄，他还勒索钱财，对新英格兰人行使的权力远大于英国国王对英国人行使的权力。英克里斯·马瑟一边恳求，一边羞辱，以求让同胞满足于现状，并且——作为会意、顺从的孩子——支持他们的君主。马萨诸塞最需要的是“忘恩负义、只会抱怨的一代人”。科顿·马瑟追随潮流，将特许状介绍给了波士顿最大的第二教会会众。他提醒一千五百名教区居民，上帝三年前就已饶恕他们。他将他们从那些声称他们是“只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的民族”的人手里拯救出来。马瑟指的是英格兰人，而非印第安人。

在宣传中不乏不满的抗议声。感恩节那天，科顿·马瑟为父亲的平安归来讲道，他说，当一个民族的人民表现得像“秃鹫和鹰身女妖”时，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意愿。那些向同胞“持之以恒地展现自己勤劳一面”的人，不应以恶名相谢。在那次温馨的演说中，马瑟称颂了牧师、地方法官和不同的人民领袖，这些勤劳却不受赏识的公仆“必须随身携带两条手帕，一条用来抹去辛劳的汗水，另一条用来擦掉责骂中飞溅的唾沫”。他让听众好好想起他们拥有的好运和诸多特权。他们应当避免分歧和争论。有人使“上帝为保护我们而建的树篱上”出现了致命的裂口，让魔鬼得以破门而入，目前，村子附近就有这样的“惊人例子”。

两个心怀不满的阵营加入了纷争：一帮人唯有恢复原有特许状才愿

留下来（大部分是东正教徒）；另一帮人（商人）则宁愿回归自治领状态，也不愿接受一个毫无威信的新英格兰政权。许多人认为殖民地的居民受到了欺骗，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这是对保守主义的传唤。更迭的政权空白期已造成损失；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投入新政府的怀抱。^[6] 支持特许状的著名人士对菲普斯很是反感，因为他先前总是触犯法律。在这座拥有八千人口的城镇，抱怨声此起彼伏，留下来的安德罗斯支持者为此暗自高兴。英克里斯·马瑟没有向伦敦传达人民的失望，相反，在6月23日，他汇报说：“人民对新特许状非常满意。”对菲普斯来说，他不仅忙于处理不满之声，还忙于应对破坏边境的印第安人——伯勒斯所指的毁灭性袭击发生在十四个星期前——和侵袭沿岸地带的法国私掠船。秩序的恢复和对水手的迫切需求——这是挫败法国和印第安计划的策略——是当务之急，空无一物的马萨诸塞财政部也急需关注。为了获得借款，政府向乐于助人的塞缪尔·休厄尔求助，几年前，他曾救助过伯勒斯。

菲普斯不可能预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袭击，他离开伦敦的那天，波士顿的狱卒将最初的三名嫌疑犯关进了监狱。很难说他如何看待这件事，与其说这是件紧急的国家大事，不如说是一件烦忧之事。猎巫不会带来沉没的珍宝或是作为战利品的印第安人头皮。征服加拿大——这片土地渔业发达，亦有丰富的皮草和贵金属资源——仍是他的首要任务。他既非深思熟虑之人，也非擅写书信之辈；他事业中的实际经历被马瑟作品中的幻想成分所掩盖。菲普斯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建政府上。从县治安官到首席法官，他都要找人填补职位的空缺；许多人等着与他会见。直到10月中旬，他才向英国的上司提及塞勒姆的“迷惑之事”，他和马瑟父子有理由重新解释来自无形世界的攻击。五个月后，菲普斯会注意到，他刚抵达时，“我发现这个省被最可怕的巫术或恶魔附身反复侵袭，已经蔓延到几个城镇。很多可怜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磺烫伤；

有些人的身上被针扎；有些人推进水火之中；还有人被拖出家门，越过数英里的树梢和山峰。”^[7] 他写下的全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无论是他还是马瑟，都没有见过这些现象。

虽然菲普斯在10月提到了撒旦的附身，但在此期间，这种可能性鲜少被提及。^[8] 相反，科顿·马瑟敦促菲普斯对比瑞典早期遭遇的灾难。在那次幽灵袭击中，至少有七十个女巫组成的“地狱团派”在猫和鸟的协助下，捕获了三百名四至十六岁的孩子，用各类运输工具将他们带到瑞典中部。孩子们聚集在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在那里遇到撒旦本人，并用鲜血在他的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瑞典的女巫威胁要杀死长官、折磨牧师，其中还有一位牧师早先不知自己为何会剧烈头痛。马瑟指出，那些根除瑞典犯罪分子的人圆满完成任务，立即便得到回报——“上帝非凡的微笑”，然而这从未在巫术相关的描述中出现。（他没有提到，七十人被处死，其中只有二十三人对罪状供认不讳，上百名瑞典儿童后来承认自己撒了谎。他一定注意到，事件始于日常生活中的诅咒，可很快就发展成着魔的狂热状态。当时的瑞典，也有这么一帮孩子瞄准各个家庭——而且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家。）

瑞典的巫术危机是从眩晕的空中飞行失灵开始的，就像安·福斯特经历的那样。就在菲普斯回来的那周，玛莎·卡里尔和安·福斯特飞过树梢，飞向帕里斯家备受议论的草地，途中，她们突然从高空坠落，福斯特双腿发软，倒在地上。大约在同一时间，卡里尔在宗教聚会上推撞了邻居家的十二岁女孩。随后，女孩在灌木丛中听到年长女人的说话声，却不见其人；那是卡里尔威胁要毒死她。5月28日，当局发出了对玛莎·卡里尔的逮捕令，她是第一个在安多弗服刑的人。三天后，她憋着怒气出现在哈桑面前，为自己辩护，否认魔镇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小安·帕特南，她从未见过这两个人。

菲普斯的到来使哈桑和科温推迟了5月中旬的审讯。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新的指控。他们下令围捕乔治·雅各布斯的大家族的成员——雅各布斯是个爱打趣的老人，曾放言如果法官能证明他有罪的话就烧死或绞死他，但他的右肩下的明显标记却暴露了秘密。塞勒姆治安官逮捕雅各布斯的儿媳时，这个神志不清的女人正在给婴儿喂奶，另外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流着眼泪追她，直到她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仁厚的邻居收留了这些孤儿。他们的叔叔作为近邻却无法这样做；他也受到指控，便与雅各布斯的儿子一起逃走。她们那种逃跑的方式不太适用于女性。乔治·雅科布斯那聪明深情的十七岁孙女也随之入狱。

哈桑和科温需要处理的案件数量非常多；5月18日，九个人作证指出了十九种不同的折磨方式。那个星期三，丽贝卡·纳斯的妹妹玛丽·埃斯蒂获释出狱，她已经在狱中度过三个星期。她最近没有出庭作证。

（死刑案件不得保释。）她丈夫是托普斯菲尔德的制桶匠，担任过从行政委员到治安官、从公路测量员到大陪审团成员的每一个政府官职。他知道这个体系如何运作；他竭力让法庭相信先前的证词是错的，信任他温和的妻子并非什么难事。有一个证人强烈反对。埃斯蒂获释不到两天，默茜·刘易斯就在死亡边缘徘徊。她的女主人招来小安·帕特南，后者与帕里斯的外甥女一同前来；女孩们似乎整个春天都在密切交往。在默茜的床边，她们描述了同样的情形：埃斯蒂和同伙野蛮地掐住她们朋友的脖子。她们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默茜——现在她呼吸困难——拒绝洗脱埃斯蒂的罪名。5月20日傍晚，呈半透明形态的玛丽·埃斯蒂警告那个孩子，她活不过午夜。在新月的辉光下，法庭执行官奔赴托普斯菲尔德重新逮捕了七个孩子的母亲——五十八岁的埃斯蒂。她一被戴上镣铐关进波士顿监狱，默茜·刘易斯就完全康复。

在同一天，经历两次磨难的缅因难民苏珊娜·谢尔登透露，几星期

来一直躲避逮捕的小镇商人菲利普·英格利希带着书和刀拜访她，他威胁要杀掉新总督——“他最大的敌人”。谢尔登不是唯一一个将这两种阴谋编在一起的人。科顿·马瑟也会这么做。马瑟警告，“全能的上帝让国王陛下庇护我们的政府”，而魔鬼试图“阻挠政府落脚”。结盟共谋并非难事：在参与驱逐安德罗斯的人中，有五人后来成了巫术案的法官，暴动的计划还有一部分是在马瑟的住处制定的。哈桑针对这场事件写过书面证词；休厄尔亦回应过批评者。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很耳熟：这个身着红衣、崇拜王权的团伙入侵了新英格兰，野蛮地利用当地人民。他们的领袖打入殖民地的礼拜堂，与法国人合作，收买印第安人。有个印第安人还发誓说安德罗斯给过他一本印有圣母玛利亚的书；所有没有那本书的人都将被害。安德罗斯打算把殖民者献给“异教徒敌人”。他还召集了额外的英国士兵，密谋从波士顿开始颠覆新英格兰的所有城镇。

5月23日黎明时分，查尔斯敦一位富有的中年船长纳撒尼尔·卡里和妻子乘船来到塞勒姆村。在过去的几天里，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这对夫妻的耳朵里，四十岁出头的伊丽莎白·卡里被指控施用巫术。在朋友建议之下，他们在塞勒姆待了半天。他们很容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受折磨的人先前没有见过伊丽莎白，根本认不出她的模样。在星期一的日程中，法官们安排多场审讯；卡里与他们协商后，坐进了礼拜堂里的一个显要座位。他着迷地看着官员领来囚犯，让她们站到离法官七八英尺的地方，命令她们面对哈桑和科温。执法官之后还仍站在被告旁边，举起武器，让她们动弹不得。这起不了什么作用。站在嫌疑犯和法官之间的，是帕里斯的小外甥女阿比盖尔与其他三个年长的女孩。如果被告的眼神飘向被施咒的人，她们就会尖叫起来。她们安静下来后，法官就会宣称她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卡里试图搞懂沉默和出神之间的区别，他不能理解帕里斯所说的，即女孩们是被超自然的力量制止说话。“你们谁去碰下被告席上的犯人？”哈桑询问。最勇敢的人还没走三步就晕倒在

地。哈桑命令她继续前进，一旦触碰测试成功，她就会被宣布已治愈。“我发现，法官们很是理解这种举止。”卡里讽刺地说，他自己无法察觉女孩们行为的任何变化。她们到处走动，几次接近他的妻子，询问她的名字。临时审判室是个混乱的地方；在其间，卡里与相识多年的约翰·黑尔探讨他面对的困境。这位贝弗利牧师建议私下会见伊丽莎白的原告，他会帮忙安排见面。卡里指挥过船舶，他懂得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便把这件事委托给了黑尔。

伊丽莎白的原告就是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然而，帕里斯不会同意黑尔向卡里承诺的在牧师住宅进行的面谈；他的外甥女只会在英格索尔酒馆见这对夫妇。卡里一家沿着马路走到熙熙攘攘的酒馆，发现约翰·印第安在那里伺候他人进餐。那天是开庭日，酒馆里充满生气；审判——街区的居民为此出门，法庭官员为此享受丰厚的买酒津贴——是对英格索尔的馈赠。约翰称自己被施了魔咒；他为讨得一碗苹果酒，向卡里一家讲述自己的故事，还展示身上的伤口。在先前的一次审判上，法庭官员用绳子捆绑嫌疑犯的双手。可约翰的手也跟着神奇地合在一起，被一根紧得勒进肉里的绳子捆住。他告诉这对夫妇，他的痛苦与提图芭毫无关系，后者是一个已认罪的女巫，在监狱里关了近三个月。在他叙述期间，一群女孩鱼贯而入，“像猪一样跌倒在地”，卡里指出。她们像是一个疯狂的杂技团，自法庭休庭后就不曾分开。有人招呼女人过来安抚她们；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女孩们表态。她们恢复过来后，异口同声地喊道：伊丽莎白·卡里折磨她们！一名官员立即从隔壁聚集着法官的房间里走出来。他持有逮捕令。无论黑尔牧师有没有默许，卡里一家都踏进了陷阱。

伊丽莎白·卡里前去塞勒姆洗刷罪名，却在那里受到审讯。哈桑和科温似乎没有回避往常的做法，他们命令这个查尔斯敦的女人站起来，

伸开双臂，转过脖子，以免折磨姑娘们。有两个人指控她。她说，她从未听说过这两人。她的丈夫询问，他是否至少可以扶住妻子的一只手；哈桑拒绝了这个请求。伊丽莎白哭了起来。她身边的丈夫可不可以擦去她眼里的泪水和脸上的汗水？哈桑允许了。房间里十分闷热；伊丽莎白感到头晕目眩。她可以倚靠着丈夫吗？哈桑厉声说：“她既然有足够的力气折磨这些人，也应该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船长痛斥这种残忍手段；哈桑命令他保持沉默或离开房间。下一个出现的是约翰·印第安，他在地满打滚，但他几个小时前才与伊丽莎白·卡里一起坐着喝苹果酒，不应当会受她的超自然力量的影响。

哈桑求助于那些被施咒的人：是谁折磨了约翰？她们声称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伊丽莎白·卡里。哈桑又开始触碰测试，这已是经常使用的手段；在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他敦促嫌犯紧握双手，越握越紧，直到结果产生。在测试中，嫌犯常常被蒙住眼睛。人们认为，他人的触碰可以使女巫眼睛里发出毒素，进入到他人的身体里；而蒙眼的绷带可以使受害者不受女巫注视，使女巫重新吸收自己的毒素。让嫌犯忧虑的是，诺伊斯尤其赞同这种做法。哈桑命令伊丽莎白触碰约翰，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他；法庭官员小心翼翼地把着她的手。约翰抓住她的手，然后一把将这个查尔斯敦女人拖倒在地。看着妻子被粗鲁地拖倒在地，旁边躺着个印第安奴隶，卡里船长大为震惊，匆匆讲了一番话。当法庭对他的妻子出示逮捕令时，他只来得及说那么几句话，希望上帝会报复这些无情的法官。卡里还费尽力气给她找一个过夜的房间，里面没有床，但即使有床，她也会彻夜不眠。

第二天，伊丽莎白·卡里与玛丽·埃斯特及其余六人被送往波士顿监狱。这是菲普斯归来后的第二次女巫押送。他记得，他在星期一命令所有嫌犯都要被拴住，但根据狱卒的详细记录——因为被告承担从稻草、

毯子到铁链的一切监禁费用——囚犯的手脚早已被戴上镣铐。清教徒的惩罚是公开、迅速且意在教化：新英格兰的监狱并非为长期关押而设计，惩罚需要观众。罪犯被判处这样的刑罚：“如果下一个训诫日天气晴朗，他就要带着足枷坐着听上一小时。”这不是为了宽慰他的痛苦，而是为了必不可少的观众。整个社区都会因罪犯的罪行而受苦，他的救赎对他们内心的安宁至关重要。

那个5月，波士顿监狱也拥挤不堪；大多数被告都被安排在那里过夜。通过垃圾和腐烂伤口所发出的恶臭，这座由石头砌成的建筑在远处就能彰显自身的存在。监狱附近的居民要和罪犯一起受苦。拜访者也不会停留太久。在邻近的营房里，至少有部分塞勒姆嫌犯会相互恐吓对方。还有一些人恐吓过路的人。铁栏杆封住了敞开的窗户，里面的人可以伸出手拿食物，外面的人可以伸手进去抚摸爱人的手，也可以冲里面吐唾沫、嘲讽；有些人正出于此目的来到监狱。5月，有个十七岁的女仆趁外出办事去看莎拉·古德，却被这个塞勒姆的女乞丐认出，后者恳求对方给她一根烟。古德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几乎遮不住身体。女孩朝她脸上砸过去一把刨花，回答说：“这把烟草对你来说已经够好了！”古德大声咒骂她，与五个月前诅咒帕里斯家的孩子所起的效果如出一辙。随后，少女开始叫嚷和昏厥，症状持续了数周之久。

监狱里冷得难以想象，冬季天凝地闭，以至于当局常常无法解释将犯人关押其中是正当的。他们曾把一个打着寒战的犯人送回家，后者在1678年攻击一位警官。1685年12月，哈桑的父亲将一个偷马贼派遣到巴巴多斯岛当仆人，他确信，这个人如果继续关在监狱里，一定会在受审前冻死。大风吹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海洋的湿气渗透所有地方。1692年的冬天更为寒冷，女巫们却无法乘船去巴巴多斯岛。她们往往不会被给予太多的仁慈。（据说，那位脾气暴躁的波士顿狱卒虽然人模人样，

却有着“老虎的凶猛和暴躁”。他两次用额外的木材和锁加固监狱设施。）根据法律，囚犯必须得到亚麻或大麻制的卧具、面包和水的供应。没有人认为提图芭或莎拉·古德会在监狱里挨过好几个月，监狱里使虱子滋生的条件、令人厌恶的囚禁空间——这绝不是为长期驻留而设计的——使其变成了“活人的坟墓”。1689年，在这座新英格兰最为复杂的建筑里，被免职的安德罗斯和他的检察总长发现，下雨时，他们的牢房里至少会积水六英寸 ^[9]。在大多数的昏暗时刻，女巫嫌疑人都在挨饿，她们创造了一份悲惨的殖民地记录。一些家庭成员——包括托普斯菲尔德的治安官——付出大代价，花上一整天为受监禁的亲属送去食物、饮料和新亚麻布。一位受到指控的伊普斯威奇妇女的女儿们每周都带着失明的父亲去探望两次。

塞勒姆监狱与波士顿监狱相差无几。四百平方英尺的监狱包括一个昏暗无光的地牢，约翰·伯勒斯在那里度过了春天和夏天；他只感到自己就像被“活埋”了，和安德罗斯手下一位被关在更大牢房里的官员一样。在早期，监狱被形容为“不适合基督徒呼吸的恶臭之地”。一个牧师的儿子发觉自己的状态正逐步恶化，感到自己将被冻死，“几乎被自己的粪便和监狱的臭味毒害了”。他声称，没有人能忍受“如此恶臭”。十个星期以来，天气寒冷，他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镇上的木匠威廉·敦顿管理着塞勒姆监狱。敦顿似乎解决了所有讨厌的差事：监视那些企图提早逃出集会的男孩，在验尸陪审团中任职，还负责征收税款。他和家人住在今天的华盛顿街上，在那里，他妻子向囚犯们兜售点心。一年前的一天，她为两个囚犯送酒，却无意中帮助他们逃离监狱，自此以后，那里就加强了安全措施。（越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但对腿上铐着八磅重脚镣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越狱的。）六十四岁的敦顿接到一个讨厌的任务，他要搜寻巫师身上的蛛丝马迹，并用针戳破身上的疤痕。对此，乔治·雅各布斯保持镇定，毫无感触，这又是一项罪证。

纳撒尼尔·卡里设法让妻子不被关进波士顿监狱。特权被赋予富人阶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收买狱卒；有观点认为，狱卒从管理监狱中取得的钱财，比从英国最好的一英亩玉米地中得到的收成更多，波士顿狱卒似乎印证了这一看法。菲利普·英格利希最后被捕时，宁愿支付四千英镑住在狱卒家中也不愿住在监狱里。5月24日早晨，伊丽莎白·卡里被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坎布里奇监狱。她因为腿上戴着沉重的镣铐而不断抽搐。她的丈夫认为她活不过第二天，那一天，全省为了叱责撒旦而实行禁食。卡里一再请求移除八磅重的铁链，却被多次告知，他的妻子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必须戴着镣铐。她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可怕的威胁。

5月底，至少有六十名嫌犯入狱，超过马萨诸塞所有监狱能容纳的人数。那些冬日里瑟瑟发抖的人开始在闷热的春天里热得浑身发烫。这一情况急需解决，被告也希望结果早日落实。5月初，为虔诚的丽贝卡·纳斯所写的请愿书已经散布出去；三十九名村民签上自己的名字。她会从经常来看望她的家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那个星期到来的人中包括她再次被捕的妹妹。与此同时，抱怨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抵达两个星期后，菲普斯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审理塞勒姆的案件，他的这一命令只提及闷热的监狱，而非数量庞大的女巫。他任命九名法官，而法庭开庭需要达到五人的法定人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曾担任过法庭上的职务。作为商人和地主，他们也构成了马萨诸塞湾的领导阶层。因为自身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有资格坐上礼拜堂最重要的位置。他们当中没有蛊惑民心的寻宝者，都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当时，不仅仅有试图推翻教会的女巫团体在搞破坏，一般的嫌疑犯也一样猖獗。

令人宽慰的一点是，巫术符合某些亘古不变的规律。它发生在家庭

之中，多发于母系成员的身上。名声一旦被玷污，便很难恢复过来；即使罪行早已被人遗忘，这种耻辱却依然留存。一个苏格兰女人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像一个无罪释放的女巫一样苟活于世。她的家人与她断绝关系，朋友也不再与她往来。一名被判无罪的查尔斯敦女人不被允许从附近的水井取水，只得喝水坑的水。偶尔偷盗的布里奇特·毕肖普无法摆脱让自己出名的名字。对大多数控告她的人来说，她仍是“好人奥利弗”。她每周要给波士顿狱卒缴纳两先令五便士费用，还是被呼为“布里奇特·毕肖普，又名奥利弗”。^[10] 尽管马萨诸塞有了新总督，其人民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仍是靠继承而来的。公民领袖就由公民领袖来培养。每个城镇里都至少有数个行政委员成长于行政委员之家，而在塞勒姆，几乎四分之三的行政委员都继承父辈的职业。审判巫术案的法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商人或牧师的儿子。科顿·马瑟、约翰·哈桑和威廉·斯托顿都重演了父亲的角色。他们很难回避已然功成名就的家长，就像很难回避三十年前发出警告的人一样，他警告说猪会在黎明前四仰八叉，不想竟一语成谶^[11]。

菲普斯在建立审判法庭（the 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时，集中了他所谓的“最审慎且影响非凡的人”。这些陪审成员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方面的正式培训。他们当中有两人被培养成牧师。三人毕业于哈佛学院。至少有五人是商人，一人是业余医生。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连串头衔。积极的巴塞洛缪·格德尼拥有塞勒姆的一个码头、一间造船厂和缅因的几个锯木厂，他此前就拜访过牧师家的女孩，还参与案件预审会。作为塞勒姆居民，哈桑和格德尼要确保当前的法庭审判和他们前四个月的审判密切关联，保持一致。他们坐在塞勒姆第一教堂前排执事前面的长凳上，一起聆听希金森和诺伊斯布道。他们参加过帕里斯的神职授任仪式，也回应过村民们不间断的抱怨。斯蒂芬·休厄尔的书法流畅优雅，他拿着墨水罐和鹅毛笔继续担任法庭书记员。他整理好文件，装进

文件盒一并在晚上带回家，而帕里斯的女儿可能仍住在那里。帕里斯重新开始讲道。坐在法庭上座的菲普斯任命威廉·斯托顿担任副总督，几周前，后者抵达塞勒姆参加伯勒斯的审讯。

法官们需要费尽心力，可从中赚得的钱财却与一位杰出的教师无异，亦是1694年印第安突袭的幸存者在波士顿用十张作为战利品的头皮换钱所得的两倍。对于所有富裕的法官来说，这点钱无足轻重。没有人对菲普斯的选择吹毛求疵。他所聚集的人员是无可挑剔的。在那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就连新英格兰政权的相关词汇也在不断演变，殖民地现在成了一个省，治安官（marshal）变为警长（sheriff），二十八名总督顾问成了参事会成员——这一点令人感到宽慰。这些人在马萨诸塞游历甚广，是市政和经济方面的领袖，也是民兵组织的领导。他们是马萨诸塞第一批移民的儿子（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女婿），均为名声显赫之士，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新英格兰的新特许状中。他们坐拥数十万英亩新英格兰的土地。虽然没有人经历过像1692年这样案件集中爆发的审判，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判决巫术案的经验。

法官们一宣誓就职，就请求得到他人的指导。他们的任务是根据英国和马萨诸塞不同的法律体系来确定罪行，但他们无法完成这一目标。他们自然会求助于现有的专家。法庭上的九名法官中有四人是科顿·马瑟的密友，包括六十七岁的约翰·理查兹，他是波士顿的商人，曾为如何定罪这一问题征询过意见。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政府的方方面面。那个月，马瑟在日记中表达了狂喜之情，现任总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他亲自洗礼的人，而且，“省里所有参事会成员都是我父亲提名的；我岳父、几个亲属和我教会的几个弟兄都是其中的成员。”

在陪审员聚集前，法庭就发出十一份新的逮捕令。原告似乎对大部分被告都不甚熟悉，仅能从姓氏辨别他们。然而，在5月28日逮捕的嫌

疑人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六十六岁的约翰·奥尔登，他是波士顿海一带的船长和商人，为人锋芒毕露，是普利茅斯一个奠基者家庭的长子。跟着马萨诸塞最强的兵力，奥尔登刚从缅甸归来，他去那里为从约克被带走的俘虏谈判。奥尔登与巫术案法庭的三个法官同属一个教会。他和塞缪尔·休厄尔格外亲密，长期以来都在与他的岳父做生意。在几个村民的控告下，5月31日，这位极具开拓精神的奥尔登被带上塞勒姆的临时法庭，出现在他朋友和同伴面前。

新任命的检察总长托马斯·牛顿也出席了审讯，借此了解审判法庭在6月2日首次开庭时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审判的顺序由牛顿决定。斯蒂芬·休厄尔或许给过他建议；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塞勒姆的人和案件。首席法官斯托顿召集十八个“诚实的合法人”担任大陪审团成员，四十八个人担任普通陪审员。他们都来自附近的社区。他们将于星期四早上8点到达镇上的公所。“巫术”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他们的传讯中，但他们知道任务的性质。他们被从一群为人所知的地方领袖中挑选出来，都是法庭上的老手。他们赢得这一席位，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而不是因为他们刚正不阿；他们将为审判带来了极为珍贵的社区知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审理其他案件。

托马斯·牛顿是圣公会教徒，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可对殖民地来说，他还算是个新人。牛顿像塞勒姆村前牧师德奥达特·罗森一样是个世故之人。他也像罗森一样被眼前之景吓得目瞪口呆。或许是为了自身利益，哈桑再次测试原告，安排奥尔登在没有警卫控制的情况下出席审讯。船长佩戴着剑，大步走进村礼拜堂，隐秘地站在人群里。然后，哈桑要求女孩们找到折磨她们的人。她们犹豫了一下，接着指向房间里的另一个军人。奥尔登后来指出，大人们的一点暗示帮到了她们。（他留下了审讯过程的记录，多数人没有机会这样做。）与先前一样，在黑漆

漆的礼拜堂里，事情变得模糊不清。奥尔登被命令站到屋外，女孩们围着他排成一圈，发出嗤嗤的冷笑声。有一个女孩——很可能是小安·帕特南——嘲笑他不够顺从。此人竟敢在法官面前不脱帽子，真是太大胆了！

女孩们了解了奥尔登在马萨诸塞和缅因的大量经历，他在两地待过很长时间；据估计，自从1688年底以来，他往返边境至少有十六次。他非常熟悉这片领土。他的岳父拥有缅因的锯木厂；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奥尔登曾英勇参战。他与瓦巴纳基人交易，并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这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约克袭击事件。他为缅因驻军提供补给物资，人们一直怀疑他宁愿做武器交易，也不愿赎回俘虏，把自己的事业置于公共事务前面。他奉命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军火前去谈判。2月时，奥尔登在约克谈判时将瓦巴纳基人描述为“熊和狼”，但实际上，他对他们的看法不仅限于此。果不其然，被施咒的人指控奥尔登向敌人出售军火。她们讥讽道，“他与印第安女人睡过觉！”他还用剑折磨过那些女孩，现在他被解除了武器，这让他很气愤。执法官带他出去等候审讯，审讯可能在英格索尔酒馆进行。无论关于他牟取暴利的指控是否属实，他确实在缅因的浓雾和嗜血成性的印第安人间如鱼得水，而其他人在那里家破人亡。

奥尔登的审讯暂停了几个小时，其间，哈桑传唤被帕里斯的外甥女和十八岁的苏珊娜·谢尔登指控的玛莎·卡里尔。卡里尔来自一个性急鲁莽的家庭，而她现在要独自维护家庭的声誉。女孩们指控她与一个幽灵黑人交往，当哈桑问及那个男人时，卡里尔哼了一声。除了那个穿着黑袍的黑发执法官，她没有见过其他黑人。按照指示，她一进房间就要与他对视。哈桑要求她转向那些女孩，但不能使她们丧失活动能力。“如果我看她们的话，她们就会伪装。”她反对说——这是“伪装”这个词第

一次被使用。历经劫难的苏珊娜·谢尔登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她问卡里尔是如何谋杀十三个人的。女孩们在形容房间里的幽灵时浑身发抖；她们抱怨着展示被戳在身上的针。卡里尔没有看到鬼怪吗？哈桑问。“即使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她嘲笑道，她的话过于准确。女孩们尖叫着说她撒谎。

目前尚未出现关于卡里尔的飞行和招募新女巫的消息。人们也不清楚真的是否如卡里尔的孩子作证的那样，魔鬼答应让他们专横的母亲“成为地狱王后”。但是，检察总长仍对女孩们看到的异象、她们身上的针和她们的痛苦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盯着人们的脸”，私下扫视。“你竟然在意这些失去理智的人，这真是可耻！”在混乱升级为危机之前，卡里尔就发现这种混乱的严重性，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女孩们性命难保。哈桑下令绑起卡里尔的手脚，将她强行带走。牛顿或许在骚动中听到玛丽·沃尔科特的话——几个月前，玛丽向德奥达特·罗森展示自己手腕上的咬痕——她告诉法官，卡里尔吹嘘自己已经当了四十年女巫。当时，卡里尔正值三十八岁。

当天下午，约翰·奥尔登返回礼拜堂。为了方便他人观看，哈桑命令他站到椅子上，这本身又是一种羞辱；女孩们似乎在惩罚她们的长辈。随后，一位执法官按住了他的双手。奥尔登可没有那么容易保持沉默。他笨拙地站在高处抗议道：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塞勒姆村伤害这些他既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人呢？五十二岁的塞勒姆商人巴塞洛缪·格德尼催促他坦白。奥尔登回应说，他无意用谎言来取悦魔鬼。他要求陪审团拿出他施过巫术的证据。哈桑安排了一次触碰测试：奥尔登一碰到被施咒的女孩，对方就平静了下来。那天，在牛顿所看到的奇异之事中，最非同寻常的可能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格德尼坐在礼拜堂前面的位子上，承认自己认识奥尔登多年。他们两人曾一起航行。他们还是生

意伙伴。在奥尔登曾被指控与敌人勾结时，格德尼就为他爱投机的同僚辩护过。现在，他却告诉奥尔登，他“一直认为奥尔登是诚实之人，但他当前有理由改变想法了”。他不能无视触碰测试。在数十年的忠诚土崩瓦解或变得棘手时，这场危机也就达到了高潮。作为同一个波士顿祈祷小组的成员，塞缪尔·休厄尔也选择不为奥尔登辩护。要知道，他的家人曾放心地委托奥尔登驾驶他们的船横渡大洋。现在，事情发生了某种剧变。

除了对曾经的伙伴表示遗憾，奥尔登无话可说。他相信上帝会洗清他的罪名。就他而言，他会“与约伯同行，至死坚持自己的正义”。他是这样一个人——在获准与被印第安人俘虏的新英格兰人短暂接触时，他增强了俘虏们的信仰，让他们相信，若印第安人阻止他们祈祷，他们就是在为基督受苦。他服从命令看向原告，看着她们突然倒在地上。他质疑说，他的目光丝毫没有伤害到格德尼，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老朋友没有屈尊回答。奥尔登就无辜者面临的困境展开激烈的论述，却被诺伊斯牧师打断，后者开始他那冗长的发言：船长您可知何为天意？奥尔登还向格德尼发出最后的呼吁。“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坚持说，“这些针对我的发言，没有一句是真话。”那天晚上，人们没收他的剑，捆绑起他的双手，将他送往波士顿监狱。

那一天格外漫长且令人疲惫不堪，托马斯·牛顿惊叹道，若非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向殖民省秘书长（the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e）报告：“这是我目睹的最为怪异之事，实在难以置信，但对于观众来说却并非如此。”人们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离开时确信奥尔登和其他人一样与巫术有牵连；他担心这一阴谋甚至已经波及上层人士。漫长的审讯也使牛顿重新思考自己的审讯策略。被告的名字使人们或发出哀号，或如被扼住喉咙，或恍惚出神。女孩们久久地躺在地上，

就像死了一样。这导致审判的进程十分缓慢。此前，他已经传唤了九个嫌犯；现在，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对这么多人提起公诉。他向大臣提出两个请求：他请求招供者——提图芭和科温法官的大家族中的一个仆人——与被告分开上路；同时，他也要了1680年布里奇特·毕肖普巫术案的审判记录。

同一天，科顿·马瑟匆匆忙忙地写了一封精心构思的信，这封信由七部分组成，几乎没有涂改之处。他急于写下自己的想法，甚至没有去那间被他大肆吹嘘的藏书室查阅资料。四十八小时后，审判法庭即将开庭；他现在要为法官们分忧。法庭向牧师征求意见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作为法庭上最年长的法官，约翰·理查兹向牧师寻求帮助更是不足为奇。其他法官显然也有疑问。上周日，作为唯一与英克里斯·马瑟的影响力相当的波士顿牧师，塞缪尔·威拉德专门对魔鬼和辨别魔鬼的方式做出解释。威拉德肯定地说，魔鬼这个老骗子通过巫术诱惑折磨他人，使邪恶之术奏效。他不错过任何机会招募女巫，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招到人，因为他承诺给她们“世上的万国”——威拉德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这也是默茜·刘易斯引用过的话。

六十七岁的理查兹和他的多数同僚一样拥有许多头衔：他是行政委员，也是民兵上尉。他从来不怕事，哪怕事情本身不好解决。此前，他就接受了1681年前往伦敦进行特许状谈判的任务，而威廉·斯托顿对此则是千方百计地躲避。在异国，作为殖民地代表，他需要卑躬屈节，力证马萨诸塞湾的动乱只是无意之举！长期以来，理查兹都是北方教堂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他是教区里给牧师薪酬捐款最多的居民。反过来，科顿·马瑟也会就教会的事务征求理查兹的意见，理查兹在这些问题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也是亲密且乐于助人的北端区居民，在马瑟家被大火烧毁时，他让他们暂住到他那富丽堂皇的砖砌房子里。当时，科

顿·马瑟只有十几岁；十年后，理查兹还主持了他的婚礼。所以，马瑟愿意为理查兹效劳也在情理之中；马瑟曾向理查兹保证，理查兹的愿望永远是他会遵从的命令。对于当前的谜题，马瑟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省都为了法官而禁食和祈祷，人们把自己交到了他们正义的手上。马瑟搬出了他最爱用“瑞典”的案例，称“那里耸人听闻的巫术与我们的如出一辙”。他自己开始担心魔鬼所玩的把戏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最近那些疯狂的咕哝”给了大骗子充分的机会介绍自己，并向人询问：“你愿意让我为你效劳吗？”无辜之人接受了他小小的恩惠，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他的圈套。“我必须谦卑地请求，”马瑟发出危险信号，清清楚楚地警告：“作为最值得托付的人，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时，不要过分强调单纯的幽灵证词，使它超出所能支持的限度。”

他触碰到问题的核心，回答了塞勒姆法官从一开始就纠结的问题：魔鬼可以冒充无辜者吗？被告可以仅凭只有一些人才能看到的证据而被起诉吗？这种想法曾在1676年纽伯里案件中令当时的法官感到不安，而马瑟对此不予考虑。当年的法官无法宣判被魔鬼恶意冒充的嫌犯有罪。马瑟则认为，所谓无辜的嫌犯其实也是魔鬼伪装的。那些沉溺于“恶毒、妒忌”之举的人即使没有见过他，没有签署任何契约，也很容易成为他的同盟。马瑟警告，如果假定只有罪人受蛊惑，就正中魔鬼阴险的诡计。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警告说，可靠的供词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种种供词的可靠程度都不尽相同。“神志不清的大脑，或怏怏不平的心”可能会导致错误结果。他也无法纵容用酷刑逼供的做法。他建议法官们轮番向嫌犯快速抛出问题。若此路不通，他便支持传统的策略：被告可以背诵主祷文吗？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受过口吃之苦的人，他对“战胜口齿不清的女巫”满怀信心。他相信诸如木偶这类的确凿证据。女巫也可

以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木偶操纵，例如，她触摸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使受害人的眼里露出痛苦的神情。尽管他自己从未见过女巫，但一个技艺高超的医师可以认出女巫的标记。^[12] 他支持浸水测试^[13]；魔鬼给新招募的女巫注射毒液，使她们振奋精神。^[14] 他既没有提到触碰测试，也没有提到邪眼。

每一次，他都选择宽大处理。与其铐住每个可恶的女巫，为何不考虑减轻她们的惩罚呢？当然，这或许还可以强求她们“立场鲜明、公开地断绝与魔鬼的联系”，以顺利地将那个老骗子赶出街区。这时，他发觉自己讲错了话；他这是在给一个长辈、一个家族的恩人写信。他为自己的操之过急道歉。他会为理查兹和他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祈祷，祈求他们能明智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棘手问题”。他这封信写得漫无边际，但有一个观点说得很清楚：他不相信那些只有被施咒者才能看到的、关于幽灵的证据。无辜之人可能会毫无知觉地受到利用，使他人达到邪恶的目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在他人想象中犯了罪而被定罪。

马瑟曾经在书房里遇见过身着白袍、扑闪着翅膀、微光闪闪的天使——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还会发现上天给他的建议、担保和启迪——所以，毫不意外，他也赞同存在看不见的世界。“我们的好邻居饱受折磨，对无形之物十分熟悉，而这些事情后来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他坚定地说。在人们看来，处决一个“将手里的剑刺向邻居心脏”的人是完全公正的做法。换句话说，马瑟使法官确信，他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显而易见的伤口——约翰·印第安的伤疤、默茜·刘易斯身上的咬痕——不容忽视。理查兹有充分的理由与同事分享马瑟的智慧，他们在随后的几周里参阅此前巫术案的判例，阅读理查德·伯纳德（Richard Bernard）的《大陪审团成员指南》（Guide to Grand-Jury Men）和约瑟夫·基布尔（Joseph Keble）关于判例法的专著，也研

究了格兰维尔、巴克斯特（Baxter）和珀金斯的作品，还有马瑟的《难忘的天意》。他们受命维护英格兰的法律；过去，他们正是因为违背这些法律而付出代价。理查兹去寻求教会的意见，不是因为缺少法律方面的指南，而是因为资深的法官知道他身边有权威的人士。他的牧师对巫术的问题有着十足的把握。至于理查兹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北美最杰出人才的代表们，却对塞勒姆的事情大惑不解。

此前，波士顿也有审理死刑案件的经验。因为嫌犯和证人的数量众多，巫术案的审讯更适合在塞勒姆的镇公所举行，那是一幢坐落在露天广场上的两层砖石建筑。在马瑟写完信的第二天，理查兹便去了那里，为一大早的开庭做准备。因为治安官选任了陪审团，牛顿的九个嫌疑人——七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又回到了塞勒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被运送过去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在已经拥挤不堪的监狱里找到容身之处，但他们很快就突显了自身的存在。星期三，全身透明的丽贝卡·纳斯与老安·帕特南在监狱转移人员时有过交谈。她吹嘘自己杀了很多，此言受到身边一群幽灵的支持。小安·帕特南举报了相应的幽灵的名字。

村中的人纷纷猜测牛顿会最先审哪个女巫。如果帕特南家族认为那个人是纳斯，他们就想错了。牛顿没有选择危害最大的犯罪主谋，他要让她在波士顿的监狱里痛不欲生。他也没有选择第一个被指控的女巫，他已罗列了一系列对她不利的证据。第一个嫌犯，不是已经招供的女巫，也不是塞勒姆村民。牛顿是个头脑冷静、眼光敏锐、果断利落的政府官员。他像所有老练的检察官一样选择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案件，这将为未来的诉讼铺平道路，向所有人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将提醒作恶者，配合法庭才是精明之举。他将安抚紧张的陪审员，罪行很容易就会

被确立。他也将向法官证明，定罪并非难事。至于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可以稍作搁置。

牛顿来到塞勒姆以来，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甚至在先前从未提及这个名字的女孩口中，他也听到了这个名字。他的第一个被告虽然身陷囹圄，却仍在折磨他人。此人参与过帕里斯家草地上的集会。她已经杀了六个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有个已经招供的女巫暗示她与案件有牵连。她的案子可以不依靠与幽灵相关的证据来论证。她威胁法官，向哈桑担保，如果自己是女巫，一定不会放过他。她的小家庭中没有像纳斯家人那样的好斗之人。牛顿可以从早先的巫术审判中找到一系列不利于她的证据。法官和一群低级官员前往塞勒姆时，牛顿准备正式起诉布里奇特·毕肖普，指控她在五个女孩身上施展巫术。人们对这个生活1693年的查尔斯敦女性的评语，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脾气暴躁、扰乱治安的小偷：穿着有道口子的大衣，配合着幽灵般的脚步，四处走动；“如果世上有女巫，她就是其中之一。”

星期四黎明时分，幽灵降落在塞勒姆各个角落。此后不久，一群人开始聚集在塞勒姆镇公所带长廊的二楼。一所学校占用了一楼的空间；楼上的大房间里配有长椅。法官们坐在长桌旁的高凳上掌管局面。那天早上刚过8点，牛顿就站在首席法官威廉·斯托顿面前。斯托顿问：“上帝保佑你。作为检察总长，你是否发誓，你会竭尽所能，尊崇法律和正义，忠实地代表陛下行事，而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呢？”牛顿发誓他会。作为书记员，斯蒂芬·休厄尔也宣誓就职。一名很可能是治安官的法庭官员宣誓十八名陪审员就职，后者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将决定案件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继续进行审判。牛顿提出了针对毕肖普的证据，指控她曾“伤害、折磨村中的女孩们，她用针扎她们，将她们折磨得日益消瘦”。女孩们镇定自若地出庭作证。牛顿可能展示了毕肖普

先前的其他案子的证据；此次她出庭受审，是自身的罪行所致，也是自身的性格所致。陪审团——其主席是伯勒斯从前的连襟——对毕肖普提出了五项正式控告。

与此同时，她迫不得已接受了一次深入彻底的检查。在一名外科男医师的监督或指导下，一群女人搜遍六名嫌疑犯的全身，寻找女巫的乳头。几个检查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接生婆。17世纪的专著在论及分娩的问题时，往往忽略更翔实的细节；接生婆——她们通常是来自显赫家族的老年妇女——对身体机能知之甚少。女人们在搜身时所能获得的指导亦少之又少。跳蚤咬的红斑、疣、痣、任何隆起或变色之处都可以算作乳头。康涅狄克的一个妇女小组检查了三遍同一个女人的身体，却未能就她们的发现达成一致意见；她们不相信嫌犯的身体构造与自己的有何不同。一个看热闹的康涅狄格人也有同样感受。在仔细检查了从绞刑架上砍下的尸体后，她肯定地说，如果受害者身上的标记是异常的，那么她自己也是女巫。在新英格兰，解剖学上的知识仍然十分原始，在1676年的一次尸检过程中，从尸体上取出的心脏被认为是胃。

接生婆探测、按压着身体的敏感区域，用大头针或缝衣针测试人的敏感度；当三英寸的针扎进去身体时，你是多么希望自己会流血。一个不得不接受这般粗鲁对待的贵格会女人发誓，她在教会成员手中受到的虐待，比生五个孩子时更为严重。虽然塞勒姆检查员之间意见不一，但她们确实找到几个犯罪标记：牛顿的三个嫌疑人的“阴部和肛门之间有异常的赘疣”。^[15] 它们异常突起，所处位置很不自然。它们在三个女人身上出现的位置完全一样，从逻辑上说，这就意味着是巫术。毕肖普便是三个嫌犯之一，她还认识其中的几个检查员。

法官坐上座位后，治安官押送她进入法庭受审。法庭书记员叫出她

的名字；她走上前去，举起手承认自己的身份。法庭宣读了对她的起诉。她如何申诉呢？毕肖普没有辩护律师，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早期的新英格兰不欢迎律师。（更确切地说，律师不喜欢早期的新英格兰。他们的价值直到七年前才被承认，当时，新英格兰要求伦敦方面派送几个诚实的律师过来——如果诚实的律师确实存在的话。^[16]）牛顿是屋子里唯一受过培训的律师。有人认为，无辜者有办法使自身境地好过其他人；若任其发挥，真正的罪人是无法用阴谋诡计来隐瞒真相的。六个星期以来，五十多岁的毕肖普在肮脏潮湿的监狱里仅靠微薄的口粮度日。她的衣服也早就破破烂烂。站在法庭前面，她憔悴肮脏，心灰意冷，在散发着酸腐气味的屋子里被细细打量。她不承认罪名。“犯人，你将如何受审？”书记员问。毕肖普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将由上帝和我的国家审判。”

法律规定，法庭案件必须严格记录在案；斯蒂芬·休厄尔坐在法官面前，将羽毛笔蘸上墨水，像预审时的帕里斯那样拼命记录。休厄尔在那天或1692年毕肖普之后的任何一场巫术审判中记下的东西都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三十年来针对毕肖普的证据却都代代相传。她曾经受过审判，后来被撤销了死刑；尽管这一次她的处境似乎更危险——她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心生畏惧的集会——但她不相信自己是个女巫。她一为自己辩护，证人就宣誓自己所说“都是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有一个人说，她从纺车上被拉下来带到河边，毕肖普威胁要淹死她。另一个人报告，毕肖普曾吹嘘自己杀了人。第三个人则描述了一个受害者的鬼魂。许多人——包括小贝蒂·帕里斯和小安·帕特南——讲述她们在4月审讯上遭受的折磨。其他人作证说，毕肖普的触碰使女孩们苏醒过来。

《申命记》中犯罪案件需要至少有两个证人才能定案的关键要求已经被满足。蒂丽芙伦斯·霍布斯发誓说，毕肖普用铁棒打她，逼迫她收回供词。她们一起参加帕里斯家草地上的“女巫集会”。陪审员听取了村民的

证词——村民们曾刺中形似毕肖普的影子，而毕肖普的衣服上出现了一道裂口。很显然，她和幽灵是同一个人。

任何嫌疑人都能被说成是迷惑邻居、折磨村中女孩的人。初审期间，毕肖普被认定多次在法庭上说谎，她能因此而被定罪。她的个人历史是原告用以起诉的资源宝库，其中一些证词从未在法庭上呈现。苏珊娜·谢尔登举报说，毕肖普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女巫；她曾跪在一个戴高帽的黑人面前祈祷；一条蛇钻进“她的怀里”，它是与她共居的妖精。牛顿没有采用这一证词。在法庭上，人们听到的可能是更切实的事件：四年前，毕肖普不仅因为被控偷窃而站在哈桑面前，更在监狱中待过几个星期。镇上的一个磨坊主控告她偷了一块黄铜。她归还后两次下跪，乞求对方的原谅。在1688年的审判中，她同样被要求承认这项罪行，但她否认了一切。她称是自己在花园的角落里除草时，偶然发现了黄铜。她从未道过歉。当时，这个最令人恼火的女人让哈桑大为受挫。

法庭听审了其他的一些指控，它们均与邪恶的阴谋、小红书和小偷小摸的行为无关。牛顿召见了一个水手，他讲述道，有一个安息日，太阳刚刚出来，他就被吵醒，发现毕肖普站在床边。她微笑着朝他头上打一拳，就从窗口消失了。那天中午，她让他手中的苹果飞了出去，穿过房间飞行至少六英尺。十二年前，她“低声发出威胁”，在房子周围推倒了帽匠塞缪尔·沙特克的儿子，拿大头棒打他，使他彻底丧失理智。

（这是一个毫无戒心的家庭，有个访客看了一眼孩子后曾发出警告：有个女巫就住在附近。）1688年，她与磨坊主的儿子发生纠纷，因为她付给了他正在消失的货币。她还使他的马车陷入一个突然出现的坑洞之中，随后便消失不见。她对一袋谷物施了魔法。她悄悄穿过紧锁的大门和禁闭的窗户。这些指控都不是最近才提出，许多都是从她早先的审判中积累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指控涉及了三代人。大量古老的指控被重新

翻出，新英格兰的空气似乎在刺激和维持它们，使它们随着岁月流淌变得越来越难以消除，完全违反自然规律。

毕肖普知道自己引起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镇民们都相信她是女巫。她也绝对知道自己因其他原因而心绪不宁。4月，塞勒姆的治安官曾提到一次夜间拜访；6月，陪审团听闻这样的夜间拜访至少还有五次。毕肖普似乎习惯流连于年轻男人的卧室，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说话，这些症状通常与另一种“魔法”手段有关。她放荡轻佻，在男人的心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他们可以准确地回忆起她的衣着。磨坊主的儿子作证说，几年前，她去拜访他时百般示好，但这种爱意并不恰当。他描述了她那镶着彩边的俗艳红色大衣；毕肖普跳上他的床，拍了拍衣角。塞缪尔·沙特克举报说，她常常借莫须有的理由拜访他，甚至摆出“圆滑、谄媚的姿态”。她的嘴唇，贴上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的嘴唇。虽然她不可能看到6月2日的记录——休厄尔只把她看作一个“老女人”——但她曾经可能美艳动人。^[17]

塞勒姆的裁缝约翰·劳德作证说，在一个月夜，他与毕肖普之间发生了持久的缠绵。后来，她声称自己对卧室的幽会毫不知情；她不打算为男人的幻想负责。此后不久，在一个安息日下午，劳德因为生病回家，却迎来一个可怕的访客：一只黑色怪物从窗户外跳进来，站在离他几英寸远的地方。它与提图芭在炉边碰到的妖精是表亲，有着男人的脸、猴子的身体、公鸡的脚。它大声说，它过来是为了控制劳德。作为交换，它答应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你这个魔鬼，我要杀了你，”裁缝发誓，试图抓住这只生物，却只抓到一缕稀薄的空气。飞猴和劳德又僵持几个回合，其间，劳德弄伤了自己的手臂。那生物从窗户外跳进来，又从走廊紧锁的门里钻进来。它诱使裁缝走到外面。就在他使劲赶走它的时候——他大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在你我之间！”——发现毕肖

普从她的果园里监视着这边的情形。最终，妖精从树上起飞，瞬间尘土飞扬，果实纷纷下落；此前，毕肖普数次与蛇和苹果躺在一起。

在4月19日的审讯上，毕肖普难以置信地摇头，她在审讯中激动不已，甚至恳求房间里的人为她洗刷罪名。（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在偷盗黄铜的案件中，她曾在法官面前就证词大闹法庭。劳德说出打落苹果的妖精的故事时——这使他三天都说不出话来！——她陷入了深思。她虽然没有律师，却有权质问原告。她甚至都不认识劳德！有人提醒她，他们的果园互相毗连。多年来，他们总是争吵。无意间，她发现了17世纪体系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自证其罪不成问题，质疑证据却是有风险的做法。正如法官斥责先前的一名嫌犯那样，他的“回答对一个明显有罪的人来说是冒失而不恰当的”。

在重新审理的针对毕肖普的指控中，有一份证词胜过了一切。它恰巧也是最早的证词。十七年前，她雇了两个工人来拆除房子里的一堵墙。墙里竟埋着几个破破烂烂的木偶，它们已经丢了脑袋，身上插着针。毕肖普被逼着解释，却无法给出合理的回答。6月2日，她试图为自己辩护，但进展甚微。她被催促着快点招供，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法庭上的拙劣谎言，低声发出的威胁，各种各样的魔法手段，谋杀和卧室造访，它们都是一回事。只要有木偶、大衣上的裂口、毕肖普身上神秘的标记，牛顿就有了物证。他还收到了另一份礼物。大约就在审判前一天，毕肖普在押送途中经过空无一人的镇公所，她抬头看了一眼这宏伟的木制建筑。突然，一块木板从楼上掉下，在地上翻滚了一段距离。

[\[18\]](#)

审判开展得顺利而迅速。毕肖普虽然可以对陪审员的选择提出异议，却无法追问他们的意见。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审判程序上的要点无须讨论。法官对证人的预先审查是不存在的，对证词的诘问也不存

在。法官代表双方审问嫌犯和原告。证人按照计划陈述证词，这不仅是因为很多证词先前已经被公开发表；毕肖普似乎无法对此争辩或干扰陈述。那些被施咒的女孩虽然痛苦，却似乎相对平静。马瑟后来在法庭文件中写道，法庭掌握的罪恶远多于他们知道要如何处置的罪恶。他没有费心去描述毕肖普最初在法庭上受到的指控，因为“几乎没有机会证实巫术的存在，尽管它对所有旁观者来说显而易见且恶名昭著”。

17世纪的地方法官会毫不犹豫地告诉陪审员他们的想法，以及评估证据的方式。他可以引导他们认定被告有罪。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强烈的嫌疑也能给被告定罪。一个人的声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表面上不相关的证词，最终会在法庭上对毕肖普不利。如果罪状可能成立但没有确凿证据——“合理怀疑”在未来近两个世纪仍然存在——那么判刑也可能相应调整。你被判的罪行可能轻于被起诉的罪行。斯托顿在最后陈述中总结案情，提醒陪审团他们将验证这些证据。那个下午，他也提出一些指示。陪审员们将无视那些女孩强健的体魄。毕肖普的意图本身也是要紧的。法庭不需要证明巫术是否使人遭受伤害，只需要证明巫术已被施展。那位严肃而备受尊敬的首席法官解释道，这就是法律的意义。他的指示使至少一位观察者感到惊讶。他们全然不顾马瑟5月31日提出的建议；不顾权威的英格兰专家珀金斯的论点；不顾新英格兰的司法历史。

斯托顿很可能在下午3点时做出判决。尽管陪审员没有毕肖普的供词，他们还有其他许多确凿的证据。陪审团主席站着宣布决定：毕肖普在4月19日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村中五名女孩实施巫术，因此被判有罪。苹果树上的妖精、卧室的造访和木偶或许让毕肖普实施了巫术。然而，陪审团认定的罪行只包括她对女孩们的折磨。更久远的历史无法被证实。所有人都目睹了法庭上女孩们所受的折磨。在塞勒姆这个

异常的节点中，法庭因毕肖普迷惑了不认识的村中女孩被定罪，而非因她在城里诱惑男人。 [\[19\]](#)

4点不到，无望的毕肖普回到监狱，女人们不得不对她进行第二次脱衣搜查。毕肖普身上离奇的赘疣已经无迹可寻，这证明她在白天与恶灵有过交流。事实上，三名嫌疑人的标记都神秘消失了。下午，丽贝卡·纳斯身上的隆起物已经缩成干燥皮肤上的一个斑点。它的变异证实了它罪恶的本质；显然，她哺育过一个邪恶的小妖精。（在她的预审会上，哈桑询问过关于伤疤的问题。这位当上曾祖母的女性回答：“我身上只有岁月留下的痕迹。”）至于苏珊娜·马丁这位矮小而傲慢不恭的埃姆斯伯里寡妇，她的乳房在早晨丰满挺拔，到了下午却变得又小又瘪。她也在白天哺育妖精。纳斯对此感到气愤；最有经验的接生婆也不同意同伴们的看法。纳斯可以解释，她身上的畸形变化都是辛苦劳作的后果。多年来，这为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她没有去过男人的卧室，没有把自己变成妖精，没有撬开公共建筑的木板以偷窥。然而，6月3日，法庭还是因为她对四名村中女孩实施“某些可鄙的巫术”而起诉她。

与此同时，哈桑和科温继续在村中签发逮捕令及受理村民的投诉。那个星期，塞勒姆的治安官在一架纺车旁发现了一名新嫌犯，他迅速将她抓往当局。找到四十岁的安·多利弗本应轻而易举，因为她就和孩子们住在他父亲家里，她的父亲是塞勒姆镇的老牧师——圆脸、鹰钩鼻的约翰·希金森。（多利弗的丈夫是格洛斯特的船长，早已抛弃了家庭。）多利弗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牧师。签署逮捕令的三个人都是她父亲教区的教徒，她的检查员们也是她的哥哥是新任命的治安法官。像阿比盖尔·霍布斯一样，多利弗是个漂泊的人，与继母关系不和。正如一位塞勒姆居民所说，她因为忧郁而长期心灵受创，“她已经失去理智”。

作为牧师之女，她在法庭人员的眼里是多利弗夫人。大概是出于对她家人的尊重，哈桑私下里和气地审问她：有没有施用过巫术？“没有怀着伤害别人的心思用过巫术。”这一回答令人不安。她也许在犯蠢，但她也的确为人天真。深夜，她睡在树林里。她离家出走只是为了躲避继母。在女孩们的劝诱下，她又透露了另一些古怪之事。她有木偶吗？哈桑问。她有两个蜡制木偶。大约十四年前，她认为自己被施咒了，就做了这两个木偶。那时，她能感受到明显的拧捏感。（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被女巫拧捏的感觉。）她在一本书里读到，她可以逆转咒语。

无论是在记录中还是现实中，她的父亲都是一个强硬而直接的人，他“说话柔和，但观点强硬”。过去，他有力地抨击贵格会教徒，表达自己对教义、饮酒的流行、王家总督权力的滥用、不服管束的塞勒姆村民的意见。他的布道不会刻意提到邪恶之物，当中不会有受困感，也不耸人听闻、狂热好斗——正是这些元素使帕里斯或马瑟的布道大放异彩。六年前，希金森接受了一个事实：他再也收不回镇民的五百镑欠薪了，于是他让塞勒姆居民留着这笔钱，但他们需要供养他已成年的子女，镇民同意了，可他们或许没有当时看起来那么高兴。在1692年，他并非最后一个女儿被控施巫的牧师。他似乎也没有反对，即使当时对女儿的诉讼已经传到他家门口。在他竭尽所能服务三十二年的社区中，他的地位不容置疑，尽管如此，他对于巫术还是无话可说。在与安德罗斯争论不休、与愤怒顽固的浸礼会教徒纠缠不止后，1692年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他后来解释，他当时干起活来“已经感到自己年老体弱”。他没有提及在6月6日被监禁的女儿。

三天后，首席法官斯托顿命令塞勒姆治安官在星期五上午8点至中午期间将布里奇特·毕肖普带到指定的处决地，“她将在那里被绞死。”他会随后过来验明执行情况。斯托顿还说了一句话——语气异常

严肃，似乎害怕犯人逃跑——治安官要自担失败的风险。

6月10日上午，乔治·科温——科温法官的侄子，亦是一名巫术案法官的女婿，也是另一位法官的外甥——将毕肖普从监狱里带出来。他安排她坐上一辆开放式的两轮马车，从监狱出发，沿着如今是圣彼得大街的埃塞克斯街向西行去，穿过塞勒姆中心，在波士顿路急转向北行驶，这段路步行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这样的安排旨在尽可能地将已被判刑的女巫受刑罚的消息公之于众；毕肖普将以女巫的身份驶向死亡的终点，以儆效尤。一群全副武装的执法官和治安官跟着队伍，车队嘎啦嘎啦地穿过入潮口，走上陡峭的小路，沿着可以俯视小镇的草地来到一个岩架前。那里，一根绳子挂在新安装的绞刑架上。它的后面是一片美丽风景，有田野、沼泽、海湾、岬角，还有波光粼粼的大海。

尽管围观绞刑的人纷至沓来，与之相关的目击报道却没有留存下来。1659年，许多人涌向一名贵格会女教徒的处决现场，他们返回波士顿时经过的桥在重压之下轰然坍塌。^[20] 1686年，在一个谋杀犯被处决前召开的训诫会上，蜂拥而至的人群差点把第一教堂的旁听席挤垮。有五千人出现在那次的处决现场，有些人甚至是从五十英里外的地方赶来的；他们甚至提前一周就开始集合。女性罪犯尤其引人注目，毕肖普的案子更是如此：谁不想知道女巫长什么样呢？自从四年前，玛丽·格洛弗因魔镇古德温家的孩子而被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以后，这样的处决再也没有发生过了。这一事件不仅因为可怕而极具诱惑力，它本身也被视为一种道德教育。这是你会带着孩子们去看的事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他们还将学到新的五音节词：“憎恶”“教化”“羞耻”“窘迫”和“涤罪”^[21]。狂欢的气氛在各处弥漫开来。

牧师们密切关注着死刑犯，绞刑架上的她们确实证实了家庭管教的好处和法庭的智慧，警告公众不要追随她们邪恶的脚步。很难有话比得上那些最后时刻的自责话语：一个被判刑的海盗后悔自己曾蔑视父母，信奉邪恶，与肮脏的同伴纠缠不清，他的悔恨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女巫不值得被这样对待。她提供不了具有威慑力的动人讲谈，也无法流露净化灵魂的悔意。与此同时，围观的人们都隐隐不安。她会在最后几分钟里坦白吗？

在绞刑架下，一名官员宣读了毕肖普的死刑令。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她甚至在爬上梯子时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有什么能像康涅狄格的女巫一样让人感到纯粹的满足了——她为自己的罪恶忏悔，“以令旁观者极其满足的形式死去”。（她是第一个承认魔鬼契约的新英格兰人。）作为她的牧师，约翰·黑尔应她的要求在绞刑架下说了最后几句话。一个塞勒姆店主嘲笑道，如果其他犯人在处决时请他来祈祷，他一定不会照做；黑尔把他的这番评论当成是一种谴责。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这名店主也痛斥过毕肖普。她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他会很乐意作证指控她。（他的妻子就这样做了。）我们不知道帕里斯是否在场，但很难相信会有当地的牧师缺席，更不用说是签署了四项针对毕肖普的起诉书的牧师。她的许多原告就站在人群中，旁边有被施咒的女孩和村里的大部分人。几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到了现场。一个塞勒姆的妇女看到魔鬼帮乔治·雅各布斯登上绞刑架。玛丽·沃尔科特也看到了雅各布斯，他用他那透明的幽灵手杖打她。法庭的成员则都在波士顿，与总督委员会举行会议。

我们不知道毕肖普最后的遗言，不知道是谁将她的裙角绑在脚踝上，将双手绑在背后，不知道是谁催促她爬上梯子，将布袋罩住她的头，或将绞索套上她的脖子。找到刽子手不是件容易的事。治安官科温

可能自己推了一把毕肖普，她的脖子被绳子勒着，身体剧烈地扭动，不时发出一阵抽搐，终于，她的身体不再晃动，平静地悬挂在半空中。她被缓慢地勒死了；这个结局可能用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达成。绞刑过程不一定安静无声。一开始，可能会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有一次，现场甚至响起令人惊讶的请求：1646年，一个罪犯在绞刑架上吊了一段时间后，问行刑者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有人走上前去，“将绳结往后拧了一下，她一下子就死了”。在一年前的纽约，从被绞架上放下的死刑犯仍然活着。接着，斧头给了他致命一击。围观的群众痛苦地叫喊起来；在随后的一场绞刑中，一英里之外的人也能听到现场观众在罪犯的身体掉落那一刻发出的尖叫声。然后，尸体悬在半空中摇晃了一会儿，人群也慢慢散去。在距离塞勒姆镇另一端数英里远的田野上，人们可以看到毕肖普的尸体。她在中午前死了；科温安排将尸体埋在附近，他原来将这个细节写进了报告中，后来也许是因为这不在他命令的范围中，便又删去这一细节。毕肖普的丈夫似乎不在现场。在她更早的一段婚姻中，她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儿，后者当时只能与母亲保持距离。

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处决了一个讨厌的人，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他们一起陷入一种宣泄情感、收获平静的仪式。他们克服恐惧，再也不会有令人惊慌失措的卧室入侵事件了。正如人们后来观察到的，这些事“怪诞而令人痛苦，但丑闻毕竟是对社会的一种仪式”。马瑟在推销特许状的布道中歌颂的英明执法官——即驱赶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和海上的海盗的当局官员们——正在驱散空气中的邪恶力量；特许状命令他们“屠杀、摧毁、征服”任何企图入侵或骚扰马萨诸塞的人。错事得以纠正，理性得以回归——这确实体现在一个案例中。十年前，毕肖普从床上拉起一个女人，差点将她淹死。这个女人从此以后就有些疯癫，“对自己及周边一切都感到心烦意乱”。毕肖普被捕后，她的情况有所改善。而当毕肖普的身体被吊在绞刑架上时，那个女

人奇迹般地走出了长达十年的精神错乱状态。马瑟会注意到，死刑在整个埃塞克斯县都奏效了，许多人“不可思议地恢复了知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指控和逮捕都不复存在。女孩们看起来没有任何症状，监狱里的女巫也似乎丧失了能力。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都有理由相信自身处于安全之中。

另一个人也可能感到安全。毕肖普被处决后的第二天，五百名瓦巴纳基人和法国人突袭韦尔斯，到处都是叫喊声和枪声，还有燃烧的箭。马瑟后来形容道：“他们就像一群可怕的龙，张开血盆大口走过来，将民众一口吞下。”两天来，一支十五人的队伍抵挡住了袭击者。虽然如此，瓦巴纳基人还是带着一个俘虏逃走了。在毛瑟枪的射程外，他们当着当地人的面脱掉他的衣服，剥下他的头皮，割掉了他的睾丸，切开了他的手指和脚趾，在他断气之前将燃烧着的煤块塞到他的皮肤下面。所幸，乔治·伯勒斯没有遭此毒手，也没有像教区居民一样遭遇骇人听闻的、长达两天的围攻，因为他在波士顿地牢里安然地守着那永恒的黑暗。

年底的某一天，马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那个夏天余下的日子对整个地区来说都一段极其悲哀的时光。”

[\[1\]](#) 菲普斯是否真的看管过羊群，这有待商榷。在一部对比新英格兰历史和以色列地的作品中，马瑟断言菲普斯确实当过牧羊人；马瑟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位殖民地的救星当成牧羊人，哪怕他从没当过。

[\[2\]](#) 沉没的宝藏属于西班牙人，来自一艘有着四十五年历史的沉船。据称，印第安潜水员打捞沉船中的财物时，头罩着桶，一次可以潜水四十五分钟。

[3] 平心而论，那些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能会在四天之内死于天花，但你的死讯可能要花上十五个月才能传递到大洋对岸。玛丽女王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命令马萨诸塞建立一个像样的邮政系统，而她的这封信花了十个月才寄到菲普斯手里。他直接忽视了它。

[4] 他很幸运，因为人们当时并不指望绅士能写好字。书法仍是一门属于书记员的艺术。

[5] 在接受新特许状前，他曾极力反对它。他愤怒地说，他宁可死也不愿支持一份如此阻碍马萨诸塞自由的文件——殖民地更倾向于像从前一样选举自己的官员——有人便提醒他，他并非来自一个主权国家。

[6] 有些人甚至拒绝与新政府支持者来往。1692年，一位居住伦敦的新英格兰杰出公民强烈反对新特许状——他的立场是捍卫旧特许状——拒绝与英克里斯·马瑟乘坐同一艘船去北美。

[7] 硫黄似乎是出现在塞勒姆和波士顿之间的城镇中。法庭的文件中没有这方面的描述。

[8] 菲普斯后来认为，他已经设立法庭来辨别巫术或附身是否在起作用。“附身”一词起先广为流行，后来又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个词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几乎没被提及，尽管英克里斯·马瑟在返回波士顿的那天用到它。他发现这个地区“因为巫术和被附身者”而陷入困境之中。

[9] 一英寸约等于二点五厘米。

[10] 布里奇特曾和托马斯·奥利弗有过一段婚姻，两人之间经常大打出手、闹上法庭，直至托马斯离奇死亡。尽管布里奇特嫁给爱德华

• 毕晓普后随夫姓，但仍被人有意或无意称为“奥利弗”，前面的“好人奥利弗”（Goody Oliver）亦有讽刺之意。

[\[11\]](#) 指发生超自然现象。

[\[12\]](#) 正如16世纪的一位法国医生向亨利四世保证的那样，难以区分魔鬼标记和天然疤痕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13\]](#) 浸水测试（water test，又被称为swim test），是指让巫术案嫌疑人下河，若此人在河水表面浮着，则证明他是巫师，若沉入水底则是无辜者。有部分牧师相信，如果一个人和撒旦勾结，说明他已宣布放弃洗礼，也因此会被水拒绝，只能浮于水面之上。

[\[14\]](#) 马萨诸塞从未尝试过这一实验，尽管在马瑟给理查兹写信的第二天，康涅狄格的一位受到指控的女巫要求做这个实验。这种方法十分古怪刁钻：无辜之人唯有几近淹死才能为自己洗脱罪名。

[\[15\]](#) 关于这些标记的用途，人们有些困惑。17世纪有个强大的英国猎巫首领解释道，魔鬼是幽灵，他不需要人血。那些突起的乳头不是为了提供营养，而是为了刺激女巫，使她记住她的盟约，并让魔鬼进入她的身体，更好地控制她。乳头可以像任何东西，譬如野兔的脚印或老鼠的脚印。有个小册子是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但塞勒姆的人不可能读过。那些检查提图芭身体的人发现了抓痕，它们被认为是魔鬼在他们搏斗的过程中留下的。

[\[16\]](#) 马萨诸塞法官中唯一受过法律教育的成员——在制定马萨诸塞第一部法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曾留下一份遗嘱，可由于它太过晦涩费解，法庭在多年的争论之后选择无视它。直到1704年，马萨诸塞才允许律师执业收费。

[17] 毕肖普的证词验证了萨默塞特·毛姆的妙语：“一个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但如果她长得不漂亮，那么这对她也没什么好处。”马瑟在他的记录中忍住不去做任何影射，亲吻的场景便也不会被提及。

[18] 我们所能得到的记录都来自马瑟，在他的描述中，毕肖普在隐身恶魔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件事。

[19] 毕肖普似乎被与另一个不愿配合的嫌疑人混为一谈，这让她的处境更为悲惨。约翰·黑尔作证指控另一个毕肖普；他的证词却被错误地用在布里奇特·毕晓普身上。

[20] 女人站在梯子上，被蒙上了脸，束紧了裙子，她被缓期执行死刑。桥上有六十名观众受伤。

[21] 这五个词在英语中都是五音节词汇。

第七章 现在他们宣称总共有七百多人牵涉其中

或因自然已赋予了女性太多的力量，以至于法律明智地选择反其道而行。

——塞缪尔·约翰逊

总督菲普斯称赞塞勒姆拥有一群最好、最聪明的法官，在这一点上，他并没说错。这批法官博览群书，游历四方，正直诚实，对于法庭的工作机制非常熟悉，并深知在法庭工作的经历是在新英格兰追求财富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1] 他们中许多人做过不顺民意的判决。其中有些人还曾在伦敦见识过审判。在各自生活的城镇，他们住在最漂亮的砖厦和带有三角墙的宅邸中。虽然搜寻证据给指控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在17世纪，指控是享有一定特权的。那时的一场英式审判是法庭质询式的，往往是一场非正式、形式自由、同时急速而狂热的对决，对此最贴切的描述是“一场被告与原告之间相对自发的口角”。在庭上，证据的标准是模糊的。嫌疑人直到踏入法庭才知道有哪些针对她的证据，而在法庭上，她可能会被指控犯下另一桩罪，而非一开始被控诉的那一桩。她有权为自己辩护，但可能会被置之不理。申明自己无罪几乎无用。一起盗窃案的被告在历经两代人的时间之后仍坚称“我不是贼”。“你必须证明你不是。”法官回答。一篇重要法律论述建议向被告的仇敌取证，因为这些人“会怀着偏见刺探方方面面”。他们是宣誓为控方作证的唯一证人，所以他们的证词更加有力。谣言大行其道，这也解释了在审判毕肖普时，塞缪尔·沙特克何以为一位通过占卜称毕肖普魔

镇一个孩子的陌生人作证。此人还坚称附近住了一位吵闹不休的巫婆。这时沙特克才想起，他的妻子曾与毕肖普吵架，后者扬长而去，口中念念有词。此后不久，沙特克的儿子就病倒了。这个陌生人与那种凭直觉便猜出你最近遭受磨难的算命者并无甚不同；她永远都是对的。巫术仅是辅助，有时是在犯罪之前，有时是在罪行犯下多年以后。在1692年，许多陈年龃龉被翻出并大做文章。在那一年的夏天，你绝不希望自己出现在邻居的梦中。

至少五个人参与了对布里奇特·毕肖普的判决。除了其中三人，其余皆身份不详。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聆听了此案的审判。那三个人都是从哈佛学院毕业的，毕业时间大约两两相隔十年。相比于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一个更加世俗化的职业。^[2] 塞缪尔·休厄尔为人亲和，体格魁伟，他是身份可循的三人中唯一有耐心留下一本日记的人。关于塞勒姆巫术一事，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却鲜有记录；整个6月，休厄尔都没有记日记，保持沉默直到7月中旬。或许他认为，过些时候更容易对此事大书特书。休厄尔是一位会花一个早晨的时间思考青少年精神危机的父亲，他总是担心自己“造成了太多危害却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并一直致力于扭转这个局面。他在朋友们的指责中渐渐委顿；而令他惊骇的是，在1701年，科顿·马瑟在一间书店里声嘶力竭地谴责了他——大街上的人都能听见马瑟的咆哮。（翌日休厄尔试图用一块上好的鹿腿肉安抚这位盛怒的朋友，但是他失败了。）休厄尔甚至写了一封诚恳的催款信。他不恰当地将自己与岳母相比。休厄尔的一举一动都是精打细算的，因此，同僚们怪罪他见风使舵，可谓合情合理。尽管当局有时令他不适，他却并未自然而然地反对它。即便他不乐意，当他亲爱的朋友和伙伴、同为巫师案法官的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对他施压时，他还是屈从了，在最后一刻同意缓期执行一名海盗的死刑。在审判巫术案之前，他从未判决过类似案件。

毕肖普被绞死两天后，休厄尔坐在了波士顿老南教堂的长椅上，聆听塞缪尔·威拉德的午后布道。其他几个法官与他同席而坐。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马萨诸塞的奠基者家庭之一的子孙，在近旁坐着，彼得·萨金特亦是。那天下午，威拉德的话既令人放心，又心生不安。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为背景，他提醒他的教徒，要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魔鬼遍布，急于发难。对于虔诚之人，他却报以最大的恶意。威拉德重申了马瑟的千禧年观点：当恶魔时日无多，就会上演最终极的疯狂。威拉德指出，魔鬼能随意化身为任何人，而不需要与人签署任何契约。威拉德呼吁善意和同情。他还认为，有些事情应该交给上帝裁决。

首席法官斯托顿认为以下这种可能性是说不通的：即不经允准，亦未签订契约，人们依然可以使用巫术。斯托顿当时六十岁，是毕业于哈佛的三位法官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有一种能及时从常人难挡的争端中抽身的天赋。他远比休厄尔强硬，并且深谙法律的强制执行力。马萨诸塞的法律条款详细并明确地列举了种种罪行，但谈到法庭程序时可能并不透明。一方面，法庭倾向于宽大处理。而另一方面，危害整个社会的犯罪行为应被迅速检举指控。然而省内正面临空前的危机。此前它从未遭遇过巫术横行之祸。即使是那些对清教制度漠不关心的人都感到震惊。对纽约圣公会教徒而言，这事倒有些好笑，毕竟科顿·马瑟两年前便曾警告说撒旦处心积虑欲颠覆清教徒占据的殖民地，如今想来真是如同先知。现在看来，魔鬼似乎的确令马萨诸塞的人口数量锐减。据纽约教徒报道，有一百多名嫌疑人被关押，其中大多数是教会成员、长老和执事。一位牧师在监狱里去世，另一位牧师的女儿亦是。还有一位牧师的妻子被指称为女巫。这些不幸的人迅速彼此出卖，以至于“现在他们宣称总共有七百多人牵涉其中”。（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毫不夸张的是，入狱的女巫数量超过了新英格兰史上被定罪的女巫数量的总和。）

对斯托顿这样的人而言，仿佛他所信任的一切都已岌岌可危。这种恐惧在整个新英格兰肆虐开来。6月22日，康涅狄格也建立了巫术法庭，以解决其内部的一场巫术蔓延。

推动新英格兰的法律执行堪称一项神圣的事业。法官谨慎待之，查阅权威的法律文本，并按照法律条文行事。然而，在他们之中，分歧仍时常出现。在毕肖普被绞死几天后，另一位从哈佛毕业的法官、五十三岁的纳撒尼尔·索顿斯托尔从审判法庭辞职。索顿斯托尔生长于伊普斯威奇镇，是一位早期海湾殖民地领袖的孙子，更是马萨诸塞的一位常驻法官。他曾与英克里斯·马瑟一道在伦敦为新英格兰游说。他也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民兵上尉，曾在缅因边境服役。原则曾经并可能再次使他犯错；在1687年，他曾拒绝与当时的总督安德罗斯合作，为此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五天。目前还不清楚，索顿斯托尔究竟是对毕肖普的审讯还是对最后的死刑判决有意见。一位观察家后来干脆称其“离开了法庭，并对法庭的诉讼程序十分不满”。无人接替他的位置。

虽然索顿斯托尔设法从法院脱身，但似乎并没有发出公开声明。当一个人开始质疑既定程序，便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慌；从提高警惕到提防被告，仅仅一步之遥。在此之前，马瑟已经紧张地回头窥望，揣测魔鬼什么时候会开始占据他的身体，假扮成他的样子。（这要不了多久。）一位安多弗的治安官在进一步的逮捕前犹豫，对罪行半信半疑；最后他便因此入狱。事实是，在那一年间，关于索顿斯托尔的幽灵的谣言传开了。“不与耶稣和他的工作相合的，便是敌他的。”巴克斯特写道，5月时，帕里斯也引了《路加福音》里的这句。这句话正是对当时情况最真实的写照。

阴谋论总是突然爆发，落到几分实处，然后便销声匿迹，神出鬼没。人人都知道，三十六岁的莎拉·比伯热衷于传播丑闻，喜欢挑拨离

间，是个十足的两面派，然而却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只是眼睁睁看着她先是陪同憔悴的伯勒斯受审，现在一转头便与生病的女孩们同甘共苦起来。当反诉到来时，人们急忙闭嘴，保持沉默。1692年之前，毁谤在新英格兰大行其道。在马萨诸塞最早的巫术审判中，一女因称另一女为女巫而遭鞭笞二十下。“她曾是一名女巫，哪怕她现在不是，将来也肯定会是，所以绞死她总是对的，无论早晚”，遭遇这种荒唐论断的塞勒姆女性起诉对方毁谤并胜诉。在案件中，常常因一女的丈夫指控另一男的妻子，两名男性争执不下，相互攻讦。苏珊娜·马丁的丈夫在1669年妻子的巫术审判后，提起了毁谤诉讼并获胜。

弗朗西斯·纳斯曾在毁谤和造谣的诉讼中胜诉过。可他在1692年并未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失败概率太大。取而代之的是马瑟的告诫：“如果一位天选圣徒的邻居有罪，那么该圣徒便难辞其咎。”在1692年，举报邻居并不会招致恶评；与其被怀疑为同谋，不如指控他人。隐瞒不报本身就是犯罪。此外，通过提供信息，你为社区尽了责。在1692年，此前导致诽谤官司的敌对言辞，似乎都被导向为对巫术的指控。

然而，对巫术案件的质疑已然沙沙作响。毕肖普被处决三天后，总督菲普斯与他的参事会成员见面，其中包括首席法官斯托顿。参事会成员要求起草相应的纲领性文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十二位牧师参与讨论。科顿·马瑟起草联合回应，并于6月15日昭告天下。尽管有些内容像是马瑟在梦里写的，这篇《从若干牧师处咨询归来》是一篇小心谨慎、凝聚了马瑟心力的八段式文章。^[3] 在开头两段中，马瑟承认此次危机的重大，继而歌颂政府的德行。在接下来两段中，他敦促人们要“格外警惕”。谈到程序问题时，他表示：法庭应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中立。类似触摸测试的方法在“魔鬼的手法”作用下很容易被滥用，大家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应该谨慎。同样的，邪眼也绝非完全可靠。不过，马瑟再一次

将英国权威珀金斯和伯纳德视作黄金标准。相比于两周前写给约翰·理查兹的那封东拉西扯的信，他的语调在这篇文章中显得犹豫不决。

在那些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的字里行间，马瑟提醒法官们，在定罪时不能仅仅依靠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证据，毕竟这些只有被施咒的人才知晓。关于这点他已经说了很多，并会在今夏贯彻下去。对于巫师嫌疑犯，还是应该多作权衡、思虑周全，恶魔可能会附身于一位无辜之人，甚至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这确凿无疑，人所共知”。倒数第二段颇为奇怪，马瑟猜想，倘若法庭不把那些所谓的证词当真，这场灾难会不会就此止息。但如马瑟1692年的每一篇巫术陈述的写法，“然而”接踵而至——接下来，他变了一副脸孔。他的“非常关键和格外的谨慎”在五段文字之后变成对“迅速和有力的指控”的赞成。据称，“按照上帝的指引，以及英国健全的法制，有些人因使用巫术而令人厌恶”，牧师们于是同意了对这部分人的指控。马瑟始终保持模棱两可，但他坚持以下两点：一，他们的情况非常特殊；二，新英格兰的地方法官是在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对于在魔鬼问题上的前后矛盾，马瑟未来会向人们多次致歉。

相比之下，其他神职人员更令人信服。同年6月，一位名叫威廉·米尔本的浸礼会传教士向马萨诸塞参事会递交了两份请愿书。米尔本有段时间曾在缅因的萨科传教；也许是伯勒斯的困境引发了他的不平。（从各个方面考虑，人们都应该提防自己的朋友。米尔本的抗议可能会让人们认为伯勒斯是一名浸礼会信徒，那么他不仅仅是异端，而且几乎和贵格会成员一样危险。）米尔本指出，“一些颇有声望、名誉清白的人”，正因巫术指控而被打入大牢。他们犯了莫须有之罪。他督促法官不要轻信那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否则，他们便悲哀地陷入株连无辜的危险之中。米尔本请愿时已有一个合法的学位，以及一段捕鲸生涯。他来自一

个爱惹麻烦的家庭，自己也是个麻烦精。他与教友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纠纷不断。^[4]

总督菲普斯下令逮捕米尔本，此事便成波动不安的1692年的又一个浪头；菲普斯和米尔本曾是同盟，与同一群朋友携手并进。米尔本曾在反叛前总督安德罗斯的行动中助菲普斯一臂之力。6月25日，米尔本被召唤前去解释他的“具有煽动性和诽谤性的文章”。因他强势地“对公共司法监管进行非议”，法庭让他在两条路中选择其一：要么坐牢，要么支付两百镑的巨额罚款。科顿·马瑟曾以相同金额买下他的宅邸和一大片土地。米尔本从此销声匿迹。他被捕两天后，巫术法庭传唤了接下来的八位嫌疑人。这时有一件事变得清楚明了，那就是新英格兰的牧师也许和当地法官有不同意见，但牧师还是愿意相信法官们对巫术案有更好的判断。

清教牧师惶惶于世界末日的来临，王家检察官紧张地筹备案件审理，马萨诸塞农民在琢磨牛的猝死，在他们眼中，所有这些都和同一件事有关：巫术。大脑高速旋转，脉搏重重跳动，脑汁绞尽，血液轰鸣。如何在指鹿为马的巨大风险之下，说通那些无法解释的不详之事？有人翻箱倒柜，只为找出某种必然存在的模式，冒险跨进信仰与偏执之间，这一中间地带并非巧合，因为信仰和偏执都寄地希望于普遍的、若隐若现的天意。人们这样做只因自己是一名原教旨主义者，一名检察官，或怀着青少年的那种劲头：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无可争议，几近盲目。

在超自然活动或者梦魇方面，没有任何一名巫术嫌疑犯可以与布里奇特·毕肖普相提并论。其他人牵涉的多是黄鸟、猫、潜伏的狼群之类的事情。五个认罪的女巫——包括毕肖普的女儿——指认她。她的丈夫

指出她的肩膀上有奇怪的记号。她曾用手指给一个熟人喂奶。她的名字在魔鬼之书中出现。她骑着一根杆，去参加伯勒斯在牧师家的草地上召开的“地狱集会”。在另一页记录中，托马斯·牛顿阐述了塞勒姆乞丐莎拉·古德的案子，并满意地指出，被施巫者的证词与犯人对女巫集会的交代是一致的。牛顿依据他为提图芭一案所做的详细摘要，详尽整理出古德一案的来龙去脉：古德肯定去了牧师宅邸。她低声咕哝，孩子们就病倒了。此外，只有受害者和同伙可以看见女巫。古德看见了奥斯本，因为奥斯本的法力没有她强。因此，检察总长推断古德“肯定是一个女巫”。蛛丝马迹拼凑在一起便严丝合缝。

牧师对陪审团的呼吁刚刚公布之时，莎拉·古德又开始用巫术折磨别人了。6月28日，苏珊娜·谢尔登在大陪审团面前身形扭曲，她所提交的证词称，就在两天前，古德对她又戳又拧，还差点把她掐死。古德捆牢她的双手，来了两个人才把她救下；他们得知，十八岁的苏珊娜双手遭人禁锢，这已经是两周里的第四次。还有一次，有把扫帚被缠在苹果树上；而在病情发作间隙，谢尔登称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从桌上偷走一只茶碟。她目击古德将茶碟拿了出去。普罗克特家的女仆也在大陪审团面前痛苦扭动；谢尔登解释说这是因为古德袭击了她。莎拉·比伯发誓说古德魔镇了她四岁的女儿。帕里斯亦在3月的预审会上以女孩们所受的病痛起誓。针对古德的审判立刻开始，陪审团对她发出至少三项指控。虽然古德和比伯年纪差不多大，看着却十分苍老。几个星期以来，她已衣衫褴褛。若说之前她只是像个女巫一般喃喃，如今的她全身上下都像极一个女巫。自2月起，她便与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起身陷囹圄，并且，还与濒死的奥斯本同处过一段时间。

古德寄希望于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初会选择站在一排黑袍法官面前。但庭审记录中她的表现与其

说是无望且三心二意的否认罪行，不如说是冗长的絮叨。在这个节骨眼上，认罪与否已无关紧要。女孩们咄咄逼人，铁证如山，她的提审和审判过程延长超过两天。结束时，陪审团判她有罪。对此，一位来自波士顿的观察员感到些许惊讶，并对塞勒姆一刀切的程序化解决方法做出了评价：在他看来，“同样的证据，对一人适用，对其余所有人也适用”。

当时，约翰·黑尔和德奥达特·罗森都在场，可他们对莎拉·古德皆只字未提。科顿·马瑟也没有。古德是她所在社区的负担和威胁，还满腹牢骚，所以并不值得关注。针对她的指控主要是神鬼之事。接下来的一周里，大陪审团听取了八件巫术案，庭审陪审团则听取了五件，其中遭到指控的两名巫婆才是更令马瑟感兴趣的人。倒没有同伙牵连出苏珊娜·马丁，尽管这位来自埃姆斯伯里的七十一岁老妪相当刻薄，曾不屑于巫术魔镇女孩之说，甚至暗示是那些女孩自己施展了黑魔法。不过马丁已经受过一次巫术指控了。有证据表明，在毕肖普的审判过程中，她一直照顾着一个小恶魔。在毕肖普案中，牛顿法官不但可以获得受害女孩们的支持，连那些受到巫术折磨的男人也成了他的拥趸。治安官们一共找到了十二名受害男子。他们不必通过一阵阵发作来表达看法，相反，他们的证词直截了当、说服力强且连贯流畅。

马丁也折磨着睡梦中的男人。她咬了咬手指，然后变成了一只黑色的猪。她对付动物最有一套；法官听闻了溺亡的耕牛、发疯的奶牛、萎靡的牲牛、会飞的小狗、由狗变身的小桶和杀人的猫。马丁的存在也解释了其他怪事，毕竟她足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做到这些呢。有一个索尔兹伯里的男人已被恶魔附身两年有余。其间有六个月，那些恶魔让他无法开口说话。现在，他发誓说，在恶魔们举办的地狱集会上，有人拿来一本书让他签字，以换取“所有他能想象到的美好的事物、人和去处”，他曾在集会上见过马丁。在多年前一个周六晚上，一名五十三岁的男子

在回家时迷路了，即便他离家不过三英里远，还走在明亮的月光下——他把这归咎于马丁：他刚走过马丁家的农田，便栽进一个此前绝不存在的沟里。

苏珊娜·马丁还在教堂座位问题上一再纠缠不清。她拼命与人讨价还价。她与自己的姐夫吵架。据许多人生动地回忆，她对那些在1669年指控她的人极为鄙视。当一名索尔兹伯里的木匠获准参与庭审，声称自己相信马丁是个女巫，马丁发誓说“她身上的恶魔很快就会把他带走”。第二天晚上，杀人猫突然出现，在睡梦中扑向他的喉咙。一个索尔兹伯里妇女早先向大陪审团作证后，马丁便在她出来挤奶时故意吓她。她咒骂道：“你竟敢在法庭上污蔑我，我要把你变成这世界上最悲惨的生物。”两个月后，在忧郁的情绪中，这名妇女开始胡言乱语。医生宣布她遭到魔镇，并持续了二十年之久。^[5]

所有事情都因果难辨：马丁是像布里奇特·毕肖普那样，因曾受审而态度强硬，还是因态度强硬而受审？巫术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针对巫术的指控亦催生了女巫般的行为。对巫术指控的回应都是恶言恶语，这至少解释为什么马丁的一些话没经过思考就被说出来。马丁老早就被挑选出来，成了指控对象；而1692年无疑是翻旧账的好时机。一旦问题出现，我们便筛选出答案。一旦到了将罪恶归咎于谁的时候，人人都胸有成竹；毕竟，直到布里奇特·毕肖普将她身边沸沸扬扬的传闻告诉磨坊主的儿子，后者身上才发生了怪事。6月29日，虽然马丁在审判过程中一直挑衅和蔑视法庭，但她究竟对原告或法官说了什么，并没有被记录在案。“她一直抗辩称，”科顿·马瑟基于那些已经遗失的记录表示，“她的一生高尚而虔诚。”这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表现。陪审员表示同意，判她有罪。数月后，马瑟拿着法庭文件，对这位他素未谋面也不会相见的苏珊娜·马丁施舍了最后一句话：“这个女人是世界上

最为无耻、下流、邪恶的生灵之一。”

那个星期的另外两个案子则彰显了自然恩怨和超自然恶作剧的力量。伊丽莎白·豪来自托普斯菲尔德，针对她的证据如一组童话故事般惊奇：跳跃的猪、有毒的芜菁、自动倒空的容器、消失的栅栏柱、致人失忆的苹果等等。她的案子与马丁的有两个关键的不同。她有个姐夫的牛被萝卜毒死，而另一个姐夫则拥有一头会跳跃的猪。当伊丽莎白在5月被指认时，曾到第一个姐夫那里寻求援：他可以陪她去塞勒姆吗？她的丈夫双目失明，无法成行；而她不想独自一人前去。她也清楚，一旦疑云升起，便会散播四方，难以消弭。她的这个姐夫答曰，在其他情形下，他一定会心甘情愿陪她去的。可这个时候，他要划清界限。他如是与她讨价还价：“如果你是一个女巫，告诉我，你已变成女巫多久了，还有你做过什么坏事。你说了，我就陪你去。”第二天傍晚，他家的母猪在空中跳跃了三英尺到四英尺，“接着转过来，尖叫，倒下，死了。”

在有关伊丽莎白·豪的审讯记录里，科顿·马瑟没有注明相比于之前的嫌疑人，五十五岁的她具有明显的优势，即不少于十二个人为她辩护，包括两名牧师。她忠于承诺，处事公正，信仰虔诚，绝对是一位好基督徒。她丈夫的家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她；九十四岁的岳父讲述了她对失明的儿子是多么用心，总是温柔地牵着他的手。她料理农场的上上下下，还照顾他们的六个孩子。一个伊普斯维奇的鞋匠作证说，豪没有说过那些原告的坏话，在她看来，他们伤害他们自己甚于伤害她。原告证词的真伪令人怀疑。罗利的助理牧师自发陪同豪去拜访一个据称是被她魔镇的十岁女孩。那孩子先是抽搐几下，可在那前后，她都没有说过豪的一句不是。牧师在场时，她甚至握了握豪的手。豪伤害过你吗？“没有，从来没有，”那孩子回答。后来，牧师陪着孩子坐在门外。孩子的哥哥从楼上的窗口喊道：“说那姓豪的女人是女巫！说呀！”

同一天，莎拉·怀尔兹上庭，而塞勒姆的陪审员们早就听说干草和绳索被施咒的事。她尤其受到亲戚们的恶语攻讦。当整个怀尔兹一家仍在悼念前一任女主人时，她出现得未免太不逢时，所以很容易就成了众人攻击的目标。虽然受到家庭的局限，但是从地理上看，妇女仍是新英格兰的流动人口；她们是闯入镇上的陌生人。怀尔兹的儿子正是那位数周前围捕霍布斯一家，然后将他们押送到塞勒姆的托普斯菲尔德治安官。“从那时起，我便很认真地想过很多次，”二十八岁的以弗瑞姆·怀尔兹在法庭上说，“是不是因为我抓了他们（霍布斯一家），他们才指控我母亲。”报复似乎是说得通的；在逮捕霍布斯时，他认为自己“几乎看到复仇写在她的脸上……她凶狠地看着我”。豪和怀尔兹无疑坚称自己的清白，因为她们以为那时仍有可能被判处缓刑。一般说来，她们对法庭质询的回答，既不完全像圣女贞德不屈不挠的“以前，人们因讲真话而被吊死”，也不像是《绿野仙踪》中的桃乐茜回到堪萨斯时瞪大双眼说的“难道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对豪和怀尔兹的指控中，恶魔集会或恶魔契约没被提及。两人都有辩护人，怀尔兹还是个虔诚的教徒。但是，飞天猪、被施咒的干草和胡乱挥舞的镰刀还是给法庭留下深刻的印象。陪审团判定，这两名妇女都有罪。

马瑟决定不对那个周三审判的另一桩案子进行记述，对此案件的嫌疑人——一位从未和“无耻、下流、邪恶”等形容词扯上关系的女人——他也只字不提。1692年之前，从没有人指控丽贝卡·纳斯使用巫术。她从未在法庭出现过。自从执法官几周前到她家后，她那体量与影响力同样庞大的纳斯家族便开始为她辩护，没有哪个家族比他们更为团结一致。在他们这样一个家族里，连襟们争相救援，而不是催促被告承认使用巫术。弗朗西斯·纳斯大力游说村民，带着请愿书走访家家户户，坚称他的妻子如未出生的婴孩般无辜，正如3月妻子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五个女孩和两个成年妇女指控她。三十九个村民签署了纳斯的请愿

书，尽管它未能释放他的妻子，也没能让他的妻子免于两次残酷的身体检查。签名者中有塞缪尔·西布里（他妻子做了巫术蛋糕），七名帕特南家族的成员（包括一开始指控纳斯的原告之一），一个生病的十一岁女孩的父亲，以及四个聆听纳斯诉苦的教徒中的三个，其中包括哈桑法官的妹妹。（帕里斯坚称纳斯有罪，他的外甥女是起诉书的四个签署人之一。）还没有哪一桩案件，能将整个社区变得如此分裂。^[6]

弗朗西斯·纳斯进而发动更具有针对性的攻势。6月29日，陪审团听取了针对他妻子及控告者的证据。一位村民发誓，格里格斯医生的女仆声称自己参加了上个月的地狱集会，其实是在说谎。一位前几周一直陪伴在丽贝卡榻边的邻居指出苏珊娜·谢尔登证词中的不实之处。据苏珊娜说，女巫们将她腹部朝下拖过草地，越过石墙，好像她是一条蛇——不，苏珊娜是自己翻过墙去的。苏珊娜还说，她曾骑着一根杆飞去波士顿——不，是魔鬼带着她凌空而去。一对贝弗利的夫妇曾在几年前雇用过帕特南家的女仆，他们认为这位十九岁的姑娘很喜欢撒点小谎。弗朗西斯·纳斯毫不客气地对刻毒的莎拉·比伯发难；因为在后者邻居的眼中，她要不是与那些发病的女孩站在一边，早就成了巫术案的指控对象。她与丈夫关系恶劣，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她说话下流，一生气就会痉挛发作。三个村民指责她“不守规矩，为人蛮横”。信念坚定的纳斯证实巫术指控想要表明的事情：其实人人都干过坏事。

丽贝卡·纳斯的丈夫用尽一切办法将妻子与那些超自然事物撇清关系，令针对她的巫术指控站不住脚。一名受害孩童的双亲作证说，他们孩子的死亡完全是因为“致命的高热”，与巫术无关。尽管纳撒尼尔·帕特南与纳斯夫妇就两家相邻的土地争论不休，而且一开始指控丽贝卡的就是他的侄子，他仍为丽贝卡辩护。帕特南认识丽贝卡多年，知道她是一位虔诚的曾祖母，抚育了一个和睦、虔诚的家庭。她虽与邻居有些龃

髭，却从未被指沾染巫术。可以说，丽贝卡尽其所能，让混乱不堪的巫术审判回归常理。审判重新召开之前，她提出了一个请求。她已遭受过两次残酷的身体检查。陪审团中有经验丰富的女人——“陪审团中年龄最长、最富才能、最为谨慎之人”——与其他人意见相左。大人们可否派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审判我的案子？纳斯提出了几个人选。同时，她的两个女儿证实，她多年来受分娩并发症的困扰，但是“女性检查员们似乎认为是其他原因”。

法庭上气氛紧张，但是受害的女孩们成功以其病症说服了陪审团。在一场审讯中，她们曾被针刺穿的嘴唇现在被紧紧合上；安·帕特南在豪的审讯上，从掌中又拔出了一根针。审讯丽贝卡·纳斯时，莎拉·比伯双手紧握膝头，痛苦哀号：那女巫刺伤了她！不巧的是，纳斯的女儿一直盯着比伯，看见她从衣服里拽出一根针，猛刺自己。有一次，法警护送阿比盖尔·霍布斯和蒂丽芙伦斯·霍布斯来到法庭。在监狱里时，纳斯就认识这对来自托普斯菲尔德的母女。她们在这儿做什么？她吃惊地问。同样的问题一再地困扰着她。帕里斯的外甥女声称，无论如何，纳斯一定曾在神圣之地就座，主持了一场神秘的安息日仪式，只不过是在魔鬼身旁。

出于谨慎考虑，有人倒戈了。老安·帕特南是纳斯一案最初的原告之一。有一次，当着德奥达特·罗森的面，安和纳斯的幽灵就《圣经》发生争执。在早前3月举行的纳斯的审讯上，安全身僵硬如同木板，她的丈夫只好将她带走。而在周三的这场审讯中，老安·帕特南根本没出现在法庭上。纳斯一案不涉及什么会飞的苹果，至多就是一句诅咒：她曾咒骂一只游荡的猪。纳斯一家在社区中颇具声望；所以，希望虽然渺茫，却是切实存在的。经过短暂的商议——在此期间，纳斯留在庭上，神思恍惚，隐约感觉到周围的吵闹喧哗——然后陪审团回到座位上。斯

托顿请陪审团发表裁决。他们的决定震惊全场。首席陪审员站起身，宣布被告无罪。原告们狂吼着，面露狰狞，淹没了纳斯家族成员们如释重负的叹息。法庭外，反对声不绝于耳。不是每个人都希望纳斯胜诉，尤其是颇为震怒的法官们。一名法官表示很失望。另一名发誓要尽其所能，重新起诉纳斯。

斯托顿转向陪审员。他没有打算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但是，他们是否认真考虑过纳斯对蒂丽芙伦斯·霍布斯的反应？一见到她，纳斯就喋喋不休，还说出类似“她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样的话。霍布斯承认过自己是个女巫。这样说来，纳斯不就承认了她也是吗？也许这便是招供了？（法官会毫不犹豫地质疑陪审团的决定，但他们更常挑战的是有罪判决，要求对方减刑。质疑无罪释放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对于造成如此乱局，陪审团深感沮丧，所以要求重新审议。对于纳斯一家，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可是对纳斯本人就要好得多，因为她在入狱九周前就已经病重，现在更是半聋状态，无法做出反应了。

陪审团紧闭房门，绞尽脑汁地分析纳斯与霍布斯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纳斯的意思是，她与霍布斯是狱友，还是同为女巫？十二名陪审员无法达成共识；而法庭需要的是一致的决定。首席陪审员一直迷惑不解。他之后解释道：“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她的话。”就两人本身而言，他们并不相互牵连。陪审员重回座席，要求纳斯做出澄清。纳斯站在被告席位上。首席陪审员重复了一遍她说过的那句含义不明的话。根据记录，她曾经发问：“什么？难道这些人现在反过来针对我了？他们曾与我们一道。”首席陪审员问纳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她静静地站着，毫无反应，只是发呆。陪审团等待许久，但没有得到澄清，“于是，”六十岁的首席陪审员几天后透露，“她说的这些话成了证明她有罪的主要证据。”陪审团第三次进行商议。最终，他们交给法官斯托顿一份有罪

裁决。

弗朗西斯·纳斯步步紧逼：十二名陪审员既然已经一致同意证据不足，现在又何以变卦？此外，在与一些懂法人士讨论过后，丽贝卡·纳斯已及时向法院解释清楚。她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说明；她说那句话的意思仅仅是指霍布斯母女是她的狱友。她只是被吓坏了。被指控的罪犯如何能够举证指控他人？（除非他们互为帮凶。）她只是说，霍布斯母女是她的朋友，她们曾共度一段可怕而羞耻的监禁时光。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话会产生歧义。至于她为什么在法庭上保持沉默，她提醒法官，因为她“半聋，而且满心悲伤”。然而，她没有指出是他们误解了她的话，所以没有为自己争取到翻盘的机会。早在3月的审讯上，她已无法准确理解法庭的问题，而她也不是第一个宣称自己听不清的被告。

（指控她的人冷冷一笑，她当然听不见法官在说什么，因为魔鬼正在她耳旁低语呢！）若她听不见诉讼过程，那就不可能听得出自己陈述中的细微差别。在陪审团看来，她这么做，等于大大方方给自己定了罪。

弗朗西斯·纳斯立即要求查阅庭审记录。休厄尔提供了所能提供的全部材料。有些证词是口头的，如霍布斯的；休厄尔那里没有书面记录。纳斯带着他妻子的书面陈述，以及乡亲们的签名，准备重新上诉，向总督菲普斯请求缓刑。与此同时，牧师诺伊斯另找机会，让丽贝卡与公众见面。接下来的一个周日，他把她带到她几十年来祈祷的礼拜堂。这天是领取圣餐日；大腹便便诺伊斯穿着正式牧师服，教徒们塞满了整座礼拜堂。一名已被定罪的女巫还能不能算是教会的一员？问题被这般表述，答案便显而易见。教会的神圣职责便是净化众教徒；而纳斯以一己之罪将大家全都玷污了。圣礼结束后，经举手表决一致同意，塞勒姆教会做出了在当时看来十分罕见的决定——正式驱逐纳斯。此举不会导致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驱逐教民是因其违反上帝之法，而非人类之

法。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惩罚是暂时的。罪人可经过忏悔解除罪孽，重新加入教区。但女巫不能。

7月3日下午，塞勒姆的长者在集会前就座，教会执事坐在第一排。纳斯身负镣铐，站在中间的过道上。教区牧师宣判她为不洁之人，进行一番冗长的训诫，将她所犯之罪又详述一遍。随后，他老调重弹，说起半个世纪前对安·西宾斯和安妮·哈钦森的判决，只不过将侮辱性的词句稍作修改：“吾谨在此，以耶稣及他的教会之名，将你等发配去撒旦之所，屈服于其，任其驱使。”被驱逐出教会本已是可怕的刑罚；对一个生活以信仰为中心的女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耻辱，她被邻居们骂为女巫，她的两个姐妹在波士顿同样身负镣铐，精神受到极大摧残，更何况诺伊斯还在对她不停诋毁，她们所受的苦难只增不减。他禁止纳斯参加集会，虽然对身陷囹圄的纳斯而言只不过是形式，但于她四处奔走的丈夫却是当头一棒，他曾声称大家绝不会避丽贝卡不及。虚弱的古稀老人丽贝卡·纳斯，虽曾在3月的集会上向教众们保证，她感到自己在病中比健康时离上帝更近，但在现实的打击下只能像个麻风病人一般，从此离开教区。她将永远不再被准许参加圣餐会。诺伊斯将她的灵魂永久打入地狱。

审判法庭在6月末对五名嫌疑人进行审判，过程与三周前审判布里奇特·毕肖普相同。在这三周里，法官们绞死了一名女巫，并向当地牧师寻求专业建议；牧师呈上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警告人们小心“噪音、集会和空旷地”，留心塞勒姆城镇里大呼小叫的房屋。神职人员还谴责“触摸测试”和“邪眼”。他们对幽灵证据表示怀疑，但无法摆脱其困扰；在6月下旬法院重新召集之时，马萨诸塞的牧师在他们的夏末会议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魔鬼会不会披起羊皮，继而大行其道？如果他可

以，那些女巫就可能是身不由己的。与此同时，法官们并未停下他们的步伐。最终，牧师的建议被无视了，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那个相信自己双眼所见的小男孩一样。小男孩喊，陛下没穿衣服呀！事实上，皇帝真的不着寸缕。但他挺直脊背，继续前行，一名内臣跟在后面，托举并不存在的五彩披风。

一名清教牧师现身审讯，从头到脚裹着一袭黑衣；许多相同打扮的牧师也来到塞勒姆的法庭。德奥达特·罗森重启了6月的部分审讯。乔纳森·科温的继子在沃特敦担任牧师，他专程到塞勒姆考察这些非常事件。离开时，他完全晕头转向。他得到的唯一教训是，走路要小心，还要对周围的人多加留心。帕里斯每天都在法庭。他和约翰·黑尔指证了两名托普斯菲尔德的女巫，即莎拉·怀尔兹和伊丽莎白·豪。诺伊斯亦一场不落；数周内，他盘问证人，收集证据，质疑证词，样样都做。受害的女孩们在法庭上格外专注，包括挥舞着针的莎拉·比伯；有人观察到，她们“被吓得又聋，又哑，又瞎，有时像是死了一样”。她们翻着白眼，四肢乱舞，仿佛证明巫术是真实发生的。然而，到了6月，被施巫的姑娘们便成了当权者手中的工具；巫术那套说辞也将她们吞没了。她们或被晾在一旁，或受到严厉纠正。法官曾公然训斥一名女孩说谎。另一个女孩指控了塞缪尔·威拉德，哪怕后者是三位法官的牧师，是马瑟6月15日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更是波士顿威望最高的人之一。在那个灼热而异常干燥的夏季，威拉德曾对魔鬼进行过一轮布道。他熟练地诱导假口供，并编造虚假报告；他的猎物浑然不觉，因此也就无关滥施权威。威拉德的观点是不会错的。可他得到的回报却是巫术指控。法官席将指控他的女孩赶出法庭，并告知人们这个女孩“弄错了人”。

陪审员们做出的判决有些随心所欲，从丽贝卡·纳斯案中便可窥见一斑。受害者们免不了一番尖叫。重要的是法官席，他们 also 对此判决不

满。首席法官插手进来，询问陪审团是否忽略了什么蛛丝马迹。他提请他们注意证据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他很有可能自作主张，向陪审团解释了纳斯的沉默；毕竟，被告虽非他抓捕，他却有权从神志不清的被告那里得到回答。他的异议对陪审团影响很大，后者生怕呈交决定之后，有辱“尊贵的法院”的名号。塞勒姆的法庭属于法官，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六十岁的威廉·斯托顿眼中，比他小十岁的约翰·哈桑善于践踏人们的自尊心，令他们的辩解变得苍白无力。斯托顿前来担任巫术法庭的法官，其司法经验比省内任何人都丰富。在新政府中，他担任副总督，仅次于菲普斯。他长着一张长脸，脸色苍白，额头很高，眼睛深陷，下巴突出，是法院最德高望重的元老之一。他口才极佳，说话令人信服，受到广泛敬仰，总在审判最后为陪审员们总结证词、发出指示。我们没有听过斯托顿的声音，但是知道他的声音令人印象深刻。想必他操着一口苛刻、高亢的新英格兰腔。斯托顿足以应付各种麻烦：应付迅速而激烈的诉讼，解决在教会里的争端，与瓦巴纳基人交换囚犯，管束不听话的政府官员。因他对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法律都很熟悉，常年来，他是人们寻求法律建议的不二人选，^[7]特别是在局势失控时。英国官员一再哀叹马萨诸塞缺少合格的官员；而他们将斯托顿列为一个罕见的例外。他知道如何谨慎行动，调解矛盾，在人们的自尊与政府执法之间游走自如。有一次在参事会上，总督菲普斯骂新罕布什尔的副总督是“无耻、粗鲁、可悲的大猩猩”，还是靠斯托顿才平息了冲突。

斯托顿是早年马萨诸塞一位地方法官的第二个儿子，他终身未娶，是早期哈佛的捐助人，也是多切斯特的奠基者，堪称殖民地之光。多切斯特是一座宜人的小镇，住了大约两百户人家，流淌着两条缓慢的河流，两岸风景优美，果园和花园枝叶茂盛。此外，斯托顿在哈佛时名列班级第一。他还在牛津大学攻读了硕士学位。此后，他在多切斯特兼职

布道，但拒绝接受教职。向他伸出橄榄枝的人络绎不绝，因为他出身名门，受教育程度高，是不二人选。他接连拒绝六份诱人的牧师职位，转而投向政治生涯。他享受平步青云的感觉。他住进多切斯特的一所豪宅，那里被广阔的牧场、草地、果园、玉米地和盐沼所环绕。

斯托顿三十六岁时，曾在影响广泛的1668年波士顿选举上布道，本质上像是给各城镇领导发布国情咨文。那一代人中，他是有能力做此事的第一人。斯托顿冷静陈词，成功再现建立新英格兰的神话。这番话萦绕不绝；二十四年后，仍被人们引用。斯托顿并非生来便秉持“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但是，在五月花号登陆四十八年后，他谈及此论已是头头是道。他们是上帝的长子，是他的最爱，最受他的眷顾；“上帝已为我们做得够多了，他还能再为我们做什么呢？”斯托顿详细讲述上帝的期许与父辈的表率，对于热衷享乐、资格不足的新一代人来说，他的话无异于一种双重管束。斯托顿提醒同胞们，殖民者代表着上帝之选。来自天堂的祝福和期盼，以及仁慈、优势、特权和自由，如大雨般奔流而下，降临在他们身上。在这片荒野之中，他们是打算蓬勃生长还是腐化枯朽？在这样的情形下，斯托顿开始为等级制度唱颂歌，而他的同胞应当明智地臣服于他们的“市政和宗教的引导”。他必然对那些自甘堕落之人感到失望——这是第二代殖民者的普遍现象——他们“拒绝参与布道或是圣餐仪式”。他提醒人们注意千禧年的到来，上帝曾说他很快便会“完成伟大的圣事”。他向那些隐藏在不远处的敌人含糊地示意。敌基督及其信徒将远征而来，只为近身一战。斯托顿强调，“此时此刻，凡不是与基督站在一起的人，都是反对他的人。”这句话，将从作为下一代人的帕里斯口中再度响起。此地不存在中间派。

从四十岁开始，斯托顿投身于公职和土地投机买卖，这历来是利润丰厚的投资组合，尤其是在一千平方英里康涅狄格土地只需五十镑加一

件大衣便能买到的时期。在英国的合作伙伴中，前自治领总督约瑟夫·达德利是他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两人携手合作，在17世纪80年代累积大量土地。（一位王室代理人抱怨，既然马萨诸塞的法官才是那些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便不可能申明王室的土地所有权。）^[8] 在1681年解决印第安人的土地诉求时，斯托顿和达德利竟然将长满雪松的两千英亩土地划为己有。五年后，他们又操纵了一次投资（后来没能成功），即大胆获取梅里马克河沿岸的十万英亩土地。

从他被任命为法官，到他在丽贝卡·纳斯案中质疑陪审团，中间隔了二十年。在这期间，斯托顿向世人证明了一个道理：即便不存在中立人士，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如鱼得水。菲利普王战争打响时，他乘船来到伦敦，为思想独立的殖民地人民就他们不服从与野心膨胀的指控辩护，在他之后，这样的行动持续了一个世纪。英国人对待他们是极无礼的，关于这一点，斯托顿深有体会；如一位官员所说，在英国人眼中，他们都是没长大的青少年，过激且偏执。^[9] 斯托顿此行几无进展。他听着他们列数殖民地人民的不法行为，还有废除特许状的初步讨论，倍感屈辱。他回到波士顿——恰在此时，伯勒斯从卡斯科湾调来塞勒姆接任神职——迎接斯托顿的便只有冷漠。在英国人眼中，斯托顿是个温和派，然而在家乡人眼中，他不过是个绥靖主义者。

接下来的几年，他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机敏。1684年，英国王室废除了马萨诸塞特许状，将斯托顿陷于叛徒之名。甚至连英克里斯·马瑟都宣称斯托顿是人民公敌。斯托顿担任临时自治领政府的副总督，不听反对当局的威拉德和英克里斯·马瑟的劝告。（然而，他却没有像达德利那样在监狱里蹲上十个月。后者不如他圆滑。）1686年12月，安德罗斯身着红衣到来，开始了他对新英格兰不羁行径的约束和管制，斯托顿与其愉快地携手合作。

虽然斯托顿是安德罗斯参事会的成员，并掌管司法事务，三年后，他却协助叛军将安德罗斯革职。这一行动有力佐证了他青史留名的才能，也让纳斯一家对他心怀忌惮，后者在受审的整个7月间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政变之后，他第一个来找安德罗斯，告知这位将要坐牢的前任上级，“现在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全是拜他自己所赐”。早在帕里斯家的女孩开始抽搐的一年前，斯托顿便深知百姓对安德罗斯政府满腔怨愤。即便是在十年后，再提起安德罗斯，哪怕是头脑冷静的人都会忍不住岔开话题，对昔日安德罗斯政府横行霸道、过分干涉、任意羞辱与滥用权力的恶行大加抨击。

在一篇名为《新英格兰革命有理》的宣言中——这大概是斯托顿为自己参与行动开脱的唯一记录——他庆贺新英格兰终于从多年的殖民压迫中解放出来。原来，他曾俯首称臣的“卑鄙无耻的暴君”对参事会从不上心。安德罗斯放任哈佛衰落，私下立法（然后将其忽略），妨碍乡镇集会，随意征税，并逼迫百姓为其贪腐买单。政权腐败，司法体系陷入停滞，陪审团遭到无视，庭审过程如同儿戏，官员公开索贿。更有谣言称，安德罗斯买通当地土著，让他们袭击殖民地人民；他给他们提供火药和子弹；他还让他们皈依天主教。这当然是蓄意陷害。^[10] 印第安人则让英国人相信，安德罗斯实际上与法国人和爱尔兰人合谋，意图毁灭波士顿。当然，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安德罗斯破坏投机买卖，从斯托顿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夺取财产，使他们无法诉诸法律，然后将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自己的亲信。^[11]

英国人认为，殖民地人民群龙无首，对自己的事务管理不善，还经历多次分裂。清教徒们“通过打碎教堂窗户，在门和墙壁上涂抹粪便”，让圣公会教徒切身体会到他们的愤怒。新英格兰人恐怕对自卫感到无望；他们急切地将火药和武器卖给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他们若不这么

做，瓦巴纳基人早就来求和了。这种说法是对殖民地人民的蓄意陷害。不论是谁挑起，一场新的冲突——威廉王之战——爆发了，立即在殖民地敲响丧钟。1689年，作为塞勒姆镇牧师之子的希金森船长，还过着自在的日子。自战争爆发后，贸易便一蹶不振，他便只出不进。塞勒姆的六十艘双桅帆船中，只有六艘幸存。他坚信，马萨诸塞没有一座城镇像塞勒姆一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

推翻安德罗斯后，在马瑟父子的协助下，斯托顿的政治生涯迎来新生。这需要一定的才能。在之后跌宕起伏的六年时间里，斯托顿在四个不同的政权中供职。他辞过职，主动提出撤换，适当回避事务，堪称那个时代变节最频繁的人；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身陷囹圄的斯托顿仍旧两面三刀，仿佛既是摩西本人，也是法老的军师。纳斯一家想要揣测这样一个人，恐非易事。马萨诸塞人手短缺，正中斯托顿的下怀。直至1692年，他担任过马萨诸塞可以提供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职务，并且可能已经瞄上总督之位，认为自己无疑比菲普斯更够格。甚至于在当上副总督后，他继续霸占着首席法官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是终身的。政府办公室的人们早就习惯围在他身旁，如众星捧月般。

第二代殖民者认为自己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正统，新的政权也相应更为暴虐；然而，两代人各有千秋。斯托顿看似高尚而死板，事实上却世故圆滑。这种处世方式，大约在他幼时就已根深蒂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伊斯拉埃尔曾出版一本小册子，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代表性的马萨诸塞政府。结果遭到当时的总督（即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之父）的强烈斥责，他将老斯托顿定性为“蛀虫”和“危害国家者”。伊斯拉埃尔·斯托顿生性胆小，很快道了歉，敦促有关方面烧了他那本错误无礼的书。老斯托顿被禁入政府办公室三年。可他的儿子却没有打算就此沦落于荒野中。一名英国官员曾赞许称，斯托顿虽与清教牧师站在一

边，但他很灵活，国王那边一样可以指望他。他也是一个虔诚的、格外能干的公仆；连马瑟也会毫无顾忌地纵容他多次“柔身术”式的转变。正如科顿·马瑟在1691年对他父亲说的那样：“斯托顿先生是新英格兰真正的朋友，他愿意为上一任政府的过错做出任何弥补。”他应该重获青睐。

若说斯托顿一生有何污点，不是他仓促重建的忠诚，也不是他那一大堆名号。1688年，也正是帕里斯第一次在塞勒姆布道的那一年，他去了一趟缅因，与瓦巴纳基人协商换囚。他搞砸了，激怒了对方。后来对方展开报复性袭击，杀了十六名英国殖民者。如果追溯到上一代，瓦巴纳基人的袭击便也不是全无道理：1637年，斯托顿的父亲作为民兵上尉，屠杀了一个印第安部落，在胜利的欢呼中回到多切斯特。所幸的是，1692年，马瑟父子带着修订后的特许状将斯托顿从那一场缅因惨败中解救出来。

斯托顿脾气暴躁，以“不发火就不干活”著称。他对人的态度也很轻蔑。自1668年以来，他便以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他的同胞，并且提醒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必须提防撒旦在身后穷追不舍。他不相信上帝会允许正直之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邪恶之事；所以，他坚定认为那些女巫有罪。如果女孩们看到丽贝卡·纳斯扼住小安·帕特南的喉咙，那么纳斯一定是个女巫。他曾审判过类似的案件：格洛弗因魔镇古德温家的孩子而被判处死刑时，他就坐在法庭上。他早就警告过人们那些无形敌人的存在；到了1692年7月，这些敌人似乎到处都是。在距离塞勒姆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兰开斯特男人回到家，目睹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倒在血泊之中，他们都是被斧头砍死的。仲夏时节，夜间袭击如瘟疫一般在格洛斯特附近蔓延开来。在好几个黑夜里，打斗声传到戍守在城镇附近的军队中。很快，十几名男子现身，一会打扮成法国人，一会打扮成印

第安人。有时，他们说英语，有时说外国话。他们没有留下蛛丝马迹。过了可怕的两周后，格洛斯特申请增援：一支六十人的民兵抵达后却无济于事。就像针在法庭上突然戳穿围裙那样，子弹不时地从树中射出。这样的袭击震动了塞勒姆，然而没有影响纳斯家族持续的上诉之旅。情急之下，他们向波士顿方面寻求缓刑。

凭借火爆脾气、强大气场，以及令人应接不暇的命令，斯托顿让同僚恐惧，甚至震慑了敌人。对弗朗西斯·纳斯这样的人来说，他是难以扳倒的势力。塞缪尔·休厄尔一直兢兢业业，总是伴在斯托顿身边；他可能是所有法官里出庭最勤的。哈桑和科温似乎也一直待在法庭，如果一定要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俩住的地方离塞勒姆镇公所很近。五十二岁的巴塞洛缪·格德尼是塞勒姆一位富有的地主，在缅因也有产业，他和斯托顿一样提倡人们迁就英国。在加入推翻安德罗斯的行动前，他也曾在其政府中工作。格德尼还是一位医师，喜欢精致的事物。他可能是所有法官中穿着最漂亮的；他还拥有一个天鹅绒坐垫，这在塞勒姆可不多见。在预审时，哈桑、科温和格德尼这三个塞勒姆人就清楚表明了自己的倾向。备受尊敬的约翰·理查兹也向科顿·马瑟申请加入巫术审判，并收到肯定的回复。类似的还有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他直到起义那天都还是安德罗斯参事会的成员。他不仅仅将生计寄托在公职上，而是更倾心于房地产、诉讼和时尚业。^[12] 他既不活跃，也不算有独特见解的思考者；还没等强迫别人做什么，他自己就先打了退堂鼓。至于另一位法官彼得·萨金特，他是一位富可敌国的波士顿商人，处事颇为神秘，不为人知，这可能是他与斯托顿的法庭保持距离的缘故吧。

1692年7月6日，斯托顿与几名同僚一道来到坎布里奇，庆贺哈佛学院的学位授予典礼。那也是一个喧闹雀跃的平民节日，满地都是小贩和宴席，人们才不管那些文绉绉的拉丁语、希腊语或是希伯来语演说呢。

庆祝活动的饮食可能包括鲑鱼、刺山柑、橙子和菠萝；毕业生们也实在管不了那三加仑酒的限制饮酒量了。身为校长，英克里斯·马瑟当天上午将学士学位授予六个年轻男子。在毕业生中，至少有一人没能得到父亲的祝贺：那便是约翰·奥尔登的儿子，其父是一位夙兴夜寐的商人，当时正因巫术指控入狱。（奥尔登的另一个儿子也没能成行。他被印第安人俘虏，约翰没能成功营救他。）在塞勒姆村，纳斯一家仍在自行其道，不屈不挠地试图解救丽贝卡，无惧高官显要，也不理人情世故：于是，在她被逐出教会几天后，总督菲普斯驳回了斯托顿的判决，要求对丽贝卡执行缓刑。

菲普斯这样做，是因为他在筹备一场新的缅因远征，订购军需，并让数百民兵重返岗位。他不在时，安排斯托顿代管。打从一开始，副总督斯托顿便对接手这位外强中干的半文盲总督的工作毫不迟疑。他俩之间并不亲密，一度几乎大打出手，可以想见，将来这种事还有可能再次发生。（1692年，斯托顿曾对别人说，早年间有人曾谨慎提出将他关起来，以防他变节。有人认为可能是菲普斯欺骗了英国王室，斯托顿同意这种可能性。）菲普斯提出赦免纳斯，与其说是怀疑巫术的存在，不如说是怀疑法庭没有足够能力辨别巫术。在这一点上，有人与他持相同观点。在7月中旬，一位知名的荷兰商人直接给英克里斯·马瑟写信，表达自己的担心。当然，这是上帝再次惩罚新英格兰。但是，所谓撒旦契约让这位商人感觉实在不合情理，同样匪夷所思的是，女巫居然可以远距离折磨受害者，或是推翻教会。与此同时，那些被施巫的受害者表现得“像是被剥夺了理智，无法回归常态”。她们若不是彻头彻尾地疯了，是否可能被恶魔附身？马瑟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释，来反驳她们的“迷信和错误”？

纳斯的死刑缓期执行，让诸多邻里乡亲松了一口气。但也有人强烈

抗议。因为控告纳斯的人“抗议太过激烈”，塞勒姆的一位法官——可能是哈桑或格德尼——说服菲普斯三思。纳斯家的女人们并不安分。对一些人来说，她们的举动说明她们的游说十分有效；而对其他人，这是恰恰证明了她们的罪孽。这一家子给人带来了极大困扰，玛丽·埃斯蒂在5月时被短暂释放后造成默茜·刘易斯险些丧命一事，就足以证明这点。更大的变故还在后面：众人抗议后不久，对丽贝卡的赦免便撤销了。具体的时机尚不清楚。或许是哪位塞勒姆法官用案例说服了菲普斯。也有可能是斯托顿抓住了作为执行总督的机会，恢复他此前做出的判决。7月17日，他起草了一份死刑令：莎拉·古德，伊丽莎白·豪，苏珊娜·马丁，丽贝卡·纳斯，以及莎拉·怀尔兹均被证实犯下“可怕的巫术罪”，将由塞勒姆的治安官安排执行死刑。斯托顿这次给了一个星期做准备，下达了下周二早晨将上述五个女人绞死的命令。

此事有几分讽刺。首先，斯托顿——他看事情公正客观，将新英格兰人视作仁慈造物主的顽劣孩子——终生未婚。在殖民地，只有少数男人未曾直接接触过未成年少女，她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是女人。^[13]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用力布道，强调是时候“做好自己，站好队”，已证明了自己是一只投机的变色龙，在忠诚度上毫无原则，可到了1692年，他突然变得固执和强硬。在推翻安德罗斯政权时，斯托顿害强烈谴责其政府的司法状况。当时，政府专横霸道，夸大罪责，无视合理的上诉，放纵“无情的迫害”。有时，它无缘无故将嫌疑人长时间拘禁。有时，它不经审判便做出判决。有时，它还举行“严苛到不合常理、非常枯燥、很不负责任地误导普通人的”审讯，其中一场审讯还指控了时任首席法官——这位法官正是后来改判纳斯案并处以她死刑的斯托顿。

7月19日那天一早，气氛令人窒息，塞勒姆镇的治安官和他的副手将五名女性罪犯押上一辆木车。他们在武装守卫之下，沿埃塞克斯大街，缓缓西行。用现代的定位眼光来看，这辆车缓缓行过塞勒姆镇的中心——经过教堂、哈桑的家、斯蒂芬·休厄尔的家、科温的家，还经过瞪大眼睛、交头接耳的围观人群——车上押解着五名衣衫褴褛的妇女，面无血色，中等年纪，均双手被缚。其实，她们五个人大相径庭。其中最年轻的是莎拉·古德，她不过三十九岁（她在监狱里度过了生日），充满怨恨。那天早上，她五岁的女儿还被禁锢在波士顿，而她在3月审讯时还怀着的另一个孩子，后来在牢里被生下并死去。年纪最大的是丽贝卡·纳斯和尖酸刻薄的埃姆斯伯里寡妇苏珊娜·马丁，两人都是七十一岁。这五个女人被捕前并不相熟，但她们在邻近的牢房中度过一生中最悲惨的几个星期。她们都不是帕里斯教会的成员。有的人十分贫穷，有的人则生活尚可。古德和马丁的日子愈发艰难，都为了得不到的遗产打过官司。马丁是五人中唯一的寡妇。莎拉·古德的丈夫很快就承认妻子是个女巫；弗朗西斯·纳斯则成天想着证明丽贝卡不是。除去性别和肮脏不堪的外表，五个女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受到控诉的也是各不相同、乱七八糟的罪行。除去丽贝卡·纳斯，其余四人在巫术案前都出过庭，那些经历对她们的处境十分不利。历史上同样的情况还有伽利略，在被控告“异端邪说”之前，他也曾被要求回应错过弥撒的指控。

“格洛弗家的寡妇被绞死时，吸引了许多人围观”，塞缪尔·休厄尔在他1688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是五个女巫乘车共赴黄泉，岂有不围观之理。大家对马蹄和车轮的嗒嗒声期待已久。虽然目睹着同样的景象，各人的见解却各不相同。五个女人面面相觑，看到的都是无辜的脸庞，有的人甚至比别人要更清白些。马丁曾质疑：是否只有那些宣称受害的女孩真正施行了巫术？数周来，几个女人身陷致命的诛心之论：你不是自己所认为的那种人，不然那些女孩也不会受到欺凌；我们

认定你是女巫，你就是女巫。当那辆木车嘎吱作响，驶向塞勒姆镇的郊区，准备转向北经过镇上的桥时，路上围观的人眼里都看到了什么？有的看见五个仁慈的、不幸的、蓬头垢面的老女人。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铁了心神神叨叨的女人，她们侵扰和平，如芒刺在背。还有更多的人——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是五个法力强大的女巫。这些人以为自己满怀公义，并认为这就是正义的模样。他们找到了他们一直在找寻的东西：痛苦、混乱与邪恶的终结。玛莎·科里也曾亲口说过，毫无疑问，第一批嫌疑人是魔鬼雇用的。她们的灵魂空虚、懒惰且邪恶。很多维护丽贝卡·纳斯的人相信，与她同车的四个女人有罪。毫无疑问，当木车经过，尘土飞扬，有的人害怕得畏缩了。其他人则发誓要加倍努力，揪出女巫。如果连丽贝卡·纳斯都逃不过魔鬼的诱惑，还有谁能？

作为一名称职的地方法官，斯托顿在1668年曾参与布道，敢于遵循自己的良知。因此，他有责任对撒旦的伎俩保持警觉，改变上帝的怒意，维护团结与消除邪恶。他知道，新英格兰饱受痛苦，而上帝正在观察和试探他们。当地人的使命陷入了僵局。他那关于邪恶力量就在不远处的观点，被证实是正确的。殖民地处于一段充满可怕审讯的时期；而他们对此应对得当。斯托顿在二十四年前已经说明了一点——也被地方法官与牧师共同证实——“在我们明智、谨慎、忠诚地践行着相互警惕和责难的伟大义务时”，新英格兰并没有“削弱爱和热情”。在自然的层面上，海洋、林地、沼泽地，还有井然有序的塞勒姆镇在他们的脚下延展，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恢复了这里的神性，将邪恶埋入地底。马瑟同意这种说法，他为爬上陡峭山坡的围观者们发言。稍后，他将写道，这五个女人是女巫，“厚颜无耻地向上帝索求脱罪”。行刑的那天早晨是那样热，哪怕有一滴点怀疑，都蒸发殆尽。唯有一缕怨恨留存，漂浮于空中。我们并不清楚，那些受害的女孩是怎么想的。

那天，行刑车队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费力爬上颠簸的山坡，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个解释今天再清楚不过，在那个窒闷的周二却远非如此。五十三年前，一位马萨诸塞牧师行事草率，他在画托普斯菲尔德的边界时，将其越过了塞勒姆的边界。结果，根据推算，托普斯菲尔德西南的部分土地是属于塞勒姆北部的。一场激战随之而来，而正如帕里斯所知，主要是因为早已短缺的宝贵资源——原木。一个新英格兰家庭每年消耗三十到四十捆木材，相当于一英亩多的树林。塞勒姆的帕特南家与托普斯菲尔德的汤恩家就原木资源积下宿怨，时不时便会互相侵犯。有一回，帕特南家有一名软弱农民看管的树木被托普斯菲尔德人砍倒，很快引得一大批帕特南家族成员出现在争议地域，手中挥舞着斧头。埃塞克斯县法院一次又一次听到帕特南家族成员的抱怨。但是，法院四次都站在汤恩那一边。和这段家族世仇一样顽固的，那就是风水轮流转的塞勒姆村牧师一职，派系斗争持续发生。

丽贝卡·纳斯就是在托普斯菲尔德长大的。她的娘家姓正是汤恩，与莎拉·克洛伊斯和玛丽·埃斯蒂一样，在那个行刑的炎热星期二中，后两人皆身处监狱。纳斯的指控者都是早年间挥舞着斧头出现在她兄弟土地上的人。豪家和埃斯蒂家关系很亲密；伊丽莎白·豪和丽贝卡·纳斯则是妯娌。在划定有争议的边界时，莎拉·怀尔兹的丈夫出过一份力。1660年，他与纳斯家、汤恩家和埃斯蒂家联合起来，打了一场遗失母马的官司，那匹马有着亮褐色与黑色相间的鬃毛，之后在别人家的谷仓被找到。这四家人都曾占据属于塞勒姆镇的土地。这其中是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对于那四个不顾后果、最早指控巫术的人，大概也没料到木车现在缓缓向花岗岩山冈驶去的痛心场景；那四个指控者中，有一个还是纳斯家的女婿。在庭上证词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那段长期的纷争，不过，在新英格兰已经形成某种默契，即便是有些事在最激烈的指控中也不会被提及。然而，7月前受理的巫术指控中，仍有一半都是托

马斯·帕特南提起的。这五个明亮天光下眨着眼、面黄肌瘦的女人，都被他的女儿逐一指控过。7月1日，帕特南提交了他最后的申诉。这一次，帕里斯的外甥女阿比盖尔不在他控诉的名单上。显然，有些事已被私下解决，不过法官们心中所想的，也许不是同一件事。7月，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出现了。

这支阴沉颓靡的队伍第二次停下，这次是在裸露的岩层边缘。前面没有路了，五名罪妇大概靠步行走完最后几码凌乱不平的距离，来到了山顶，在那里她们能瞥见远处的一台简陋绞刑架。鉴于她们身体虚弱，行刑花费了不少时间。裙子缠在她们的脚脖上，兜帽从头上拉下、遮住眼睛，五个女人却坚持自己是清白的。诺伊斯牧师对此情绪激动。他坚持认为，认罪对普通民众和教会都好。苏珊娜·马丁并不理会诺伊斯的纠缠。据我们所知，莎拉·古德亦是。从古德爬上山，到她被蒙住双眼、爬上绞刑架的梯子之时，诺伊斯一直在提醒她，她做了非常邪恶的事。她是个女巫；她最好现在承认。他低估了这位衣衫褴褛的对手。站在即将绞死她的绞刑架下，莎拉·古德不客气地回敬道：“你是个骗子。要说我是个女巫，倒不如说你也是个巫师！”她已经失去遗产，失去家，失去一个孩子，于是她发出了尖锐的诅咒。“如果你取走了我的命，”她扬言，“上帝会让你饮血。”这句话对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很熟悉。^[14]这是古德听起来最像女巫的一次。

有人把犯人的脚从梯子上拽下来，过程大概快速且连续。人群因她们可怕的呻吟而纷纷退散。女巫们的尸体被示众一阵，虽然时间不长，但足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天；她们被迅速掩埋，至少一开始还在山上的岩石堆中，后来却不知所踪。^[15]古德的诅咒萦绕不散，并在休厄尔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遭罪的人。第一场绞刑虽令折磨和指控暂停了一阵，第二场绞刑却反之。在塞勒姆

镇中心，人们在街上遇到幽灵，他们飞过，疾如飞鸟。第二天，牧师宅邸里发作的不仅是帕里斯的外甥女，帕里斯太太也第一次痉挛发作。所幸哈桑和科温并没有懈怠。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审问老安·福斯特，据称她从安多弗乘杆飞来，是一切厄运的开端。她透露了阴谋的具体细节，还将她的印记——一个若隐若现的、倒写的C——加进了她史诗般的审讯记录中。对有些人来说，这如同上帝带来的奇迹：他们刚处决那五名女巫，上帝就送来了一群新的女巫，她们对自己的堕落供认不讳，并交代了耸人听闻的阴谋。

那个星期结束时，引发牧师家骚乱的新罪魁现身了。他十八岁，强壮且引人注目。他住在安多弗。哈桑做到了诺伊斯没能让莎拉·古德做到的事——让那年轻人认了罪。“有时候，”年轻人羞惭地招认，“魔鬼扰乱我的心神，让我不由自主地伤害牧师的妻子。”他曾拧起一块手帕，想象那便是帕里斯太太。他怎么会为魔鬼工作？一定是他的母亲的错。她不仅与安·福斯特同骑一根摇晃的杆子飞到塞勒姆，还把儿子变成巫师。虽然身处狱中，她还是化身为猫，在近期回家看望儿子。魔鬼曾向她允诺，她会是地狱的王后，虽然这一地位在经文中没有先例，但是，这对一个满脑子等级思想的新英格兰少年来说显然合情合理。

[1]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当时公认的聪明做法是起诉别人，这样你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变得更好。“起诉越多，日子越好”。

[2] 发生在1692年的讽刺之事是，牛津大学毕业的神学硕士在主持审判，而没有文凭的牧师在塞勒姆村布道。这两种情况在当时都算异常。

[3] 马瑟很可能连做梦都会因某场布道没有准备而焦虑不安，然后

在梦中继续准备。1689至1691年间，他出版了二十二部作品。他知道出书太多，人们会不喜欢他。但他不知悔改。1699年，他将自己“上天堂的善行”列出来，排在第三的是“我也许比这个地区大多数人更加愚蠢和浅薄；但我是这个地区及整个美洲从古至今写作出版最多书的人，我凭借这些作品有了更多机会来行善”。

[4] 一年前，米尔本的弟弟因叛国罪在纽约被砍头；此前，他从绞刑架被解下来后居然还没死。托马斯·牛顿是此案的公诉人。

[5] 医生下结论称“某些恶人 (evil person)” 魔镇了她。在马瑟的记录中，他更加肯定地断言“某些恶魔 (devil) 魔镇了她”。

[6] 此案也将人群划分开来。1692年，人们必须选边站，可还是有些村民摇摆不定。老约翰·帕特南似乎同时支持纳斯和她的控诉方。

[7] 1681年，斯托顿曾向普利茅斯的总督保证，依照英格兰的法律，陪审团的无罪裁决仅仅表示犯人无罪。按照殖民地的习惯做法，犯人还是可以被处以严厉刑罚，只要与他的罪行相称。

[8] 1678年，斯托顿曾温和地反对这位王家官员的就职。因为后者缺钱，所以他不太可能诚实地发表意见。在当时的情境下，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九年后，这位“穷得不说实话”的官员注意到，斯托顿和他的同伙“在这片地区大肆敛财”。

[9] 正如一位英国官员在1684年对波士顿最富有的商人所说的，“我觉得你们这里的人都疯了。”

[10] 这类怀疑可追溯到上一代。在17世纪60年代，休厄尔的岳父曾愤怒地放话：英国佬无权来到北美，“并试图颠覆我们的世俗和宗教

的政权”。

[11] 毫无疑问，在安德罗斯任下，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对投机者尤甚。那时，土地买卖难以进行，因为没有人知道钱是应该付给业主还是国王。

[12] 三年前的夏天，他就注意到公职的薪水少得可怜。虽然他想过“凭借政府的力量，剥削穷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但他最终还是寻求别的办法养活自己。

[13] 性情活跃的诺伊斯是极少数没结婚的神职人员之一，于他而言与女教徒相处也是十分必要的。

[14] 连纳撒尼尔·霍桑都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把它用作书里一个人物的台词。这个人物是《七角楼房》里的马修·莫尔。古德这句话可能出自三十年前死在波士顿绞刑架上的两名贵格会教徒。

[15] 据传说，她们的家人默默找回了尸体；据说纳斯的几个孩子是在那天夜幕降临后去的。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这五个女人的踪迹。

第八章 在地狱集会中

怀疑并不愉快，但深信不疑未免荒唐。

——伏尔泰

及至7月底，一切清晰明了：恶魔已经玩腻寻常的伎俩，不再以偶尔的不满者为食。他已在马萨诸塞站稳脚跟，广泛招募追随者，现在他有着更宏大的计划。他打算推翻教会，颠覆国家。某些征兆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已为人所知，其他则完全是新的。谁中伤被施巫的女孩，谁经常访问他被关押的配偶，谁就有可能被指控。质疑巫术的存在、证据的合法性或法庭的智慧，也都近似于异端邪说；你越是反抗，越是可疑。已经归罪的，就不可能逃脱。就算是两位牧师的话，也救不了一名被指控的教民。不管是年龄、财富、性别，乃至教会成员身份，都不能使人获得赦免。杰出人士和无家可归的五岁女孩一样受到指控。许多人已经做好接受上门调查的准备。

指控往往从农村开始——特别是在秩序井然的虔诚家庭——然后辐射到城镇。相反的指控路径不会发生。仆人会指控自己的女主人，但女主人不曾指控仆人。青少年指控自己的同龄人时，往往会指控异性。妻子不会指控丈夫，但是她们早就趁丈夫睡觉时检查他们身上是否有泄露罪行的标记。丈夫不会提出诽谤诉讼以维护妻子。很少有奴隶受到指控；至于印第安人，更是无人受审。贵格会教徒虽言行不得体，此次却躲过一劫。家庭因信念不同而分裂。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你与指控你的人同床共枕。^[1] 昔日友情转瞬即逝。别的情谊也分崩离析。一个塞勒姆村民既捍卫又指控约翰·普罗克特；他父亲为丽贝卡·纳斯签署请愿

书，却指责伊丽莎白·豪。巫术审判似乎激活并且认可了那些见不得光的怀疑。牵连出的不过是些小事，不过就像马瑟说的，小事也会积少成多。与边境接触是危险的。到1692年，新英格兰被起诉虐夫的女性，和虐妻的男性一样多；残忍的丈夫和好斗的妻子都会受到指控。被施咒的女人在阵阵痉挛中窒息，男人们则瘫在床上，只有在审判开始时才起身。（老安·帕特南一个人就占了两种。）年轻男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以最匪夷所思的方式受难，提供最荒诞不经的证词。凡是经历过痛苦的人，都能指认女巫。同时，斯托顿拒不批准缓刑。在此之前，不论是在北美还是在英格兰，都没有一个法庭拥有如此高的定罪率。

5月11日，爱开玩笑的乔治·雅各布斯曾告诫他十七岁的孙女不要承认使用巫术。他警告说，这样做会让她因串通他人而以死收场。他错了。只要有一个人供出他人，其他人便会跟风而为。阿比盖尔·霍布斯、提图芭和玛格丽特·雅各布斯和其他九个承认自己是女巫的女人仍待在狱中，而且还能相安无事，这简直前无古人。在过去，被施咒的女孩一般都要面临医学检查，从来不会自己站出来解释前因后果。解释巫术，靠的是法官和牧师。而在1692年，受害的女孩们也能解释，因为她们有预见未来和诊断的能力，自从托马斯·帕特南4月写了那封充满暗示的信后，这种情况便愈发突显。

7月下旬，塞勒姆镇上有人指出，上帝已经解除了一个灾祸：整整一年，都没有出现一例天花。然而，上帝送来了一场新的瘟疫。传播者看起来是一位好心的安多弗农民，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挽救濒死的妻子，后者在过去二十年间给他生了十个孩子。约瑟夫·巴拉德首先找的是一个四十九岁的亲戚。他是否和那些从春天开始便一直折磨伊丽莎白的特别的“痛苦和压力”有关？这亲戚对算命和黑魔法都有所涉猎，但这次不关他的事。他对伊丽莎白的事一无所知。巴拉德遂求助于权威，后者重

启了16世纪早期西班牙的应对方式，鼓励他派一匹马，护送伊丽莎白去塞勒姆预言家那里。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预言家包括帕里斯的外甥女和玛丽·沃尔科特。在伊丽莎白·巴拉德的床边，女孩们痉挛发作。她们明示又暗示，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虚弱的安·福斯特，一个曾在飞行中出过事故的安多弗七十二岁寡妇。

此后不久，一名治安官将福斯特押送至塞勒姆村上，此行是靠骑马，自然比在空中飞行要艰辛得多。福斯特是个安多弗农民的遗孀，她丈夫生前待人友善，年纪比她大很多；她家住塞勒姆镇南边的郊区，与巴拉德家是邻居。7月15日，她遭受到最初的几场审问。审讯开始于斯托顿判处五名女巫死刑后，仅在行刑后两日，她便也走到了生命尽头。起初，她否认与巫术有任何牵连。很快，她开始编造一个与提图芭有关的故事。魔鬼出现时化作一只奇异的鸟。他向她许诺财富，还赐予她邪眼。接下来的六个月，她都没有再见过他，但是她的邻居玛莎·卡里尔一直代表他与她联系。即便是有人问了福斯特那生病的伊丽莎白·巴拉德，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在卡里尔的引导下，福斯特魔镇了几个孩子和一头猪。她利用人偶来施展巫术。卡里尔已经宣布，恶魔的集会在5月，并已安排好她们的行程。那天，共有二十五个人来到草地上，参加由伯勒斯牧师主持的集会。三天后，在塞勒姆监狱中，福斯特又交代了那根出现了故障的杆子和那场飞行事故。她提到，还有两名男子也参加了集会，在那里，她无意中听到一个女巫说，她们一共有三百零五个人。他们行将摧毁整座村庄。斯托顿已经安排了次日早晨的一场绞刑；对于法官们而言，那天真可谓是忙乱的一天，毕竟他们的时间已不多了。约翰·黑尔问道：他是否可以留下来与嫌疑人在一起？他对一些细节还很好奇。他问福斯特：你是乘着什么飞到塞勒姆来的？这趟旅程用了多长时间？集会究竟是在

何地召开？黑尔是第一个听说福斯特口袋里还装着面包和芝士的人，这些细节并未出现在庭审记录中。他也听闻过她的焦虑不安：一想到乔治·伯勒斯和玛莎·卡里尔会因她泄露秘密而取她性命，她便浑身颤抖。这两人都被铐在附近的牢房。可如同幽灵一般，他们手执利器现身，意图将她刺死。（此前，福斯特的女婿曾用刀割了她女儿的喉咙。此外，她来自于一个不同于塞勒姆的社区，此地遭受过印第安人的袭击。）承认使用巫术，或许可以保住性命。不过这也绝非易事。

面对黑尔和法官时，福斯特都是一个人，她表现得完全配合。很快，他们就发现，福斯特未能和盘托出。事情似乎是，她和卡里尔骑着杆子飞往塞勒姆并发生事故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此人和她们一同飞行，安静地跟在福斯特后面。因此，7月20日，根据这一线索，他们又抓获了一名安多弗嫌犯，正是四十岁的玛丽·莱西。莱西住在安多弗的北端；在对她家进行搜查后，发现了破布和几捆豪猪刺，看上去十分可疑，像是制作人偶的材料。福斯特还隐瞒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仪式细节。魔鬼给他的新兵施洗，将他们分成六人一组，把他们的头浸在水里；由此，他们便成了他的人。他在附近的一条河边举行这场圣礼，怀里还搂着玛丽·莱西。7月21日，安·福斯特第四次来到法官面前，她要来解释她故事中的遗漏部分。那场审讯实在是耸人听闻：玛丽·莱西，那个补充了遗漏细节的人，正是福斯特的女儿。

7月21日是将那五名女巫绞死后的第一个公共日；天气依然炎热，异常干燥。法官开口时仿佛身处高位，先是傲慢，接着又充满嘲讽。“福斯特老太，”一位法官说话了——很可能是哈桑——“你可记得，我们曾审问了你三次？你可记得，你当时对我们承认了什么？”一名法庭官员大声宣读了她的陈词。她发誓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法官表示赞许；相比于别人，她或许能够获得宽待，因为她承认了这“无

比之恶行”中有她的份。但是，她并不坦诚。为什么她没有提到她的女儿与她一起飞行？她女儿成为女巫多久了？听到这儿，她慌了。“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女儿是个女巫？”哈桑不依不饶。她不知道，而且大惊失色。如果她见到她的同伙，能否认出他们？与她一同在场的是不是还有两名女巫？她只知道卡里尔参加了集会。玛丽·沃伦适时地插话了：这女巫敢确定，福斯特为魔鬼招揽了她的亲生女儿。

法官们的理解是，她早在大约十三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了。是不是这样的？“不，不是，就像我不知道我哪天会死一样，我根本不知道我女儿是个女巫，”福斯特非常坚定地回答，语气和她说起那场倒霉飞行的细节时一样。于是，有人再次提醒她，坦白方能令她卸下负担。一位法官哄骗道：“若非尽数交代，你便不能获得良心的安宁。”福斯特发誓，如果她还知道什么，一定不会隐瞒。于是，法官叫来了她最小的女儿。四十岁的玛丽·莱西一走进镇公所就痛斥她的母亲：“是我们背弃耶稣，才沦入魔鬼掌控。我们如何与这邪恶之徒撇清关系？”福斯特开始小声地祈祷。“女巫向什么人祈祷？”一位法官讥刺道。“我也说不清，还请上帝帮帮我呀，”老妪彻底糊涂了。她的女儿交代了此前没有的细节，关乎她们来到塞勒姆草地上的那场飞行和恶魔的洗礼，表示那是安多弗巫术的必备；在安多弗，对施洗者的恐惧就像是对印第安人袭击那般根深蒂固。玛丽·莱西澄清，她的母亲骑着杆飞在最前面。她详细阐述了撒旦仪式。法官们问什么，她都对答如流，甚至添油加醋，说她的母亲得了个“地狱王后”的称号。

法院人员送走了这对母女，又将福斯特那面带稚气的外孙女护送进来。小玛丽·莱西才十八岁大，她容貌可爱、颇有主见，被巴拉德指控魔镇了他的妻子。她一进来，玛丽·沃伦立刻开始痉挛；法官命令小玛丽摸一摸比她大两岁、正不停抽搐的沃伦的胳膊。沃伦恢复了正常。起

初，小玛丽什么也不承认。“我妈妈在哪里？你们都说她将我变成女巫，可我怎么不知道？”她大喊道，这个问题比6月那个问题——即一名嫌疑人想知道她是否可能是个女巫，但自己却不知道——更恼人。法官要求小玛丽对沃伦微笑，但是不许伤害她，小玛丽没能做到；沃伦瘫倒在地。“你现在承认你是个女巫吗？”法官问小玛丽。她只能承认，尽管她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似乎与法官们不同。她执拗的性格已经给父母造成许多麻烦。她曾离家出走两天；她经常会让自己的母亲有理由希望魔鬼能将她带走。但是，小玛丽坚称，她没有签署任何契约。法官们提醒她，她还有选择：如果她希望耶稣拯救她，如果她企盼得到宽恕，便应承认罪行。“她便承认了。”法庭记录员这样写道。她所交代的细节，比母亲和外婆的都多；报告内容之丰富，堪为塞勒姆年轻一代——包括科顿·马瑟在内——的标杆。小玛丽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巫术飞行的练习。若一个青少年已被告知，或者她相信，她一直与魔鬼共舞，那么描述那些邪恶的行为便很容易了。法庭记录里还有只言片语，记载了她对自己的判断。“我一直是个不听话的——”她是这样开头的，但后面的纸页被撕去了。她所说的，可不比阿比盖尔·霍布斯少。

小玛丽的讲述完美地承接了阿比盖尔；她俩不可能没见过面。小玛丽曾在深夜两次被奇怪的响动吵醒。这种事情发生在上个星期，还有一年前及十六个月前——细节浮出水面，并不断变化。恶魔第一次造访时，是以马的形象出现，第二次则是“一个灰色的圆物”。法官将超自然的罪恶与青少年的不法行为混在一起，问她在离家出走时，他有没有来找她，？“没有，”小玛丽回答，“但他把不要听父母的话之类的想法灌输给我。”他的确指使她折磨了几个人，包括伊丽莎白·巴拉德，这还是审讯中第一次被提到。小玛丽用人偶来施展巫术。她暗示，她的母亲、外婆，玛莎·卡里尔，还有卡里尔十多岁的儿子理查德都是巫师。她怎样膜拜恶魔？“他让我向他祈祷，侍奉他，并告诉我他是我的上帝，我

的主人。”她承认道。他是如此慷慨，她对他无所欲求。在指认卡里尔的儿子之后，她又透露了些别的事情。“除了伤害别人，魔鬼有没有要求你做其他事？”法官问。的确是有的。他要求女巫们积极地为他招募追随者。他还要求她们放弃原先教会的施洗，这一旦实施，后果不堪设想，将会动摇新英格兰的根基。

小玛丽解开了一个秘密，那便是一个人如何在种英国玉米的同时与魔鬼搭上线，而且他的邻居竟没有注意到他骑着杆飞过。“有时候，我们把身体留在家中，但有时我们身心合一，”她解释说，“这时魔鬼便会在旁人眼前释放雾气，让他们看不见我们。”她还解释了一件更要紧的事。“你有没有听说过，魔鬼不经人同意便附上身，然后伤害别人？”法官问道，他似乎认为一名青少年能解决法律上的谜题。“如果有人拿剑或者权杖攻击灵魂或幽灵，会否伤害对方的躯体？”另一人问。小玛丽给予了肯定。她的母亲和外婆受的伤都曾显现出来过。这番坦白的效果立竿见影：玛丽·沃伦走上前去，抓住小玛丽的手。这一次，她没有感到不适的刺痛。

恰在这时，玛丽·莱西回到了庭上。如同要为这扰乱人心的场景配上字幕，有位法官缓慢且庄重地说：“此处有个可悲的孩子，还有一个恶母和一个坏外婆。”无须多说，小玛丽的情绪便爆发了。“哦，妈妈！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的交给恶魔？”小玛丽声泪俱下。玛丽·莱西向女儿道歉。小玛丽小小地报复了一下：她的妈妈总是斥骂说魔鬼应该把她抓走。她的愿望实现了！“哦，我心已碎！哦，妈妈再也不用把我交给魔鬼了！”她抽泣着说。她祈祷上帝揭露所有的女巫。法庭官员将她的外婆遣送回法庭。一家三代女巫现在都站在希金森、格德尼、哈桑和科温面前。玛丽继续大声责问：“哦，外婆，你为什么把我交给魔鬼？你为什么要来游说我？还有，哦，外婆，别否认了。在你这一生

中，你一直是个坏女人。”

要么审问者换了个人，要么出于外孙女的猛烈抨击，福斯特一下子就屈服。法官之后一直称呼她为“老女人”。法官提醒福斯特，小玛丽有悔改的迹象。她尚能被从魔鬼的掌控中被解救出来；福斯特自己却招来噬人的大火和永不熄灭的烈焰。是时候道出全部真相了。在外孙女的推动下，福斯特勉强交代了一些额外细节。她成为女巫已经六年了。（小玛丽立即说是七年。福斯特承认，“她不清楚，但是有可能吧”。）法官把小玛丽的供述读给她的母亲和外婆听。她们确认她们曾一同飞去女巫集会。她们用红墨水签署恶魔之书。她们利用人偶施展巫术。卡里尔也曾向玛丽·莱西吹嘘，魔鬼会让她当上地狱的王后。玛丽·莱西证实了那场飞行事故。一批逮捕令发出，三人随之一同被捕，送至安多弗的监狱。

第二天，十八岁的理查德·卡里尔和十六岁的安德鲁·卡里尔来到比德尔客栈见法官，伯勒斯就曾暂扣于此。他们前来是为回应有关折磨玛丽·沃伦的指控。（至于巴拉德那生病的妻子，她在混乱中被人给忽略了，大概只多活了五天。）卡里尔兄弟均是相貌堂堂的年轻人，魁梧又聪明。两人都否认知晓巫术。情况比想象中的棘手，法官们一时无法应对；审讯随之陷入僵局。这时，可爱的小玛丽伸出援手激励法官，也刺激了两兄弟的回忆。她为两兄弟作答。他们曾与魔鬼一起飞行；在魔鬼的指挥下，理查德将一枚铁纺锤用力插入一名受害者的膝盖。他们还将另一个人刺死。小玛丽的母亲抗议称，她没有参与那场袭击。她的女儿很快纠正了她，就像常常纠正自己那样：“你参与了，妈妈，不要否认了。”玛丽·莱西接着确认了几个名字，描绘了刑具和一场女巫们用烟斗烧死受害者的行动。小玛丽不像她母亲，她没有丝毫犹豫，一直顺着哈桑的话，讲得惟妙惟肖。不过，理查德·卡里尔就没有那么配合，人

家说东，他就偏往西，否认夜间飞行和烟斗烧人。小玛丽以一种貌似熟稔的口气刺激着他。他们是一起动的手！难道他不记得他们在飞行中的对话了吗？还有他的计划——招募他的弟弟，杀了巴拉德的妻子？听到这儿，玛丽·沃伦开始颤抖。她的口中流出鲜血。法官们赶快将两兄弟带去隔壁的房间。

返回后，两兄弟的态度就软化了。理查德首先承认指控，话语清楚有力。他已侍奉恶魔整整一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镇上，当时恶魔对理查德来说还很陌生，但他猜理查德对黑夜独自骑马回家感到不安，便提出与他随行。之后，理查德便听从他的调遣。他曾两次飞到帕里斯的牧场。魔鬼已经对他和其他五个人施过洗；因为理查德折磨了伊丽莎白·巴拉德，魔鬼对他青睐有加。安德鲁回来时，理查德告诉他自己已经承认了。安德鲁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之前他“说话非常结巴”，现在却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是在6月和魔鬼签订契约的。夜间，他们在安多弗的一个果园会面。两个男孩都非常可信。有了他们清晰的证词，法官们终于触及此案耸人听闻的核心部分。

两个月前，大多数塞勒姆村民正忙于修剪羊毛、搅动糖浆、将牛奶发酵成黄油、播种印第安玉米，与此同时，大批女巫降落在帕里斯家的油绿草坪上。召唤她们的号声在方圆几英里回响。阵阵鼓声响起，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骚动——女巫们最远的从康涅狄格来，搭乘你能想象到的各种飞行工具，历经数个小时，匆忙降落在塞勒姆。不是所有女巫都能准确描述她们是如何涌入塞勒姆的。安多弗的女巫在几分钟的时间内陆续到达。玛丽·莱西自然是与她母亲和玛莎·卡里尔一起骑在那根坏了的杆上。理查德·卡里尔一开始想不起集会那天的日期，但是——他努力回忆了一下——承认他是和玛丽·莱西一起飞过去的。他们兄弟俩的交

通工具不怎么便利；魔鬼幻化成一匹马，肩上扛着一根杆，卡里尔兄弟俩就坐在杆上。有个农民独自骑在一根树枝上。大多数人分成三或四人一组，共骑一根杆。安·福斯特和玛莎·卡里尔飞在最前面；其他来自安多弗地区的人后来跟上了她们。福斯特只数出了二十五名女巫。理查德·卡里尔则供称他们一共有差不多七十个人。小玛丽估计有一百个。魔鬼以一个戴着高冠帽的黑人形象出现，那高冠帽在瑞典的传说中也出现过。一名参会的神父注意到，魔鬼的一只脚是裂开的。

女巫们沉湎于邪恶的仪式中，因为是由女性主持，仪式更加可怕。丽贝卡·纳斯坐在圣餐桌的一头，即魔鬼的身边；她和伊丽莎白·普罗克特一边念咒，一边分发绯红色的酒和面包。纳斯让阿比盖尔·霍布斯相信，她们喝的是血，“比葡萄酒更甘美”。帕里斯的外甥女证实，她目睹了众神父吃喝。他们喝的是什么？“他们说是我们的血，一天喝两次。”她作证，吸血鬼似地扭了一下。至于面包，它“红得像生肉”。一名参会者看见玛莎·卡里尔倒酒。小玛丽回忆说，面包不够多。无奈之下，有的人只好偷食物，还有的人，就像她的外婆，随身带了吃的。不是每个人都吃了。即使在那样一场撒旦集会上，仍有零星的抵抗，无惧于附近驻扎的一百零五名幽灵剑士方阵。十六岁的安德鲁·卡里尔用一只陶杯喝了酒，但他没有吃东西。他坐得太远，没有听到魔鬼主持圣礼时说的话。阿比盖尔拒绝食用甜美的面包和酒；她的母亲也没喝酒。安·福斯特一直保持着距离。默茜·刘易斯反抗得最激烈，向那些送来血肉面包的人啐唾沫。“我绝不会吃！”她怒吼。有一些喝了酒的人，觉得酒是苦的。

伯勒斯牧师和另外两人一起主持圣礼。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牧师，尽管经过一再审问，也没人能指认他们。科里夫妇、普罗克特夫妇、约翰·威拉德，还有其他几名嫌疑人都参加了，此外还包括已被处以绞刑

四个妇人。到场的几个人向他人炫耀华丽的服装；伯勒斯看上去兴致很高。魔鬼拿出他的圣书，众人有的用血，有的用手指，有的拿木棍和笔，还有一个人是在白色树皮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大部分签名都是红色的。只有一个参会者犹豫了一下，但他立刻就后悔了。他的犹豫激起了“可怕的动作、噪音和尖叫，几乎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大家都在书页上看到同伙的名字。他们通常签订六到八年期限的契约；随着夏天过去，签署契约的人也越来越多。对于细节，仍存在一些不同意见——毕竟不是谁都像小玛丽那么好记性，能记得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节——但关于魔鬼安排的任务，没人提出异议。魔鬼命令他们摧毁马萨诸塞湾的各个教堂，从帕里斯的家到塞勒姆镇，无一可幸免。在他们的地盘上，他们将为撒旦建立他的王国，麾下之人均能快活度日，过得比现在更好。

异常行为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不同的欲望得以满足。魔鬼很少高高在上，向底下的凡人敷衍地挥手。他一般进行货真价实的交易。他给理查德·卡里尔送新衣服和一匹马；还用房屋和土地来诱惑他的弟弟。一个农民为一大家子的生计奔波，魔鬼替他偿清债务。魔鬼给一位安多弗木匠许诺了民兵上尉的位置。他许诺给十四岁的斯蒂芬·约翰逊一双秋天穿的法国制鞋子；对另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则以一套衣服为诱饵。他向一个十三岁的安多弗女孩保证，他会宽恕她的罪过。他承诺会送一条黑狗给一个孩子。面对一个博克斯福德老妇，他用了屡试不爽的法子：帮她报仇，打击她的敌人。魔鬼的诱惑也可能特别针对女性。一名五十五岁的女子将拥有她一直以来热盼的“充分的满足和宁静”。（可魔鬼并不能真的能给她；她的生活反倒愈发悲惨。被施以绞刑时，许多人发觉魔鬼未能兑现他的诺言，好像是他违背了诺言，使得交易不算数。）情感丰富的小玛丽想要的可能是荣耀，这是她在家里得不到的。魔鬼夸下海口，令人尽皆知；有的人听见玛莎·卡里尔吹嘘说魔鬼许给她地狱王后的头衔。她会像个牧师一样打理地下之事。魔鬼还

伪装成伯勒斯的样子，承诺将消除人们的恐惧。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魔鬼向另一位追随者画出一张更大的饼。他不仅打算“消灭所有的教会”，而且会让众生平等。取消审判日，去除耻辱和罪恶，岂非绝妙？若非如此丰厚的回报，谁都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灵魂。

在卡里尔兄弟提供了懊悔的证词的两天后，约翰·普罗克特开口要了一些纸。普罗克特是第一个被逮捕的，自4月起便被关在狱中。后来他的家人几乎都被捕入狱。在塞勒姆的铁窗里，他在地板上写下一份请愿书；之前，他也曾为嫌疑人作证过。这位直率的酒馆老板早先宣称，那些任性妄言的女孩就是在讨打，而对于那天集会的事，他也另有一套说辞。那一周共有五个人认罪。他跟这五个人都说过话；他们都伪造了供词。7月23日，这位直言不讳的塞勒姆农民发问了：他既然戴着枷锁，被关在监狱里，又怎么可能去参加那场恶魔的圣餐？那五个承认参加安息日集会的人中便有卡里尔兄弟。普罗克特碰巧知道他俩的遭遇。法庭书记员写道，兄弟俩被押解出去时，“他们的手脚被绑住了一小会儿”。普罗克特揭露称，这说法太委婉了。安德鲁·卡里尔突然流畅地招供，并非无缘无故：被押送出法庭后，兄弟俩“不愿承认任何事情，直到被五花大绑，以至于鼻子都快喷出血了”。直到那时，他们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让普罗克特更加愤怒的是，他的儿子也被吊了起来，鲜血从鼻子里喷涌而出。如果没有官员大发善心干涉，这种酷刑会持续整夜。^[2]

如果普罗克特参加了审讯，那他要谈论的便不止上述折磨了：在法官们的连续敲打下，安多弗人的供词终于成形。小玛丽的证词如子弹般射出，不过是通过提示、跳跃、建议和计划；法庭在她眼前以脱罪作为诱惑，就如同魔鬼晃着荣耀一般。在千锤百炼之下，供词到了8月更加准确，庭审记录在原先骨架的基础上渐渐变得血肉丰满。当然，一些地

方还存在出入，法官将其记为魔鬼的诡计。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一致反而可疑；魔鬼已经搅乱了新兵们的脑子。所以，有些问题玛丽·莱西答不上来，是完全说得通的。恐怕魔鬼已经抹去了她的记忆。玛丽·莱西爬上楼梯去参加审讯时，又有一名嫌疑人决定认罪。后者发觉，在房间里她做不到。她解释说，恶魔“确实从她脑子里偷走了东西”。

普罗克特清楚，他的审判已经定在8月2日，和伯勒斯在同一天；所以要来纸后，他写得很急。他给五名波士顿的知名牧师写信，包括马瑟和塞缪尔·威拉德，他在信上警告说，一场可怕的司法不公将要发生。他不是为他自己发声，而是为他的狱友。他们全部是无辜的。他们都知道，审讯不可能公平。经过商量，他们只能得出一个解释：魔鬼挑起法官、牧师、陪审团和人民针对他们。普罗克特表述得非常直接：在踏入斯托顿的法庭前，嫌疑人们就已被定罪。他们的产业大多也都不复存在。他对自己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但没有写在信中：他被逮捕后，乔治·科温突袭了普罗克特家十五英亩的农场，贩卖和屠杀牛群。他没收了普罗克特家的财产，为了酒桶而倒空酒，为了汤锅而清空汤。他没给家里年幼的孩子留下一丁点食物。普罗克特恳求牧师们，要么指派别的法官，要么让法庭减少偏见。塞勒姆法庭上的人群和治安官一样残忍。能不能请求至少一部分牧师来到塞勒姆，看看这里的情况？

普罗克特不曾像卡里那样斥骂法庭，也没有像奥尔登那样激烈地反驳指控。他也没有中伤那些受害的女孩。他不像别人要从魔鬼那里讨要荣耀和快乐，或是法国产的秋鞋，他要求的只是一场公平的审判。他写信给那些他认为富有同情心的人；其中有三个来自波士顿第一教堂，那里没有一人是涉及巫术案的法官。（讽刺的是，那儿也曾是帕里斯在波士顿的家。）他刻意加了几句，想让收信方感到不安。魔鬼傲慢地复制他们的举动，拙劣地模仿洗礼和圣餐的仪式，这是对魔鬼最高的赞美。

但是，法官们的某些言行竟开始变得像魔鬼，这就很糟糕了。普罗克特控诉称，斯托顿的法庭像是审问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审问者的言行举止“如同教皇般残忍”。^[3] 这又何尝不是清教徒最可怕的噩梦；科顿·马瑟在记录恶魔集会时，可是毫不犹豫地用了“龙骑兵”这样的词。他的父亲曾大肆指控天主教是邪恶的巫术。事实上，巫术法庭似乎已经中了它所痛斥的巫咒。

如果说，想要以智力战胜魔鬼是极其困难的，那么，直言不讳的普罗克特将会知道，撬动牧师们的死脑筋更是难于登天。倘若他收到回信，也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了。十二天后，他如期走上法庭，接受盘问。但是不得不说，普罗克特选择了正确的诉求对象。只要能产生阻力——哪怕只是些许不满——这阻力也是产生于最杰出的神职人员之间，这些波士顿人都是对幽灵世界有第一手经验的专家，会对地方法官发出引导性的呼吁。英克里斯·马瑟在1684年出版过一本影响深远的书，他儿子科顿·马瑟后来的那本《难忘的天意》正是对它的一种致敬。英克里斯·马瑟在书中明确质问各种各样的巫术指控。“事实上，”他指出，“世界上确实充满各种难以置信的事件，与魔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些事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事都超出人类及其他生物所能及的范畴。”若非奇迹，女巫们不可能变形成马、狼或是猫。1671年，威拉德留下一段关于他家十六岁仆人的著名描述，那人言行无状，咆哮不止。他将其称作“上帝古怪且不寻常的天意”，而不愿用“巫术”“附身”一类的词。普罗克特去信的五位牧师都曾在1688年与约翰·古德温一同祈祷。三位曾签名支持《难忘的天意》。他们还大多签字不准罗森的塞勒姆布道记录出版。^[4]

就像普罗克特抱怨的那样，塞勒姆的牧师、法官、陪审团和百姓脚步一致，动摇不得，波士顿的神职人员们却步履蹒跚，茫然失措。丽贝卡·纳斯被绞死后的第二天，一群牧师突袭了约翰·奥尔登船长的家，那时正是船长在监狱度过的第七周。和休厄尔一样，奥尔登是威拉德任牧师的波士顿第三教堂的长期成员，此教堂也是波士顿唯一同时产生巫术案嫌疑人和法官之处。为了不肯示弱的奥尔登船长，一群波士顿显要人士和几名牧师轮流领头祷告，吟唱颂歌。塞缪尔·休厄尔负责布道。这位巫术法官的出现，令牧师们若有所思又迷惑不解；他们如此祈求上帝干涉奥尔登的事，究竟是在为正义还是为清白祈祷？不管是哪一种，牧师们至少都愿意为了奥尔登祈求上帝。在狱中，约翰·普罗克特恳求诺伊斯牧师给予一些安慰，被后者断然拒绝，“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个巫师”。7月20日，奥尔登的朋友们一起祈祷了整个下午，以《诗篇》第一百零三篇作为结尾：“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至少有部分诉求得到回应：那天晚上，久旱逢甘霖，大雨倾盆。

神职人员内部无法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该问题同时也极大困扰着塞勒姆的法官们：他们难道已经沦落到需要向一名十八岁的女孩寻求意见了？魔鬼会否在某人不知情或不合作的情况下冒充此人？他们本在6月底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到了8月1日早上，他们来到哈佛学院，爬上通风良好的二楼图书馆时，这个问题却更加紧迫了。他们为奥尔登举办斋戒，这似乎能证明，有些人确实认为可能有人被无辜牵连了。八位牧师参加那天的会议，包括普罗克特写信诉求的三位。英克里斯·马瑟在弥漫着浓烈烟味的房间里主持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关于一个人是否可能既是巫师、但自己又不知情的问题，现在的回答是肯定的。（6月时，塞勒姆的法官们持否定态度。）同时，牧师们也做出一点让步。虽然这种事情是可能的，但是“非常罕见，非常特殊”。牵连无辜是很不寻常的情况，“尤其是在民事司法中”。换句话说，无罪之人很少会受到

法院审判。该声明给法官和法庭程序撑了腰。但它也留下一个漏洞：牧师在必要时可以为某些人免罪。

这些牧师中，至少有少数几个，努力确保某些案件不会走到开庭审理那一步。他们同意约翰·普罗克特的意见，哪怕只是心照不宣：马萨诸塞确有女巫不假，但斯托顿的法庭未免太过冷酷，竟无一例缓刑。

（更加讽刺的是，马萨诸塞绝对有女巫，但他们的朋友之中绝对没有。）在塞勒姆的法官下令再次逮捕安多弗嫌疑人的两天后，卡里船长的妻子不知怎么竟挣脱了她那副坎布里奇制的八磅重枷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休厄尔的报告中，既没有读到对其逃跑行为的愤慨，也没有读到对一个凶残女巫的恐惧，要知道，他的法庭正打算起诉她，而她很可能在波士顿地区四处流窜。此前，已经有几个塞勒姆男子不知去向。

（约翰·奥尔登将在9月中旬消失，藏身于达克斯伯里。）法庭再一次开庭前，普罗克特写信求情的牧师之一，约书亚·穆迪，协助另一人逃跑了。

尽管一再遭到逮捕，四十一岁的菲利普·英格利希在整个5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虽是个体格魁梧、身形笨重的大老爷们，又是塞勒姆最著名的船主和商人，却在那段时间躲在波士顿的一户人家，整日藏身于一袋袋脏衣服中，使得当局无法找到他。^[5] 他出生在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原名菲利普·朗格洛瓦，后来在塞勒姆发迹，到了1692年已拥有十四幢楼房、一间仓库、一座码头和一支船队。他的妻子玛丽是塞勒姆镇奠基者家族的后代，时年三十九岁，非常虔诚，受过很好的教育。她于4月21日被捕，托马斯·帕特南正是在同一天发出那封装腔作势的信函。当时，夫妻俩还住在有许多山墙的华丽房屋里，那是塞勒姆一栋顶好的建筑。他们雇用了很多人手，菲利普还从泽西岛招来佣人，可这也不奇怪，毕竟他是一位商业大亨。他与法国、西班牙和西印度港口交易广

泛；他的二十一艘船在新斯科舍到弗吉尼亚的海岸间固定往来，经营生意。英格利希性格强硬，是社区的领袖，会在觉得合适时履行保护社区的职责，为此，他早前出庭做出解释。一直到7月，他在教堂长椅上的位置都紧挨着斯蒂芬·休厄尔。他与塞缪尔·休厄尔有生意往来。他还是伊齐基尔·奇弗一位亲戚的房东，奇弗有时在法庭担任书记员。

英格利希眼里闪着精光，从不屑于割地求和，但在被控欺诈时，他忍无可忍了。起诉他的是一个激烈又强硬的新英格兰人，对他无休止地纠缠，他唯有出庭作证。据说他作为原告，在过去二十年间，至少在法庭上现身十七次；这足以证明，无论如何，他笃信马萨诸塞的司法。英格利希说话带有口音，来自一个从属于天主教国家、却信仰圣公会的小岛，漂洋过海后成为笃信独立精神的杰出移民，曾在人民反对新英格兰自治领政府建立胡格诺派难民社区时支持政府。相比菲普斯政府，他更倾向于安德罗斯的政权，部分原因在于他欣赏才能。他在政坛一路顺风顺水，从陪审员到治安员，再到今年3月被选为行政委员。英格利希或许会因诸多事端受到指控，但是——除了他那魔法般的生财之道——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因巫术这种事被指控。

托马斯·帕特南代表四名塞勒姆受害女孩向菲利普·英格利希重新提起诉讼，但十八岁的孤女苏珊娜·谢尔登是单枪匹马与英格利希夫妇斗争。在那场魔鬼集会上，英格利希从教堂的长条凳上扑过来掐她。他咬了她；他扬言要割开她的喉咙。他与一个戴着高冠帽的身影相会。他将一个人溺死在海中。英格利希还打算杀死总督。谢尔登曾看见一只黄鸟停在玛丽·英格利希的胸口，后者已经做了二十年的女巫。到了6月，在最初的逮捕令下达六周后，英格利希也被关押。他尚未被捕的那几个星期，他的名字在庭上被反复提及。在凡人世界里，他与几个法官都有生意往来，而在幽灵世界里，他与伯勒斯和普罗克特定期会面。

英格利希本应出现——或被指望出现——在8月2日的审理中。但是，只要恶魔集会在细节上有进展，英格利希夫妇就会找穆迪牧师商量。穆迪是一位资深牧师，也是一个特别温暖、机智的人。他曾在边境工作过——在那里，他同时担任教堂牧师和菲普斯的军队牧师——而且和超自然事物也打过交道。英克里斯·马瑟创作他的大部头著作时，穆迪牧师向他提供素材。他也曾因对上帝大不敬，遭到当局的追捕。八年前，新英格兰自治领政府统治时期，他曾拒绝根据圣公会的仪式，给新罕布什尔提供圣餐。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向外省提供圣餐乃是天意”。他选择了无视，结果就因为藐视女王的法律而被判六个月监禁。（他被关押十三个星期，比英格利希还长。）7月下旬，穆迪牧师依照《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布道，其中有这么一句：“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他传递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但是巫术案犯人仍然迟疑，请穆迪和塞缪尔·威拉德再行表述。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了？穆迪问，当时大约是7月31日。英格利希希望他可以说得再明白些。牧师坚持要他逃跑。英格利希颇为迟疑。他知道潜逃的滋味。他有自己的原则。他的商业事务此时也已陷入混乱。“上帝不会允许他们碰我，”据称他如是说。他的妻子提出异议。她问，他真的以为被绞死的六个人是女巫？她的丈夫不这么认为。那么，他们如何能逃过一死？“听穆迪先生的吧。”她恳求道。虽然穆迪才是那个更加坚持纪律的人，但这一次他明确表示，如果英格利希没法保护妻子的平安，他会亲自上阵。他已经安排了几个波士顿人护送这对夫妇离开马萨诸塞。于是，这两名嫌疑犯逃走了。

他们逃走数日后，大陪审团从证词中得知，英格利希用巫术谋杀了邻居的儿子。（邻居还说，那天他对一个朋友说，他不满意英格利希对土地的设计，然后在骑马回家的路上，鼻血忽然狂流，浸湿他的手帕，还弄脏了马的鬃毛）。一个十六岁的塞勒姆佣人发誓说，这对夫妻曾威胁

将他撕成碎片。他作证时，英格利希夫妇已经逃到塞勒姆数英里外，正在前往纽约途中，那里的总督弗莱彻·本杰明据说已经向他们提供庇护。这是很有可能的，尽管弗莱彻直到8月30日才上任。纽约将在这场危机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还没到时候。纽约和新英格兰的两个殖民地虽联络密切，但交情不深，各自安排也大相径庭。弗莱彻观察到，北美殖民地之间“就像基督徒和土耳其人那样，利益和情感分歧很大”。他们不想向马萨诸塞新政府示好。 [6]

普罗克特一周前掷地有声的问题，现在也被英格利希夫妇向波士顿的神职人员提出。他们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他们逃脱，是因为他们得到那些稳重且颇有影响的牧师的支持，牧师就算公开赞同某事，私底下也能使计避免其发生。不过奥尔登、卡里和英格利希夫妇的逃脱还有一重因素，它同样使得许多人在塞勒姆的法官们面前犯错、结巴，乃至大脑一片空白。那便是，即便是在1692年，富人是受到另眼相待的。一开始，新英格兰的奠基者们便再三强调等级观念。1630年，还在船上的时候，约翰·温思罗普就宣称，上帝凭借卓越的智慧，洞察到“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人富有，有的人贫穷，有的人位高权重，有的人身如蝼蚁，唯有服从”。虽然大家都侍奉同一个上帝，但是在1668年，斯托顿还是提醒他的教众，“有的人地位高，有的人能力不足，地位也相应低下”。能力更加出众的人，发展得更好。我们并非生来平等，死去时也不会如此。那么，在我们活着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假装如此呢？ [7]

就算是在仆人中，也有上等阶层。（提图芭是属于最差阶层的最底层。）天堂也分各种等级，有智天使和炽天使，有天使长和一般天使。魔鬼也非生来平等；有负责跑腿的，也有专门管事的，有强大的恶魔，

也有底层的妖精，有些魔鬼的资质更高、成就更大。“魔鬼也有君主制。”科顿·马瑟指出，虽然这不过是愚蠢地效仿现实世界。像菲利普·英格利希，或白手起家的马萨诸塞总督，甚至是作为外来公职人员来到马萨诸塞的巫术案法官约翰·理查兹，都体现了经济地位上的流动性。相比之下，社会等级要更加稳固，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自我延续的。你可能不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却不难把握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塞勒姆镇教会礼拜堂的座次也体现了这种等级制度，人们相互排挤、掣肘和中伤，极易导致世仇和积怨。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沃本镇的教会甚至专门安排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座次问题。这是为了防范类似下述情况——有个纽伯里女人以一种“完全与她的性别不相称的方式，爬过、骑上或跨过”五英尺长的教堂座椅，在墙边的位子上大抒己见，影响集会。那些坐错位子的人面临巨额罚款。^[8] 所以，一个要养一大家子人的中年安多弗农民，有充分的理由渴望一个平等的社会，正像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与魔鬼联合一般。“但凡在社会中追寻平等，最后只会令一切陷入混乱，”早年，一位伊普斯维奇牧师警告道。帕里斯对等级非常敏感，这是有原因的：在巴巴多斯，他属于上流精英阶层。该岛的权力和财产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相应的，他的女儿——以及她所受的苦难——所引起的关注，也远甚于任何塞勒姆的女孩。

地位差别无时无刻不在显现：在家里，在安排座次时，或是在大街上。村里的女孩们对众人的背景都很了解，深知谁的社会地位高，谁的社会地位低。华丽的着装是富人的特权；她们观察到的富人着装有多漂亮，魔鬼允诺她们的丝绸和衣服就有多漂亮。只有绅士才能穿有金色饰带的外套。在着装上超出自己的等级是严重的冒犯，无论男女都常为此出庭接受问讯。^[9] 违法行为时常发生。许多女性被控非法穿戴丝绸帽兜——这是专属于那些丈夫资产超过两百镑的女人的特权，甚至约翰·普罗克特、塞缪尔·帕里斯和托马斯·帕特南的妻子都无权穿戴——而后

她们出庭为自己辩护。（尼古拉斯·诺伊斯的母亲也被控告过，她成功地挑战了这项对她穿着超过自身地位的指控。招架住指控的女性，更多地责怪新英格兰人强烈的嫉妒，而非清教徒的华丽服饰。）社会等级也决定了哈佛学院毕业生的次序。科顿·马瑟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他的一位表亲，后者是当时总督的孙子。斯托顿排在班级第一。希金森的大儿子排在1670年毕业生的首位，伯勒斯排在最后。直到1769年才出现按学生姓氏字母排序的方式。

司法是公正的，但惩罚依社会地位而定。一位绅士是不会遭受鞭刑的，除非罪行特别严重；犯罪的主人和从犯仆人也会有不同量刑。在1684年被定罪时，穆迪牧师要求免除牢狱之灾，“牢房实在太冷、太肮脏，而我的教育层次和生活水平这么高，让我去坐牢岂非虐待？”最终，他在一户私宅服满刑期。禁奢法让人们安分守己。同样的，巫术审判也充满了等级偏见。印第安佣人不会和船长的太太混住在同一地方，就像是少女不可能去给大学者辅导法理一样。同理，1692年逃走的疑犯要么有钱，要么和愿意合谋的牧师关系紧密。巫术本身也有等级和家长制度。女巫从一个比男巫还厉害的人物那里获取法力。小安·帕特南早前揭露，此人是个魔法师。他恰好也是男性，虽然常常变形，却从未改变过性别。

安·福斯特也许能够高速飞过埃塞克斯县，但是——即便她是一位安多弗富农的遗孀——她无法逃脱。她的小叔子来自劳利，帮她逃出了伊普斯维奇监狱。但她没能逃得很远，小叔子也为此交了一笔罚款。村里的女孩们在5月指控了十六岁的伊丽莎白·科尔森，当法庭发出逮捕令时，她已经不见了踪影。据说她已逃出马萨诸塞，藏在波士顿或者坎布里奇。9月初，治安官和一个手下追踪她到了雷丁的外祖母家。（彼时，她的母亲、外祖母和姨妈已经通通被逮捕。）他们在安息日的早晨

来到雷丁，准备在她外祖母家抓捕她，却发现大门紧锁。治安官请求同事协助，突然，他们听到后门开了。一个女孩冲了出来。他们手握警棍，穷追不舍，接连跃过邻居的田地。在快追上伊丽莎白时，其中一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明知肯定会被抓，她干吗还要跑？他没有得到回答。伊丽莎白竭尽所能地跑着，在田里被绊倒，然后又站起来，往身后摇晃着一只手，好像在攻击追赶者。两人跑不过她，便放出狗。狗周旋在伊丽莎白身旁，紧盯着她，但没有攻击。他们一直追到灌木丛边缘的一面石墙前。到那里时，伊丽莎白已经不见了。治安官用力抽打灌木丛；一只大猫冲出来，怒目相向。治安官转而用警棍打它，吓得它赶快逃命。显而易见，科尔森变形了。她的出逃非常大胆，好比猎狐时狐狸占了上风。这事情令两位已是成年人的治安官摸不着头脑。不过，仅十天后，科尔森便被关进坎布里奇监狱。与此同时，英格利希夫妇的下落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狗在身边，警棍在手——却没有人像追踪之前死刑案的逃犯一样追踪他们。

负责逮捕的官员并非嫌疑人的头号敌人。当玛莎·泰勒——一个安多弗铁匠之女，时年十六岁——被逮捕时，她倒没有突然从后门冲出去。她是一个虔诚的女孩，本无罪可认。不过，那是在她和哥哥（更准确地说是继兄）一同前往塞勒姆之前。在三小时的行程中，他一路刺激她。她恳求他停下，她对巫术一无所知。他们抵达塞勒姆后，她被领进一个房间，在她的身旁，一边是哥哥，另一边是约翰·爱默生，格洛斯特特的牧师。爱默生可以看到她身前的魔鬼。他伸出手，用力将魔鬼打跑。两人合力压制住她后，爱默生无情地说：“好吧，我看你也不会坦白了！行，我这就走人；接着，你的身体和灵魂都将被永远毁灭。”爱默生还兼任小学校长，有的是办法让孩子们说实话。她的哥哥命令玛莎不许再说谎。她，就是一个女巫。“好哥哥，”她恳求道，“不要这样说；如果我承认了才是撒谎，我该如何向上帝交代？”他不为所动，坚

称她与撒旦同谋，“上帝如何能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好人被你蒙蔽，你若不承认，终将被绞死。”玛莎屈服了。她宁愿被关进地牢，也不愿再承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其他人也是一样，与其忍受长时间站立、不睡觉、被无情质问的痛苦，不如赶快承认。很多人再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其他人则开始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一切。

随着8月开庭的临近，时间似乎流逝得更快；忧虑不安的情绪散布在各地。尽管大陪审团坐镇塞勒姆镇，大部分陪审员都要长途跋涉，哈桑和科温还是不辞辛劳，坚持在各自的村庄召开审讯。在伊丽莎白·卡里越狱的那个周六，他们在村里审问了玛丽·图塞克。她是个接生婆，六周前死了丈夫。她的丈夫年仅三十七岁，是比尔里卡的赤脚医生，被控是巫师，最终死在狱中。她的大女儿已经招供。鉴于图塞克的妹妹是玛莎·卡里尔，法官们必须好好审问她。她不服指控，多次发誓，“她只会说自己是无辜的，如果他们要她说别的话”，她宁愿死在绞刑架上。但她现在突然想到，但有些不确定：也许，那些话其实是魔鬼说的？她身边没有痛斥她的牧师或亲戚，于是她给自己施压。她反复思量，之所以无法招供，到底因为她是无辜的，还是因为恶魔逼迫她保持沉默？有时他会干扰她的祈祷。有没有可能，她无意中和他签订了契约？她始终小心谨慎，试图既满足权威人士的意愿，又不歪曲事实真相。她现在明白，坚持清白就等于证明自己罪大恶极。与此同时，被施咒的女孩们不停地折腾她。她终于招供了。她手里紧攥着一块抹布，承认折磨了一个安多弗人，令他长期痛苦不堪。她是个女巫——她对此深信不疑，或者说，她已经说服了自己。她做女巫还不到两年。魔鬼许诺她，会让她和儿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图塞克在7月30日的供述中，牵连出其他十一人，包括她的妹妹、外甥、女儿，还有伯勒斯，并称自己曾两次参加在帕里斯的牧场举办、

由伯勒斯主持的集会。关于这些事情的缘由，她比任何人交代得都多。她断断续续地讲，好像窒息了，又好像呼吸过猛。但她也有她的疑虑。她认为——她去参加集会了；她将手放在那里的一本书上；她们的目标是推翻教会；她还听到了号角声。但她不确定，她究竟是在对谁宣誓效忠。“魔鬼非常狡猾，一旦她想招认，便阻止她，”法庭书记员这样写道。撒旦用圣经哄骗了她。哪一章节？一位法官问。图塞克答，是有“让我的敌人蒙羞”这句诗的章节。正是这句诗让她心如铁石，只愿她的指控者去死。

她对魔鬼产生信任的方式也很具有代表性；在虔诚的外表下，涌动着怀疑的暗流。经受洗礼后，图塞克感觉自己的情况变糟了。之后她的状况一直没有明显改善。那年春天，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完全俘虏了她；她不时从抵挡袭击的噩梦中惊醒。当她焦虑不安、备受煎熬时，一个黄褐色皮肤的男子出现了。他会保护她，但之后她需对他祈祷。她欣然同意。也许，她现在意识到，自那开始她便一直在与撒旦交易！敌人究竟是谁？他会不会就是你本人？围绕着这些问题，她有太多的困惑。最终，玛丽·图塞克与魔鬼达成交易。她三次提起，魔鬼终于允诺“将她从印第安人手中救出”。事实证明，这交易是很明智的。她交代使用巫术四十八小时后，印第安人袭击了比尔里卡。

你若认定自己是“荒野中的羊群”，便相当于在大张旗鼓地捕食者。自从新英格兰创建以来，许多捕食者早已开始捕猎行动——或伺机行动。按玛丽·罗兰森（可能在牧师的帮助下）说的，印第安人是“残暴的狼”，“咆哮的狮子和野蛮的熊”。在马瑟的书中，美国土著经常被形容成老虎，魔鬼也被写成老虎或咆哮的狮子。贵格会用行动表明自己是“凶暴的豺狼”。他们与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充当着新英格兰恶魔动物园里的虎豹豺狼。老安·帕特南在5月的审讯上遭到巫术魔镇，变得

像木板一样僵硬。只有出了礼拜堂，她才从“那些吼狮的爪下和暴熊的口中”——借用罗森在3月25日的布道中用的词——逃了出来。就像真实的边界与道德界限趋于模糊，那些狂暴肆虐的捕食者也开始融合。（在5月的布道中，帕里斯将路易十四、他的天主教同伙，以及挑唆女巫和巫师的恶魔归为一谈，至少前两个在塞勒姆是见不着的。这种想法绝非帕里斯独有。）^[10] 在大多数语句中，“印第安人”都可以用“天主教徒”来替代，而且并不改变原意。不可避免地，这将招致颠覆活动。^[11]

印第安人当然也是“可怕的巫师和邪恶的魔术师”。这很能说得通；荒野本身便是“魔鬼的巢穴”。从摩西那时候开始，黑暗之王撒旦便在荒野发迹。得知“世界上那个他统治多年、不受控制的角落”被清教徒占领，恶魔很不高兴。事实上，马瑟断言，恶魔为此大发雷霆，所以经常搅浑畜禽的饮水。印第安人、狼和魔鬼组成了“荒野中的恶龙”。在马瑟看来，参加英国国教等同于接受魔镇。贵格会成员则是陷在魔鬼网中的一群麻风病人。贵格会如同“蟾蜍汁”一样糟糕。在人民受到压迫、气氛恶劣的社会中，很容易产生勾结合谋的罪行。

混杂的恐惧令人们开始胡乱指责。大火在波士顿燃起时，人们都说是浸礼会的杰作。是谁割了晚间在坎布里奇公地吃草的羊儿的喉咙？罪魁祸首当然是狼，但在1691年末，说是法国人倒更合理，正好方便大家禁绝法国人。1689年，为了煽动反对安德罗斯的情绪，马瑟提起（虚构的）十年前的“天主教阴谋案”（Popish Plot），这件事在新英格兰人心中依然历历在目。新的印第安人的战争似乎是“阴谋的一个分支，企图让我们受损”。马瑟将菲普斯在魁北克战役中的惨败归咎于波士顿的英国国教，正是它惹怒了上帝。借此，阴谋顺势而生。同样的，新英格兰人深信神圣的使命，坚持纯洁，也就易于接受契约。就像一个印第安线人所说的，新英格兰人“如孩子一般轻信”。^[12] 他们觉得自己昂首四

方，不可一世。清教徒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征，天生爱好阴谋；又因宗教是他们生活的中心，那些阴谋自然与恶魔有关。1688年，穆迪牧师就那些酝酿中的“难以名状的阴谋”发表了意见。塞缪尔·威拉德和塞勒姆的约翰·希金森，本都是温和、稳重的人，此次却激烈辩称天主教徒的阴谋也许即将对准马萨诸塞。就在法国人施展巫术渗透格洛斯特之前，有谣言称一船爱尔兰人正向马萨诸塞来，企图在新英格兰建立罗马天主教。当然，能够自由改变形状的恶魔破坏者们另有所图：凡是新英格兰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朋友。在他们的“教堂”里，这些人都坐在长椅上。尤其是在几个月的政治风暴后，共同的忧虑给了人们充足的理由，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噢！别吵了，”马瑟于1690年恳求道，“立刻团结起来，对付比你们更加团结的敌人吧。”^[13]

罢免安德罗斯时，殖民地的精英们控诉安德罗斯处心积虑，要将人民交付给“外部势力”。（英国王室和英国军人也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虎视眈眈，和戴高帽的恶魔也差不多了。）1690年，科顿·马瑟在处于“前所未有的痛苦和危险”之中的新英格兰布道时，围绕重现的忧虑发表了讲话。他的话具有法律一般的强制力，且条理分明；人们的罪恶和不满招致“印第安和高卢嗜血猎犬倾巢而出”。当局未能保护“羊群”。如果没有特许状，新英格兰只能对野兽摇尾乞怜。8月上旬，马瑟正面针对塞勒姆危机的讲话表明，他关于巫术的布道与针对忠于英国王室的总督安德罗斯发表的激烈言辞无甚区别。他大量借用玛丽·罗兰森对印第安人的描绘：在前往“地狱集会”的途中，女巫将“穷人拖出卧室，带着他们飞越森林和丘陵，还一起飞过其他形形色色的地貌”。究竟“魔鬼的军队”是什么样子？马瑟鼓励他的教民们想象一下“残忍嗜血的法国龙骑兵军团”，那样他们就明白了。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当面对四处劫掠的印第安人，或斯托顿口中“嗜血的野蛮异教徒”法国人时，人们极度痛苦和无助。但对付女巫，还是有一些办法的。8月1日，

印第安人袭击比尔里卡，残杀两名妇女、她们的婴儿和两个未成年女儿（分别为十三岁和十六岁）。那天，法官们前往塞勒姆——在那个酷热难耐的星期，条条大路都通往塞勒姆。

8月来了一位新的检察总长，审判法庭被重新召集。出于政治原因，安东尼·切克利取代了托马斯·牛顿，他比后者大二十五岁，也是科温的朋友。虽然牛顿没有经过律师培训，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态度和蔼、做事认真的公职人员。相比之下，切克利的法庭经验更加丰富。他起诉过一桩更早的巫术案，更是在自治领时期就当上了检察总长。他将至少八名嫌疑人转移到塞勒姆。嫌疑人中没有寡妇、赤脚医生，或是牙尖嘴利的乞妇。切克利准备起诉的四名男子中，一人曾试图躲避追捕（即约翰·威拉德），一人曾向当局请愿，希望能换个关押的地方（即普罗克特）。另外两人，一人是狂笑着称说他是巫师还不如说他是秃鹰的乔治·雅各布斯，还有一人是牧师伯勒斯，或说魔法师伯勒斯。再一次，法庭显然知道该从哪里开始。8月2日早上10点开庭，斯托顿首先指控玛莎·卡里尔——刻薄的地狱王后，安·福斯特的安多弗飞行伴侣，此女罪大恶极，甚至在出生前两年就成了女巫，竟还声称受害的女孩皆为伪装，头脑都不正常。她的两个儿子都指控她有罪。上一次见到她时还是5月31日，她被押送出去，手脚都被缚住。之前针对她的审讯纷乱不休，令一向好脾气的检察总长难以置信，目瞪口呆。

大陪审团正在讨论卡里尔的罪行时，数周前牙买加遭遇大地震的消息刚好传到马萨诸塞。牙买加岛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罹难；罗亚尔港旁的城镇被大海吞没。房屋被冲走，还发生了山体滑坡。这场灾难带有圣经的色彩，再加上科顿·马瑟的复述，就更明显了：共有四十艘船倾覆，但没有一艘来自新英格兰。牙买加的清教牧师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马瑟本来决定那个星期四的布道要讲《启示录》。到了布道日，他才急

忙将最近听说的灾难加进去。地震的源头也与恶魔有关；恶魔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大发脾气。

那天，波士顿万人空巷。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道，有程式可循；他们将罪恶与痛苦匹配，警告说如若不变革，更大的恐慌将至。马瑟拿地震的新闻大做文章。牙买加人被“喘气呻吟的大地生吞，数以百计的居民被活埋”。他预言更多的不幸将降临：“你们将听到更多魔鬼显灵的消息，可怜的人将遭遇离奇的魔镇、附身，被地狱来的魔鬼所蛊惑。”说到塞勒姆的女巫事件时，他提出在法庭证词中从未出现过的细节，比如魔鬼会偷回之前派发给其新手下的钱，这是连狡猾的恶棍都不屑去干的下作之事。二十余名巫师现已供认不讳，最小的年仅七岁。他们指责自己的父母，后者将他们卖给恶魔。“若看到我最近看见的事情，就是铁石心肠也难以承受。”这是马瑟第一次暗示他曾到访塞勒姆，即便他没有参与任何一次庭审，却似乎一直在提供战略性建议。成群的魔鬼降临到了“阴云密布的埃塞克斯县”。他们凭借着无形的折磨工具，几乎毁灭了殖民地的第一座教堂。马瑟警告说，这一场魔鬼引发的瘟疫，从一个镇传播到另一个，由近及远。

马瑟还提到了与此相关的苦痛。“在我们之中”有着“令人焦虑的争论”，他承认这一点，甚至向怀疑者们致以敬意，后者在1692年可是相当活跃，不像我们今日理解的那般缄默。他敦促大家要保持克制。狂热和谣言已随着事情的发酵慢慢平息。他谴责诋毁和诽谤，正是它们最初鼓动了魔鬼。他伸出手，请求大家给予女巫同情，更请求大家给予法官怜悯。他们站起来反对的是当今最厉害的诡辩家。看上去，他已经用一根前所未有的细线将新英格兰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智慧的法官们正努力为无辜者正名，同时讨伐作恶者；这项使命是艰苦且危险的。迄今，法官们已经找到了充足的证据起诉“女巫团伙”，这令马瑟感到欣慰。但

是对于那些只有不切实证据的嫌疑人呢？敬爱的法官们有理由叫苦，像约沙法那样大喊：“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14] 魔鬼每时每刻都在掩盖事实，徒留法官们“带着罪恶，但热切甚至疯狂地，在黑暗中伤害到自己人”。

神职人员上一秒还在帮嫌疑人逃脱，下一秒便能支持起诉（连马瑟8月4日的布道听起来都既像是训诫，又像是鼓励）；村民先是指控自己的邻居，不久后又签署请愿书，为她辩护；维护和平的法官将对一名女巫的审查报告递交给当局时，偏要附文称此事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连遭到指控的女巫也不确定，脑中的声音究竟是上帝的还是魔鬼的——总而言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重重迷雾中迷失，却有一人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此人义不容辞，担负起马瑟所说的危险义务，惩恶扬善。此人正巧是巫术法庭的领头人，亦是马萨诸塞的代理总督——当时是8月1日，菲普斯正因一场新的缅甸远征而焦头烂额。那一周，菲普斯并没离开，还留在波士顿，但菲利普已经授权此人，让他在自己缺席时能继续行使权力。通过下达授权命令的管理艺术，菲利普甩开了塞勒姆的乱局，将它们全都留给他的副总督兼前政敌——无所不能的威廉·斯托顿。

8月3日，玛莎·卡里尔出现在一大群人面前，包括一帮黑衣加身的牧师，罗森、黑尔、帕里斯，当然，还有诺伊斯。我们不清楚她当时的样子——毕竟她在密不透风的监狱里待了两个月——不过马瑟将她描述为“猖狂的丑老太婆”，哪怕她当时才三十八岁。她被传唤上庭，举起单手，交代自己的身份。法院指控她“穷凶极恶地”施行巫术。她不认罪。她有没有像5月时那样，夸张地表达不屑呢？这一点法庭没有记录。执

法官带来一群村里的姑娘，相比较她们直翻白眼的阵阵痉挛，她们的证词倒显得苍白无力。卡里尔显然对她们无甚同情。她5月时就已经这样了，那时她指责法官：“你们竟相信这些精神失常的人的话，实在可耻！”安·福斯特那个五十五岁的儿子透露，卡里尔曾说就算那些女孩的头立时扭断，也和她没什么关系。从各方面来看，她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人。

自5月份的审讯开始，针对卡里尔的证据便逐步累积。她的姐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外甥女，都承认曾在她的陪伴下参加恶魔的集会。苏珊娜·谢尔登出庭指证她时，手腕又一次像被焊在一起似的。它们怎么样也分不开。托马斯·帕特南描述了自5月以来，他的女儿和其他四个塞勒姆女孩在卡里尔手中遭受的折磨；她们的四肢都几乎脱臼了。安·福斯特的女儿悲哀地承认，她和卡里尔曾一起参加恶魔的圣礼。卡里尔“将她的家庭成员引入了魔鬼的罗网”，毁了她的整个家庭。卡里尔脾气暴躁，牙尖嘴利，没什么人缘；她冲着年轻人的脸拍手，希望形形色色的不幸降临在邻居头上。那些诅咒效果惊人：一场土地纠纷最后演变成对方的脚部或腹股脓肿。卡里尔二十二岁的外甥从战争前线返回安多弗，身上多了一道四英寸深的血腥伤口。在他姨妈被捕前，那伤口之深，足以插入一根四英寸长的织针。她肯定地告诉他，这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了；可她一被逮捕，伤口便奇迹般地愈合了。（邻居的腹股脓疮也是如此。）卡里尔的外甥没有提到他们密谋推翻教会。可他提到的现象和贝弗利的约翰·黑尔所观察到的不谋而合：“不管抓了多少人，仍有更多人正在受到撒旦的折磨。”这已不仅仅是悄然进行中的恶魔阴谋所导致的。卡里尔的外甥已经失去了父亲，他父亲同样受到指控，六个星期前死在狱中。他母亲和姐姐则一直被拘留。他的一个表兄已经承认使用巫术。怀疑如同浑水，会将整个家庭搅和进来，倒不如认罪，还能有效地避免大家互泼脏水。但无论是哪一种，恐惧都一路相随。即便是那些

坚称自家人无罪的人，也将弯曲的手指指向别处。纳斯家的一个亲戚就指控了卡里尔。

那一周，普罗克特夫妇俩都出庭受审。几乎没有针对他俩的证词留存下来。对于伊丽莎白这位已怀胎九个月的孕妇而言，活下来对她的意义，更甚她的丈夫约翰。他们出庭之后，一份强有力的请愿书被送往波士顿。这是一次专门针对法庭的呼吁。伊普斯维奇的牧师约翰·怀斯起草了这份送往波士顿的文件，很有可能还征集了签名。不过，他又一次提醒当局，魔鬼惯于冒充无辜。神之指引尚不可求。哪怕是最一丝不苟的法庭也只能查出这么多了；随之而来的应该是些许慈爱之心。签名请愿的三十二人中，没人觉得普罗克特夫妇有哪怕一丁点邪恶，在他们看来，这对夫妇“与此等邪恶绝缘”。他们是友善的邻居，更是虔诚的教徒。如果有人仔细听了他们的案子，也许会引发他们对指控者们最大程度的怀疑。但是，只是星点怀疑之火，便可导致获罪的可能性。在给伊丽莎白定罪后，有个女孩才解释称，那些事情都是编的，不过为了好玩。还有两名男子作证，他们偷听到帕特南母女教默茜·刘易斯说那些证词。但是，一切皆成定数。法院认定，普罗克特夫妇犯有巫术罪。

约翰·怀斯与帕里斯是同龄人，在哈佛时便相互认识。怀斯在伊普斯维奇当牧师，教众人数与塞勒姆差不多，两人任期也相近。但他走的路与帕里斯不同，爱争论的脾性也多用在公益上，而非计较四十捆柴火和八堆沼泽干草这种事。虽然没有公开表露，但怀斯对政府和税收的作用确有独到见解。怀斯颇具幽默感和吸引力，所以很轻松便吸纳了教众；五年前，他领导了一场伊普斯维奇抗议安德罗斯政府强行征税的行动。他们侵犯了新英格兰的自由，怀斯争辩道。他还煽动邻镇参与抗议，在被捕前最远已经争取到托普斯菲尔德的支持。他后来明确表示，贵族制和君主制没有什么不同，离暴政不过一步之遥。基于自己的原

则，他在狱中度过了二十一天。由斯托顿牵头，法庭审理了他的案子；也正是斯托顿做出了有罪判决，怀斯认定这是法官强加给陪审团的。斯托顿也可能告知怀斯和他的朋友，若是他们认为自己不管身处何方，都有英格兰的法律保护，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法庭明确表示，他们“除了不会被当成奴隶交易外，没有别的特权”。[\[15\]](#)

出于这段经历，怀斯对侵犯自由和法官强权十分敏感，所以他在此时发声。他不信任当局。在他看来，做人懦弱不仅难以启齿，更是罪恶至极。他有理由质疑斯托顿，因为他很可能对后者还怀有几分残留的恨意。当然，怀斯之后的观点与斯托顿的也大相径庭；怀斯认为，人民服从于政府，但政府没有体现出其对人民的价值。他认为，任何夸夸其谈都不如“事实的真面目”。怀斯非常受欢迎，他的教徒认为他可与科顿·马瑟比肩。听起来，他像是适度地汲取了约翰·洛克的观点。

那个星期，约翰·普罗克特手上悬着铁链，重新写了一份遗嘱。但乔治·伯勒斯什么都没做。即便“一大群人”开赴塞勒姆听取他8月5日的审判，即便每一名已认罪的女巫都将他指认为领袖，他依然有理由自信。在审判前夕，七个人来检查他身上的巫师痕迹。他们一无所获。伯勒斯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写信鼓励他的孩子——用“庄严而体面的指令”——与他保持一致。他有一批支持者，其中一些人说服了一名可能列席起诉他的证人周五不要出席。（但当时的主流意见还是让这人出现了。）朋友们来探监，与伯勒斯商讨他的案子。他并不打算依靠5月的审讯。他对塞勒姆乡间的事务足够了解，知道该如何质疑原告们的可信度；同时，他也对这个司法体系有信心。这种信心更来自于，他不仅认识审判他的部分法官，也认识检察总长；十三年前，他曾为切克利第一任妻子（她也是切克利五个孩子的母亲）的父亲工作过。出庭时等待着伯勒斯的，是与他地位相当的人。他很轻松地做了陈述。他听起来就像

是审判他的法官，操着当时那种受过教育、变化不断的盎格鲁——撒克逊口音。他用《圣经》的方式思考，并能随时解读《圣经》。别的不论，他也是在哈佛接受过教育的牧师。他在口袋里还藏着一张小纸片，能进一步确保辩护成功。

伯勒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认定为女巫们的头目，所以在审判开始前，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众人等待已久；星期五下午，他走进塞勒姆的法庭，那里果然挤满了人。他颇为积极主动，当陪审团成员上前宣誓时，他就向他们发问，这是此前的被告都不敢做的。他可能也传唤了证人。窄面孔、高颧骨、看起来颇为清逸的英克里斯·马瑟也在庭审中现身，这本身就够引人注意了。伯勒斯可以安心一些，因为老马瑟曾在《显赫的天意》表达了对巫术的怀疑。总之，人们实在是过于笃信恶魔的存在了。

在伯勒斯5月的审讯上，共有十六人作证；这个数字是8月5日那场审讯的近两倍。八名已经认罪的女巫透露，撒旦已经允诺在自己统治世界时，赋予伯勒斯一个王位。九名证人控诉伯勒斯这个肌肉发达的矮小牧师（那个“小个子”）干过一件大事：给恶魔缴税。医生的外甥女伊丽莎白·哈伯德称伯勒斯夸大了自己的等级。他的确是一个魔法师，“只不过比普通巫师的级别高一点”。伯勒斯之前的仆人默茜·刘易斯从昏迷中醒过来，向大家讲了她那个由《马太福音》变体而来的故事：伯勒斯带她上了一座高山，许诺给她脚下的这些“辽阔且壮丽”的王国。在这场审判中，哪怕人们知道伯勒斯魔镇了村里的姑娘，但他曾失去过妻子，也抵御过印第安人，要撼动他那聪明且强硬的形象可不容易。

受害少女们的作证过程十分艰难，她们不时陷入昏迷，不得不中止作证。她们还尖叫说，伯勒斯咬了她们。有牙印来证明这一点！她们向执法官展示了伤口，后者还检查了伯勒斯的嘴——印记完全相符。窒息

和抽搐不时中断审讯；法庭没别的办法，只能等待女孩们恢复正常。这时，斯托顿转向伯勒斯。他问伯勒斯，你觉得是什么扼住了她们的喉咙？伯勒斯坦诚相告，他认为是魔鬼。“那么，为什么魔鬼不情愿让她们指证你？”斯托顿质问道。这个问题实在难解，伯勒斯无言以对。在过分拥挤的法庭里，鬼魂们开始穿梭，伯勒斯也同样困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鬼魂们造成的骚动更甚于魔鬼；有些人并没有中邪，但也看见了鬼魂。就在伯勒斯面前，一个姑娘连连退却，一脸惶恐；她瞪大眼睛，盯着的正是伯勒斯的亡妻们，她让她们解释发了什么。亡妻的鬼魂脸色血红，索求正义。斯托顿叫来其他几个中了邪的孩子。他们也都看见了鬼魂。斯托顿问伯勒斯对此有何看法。伯勒斯深感震惊，但却什么也看不见。

马瑟后来说，伯勒斯“因野蛮地对待后两任妻子而在当地恶名昭彰”，法庭上人人皆知，哪怕不知情者也当场就知晓了。有人坚称，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奴役”两个妻子。他“几乎把她们害死了”。受害者名单上多了罗森的妻子和女儿，一个姑娘为她们的被害做出了解释：伯勒斯怨恨他的继任者罗森，因为罗森着意照顾的那批教众曾对伯勒斯很不好。繁杂的罪名最终归于一处：有人作证说，伯勒斯曾强迫他的妻子发誓，永不泄露他的秘密。当地酒馆的老板是他曾经的大舅子，他当着法庭上所有人的面作证，称伯勒斯曾在采草莓时看透了他妻子的所思所想。斯托顿问：关于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伯勒斯解释说，当时他妻子和大舅子并不在场，只留他和另一个男人在那里。他的大舅子表示反对。斯托顿要求伯勒斯说出那人的名字。伯勒斯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他没有回答。事情到了这一步，伯勒斯可能真的不是魔法师的料。要么就是因为他在暗如洞穴的潮湿牢房里待了三个月，又饿又虚，要么就是有人夸大了他的能力——他在法庭上支支吾吾，颇为动摇。斯托顿说，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那个人——至少在马瑟的复述中是个黑衣人——身披

隐形斗篷，走到伯勒斯身边，与他并肩同行？

伯勒斯的答案如何，已不可考，倒不是因为他答不上来，而是因为马瑟认为他的答案“经不起考量”；铁证如山，再怎么反对也是徒劳。伯勒斯似乎是搞砸了。当被要求解释他的天生神力时，他解释说其实有个印第安人在帮他开火枪，仿佛那不过是把手枪。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因为你供出的从犯很容易就能被解释为“黑衣人”；何况，马瑟又是个爱安插魔鬼的人，不管是在作品里，还是在法庭上。此外，没有其他人看到过伯勒斯有这么个帮手。当被要求解释用枪的高超技艺时，伯勒斯发觉局势不对。早在四年前，他在检察总长的岳父家里时，枪法就已经非常高超了。现场找不到切克利在场的痕迹，他似乎刻意保持距离。而伯勒斯质疑原告的努力也宣告无效。与他的教民比起来，他并不是那么热衷八卦，在他突然离开教区后，教民们起诉了他，将他从牧师活生生变成巫师。斯托顿大获全胜；在印第安人破坏性的袭击之后，伯勒斯本能地寻求《圣经》的帮助，但现在，他明明掌握着斯托顿孩子的洗礼记录，却没法应付斯托顿的威吓。

他一再结巴，回答自相矛盾，对原告来说实在不可多得。因其“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满口谎言”，马瑟斥责称，“说他是囚犯，已是褒奖了”。罗森发现伯勒斯没有一处能令人信服。尽管证人数量庞大，还间或发作愚蠢的痉挛，审判还是进行得很快；伯勒斯最多在法官席前站了几个钟头。他已走投无路，伸手进口袋，取出最后的王牌。他把那张小纸片交给了陪审团。这位四十二岁的牧师并未质疑幽灵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只用了寥寥数语，伯勒斯便提出了更惊人的事情；他主张：“现在没有，且以前也没有女巫与魔鬼签下契约，令魔鬼能够隔空折磨别人。”这是一次鸣枪似的警告，亦是最大胆的异议。假如魔鬼契约不存在，不能将他的工作交给他人，那么审判法庭便是害死了六名无

辜之人。

随后激烈的争论不仅围绕这些话语的内容，更针对它的出处。斯托顿——他在伯勒斯出生的那一年从哈佛毕业——立刻认出了这段话：伯勒斯是从托马斯·艾迪（Thomes Ady）的书中摘抄的。艾迪是英国学者，在怀疑论方面研究领先，他认为巫术和《圣经》毫不沾边。他似乎认为后者不过是个寓言。他猛烈抨击“毫无根据、漫无边际的学说”，童话故事和老妈子八卦，以及夜半遐思、过度饮酒和头遭重击后的胡话。女巫的确存在，但十分罕见；艾迪相信，她们不过是无知的医生随意找的借口。他建议人们在遭遇不幸时，不要怪罪到最后一个来访者的头上。^[16] 伯勒斯先否认他是从书中摘录的，后来又承认了；在最不利于他的时刻，他却倾向于表现得直率。有访客给他带了艾迪作品的手抄本。他将其抄写下来。当时，伯勒斯数次表示，女巫确实困扰着新英格兰；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关于此举，我们在马瑟修改后的记录中，只能读到部分内容。陪审团当即做出裁决。他们的决定，让斯托顿感到满意。

当天下午，约翰·黑尔离开法庭时，满脑子都是疑问。此事关于他曾经的同事，他可是见证了后者的任职，并与后者并肩工作了好几年。黑尔将一名认罪的女巫拉到一边问话。她发誓自己参加过一场集会，在那里，伯勒斯劝导他的同僚推翻教会，建立魔鬼的王国。黑尔冷静地提醒她：“你会害死他的。”对话陷入一片死寂。“如果你对他的指证中有任何虚假成分，趁他还活着，还没有为时太晚，赶紧回想一下。”这女人没有丝毫顾虑。可黑尔显然心存怀疑，但是没有落到纸上。科顿·马瑟绕过了推翻教会的阴谋，可黑尔认为这才是他们给伯勒斯定罪的理由。他们没有关于巫术、鬼魂或神射术的有力证据。马瑟指出，巫术、鬼魂或神射术均不是此案的重点，想证明这些幽灵般的证据，或是将它

们完全排除在外，都难以做到，因此他只能做出大体上的推论：伯勒斯之所以成为巫师，是因为他具备相关特征。英克里斯·马瑟认为，伯勒斯超人般的力量便足以被定罪；伯勒斯的诸多行为，若放到正常人身上，没有魔鬼的帮助，是不可能做成的。他认为此案无懈可击。“如果我是法官之一，”英克里斯·马瑟如是说，“我无法宣告他无罪。”

至于被定罪的魔法师，他并没有提出异议。宣布判决后的某一刻，伯勒斯与黑尔交谈了几句。伯勒斯也许不尊重他的妻子，但他尊重权威；他不能对法官或者将他定罪的陪审团发牢骚。的确，控告他的证据数量是压倒性的。伯勒斯辩称，唯一的问题是这些证据都是假的。他是如何接受那般绝境的，我们不得而知。之前，在同样的绝境下，他也是听天由命，屈服于上帝的怒意。“上帝最甜蜜和丰盛的应许，以及亲切的神意，是很有可能被其子民的罪孽打破的。”七个月前，在约克被袭击和血洗后，他这样说道。斯托顿将伯勒斯与普克洛特夫妇、约翰·威拉德、乔治·雅各布斯和玛莎·卡里尔一同判处绞刑。

[1] 在执行绞刑的路上，折磨古德温家女孩的女巫指控了自己的女儿。

[2] 马萨诸塞法律禁止酷刑，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在谋杀案中，只要手段不被认为是“野蛮、惨无人道”的，就可以对犯人动刑，令其供出同伙。这一过程虽不被赞同，但还是较为普遍。十年前就有人曾将仆人绑起，“像屠夫屠宰野兽一样”对待他。

[3] 普罗克特不是第一个提起宗教裁判所的被告。1668年，塞勒姆一位暴躁的造船匠因怒斥马萨诸塞治安官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而被提起诉讼。一经逮捕，他被认为是“应该被吊死”。三名证人证实了

他骂人的事实，但都坚持自己完全不知何为“宗教裁判所”。

[4] 约翰·贝利牧师收养了古德温家一名被施巫的男孩。巫术还曾与另外两位第一教堂的牧师产生过直接联系；6月，穆迪牧师的妻子受到指控，但无人理会。詹姆斯·艾伦牧师名下仍享有纳斯家三百英亩的地产。他每年还从一个妻子被作为女巫处决的鳏夫那里收到固定薪酬。

[5] 逃亡的生活开销很大。据英格利希估计，他四处躲藏的数周内花掉了大约五十英镑，比毕肖普家地产的总额还多。

[6] 很多纽约的政要曾是自治领的官员，在马萨诸塞政变期间，这个身份不但毫无用处，还使他们吃上牢饭。纽约的检察总长就曾和安德罗斯关在同一个狭窄潮湿的牢房中。

[7] 确实有一个群体从新世界的社会流动中受益，那就是神职人员。在英格兰，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在北美洲，他们一跃成为上层人士，在这个缺少绅士阶级的社会中，地位仅次于执法官。如果镇上有谁拥有一张好的坐垫，或是一面好的镜子，这人通常是个牧师。他们的地位令人羡慕，在1699年，还有几名冒牌牧师现身于波士顿。

[8] 以社会和谐之名，许多有创意的对应方式被创造出来。打个比方，迪尔菲尔德政府认为，“前廊的第二个座位和后排座位在尊贵程度上等同于镇公所的第五个座位”。

[9] 无论男女，都对服饰充满渴望，这种渴望甚至是危险的。黑尔家的女仆偷了一片丝绸，最后它变成了多卡斯·霍尔儿子帽子上的一圈装饰。

[10] 浸礼会教徒很少，而且分布零散。科顿·马瑟将法国君主称

为“路易·那只·狼”（Louis le loup）。

[11] 1676年，后来一度成为巫术案法官的纳撒尼尔·索顿斯托尔写到印第安人抢走了玛丽·罗兰森的那场袭击，将印第安人称作“到处飞的野蛮异教暴民”。在描述那些骑杆飞进塞勒姆村的女巫时，他可能也是这么说的。

[12] 印第安人充分利用了这种轻信。自打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每年都会听闻印第安人的各种密谋，而且经常是从印第安人中相互敌对的派系那里听说的。

[13] 或者就像麦考利（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所写的：“与来自外界的残酷迫害相比，宗教社会内部的净化手段看似非常柔弱，其实才是最为严厉、强制推行的惩罚方式。”

[14]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引自《圣经》中南犹大王国国王约沙法在面对敌军时所说的话：“我们无力抵挡这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十二节）

[15] 随着安德罗斯政权的垮台，怀斯的不顺从升华为英雄主义。在为政变正名的小册子中，怀斯的庭审过程得到光辉的重现，不过没有一个字提到给他判刑的法官正是斯托顿。

[16] 艾迪对“女巫贩子”以及“以女巫之名错杀无辜”的批判，英克里斯·马瑟再清楚不过。一年前，他就在伦敦买了艾迪的书，一边读一边大加批注。

第九章 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

女巫，名词。（1）指丑恶、讨嫌的老妇，邪恶程度堪比魔鬼。（2）指美丽迷人的年轻女子，邪恶程度甚于魔鬼。

——安布罗斯·比尔斯

魔鬼阴谋的幕后策划者伯勒斯——被吓坏的塞勒姆村鞣皮匠称他为“所有巫术罪犯的首领和元凶”——被定罪后，大家都认为这场猎巫行动可能要画上句号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8月，招供的势头高涨；而在9月的最初几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在审判伯勒斯的早上，英克里斯·马瑟造访塞勒姆监狱，与几名女巫会谈。马瑟这位马萨诸塞最杰出的牧师宣称，他对女巫们关于“地狱任务和可憎之事”的报告非常满意。几天后，玛莎·卡里尔十岁的儿子承认他当过一周巫师。他说，他母亲为他安排了恶魔洗礼，将他赤身浸在卡里尔家和福斯特家之间的河里。他与三个男人、六个女人一起飞去集会。他们骑在两根杆上。他没有提到他的妹妹，但到了8月10日，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安多弗的治安官听取了她的招供，在同一天也和他的妹妹谈了话。这次谈话让法官感到不安，但他过了段时间后才把这种厌恶感完全表达出来。法官将谈话记录连同一份惶恐的免责声明一起呈交给了哈桑和科温，为“做了一份我完全不适合的工作，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而致歉。他希望，无论如何，他的记录能派上用场。

事实确实如此。次日，莎拉·卡里尔来到了塞勒姆。一路上，她与执法官友好地交谈，审讯召开前她对哈桑也是如此，尽管后者在讯问她前就知道了她的事。她自六岁起便一直是女巫。“你现在几岁了？”哈桑

问道，准备记录。“理查德哥哥说，我快八岁了，”她语气明快，“明年11月，我就八岁了。”莎拉折磨受害者时，用的是她妈妈给的矛，她的同伙也和哥哥供认的是同一批人。虽然玛莎身在狱中，却化成一只黑猫出现在女儿面前。“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的母亲？”哈桑问。“那只猫告诉我的。”七岁的小姑娘说得很轻快，比起相信自己七岁，她更确定自己是个女巫。

塞勒姆出现了大量黑猫和红书，而安多弗的巫术则大不相同。首先，安多弗巫术更泛滥。1692年，巫术严重波及了马萨诸塞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并一度影响到康涅狄格的一角。它从塞勒姆传播到另外二十四社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安多弗那样完全臣服，巫术在此地迅速且凶猛地传播，被定罪的女巫数量比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的总和都多。从玛莎·卡里尔接受审判，到一个月后安多弗的法官终于对女巫充满厌倦，其间在这个六百人的镇上出现了五十名女巫。安多弗的巫术更多作为家庭事务出现，传播起来更为有序。孩子控告祖父母，母亲控告儿子。兄弟阋墙。所有巫师几乎都来自于五个氏族；和塞勒姆受害的姑娘们一样，这里也是由十几个人供出所有人的名字。类似“你是个女巫！”和“你有罪！”的指控在镇上回响，甚至比谣言传得还快。有人在担心接下来谁会被带走，有人先是为之愤怒，之后被其反噬。

作为新的舞台，安多弗又换了一种说法：滋扰社区的不是幽灵。安多弗的巫师更喜欢撒旦的洗礼——在河流、池塘、水井或水桶里——这在瑞典很流行，但之前在新英格兰却声势低迷。即便猎巫在安多弗最热闹的时候，邻居之间通常也不会给对方的干草或猪念咒；他们关注的是与恶魔沾边的事，更喜欢长矛、撒旦圣礼、女巫集会之类连提图芭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而作为塞勒姆舞台的奠基者，提图芭已被人遗忘，此时是她身陷囹圄的第六个月——她既没有作证，也没有被起诉。安多弗的

故事被翻来覆去地讲，完全是从小玛丽·莱西所说的魔鬼推翻教堂的阴谋中脱胎而来。这一说法的核心是伯勒斯的撒旦圣礼，几乎每一个安多弗的招供者都提供了一些细节，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连贯的说辞，即使在安多弗，魔鬼仍然可以出现，形象因人而异，可能是一匹马驹、一只老鼠、一只苍蝇、一只鸟、一只猫、一个女人、一头猪、一个黑人或一头熊。除了提图芭，只有安多弗的巫师们知道如何飞行。

究竟发生了什么？伯勒斯的定罪使人心惶惶，怀疑的沙尘在安多弗弥漫。安多弗更接近边疆，所以更易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异端邪说的渗透，以及——由卡里尔家族带来的——天花的威胁。但同样的，到了8月份，当局更加清楚他们正在追寻什么。在审判法庭第三次开庭后，问题和答案都一目了然。从一开始，哈桑就巧妙地暗示他人。到了8月，他非常清楚自己想听什么，与有些人想说的话正好完全一致。随着审讯的推进，证人渐渐活跃起来，撒旦的面包在他们的描述中变得越来越红。“你有没有铬铁或织针？”哈桑问福斯特的女儿。她承认自己有一根铁纺锤。“过去你是否曾骑在一根棒或杆上飞行？”他问福斯特的孙女。对方承认了。“但是，你若不照着魔鬼说的做，他没有威胁要将你撕成碎片吗？”他质问一名来自博克斯福德的女人。“不，他威胁我了。”她承认道。证人很少令他失望。女巫集会上是不是有两位牧师？哈桑问小玛丽·莱西，但是她不能确定，所以也没有帮他找到想找的人。

部分结果是，在塞勒姆发生了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1692年之前，只有四个新英格兰人承认使用巫术，其中一人对自己的说法可能只有个模糊的概念。审判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只有八个人承认，包括一个四岁的孩子、提图芭、两个后来翻供的嫌疑人，以及厚脸皮的阿比盖尔·霍布斯。伴随着一种混合着自我鞭笞和歇斯底里的炫耀心理，招供行为在

8月时涌现，人们的痛苦都跟不上它的增长速度。而在安多弗，几乎所有遭到指控的女巫都供认不讳。法庭的胁迫——比如一位目击者所说的“又是暗示又是哄骗”，或者像坦白即可去除镣铐、否则就得进监狱的威胁——并非让人招供的唯一方法。那位来自博克斯福德的五十二岁女士承认，她已经被魔鬼雇用七年了。可她后来透露，阿比盖尔·霍布斯和小玛丽·莱西奚落了她好几天，“她们嘲笑我，吐唾沫在我的脸上，说她们知道我是一个老巫婆，如果我不坦白，活该很快被绞死。”她被她们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她在审判中说了什么，也几乎不清楚别人对她说了什么，她只听见了那令人敬畏的“玛丽女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拧胳膊之类的耻辱，要知道，虽然官方记录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种措施在4月时却令玛丽·沃伦大声嚎叫：“我说，我说！”

在针对安·福斯特的第四次讯问开始时，哈桑提醒她若不完全认罪，她将不得安宁。法官们动之以情，鼓励福斯特的外孙女提供一些家人没有提供过的信息：一位法官还承诺，若她招供，上帝会饶恕她。“希望如此。”她真诚地回应道。玛格丽特·雅各布斯才十七岁，就必须要在牢和她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在5月的信中，科顿·马瑟早就提到，应该对那些背弃魔鬼的人从轻处罚；7月中旬以后，再无须提醒拒绝服从的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某些奇怪的情况下，斯托顿也会宽恕认罪的女巫，只给那些拒绝认罪者定罪。^[1] 如果承认骑在一根杆上飞行就能救自己一命，你难道不会这么做吗？

对有些人来，认罪再自然不过——他们本来就相信忏悔是得救的必经之路，在加入教会时就坦白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不完全明白原罪和罪恶有何不同。作为新英格兰事业的核心，忏悔是一门手艺，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糕点师傅玛丽·西布里烘焙女巫蛋糕一样需要功夫。根据当时混乱的逻辑，如果你被指认，那肯定会有缘由。而想要找到罪恶

之源，只需对你的灵魂进行小小的反思。良知泯灭说明你正和撒旦在串通；与自己的信仰搏斗，就是在与魔鬼搏斗。对于一个十一岁的女孩来说，当她已经“知道自己身负所有罪恶”，那她承认自己与恶魔勾结并非难事。即便不像小玛丽·莱西那样有母亲时常提点，她也完全可以自己归纳出来。丽贝卡·纳斯面对着大量针对她的极端指控，精神受到极大折磨：何罪难赎？如在瑞典一般，女性、儿童和年轻男性最容易招认。从女性口中提取供词更加容易，因为女性更不确定自己的价值，但更相信治安官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四个中年男子——其中一人称，说他是巫师，还不如说他是秃鹰——被定于8月19日处以绞刑。

还有些别的事情困扰着受审的嫌疑人。比如玛丽·图塞克，她觉得自己不配接受洗礼。人们对进步有所期待；但难以避免的是，这期望落空了。许多人迫切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接受圣经，这是魔鬼永远满足不了的渴望。他们害怕精神麻木，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位嫌疑人所描述的，当她的幽灵离开她去折磨别人时，自己便只剩“一种冰冷的忧郁”。“我以为，”科顿·马瑟抱怨道，“我只不过是教会的学舌者！”曾几何时，在雪地里，玛丽·罗兰森赤身裸体，六岁的孩子在她膝头奄奄一息，她在篝火前冥想自己为何没有好好利用圣安息日。除了魔鬼之外，玛丽·图塞克没有供出其他名字，她的脑中只有怀疑的、挑刺的、诱惑的声音。如果你试图祈祷却不能，这个阻止你的人，除了魔鬼，还能是谁？无论如何，她都没有更好的答案。招供者们无一不哀叹，他们向魔鬼献身，却并未像期望的那样，少受些苦难。安多弗有个木匠向当局报告，自己曾在带领家人祈祷时被魔鬼打断，也许当他这样说时就处于相同的精神麻木中。

女人们为自己恶劣的本性而感到悲痛，连早年的失当行为也被一股脑地翻了出来：自杀未遂、偷窃、酗酒、流产、通奸。玛格丽特·雅各

布斯的母亲在监狱里为七年前溺死在井里的女儿哀哭。她相信是她自己杀死了这个孩子。满怀忧虑且掏心掏肺的招供不但能为自己正名，还能援助身陷囹圄的亲人。莱西一家可能都觉得彼此都在互相帮助，于是都纷纷倒在了玛丽·莱西的故事之剑下。如果你打算招供，那么用宗教术语——即便是在曲解这些术语——较为明智。这会让你有机会领受神性的恩典。与恶魔撇清关系就意味着解脱，即使供述的内容与被控的罪名无甚关联。

正如推理小说读者所知，否认只会使事情愈加复杂。供认却格外简单。这对公诉方来说是最方便的法子了，因为审判实在浪费时间。1692年，在一位巫术法官看来，有了供认，便不必将所有赌注都押在不堪一击的幽灵证据上。法官热切地接受了嫌疑人的供认，并深信不疑。每一条供述都彼此关联——这使它们看起来真实可靠——都裹挟着一枚闪亮的弹片，构成了指控。不是每个人都像提图芭那样小心翼翼，只供出那些已经被逮捕的同伙。当理查德·卡里尔终于从折腾不休的惨痛折磨中解脱出来，他供出了十一个名字。但在一点上，他一直坚持：他没有牵连他的母亲。

玛莎·卡里尔和安·福斯特虽是隔河相望的邻居，也是飞行同伴，却被分开受审。福斯特的嘴很硬。卡里尔没有得到宽恕。两人都住在安多弗的南边，几乎就在米德尔塞克斯县而非埃塞克斯县，那是一片较新的区域，但没什么人想去。她们尽可能住得远离礼拜堂，但还是在安多弗范围内。随着8月11日的招供，巫术浸入社区的核心群体。卡里尔的两个儿子都提到了二十二岁的小伊丽莎白·约翰逊，而她关于女巫集会的描述和之前的很像：参与者一共大概八十人，妄图拆毁基督的国度。约翰逊是弗朗西斯·丹恩牧师的外孙女，后者已在安多弗任职很长时间。那天，丹恩怀着孕的四十岁女儿老阿比盖尔·福克纳出现在哈桑和科温

面前。尽管老阿比盖尔·福克纳伸手一摸普罗克特家的女仆，后者就停止了发作，但福克纳不肯认罪。她的外甥女催促她承认，“为了安多弗的名誉”。根据法庭记录，福克纳毫不动摇，坚持认为“上帝不会要求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即使有看不见的力量在检察官的桌子下面拉扯着可爱的玛丽·沃伦，福克纳仍在抵抗。又是福克纳伸出手，将沃伦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但是，福克纳反驳，那些受害的姑娘早前到访安多弗时，她曾见过她们，却并未折磨她们！法官告诉她，因为那是在她开始练习巫术之前。

十五天后，她承认因外甥女被捕而感到愤怒。她“确实用邪眼”看了受害的姑娘们。她希望她们受苦；因为她们毁了她的家。于是，巫术再次展现了一次恶性循环。（在一场类似的巫术审判中，一名来自雷丁的女性承认她对原告怀有恶意。）老阿比盖尔·福克纳尽管对女孩们表示同情，但一滴泪也没流，所以对她的案子并无帮助。更糟的是，她同时是玛莎·卡里尔和玛丽·图塞克的表亲，还是伊丽莎白·豪的姻亲戚，后者7月19日已被绞死。几周之内，福克纳七岁和十二岁的女儿也被拘留了。两个女孩都供认不讳。到9月中旬，丹恩牧师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媳、四个孙子辈，以及许多侄女、侄子、外甥女、外甥都被羁押。法庭发现，丹恩至少与二十名巫师有所牵连。

自与安多弗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结亲，弗朗西斯·丹恩一直担任安多弗的牧师，从塞缪尔·帕里斯出生前就开始了。他还同时还担任当地学校校长的职务；安多弗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学会读写的。安多弗很少发生激烈的土地纠纷；牧师们的纷争也从未波及当地人。尽管如此，安多弗镇上的居民仍有理由怨恨这位身患关节炎却拒绝退休的独裁老牧师。他跛了一只脚，只能应付部分职责。安多弗雇用了一个更年轻、更正统的人，也是帕里斯的同学，以取代这位六十五岁的传道

者。丹恩对此提出诉讼。最后，安多弗只好付两个人的工资。他俩是近邻，相隔两代，虽共居神职，世界观却不同。丹恩手段强硬，托马斯·巴纳德则锐气更盛。巴纳德抱怨说，在他接受安多弗的任命之前，他住的校舍和猪圈一样大小，应该扩大一倍。最终，镇上为这个年轻人花的钱，比给丹恩花的更多。没有人指控巴纳德或他刚组建不久的家庭，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丹恩的家庭将被系统地针对。他不能对此耸耸肩，不在乎指控；现在，马萨诸塞已经开始判处牧师死刑了。至少有一个会众试图赶来救他。9月，在大陪审团面前，一位安多弗的老妇详细讲述了她去往撒旦洗礼的飞行过程。她和一个教会执事与另外两个女巫共骑一杆。法官们问，那么她是否知道，魔鬼是不是可以在没有同谋同意的情况下，以其同谋的形象折磨别人？她向他们保证，魔鬼并不能这样做。就在上周一，她和丹恩夫人还想借助牧师的幽灵，让牧师也陷入牵连。她俩的伎俩没有奏效。当局问，是什么阻止了她们？“如果恶魔假扮成无辜的人，对别人施加折磨，上帝不会对苦难视而不见，”她解释道。

塞勒姆的第三波运动如旋风般开始——各式怀疑与吹毛求疵一点点地侵蚀诉讼——逮捕、招供和定罪的速度疯狂加快。8月19日以后，再也没有顽固不化的约翰·普罗克特，或是极度不屑的玛莎·卡里尔。当卡里尔的孩子们被召集时，他们都一一承认了。这些供词都展现一个典型的新英格兰问题：你何时才能认为自己已完全改过自新？一旦你开始忏悔，一切将永无止境。从8月底到9月，塞勒姆的法官几乎天天坐在庭上，听人们对一个已经十分熟悉的悲剧进行没完没了的改编。如果普通的监禁无法保证所有细节达成一致，问讯的方式和抵抗的代价可以让人做到这一点。安·福斯特到底是主动承认飞行，还是先有人问她，这并不清楚。细节是一点点拼凑起来的。在她的第一次审讯上，她没有提到那次飞行。在第二次审讯上，她把签署契约的日期提早了，还描述了坠

落事故。第三次审讯上，又多了恶魔安息日。一个安多弗的女人在招供前，一直否认参与了任何巫术。一个农民很晚才在供词中加入撒旦洗礼的部分；撒旦把农民的头浸在水里，宣布农民“永远永远都是他的”。不知出于何故，他早前忘记了这个细节。不过，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女巫是如何工作的；因此，黑尔的好奇心也就可以理解了。女巫的形象一半来自《圣经》，一半来自民间传说，很可能来自于印第安人的传说，同时也有一点瑞典渊源。7月时，女巫还只是对受害者又拧又掐，到了8月却能颠覆王国了。

到了9月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还没有完全对上。比如关于谷仓或镰刀的分歧，还有巫婆是否真的需要油膏才能飞行这样的问题。（在新英格兰，她们不需要。）约翰·威拉德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哈桑如此询问理查德·卡里尔，想考验一下这名证人。十八岁的理查德不想让哈桑失望，于是小心翼翼地回答：“他不老。”当丹恩牧师的女儿被问及是如何前往塞勒姆女巫集会时，她供认是骑马去的。“但后来”，法庭记录员记道，她修改了自己的答案，表示“她是骑在一根杆上，被带到那儿的”。这个“后来”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提图芭的多毛精灵和会飞的猴子，与推翻政府的阴谋一起消失在后来的供词中。蓝色的野猪、中了巫术的公牛、死了的奶牛，甚至是那位坏脾气的洗衣女工，到了9月都被忽略，撒旦的阴谋开始担任主角。每天在法庭上，塞勒姆受害的女孩们协助证词变得更加连贯，她们的父母、监护人陪同在旁。最受瞩目的玛丽·沃伦频繁发作，9月2日，“一根针穿过她的手，血从她的嘴里涌出”，她就这样来到法官面前。在法庭上，一块红色的污渍在她的帽子上蔓延开；仅仅是提到嫌疑人的名字，都可能使她受到影响。女孩们的存在就好比法庭上躺着一具尸体，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抵赖。如果你的邻居声称在一条狗的身上看见过你的脑袋，你完全可以反驳。但是，你不能抹去那些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杂技般扭曲的姿态，或者是了

无生气、瘫软在地的玛丽·沃伦。这些景象足以令一个自信满满的二十九岁男子招供。而且，他们的供词一致，有着近乎科学般的准确性，让忙碌的塞勒姆法官感到安心。尚需一段时间，人们才会发觉那些供词自我复制的本质是多么可疑，不足以成为致命阴谋已然扎根的证据。与此同时，埃塞克斯县的大部分人似乎都曾挤在杆上，从空中飞过。

在当局全力关注安多弗的撒旦阴谋时，他们在这期间也揭露了别的事：在清教徒朴素的地板下，藏纳着满满的迷信。尽管丹恩的女儿最终承认使用巫术，但一开始，她反驳了关于她使用民间魔法的传言。她绝对没有用筛子——一种17世纪的占卜板——来施法。几个星期后，一个嫁入丹恩家的妇人承认自己确实在家里用过几次筛子来施法；她是从巴纳德牧师的女仆那里学会咒语的。8月11日，福克纳的嫂子向法庭呈上一整套巫术人偶，两个由破布制成，一个用的是桦树皮，还有一个上面仍插着三根针。安多弗竟然不仅巫术猖獗，还盛行民间魔法——民间魔法是宗教信仰任性却招人喜欢的继妹，在牧师住宅都能安然居住下来。巴纳德和丹恩的家，就像希金森和黑尔的那样，都被感染了。讽刺的是，似乎只有帕里斯家未受影响。

通常，创造奇迹之人一般都是女性，而会花钱找人算命的往往是那些冲动的少女——安多弗当局便遵循这种惯例，并将这种想法推加在她们身上。该镇公认最有天赋的占卜者是一个四十九岁、在埃克塞特出生的木匠，他自由散漫、挺不负责，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在当地算是个名人。此人叫塞缪尔·沃德威尔，他帮人们看手相，说出预测时会若有所思地盯着地面。他曾为一名治安员的妻子预测，在她生下儿子前，她会先生下五个女儿。他还曾宣称，伊丽莎白·巴拉德会在这名治安员妻子之前屈服于巫术。人们在针对沃德威尔的证词中，有一些护他周全的意

味。那时，哪怕被他预言将遭不测，人们也不会介意，比如一个他警告说会从马上摔下的年轻人，一个早恋被他说中的人，或是一个从他口中得知会遭心上人背叛的人。所有人都紧紧围在这位巧舌如簧的木匠身边。安多弗的农夫即使当着青春期女儿的面，也会请求他揭示她们的命运。一位六十五岁的铁匠虽然作证指称沃德威尔“过分沉迷于”占卜，自己却曾急切地向他问询。

9月1日，沃德威尔很勉强地承认使用巫术。或许，他召唤魔鬼太频繁了。当别人家走丢的家畜在他家田地大肆破坏时，他很难不发出诅咒。^[2] 他承认自己见过魔鬼。沃德威尔——常常不务正业，也不爱管家事——就这样成了魔鬼许诺给他民兵上尉职位的安多弗人。不久后，治安员重返沃德威尔家偏僻的农庄，逮捕了与他结婚二十年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个家庭展现了一种巫术如何引来了另一种巫术；沃德威尔的继女承认她在春天曾用筛子和剪刀做过尝试。魔鬼曾带着承诺向她现身。之后，她见过他三次，包括在一次村里的集会上，她在那儿看见十多个人骑杆飞行。对神秘事物的涉猎进一步推动了招供；很多人已经对使用民间魔法深感罪恶，而且也因其被抓个现行，所以很轻易便招认了。^[3]

新教一向与魔法撇清关系，但是——特别是涉及猎巫时——两者的界限趋于模糊。3月，罗森猛烈抨击了大多数安多弗人的认罪行为，警告人们不要受到“驱除巫术”的诱惑。玛丽·西布里的实验让她受到了公众的谴责。玛莎·卡里尔的外甥女早先试图通过收集和烘烤受害者的尿液来杀死女巫。玛丽·图塞克向一本占星术书籍寻求帮助。9月6日，黑尔牧师作证称多卡斯·霍尔有算命的习惯。早在多年前，他坚持要她丢掉那本手相书，他的孩子当时都在场见证了。霍尔还自学了根据眼睛周边痕迹做出预测。在审判中，法庭测量了她的精灵辫^[4]（四英尺七英

寸长）。他们要求把缠结的辫尾剪掉。霍尔畏缩了；她抗议说，如果他们这样做，她就算不死，也会生病。法院取得了胜利。

马瑟承认，魔鬼现身时，很多人都会从非法的“焚火、瓶子、马蹄铁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魔法仪式”中寻求安慰。与此同时，17世纪的马瑟比现在的我们更能区分“天主教谬论”（马蹄铁，尿液蛋糕，触摸测试）和正确的清教神学。可事实证明，两者间的界线并不清晰明了。虽然英克里斯·马瑟公开谴责在女巫嫌疑人身上扎针，但也为时已晚，乔治·雅各布斯已经遭受了这等酷刑。如果针本身就被施了巫术呢？他还反对浸水测试，认为用这种方式识别女巫，是毫无意义的迷信。（他的儿子则支持这种做法。）7月中旬，帕里斯派人请来了默茜·刘易斯，后者在恍惚中为一名受到魔镇的帕特南家族成员诊断。那么，召集受害的女孩，让他们诊断别人的病因，这是不是信仰的治愈力量？在火上架起一只平底锅，然后煮沸受害孩子的一绺头发究竟是灵药还是迷信？^[5]塞缪尔·沃德威尔警告巴拉德的妻子会生病，和英克里斯·马瑟在休厄尔与他儿子发生争吵后低吼说伤害将会落在休厄尔家头上，两者有何区别？1676年，英克里斯·马瑟放弃了一天的祷告，企求上帝重重打击强壮的印第安头领，菲利普王。他的祈祷在一周之内便应验了，就如同一个咒语。如何区分祈祷和咒语——或者说，如何区分咒语和能够从远处治愈伤口的炼金术士膏油？对主的祷告被理解为一种“圣洁的咒语”，也可使鬼魂和精灵纷纷遁逃。^[6]

若说神秘事物、宗教、民俗和医学很容易溢出各自的界限，这种效应在富人家最明显。1692年12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寻找隐藏的宝藏是一种巫术行为；马萨诸塞的菲普斯总督的官路正要归功于这种特别的嗜好。菲普斯曾经咨询过一位伦敦算命先生，后者预言他前途无量，这和科顿·马瑟在研究中从一位闪闪发光、长着翅膀的天使那里获得的保

证并无甚不同。几位塞勒姆法官拥有大部头的占星学书籍。他们中许多人对炼金术也有所涉猎。所有法官都会阅读历书。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的图书馆藏有特别丰富的神秘主义文学作品、星座图表和魔法学专著。他还与牧师们一样，沉迷于各种征兆和神迹。

此外，信息还可能更加复杂。英克里斯·马瑟严责抵御巫术的法术，却承认它们确有功效。塞缪尔·休厄尔向一位牧师咨询，如果要在家里添置东西，此时是否算是吉日。超自然因素总在附近徘徊，有时披上宗教的外衣，有时则不。马布尔黑德的牧师在十二岁时，曾在病床上和一位身形缥缈的人物交谈，后者给了他三颗神奇的药丸。正是这三颗药治愈了他；此后他一直认为那位访客是一位天使。而当一个也曾与天使交谈的年轻女子开始用圣意恐吓邻居时，为了邻里的和平，马瑟宣称那个东西不是天使，而是恶魔。马萨诸塞的牧师们直到1694年9月开会时还在问这个问题：如何区分恶魔与天使的造访？巫术和神圣的旨意很容易混淆，怒气和邪眼、预言和基于知识的猜测、原罪和与恶魔勾结，皆是如此。

科顿·马瑟在撰写庭审过程和四处兜售他钟爱的、为塞勒姆勾画的瑞典巫术蓝图时，没有算上民俗。不过，他知道隐藏的世界就在某处；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将其大白于天下的方式。他用圣经进行科学计算，以确定世界末日何时到来。1705年，他将摩西的历史套用在一枚纽约出土的乳齿象牙齿上。书房中的天使造访和客厅里的恶魔来访，应对的是同样的焦虑，目标也是相似的。莎拉·古德也许对她的邻居施加了诅咒。与之类似的是，科顿·马瑟也曾希望一个可恶的巫师得病，甚至连续三天祈祷他快死。他的祈求应验了；那可恶的年轻人本来身体健康，可之后真的很快就死了，马瑟应该为此负全责。这年轻人的死亡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塞勒姆准备再处决五名巫师，其中四人是男人，有一人是牧师，疑虑从四面八方而来。七十六岁的罗伯特·派克错过了菲普斯总督5月的宣誓就职，因为他正忙着指证埃姆斯伯里的寡妇苏珊娜·马丁。他还将夏天的一部分时间花在指控索尔兹伯里牧师的岳母玛丽·布拉德伯里的案子上，后者——变形成一头蓝色野猪——在马蹄下面胡乱扒拉，惊扰了骑马的人。派克是一名受欢迎的马萨诸塞参事会成员，也是多年的民兵上尉和索尔兹伯里最声名显赫的公民。去年春天，他曾与斯托顿和格德尼一起前往缅因，与印第安人进行休战谈判。因多年前曾与伯勒斯发生争执，他对伯勒斯也很熟悉。派克的儿子是帕里斯在哈佛的同班同学；他还与约书亚·穆迪的女儿结了婚。他自己的女儿则嫁进了帕特南家，所以在玛丽·布拉德伯里的案件中，他所处的位置十分微妙。指控玛丽·布拉德伯里的是家人，她也曾短暂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她的丈夫是行政委员，也是派克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派克是一个虔诚的人，博览群书，有着坚定无畏的信念。几十年前，他曾对法院就宗教自由的判决提出质疑。因此他被判诽谤法庭之罪，被禁止担任公职。^[7]

8月中旬，随着人们开始聚集在塞勒姆，派克可能是第一位公开表示对诉讼进程感到忧虑的公职人员。他在给科温法官的一封长信中，回顾了案件的逻辑。虽然他注意到，巫师在《旧约》中很罕见，却依然相信巫师的存在。（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大部分巫师都是男人。）他从未有哪怕一分钟怀疑过魔鬼的力量。魔鬼甚至曾顺手拐走了基督本人，并以“可怕的褻渎作为引诱”折磨基督。所以，任何好人也当然会遭逢同样的厄运吧？正因如此，有缺陷的人格不应成为定罪的理由。派克指出，有很多人“无辜却并非圣贤”。他最反对的是鬼魂之说；人们根本不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此外，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身在塞勒姆和坎布里

奇？派克暗示，有人行欺诈之事。他个人保持怀疑。他同意，他们的情况异乎寻常。

由此，派克去见了那些受害的女孩，她们的话如同神谕。派克没有见过她们，但和马萨诸塞的每一个人一样，他曾有所耳闻。说到这里，他有些支吾。她们的所作所为，若非神圣，便是邪恶。但是根据记载，与那些公开且明确被埋葬的人会面是违法的。《利未记》特别警告，不要向灵媒或鬼魂请教。为什么就不可能是上帝伤害和折磨那些女孩，“特别是当她们说错话且受到误解的时候”？派克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教唆谁。恶魔无须人的帮助，便可施展法术；反过来就不对了。只有从魔鬼这个谎言之王那里，耽于幻想的女孩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此种情况下，她们又怎能成为可靠的证人？类似的还有招供者，派克是第一个揭穿他们的人。当时的逻辑上有个缺陷：在法庭上，被告在坚称无辜时还施行巫术，这根本说不通。“自身利益，”派克说，“驱动着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就算魔鬼再任性，也不会清除巫师。派克担心迷信对巫术案的影响太大了。他也不赞成用身上的标记来辨认巫师。他希望《圣经》的解释能更清楚，而他绝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在他看来，与其处死无辜者，不如让一个有罪的人活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帝比人更擅长处理这些事务；二是以后有了更确凿的证据，还可以起诉有罪的人，可是无辜的人“一旦死了，就不能复生”。^[8]

即便派克收到了回应，也没有保存下来。8月17日，科顿·马瑟就因类似的质疑与人争辩。那一周风平浪静，对一场绞刑的期待使得法庭进程都暂停了。^[9]向马瑟发问的人，是波士顿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参事会成员约翰·福斯特。马瑟是否还相信，一场可怕的巫术正在进行中？答案恐怕是肯定的。自马瑟向理查兹法官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已经过去了十周。在此期间，已有六名女巫被处决。按计划，还有五名将在四

十八小时内处以绞刑。马瑟再次警告幽灵证据的可信性。不过，他也认为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他承认，这些证据可能有助于“加强其他推定”。信奉新教的作家一致认为魔鬼会虐待无辜者。马瑟两次提到，如果遭逢不幸，他的幽灵开始骚扰他的邻居，他不会感到惊讶。同时他又强调，触摸测试和邪眼都不应作为定罪的证据。再一次，他倾向于从轻发落。为什么不设定保释呢？至少也要为那些仅仅因为幽灵证据就入狱的人考虑吧？（这类人不包括那些被上帝已经“额外地送来更人性化且更有说服力的其他证词”所针对的罪犯。此处的影射十分明显：在对伯勒斯的判罚上，法庭并未仅仅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证据。）如果定罪的人可以执行缓刑，受到怀疑的人只不过被驱逐，马瑟就会更加满意。再一次，他在写信阐述巫术案时，必须用到“然而”这个词。他理智地为“我的想法不连贯”而道歉。自5月以来，他们绝未变得更加清醒。

不过，马瑟完美避开了深深困扰着派克的逻辑问题。但他添了一套说辞，喋喋不休地赞美治安官们的美德，说他们“因正义、智慧和善良而扬名于世”，世上不会再有其他入，比他“更敬重”他们了。他向福斯特保证，无论法官们的个人信仰如何，他们都不会以有争议的原则来进行庭审。魔鬼是反复无常的大师，可能二十次里有十九次都表现一致，却在第二十次变卦。“我们最大的幸运，”马瑟向福斯特保证，“便是拥有这些清楚地意识到危险的法官。”他希望福斯特能够加入，让这个阵容变得更加强大。他大体上暗示说，法庭可以招揽一两位牧师。在前一代人的英国案子中，就有牧师确保那场巫术大爆发已被熄灭。（当时，至少有十八名巫师被处决，包括一名牧师。）“我们的情况非常特殊。”他同样得出这一结论。

翌日，另一位毕业于哈佛的牧师听说了不同的疑虑。因帕里斯的外

甥女的指控，十七岁的玛格丽特·雅各布斯自5月初起便被桎梏于污秽恶臭的塞勒姆监狱中。她的祖父曾狂笑着对哈桑和科温说，要么烧了他、要么绞死他，与其说他是巫师、不如说他是只秃鹰，她可能就在祖父近旁。当天她就被捕了，很快就在比德尔客栈招供。她是一个女巫。她已经在恶魔的书上签字。（雅各布斯就被关在隔壁，听到这些非常震惊。他力劝她不要加速自己的死亡，她的冲动也会进一步证明他的罪责。）第二天，玛格丽特指控了一名塞勒姆的女性。她成为那一周审讯的常客；她看到不断变色的伯勒斯咬了普罗克特家的女仆。从那以后，她一直身处监牢。她的父亲和叔叔逃走了。她半疯的母亲则戴着镣铐，等待审判。

8月18日，她终于忍无可忍。按照计划，她的祖父将在第二天早上，与伯勒斯和约翰·威拉德一道被处以绞刑，对这两人的定罪，她还做了一点贡献。然而，行刑前夜，她宣称自己的供词有问题，“完全是虚假和不真实的”。在她的审讯上，受害的女孩一见到她就崩溃，这令她大为惊恐。法官们给她提供了一个选择。“他们告诉我，如果不承认，我就会被丢进地牢，会被绞死，但如果我承认，就能保命。”她解释说。她选择了活命。自那之后，她深受折磨，“在良心的恐惧中，我无法入睡，因为害怕魔鬼会因我说了这么可怕的谎言而将我带走。”

在痛苦之下，玛格丽特请求与伯勒斯谈话，早在孩提时代，她就认得后者。她请求这位前任牧师的宽恕。伯勒斯虽身负镣铐，信仰依然坚定，“与她一同”并“为她”祈祷。玛格丽特行事认真，感情丰富，头脑还很活络。她遗传了祖父的言语能力。她也是伯勒斯认为该为他的定罪负责的“假证人”之一。我们不清楚她反悔的风声是怎么传出监狱的；只有两个嫌疑人这么做了，她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算命的沃德威尔。）这对玛格丽特毫无益处；法官们不会再相信她。因为她倒戈了，

他们把她送进了令人窒息的地牢。幸运的是，她发现，与其背负着愧疚感痛苦地活着，还不如“心安地死去”。在地牢中，她给父亲写了信。她曾见过母亲，后者虽然疯了，却表达了爱意。她知道，整个家已经彻底毁了。她处境很糟，不知道自己多久就会被绞死。她向父亲保证，她期盼“在天堂快乐、高兴地会面”。她仍然是他恭敬顺从的女儿。

其他人对于8月18日晚的记忆却不同。伯勒斯在地牢里安慰了曾指证他的玛格丽特，后者哭个不停，与此同时，他竟设法在安多弗中部主持一场巫师集会，组织了圣礼。他取下帽子，庄严地离开了他的新兵们。他敦促他们坚定地继续下去，不要交代任何事。但他似乎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不折磨那些背叛他的招供者。一个老农民热切地表达了再见到伯勒斯的希冀。牧师的幽灵泼了他一盆冷水。他觉得不会有这种可能性了。

翌日一早，官员们带着乔治·伯勒斯，约翰·威拉德，约翰·普罗克特和乔治·雅各布斯穿过塞勒姆监狱庭院，登上一驾马车。玛莎·卡里尔与他们同行——她是安·福斯特的飞行向导、地狱王后、五个孩子的无良母亲，其中四个孩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尽管在审判前她都没有见过伯勒斯，却被判与伯勒斯同侍魔鬼之罪。伊丽莎白·普罗克特虽被判与丈夫同一天处死，但那天她没有赴刑。斯托顿念其有孕，延迟行刑。那是马萨诸塞因巫术被处决的第一批男性，所以，人群蜂拥而至，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两名博克斯福德的治安官带着一名嫌疑人去村里接受问讯，与行刑队伍不期而遇，后者正准备爬上乱石嶙峋的山坡；两名治安官便将嫌疑人丢在山脚下的一座房子里，以免错过这惊人的景象。正如帕里斯在1689年的一次讲道中指出的那样：“看着一个人迈出最后的步伐，走向行刑处（尽管应当如此），会让任何人为之触动，只要他们不心如磐石。”马车咯吱作响，向山上爬去，五人都坚称自己被诬陷了，而不像

那些海盗和杀人犯，虽然后者被处刑时的布道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他们希望真正的巫师能被尽快揭露出来；他们“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希望他们流下的是巫术案中最后的无辜鲜血”。一名旁观者被威拉德和普罗克特的庄重深深震撼。他们是那么“真诚、正直、通达”，令围观者潸然泪下。他们宽恕了指控者、法官和陪审团。他们未嚷着要那些受难的孩子在他们死后继续受苦，而1688年的格洛弗曾做过这样的事。他们祈祷，希望自己能从真正的原罪中得到赦免。

在他们祈祷时，人群中几位身份显赫的人士。就像英克里斯·马瑟曾在法庭上目睹伯勒斯被定罪，此时科顿·马瑟也来到塞勒姆，见证伯勒斯被处决。马瑟——身材高大，眼睛清亮，英俊，无论何时都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该场合的重要。即将受刑的五个人中，至少有个别人向他发出悲痛欲绝的呼喊。前方的黄泉路上，他会是他们的精神后盾吗？我们不清楚马瑟有否响应，又或他像诺伊斯那样坚决，不肯与巫师们一同祈祷。有的人就是心如磐石。

四十二岁的伯勒斯最后受审，这决定了他首先被处决。他平静地走上梯子，中途停下说了一番话，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迟到太久的招供。这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小的男人——在地牢里历经了十四个星期的折磨，已不成人形——再次表明了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他站在高处，脚下是他曾经的亲戚和教民，脖子上套着一根绞索，突然慷慨陈词。他把《圣经》背得烂熟；毕竟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他超越了自己所能。伯勒斯深谙布道，讲得庄严而热切，抑扬顿挫，激发了人们对他的敬畏，“仿佛看见了闪电的降临”。一位目击者称，那个星期五伯勒斯说的话赢得了“全场的敬慕”。刽子手隔着几个梯级，站在他脚下，他仍字字真诚，几乎融化人心。伯勒斯用尽最后一口气，将自己托付给上帝。他潸然泪下，然后说了最后几句，耳熟能详，可令人心悸。“我们的天父，远在

天堂的主”，他以此开头，然后站在梯子上，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主祷文，这对于巫师来说是不可能的壮举，没有哪个嫌疑人都做到。伯勒斯令他的观众乱了方寸。有那么一刻——甚至显赫人士们的眼里都闪烁着泪光——似乎人群会阻挠行刑。

一名巫师竟能如此真诚，完成如此壮举，显然需要解释，而指控伯勒斯的人们很快就找到了。魔鬼就站在伯勒斯身旁，向他口述。还有谁的布道能够如此有说服力？几分钟后，伯勒斯被处以绞刑，身子悬挂在一根只建好一半的梁上。马瑟插手以熄灭愤懑之火时，伯勒斯还没有死透。马瑟语气坚定，胸有成竹。马瑟是个二十九岁、浅色头发的瘦高个儿，他骑在马上，提醒围观群众，伯勒斯从未被授予圣职。（这句话让垂死的伯勒斯显得更像个异端，也适用于贝利和罗森，尽管他们中至少有一人那天也在山上。）除了扮成“光明天使”，在这样的场合下，魔鬼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伪装吗？这一伎俩倒真是历久弥新。马瑟的这番论调，创下了明褒实贬之最；直到最后一刻，乔治·伯勒斯都应为此受到谴责。马瑟向人们保证，对伯勒斯的判决是公正的。人们的抗议被平息了，悬挂在空中的伯勒斯也咽气了。他可能听见了马瑟的一些话。威拉德和普罗克特接着受刑，之后是玛莎·卡里尔和玛格丽特的祖父，油腔滑调的乔治·雅各布斯。

悬挂尸体的绳子被砍断后，刽子手们拽着绞索，把尸体拖进岩石间约两英尺深的公用墓穴中。据唯一留存下来的史料记载，伯勒斯的衬衫和裤子都被扒掉了，换上一套更褴褛的；毕竟那是一条好裤子，没人愿意浪费。十一年前，在安·帕特南父亲的面前，伯勒斯承诺将与村民同在，“与牧师事业共存亡”，此刻却与威拉德和卡里尔一起被草草埋葬，“他的一只手和下巴，还有某人的一只脚，都裸露在外”。

伯勒斯至死都辩称自己是无辜的，而正是这样一位迷惑人心、口才

出众、对《圣经》张口便来的牧师，却被处以绞刑，这带来的不安几乎等同于他为魔鬼招募追随者。事实明摆着——就连普罗克特和威拉德最后在奔赴黄泉时也承认罪行——毫无争议。唯一有争议的是，到底谁该为此负责？约翰·希金森在塞勒姆任教职长达五十三年，早已历尽沧桑，曾拒绝提供安德罗斯想听到的答案，在1687年曾因“毫无善心的表现和不恰当的想法”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与顽固的仇怨”谴责塞勒姆的村民，难道他会真的相信，他身陷囹圄的女儿是个女巫？然而，事实不言自明。她承认自己曾帮助给无辜者定罪，连玛格丽特·雅各布斯也认为女巫真的飞过塞勒姆。8月的处决让科顿·马瑟回归案头，试图解释清楚前因后果。那个星期五，塞缪尔·休厄尔在别的地方，但是在他8月19日的日记的最后几句话里，他几乎无意识地为马瑟说话。关于被执行死刑的五个人，休厄尔写道：“马瑟先生说，他们都死于一场正义的审判。”接下来的几句话就令人不那么舒服了：“伯勒斯先生通过他的演讲、祷告和抗议以声张自己的无辜，确实打动了几个没头脑的家伙。”虽然伯勒斯是他多年的同事，也经常去他家吃饭，且再无缘得见休厄尔家重新装修的厨房，休厄尔却未流露出一丝同情。字里行间，无半分怀疑。

伯勒斯被处决六日后，哈桑和科温审问了一个十八岁的安多弗女孩，她是伊丽莎白·豪的侄女。她否认自己了解巫术，直到得知姐姐指控了她，才承认去年冬天曾见过魔鬼。她屈服于撒旦洗礼，骑着一根杆飞行，参加了有两百名巫师的集会。（她的姐姐证实了这一数字，但是警告说侵扰马萨诸塞的女巫共有五百人。）在受审的过程中，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又牵连出两个姐妹。她所面对的问题中，有几个在伯勒斯被吊死前还没有被提起过：狱中有谁是无辜的？（她只知道一个。）治安官又突然问起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那些受害的女孩会不会自己就是女巫？“她们不是，”姑娘向他们保证，“她们是诚实的人，帮助揭露女

巫。”塞勒姆的法官再三确认，或因派克的质问而感到不安，或出于个人原因。

随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供认。夏天慢慢过去，承认的人越来越多，供女巫骑的杆子也越发拥挤。8月被指控的女巫比7月的更多。而在9月，还有更多人招认，供词一致，都提到了伯勒斯牧师。四十六岁的威廉·巴克和四十九岁的安多弗算命者塞缪尔·沃德威尔依次招供。两人都是经济拮据的安多弗农民。沃德威尔没有提到撒旦安息日，只说起他造成的痛苦。他与魔鬼签了数十年的契约。他六十岁时契约将会过期。巴克比他加入的时间更晚。他提供了对女巫团体人数最多的估算之一——在他的版本中，她们的数量超过塞勒姆村民的半数——还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故事。他也面临着法院提出的令人不安的新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新的答案。他知道有谁明明无辜却遭监禁吗？他不知道。他对受害的女孩有什么看法？她们功不可没。他警告法庭，不要误解她们。女巫们密谋让那些受害的姑娘看起来有罪，并且因被发现而格外愤怒。

正当斯托顿准备为下一次开庭选陪审员时，巴克又提供了猛料。在聚光灯下的狂喜瞬间不过是另一种魔鬼的诱惑；没什么恶名可与法庭上的恶名相提并论。巴克认为自己肩负使命。他一边祈求法官和所有上帝的子民的原谅，一边承诺“衷我之心，尽我之力，用我心底之善摧毁对邪恶的崇拜”。他提出了人们选择塞勒姆的草地作为地狱集会的理由，令权威人士，尤其是帕里斯，感到满意：村民们互相斗嘴，还和牧师争吵，所以魔鬼意图消灭他们。（公平地说，若此标准为真，那在会众的选择上，撒旦颇有想法。）他所说的验证了法庭十七年前就警告过村民的：在无休止的争吵中，他们给撒旦搭了一把手。^[10] 巴克透露了魔鬼的计划，此事急需所有人的关注：恶魔意图实现“无复活日，无审判日，无须因原罪则受罚或蒙羞”。魔鬼承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

在1692年同样是异端邪说。

与此同时，安多弗似乎还是依赖塞勒姆的占卜师。在各种情况下，安多弗人都把村里的女孩送过去，安置在病房里，把病痛的头和脚固定住。可能是在9月初，安多弗的助理牧师托马斯·巴纳德也召集了她们，不过是出于另一个目的。他在会堂召集了七名当地女性，没有说原因。这七人中包括一名十三岁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以及丹恩四十一岁的女儿。巴纳德带领她们祷告，然后蒙住她们的眼睛。塞勒姆的女孩抽搐、摔倒，巴纳德指示安多弗的女性将手放在她们身上。女孩们立刻平静下来。七个女人浑身颤抖，接着被逮捕带走。她们说：“即便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还是没有料到，为此惊慌和恐惧。”官员恐吓她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女巫，他们知道，我们也知道。”

招认与指控均在不断累加，引发新的逮捕和更加复杂的情形。五十一岁的丽贝卡·伊姆斯初次招供时还没有经受过撒旦洗礼，她听从魔鬼的吩咐已有七年，但不愿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个巫师，也没有供出其他人。经过十二天的监禁，她的供词变了：她已经练习二十六年巫术，并受过洗礼。她还透露儿子已经当了十三年巫师。她供出了别人。五名安多弗的修女随之招供。当时，马丁和雅各布斯都被吊死了，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敢问法官是否神智失常，或者轻蔑地说，倒不如说自己是只秃鹰。正如每个人都认识几个菲利普王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几个被指控的巫师。一片混战中，男人指控女人，年幼的女孩指控年长者，孩子指控母亲。一家被指控的十一人中，九个都是被亲戚指控的。刚被指控的人，年龄从七岁到八十岁不等，近一半是青少年。丈夫们做好准备，算计妻子的缺点。埃利泽·基瑟家的壁炉曾被伯勒斯施咒，现在他却指控另一个人：曼彻斯特镇的一名皮匠。

从一开始，记录中就有漏洞。正如斯蒂芬·休厄尔所解释的那样，

根本就不可能把一切事无巨细地记下来。有几位记录员从一开始就是极简主义者；有些指控根本没留下记录。在夏天的某一刻之后，否认罪名也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司法系统中所有登记在案的审判所产生的恶果——法官们都花在了日常的巫术审讯上——便是让其他不太紧急的事务只好延期。疲惫自上而下，无处不在；就连检察总长自己也说，这是“困难且麻烦的工作”，因其没有固定薪水，情况更加恶劣。对于大家来说，太多细节无甚意义。即便是黑尔也在后来写道，他因为“相关细枝末节”变得“非常疲惫”。

对于监狱看守，囚犯中有像英格索尔这样的酒馆老板，审判就意味着好生意。对于其他人，审判则带来了数个月的艰辛。当地的治安官整日加班，骑马到很远的地方传达逮捕令，护送嫌疑人去往和离开审讯，追踪逃犯，还要安排监狱转移。这种压力——随处可见，且非常压迫神经——会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一位安多弗的法官担心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在9月中旬，他签署了自己的最后一份逮捕令。此前，他发出了近四十张传票。究竟是怀疑还是疲倦控制了他的手，无人知晓；他只是拒绝再签署一份逮捕令。就像约翰·普罗克特（生前）嘲笑女孩们应该回去织布，以及约翰·威拉德（生前）犹豫要不要围捕嫌疑人之后发生的事，此人的下场也可想而知：法官和他的妻子被指控使用巫术。他的哥哥也被指控，而他的从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狗，曾有人见他骑狗穿行。兄弟二人的家人——他们都是前总督布拉德斯特里及诗人安妮的后代，和一些牧师也有亲戚关系——都逃往了北方。那只狗被处死，是安多弗的两只犬类受害者之一。另外一只狗只要看看女孩们，就能把她们变得疯狂。它被枪杀了。

青草未被晒干，玉米颗粒无收，栅栏摇摇欲坠，作物无人照拂。果园缺乏看管，木柴堆业已用尽。与此同时，微风拂起涟漪，夜晚也变得

干冷。一年中劳动最密集的几个星期就在前方。秋天是做苹果酱的季节，也是晾晒、盐渍和腌制冬季库存，采撷郁金香和苹果，为谷物去壳和屠宰家畜的时候。这些事情很难在妻离子散的情况下和探访监狱的间隙中完成——玛丽·埃斯蒂的丈夫连续五个月每周两次骑马去看她——人手实在短缺，因为人们长时间消耗在法庭上，还要看顾施巫或被施巫的亲戚。（更难的是人在狱中。正如斯托顿最亲密的政治副手在安德罗斯发动政变之后抱怨的那样，他该如何在狱中管理家族赖以生存的农场呢？）许多人发现自己已近山穷水尽，他们贱卖牲畜，支援狱中的亲戚。我们不可能不为一位助理治安官感到遗憾，他在年底时不仅抱怨辛苦，更埋怨赤贫。自3月以来，他只依逮捕令行事，逮捕嫌疑犯，参加传讯和审判，将女巫从一个监狱送往另一个。这些事情“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使我无法维持我可怜的家庭”。他现在一贫如洗。（更何况，马萨诸塞还相信，支付公务人员薪水不是必须之事。）治安官恳求菲普斯和斯托顿帮忙，“这个艰难的冬天，我和我可怜的孩子将不堪重负，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为国王和国家服务已然榨干了他，而且因为他是被当作绅士养大的，“并不习惯劳作”，所以情况更糟。米德尔塞克斯县治安官和坎布里奇监狱看守一直在为以下项目自掏腰包、垫付经费：上路的马匹和人手，监狱要用的木材，护送马车的守卫，兴师动众追捕嫌疑犯的治安员。他们还要为被羁押的人付出大量时间，给他们供应饮食。这些都没能报销。牧师之子、法庭职员小约翰·希金森，发现自己只因公开露面所花费的钱而负债累累。

更不值得同情的是埃塞克斯县的治安官乔治·科温，他时年二十五岁，是科温法官的侄子。乔治·科温拆除了被告的家，也为此筋疲力尽。犯人被定罪后，他有权清空那些家宅，并老是速办速决。即便是在乞求伯勒斯牧师的宽恕之时，玛格丽特·雅各布斯也知道科温已经洗劫了她祖父在河边的产业。他和他的手下将那里洗劫一空，没收了牛、干

草、一桶又一桶的苹果、数不清的谷物、一匹马、五头猪、床和毯子、两把黄铜水壶、大量白锡器皿、鸡和椅子。他们甚至从玛格丽特母亲的手上拔下黄金婚戒。她设法讨回，但最后别无选择，只能凭此从科温手中购买食品。虽然英格利希夫妇安全逃脱，他们那座有山墙的豪宅却未能幸免。科温恬不知耻地掠夺了他们的财产，然后开放给人们洗劫。家具、家居用品和家庭肖像都消失不见，这批赃物价值约一千五百镑。全家只剩下一张仆人床。（在这件事上，科温过于心急。英格利希夫妇并未被定罪，他们在审判之前就已逃离。）9月，一名六十一岁的老妇被吊死后，一名助理治安官骑马来到她位于安多弗镇中心的家。他夺走了这家的牛、谷物和干草，并建议她的儿子与治安官赫里克谈谈，以避免剩下的财物被变卖。在那场谈话中，赫里克——天生的绅士——善意地提供了“赎回”财产的机会，要求他们总共付十镑。最后他们敲定了六镑，只要这笔贿款能在本月内兑现。

嫌犯被抓走，新问题到来。那些孤儿们怎么办？许多人只能自生自灭，比如普罗克特家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食物，或是一口可以煮饭的锅。在伯勒斯被捕之后不久，他的第三任妻子“把所有能够得到的东西都握在手里”，包括丈夫的图书馆。然后，她变卖家里的财产，还放了高利贷。她和自己的女儿一同南下，抛下七个继子女，最大的一个孩子才十六岁。“只剩下我们这帮无助的小孩了。”他们后来请愿道。他们甚至没能留住任何信物以铭记父亲。9月下旬，安多弗的行政委员向伊普斯维奇法庭寻求帮助。算命佬沃德威尔和他的妻子都进了监狱 [\[11\]](#)，这对夫妇的七个孩子该怎么办？他们处于“痛苦之中”，安多弗无力缓解。法院下令，将七个孩子中的大部分人或全部人都交与“善良和诚实的家庭”看管。最小的刚满五岁。最大的那个归给他的舅舅约翰·巴拉德，正是后者的兄弟指控沃德威尔，害他入狱。

哈桑、科温和格德尼在巫术案上投入最多的时间。他们每个星期都举行审讯，直到9月都坐在庭上。从3月末到9月初，帕里斯花了大约五十天在巫术案上，每周多次行五里路到塞勒姆镇上。为此他忽略了家中的义务；伊丽莎白·帕里斯已不堪重负，濒临崩溃，他必须每天为她进行家庭祷告。晚上，他回到一片混乱的家中，那里还回荡着阿比盖尔的尖叫。连续数月，他都没有在布道记录本上写下一个字。（他也没有抱怨薪水的事，尽管很久都没有收到了。）他陪同外甥女走上法庭，指证十名嫌犯。他觉得协助当局是他的责任，而在这一使命中，没人比首席法官斯托顿更累了。斯托顿费尽心力，想要一劳永逸地清理巫师，因此，9月6日星期二，斯托顿第三次召集审判法庭，于中午开庭。

那个星期，法庭起诉了十九名巫师，这是到那时为止最多的一次。证据更加薄弱，节奏却更快；斯托顿必须尽快遏制危机。他也遇到几个难题。当被自己的外甥女指证时，玛丽·埃斯蒂让法庭感到无措。在此之前，法庭已经发现很难给这位温和的五十八岁妇女定罪。9月，连伊普斯维奇监狱的看守都为这位七个孩子的母亲辩护，声称她是模范囚徒，一直保持清醒和礼貌。当时，各个地方都在松动——波士顿监狱的囚犯近乎保持一致，为埃斯蒂开脱。埃斯蒂向法官们提交请愿书。她于4月从她广阔的托普斯菲尔德农场被带走，一再被捕。她的大姐7月被绞死。她和她的二姐莎拉·克洛伊斯只有三个请求。此前，法庭既不允许她们找律师，也不允许她们在宣誓的情况下提起上诉。她们的第一个请求是：法官能否拥护她的权利？第二个请求：她们可以传唤代表她们的证人吗？托普斯菲尔德的牧师已经做好准备，发誓她们是无辜的。回想起罗伯特·派克，她们还问：是否可以用其他证据来审判她们，而不是——请注意措辞——“女巫、的证词，或者被女巫折磨的受害者的证词”？她们要求“一场公平、平等的审讯，褒贬皆有”。她们提出的每一个请求都在巧妙地谴责法庭；而且，英国法律保障这些权利。对此，斯

托顿判处两姐妹绞刑。

斯托顿又一次感到头痛，是在大陪审团听取检察总长指控贾尔斯·科里的案件时。至少七名塞勒姆女孩证明科里拥有超自然的天赋。（默茜·刘易斯发誓说：“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贾尔斯·科里是一个可怕的巫师。”小安帕特南发誓说：“我真的相信，贾尔斯·科里是一个可怕的巫师。”伊丽莎白·哈伯德说：“我真的认为他是一个巫师。”）他化为幽灵，出现在她们的床上，镇公所中（他在此地拥有一个尊贵的座位；而巫师们则在这里参加多次布道），以及毕肖普的绞刑现场。9月9日，当大陪审团传唤他时，科里走上前，举起手来。他不认罪。法院接着问道：“罪人，怎样你才肯接受审判？”只有以“上帝和吾国”之名，审讯才能进行。之前，科里就曾在给他定罪的法官面前说起这五个字；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五，他拒绝被审判，拖延了时间。对待检察总长的要求，科里并不服从，甚于3月时曾试图解下他的马鞍的妻子。（在他受审前一天，法庭已经给其妻玛莎定罪。）

对斯托顿而言，幸运的是，还有少数几个人愿意伸出援手。9月2日，科顿·马瑟给斯托顿写了信。世人皆知，在斯托顿崇高的重任中，他是多么“热心地提供协助”。马瑟已经在幕后做了很多事，比斯托顿知道的可能还多。（在写给福斯特和理查兹的混乱含糊的信件中，他也如是声称。）为了巫师腐蚀性的攻击尽快结束，那个夏天他几乎每周斋戒。他认为牧师们应在这次特别的使命中支持法庭。没人这么做，那他自愿填补这一空缺。他已经开始写一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将“尽我所能，像一束真理之光，照亮这场灾难”。他一再强调，并允诺会驱散对身处险境的无辜者的怀疑。他希望“平息愤怒，它已令我们反目成仇”。马瑟还许诺会将他写的每个字都递交斯托顿，这样“就不会有任何无关之词”。（他非常清楚，不经过允许，他什么也出版不了，也将官方历

史熟记于心。) 他会讲述瑞典巫术泛滥的情形，强调和塞勒姆最相似的方面，就像把一个人从他的阴影中重塑。但斯托顿和他的同僚是否会认可他微小的劳动，借此提醒人们在这场灾难中应尽的义务？他知道斯托顿身负重压，所以只送去一部分手稿。他跳过了前面三十四页。在手稿的最后，马瑟发出了非凡的致辞，希望斯托顿“成功以高贵姿态迎接地狱的挑战”。马瑟比玛丽·埃斯蒂幸运，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斯托顿在手稿的封底写了一篇不吝赞美的答复。我们现有的关于1692年的最佳记录自此流传下来，在当时，它是作为一本宣传册，以应付8月愈发壮大的公众抗议的冲击。

马瑟所言的那些愤怒，帕里斯有着最直接的接触。随着斯托顿的施压，这位牧师的言辞表明，他非常清楚教会的毁灭是从他家开始的。他选择《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作为9月11日布道的材料。他审视了面前的战役，然后尖厉肆意地剽窃了科顿·马瑟的说法。他们所参与的战斗早已被写进预言。这是一场“魔鬼及其同盟”对抗基督及其追随者的战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终将获胜。帕里斯不仅被恶灵包围，也遭受许多人的质疑，他压下了这些异议；他声称，那些反对法庭的人，并不比反叛摩西的“叛变且怨声载道的以色列人”好多少，后者猜想返回埃及可能比死在荒野更好。反抗法官，就是与魔鬼为伍。帕里斯的演说如火焰般熊熊燃烧，无疑很激动人心，他既呼吁虔诚，也号召团结一致。接着，帕里斯要求人们投票将玛莎·科里逐出教会，后者在3月曾嘲笑帕里斯的外甥女及其同伴们为“心烦意乱的可怜孩子”。教会进行了表决，但未达成一致。

周三，帕里斯去见了狱中的玛莎·科里，由纳撒尼尔·帕特南和教会执事陪同，其中两位同行者是遇难女孩的叔伯舅父。科里冷静地迎接了来访者，再无六个月前的热忱，当时她还期待治安官和牧师们是开明

的。不过，她还是那么直率；帕里斯一五一十地转述了她丈夫的审讯记录，继而发现她“顽固不化，不断为自己正名，谴责那些发现和定罪，把她害到了这个地步”。他建议他们为她祷告。对此，自诩为“福音女人”的科里毫无兴趣；于是，来访者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祈祷。之后，帕里斯宣布对这名怨愤的教民判处“开除教籍的可怕惩罚”，切断所有的教会特权和希望，并将她的灵魂交给撒旦，不过或许是多此一举。这次造访非常短暂。

9月1日，威廉·巴克曝光了撒旦意图令所有人平等的堕落计划的三天后，巫术案法官约翰·理查兹在波士顿完婚。理查兹长得棱角分明，来马萨诸塞的时间较晚，但却过得非常成功。他娶了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的妹妹，安·温思罗普。斯托顿主持了婚礼仪式，塞缪尔·休厄尔也前来参加。同时到场的可能还有两位法官；巴塞洛缪·格德尼也是温思罗普家的姻亲。新娘的姐姐是乔纳森·科温夫人。^[12] 这并非一件奇事——至少四位巫术法官发现他们是姻亲，并于一个周四下午相聚。虽然这么说有些以偏概全，但站在马萨诸塞权力顶端的人其实寥寥无几。担任教会执事和行政委员的是同一批人，他们在殖民地纳税最多，他们的名字也最为人津津乐道，主导着民事、刑事和宗教事务。他们都来自一个小小的圈子，成为相互渗透的精英群体，全拜像理查兹——温思罗普这样的结合所赐。这是理查兹的第二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现任妻子的姨妈。^[13]

牧师界以相同的方式重叠和相交。塞勒姆法庭书记员斯蒂芬·休厄尔的妻子，即照顾贝蒂·帕里斯的女人，是一位保守但很有影响力的坎布里奇牧师的女儿，这位牧师又是马瑟一家多年的朋友。诺伊斯牧师和

黑尔牧师是姻亲，黑尔和格洛斯特的约翰·艾默生牧师、塞缪尔·帕里斯和米尔顿的牧师之间也是如此。神职人员作为一个团体，也像法庭一样，处于紧密相连和近亲之间，手足情谊如家庭一般。^[14] 在集会期间，他们可以共享床铺。他们的亲戚去世后，也会被安放在相邻的坟墓里。尼古拉斯·诺伊斯与塞勒姆高级牧师约翰·希金森一家关系甚是亲密，只需寥寥数句客套，便能直接切入私人问题。

法庭成员在政治上并非总是见解一致，就像过去十年动荡中，首席法官斯托顿几乎什么立场都站过。政治和生意——以及捍卫商业利益的政治——影响着法官的判断。几乎每个人都在边境有着相当可观的利益。1689和1690年，印第安人破坏他们的磨坊，使他们遭受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斯托顿和休厄尔一起前往纽约争取支持，以对蒙特利尔进行联合攻击；哈桑和科温则去缅因和新罕布什尔巡查边防。1681年，斯托顿被选中再次前往伦敦，试图就新的特许状展开谈判，但斯托顿已经听够了英国人对新英格兰的侮辱，所以拒绝该任务，于是它落到理查兹头上。

塞缪尔·休厄尔经常与其他法官开展社交活动。斯托顿和温思罗普算得上他最亲密的朋友；不过，他与诺伊斯还要更加亲密。忙到发疯的治安官科温——10月7日他试图又一次征收某人的财产——是温思罗普法官的外甥和格德尼法官的女婿。整个新英格兰都是相同的模式，一小部分家庭紧紧交织在一起。巫术案法官——以及他们求助的牧师们，后者的工资也主要由他们支付——一起遵循斋戒，激辩《启示录》的内涵，一起祷告、吃饭、游泳和航行。他们为彼此的孩子们施洗，教导他们，并为他们哀悼（威拉德先后施洗和埋葬了休厄尔的七个孩子）；向彼此的遗孀求爱；住在彼此的家里。他们甚至愿意共享棺木。

他们合谋并推翻安德罗斯的政府。科顿·马瑟写了一篇宣言，为推翻安德罗斯的反抗行动正名，从会议室的边座读给广大群众听。斯托顿身边围着几位后来巫术案的法官，在安德罗斯家里谴责这位被罢免的总督。在伦敦，英克里斯·马瑟为新的特许状极力游说；他背叛了同胞，同意了特许状，将要花一段时间为自己辩护。副总督斯托顿——恰巧也是首席法官和马萨诸塞的资深政治家——完全可以证明他们已经恢复了殖民地的稳定。他们煽动政变，在女巫集会之前就搞阴谋集团，所以他们需要证明新英格兰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他们也可以借此击退入侵者。同为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他们一向步伐一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的法庭里才有不满之声传出。他们愿意达成共识，有足够的政治动机让他们这么做。英克里斯·马瑟在1691年吹嘘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特定的人像我一样，为政府承担这么多的责任。”这让他要面对塞勒姆发生的事，包括会飞的猴子或者烟囱里的水母。10月，一名法庭评论员在开口之前，先铺垫了一段免责声明：与其让他“心甘情愿地批判权威，或用任何方式加以责备”，还不如让他咬掉自己的手指。他是威拉德的教会成员，与休厄尔关系紧密。很快，他还通过婚姻成了温思罗普的亲戚。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巫术的故事独属被指控者与认罪者。他们的记录紧密相连。9月中旬，法庭屡遇挫折。9月过半时，黑尔牧师的妻子被指控；她已是三个小孩子的母亲，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如同在伯勒斯的审判上一样，黑尔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令这项指控变得更加尴尬的是，黑尔夫人还是诺伊斯牧师的大表姐。）这时，安多弗治安官达德利·布拉德斯特里特再找不出原因拘留女巫，只能放下了笔。斯托顿也没有听取玛丽·埃斯蒂最新的请求，后者已提交了第二次请愿。这次她不仅向法官席陈情，更越过他们向菲普斯总督陈情。按照计划，她将在一周内被绞死，所以她已经认命。“我请求你们，尊贵的各位，

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命，”她写道，“因为我知道我必死无疑。”法院正尽其所能消灭巫术。但是，他们的方向是错误的。她冒险提出一些想法。法官们可否谨慎地将受苦的女孩晾一段时间，并将她们分开？她建议他们从一个已认罪的女巫入手。女孩们中有几个人撒了谎，作了伪证。

如何处理老贾尔斯·科里还未知，法庭在他身上没有进展。7月底，在伊普斯维奇的监狱里，老科里“身体非常虚弱，但记忆力非常好”，他写下遗嘱，把百亩农场留给两个女婿。约翰·普罗克特——他是科里的邻居，两人曾在法庭上扭打，又曾相互安慰，一起喝酒——已被绞死。从教会被驱逐出去的玛莎在几天之内就要行刑了。她的丈夫无意承认，更无意迎合法官。他出庭数次，每次都拒绝说重点。他深知，任何踏入斯托顿法庭的人都难逃一死。姑娘们又会从头唠叨一遍他能和乌龟交谈，还有他透明的刀之类的话。

科里一直吹嘘，他一生就没怕过，因此拒绝说“上帝和吾国”。斯托顿警告他，如果不这样做，他将遭受中世纪的“踏刑”（*peine forte et dure*），该刑的字面意义为“痛苦的严厉惩罚”。石头和铅块将堆积在嫌犯身上，不断叠加，直到嫌犯求饶或死去。这种惩罚曾被提起，但从未在新英格兰使用。最近一次用来威胁犯人，还是在1638年——那是一名被指控谋杀三岁孩子的女性——她选择绞刑。

可能是在9月17日，守卫将科里带到封闭的塞勒姆监狱庭院，或是过了街，带他去了一片田地。他脱了鞋和衣服，近乎赤裸，然后展开双臂呈大字状，躺在阴凉的地面上。官员们用一块木板盖住他，然后在木板上堆积岩石；敦顿可能提供了协助，这个监狱看守什么活儿都干。执行者直接按照既定的法律准则进行工作。根据法律，被告将被压上“他能承受的全部重量，直至更多”。科里将“没有给养，只在第一天有三小

块最差的面包，第二天有三口死水，取自最靠近监狱门的地方”。最初的几个小时，酷刑可能会有所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便为时已晚。围观者聚集起来，其中包括科里的朋友，一位富裕但凶狠的楠塔基特船长。他出生在塞勒姆，曾担任行政委员。他了解情势，也明白科里死去的概率；他的姐夫也在逃亡之中。他试图说服科里。

虽然呼吸困难，贾尔斯·科里毫无疑问有很多话想说，他到底还是没有说出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词。他表示忏悔，但若重来一次，他仍会那么顽固。那个星期，教会开除了他的教籍，又一个科里家的成员；这一决定是在他忍受酷刑时做出的。因为不能宣布他犯巫术罪，所以教会开除他的教籍的理由是自杀。在他被折磨多日的最后时刻，他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显然，治安官科温“用他的手杖，逼迫它又缩了回去”。很快，这位老人就死了，时间大概是9月19日的中午。科温立即出面征收他的财产，这实在是有趣的讽刺，因为四十三年前，贾尔斯·科里第一次出庭受审时，便是因为从治安家里偷麦子、烟草、培根和一些其他物品。他的一个女婿同意缴纳巨额罚款，这才阻止了科温。

乔治·伯勒斯是唯一一位因巫术被绞死的哈佛毕业生，而贾尔斯·科里或许是美洲唯一一个被石头压死的人。我们不知道玛莎——她该怎么才能猜到那场马鞍之争会带来什么——是否收到了消息，或许，这名罪妇在监狱里能听到她丈夫的呻吟。其他人在伯勒斯行刑时已然颤抖，自然尽力避开科里。在科里死后的第二天，一封写给休厄尔法官的信表明了这种反感的程度。科里在巨石下喘息时，女巫们再次袭击了小安·帕特南。她们威胁在科里咽气之前，要在圣安息日那天晚上就将她压死。她的父亲说，一个鬼魂显形后，她才终于得到喘息的机会。这个故事实在复杂，帕特南认为有必要告诉休厄尔法官。那个鬼魂是据称几年前被科里杀死的男人。鬼魂说，虽然魔鬼答应科里他不会被绞死，上帝的命

令却让他痛苦且恰如其分地死去。小安与鬼魂的谈话令帕特南惊叹，在两个层面上尤为不寻常。他本人认识被科里谋杀的男人。那鬼魂的话绝对是真的！然而，一切都发生在他的女儿出生之前。这个十二岁的孩子似乎连通了过去和未来。

为什么以前没人提起这事？帕特南对此疑惑不解。“现在，先生，这件事太奇怪了；这么长时间以来，贾尔斯·科里一度入狱，而且经常出庭，为什么就没有人想起这些事呢？”早年间的陪审团认定他犯有谋杀罪，“但是好像有某种魔法妨碍了起诉，法院并未治他的罪”。（帕特南给出了解释：陪审团的判决让科里不得不施用大量魔法。）休厄尔读信时，科里刚刚死去，所以他完全感同身受。正义胜利了。安息日晚上的幽灵得以安息；细节皆匹配，结局令人满意，尽管休厄尔仍有些疑惑。读信时，他把鬼魂当作了科里。于是，休厄尔很自然地推断出，科里曾“踩踏并压死了一个男人”。（帕特南写的是，科里“用他的脚踩死”了受害者。）而在1676年，陪审团听到的是，科里用棍子打了受害者将近百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庭还判科里无罪。

玛莎·科里仅仅当了两天的寡妇。9月22日早上，天色仍然灰暗，她沉重缓慢地穿过塞勒姆，去往后来被称作“绞刑山”的地方。那天是布道日，可能是故意安排的。玛丽·埃斯蒂与她同行，此外还有塞缪尔·沃德威尔和另外五人。虽然按照计划，多卡斯·霍尔应该加入，但最后并未现身。虽然被剪去卷发，霍尔还好好地活着。她希望能活下去；数日前，她已经承认犯下“恶毒的巫术罪”。诺伊斯和黑尔干预了她的案件，请求菲普斯或者斯托顿——他们不知二者谁在管事——推迟行刑。黑尔无法解释为什么霍尔在恶魔之书上签字，但对她的供词非常敏感。鉴于她非常痛苦，可否给她一个月的时间，牧师们请求道，“以完成忏悔”和“为死亡和长眠做好准备”？她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他们加了一些

筹码，补充说霍尔供出了同伙。缓刑得到了允准。休厄尔指出，这是第一次被判死刑的女巫认罪。这也是唯一一次。

9月行刑前，其他罪犯关心灵魂多于自己的生命。会算命的塞缪尔·沃德威尔也经历了心境上的改变。那天，当他在监狱中备受煎熬，他没有兴趣听到有关他6月参加布道时推搡着挤进人们的座位当中的更多细节。他不是巫师。法庭怎么能仅依靠幽灵证据就定他的罪？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却发现放弃恶魔洗礼同放弃教会的洗礼一样困难。按照当时的逻辑，多卡斯·霍尔认了罪，仍然待在监狱里，而沃德威尔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则去往刑场。^[15] 他让那些考虑跟随他步伐的人们感到灰心；他将是唯一被吊死的认罪者。他可能已经猜到自己的结局，但宁愿像玛格丽特·雅各布斯那样，不要以牺牲良知来换取活命。科温的手下乘虚而入，抢走了沃德威尔的牲畜、木匠工具、八堆干草，还有六英亩地里的谷物，大概是他们自己收割的。虽然为时过早，科温还是去了霍尔家。离开时，他带走了窗帘和床。

在那个闷热的周四，牛拉着车缓缓前行，一个车轮卡住了。人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让它继续前行。女孩们是这么解释的：恶魔阻碍了它的前进。（事实可能乏味得多。在镇外不平的、车辙纵横的路上，有轮子的车往往无用。而且，这辆车还超载了。）塞勒姆的“福音女人”玛莎·科里始终坚持自己无辜，临死前站在梯子上热切祈祷。沃德威尔对人群说话时，刽子手烟斗里的烟雾如云般飘到他的脸上。他开始咳嗽；他的指控者讥笑着，那是魔鬼打断了他，因为他不喜欢沃德威尔胡言乱语。他声称自己无辜。没有法庭可以证明他有罪。玛丽·埃斯蒂爬上梯子，与丈夫、孩子和朋友道别，引来纳斯一家的啜泣。她以无私、清醒的语调表达了她的请愿。当刽子手罩住她的脸，把她推下绞架时，几乎所有人都哭了。

尼古拉斯·诺伊斯除外。他转向简陋绞架上悬挂的尸体，嘲笑道：“看着八个来自地狱的叛徒挂在这里，是多么悲伤的事呵！”在马瑟的记录中却没有他们的痕迹，他们死得有点晚了，马瑟已向前推进。他们否认使用任何巫术，和此前四次庭审中的二十七名嫌犯一样，也都被判处死刑。他们所有人都因折磨塞勒姆村的女孩而被定罪，其中有人从未听说过后者，大多数人也从没看过后者一眼。许多海湾殖民地的居民都在认真地计数。他们的统计也许并不精确，但深藏内涵：清教徒的敌人导致马萨诸塞陷入这么一场狂乱，实在让人惊叹。两名贵格会的商人在那个秋天造访塞勒姆，发现那里为了所谓的恶魔崇拜，正急切地“吊死一个又一个人”。的确，如科顿·马瑟所哀恸的，他们“狂热且疯狂地在黑暗中相互伤害”。猎巫似乎鼓励着你，让你如你所憎恶的生物——天主教徒，法国人，巫师——一般行事。

[1] 我们不清楚斯托顿想如何处置那些认罪的人，他们都回到了狱中。审判仍在进行，留着他们有助于巩固证据、辨认同谋。不过，他们中至少有部分人是可能会被绞死的。

[2] 关于诅咒尚有一些疑惑。如果你象征性地许愿，希望魔鬼带走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一头奶牛或一个女儿——这真的算对魔鬼发出邀请吗？科顿·马瑟会警告你，许愿时要特别小心。一旦召唤魔鬼，他便会如期而至。

[3] 丹恩牧师否认自己了解任何咒语或实验。他有些尴尬地坚称，他在村里度过了四十四年，与教民保持密切联系，如果真的有，他一定会知道！

[4] 在民间传说中，仙女或精灵会在夜间玩弄孩子的头发，从而缠

结的辫子就叫精灵辫（elflock）或仙女辫（fairy-lock）。

[5] 这个实验引起孩子的痛苦，还把一位邻居召唤到了门外，她声称自己是来卖鸡的。人们认为这个邻居是在这场实验被念咒召唤而出的，所以她受到指控和审判，并于9月22日被处以绞刑。

[6] 后来，马瑟因在治愈古德温家孩子的过程中召唤了魔鬼，被法庭传唤。在一位反对者眼中，马瑟的祈祷与其说像神圣的启示，还不如说像“迷信者的魔法和咒语”。

[7] 索尔兹伯里少不了派克，所以人们无视此判决。

[8] 派克并非唯一一个注意到《旧约》很少提及巫师、《新约》则更少提及的人。他还注意到，《旧约》中的男巫都十分蠢笨。他们甚至都解释不了法老的梦！

[9] 在塞勒姆村，帕里斯的脾性异于常人。8月14日是礼拜日，唱完赞美诗后，他祈祷并祝福了一句，然后解散了教众。他请男人们留下。他问他们，近来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教民放弃了圣餐，甚至很少来参加集会？他发动志愿者调查此事，但其实这事不需要调查：空空的长椅原先是丽贝卡·纳斯的儿子和女婿们坐的。寻找彼得·克洛伊斯时，志愿者们遇到了麻烦，此人很少在家，于是他们在教堂记录上千巴巴地留了一句：“他常在伊普斯维奇监狱里陪伴因巫术入狱的妻子。”

[10] 科顿·马瑟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同样以自我为中心：恶魔之所以降临埃塞克斯郡，是因为这里的法官太厉害了，二者势均力敌。

[11] 事实上，沃德威尔四天前就死了。他没能活到六十岁，到那时他与魔鬼的契约就失效了。

[\[12\]](#) 庆祝活动在布里奇特·亚瑟家举行。亚瑟先生当时或许已经躲起来，因为他被指控使用巫术。

[\[13\]](#) 这种紧密关系在上一代已经形成。休厄尔的父母是在索顿斯托尔的父亲撮合下成婚的。斯托顿已经与哈桑的父亲共事多年。温思罗普帮科温的父亲获得了地产。休厄尔和科顿·马瑟的父亲是朋友；温思罗普和斯托顿的父亲则曾打过架。

[\[14\]](#) 有的人做得更绝。英克里斯·马瑟在1714年丧妻，对方也是他的继姐。后来他娶了侄子的遗孀。

[\[15\]](#) 有人好奇，如果两人性别互换，结果会否不同。在巫术法庭的桎梏中，男人的下场往往比女人更凄惨。

第十章 出版以防误信

因为预言是历史的前言，而历史是预言的后记：所以两者记述的是同样的事。

——尼古拉斯·诺伊斯，1698

那个秋天，一百二十名浑身脏污、营养不良的巫师嫌犯身陷囹圄。有些怀着身孕。有几个病情危急；其他人曾照顾着这些现在已经死去的嫌犯。她们在流言漫天的污秽巢穴中相互依存，成为彼此不法的同伴。近一半人对罪行供认不讳。牧师丹恩的儿媳和威廉·巴克的嫂子描述了指控是多么疯狂且令人心力交瘁，“胆怯的女性不可能忍受”。她们对所有归咎于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心智，几乎消耗殆尽”。她们羞愧而不知所措，前途未卜。认罪的女巫和被指控的女巫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吗？有些人坚持自己的无辜，强硬程度就像其他人为恶魔契约作证一样。认罪者对顽固分子发出嘘声，唾弃他们。他们完全知道，自己也是巫师啊！与此同时，认罪者肯定了彼此的说法。整个夏天，他们口径一致，充分证明了恶魔阴谋的存在，然而到了9月末，他们的话开始不那么可信了。这场危机的扩散范围之大也令人不安。约翰·黑尔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不禁怀疑，“在一个文明开化、面积狭小的土地上却有如此多人犯下如此恶劣行为，立马便臣服于恶魔”，这真的有可能吗？法庭遇到愈来愈多的阻力。他们需要一个恶魔入侵的权威版本，以便验证他们的努力，强调当下的危险，并消解所有的疑虑。幸运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志愿者。

早在9月初，科顿·马瑟就已要求斯蒂芬·休厄尔把法庭记录给他。休

厄尔同意提供，但一直没有送出。他缘何犹豫，原因难解。法庭一直到9月中旬都在持续工作；此时，休厄尔的妻子刚怀上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他要应付各种请求和问讯，包括帕里斯和纳斯一家的，前者在镇上定期举行，后者则在他的家门口持续不断。他已有太多文书工作要做，没空转录审判记录的额外副本。马瑟十分不耐烦，试图在9月22日的绞刑前几日看到那些文件。他恳求休厄尔信守诺言，这样他就可以证明自己“更有能力协助提高对抗地狱敌人的标准”。他只需要六个嫌疑人的记录或者——如果休厄尔觉得方便分的话——十几个主要案件的记录。虽然要付出额外的力气，但必定获益匪浅。^[1] 马瑟提醒他，他正在为了朋友冒险。无须明确指出，其中一位便是休厄尔的哥哥。

马瑟一开始不过要求休厄尔帮个小忙，后来就变成了命令，并提出了要求。法庭书记员应以叙述形式向他提交材料。至少，他应该详细说明他经常听闻的事情；能否请他重复一下他关于认罪者的可信度、目瞪口呆的陪审员对幽灵证据的解读的评述？马瑟听起来可不像是会一再反对幽灵证据的人。他想要最有说服力的细节；他会读休厄尔的记录，然后收为己用。迄今已经绞死十一名女巫，此刻再说不信巫术，实在太难。（他还有一个额外的理由，解释他为何适时地跳进这个烂摊子：黑尔和诺伊斯都在考虑写一本自己的书。无论他们目睹了什么，塞勒姆的参与者们都觉得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信的最后，马瑟亮出杀手锏：他是在总督的要求下参与此事的。这就暗示了此书会有很强的政治反响。

休厄尔再也无法推迟；他和家人第二天就去了波士顿。那时，他可能交出了很多文件，但是从未打算提供目击证人的记录。那个周四，斯蒂芬·休厄尔，斯托顿，哈桑，小约翰·希金森和科顿·马瑟共聚在休厄尔哥哥华美的豪宅，那里的装饰都是橡木和红木制的。9月22日，当塞勒

姆绞死八名巫师时，这些人则在应对世人对法庭的抨击。所有人依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满意，甚至包括希金森，尽管他的妹妹被判入狱，而他在数天前才签署逮捕令，抓捕一名格洛斯特的新嫌犯。法官们必然是英雄，而非玛丽·埃斯蒂或贾尔斯·科里；他们的事业是消灭巫师，而不是制造殉道者。这是一个布道日，他们参加了祷告。如果他们寻找的是上帝的首肯，那么他在当天晚上便降临了——以一场倾盆而下的及时雨的形式出现。

虽然在5月抵达此地时，总督菲普斯已经发现他的选民们正被“非常可怕的巫术或恶魔附身”悲惨地困扰着，但他将此事完全交托给斯托顿，希望能够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或者至少可以打击得到的敌人。然而现状危急，他实在不能再无视了。9月29日，他回到“激烈的争议”之中。巫术已经阻碍所有其他的事务。那些抨击新特许状和新政府的人，都利用这些审判来诋毁菲普斯，将“酝酿陌生的不满情绪”推进为一场公开的争论。即使菲普斯希望在政治上回避这个问题，他个人却不能逃避；到了秋天，他发现自己竟然与一个受折磨的孩子和一名被指控的女巫有关。他不在的时候，连他的妻子都被牵连了。^[2] 菲普斯决心控制法庭的走向，定于10月重新召集法庭。

法官们劳苦功高，马瑟写道，“在令人心碎的悲悯之中，他们如何能够在那里最好地服务上帝和人”，换言之，他们非常困惑。法庭的意见分歧很快被泄露；几名法官向总督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担心是自己思虑过度了。如果再次开庭，他们承诺，“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下去”。（我们不知道意见相左者的名字。最有可能是新婚的理查兹，或者他和波士顿的商人彼得·萨金特。理查兹——他的母亲多年前曾成功抵挡巫术指控——已经请求上级给他指示。萨金特因其富有而受到保护，法院其他人被商业相关利益网络束缚，他却不受约束。休厄尔听从

斯托顿的意见，温思罗普没有表态，这三名塞勒姆法官仍然立场坚定。）知名教会人士提出了一针见血的好问题。受人尊敬的公民也受到指控，即便是波士顿的一位显赫人士，也得带着生病的孩子赶二十英里路到塞勒姆，请村里的姑娘们诊断，那时的塞勒姆已突然成了新英格兰的卢尔德 ^[3]。英克里斯·马瑟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这位哈佛院校长、新英格兰最杰出的律师怒道：是不是“波士顿没有神”，“所以他要去塞勒姆，寻求魔鬼的帮助”？当一位波士顿的牧师发言抨击青少年神谕，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巫术的黄金时代再次促成巫术文学的黄金时代；马瑟父子都在辛苦创作。先完成的是英克里斯·马瑟。10月3日，星期一，牧师联合会在明亮的哈佛学院图书馆碰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年前就在底下的礼堂参加礼拜和上课。他们原本准备解决一个行为规范的问题：一位牧师能否向没有牧师的兄弟教会提供圣餐？但是，更紧急的事情插了进来。科顿·马瑟作为主持人，在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大声朗读他父亲的新作《良心之案》（Case of Conscience）的选段，这一部分是从联合会8月的讨论中脱胎而来的。这篇选段呼应了那篇写于1646年、由英克里斯·马瑟推荐给巫术案陪审员的英国作品。他详述并急迫地重申他5月的观点，即幽灵证据无效。他第三次坚持认为，虽然魔鬼可能冒充无辜之人，但他的诡计很少成功。 ^[4] 法庭很少错判，以至仅凭魔鬼的迷惑，“世上可能从未有无辜者被法庭冤枉”。这话不仅听上去别扭，逻辑也不怎么通，它后面跟着为法庭开脱的、大写的“不过”。恶魔一般也不会安排女巫飞越数英里。的确，人子，了在瑞典这样做了。但是真实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往往不会如此自由地交错。

于是，英克里斯·马瑟表示支持法庭；他大多是在发挥辩才。塞勒姆的姑娘们虽然能看见幽灵，但绝不能断定她们乐意为之。甚至连她们

是否受到魔镇（bewitched）都不清楚。他怀疑是附身（possession）。

[5] （此后，“魔镇”和“附身”两个词一直被混用，除了在他儿子的书中）。附身很容易导致抽搐、四肢伸缩、预言、突然跳入壁炉，还有女孩们容光焕发的身体状态。据他推断，邪眼是“一种古老的谎言”。如果女巫真的能从眼睛里射出毒液，那么只要在她们的视线范围内的人都会受到影响。（奥尔登也曾指出这一点，然而徒劳无功。）至于触摸测试：“有时，想象力的能量是巨大的，一个无辜者的触摸与未被指控者的触摸应该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他拒绝相信“魔法实验”，就像他拒绝相信女巫蛋糕一样，因为那是“非常愚蠢的”。（玛丽·西布里也许不会知道，那个懒散下午的实验为何会被奉为圭臬。）马瑟非常熟悉法庭进程的每个细节，甚而知道那只邪恶的狗因折磨一个被施咒的女孩而被射杀的事。“这只狗不是恶魔，”他解释说，“如果是，他们不可能杀得死它。”在文章的主体部分，他没有提到马萨诸塞的其他死者。他也没有提到，法庭刻意忽略他在6月提出的每一条建议。

什么样的证据才足够证明巫术？“自由和自愿的供认”始终是黄金标准。据此，在瑞典女巫大屠杀后的几年，仍有无辜的鲜血流淌，起因于一个指责母亲带她飞到夜晚的集会的年轻女孩。女孩的母亲因此被活活烧死。后来，当女儿的来到法庭面前“鬼哭狼嚎”。她想报复她母亲，所以错误地指控她。施咒或占卜秘密的证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样的还有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完成的壮举。（马瑟父子都努力压制对伯勒斯的疑虑，后者令他们感到特别慌张。）若是可信的、充分了解自己能力的男男女女作证，那么证据就是可靠的；五十三岁的马瑟对啜泣撒娇的少女可没什么耐心。如果在“谋杀、盗窃或任何重罪中，一个受到干扰的或被附身的证人”的证词没有被接受，那么“在巫术案中也不应该被接受”。[6] 他表示愿意宽恕，在那个秋天写道：“我宁愿判一个女巫为诚实的女人，也不愿判一个诚实的女人为女巫。”

八位牧师为马瑟10月3日的声明背书。作品出版时，又有六位加入，有人的教民已被处决，还有人的教民正等待审判。那个早晨，当科顿·马瑟大声朗读他父亲极具说服力的文章时，塞勒姆的法官听取了证词，指控一名四十三岁的林恩女巫。巨大的猫成群结队，凶猛跃过屋顶。一个成年男人已经连续三个晚上因为害怕而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一个女人换衣服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黑色东西”扫了过去。法官传唤了痛苦扭动的玛丽·沃伦。嫌犯的手一触，她便平静了下来。只不过看了两眼，嫌犯就使玛丽瘫倒在地。沃伦回了家，林恩的女巫则进了监狱。风向变了，但仍立即吹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大约在这个时候，菲普斯或其亲信中有人向一群纽约神职人员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提请对巫术的质疑。至少有一些人相信，马萨诸塞的牧师太浅薄，不够格。

翌日，七名嫌犯被保释回家。这还是第一次。他们都不到十八岁。最小的是卡里尔七岁的女儿和牧师丹恩八岁的外孙女。年纪最大的嫌犯里有小玛丽·莱西，安·福斯特任性而滔滔不绝的十八岁外孙女。有些人对此感到不安；三名嫌犯那个星期刚从波士顿监狱逃脱。威廉·巴克，安多弗的农民，曾透露要让所有人平等的恶魔计划，抓住时机逃了出去，一对在押逾九个月的夫妻也逃走了。治安官科温立刻出马，没收他们在塞勒姆村的剩余地产。之前他已经去过一次，抄走牛群，用以支付他们在监狱的账单。十二个孩子被留在了农场上；10月7日，一个年龄较大的儿子设法以十镑的贿赂阻止科温。这是他最后一次企图没收财产。在那个星期，一个波士顿商人给纽约的朋友写了封信：“在此，我们希望这极度的狂热和愤怒已经停止。”

整个10月，唯独沉默与姑娘们的哀叫一般诡异。即使是那些大胆废黜英国总督、后因公民不服从而入狱的人，也在此时选择沉默。持怀疑

态度的人将这份怀疑深埋心底。前任副总督托马斯·丹福斯曾主持4月的审讯，当时帕里斯的外甥女初次提及在她家后院举办的女巫集会；女孩们宁愿把手伸进嘴里，也不指认伊丽莎白·普罗克特；波普夫人飘浮在空中，阿比盖尔的手则烧焦了。自那时起，查尔斯敦最大的地主开始产生怀疑。他似乎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10月中旬才表达出他不相信法庭可以在没有人民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下继续办事。法庭的做法将招致危险的分裂。六十一岁的著名牧师迈克尔·维格尔斯沃思是广为流传的《毁灭之日》（The Day of Doom）的作者，10月3日为《良心之案》背了书，但直到很晚才发表对审判的看法。审判的成本高昂，但人们对聪明、健壮的斯托顿的信心更高。提出异议者通常会被指控或被罚款。五十二岁的塞缪尔·威拉德是牧师中唯一堪与英克里斯·马瑟比肩的人，一直都言语谨慎。他协助英格利希夫妇逃跑；他还参加了为约翰·奥尔登私下举办的斋戒。作为交换，他遭受了“粗鲁对待、辱骂和责备”，后来还受到巫术指控。

风向终于转变，而且突如其来。原本默默退缩的人们，开始高声呐喊。他们指指点点，火冒三丈。丈夫们责备自己，因欺侮妻子以致她们承认罪行。一旦发现发声安全，所有人都立刻开口，而且几乎没有人像英克里斯·马瑟那样小心地绕圈子，宽待法庭和政府。一位波士顿显赫人士被指控后，提请了高达一千镑的诽谤诉讼。科顿·马瑟观察到，随着巫术的愈演愈烈，人们就像中了咒语，“继而进入一种狂怒、肆意、不道德、不合理的状态”。而随着这个咒语的解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疯狂的人在相互对抗”。

这一转变的到来，既可以说毫无缘由，也可是说有多达数十种原因。恐惧终于消除了迎合；司法体系和人们的精神都已疲惫不堪。法庭的行动太激进，牵扯的范围也太广。说起来还真是微妙；政府毕竟是英

克里斯·马瑟促成的产物。当法官们需要建议时，他们总向他求援。马瑟对菲普斯政权的投入是最多的。善于控制的殖民地最杰出公务人员斯托顿，亦是由马瑟指定的。不过，斯托顿现在似乎站在更正统的乡村牧师那边，如帕里斯、诺伊斯、巴纳德和黑尔，后者们对幽灵证据坚信不疑。斯托顿的不知变通令人惊讶；一位远观事态发展的伦敦记者在1月表示质疑：“任何一个能力、学识和经验都远不如斯托顿的人”，都不会屈服于这些信念。相信这样的东西，毫无理性可言，且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任何能像理查兹法官在5月时问出尖锐问题的人，都不会在绞死牧师时作壁上观；伯勒斯在绞架上的演说，比科里固执的沉默更加震撼人心。甚至连巨石都为止微微颤抖。

很少有人能像塞缪尔·休厄尔那样分裂，一方面衷心地赞同“团结一致令王国繁荣”的箴言，另一方面避开争议或冲突。10月初，他的弟弟斯蒂芬长期高烧，久卧病榻。这令人不禁好奇病因，毕竟当时人人都在反思自己的灵魂。病况未得到减轻。到了9月末，斯蒂芬允诺，如果能活下来，会更用心侍奉上帝。整个10月，在波士顿及其周边，他的哥哥四处谈论和了解巫术的情况，人们对此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对他发表了看法。但大部分人保持沉默。贵格会人士预计，女巫将继续在马萨诸塞继续猎食，直到殖民地后悔绞死了他们的贵格会同党。

10月第一周的星期五上午，天气潮湿，休厄尔和塞缪尔·威拉德骑马往北，去拜访一位信任的同僚。休厄尔此前就常向韦纳穆的牧师塞缪尔·托瑞寻求工作上的建议，也会向他咨询法律事务，甚至询问英格兰旅行事宜。托瑞一个月前成了鳏夫，正因此感到孤独；于是，三人在托瑞家的厨房里探讨这场危及殖民地的危机。托瑞认为，法庭在执法中有不当之处。但他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纠正的，之后法庭就应该恢复最重要的工作。休厄尔受到了鼓舞，在冰冷的细雨中离开。早晨刮来了大风。

翌日晚上则降下厚厚的霜。休厄尔开始读一些晦涩的材料，之后雪便落了下来。威拉德为马瑟的《良心之案》写的序言，他可能已经预先看过；他已经明白了马瑟的意见。作为曾判处十一人死刑的法官，那并不为他所在意。

早在4月，威拉德就曾讲述了一个撒旦折磨无辜者的著名例子，即伊甸园里的蛇，那只是恶魔手中的工具。该生物不能因“超出其天性和领悟力之外”的举动而受到指责。（威拉德在波士顿免除了蛇之罪，与此同时，哈桑却在塞勒姆用他不变的逻辑让布里奇特·毕肖普落入圈套：既然她不知道女巫是何物，又怎能宣称自己不是女巫？）威拉德并没有怀疑是恶魔造成了祸害。女巫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消灭。但哪怕是对此表态的上帝（见《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也会指派两名证人见证死罪（见《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7] 鉴于惩罚的严重性，证据多多益善；威拉德为无辜者慷慨陈词，直到其被证明有罪。起诉也并非总是可取。上帝从未规定，所有死罪都要被追究。如此做法是为了“推翻政府”，“把世界变成一团混乱”——这是清教徒的噩梦。在他写给马瑟作品的序言中，可见贯穿整个10月的强烈反对意见：“过于草率的怀疑”“太武断的结论”“太沉重的判决”“大胆的篡改”，以及“被误导”的危险。

休厄尔对威拉德唯有敬佩。他布道的天赋过人；哪怕是发挥失常，他也可以泰然自若地完成。他是一个审慎而冷静的人，哪怕布道时一位教民昏死过去，他也没有停下。他应付得了绝望中的青少年；当休厄尔十五岁的儿子遭遇锥心般的信仰坍塌时，休厄尔便是向他寻求帮助。在马萨诸塞的牧师中，只有科顿·马瑟在文学上的造诣超过威拉德。在关于“邪恶天使”和“恶魔算计”的经历上，新英格兰的任何人都比不上这位波士顿第三教堂的牧师。当威拉德还是年轻牧师时——当时同样是雪

季，他身处塞勒姆村以西五十公里处的格罗顿乡村，过着更加孤独的生活——他便已开始对付一些怪事了。1671年，他十六岁的仆人开始大吼和尖叫，忽而又爆发出“极端和放肆的大笑”，比画“愚蠢做作的手势”，还在房子里跳来跳去。接着，她倒地哀号。窒息和麻木随后轮番上阵。有一次，她连续发作四十八个小时，厉害到六个男人都压制不住。她——伊丽莎白·纳普——也在壁炉中看到了中了咒语的生物。

这一切都是塞勒姆的重演，不过它发生在二十一年前，比古德温家孩子的发作还早了十七年。塞勒姆的年轻姑娘像狗一样狂吠，像猫一样咕噜叫，伊丽莎白·纳普和她们一样或发出犬吠，或如小牛般轻声叫唤。她不再祷告。她打那些照顾她的大人，还吐唾沫在他们脸上。她见过撒旦。她比科顿·马瑟更早说这世上鬼比人多，在格罗顿这样的偏僻农村，这种说法听起来特别合理。威拉德叫来一位医生，请他治疗伊丽莎白。医生诊断是胃病“在她的大脑中引发烟雾和奇怪的幻想”。再次检查后，他拒绝再照管她。让这个姑娘生病的是邪恶之物。

那个冬天，很多人来看伊丽莎白——威拉德指出，她所受的折磨因被人旁观而达到顶峰，随着人越来越多，她也变得愈发狂躁——但是，没人比威拉德花更多时间陪伴她，也没人比他受到的辱骂多。他整日与十六岁的伊丽莎白待在一起，与她一同祈祷，和她讲道理，安慰她。她指控一位受人尊敬的邻居魔镇了她。她亦承认已经签署了撒旦的契约。魔鬼向她允诺“钱，丝绸，好看的衣服，不用再辛苦地劳作，以及带她环游世界”。即使她拒绝了他的帮助，他也为她收集来了柴火。在发作间隙，她难以抑制地痛哭。她承认一连串罪行：冲着父母咆哮，故意不祷告，还考虑过自杀。威拉德始终保持冷静，即使伊丽莎白透露魔鬼让她杀死他和孩子；她一度想要把他最小的孩子丢进火里。伊丽莎白一会语无伦次，一会狂暴，一会发难，一会又道歉；时而“无比愚蠢”，时而

魂不守舍，时而却完全清醒。她也艰难抵御壁炉对她的引力。她差一点就投了井。每过一小时，她便推翻自己之前说的话。是魔鬼；是那个邻居；是伪装成邻居的魔鬼；这一切都是幻想；在牧师家的楼梯上遇见魔鬼；以血立下七年之约；她没有签过那种东西。

在12月一个昏暗的安息日下午，她刚被确定未被附身，体内便开始发出低沉的男性低吼。伊丽莎白的家人从安息日集会上匆忙地赶到她的身边。威拉德直接从讲坛上下来，也跟着来了。“哦！你这恶棍，”她以此问候，嘴唇未动，嗓音粗哑，这是成年人的声音。威拉德全身发冷。“他受到了惊吓”，让人们点灯。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花招。他威吓魔鬼现身，通过这个少女与嗓音粗哑的魔鬼交谈了一阵。魔鬼嘲笑道：“你告诉人们的，不过是连篇累牍的谎言。”威拉德回答：“撒旦，你才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总有一天，上帝会显灵。”最终，他要求大家跪在伊丽莎白的床边祈祷。这时，魔鬼更大声地咆哮起来：“闭嘴，闭嘴，滚开，你这黑皮恶棍。”威拉德谨慎详尽地做了记录，但是拒绝给出结论。人们可以伪装成很多东西，但这个，他确认，是伪装不了的。（德奥达特·罗森曾发誓塞勒姆的姑娘们也是如此。没人可以用正常手段将她们的身体扭曲成这样。）至于伊丽莎白是否真的与恶魔签了契约，“我想，”威拉德总结道，“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像帕里斯或马瑟，威拉德可以接受不下结论，于是他停在那里，只对伊丽莎白完全不动嘴就能发出P和M的声音的能力及其他事情表示好奇。虽然不太方便，他还是将她留在身边，密切观察。他还做了一件更费劲的事：他暂停了祈祷。

伊丽莎白最终恢复了健康。没有人被绞死。这次情况最后被视作恶魔附身，威拉德对此细致的临床研究被广为传颂。英克里斯·马瑟在新作中提到此事；而第一次提及是在更早的《显赫的天意》中。（他补充

了几个马瑟式的转折。在他1684年的版本中，恶魔“吐出了最可怕、最邪恶的褻渎”。）三十年后，伊丽莎白·纳普再次出现在科顿·马瑟的史诗巨著《玛格诺拉》（*Magnalia*）中，被视作代表性案例，是无形世界十四个超自然奇观中的一个。若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帕里斯家的孩子可能只会受到同情，不会在塞勒姆村以外的地方制造更多波澜。^[8] 威拉德没有责怪谁，尽管他那段时间没少受为神圣使命来回奔波的折腾。撒旦以格罗顿为目标是有原因的。居民们需要好好反思，他们是如何让撒旦的裂蹄踏入村庄的；他们应当齐心协力，把他赶走。1692年，塞缪尔·威拉德是马萨诸塞少数亲身理解为何要审判塞缪尔·帕里斯的人之一，因为他必须要问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使得灾难降临在自己家中。

纳普案的四年之后，印第安人袭击了格罗顿，焚毁部分城镇。^[9] 威拉德和家人逃到波士顿。威拉德是位嗓音悦耳、不知疲倦的传道者，已经有作品出版，很容易便找到了工作。1677年，威拉德刚刚加入第三教堂，便目睹几个贵格会女教徒冲进会堂，只穿一半衣服，头发纷乱，脸上满是黑灰，造成塞缪尔·休厄尔口中的“极为惊人的大骚乱”。十年后，安德罗斯占用了威拉德的教区——这也是波士顿最富有的教区，专为英国国教服务。很快，浅色头发、五官端正的威拉德，作为一位思想深远、性格冷静、逻辑强大的思考者，明白这是恶魔、印第安人、贵格会和英国国教的入侵。他应当比任何人都要保持正统，而《公祷书》^[10] 却玷污了他的讲坛。他的会堂毁于一旦。他曾与魔鬼交谈过，若非魔鬼，也是他管辖范围内的一些幽灵。

威拉德与英克里斯·马瑟一起在哈佛的理事会任职。他很乐意在不影响法院判决的情况下，为一篇质疑法院方法的文章背书。但是他发现，为同僚文章所写的介绍文并不足以表达他想说的。所以，在10月前的某一天，威拉德又多写了几页。那个秋天，一位杰出的马萨诸塞牧师

只能如此表达心声：悄悄印刷地下出版物，靠人们口口相传，还要化名为P.E.和J.A.（即威拉德帮助脱逃的两名巫师的姓名首字母）。威拉德写作是为了启发世人，而非指控他人，他创作出了两名背景相同、头脑冷静的对手之间的虚拟对话。此书在波士顿匿名出版，上面还盖着假的费城印记。

在这本名为《关于我们当下巫术相关讨论的杂谈》（*Some Miscellany Observations on Our Present Debates Respecting Witchcrafts*）的书中，两个对话者分别叫S和B（应该是指塞勒姆和波士顿，因为波士顿人已经开始有意与塞勒姆那帮乡村同僚区分开），他们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一是巫术祸害了新英格兰；二是人们对法庭的不满助长了危险的敌意。威拉德强调了他给马瑟作品写的序言中的观点，但是更进一步，重申人民颠覆政府的警告。单靠限制司法就可以避免。S对此表示反对：但是与此同时，好人有可能牺牲，被献给魔鬼！B提醒他，不管谁是罪魁祸首，更严峻的问题就在眼前，危在旦夕。由于在其他地方说不得，威拉德便在此书中质疑审判的证据。B说，超自然的知识，在尘世的法庭里不能被接纳。那些姑娘们无论是被施咒，被附身，还是二者皆有，她们都已与恶魔勾结。若非如此，她们怎么能提供怪诞的预测，报告出生前的事，或者指控那些她们从未见过的人？

S提出反对：那B真的想要“完全无视受难者的证词”吗？确实，B是这么想的。若一个人心烦意乱、心怀不满，怎么会是可信的目击证人？又如何能够作证指控那些根本不认识的人？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与囚犯对质，可是这些证人都没有照做，法庭又岂能信任她们？（“那是因为女巫用恶毒的面孔吓倒了她们。”S解释道。）B提醒S，双重证人原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但S不同意。“如果一个人说他去年在非洲见到狮子，另一个人说今年在那儿看到狮子；尽管不是在同一时间，也不可能

有同样的狮子：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行不通呢？”

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参加审判，但S向B保证没有嫌疑人仅仅因幽灵证据就被监禁。B表示异议。S安慰自己，触摸测试和邪眼永远不会出错；但B对两种方法都持保留态度。^[11]那么洗礼、集会和圣餐呢？S固执己见。B再次询问，一名认了罪的巫师如何提供可信的证词，他发出质疑：“你真的相信，被指控的所有人都是巫师吗？”攻击的规模不太可能那么大。S同意这点，使得B试图说服他，原告要么是在说谎，要么是耽于妄想。最终，两人胆怯地求同存异。分开前，S忍不住攻击了B。“在支持巫师上，你真叫人敬佩。”他告诉B，后者叹了口气。他之前就被这么指控过。10月前，敢于向法院提出质疑的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威拉德曾几次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又曾几次因个人观点受到抨击——从另一份在10月8日开始私下发行，可能只经过几人之手的文字中可见一斑。从中，我们更加了解威拉德无法表达、但在那个秋天到处在讨论的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三十四岁的托马斯·布拉特尔，一位倾向于英国国教、受过哈佛教育的商人，亦是马萨诸塞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儿子。布拉特尔写信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牧师，后者在巫术风暴之中向他寻求意见。布拉特尔经过深思熟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作为马萨诸塞最杰出的读书人之一，他却从未布道或在政府任职，他的独特地位决定他有资格提供自己的看法。他与菲普斯底下的法庭成员关系密切，却无任何亲戚关系。他和波士顿的许多牧师一样，有着科学的思维。但和他们不同的是，他经常关注塞勒姆的审讯和判决。当斯托顿就8月19日的绞刑和玛丽·布拉德伯里9月9日变为蓝色公猪的情况对陪审团

发出指示时，他都在场。

布拉特尔几乎算是休厄尔的下一代人，而休厄尔是巫术法官中最年轻的。听他说话，像是个不得不在哈佛自学欧几里得几何的人，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这门课程超出了他的导师的知识范围。十多年前，布拉特尔曾对一颗划过新英格兰的彗星进行精确的测量。对于布拉特尔，处于谨慎的态度，彗星就只是一颗彗星而已。他错过了古德温家的小孩引发的骚动，因为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英格兰度过，其间还与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一起工作过。在去之前，布拉特尔已经对新英格兰的本土主义深为不满。他相信简单的解决方案便是最佳方案，这在波士顿还是一个新想法；在许多方面，他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纪穿越到1692年。尽管在今天看来，他的同胞在他笔下就像是一个在参加中世纪仪式的灭绝人种，可他并不是在胡说八道。布拉特尔便是那个讲话前提醒说，与其让他中伤权威，还不如让他咬掉自己指尖的人。然而，他不相信人是万无一失的。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就必须说出来。他远离了搅乱波士顿的焦躁情绪。他没有政治主张；他也不反对新的特许状。但有时候，沉默是愧对良心的。蹚入这趟浑水后，他一直在遮掩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破坏了斯托顿法庭提出的所有设想——他希望自己不会因为表达心声而落入圈套；米尔本牧师还没说什么就被捕了。他同样避免在信上签字。

正如布拉特尔所见，审判有许多地方都太不寻常了。作为约翰·奥尔登的老相识，老成的巴塞洛缪·格德尼是位勤奋的船长，经历过辉煌也见过低谷，怎么会因奥尔登的触碰解除了一个可怜孩子的痛苦，就转而指控他？诺伊斯牧师，“学富五车、慈善心肠，为人友善”，怎么会相信邪眼呢？那些东西都是荒唐的想法，是“更粗鲁和无知的人”才会相信的乡下胡言。谁的身上没点不同寻常的标记？从何时开始，哭不出来就

意味着有罪？（哈桑、科温和格德尼在这一点上特别执着。）此外，大量指控都与巫术无关。布拉特尔拒绝接受司法程序：法庭是偏颇的，其方式是蒙昧的，审讯也是拙劣的模仿。法官们是否真的如他们自己所说，从未仅因幽灵证据就定罪？这显然是假的。只有神智失常的人才会把幽灵证据当作法律依据。为什么科温法官的岳母——多次受到指控——却仍逍遥法外？法院竟还允许供认罪行的女巫把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可是后者已然放弃了上帝和基督；此外，布拉特尔还对“认罪者”这个词吹毛求疵。证词是通过武力逼迫得来的，在那些受到逼迫的人中，还有新英格兰最虔诚的女性。

相比威拉德，布拉特尔远过之而无不及，威拉德还做不到批评法庭。布拉特尔强调人们付出的代价：整个家庭都分崩离析。安多弗那些当丈夫的是多么可悲啊，居然宁愿相信村里孩子的话，也不相信自己的妻子！现在他们就只能“悲伤哀悼，自吞苦果”。实际上，有五十五人已经承认参与了恶魔的阴谋。但是，有些人在“经历非常暴力、令人困扰的强迫手段后”，仍坚称自己无辜超过十八个小时。哪怕他们认为自己已濒临死亡。他明确指出，“大多数人宁可选择落入野蛮敌人之手”——像后来一位评论家所说——“也不愿落入教友兄弟的掌中”。

布拉特尔没有深究这一惊人的灾祸是如何发生的，他更为沮丧的是事态将走向何方。然而，他对真凶有些眉目。他批评法庭程序，对巫术受害者尤为鄙视。谁相信她们是预言家？为准确起见，如果人们指控从未见过的人，这些信息只可能来自魔鬼。（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招供者，他们的记录也充满矛盾。）如果她们真的在受苦，那么如何才能日复一日变得“身体健壮，活力满满”呢？——这里他特别反对斯托顿给陪审团的指令，即仅有施用巫术的意图就足以定罪。至于看见幽灵，布拉特尔以科学态度提出驳斥。甚至不需要光学知识，就知道闭上眼睛来看

东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此非视觉，而是想象。至于支持塞勒姆“眼瞎、无知的姑娘”的伊丽莎白·纳普，被关押是应当之事。她们可能因此变得耽于妄想。最坏的情况是被恶魔附身。回到纳普，他不是唯一一个想到她的人，她的经历将在此后的诉讼进程中萦绕不散。而无论是公开发声和地下出版，威拉德都没提到纳普，尽管附身理论十分流行。也有人向斯托顿提出纳普案，首席法官毫不客气地评判了她。“就好像，”布拉特尔说，“他直到今天都相信她是一个女巫。”

像其他人一样，他对首席大法官斯托顿极其尊重，佩服他的智慧和正直。但所有观察过他的人都会同意，他在巫术这件事上野蛮又狂热，对任何挑战他的观点都很不耐烦。塞勒姆的其他法官（或如布拉特尔所说，“塞勒姆的绅士们”），与斯托顿一起成了幕后主使。哈桑、科温和格德尼——还有，在他们身边的牧师，诺里斯、帕里斯和希金森——一听到质疑都会皱眉，即便是由最亲密的朋友提出的。任何形式的批评都会引起怨恨，惹来愤怒。

所谓地狱对新英格兰教堂发起的大肆袭击，在布拉特尔看来实在滑稽。他担心有另一种恶毒的阴谋。他的笔锋一转，表示法庭参与了“一场地狱般的阴谋，意图毁灭这片可怜的土地”——这让人好奇他的倾诉对象是谁，文章到了第六段就已经远远不止煽动叛乱了。他没有时间做出威拉德式谨慎、艰难的开放性结论。如果人们纯粹因为抱怨受害者而受到监禁，而受害者依恶魔提供的信息行动，那么法官自己就是在和恶魔串通。穿着黑色长袍、坐在法官席上的是地狱的使者；这帮塞勒姆的绅士“无知且愚蠢”，他们才被恶魔附身了。布拉特尔既不像当局那样同情抽搐的女孩，也不像马瑟父子那样同情辛劳的法官，而且，他还不同情那些不信任和误导妻子的丈夫，不同情约翰·威拉德和约翰·普罗克特，尽管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表现得很崇高，哪怕对新英格兰，

他也毫不在意。^[12] 他单独表达了一些更加宽泛的关切。那些参与审判的人，怎么在后来“回顾这些事情时，不为之感到强烈的悲伤”？思及此，他不由得颤抖。他是第一个预想到巫术案会给新英格兰留下深远污点的人，任凭岁月流逝，也不会消失。

布拉特尔知道在10月12日，即他写完的四天后，有一场立法议会，巫术法庭的未来将是议会的首要议题。他希望立法议会可以将其解散。如果没能解散，“我想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英格兰将万劫不复。”在会议之前，菲普斯收到了他在纽约征求的第二个人的意见。这位新教神职人员提出了八个简明扼要的问题，从宽泛的“女巫存在吗？”，到具体的“什么证据有助于定罪？良好的声誉或以前的违法行为都起了什么作用？”，此外还有“幽灵证据是否足以定罪？”。从审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症结所在，在怀疑村里姑娘们的这件事上，布拉特尔不是一个人。那位法国胡格诺派牧师和那三位荷兰加尔文派牧师能否解释，为何女孩们每天都在遭受地狱魔鬼的攻击，却仍保持身体健康？

纽约和马萨诸塞的牧师们以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即拉丁文，进行了沟通。他们同为加尔文派教徒，故而见解一致。纽约的牧师都看了马萨诸塞的公文，还有位特别博学的三一学院毕业生也看了，此人非常年轻，是位理想主义的牧师，代表英国方面刚到纽约，彼时是那里唯一一位英国国教神职人员。^[13] 所有纽约牧师都达成一致：恶魔确实狡猾地使用了“谎言，奇迹，承诺，虚构的或真实的感官放纵，荣誉，财富和其他不计其数的诱惑”。他还诱惑一些人和他做交易；巫术就包含在这一契约里。至于在清算过去的恶行和名誉的清白上，牧师们更倾向于老姬莎拉·古德，而非同为老姬的丽贝卡·纳斯。以前的恶行无关紧要。哪怕是一个好人，也可以找到理由不喜欢自己的邻居。良好的声誉也无甚价值。然而，这些专家们再次认定，幽灵证据不足以定罪。单靠这些证

据“是非常轻率的”。至于女孩们，良好的健康状态应该会持续。纽约的牧师们解释，魔鬼注意到受害者在折磨下日益健壮，并渴望和吞噬“比以前更多的营养”。魔鬼就像是一种类固醇。他可以扭转所有折磨的影响。

这一看法传来时，休厄尔法官正在阅读科顿·马瑟的《无形世界的奇迹》（*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马瑟想赶在10月立法议会结束前写完，最后踩点完成。10月11日，休厄尔和斯托顿都证明了马瑟说法的准确性，与布拉特尔看法迥异。他们还声称，马瑟的作品是在向总督致敬。翌日，菲普斯给伦敦方面写信，第一次提到新英格兰这场超自然疫情，他让两位法官——或马瑟——在场。在斯托顿的建议下，总督才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之后，他几乎一直不在其中。他回来时，眼前只有一片混乱。许多人谴责法官。此外，魔鬼已经开始冒充无辜者。因此，他现在推迟进一步的起诉。只要有可能，他还禁止进一步的逮捕。他着重提出，这些事全是他一个人做的，没有人劝诱。情况非常严重；国王的事业受到损害；混乱还危及新政府。有些公职人员雄心过大；他很遗憾地报告说，有人行事鲁莽，他们本能做得更好。菲普斯的政敌打算用巫术事件针对他，他非常担心，所以强调了两次。那些支持旧特许状、嫉妒他被任命为总督的人想要抹黑他。他等待着国王的命令。

这是英国当局首次正式听说马萨诸塞的巫术。菲普斯10月的那封信其实也是谎话连篇。他说自己很长时间不在殖民地，这绝无可能。他好像是从瑞典而不是波士顿写的那封信；他还借鉴了马瑟对巫祸的描述。他还坚称法庭执法只靠实证；此乃虚言，后来布拉特尔、丹恩、威拉德、沃德威尔，甚至罗森都证实了。（菲普斯总是会“说巫术或附身”，但鉴于发生的一切，他不能太过倾向后者。一位荷兰牧师后来将马萨诸塞的巫术流行称为“假装的巫术，或是一种未知的疾病”。）他肯定是经

人劝诱，而且非常紧迫；他一再听闻纳斯家的消息。与其说他想保护国王的无辜子民，不如说他想捍卫自己不稳定的政治地位。他也感觉到有个阴谋正在靠近：他们密谋将罪推到他头上！为了公共秩序，他禁止所有关于巫术的出版物，“因为火焰一旦点燃，便有可能无法熄灭。”（这在马萨诸塞不是第一次，在1690年，一名激进的印刷工曾竭力维护一份报纸，出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假消息。不出四天，他就被迫停工。^[14]）菲普斯声称要等待命令，这不是不切实际，便是不够真诚。人们说，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通信，“如同大象的繁衍，快两年才有一次”。如果他真的决定解散法庭，并停止起诉，那他还没有通知总督或立法机关。

不过，出版禁令仅适用于非马瑟作品。《良心之案》和《无形世界的奇迹》快速获印，日期巧妙地写迟为1693年。后者堪称美洲的第一本“热点书”（instant book）。此书被冠以各种资质，宣称是“在总督阁下的特别命令下”出版。出版商是本杰明·哈里斯，他的新闻传单在1690年经营惨淡，《难忘的天意》也未获成功。哈里斯无疑为之高兴；只要一过目，他便知道这将是一本畅销书。斯托顿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称自己略微惊讶，但极度满意。这本书是多么及时，写得如此仔细，简直恰到好处！首席法官特别感谢马瑟的艰苦努力，“这是出于我在审判法庭中的地位，仍在为审判有罪者而不辞劳苦、持续工作”。他特别欣赏其中对太平盛世的描述；马瑟从重要的事件中获取了对基督再临的朦胧暗示。当然，他事先读过马瑟奋笔疾书的每一页内容。

从头到尾，都是装腔作势。马瑟声称他被招募来写一本书，斯托顿对此表示由衷欣慰，但与此同时，总督却假装禁止所有关于巫术的书。在其他巫术作品无法出版时，《无形世界的奇迹》顺利付梓，这是巫术审判的宣传物，一个恰到好处的意外，作者也亲自为它背书。的确，当

时的情况比想象中的更复杂，早已不是托马斯·帕特南曾预想的那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菲普斯可能非常希望自己身在瑞典。各种呼吁蜂拥而来。就在他向伦敦报告的时候，九个安多弗人代表他们挨饿的妻子和孩子请愿：他们可以回家了吗？“悔过的认罪者”当然可以软禁在家，直到被传唤。监狱里的艰辛条件让人受尽苦难，囚犯要忍饥挨饿，面对严寒天气，并应付“他们内心的悲伤和烦恼”。这苦难的代价，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家人身上。三天后，一名十二岁的女孩走出监狱，因为她的家人付了安多弗大多数人都支付不起的保释金。10月18日，同样一群人却向菲普斯发出了不同的呼吁。他们的牧师也纷纷加入。多达二十六个安多弗人表示，自己热切地希望这片土地上的巫师可以被全部消灭。但是那些“暴躁的人”歪曲了他们无辜的朋友和邻居，后者在胁迫下认罪，还受到友人和审讯者的攻击。（巴纳德牧师改了口风，签署了由他或丹恩牧师写下的请愿书。）如果法院不重新考虑审讯方法，这座小镇的麻烦将有增无减。已经有更多人被视为巫师。“我们不知道，谁还可以认为自己是安全的，”这些人恳求道，“那些孩子和其他人之所以会指控名声清白之人，是受了恶魔的影响，然而却被接受。”他们也委婉地暗示，法院可以回头想想：受害的女孩会不会自己就是恶魔的使者？为了拯救悲惨的亲戚，来自伊普斯维奇和雷丁的更多人也加入行列：他们的妻子可以回家了吗？“实在可悲，”一位林恩的男子这样描写他的妻子，“我家老伴都一把年纪了，年老体衰，不仅没人照顾，还要在一间发臭的监狱里长期受到囚禁。”她已被关押近五个月。

英克里斯·马瑟坐着隆隆作响的拖车，踏上调查之路。在塞勒姆的监狱里，他们试图让人发言，不仅深入了解法庭的审判方法，更是见识到人类的想象力。人人八个愤愤不平、倍感屈辱、披头散发、饥肠辘辘

的女人口中，他们听到了同一则故事。这些囚犯没有折磨任何人，没有签署契约，没有出席集会，没有屈服于恶魔洗礼。但是，她们被吓得魂不附体。她们哭诉，她们的供词“彻头彻尾是假的”。威廉·巴克三十六岁的嫂子格外悲痛。她的审问人一再断言，“她知道她们都是女巫，她必须承认这点，她也知道她们都接受了撒旦的洗礼和其他事，这她也必须承认”。最后，她终于投降了。她难以忍受这种耻辱，相似的还有十六岁的玛莎·泰勒，她受到她的哥哥和牧师的双重威胁。为了拯救她永恒的灵魂（她的哥哥提醒道，这也是为了救她的命），玛莎认下了每一项指控。囚犯因为牵连别人而痛苦哭泣。

但是——女人们在10月又面临着接二连三的新的问讯，不过审问者要友好一些——她们是如何捏造出那些生动细节的呢？布拉特尔也对细节感兴趣，不过他的疑惑和黑尔牧师不同，后者更好奇安·福斯特为何会飞。这个五十五岁的安多弗女人骑杆飞往恶魔洗礼仪式，很能说明问题；这就像是看《绿野仙踪》里的西国魔女变回了古尔奇小姐。她被迫选择恶魔洗礼的日期，此日子十二年前就已定下。那时，她刚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她缠绵病榻，且忧心忡忡，“所以觉得如果说个日子，那时可能是最适当的”。但是为什么要承认撒旦以猫的形象出现呢？法官让她相信自己是个女巫，还强迫她说出恶魔的形象。在她被捕前不久，她在自家前门外看到一只猫。这是第一件出现在她脑海中的事。^[15] 大多数妇女蒙住眼睛参加了巴纳德的触摸测试，可现在，这位年轻的牧师为此实验感到后悔。它让一个四十九岁的女人仍然疑神疑鬼。她向来访者保证，她从来没有和魔鬼交谈过，也没有折磨过任何人。至于她是不是女巫，她觉得是，又觉得不是。女孩们的嚎叫仍然在她耳边萦绕；她不能不考虑她们。此外，监狱中的三名年轻女子讲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她们坚持自己曾飞行，使受害者窒息，用荆棘扎小人。一名囚犯说，法庭到访之前，乔治·雅各布斯的仆人被玛格丽特·雅各布斯折磨，

以至于不停抽搐。塞缪尔·休厄尔当天善意地写信给一位英国表亲：“出于巫术案的情况，我们希望你们为我们祈祷。”

科顿·马瑟就是在这样动荡、混乱、无序的情况下，为大家带来了《无形世界的奇迹》。他很清楚自己陷入的是怎样的“泥淖”，在序言中，他夸奖了自己的勇气。然而，正确理解“我们之中发生的惊人异常之事”，是至关重要的。他自称这样做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愿为之。（数周前他曾承诺，他的工作绝不会干扰诺伊斯或黑尔，因而他直接将两人隔绝在外。）他概述了他的意图：他要“对抗魔鬼针对新英格兰的整个阴谋”。他希望他的记录传到全世界。之所以出版这本书，是为了防止“虚假信息”。他没有明言对法庭的任何辩护，但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做；这一目的清楚体现在字里行间，还有斯托顿的那篇溢美的序言里。

马瑟父子的两部作品各行其是。父亲处理抽象的事情，为无辜之人辩护，科顿·马瑟则陶醉于超自然的事务之中，谴责女巫。他热衷于攻击新英格兰，如同他在另一本书里描写古德温家的一个女孩的不幸遭遇。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灾难在所难免——预言坏事时他最来劲——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这场风暴早已被预知。四十多年前，一个被定罪的女巫已经预料到将有一个“通过巫术对抗国家的恐怖阴谋，其根本力量就是巫术，如果没被及时发现，可能会剧烈爆发，继而毁灭此地的所有教会”。^[16] 命运现在正降临在他们头上，正如预言一样！如会算命的多卡斯·霍尔所知，能否应验是衡量预言的试金石。她警告说，许多孩子都将难逃一死；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庭都记得她的话。1676年，英克里斯·马瑟把菲利普王战争的历史当作自己的预言应验的佐证，机智、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恐惧。让同一批人插手预言和历史事务，是很危险的。

马瑟承认，如果巫术波及的范围比预测的更大，他不会感到惊讶；听上去，他一点都不像是想灭火的样子。在书中，他为专家们加注解，提到他8月4日的布道，还说起一个三十岁英国女人的知名案件，它和塞勒姆的案子相似，除了可能多了一只烧着的蟾蜍。他选择这个案件的理由是：对被告的起诉依靠的是幽灵证据。直到书的后半部分，马瑟才开始讲述他被要求写的案件。他虚伪地为法庭辩护，和斯托顿在序言中所谓的惊喜如出一辙。他要么是得到了比想象中少的案子，要么就是发觉没那么多案子符合他的论述需求。有时候，他似乎在法庭报告上添油加醋，有些内容在幸存的文件中无法被找到：硫黄的气味，下钱雨，从无形幽灵身上撕下的一角布片，法官亲自从女孩身上取下的针。或者说，他就是坚持按手头的证据来，只是在写作时施了点魔法。《无形世界的奇迹》中没有纳斯的无罪释放，没有埃斯蒂的请愿，也没有证人为伊丽莎白·豪辩护的证词。书中囊括了所有迎合人们喜好的幽灵故事，还时不时提醒，女巫飞行和契约在定罪中只发挥辅助作用。

他强烈地希望，一些被告能被证明是无辜的。他们应该得到“我们最有同情心的怜悯，直到有更多证据表明他们并不值得”。这都是谎言。过了十六页，他写到了乔治·伯勒斯：“若我从不知此人名姓，将会是多大的幸事。”仅是他名字的首字母便令马瑟反感。（伯勒斯是一名法力非常强大的巫师，不能被提到名字。）他对故事发展至关重要，是情节的关键人物和策划者，正如马瑟在接下来的一句话中所承认的那样：政府特别要求将伯勒斯的案子写在书中——这句话倒可能是真的。不过，与其余部分相比，对伯勒斯态度的转变不算什么。马瑟之前谴责过触摸测试和邪眼，也不承认幽灵证据。他曾呼吁要特别谨慎。然而，在《无形世界的奇迹》中，他说手的触摸、眼神的影响、空中的飞行、消失的动作，都是魔鬼对基督亵渎性模仿的一部分。这个畜生在模仿教会圣礼时，心中是多么快乐啊！

在履行政府交给他的义务后，马瑟留下几个“独一无二的神奇之处”。他提及瑞典的记录，正是新英格兰的蓝本。马瑟没有写恶魔的红胡子和长长的吊袜带。在书中，撒旦也没有大摆宴席和跳舞。马瑟筛选出其中最难忘的段落，征求了一些印刷排字上的帮助。为了强调与塞勒姆不谋而合的细节，他将其加粗。“痛苦的孩子”“割手指”“魔法工具”“自愿认罪”和“企图谋杀法官但未能得逞”跳跃在字里行间。他还选用之后瑞典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当事人后来翻供，成为马瑟父子最爱的人物。书里还有托马斯·帕特南针对贾尔斯·科里使用巫术和谋杀的控诉书。^[17]马瑟声称，自己从未如此费力做任何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他答应斯托顿的巧妙构思几乎无处可寻；这本书编排混乱、制作粗糙，有时甚至写作极不连贯。当然，错误在所难免。当撒旦玩弄他们，在法庭进程中注入虚假和欺骗，他又如何能够更好地写这本书呢？看到新英格兰的治安官们如此明智，恶魔妒意焚身。他们对他们运行良好的新政府大发雷霆。幽灵证据可能不足以定罪，但也不可忽视。

虽然科顿·马瑟已经尽快动笔，《无形世界的奇迹》一书还是来得太迟，况且它的内容太多了。它被视作对法庭的解释，出版以防误信，但是读起来仍像在大声辩解。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期间——由于菲普斯决定解散法庭，或者想要大家知道他解散了法庭——风向突然转变。还有另一个问题：马瑟的父亲不喜欢审判，但马瑟本人似乎在催促着审判。科顿·马瑟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他立刻发觉自己处于麻烦之中，不仅因为他讨好法庭，更因其不尊重父亲，这在新英格兰尤为敏感。他没有为父亲的作品背书，也损害了自己的立场。在1692年所有随心所欲的指控中，没有一次是父亲指控儿子或儿子牵连父亲的。《奇迹》出版数日后，马瑟哭诉道：“我受了太多的折磨了，那些人说我有罪，朝我发火。我宁愿忘记，也不愿被牵扯其中。”“不友好、虐待和责备”的洪流向他呼啸而来。人们对他口蜜腹剑。他不过是想在一个关键

的时刻压制异议！当批评他的人正疯狂地相互抨击时，又怎么能说他反对他的父亲和新英格兰其他牧师呢？他唯有一死。（那时他二十九岁。）

按照他自己的解释，父子两人齐心协力，展现所有情况。科顿·马瑟担心《良心之案》会损害法庭，并“永远扼杀接下来的司法进程”。他不敢公开攻击法官，后者的工作会将他们自己暴露给“最粗鲁的暴民”。（他后来才加上“最粗鲁的”，以示强调。）父子俩共同主持第二教堂的讲坛。他们每天相见，并且密切合作。早些时候，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一起工作，为一场政变正名，一个敦促安抚殖民地的不安，另一个在英国寻求同情；现在他们也不会忘了昔年精心的编排。更可信的是，科顿·马瑟认为这两本书在逻辑上是对同一则模棱两可的声明的延续。而马瑟的文章“几位牧师的回归”甚至连灵活都称不上，只不过向法庭表达善意，同时向被告表达仁慈。英克里斯·马瑟的《良心之案》重在恳求“特别小心”；而科顿的《无形世界的奇迹》过度使用“然而”。^[18] 马瑟认为，他让起诉有罪者变得合理，他的父亲则保护无辜者。他们说的话，难道不是殊途同归吗？

马瑟认为，《无形世界的奇迹》能够出版，是得到了斯托顿的庇护。但事实证明，仅此尚不足矣。是他的父亲赶去救火；菲普斯政府在这个关头可不愿看到任何裂痕出现。在《无形世界的奇迹》出版前，甚至可能是几个小时前，英克里斯·马瑟给《良心之案》重新加了一段附言，表明两本书一脉相承。他可能听到斯托顿的意见。老马瑟始终坚信，女巫在这片土地上漫游；他在走访监狱期间听到的供词也充分证实这点。他不是要否认巫术，只是想让起诉更加准确。他也没有打算中伤一直表现杰出的法官们。他们应该得到“怜悯和祈祷，而不是谴责”。他非常感谢他的儿子，后者确定没有人仅因幽灵证据而被定罪。英克里斯

·马瑟也提到了伯勒斯，这是他唯一提及名字的巫师。伯勒斯牧师死得其所。马瑟向读者们保证，伯勒斯曾经做过那些“没有恶魔在身边”便不可能做的事情。

站在崇高的角度，英克里斯·马瑟指出，他听说有人认为这两本书差异颇大。人们想象的都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在出版之前，他已经仔细检查了《无形世界的奇迹》。他之所以没为它背书，只是厌恶裙带关系。对自己儿子这本失控的书，如果他是在抑制自己的厌恶，那他也掩盖得令人信服。在一件事情上，父子态度完全一致：无论巫术法庭的命运如何，社会秩序都不能因此遭殃。法官——以及政府，审判引起大量针对新特许状的批评——绝对不能被危及。英克里斯·马瑟没有评论司法程序。只是后来，在他的日记中，科顿·马瑟认为，他虽高度称赞法官，却不能同意他们审案的方式。总而言之，两相平衡非常困难。毕竟，首席法官是马萨诸塞最令人信服的法律权威，他忠于职守，确信天使站在他这边；年轻的马瑟在即将出版的作品中，不仅要消除疑虑，又凭借其热情和智慧“提高对地狱敌人的标准，恶魔的攻击像洪水一般铺天盖地”，斯托顿对此非常满意。这些引语，斯托顿大多都是借用马瑟书中的。

塞缪尔·帕里斯10月23日的布道让人们清楚感知了风向的转变。那个星期天，他的话温柔而感性，谈论的都是和解。为了巫术，他格外努力，献身于其中。我们不知他是在何种情况下写的讲稿：阿比盖尔有否在牧师住宅继续抽搐？贝蒂·帕里斯是否已从休厄尔家返回？帕里斯家两个健康的孩子是如何平安挨过危机，又是如何发挥着不易察觉的作用？小安·帕特南的遭遇又是如何？比起马瑟，帕里斯话锋的转变更为灵敏，超越了言语，直接热情接受。他以《所罗门之歌》为基础，提出

了一连串狂喜的吻：有好色的吻，圣洁的吻，奸诈的吻，告别的吻，征服的吻，认可的吻，还有和解的吻。吻代表爱和善意。在“一些冲突和分歧”后，朋友之间的亲吻是甜蜜的。这一意象并不少见；自然而然地，神圣的爱会变成沐浴恩典的全身体验。^[19] 但是，这篇光芒四溢的非凡讲话，是帕里斯的态度发生突然转变的最好佐证。在9月11日的布道上，他还在制造分裂。对于一个自己的家庭和教区陷入混乱、教堂座位空空荡荡、大量教民流失、还在与剩余流氓教民争辩不休的牧师，这篇讲话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只有在结论时，帕里斯才回归本性。上帝曾将基督送往人间，让他将爱传播，谁会否认这点？“他的吻是最甜蜜的，”帕里斯讲道，“如果你不被他亲吻，就必定被他诅咒。”人一旦被诅咒，甚至恶魔也会咆哮。

三天后，立法议会讨论了一项附有免责声明的法案。撒旦在马萨诸塞漫游，“怀着极大的愤怒和蛇的狡猾”。一个优秀的委员会已经尽力遏制了他。“尽管这些杰出人士不知疲倦地努力”，灾祸却变本加厉。殖民地依然处于“黑暗的阴云之下”。为了诉请神的指示，斋戒是否在所难免？菲普斯参事会的成员似乎急于会见一些牧师以确定行动的方向。他们非常需要智慧，因为恶魔愤怒的威胁“将要彻底破坏和毁灭这个可怜的地区”。对该法案的投票表决，将会直接挑战审判法庭。会议造成了巨大的争议，此问题将人们一分为二。经过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法案以三十三票对二十九票通过。有些人赞美过马瑟的作品，却真诚地投出了支持票。

休厄尔——对这个法案投了反对票——认为法庭成员应该立即意识到法庭已被解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的。议会只在暗地里处理了这个问题，而法庭计划在六天内重新召集。斯托顿给菲普斯施压，让他做出决定。但这很难。那个星期四，当科顿·马瑟鼓舞大家要坚持时，他

很有可能为斯托顿说了话。两人都认为，法庭若不恢复，就会破坏稳定，也意味着承认错误，纵容巫术。两人都相信，法庭的工作尚未完成。斯托顿定期前往波士顿，企图打探菲普斯的答案；虽然他自己是副总督、首席法官，也无济于事。这两个人私交不深，但在这个问题上，虚张声势的总督似乎完全被他的副手吓唬住了，后者可是非常老道的政客，会灵活运用身边的文人。10月28日，斯托顿冒着暴风雨出门，从多切斯特出发，穿过一条淹水的堤道，全身都湿透了。于是，他又一次去休厄尔家寻求庇护。他把衣服送回家更换。他应该意识到，这场洪水是某种征兆，但他没有：第二天，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菲普斯正式解散了听审和判决法庭。

人们的请愿继续累积。十名被指控的伊普斯维奇女巫恳求释放。她们不太可能在那个冬天被审判，但她们已经冻僵了。很快，她们就会“在风寒中死去”。其中有人已年近八十，有人怀着孕，还有一人正在抚育九周大的婴儿。在女儿饱受牢狱之苦的那年，有个切尔姆斯福德的父亲独力抚养两岁和五岁的孩子。他缺衣少粮。有个年轻的伊普斯维奇人突然宣布撤回5月针对伊丽莎白·普罗克特的证词。1月27日，伊丽莎白在塞勒姆监狱的地板上生下孩子。她给孩子起名为约翰，和死去的丈夫同名。她被判于8月份处以死刑，只因怀孕而缓期执行。她等待着行刑的那一天。丹恩牧师的女儿也被定罪，她直接向菲普斯申请赦免。她被严密监禁了四个月。指控她的人承认自己说谎；同时，她还怀孕了。（她相信，若非如此，她已经被绞死了。）她完全是无辜的，家里还有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丈夫和六个孩子。12月14日，阿比盖尔·霍布斯的父亲获得自由，因为他的两位托普斯菲尔德邻居为他交了两百镑的保释金。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清了能够预知未来的姑娘们。格洛斯特11月初还

去找她们。11月7日，另有三名女巫被捕，其中包括希金森的一个亲戚。旧的还没去，新的诉状又来了。1692年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科尔森——治安官曾在田地里徒劳无功地追逐她，连他们的狗都被迷惑了——终于在坎布里奇入狱。伊丽莎白·哈伯德仍在抽搐，直到11月还在指控女巫。1693年1月，玛丽·沃伦难以忍受被掐、被刺，以及在桌子下面的拖拉，她仍然在指证嫌疑人。

在12月特别黑暗和寒冷的一天，马萨诸塞参事会的成员们坐在一个新的法庭上，试图审讯剩下的巫术嫌疑犯。通过匿名投票，他们选斯托顿为首席法官。他的三名前审判法庭的同僚也加入其中，此外还有托马斯·丹福斯，后者曾在4月首次诱出关于女巫集会的供述。12月22日，菲普斯在新成立的高等法院宣誓就职。每个人都宣誓，正如休厄尔总结的那样，“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公正地主持正义”。按照新的特许状，12月的陪审团以社会地位而非教会成员为标准选定。因此，他们就不容易被法官的想法所左右。虽然他们对塞勒姆村务不是非常熟悉，但他们都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有人被指控，有人则与女巫有关联。一旦成为陪审员，他们就请教法官席：幽灵证据到底有什么用？答案是，没用。1月，法庭审判了五十二起案件，除了三名嫌疑人有罪外，其余全部被判无罪。丹恩牧师二十二岁的孙女被判有罪，他的女儿则无罪。陪审团发现算命者塞缪尔·沃德韦尔的遗孀有罪，但他的女儿是无辜的。（两人都指控已故的塞缪尔。）法院驳回玛格丽特·雅各布斯的请愿，但请愿书得以保存。只有她把原告称为“被恶魔附身之人”。

斯托顿继续坚持幽灵证据的有效性。他认为自己在打一场圣战，全力以赴，以求胜利。他匆忙地签署三份死刑执行令，在1692年被定罪的嫌疑犯的基础上加了五人，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多卡斯·霍尔，小玛丽·莱西都在其中。他安排于2月1日举行一场绞刑，并命令挖好坟墓。他似

乎有意证明，英国的法律确实适用于北美洲，并会紧追罪恶，直到世界尽头。与此同时，菲普斯与检察总长切克利商谈，后者担心不能再将无辜者与罪犯区别开来。菲普斯撤销了行刑，对八名定罪女巫予以缓刑。我们还不清楚斯托顿如何得知这件事；他并非直接从菲普斯那里听说此事。他怒气冲冲地宣称：“我们本来有办法清理掉这片土地上的巫师！”他不知道是谁阻挠了正义，但他警告说，巫师们将殖民地献给了魔鬼。他从法官席上冲下来，啐道：“愿上帝怜悯此地。”这是他有关巫术的发言的最后记录。2月2日，他没有现身，丹福斯取而代之。接下来几天出现的嫌犯中，有一名八十岁的寡妇，她是腿脚飞快的雷丁姑娘的外祖母。她在辩护中几乎没说一句话。三十名证人作证指控她。正如她预见的那样，一旦有人从她面前走过，就会有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女巫，”罗森在审判时说，“她算一个。”但是，她被无罪释放了。

到了1693年2月21日，菲普斯准备宣布灾祸结束。早些时候给伦敦写信时，他提到一些公职人员越权，现在他直指姓名。不止一个人说，1692年的审判“过于暴力，且未基于正确的基础”。说这话的是几个星期前跺着脚离开法庭的法官，当时他“被激怒了，称得上是怒火焚身”。斯托顿实在太鲁莽，过于急躁，甚至可能涉嫌腐败。他授权手下非法收缴遗产，并在没有菲普斯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处置这些财产。菲普斯对他的方式提出过质疑；尽管遭到多次警告和强烈的抗议，斯托顿仍一意孤行。虽然菲普斯早前会听从这位副总督的睿智建议，现在他似乎不胜其扰，堪比巫术。菲普斯的口吻就像在向父母告密，声称那位天赋异禀、受到偏爱的老哥都有哪些错误言行。菲普斯报告说，他暂停了审判，直到有更懂法律的人加入进来，并称英克里斯·马瑟和纽约牧师也支持他的决定。（在其间的几周里，斯托顿拒绝参加参事会的会议。他称自己跌倒了。）菲普斯的强硬插手，让马瑟父子后来完全有理由将他宣扬为

救世主。他向英王的国务大臣保证，“那片危及马萨诸塞、很可能将其毁灭的乌云，已经过去。”鉴于其危及生命、财产、声誉和官方事务，这件事，菲普斯怒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烦恼”！现在一切都好了。国王的事务可以继续畅行无阻。“人们的思想一度分裂，被不同的声音所扰，现在终于安定了下来。”他高兴地说。

菲普斯和参事会已经决定将2月23日星期四作为整个殖民地的感恩日，庆祝诸多快乐的事宜，包括“通过阻止巫术袭击来限制敌人”。政府重新把焦点投向“我们所有不幸的来源”——法国人。他们开始补偿埃塞克斯县高昂的审讯开销；他们增加税收，以支付酒店老板、警员、监狱看守和铁匠的账单。这是充满虚假证人、虚假供词、虚假朋友、虚假矛盾和出版以防误信的虚假书籍的一年。监狱空了。指控停止了。大多数人的痛苦都减轻了。早在1693年4月3日，菲普斯提到他叫停的1692年的事件时，就将其称为“一场假想的巫术”。那个月，一封赞扬其为人仁慈的信件，从伦敦一路传到新英格兰这个遥远的生物育养箱。信件于7月抵达。那时，菲普斯比过去更加坚信，他理应得到夸奖——正是他停止了司法程序，单枪匹马地将新英格兰从被毁灭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顾虑供词。10月决定法庭未来的表决票数如此接近，是有原因的。科顿·马瑟仍然担心，在消灭巫师这件事上，他们还未尽其事。1693年9月他到访塞勒姆时，听到一名女教徒预测一场新的巫术风暴，他并不惊讶，因为这是对法庭没有做完工作就解散的惩罚。见多识广、脾气温和的人屈服于同样的恐惧。约翰·黑尔声称，如果当时环境更加稳定，应开始第二次审讯。“但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引起的困惑和混乱，与其多做，不如少做。”他总结道。他们不想再多说了。他们可以以后再纠正错误。“所以，事情结束得很突然。”黑尔说，但他知道，这件事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他在阿比盖尔和贝蒂初次

发作时，和帕里斯一起密切在旁关注，希望得出诊断。他听了提图芭在监狱里坚定无疑的供述。他作证指控多卡斯·霍尔和布里奇特·毕肖普；他哄骗出她飞行的细节以及和安·福斯特的坠落事故。黑尔还记得，“我问她做了什么食物”，然后福斯特提及了面包和奶酪，还描述了清爽可口的溪水。

同样，福斯特也对黑尔坦白了她对乔治·伯勒斯和玛莎·卡里尔的惧怕，那时他们还没有成为地狱的国王和王后。她相信，就像他们的幽灵威胁的那样，他们会杀死她。可她比他们活得更久一点。福斯特是最后一批死者之一，于1692年12月9日死于狱中。她的儿子花了六镑十先令——一头好牛的价钱——收回了她的遗体。提图芭是第一个签署恶魔契约的，却是最后被释放的。她为过去一年的局势打下基础，将飞行和熟人引入诉讼进程中，她那爆炸般的供词启发了新英格兰人，但自此之后，她既未受到问讯，也未再被频繁指控。她于5月9日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因其与恶魔签订了契约。但是，大陪审团拒绝指控她。

[1] 对于马瑟这样一个写作如呼吸般自然的人而言，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为马瑟写传记的人应该感恩，而为马瑟编著书志的人应该会瘫痪。因为马瑟一生写了四百三十七本书，仅1692至1696年就写了二十六本，他宣称自己“几乎一生都在与天堂持续对话”。

[2] 一名囚犯眼看审判临近，便向菲普斯夫人求援。菲普斯夫人亲自签署了释放令，监狱惟命是从。报复迅疾而来；菲普斯夫人立即就被指控。

[3] 卢尔德（Lourdes）位于法国南部，传说当地的河水可以治愈百病，每年的宗教节日期间都有大量人到当地朝圣、饮用圣水、寻求奇

迹。

[4] 马瑟的论断是：如果魔鬼能够伪装成无辜之人施展巫术，那么他也可能借助人形进行盗窃和谋杀。如果是这样，马瑟推理道，“这世上就没有活人，全是魔鬼”。

[5] 玛莎·科里在3月就几乎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她说姑娘们是被魔鬼“分了心”，大大惹怒了哈桑和诺伊斯。

[6] 在16世纪时，蒙田就用简洁的语句说：“因为揣测就将人活活烧死，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7] 两处《圣经》引文分别为：“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将他治死”。

[8] 1674年9月，伊丽莎白·纳普嫁给了一个年轻男人，后者为隔壁邻居工作。我们不知道她对1692年的事件作何感想，毕竟那时她已经是八个孩子的母亲。

[9] 他们在牧师住宅嘲讽威拉德道：“现在我们烧掉了你们的镇会堂，你们要在哪里祷告呢？”

[10] 《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礼文书，用于规范教堂的礼仪和程序。

[11] 威拉德似乎对伊丽莎白·纳普用过触摸测试。无论如何，他声称纳普可以分辨出女巫邻居的手。新英格兰从《显赫的天意》中了解到纳普的情况，书中英克里斯·马瑟也用了“触摸”一词。而当科顿·马瑟在《玛格诺拉》中提到纳普的故事时，她并没有和折磨她的女人有

物理接触，而只是紧闭双眼，就感觉到那个女人靠近。

[12] 虽然他驳斥女巫引诱少女，但也不认为恶魔就会扮成牧师。支持法庭的人往往会对伯勒斯避而不谈；批判法庭的人却不会。伯勒斯有污点，但还在有好的一面。在印第安人对约克郡的袭击中——休厄尔有个在缅因当牧师的堂兄弟惨遭屠杀，成了殉道者——伯勒斯艰难克服，最终得以幸存。

[13] 此人叫约翰·米勒，他很乐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对新英格兰的做法非常不满。他后来说，人们需要他的建议，他便慷慨予之，即便人们不够礼貌，不向他表示感谢。

[14] 他认为自己有三重使命：一，启蒙公众，唤起他们对代表神圣天意的案例的记忆；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公共事务；三，治愈“在我们中随处可见的，说谎的魂灵”。那些反对的材料中包括一份报告，里面说安德罗斯武装了印第安人。直到十四年后，第一份报纸才在马萨诸塞州出版。

[15] 为什么猫被如此滥用？猫与恶魔的联系早在古时便有，不过猫与女性媚惑的联系出现得更早，首先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特别是黑猫，与恶魔联系紧密；它们是“人类的大敌”，自然成了女巫的完美拍档。黑狗也常常出现在塞勒姆的文献中，尽管历史上英国女巫更喜欢变成猫而不是狗。虽有争议，但猫向来是更加娴熟（也更加女性化）的魔法师的学徒；它们善变，不恭，难以预测，谄媚，上一秒还愉快且娇柔地行走，下一秒便挥起爪子。夜间，它们出来活动，一会儿咕噜叫，一会儿捕食，偷偷溜进锁紧的门内，跳到箱子上。如果它们与邪恶势力分离，才令人感到意外。

[16] 所有被处决的女巫都不完全符合他的描述，而预言也没有留存。也许玛格丽特·琼斯曾有预言；当时，有传言称一名治病术士能施展恶魔的触摸，并有预言的天赋，琼斯正是适时出现的嫌疑人。科顿·马瑟总是对他出生前的事发表意见，就像老安·帕特南的事。

[17] 那年年末，《无形世界的奇迹》在伦敦付梓。即便在1692年，几个字就能令书卖得更好；在书名页上，精明的英国出版商放大了“审判”“新英格兰”和“几个女巫”。接着，对外宣传时，他说书名是《最近新英格兰被处决女巫的审判》，将马瑟原书名和大部分神学理论弃之不用。2月，第二版发行，“马瑟的女巫书”——没有了布道和支持性理论——缩减得只剩耸人听闻的细节。出版商叫卖称这本书是那些好奇的、轻信的殖民地人民的怪人怪事。

[18] 如果马瑟父子的作品的确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笨拙例子，两人写作的内容就颠倒了。科顿并非天生的政客，他的任务却是调停公共秩序。他对斯托顿的辩护充满幻想，做得太过火了。他的父亲也会全力支持斯托顿，但不会这么激情澎湃。

[19] 他不是第一个提到吻的人。伟大的英国牧师理查德·西贝斯（Richard Sibbes）几十年前就这么做了，还是在一场帕里斯可能听说过的布道里。西贝斯以甜蜜的圣餐作为结尾。帕里斯的结语则是耶稣的亲吻和诅咒间的选择。

第十一章 那个黑暗而神秘的季节

真正可怕的是，每个人都有他不得不为的理由。

——让·雷诺阿

斯托顿的工作突然被中止，回归正常状态还需要一点时间。在经济和情感上，清醒都需要付出代价。司法程序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牺牲了果园和酒窖、栅栏和木柴堆。二十五年前，塞勒姆的农民已经发出警告，丈夫离家抗击入侵者之日，就是家庭蒙受痛苦之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妻子们离开去搜查女巫印记时。一些家庭付出了极大代价接纳亲戚，才换取了幸运的眷顾，而这些亲戚在某些情况下也被他们谴责过。日益加深的邻里怨恨蒸发殆尽，被更严重的事情所取代，如普通的感冒被瘟疫所消灭。巫术吞没了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惩罚，而不是罪行本身。幽灵证据已经绝灭。但是，人们相信巫术依然存在。

有些时候，事情着实令人尴尬。离你几英尺远、受你指控的那个女人，穿过小溪回到她的农场，你该如何是好？又或者，被判缓刑的女巫突然就出现在你旁边的教堂座位上。还有，如何重新接受一个发誓她已故的母亲将她变成女巫的六岁女孩？老玛丽·莱西重返厨房与纺车，身边还有她十八岁的女儿，后者曾公开质问：“哦！妈妈，你为什么要把我送给魔鬼？”有一帮埃塞克斯县的居民针对虚假证人的戒律争执不休。人们之间——父母、子女、邻居、配偶、姻亲，甚至是道德完人——的信任尽数遭到背叛。是不是还能听从曾经打断被告的诺伊斯牧师的话？或是在安多弗组织了惊人的触摸测试的巴纳德牧师？或是以同样的方式再次作证指控教民的黑尔牧师？弗朗西斯·丹恩牧师又要如何面

对告发他几乎所有家人的会众？安多弗有近百分之十的人都受到指控。避开他人的目光，如同对他人绷着劲一样，势必被人所习惯。当一个女孩的母亲因巫术被绞死，她也被审判所牵连时，她对自己的婚姻还能有怎样的预期呢？

财富损失的同时，信仰也丧失了。约翰·奥尔登刚回到波士顿，未能在12月18日的圣餐上现身。他不在的时候，虽然他的朋友有可能为他祷告，但他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出卖了他。威拉德牧师的妻子一针见血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休厄尔，她觉得后者应该为此负责。几个月后，休厄尔拜访了奥尔登一家。他对他们的烦恼深表遗憾。他很高兴船长能够恢复名誉。他的表态十分难得；至少最初，大家还没开始解释便互相指责，道歉寥寥可数。纳斯和塔贝尔家族继续抵制塞勒姆村的宗教仪式；曾关门打断布道的莎拉·克洛伊斯幸存下来，她的两个姐姐却被绞死了。她和丈夫在波士顿重新安顿下来。菲利普·英格利希在近九个月的指控后，回到被洗劫一空的房子，那里被抢得连一根针都不剩。很快他就开始从塞勒姆划船到马布尔黑德参加英国国教的礼拜。不论宗教信仰，他也很难再次与斯蒂芬·休厄尔一起祷告。英格利希从1693年4月开始申请赔偿。二十五年后，他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奥尔登缺席第三教堂圣餐会后的那个周日，德奥达特·罗森在查尔斯敦布道。他谈到家庭纪律，提醒家长们对孩子、仆人、奴隶负有的义务。罗森警告说，不要分心，也不要机械地履责。父母既不应太正式，也不应太啰唆。在家里，牧师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不负责任；他们也可以变成“在外当圣人，在家当恶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将他的悲痛集中于“十二、十四、十六岁”的孩子，这是一个被忽视和放纵的群体。那些年轻人不正是新英格兰苦难的根源吗？难怪撒旦设法吓唬他们“屈服，并与他签订契约”。他们的父母已经抛弃他们；随之而来的是混

乱、叛逆、不服从，以及魔鬼契约。罗森在169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有英克里斯·马瑟的背书和休厄尔的题词加持。这些文字令塞缪尔·帕里斯深感不安。罗森似已偏离他早些时候的说法，即虔诚的家庭往往脆弱。

人们理应在塞勒姆村的牧师住宅寻找灵魂；五名原告和四名受害者住在那儿，比其他任何地点都多。帕里斯十分清楚，他的家庭给社区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村民们走过他家饱受争议、遭人议论纷纷的草坪时，会怎么想？）罗森布道后几周，帕里斯自愿放弃了他1692年薪水中的六镑，“为了让邻里高兴，也为了修筑和睦”。来年，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还禁不住补充说，尽管这件事也让他付出高额代价，但他还是做出了牺牲。）他没有采取行动来帮助提图芭，因为这会令他尴尬，还要花他的钱。当法院解散时，随着监狱清空，家庭团聚，她仍然身陷囹圄。有人在1693年底帮她付监狱费用，这等于买下了她。她自此离开马萨诸塞。

对有些人来说，恢复正常已不可能。巫术的污点将一直持续；女巫将永远身背“难以言明的怪异”。^[1] 约翰·普罗克特被处死前就曾警告说，嫌疑犯在审讯前就被定罪。即便陪审团宣告其无罪，罪责依然洗不掉。他的遗孀的情况比大多数人更糟糕：在遗嘱里，他没有给伊丽莎白留下任何东西，故而她只能徒劳地与亲戚抗争，“因为他们说，”她告诉法庭，“我在法律上已经死了。”他们完全有理由甩掉这个喜怒无常、带有污点的继母。（她搬到林恩，在那里再婚。）丹恩牧师的女儿——也因怀孕而缓刑——回到丈夫和六个孩子身边。她“只能作为一个罪犯”活着。因被指控“犯下了人类可以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她的生活崩塌了，还要担心自己的家庭在新的指控面前全无还手之力。她所谓的“永远狼藉的声名”也不是唯一的负担。玛莎·卡里尔两个高大结实的儿子虽

经折磨，但活了下来。他们承认飞去参加女巫集会，并协助法官给他们的母亲定罪。现在他们成了孤儿，还发现自己与地狱王后永远脱不了干系。

虽然绞刑缓解了苦难，但是审判又造就了更多。莎拉·克洛伊斯离开监狱时身体衰落，因为这五个月她的手脚都戴着镣铐。玛丽·英格利希从流亡中返回时，已经病入膏肓，于1694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至少有四名嫌疑人死在监狱里。小桃乐茜·古德在被释放前，已经戴了八个半月的小号手铐。她看见尚在襁褓的妹妹死去。她作证指控母亲，并目睹母亲不服地走向绞架。桃乐茜陷入疯癫，余生都在别人的看护下度过。玛丽·埃斯蒂和苏珊娜·马丁都留下了七个孩子。孤儿数目众多。

巫术指控要求人们拥有很强的记忆力和责任感；但在1693年，没有人关心这些，许多从来过目不忘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失忆了。只要有人问起缘故，他们就会抢话，问对方是什么带来了“该死的恶魔和巫师”。他们的子孙呼吁虔诚，而非道歉；安多弗和塞勒姆可不能变得像瑞典那样臭名昭著。不过，新英格兰倒不在乎被人铭记为“新女巫兰”（New Witch-land）！过了一些时间，人们才意识到有二十个人被无辜处死。更久之后，终于有人提出，人不可能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内飞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再飞回来（是约翰·黑尔1697年指出的。原因是你不能呼吸；不过黑尔至死也不认为有人无辜受刑。）

布拉特尔坚称，是人都会犯错，而我们有义务指出。这话也好像蒸发了一般。羞耻感抹去了责斥；承认错误难能可贵，但没人这样认为。人们都不敢表明身份；最终，唯一敢于发声的是不守规矩的总督菲普斯。他责备斯托顿，自以为在引领革命、实则精于算计的首席法官。斯托顿觉得无须捍卫自己的决定，也没有人为他这么做。招供者推翻供词，声称自己伪造供词是为了活命。几个原告和目击证人被评为“言谈

不检点、恶毒的人”。有几个人承认说谎，还有人坚称自己不记得作证的内容。仿佛所有人只是突然从同一个超自然的梦中醒来，用力摆脱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

马瑟父子则继续致力于预言第二次耶稣降临，为其计算日期。1693年年中，科顿·马瑟保证这一天将在未来几年内到来。在同一次布道中，他严厉斥责了塞勒姆的“疯狂的着魔和附身”。这两个词从此便常一起出现。女巫又变成“邪恶天使”。偶尔才有人认为这是骗局，称她们为“病态的生物”，或“邪恶和居心不良的人，假装自己被施咒、附身或变得疯狂”。粗鲁行为重新变回粗鲁行为；妻子又可以把丈夫从酒馆里拽出来，而不会被指控为使用巫术。你可以干下流勾当，这只是一般的恶行，或发疯的举动。女人惊扰沉睡中的男人，然后变身成猫——就像他们已经这样干了几十年，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所做的那样——但是她们不再为了这些罪行而被起诉。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巫术审判之后的几年里，女性不再那么容易被起诉，不管起诉理由是什么。村民还是会看到中了魔法的壁炉、会走的树木和错放的碟子，他们仍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对这些怪事更加谨慎，一言不发，这也成了新英格兰的另一特性。巫术危机偃旗息鼓后——它曾一度陷入狂热——1692年留下的是异常的静默。埃塞克斯县人努力忘怀的事，大部分是我们想知道的事。

一些错误立即得到更正。1693年6月，大陪审团首席陪审员约翰·鲁克成为乔治·伯勒斯留下的孤儿的监护人。他为孩子们安排了洗礼。同一个月，言辞辛辣的驼背巫师乔治·雅各布斯的遗孀，嫁给了托普斯菲尔德给干草念咒的女巫莎拉·怀尔兹的鳏夫。他们的配偶在5月中旬一同被送进监狱。约翰·威拉德的遗孀，曾被家暴后畏缩在楼梯下，于1694年嫁给汤恩家的一人。^[2] 大多事情保持不变。玛丽·图塞克被释放后无家可归，因为印第安人已经毁灭了比尔里卡。两年后，他们再度回来，

不仅杀了她，还将她十二岁的女儿带走囚禁。1693年的秋天也意味着缅因的大屠杀再次开始。马萨诸塞的女孩继续扰乱布道和抽搐；到了那年秋天，科顿·马瑟着手处理一个新的附身案件，这是他所谓后塞勒姆时代的两个案子之一。

曾在猎巫中发挥了作用的扫帚，后来又被人们所用，将1692年扫进了地毯下。四年前，权贵们驱逐了王室派来的总督，并热切地为自己辩护；在1693年，他们却觉得无须解释。5月31日，巫术法庭的所有成员被重新选入马萨诸塞参事会——斯托顿的票数远远甩开其他人，休厄尔的票数超过索顿斯托尔，后者曾迈步离开法庭。（二十年后，哈桑、休厄尔和科温仍然坐在同一法官席上。）菲普斯一向大大咧咧，疏远了马萨诸塞所有选区的选民。到1693年，许多人已经同意纽约总督对他的描述，“屁股指挥大脑的机器，总是蔑视聪明人却推崇傻瓜”，这样，副总督斯托顿很快就能取代他的位置，毕竟斯托顿依然很受欢迎。切克利曾指控女巫，后来还提议菲普斯反对司法进程，却又当了至少十年的检察总长。

新英格兰人是狂热的记录爱好者，不喜欢事情被冷落在“遗忘的坟墓”中。但1692年是个例外，伯勒斯担任牧师那些年也是。当托马斯·帕特南重新抄写塞勒姆村的村务记录时，省略了那些“令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之伤心，或者对未来毫无益处的条目”。于是，记录从1692年1月27日跳至12月7日，略去所有逮捕和审判。^[3] 人们急于忘记，就像过去九个月硬要记起往事那样。帕里斯留下一份村民的详细死亡记录。其中包括两个他归咎于巫术的，以及一个他人归咎于巫术的，但是没有提及贾尔斯·科里，或是任何被绞死的村民。一个家庭将一名原告从族谱上抹去。其他人用自己名字的其他拼法来伪装，鉴于当时名字有很多变体，这样做并不难。也没有人准确地指出绞刑发生的地方。

（似乎是今天的普罗克特街、波普街和波士顿街围成的三角地带。）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贾尔斯·科里的鬼魂始终游荡在那片他被压死的田地上。又过了一百五十年，那里建起一座关于1692年事件的纪念碑。

实际上，休厄尔避开了他日记中记录的事件，五年后他才对此做出解释。这位米尔顿牧师在1692年的日记都遗失了，而他可是一个连每次闪电和理发都不会漏掉的人。甚至连审讯的批评者，以及那些最清楚地掌握殖民地生活细节的人——托马斯·丹福斯二者皆是——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威拉德在夏天所作的布道，在他出版的文集和一位勤快礼拜者的笔记中都找不着。斯蒂尔·温思罗普在1692和1693年的信件从家族信件中消失。马瑟将对审判的记录缩减为几页，他称之为回顾性的注解。他对1692年的记录都是经过重写的。（他的作品针对的是子孙后代，所以提到自己时他用的是第三人称，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旁观者清的态度。）想要寻找一个真正的鬼故事的人可能会问：法庭的官方记录去哪了？而斯蒂芬·休厄尔对其尤为留心，肯定一直带在身边。沉默，才是1692年真正的阴谋。^[4]

即便是那些相信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的人，也一直三缄其口。科里的孩子们在请求补偿时，提到父亲曾被压在石头下面。他们也说起母亲，仅是她“也已被处死，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女巫”这个词消失在经过净化的赔偿诉求中。受害家庭将这些人称为“1692年受难者”，他们的所爱之人遭受“塞勒姆最近的一场灾难”，即在“那个黑暗又神秘的时节”中“黑暗力量”所引起的事件。

如同牧师家的篱笆，塞勒姆村的邻里关系似乎无法修复。2月7日下午，帕里斯邀请了五位教民，会见心怀不满的纳斯家族代表，此时，菲

普斯还没来得及将他如何妥善处理巫术危机的过程写信报告给伦敦。帕里斯需要安抚他们，让他们回归常态；他们拒绝参加圣礼，这使整个教会在精神上受到影响。祷告后，他询问纳斯家人有何委屈。后者并不配合。帕里斯提议他们两周后回到教堂参加集会。他非常清楚他们的立场；那天早上，纳斯家的三个人很早就来访，他在书房里就能听到他们的闹声。（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先煞费苦心地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在诉请女孩们指出女巫这件事上，帕里斯沉迷于无耻的迷信，如烘焙女巫蛋糕的人一般。他怎么能在法庭上发誓，有人曾被一次触摸唤醒，或被一个眼神打倒？要不是他——纳斯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分别发作了一个小时——丽贝卡·纳斯就不会死。在他们心中，帕里斯是“万恶的迫害者”。除非他道歉，否则这些人拒绝从他手中接过圣餐。

大部分的巫术文学都站在他这一边，帕里斯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仍然固执己见。“不高兴的兄弟们”，这是他第二天回到教堂时对他们的戏谑。莎拉·克洛伊斯的丈夫最先来到牧师的书房，有位虔诚的教会成员作陪。帕里斯坚持加入一位公正不阿的见证人。双方都认为，他们是依据《马太福音》第十八条的规定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条要求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于是，分歧就转化为对《圣经》中三段经文的正确诠释。1693年3月下旬，这些人出示了一份未注明日期、未签署姓名的请愿书，要求成立教会理事会，查明“过失原因”，这两个词那年在埃塞克斯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被煞费苦心分开的。帕里斯不快地发现，这些人曾与邻近的神职人员商量过，他便问究竟是谁认可了他们的文件。纳斯家族的代表只说他们是为在该地区的许多人发声。帕里斯把请愿书塞进口袋。“我告诉他们，我会考虑的。”他写道。那一天，正是将莎拉·克洛伊斯从镇会堂被赶走一年的日子，那场布道充满煽动性，直指会众其中一人便是恶魔。同一天，在波士顿，科顿·马瑟和他的妻子失去了一个新生儿，马瑟将其归因于巫术。^[5]

4月，一众代表来访——其中包括丧偶的弗朗西斯·纳斯，帕里斯告诉对方自己不能与他们谈话。他马上要去参加一个私人祷告会。在帕特南家几个成员和他自己的执事们的要求下，他只好在下周与他的批评者们见面。帕里斯从口袋里掏出那份请愿书，大声朗读出来。他们怎么叫这份文件来着？他自己把它称为诽谤。纳斯一家提供了第二份文件，上面有四十二个签名。帕里斯大声宣称这是欺诈。所有签名都是同一个人写的！有没有人依自己的自由意志签署了这份文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指控令人震惊。另外，他到底是要回答心怀不满的村民，还是心怀不满的教会成员？因为，这恰好完全是教会的内部事务。两方持续辩论，直到夜幕降临。双方势均力敌。在所有家庭中，纳斯家庭最为激动，坚称请愿书有效，后来却戏剧性地离开。此外，塞缪尔·帕里斯对正义或准确的态度如此坚决，无人能及。他曾花九个月的时间，完全投身于细致的证词中——现在他发觉自己竟因断章取义而遭到控诉。（记录审讯时，他比包括托马斯·帕特南在内的许多人都认真得多。）

一个月后，一场大型会议在牧师住宅召开。要是帕里斯家的孩子依然抽搐，那也是有原因的：好斗、严肃的男人在他们家中进进出出，进行一系列无休止的激辩。然而，孩子们已经熟悉这个很少接受道歉、更从来不道歉、以《圣经》经文定罪，并在法庭技术上十分挑剔和跳跃的政权，门口走廊上沉重的脚步声也不令她们意外。那个星期四，帕里斯在祷告之后向异议者开了口：他们要说什么？他们要求公开表达不满。帕里斯设法阻止他们。随后，大量怒火冲天、不符教义的辱骂迎面而来，而帕里斯在10月时耐心解释的亲吻论却没有任何成效。异议者向菲普斯和马萨诸塞当局发出呼吁。但同样如石沉大海。1694年秋天，他们转向波士顿的神职人员。威拉德指示诺伊斯、黑尔和希金森，让他们劝说帕里斯在牧师理事会召开前解决这个恼人的问题。“巫术”一词在这些通信中无迹可寻。

那个秋天，科顿·马瑟在塞勒姆镇，且肯定重申了这个消息：帕里斯正在引发一起丑闻。（正是在那次造访期间，幽灵偷走了马瑟的记录。他回到家里，发现他年轻的邻居玛格丽特·鲁尔受到八个邪灵的折磨——并且自发问起他丢失的笔记。十七岁的姑娘听到幽灵吹嘘他们偷走了笔记。）帕里斯对好心的同事们解释了村里的仇怨。他没有蓄意阻挠。反之，他一直在维持秩序。异议者令他屡次遭受折磨。他试图用布道安抚他们回来；教堂的门，帕里斯坚称，将一直为他们敞开。（“你们是我的羊，所以我希望你们听到我的声音”，这对纳斯一家而言算不上邀请，更不用说是橄榄枝了。）他觉得他已经试过了所有“善良和感动人心的讨好”。而背叛者仍然不肯回归领取主的圣餐。他遇到的麻烦，帕里斯坚称，是前所未有的。僵局持续。纳斯家的人拒绝讲述令他们怨愤的细节，除非帕里斯任命一个理事会。帕里斯不会这么做，除非他先听完他们的怨愤。

直到1693年11月13日下午，大家仍然无法就如何继续下去达成一致，帕里斯便对批评他的人大声宣读他的怨言。怨言共有十七条。纳斯家族违反契约。他们树立了坏榜样。他们无法无天、处处发难、不留情面。他们在内责备社区，在外还要败坏其名声。他们诽谤牧师，上门骚扰他，向总督、法院和波士顿牧师散布谣言，说帕里斯“心怀不满”。他们声称，“最近可怕的巫术危机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好好地坐在教堂长椅上，而帕里斯有逾一年时间都不进行祷告。这场会议耗费了一个下午。两周后，帕里斯通知纳斯一家，教会拒绝了他们设立理事会的要求。他们应该考虑《圣经》所说的关于和平的话。他向他们推荐了一些经文。就这样，一整年过去了。

菲普斯1693年2月所写的关于审判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玛丽女王签署了一份模糊的答复，赞扬总督对危机的上心，并建议他继续用“最

大的克制和应有的慎重”应对将来可能的巫术或附身。数周后，七位牧师再次劝导帕里斯解决争端。1694年7月5日，他祷告、斋戒，与他坚定的拥趸一同思虑这个问题。同时，他拒绝了牧师的建议。几周后，牧师们以为是他们说得不够清楚。他们计划简单的仲裁策略。帕里斯要在冬天之前解决问题。英国圣公会和浸礼会势力开始在波士顿发展壮大。距玛丽·埃斯蒂爬上绞刑架，已过去了两年。

在这几个月的记录中，帕里斯的字迹愈发难辨。他心里的弦绷得太紧，解决问题的压力也过于沉重。1694年11月18日下午，他回到镇会堂，朗读了几位同僚审议过的一则声明，第一次公开宣布他们在1692年犯了错。他将这则声明称为《为和平而沉思》（*Meditations for Peace*）。（不同于他的十七条怨言，声明一共只有九条。）帕里斯认为，巫术在他家里爆发，是“非常痛苦的责难和令他羞辱的天意”。他的家中既有原告，也有被告；他承认，“上帝非常正确地吐了我一脸口水”。他谴责别人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迷信做法。他承认在“处理这些神秘之事”时曾犯错，也承认自己对幽灵证据的看法是错误的；恶魔“既可以借用无辜之人，也可以利用虔诚之人”施加折磨。女孩们看到丽贝卡·纳斯正在折磨她们，她们所言准确无误。但丽贝卡·纳斯否认自己的责任时，也没说错。这时房内必有一阵骚动；纳斯不但死了，还被逐出了教会。他不应该依赖姑娘们的推理意见。他对在神坛上所说的任何不妥言辞，以及在作证时犯下的任何错误深感后悔，不过这些他也并非自愿。他对所有受苦的人表示同情。他谦卑地恳求上帝的赦免，为“犯下的所有错误，以及涉入不堪负荷之事”。他也恳求他的教民的原谅。他们可否放下“一切的痛苦、激怒、气愤和恶行”，满怀爱意地向前看？

帕里斯表达了他的愿望，即会众“衷心、真诚、彻底地”原谅彼此，这和道歉不同。他还补充了一条杀伤力极大的免责声明：他乞求宽恕

的，是他的教民认为他所犯下的罪行，而不是他认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在提议和平的层面上，帕里斯的声明是至关重要的。纳斯的女婿明显深受触动，表示如果牧师早一点承认，哪怕只承认一半，便可避免大量的不快。11月26日，他们召开公开会议。异议者坐在一起，有少量外人加入。这些人被要求说明退出教会的理由，于是他们出示了请愿书，再次拒绝给牧师看。直到他们站在合适的权威面前，才打算对帕里斯提出指控。帕里斯获胜。

1694年11月26日，巫术法庭解散后两年多，帕里斯在讲坛上宣读了一篇对其牧师工作的严厉自责，弗朗西斯·纳斯把讲稿原件放在腿上，以防牧师遗漏字眼。正是帕里斯推动了一种相互指责的氛围。女孩们让祷告变得不可能；而受害者的家属更希望参加能够真正听到布道的集会。由于肆意的指控，人们都担心自己的性命。他们拒绝从一个与主流立场相悖的人手中接过圣餐，这人毫无同情心，对待“被施咒或被附身的人”时，用的都是毫无根据的办法。（他们让帕里斯看起来像一个疯子，与其他神职人员不一样。但他们没有指责他制造了这场危机。）他作证指控被告。他的法庭记录有误，他的立场不坚定，他的自我辩护令人反感。读完后，帕里斯问——尽管毫无必要——这些问题是否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答案是肯定的。一位执事问：有没有教民因其他人而退出圣餐仪式？答案是否定的。在疯狂的耳语和催促中，帕里斯又读了一遍《为和平而沉》。他们对他的言论还满意吗？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塔贝尔回答说，他们需要想一想。四天后，他们造访牧师家，坚持召开教会理事会。他们发现，帕里斯的道歉不过是装腔作势。

那个秋天，帕里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要求自己辩护的人。1694年11月，威廉·菲普斯航行到伦敦，回应对他不当行为的指控。这些行为从贪污到殴打，不胜枚举；在三十个月的总督生涯中，他没能赢得波士

顿任一派系的欢心。斯托顿为他设宴饯行，他却表示拒绝。帕里斯的痛苦仍在持续。1695年4月，包括威拉德、马瑟父子和帕里斯在波士顿教会的牧师同僚聚在村里，组成了仲裁理事会。他们发现各方都有错。帕里斯在“近期黑暗的混乱中”采取了许多“不合法、不恰当的方式”。他需要向纳斯的家属表示同情。而除非会众希望继续相互攻讦，他们就要接受帕里斯的道歉——这同1687年塞勒姆元老们的建议并无二致。如果和解不可能达成，那么帕里斯必须走人。

一个月后，另一群牧师表达了更加明确的态度。帕里斯是时候放下了。（他的结局至少好过菲普斯，后者在抵达伦敦后不久就死了。斯托顿——就是他筹谋指控菲普斯——担任代理总督，之后几乎没有间断，直至去世。）在执行玛丽·沃尔科特4月的婚礼仪式后，帕里斯于1696年6月28日在塞勒姆进行最后一次讲道。四周后，四十八岁的伊丽莎白·帕里斯去世。帕里斯是此地第三位在任上丧妻的牧师，他将妻子埋葬在村里，墓碑至今仍在。^[6] 社区的大部分人仍然支持帕里斯，后者拒绝离开塞勒姆，除非领到薪水。人们已经失去了三个牧师；失去第四个只会让事情恶化。他们请他留下来。诉讼和反诉接踵而至。1697年7月，这件事被上报给三名仲裁员，其中包括两名前巫术案法官。纳斯的家属向他们抱怨说，帕里斯领导他的会众犯下“危险的错误，并且宣扬了可耻的不道德行为”，所以他应该离职。他打压批评言论，同时又煽动另一些言论。他发的誓都是假的。双方都夸大其词；正如帕里斯的批评者所言，他“不仅是这个村庄，更是整个地区最大苦难的始作俑者和皮条客”。仲裁员对他进行了裁决，判定他有罪。帕里斯回到斯托，他曾经布道的偏远小村庄。他随即卷入一场薪资纠纷，只活了一年就死了。

塞缪尔·休厄尔身材魁梧，脸膛泛红，灰白的头发日渐稀疏，在1696年8月12日这天，却被一条措辞尖锐的评论刺痛了。一位在阿姆斯特丹出生的朋友出乎意料地说，若有人声称自己已经把波士顿的比肯山背在背上，把它送走，然后再送回正确的地方，他也会对此深信不疑。巫术案法官的轻信，还有那些相信恶魔契约的“蠢人”的声明，早已让这位朋友感到震惊。此人在波士顿当治安官，话中的深意明确且尖锐。差不多在四年前，惊人活跃的乔治·伯勒斯被绞死。这句评论也抵消了帕里斯的缓慢退场产生的影响。无论态度多么勉强，无论他的教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帕里斯的道歉仍然可以算是唯一的公开认错。耻辱的黑云悬在高空。

休厄尔并非唯一一个为未竟之事战栗的人。1696年9月16日，星期日，斯托顿、理事会成员和马萨诸塞行政委员在波士顿市内住宅碰头，举行了一天的祷告，由五位牧师主持。轮到威拉德牧师时，他谴责了当局。无辜的生命已经消逝。为什么还不下达正式的命令来恳求上帝的赦免？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时节，累积的集体罪恶便益发沉重，作物歉收、飞虫成群、流行病、印第安人袭击、讨伐法国军队的远征失败，皆是上帝对新英格兰不满的表现。马瑟关于新千年将于1697年开始的预言似乎错了。那是新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冬天。厚厚的冰使得波士顿港瘫痪。随着贸易停滞，粮食价格上涨到历史新高。食物匮乏。人们时有责骂，敦促着解决1692年的问题，这势头愈演愈烈。

11月中旬，塞缪尔·休厄尔北上参加一场令人不安的审判。甚至在托马斯·莫尔在塞勒姆镇建造他那小小的贵格教会堂前，休厄尔已经自觉担起责任，告诉希金森牧师，此人的布道谎话连篇。莫尔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来到新英格兰，似乎就是为了激怒当局；在这个容不下英国国教的社会里，他极尽所能。莫尔宁愿打自己的女仆，也不愿卖了她，而

当黑尔牧师在绞架下为布里奇特·毕肖普祈祷时，莫尔严厉训斥了他。要知道，莫尔的一个孩子正死于毕晓普手下！^[7] 1695年，莫尔出版了一本书，在纽约印刷，炮轰马萨诸塞迫害贵格会教徒。他高兴地指出，这本书将制造“一阵巨大的混乱”。斯托顿命令搜查莫尔的家，看看有无违规出版物；治安官科温负责这项任务，带走三十本抄本，逮捕莫尔，将他送往塞勒姆监狱，此处和以前相比，犯人少了很多。书则都被烧了。^[8]

在11月案件审判之时，莫尔出席了初审，罪名包括出版亵渎上帝的刊物和不服约束的侮辱性行为。休厄尔与另外两名法官一道，为之头痛了一个下午。莫尔是那种腋下夹着《圣经》出席审讯，并且戏谑法庭为“高等非法院”（High Court of Injustice）的人。他急于把对贵格会的迫害与猎巫相提并论，这对他自己的罪名毫无帮助。当局令人作呕，他们把伯勒斯害惨了。他们用巫术与巫术相抗。他滑稽地模仿了村里的姑娘，嘲笑她们荒唐的预见能力。怎么会有人想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真正殉道者”？11月，莫尔得寸进尺，开始模仿法官。尽管五次入狱，两次遭鞭打，他也无所畏惧。这个曾对无辜者行刑的法庭真的敢审判他，谴责他的邪恶吗？相比于贵格会教徒，那些假装圣洁的灵魂才更喜欢他们的孩子变成“流氓和妓女”。然后，变！希金森牧师的女儿就变成了一个女巫。

以国王之名，莫尔开始对陪审团进行陈辞。他提醒他们，是法庭把上帝的愤怒带到了省内。当他们杀害无辜者并从不悔改时，又有什么资格控诉他说“臭名昭著的邪恶谎言”呢？他们挥霍光了所有的信誉；他不需要特别指出，一切便是发生在这个房间里。1696年，言论和出版并不比之前自由。定罪倒是不那么容易了。莫尔的辩护颇为新颖，只有在那个凄凉的冬天才能奏效。是的，他的名字出现在渎神书籍上。但是，陪

审员需要与纽约的印刷工好好谈谈。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证明书籍封面上的“托马斯·莫尔”这个名字便是站在他们面前的男人？那名字会不会是个幽灵呢？

莫尔警告陪审团：他们应该小心思量。他们不会想承担埃塞克斯县另一些陪审员现在所遭受的愧疚感。判决是由他们独立完成的，法官不过是他们的记录员——显然，这是对纳斯案判决的反讽。令法官们震惊的是，十二名陪审员判处莫尔无罪。这怎么可能，休厄尔的一位同事怒道；莫尔散发着恶臭的书就摆在他们面前！陪审员耐心地解释说，他们认为证据不足。是印刷工将莫尔的名字印在封面上；仅凭凡人无法证实内容的含义。法官咕哝道，莫尔可能逃脱了人的审判，但他逃脱不了神的审判。对此，莫尔胸有成竹地反驳道：陪审团将他从行不义之事的 not 义之徒手中解救出来。

12月，赢得公众认可的契机来了——情况很像巫术恐慌发生前，新英格兰似乎处于“毁灭的边缘”。起草法案的任务落到科顿·马瑟的头上。他仍坚持认为，虽然他无法支持他们的原则，但他不能对他们不敬。（这个声明中也有一个“然而”。）他们谨慎、虔诚、耐心。他们表现得比普通人好太多，后者完全屈服于混乱的大脑和不满的心灵。他为斋戒日制定了一份不敬行为的细目清单，在饮酒、诅咒和不服管的儿童中间加入“邪恶的巫术”，就像你在药店柜台的杂物中埋藏的一件尴尬物品。巫术从无形的世界带来风暴，导致“错误，使得无辜者承受极大的灾难，（我们担心会）招致罪恶，对此我们都有理由感到悲哀”。对马瑟的草案，其他人加了些话，承认“司法中存在疏漏”。参事会——每一位巫术案法官都在其中——对此勃然大怒；休厄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怒火。“邪恶的巫术”可以保留，司法的失策则必须删去。马瑟被命令重写法案。最后，公开版本大为缩短，既没有提到不公正，也没有出

现“巫术”或“魔法”。马萨诸塞将为“近期的一场悲剧”中的各方所犯的错误而忏悔。

众人的争吵，加上莫尔的非难，令休厄尔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同样沉重的，还有那几周他脑中翻来覆去回想的《启示录》章节，同时，大雪覆盖波士顿。激辩过后，他在大雪中跋涉两天，去找他的牧师，心情十分沮丧。休厄尔的妻子和两岁女儿莎拉都生病了。那个冬天，休厄尔这位前巫术案法官难敌内心的负疚，而莫尔的陪审团却在证据面前无动于衷；同一个星期，一个波士顿女人因另一项裁决谴责他，而他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受到了“哄骗和欺凌”。第二天破晓时，年幼的莎拉·休厄尔在保姆的怀里死去。家里一片悲伤，小小的尸体还停放在房子里，休厄尔十六岁的儿子用拉丁语朗读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的父亲听到第七节时，不禁颤抖，因为它提到了无辜者受难。^[9] 这“真的让人想起塞勒姆的悲剧”，他十分焦虑，那是他第一次私下里把“悲剧”和巫术联系在一起。葬礼之后，在苦寒中，他独自悲伤了一阵，在家族墓穴里和死去的孩子说了些话。莎拉是他1696年埋葬的第二个孩子。五年来，他一再经历亲人逝世。他非常痛苦。

1697年1月14日，殖民地开始了全省范围内的忏悔斋戒。所有的工作都停止，各个社区恳求上帝“赦免他的仆人和人民的一切错误”，特别提到塞勒姆。当牧师在前往神坛的路上与休厄尔擦肩而过时，休厄尔递给他一张纸条。它可能只是节选；在那个阴沉的时节，休厄尔感觉到威拉德的疏远。这种冷落刺痛了他；他觉得自己遭到了放逐。布道中途，坦率的牧师给了休厄尔信号，后者站在教堂长椅前，低垂着头。牧师在整个教会面前，在休厄尔悲伤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大声朗读了他的话。鉴于“上帝对自己和家人的一再打击”，休厄尔已非常清楚自己在巫术法庭上所犯的罪行。他恳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行，不要因为他的失足，而怪

罪其他人或新英格兰。^[10] 实际上，用一句内涵丰富的话就可概括——这句话包含“责备”“耻辱”“罪恶”和“内疚”四个帕里斯故意避开的词——威拉德读完后，休厄尔深鞠一躬。然后他才坐下。

对于休厄尔这样一个听到批评就变身缩头乌龟且不愿做出头鸟的人而言，这一定是个痛苦的时刻；他的行为可谓是公开救赎，斯托顿至少不会赞同。首席法官后来便冷落了他。显然，他觉得道歉没有必要；斋戒的法令就足够了。斯托顿在谴责安德罗斯政府时，指出了司法程序的不合理和欺骗性。后来他一度失宠，便宣称自己“愿意对之前政府的失策做出任何补救”。但在1697年，他认为没有必要处理失控的争议，或法律上的错误。那天晚上，休厄尔在日记中仔细地转录了纸条的内容。在几个街区以外，马瑟坐在桌前，为“神的不悦”而发愁。它会不会“突然降临在我的家人头上，因为当无形世界席卷而来的神秘风暴袭击这个地方时，我没有尽力阻止法官的诉讼进程”？负疚之情充溢在字里行间。第二天早晨，他向着同样的方向祈祷，收到上天的保证：他不会受到报复。

其他人也利用斋戒这一天寻求解脱。十二名塞勒姆的陪审员——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在斯托顿提议三思之前，认为丽贝卡·纳斯无罪——那天下午请求上帝和所有曾冒犯过的人的宽恕。他们永远不会再“以这样的理由对全世界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艰难地为自己辩护，承认“被强大和普遍的妄想所控制”。他们做出了糟糕的决定。他们的声明带有些许责备意味。没人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辜之人之所以流血，是因为有其他人的参与。当天下午，科顿·马瑟向北教堂教众布道，谈的是同一个话题，还向因行正义之事而受难的法官和牧师致敬。之后，罗伯特·卡莱夫，一位波士顿商人兼治安官，上前攀谈。两人已经通了一段时间的信。马瑟将巫术定义为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卡莱夫问，你说这

话的根据是什么？毫无疑问，马瑟知道卡莱夫已经给托马斯·莫尔交了保释金。但他想象不到，这位令人恼火的四十八岁波士顿羊毛商将会给他造成多大的麻烦。

1693年，卡莱夫开始创作《无形世界的更多奇迹》（*Mor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书名本身就是挑衅。这本书于1697年完成，后来在伦敦付梓。卡莱夫已经散布了一篇讽刺的文章，指责马瑟对待十七岁的玛格丽特·鲁尔的方式就是试图重演塞勒姆的历史。鲁尔告诉了马瑟他丢失笔记的消息。卡莱夫说，马瑟父子对待这个少女的方式都很不妥当。马瑟向他保证，他们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问过有多少女巫压制住玛格丽特；他明确要求她不要指出他人的名字。他的父亲也绝没有碰她的肚子。据说，折磨她的小恶魔就在她的枕头上，他又怎么会这么做？（写这几句的时候，卡莱夫特别认真，多次划掉重写，这不符合他的习惯。）马瑟的一位朋友向卡莱夫提供了玛格丽特在卧室里胡言乱语和升空的记录，卡莱夫在书中分享了这一情况，这便成了塞勒姆五年之后的一次巨大的尴尬。马瑟在讲坛上谴责他，几乎让他因诽谤而被捕。卡莱夫同意女巫存在，但认为《圣经》没有提供任何辨认她们的可靠手段。绞死她们对恶魔没有什么困扰。卡莱夫认为，人们应该停止涉足神圣事务。他们只会笨手笨脚，把事情搞砸。

争论首先有关声誉，而不是良知；大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容易。当乔治·科温在多雪的1696年春天去世时，菲利普·英格利希明确威胁要夺取尸体。他咆哮道，要他将尸体还回来，除非治安官将他私吞的一千五百镑财产的部分金额作为交换。^[11]他在科温的院子里看见了他的短尾牛，从而被激怒。后来，英格利希多次出庭，因为他拒缴教会税（这一罪行最终令他入狱），以及损害塞勒姆行政委员的权威（在被指控犯巫术罪数周前，他还曾被选上该职位）。他称牧师和法官

为劫匪。他拒绝在被清教徒“感染”的镇会堂里进行礼拜。塞勒姆的教会是“魔鬼的教会”。1722年，他仍在猛烈抨击神职人员，当时法院因他称尼古拉斯·诺伊斯——此时已经死了二十一年——是杀人凶手而指控他。在垂危之时，他还在为家族往事怒斥哈桑。

自然地，科顿·马瑟多次尝试分析此事，没人比他研究得更多。通常，他慢慢接近现场，假设自己在塞勒姆，比他自己1692年现身的次数更多；若读他后期的作品，读者可能会认为他参加了那些审判。鉴于他无比坚定地把自已定位在事件的中心，那么当人们知道他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否定幽灵证据，可他又不参加任何审讯，也没担任过法官的角色，他因此受到指责也就理所当然了。^[12] 只有这次事件中，因果关系对他来说不是燃眉之急；邪恶天使之灾的起源，不如它的作用令马瑟感兴趣。为了使这些“惊人的事物”被恰当地利用，他写了《无形世界的奇迹》。尽管那本“令人憎恨的书”给他带来了侮辱，他却不后悔写它。他也从未怀疑过法官“纯洁的忠诚”。他把手指放在无形之物上：政治考虑严重损害了道德观念。马瑟在1692年底或之后不久就有了一个理论。他在他的日记中思考，邪恶天使的横行，是不是“地狱发起的一场特别挑战，企图阻止我可怜的努力，不让我把人们的灵魂带入天堂？”他将这一想法归功于他人。^[13]

1697年，马瑟在写威廉·菲普斯的一生时中做了详细解释。这本书谎话连篇，只为了给糟糕的政府及其幕后人士免除责任。在文中，他将塞勒姆的灾祸归因于年轻人热衷于施咒和算命。迷信书籍毒害了青少年的头脑，“以前所未有的惊人方式”邀请恶魔降世。他坚持恶魔契约的存在，却抛弃女巫集会的说法。幸运的是，菲普斯在紧要关头到达，组建了一个杰出的法庭。法官行事有效，也许过于有效。然而，颠覆政府的行动已箭在弦上；撒旦试图从他们手中夺去来之不易的新特许状。马瑟

重复了6月写的《几位牧师的回归》一文，或者是该文的一部分；他略去引言中对武力的呼唤，以及结语处提议的“迅速有力的起诉”。写作时，马瑟怀着政治目的，所以他在该书出版时很激动地宣布，他的敌人“因这本书而痛苦万分”。

他并未将瑞典忘却。他曾许诺巫术案法官，他们的劳碌会换来上帝的微笑，不过现在却闭口不谈。他宁愿让这件事也在混乱中结束。连瑞典王国都无法打败巫术，马萨诸塞湾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打败了。那些孩子说了谎。）像陪审员一样，他谴责魔鬼和人们狭隘的理解。“大量证人”都可以对他们所看到的東西起誓。作为收尾，他只能引用一位很喜欢的早期基督教作家，再改成自己的话：“魔鬼可以让人看到不存在的东西，仿佛它们真实存在。”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马瑟毫无悔意；他的怀疑只限于日记之中。然而，他不能远离这个话题，就像担心一颗松动的牙齿。他不会让巫术落幕，后来又折腾多年，做了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斯托顿则采取了沉默的策略，逃脱所有牵连。马瑟把自己写进故事之中。在他1702年的《玛格诺拉》一书中——这本书描绘了新英格兰史诗般的历史，包括对菲普斯言行的记录——他通篇都在描写奇迹。他详细阐述了古德温的故事。他把印第安酋长也牵扯进塞勒姆的那场灾祸中。他一直怀疑那些“可怕的巫师和地狱的魔法师”在这场“无法解释的战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声称，一名已被处死的女巫曾在恶魔的集会中看到他们，旁边还有一群法国人。他们齐心协力，密谋摧毁新英格兰。

在《玛格诺拉》出版的时候，贝弗利牧师约翰·黑尔对这些审判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叙述。他等了五年，给别人机会解释这件事。但没有人做到。即便失明，他也可以在家里来去自如，他特别适合做这件事。他目睹女孩们最开始的痛苦。他花了无数时间出庭，参加审讯和绞刑，与

帕里斯和诺伊斯一起，而他的存在也给了他们信心。他作证指控了三名女性。无辜者因罪赴死，法官们行事正义，这是不容许人们辩驳的真相，可他显然只能勉强接受。“但当天就是那么黑暗，”黑尔哀叹道，“受害者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加上早期案例的影响，我们好像走在云雾中，看不见方向。”绝望之下，他试图不再内疚——必须为那些财产和名声毁于一旦的人多做点事——同时采取一个充分、安全的办法来检测巫术。那时，他是最接近承认错误的人；但是，他困惑地踌躇着。他们的起诉可能过于激烈，但未来也不能太宽容。黑尔暗示他在死前有“特殊的理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可能已经或尚未意识到，他在作证指控一个女人时，错以为她是另一个女人。他愿意解决此事的原因与马瑟相同，但并不考虑印第安人、政治议程和个人侮辱。黑尔承认了我们都很难以承认的事：1692年的事件使他“更严格地审视自己所坚守的原则，质疑它们，而最终反对其中的多条”。他不安地脸红了，为一个没有明确表述的想法：危及塞勒姆的稳定的，是人们对巫术的笃信，而不是巫师。

危机造成了两种类型的回忆录：一种是“不要责怪我，我不在场”，还有一种是“如果不是我，事情还会更糟糕”。塞勒姆只有第一种。没有人表露自己的英雄身份。约翰·希金森，镇上的资深牧师，为黑尔的作品写过序。他也直指撒旦。二十个人都落得“悲剧性的结局”。有些人可能是无辜的。逃脱起诉的其他人可能是有罪的。他承认对司法程序有疑虑，但法官和陪审团是无可挑剔的。然后，他就完全脱离了审判。“我很少激动，”他写道，这符合他的年龄（他已经七十六岁），“并且因为无能（身心皆如此）而无法知晓和判断那时的事情和处理方式。”希金森没有作证指控任何人，但是密切参与审讯。他曾经主持过法庭祷告。他知道司法进程的每个细节。他的儿子花了几天时间记录证词，他的女儿在1692年前后被监禁。黑尔的作品很有勇气，聚焦危险的主题，但他

选择生前不出版此书。这本叫《对巫术本质的些许调查》（*A Modest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Witchcraft*）的书出版于1702年，即斯托顿死后一年的时间，这显然是设计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威人士之间，或其他人针对权威人士方面，鲜有反对声音被留存。^[14] 父母仍然把孩子送去诺伊斯牧师那里接受教育。穆迪牧师帮助英格利希夫妇逃跑五年后，科顿·马瑟在穆迪的葬礼上布道。1697年，休厄尔致力于为斯托顿写一篇关于《启示录》的文章，后者的政权则致力于抵御印第安人的入侵和挫败法国的阴谋诡计。斯托顿已经是首席法官、参事会成员和副总督，有几年还担任殖民地军队总司令；他也承担了海事法庭的法官职责。他的工作得好几个人来接替。1701年7月4日，休厄尔在他的床边。“为我祈祷！”这是六十九岁的斯托顿对他多年的同事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访客离开时，他伸出手来，休厄尔亲吻了它。三天后，他死了。威拉德在葬礼上讲道，也许在未能忏悔这个问题上纠缠得过久。威拉德说，有时，甚至最好的人都会激怒上帝，所以“虽然他爱他们，却不喜欢他们所做的事情”。

休厄尔造访后两天，斯托顿定下了自己的遗嘱。开头是套话：“我非常谦卑地乞求并相信，我的心灵和一生的许多罪孽将得到宽恕。”该文件是开明慷慨的范文；如果能够通过最后的愿望来判断一个人，那么斯托顿做事有条不紊，做人则富有同情心。他没有忘记任何人，从他的管家到参事会的门卫，再到哈佛学院。他将一些土地、一栋四层楼房和很大一笔奖学金留给哈佛。这笔钱将提供给贫穷但值得帮助的学者。他规定，斯托顿宿舍楼的几间房间将免费留给印第安学生。另外，他还拨出很多钱，支持印第安人的教育事业。他为多切斯特的学校拨了一大笔钱，给米尔顿的穷人提供四十英亩地。整整一个世纪，哈佛学院的捐赠者名单中，没人比他更加慷慨。^[15]

马瑟和莫尔继续争斗，马瑟从印第安战争写到贵格会，莫尔则从巫术写到《无形世界的奇迹》，那是“一团黑暗、混乱、轻率的玩意”。迷雾依然没有消散；经济赔偿和恢复名誉的要求堆积成山。与往常一样，他们区分了审判中的“失误和错误”和“尊贵法官的谨慎和尽责的努力”，就像一群托普斯菲尔德的请愿者在游说救济一样。（牧师们接受了受害者的请愿书，尽管没有一位塞勒姆镇或村的牧师在上面签名。）诅咒笼罩着这片土地。上帝的不满，不是像巫师所解释的那样，而是搞砸了的控告造成的。正如布拉特尔所警告的，内疚很难卸除。它会恶化，因为侮辱的记忆比侮辱本身更强大，这在1692年事件中已得到充分证明。

距离安·福斯特同女儿及外孙女相互指认，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迈克尔·维格尔斯沃思参与讨论，他七十三岁，是马尔登牧师，为人谨慎且敏感；他写信给英克里斯·马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16] 维格尔斯沃思是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教过休厄尔和马瑟父子。一如过往，专注正义源于发现了不公正。那一年，一场大旱威胁着新英格兰的农场；威格斯沃思担心“上帝对我们在巫术危机时所做的一切有意见”。法官受到魔鬼的强迫，或者是“魔鬼的冒名顶替”。他们使无辜之血溅于当场，而从未承担过责任。他知道这个问题不准提，但没有别的选择。他对掠夺财产之事感到尤为震惊，这是早先巫术指控中没有的。（1692年前也没有几个富有的巫师。）^[17] 由于未能适当补偿在“所谓巫术”被告的家庭，这种耻辱进一步加深，诅咒将不会被解除，直到法庭给予恰当的补偿。他敦促马瑟去做这件事。（五年之后，菲利普·英格利希和其他二十人仍然吵着要赔偿，也不忘带上一句对法官表示尊重的话。英格利希提出了近一千二百镑的索赔要求。他在1718年收到三百镑。）正如维格尔斯沃思所说，没有法官站出来。唯一站出来的那个人也很快后悔了；1720年，塞缪尔·休厄尔看到历史书时，感到被羞辱了——所有后人都会读到他那段羞耻的忏悔！

有一分猜想仍在。1706年8月25日，小安·帕特南将站在塞勒姆村会众之中，被完全、正式接纳为一名教会成员。她二十七岁。她的父母都死了，留下了九个兄弟姐妹要她照顾。安没有结婚。在巫术指控更猖獗的时期，她受到过至少六十二人的折磨，其中还有前任牧师（现在已经死了）、一位邻居（现在已经死了）和少女桃乐茜·古德（现在已经疯了）。在十九名被绞死的人中，她宣誓作证，指控了其中的十七人。在八个多月的灾祸中，整个社区都在等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在罗森的布道中，她从讲坛上疯狂地指着一只黄鸟，而现在她沉默着站在同一个讲坛上，由塞勒姆的新任牧师大声读出她的忏悔书。昔日的先知如今恳求那些因她被捕或被告之人的亲属的宽恕。她对她造成的灾难深表遗憾。她特别向纳斯、埃斯蒂和克洛伊斯的家属道歉，到1706年，他们家在教堂中的座席变得稀疏。他们是无辜的。她两次提醒会众，她是“和其他人”一起行事。帮她起草声明的人已经得到了陪审员的道歉；就像陪审员一样，安宣称她的行为都是“无知和无意的”。同样，她“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黑暗力量和魔王的神秘欺骗”。在她简短的陈述中，她三次提到，在恶魔的诡计中，她只是一个“工具”。

没有必要再找出罪魁祸首。这位永远的死对头便在他们呼吸的空气中，占据马萨诸塞的每一个小镇，逼迫人们为他做事。在塞勒姆村和其他地方，他潜回了人们的讨论中。在1693年一次特别激动的讲话中，马瑟宣称恶魔无处不在，他“观察、祈求、伸手，准备吞噬我们”。与此同时，理智渐渐回归。巫师慢慢变为殉道者。很多年过去，才有人问那到底是谁的错，才有人敢指称法官自己才是巫师的学徒，是他们“眼瞎且荒谬”、被鬼附身、“无知又愚蠢”，而非村里的姑娘。尽管如此，这还是没有回答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要求补偿的请愿变得越来越情绪化；1710年，马萨诸塞省立法会成

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为塞勒姆人处理索赔和恢复名誉。（即使这样做，他们也表示，他们不过起诉了错误的巫师嫌疑人。）1711年10月，大多数受害者已经平反，监狱费用也偿还给了部分家庭，仍然没有人承认责任。这项裁决撇清了监狱长、执法官和治安官的错误行为。法官未被提及。许多人与委员会讲理，将丑事公开，并引起了新一轮的愤慨。马瑟后来表示要去一趟塞勒姆，“努力治愈所有不和谐的倾向”。阿比盖尔·霍布斯因为煽动性的供述而获得奖励。曾经谴责自己妻子的威廉·古德也获得不错的结果。进一步的赔偿申请仍在持续。不过，还是没有人因羞辱而离开此地。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证人在弥留之际改变主意，承认他对布里奇特·毕肖普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归咎责任似乎毫无意义，正如人们好像不可能理解1692年发生的事。除了被绞死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是无辜的。

在帕里斯承认她们被施巫前，在她们变成预言家或殉道者之前，在人们将她们贬为“卑鄙的恶棍”前，大家都认为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贝蒂·帕里斯只是被恶魔附身了。长大后，她们又重提起那一诊断。^[18]塞勒姆姑娘们的早期症状，在各个方面与伊丽莎白·纳普、古德温家的孩子和马瑟在后塞勒姆时期冲去床边看望的两个年轻女人一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击倒了那些女孩：是她们的灵魂状态，还是琐碎的家务活？是父母的过度关注，还是疏于关心？刺痛感，抽搐，口吃，痛苦的神情，溃烂的皮肤，扭曲的四肢，卷曲的舌头，凸起的背部，神志不清，“对假想敌愤怒地破口大骂”——却正符合19世纪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和后来的弗洛伊德所称的癔症（hysteria）。17世纪权威人士眼里的恶魔，我们则认为是神经过度疲劳；而早先被称为癔症的状态，现在被称为转换性障碍（conversion

disorder），即身体将情绪忠实地转化为症状。痛苦被高尚化，通过肉体显现，亦控制了身体。沙可描述不断抽搐的癔症的绘画作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与那些让德奥达特·罗森眩晕的场景相符。

当时的环境也有利于巫术的爆发。人们谈论贝蒂和阿比盖尔时，语气里充满担忧和愤怒，像是害怕世界末日的降临。住宅通常很冷，而且越来越冷。教民心怀不满，步履沉重地进出牧师住宅，发泄强烈的怨恨。1692年初，贝蒂和阿比盖尔深陷这种怨气中，那是黑暗、阴冷、幽闭的几个月，死亡渐渐靠近，巫术指控将要达到巅峰。女孩们所居住的封闭、狭小的环境，很容易产生出色的戏剧（和优秀的侦探故事）；相比之下，城市里很少发生巫术指控。在孤立的社区，在紧张的家庭环境中，那些观察女孩并和自行想象她们痛苦的人，也正是她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她们崩溃了，或因遭到莎拉·古德的袭击，或因讲坛传来的消息，或因内心的痛苦。

她们发出的声音像是患了某种情绪上的喉炎，往往有种窒息感，伴随着歇斯底里。女孩们用一阵阵的发作来表达不能用言语传递的东西，或者即使用言语表达也似乎没人会听的东西。^[19] 对于闪电常常击中牧师住宅的问题上，马瑟和休厄尔产生了误解。^[20] 但帕里斯有一点是正确的，即魔鬼的目标往往是最虔诚的人。癔症的目标往往是有教养、清醒的家庭，那里的紧张局势更甚；所以，塞勒姆的牧师发现在他家屋檐下的巫术受害者最多，这就说得通了。（他家没有产生更多受害者，这倒是令人吃惊。帕里斯家的两个孩子艰难地长大，被历史遗忘。）贝蒂和阿比盖尔被要求不许坐立不安，品行端正、表现良好的两人却因痛苦而扭动。她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们不像叽叽喳喳、煽动阴谋的坏女孩——阿比盖尔·霍布斯和小玛丽·莱西，这两人可能真的相信她们已经与魔鬼签署了契约，听起来好像如果可以，她们就会这么做。牧师住

宅里更容易产生幻觉，而非观念。

转换性障碍常发生于闭塞之地，对象是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和无父的孩子。它往往在联系紧密、情感充沛的环境中爆发，如修道院、学校、医院。弗洛伊德指出，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在视觉上和智力上特别敏锐的孩子。女孩的症状本来就具有感染性，当她出生在城里最显眼的家庭时，更是如此。（同样的道理，虔诚的人会更频繁地瞥见恶魔。没有极度的虔诚，便很少会发生附身之事。）使用女巫蛋糕的人是教会正式成员，强迫帕里斯以及社区其他更虔诚的教民——还有更正统的牧师——接受，于是，帕里斯便在牧师住宅的草地上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颠覆圣礼仪式的说法。女孩们可能已经知道古德温的案子。至少大人肯定会知道。当你的长辈告诉你，你被施了魔咒，症状便不大可能立即缓解。相反，胳膊上的刺痛可能更为强烈，就像在提到虱子时，头皮便会刺痛。

贝蒂和阿比盖尔已经成为社区的焦点，却仍要求被重视，这显然也被其他人所渴望。玛丽·罗兰森在这个问题上很坦白。“在我知道折磨是什么意思之前，”她在狱中承认，“有时候我还企盼过呢。”她不可能是唯一一个渴望以此测试自身圣洁的新英格兰女性。伊丽莎白·纳普啜泣着，不但为精神上的贫瘠，也因为“劳动对她来说是种负担”。没人会惩罚受折磨的女孩，或派她去收集柴火。伊丽莎白·哈伯德不再需要干那些被狼群紧跟的可怕差事；灰姑娘都与她们的家务脱离了。（老安·帕特南——第一个被折磨的成年女性——累得筋疲力尽，正是因为她曾依赖的姑娘们不再劳动。她有理由悲伤，但17世纪的马萨诸塞容不下这些悲伤，这也造成了此地极度贫困的状态。）父母尚能给予温柔的呵护，其他兄弟姐妹则毫无疑问会为此疯狂地嫉妒。在又一次爆发中，一个年轻女孩注意到，她抽搐的姐妹“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父母关心、爱

护和同情”。不久之后，她就出现了一样的症状。

根据起诉书的描述，这些被施咒的女孩“崩溃，憔悴，瘦弱，备受煎熬”。可是，观察过这些女孩的人，不会看到前三种状态；此前，她们从未受到如此宠爱。毫无疑问，这本身就是一种诱惑，鼓励她们装病。被告方的一名证人指出，每当“母亲对她言辞尖酸”时，受害女孩都会发作。伊丽莎白·纳普不仅保持身体健康，甚至随着痛苦升级而增加了体重。（像牧师一样，女孩们喜欢充满人的房子和宽敞的剧场。伊丽莎白警告说，除非牧师齐聚波士顿为她祷告，她才会康复，这是她自己想象的黄金之旅。）她明确表示，自己有许多自责、精神困惑和恶魔的诱惑需要宣泄，也正是这种痛苦让休厄尔和古德温家的孩子们哭喊着自己浪费了生命。每个灌木丛里都有印第安人，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个法国人的幽灵。^[21]每个孩子内心都有肆虐的怪物。但是，成年人也会有同感——当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手并没勾着亨利·杰基尔秀丽的手，而是爱德华·海德黑暗、扭曲的爪子^[22]。

受害者真的感到被捏和被刺吗？据说，癔症患者的皮肤非常敏感，特别是在深夜。他们很容易会瘀伤。至于捏伤和刺伤，一个17世纪的村民也可能感觉到。一场精彩的布道会深入骨髓。科顿·马瑟笔下的冬天“寒风刺骨，痛苦万分”。^[23]他说，冬天时间若多一点，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反思。清教徒撤销日历上的每个节日和假期，一年要工作三百天。这有助于达到惊人的生产力。可它同样也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中最暗无天日的日程安排”。在一年中最荒凉的月份，人们只能待在室内，地平线低沉，家庭气氛压抑，女孩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她们是否相信，自己真的看到蒂丽芙伦斯·霍布斯在房梁上，约翰·普罗克特坐在执法官的大腿上呢？她们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幽闭的冬天，

外面天色灰白，雪花飘落，屋内装饰简陋，墙壁刷了石灰水。我们已经知道，视觉上的单调乏味会产生幻觉。（有趣的是，没有嗅觉上的幻觉，只听其声、不见其人的情况也很少见。）发烧时，很难不去说出所见的幻象。女孩们熟悉超自然事物，还能很好地化用《圣经》中的语句，说出幻想时明显胸有成竹。祈祷是为了净化内心的意象，让虚构世界凌驾于实际世界之上，而青少年已经在这个层面上脱颖而出。村里受过最好教育的女孩最狂热地参与其中，并非偶然。在瑞典，站在漩涡中心的，同样是一个聪明、心直口快的十一岁孤儿。窗外飞过了女孩扭曲的恐惧，《圣经》里漂浮的场景，肮脏的家庭积怨，恼人的原罪和罪恶，梦和噩梦的残余，八卦和政治游戏的碎语，还有门口夏卡尔 [\[24\]](#) 风格的真猫，以及果园里的邻居。在某种意义上，受害者是在做反馈式阅读；听惯了教仪中的老虎与恶龙，他们便回以黑猫和野兽。换句话说，正如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的，我们的想象力会与时代同步，“在17世纪，圣母玛利亚更可能向法国农民现身，而则不是向低地苏格兰人”。“被施咒的人”还会编造和自身经历相呼应的意象。苏珊娜·谢尔登在印第安人的袭击中幸存下来。她曾提及过一次暴行，而安·帕特南也在同一件事中看到死婴；两人的说辞都形象地体现了她们的忧虑。正如布拉特尔指出的，我们闭上眼睛是看不见的。的确如此。但是，当我们闭上眼睛、又能看见东西时，谁能来证实真假呢？

当年龄较大的女孩开始抽搐时，额外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只有在提图芭信息量巨大的证词之后，那五个叫嚣得最凶的原告才加入进来。每一个原告都是仆人。她们已经长到了疯狂攻击大人的年纪，曾经的依赖升级为反抗。她们可能有秘密的议程，比阿比盖尔·霍布斯更加精明。她们知道年纪较小的女孩们所不知道的重点，在伊丽莎白·纳普出色地勾画出的罪恶和诱惑的森林中，她们冒险走出更远。她们更加适应成年人的冲突、要求、信任和推进，也更熟悉扮演披着羊皮的狼。这个

游戏里是否有性元素？刺、啄、戳，扔下干草叉，后背暗示性地向上拱起，膝盖被紧紧地锁在一起，如何理解这些取决于你的意愿。没有具体的证据保留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才是在床上控诉女巫的人。但是，青春期不就是充满性的恐惧与渴望吗？这场为抖动、呻吟的年轻女人灵魂的斗争，肯定会挑逗了她床边的某些人。而男性牧师的手也很受欢迎。1693年，玛格丽特·鲁尔让围绕她的女人们离开，却留下了男人。她特别恳求一位年轻的拜访者留下：如果他离开房间，她就会死去。

瘵症具有传染性，在精神上也会让人上瘾；自然而然，少年开始了任意的自我虐待。若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心怀不满，被剥夺了基本权利，那她可不会错过将自己置于聚光灯下的快感，比如默茜·刘易斯这样的女孩。^[25] 有没有人真的相信她们的每一句发言？乔治·伯勒斯肯定不信。然而，被施咒的都是丧父的女孩，她们的手段非凡，赢得了每个男性的支持和同情。（约翰·印第安除外，在安多弗之前还没有出现男性原告。）许多人的创伤都是有理由，有些人则肯定将苦难当作儿戏。剧院一直是不幸童年的避难所。当玛丽·沃尔科特迎接回到村里的罗森牧师时，她可能带着一位前教民的指示。同样可能的是，她去罗森的家里拜访，是为了一睹他家奇观的预演；帕里斯特别相信她和另外一个女孩曾目击幽灵。年纪大的女孩精心算计、互相勾结，在彼此之间，也在与几个成年人之间。否则，法庭上心灵感应便不能实行，除非经过提前密谋。否则，苏珊娜·谢尔登就不会把自己的手腕绑在一起。小安·帕特南和伊丽莎白·哈伯德也是统一口径后才得出结论，即施巫术的伯勒斯的身份比巫师还高，这在马萨诸塞并无先例。尽管深受折磨，帕里斯的外甥女却设法到小酒馆，并找到一个年轻人，利用他的剑，将她从幽灵手中解救出来。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她们假装到什么程度。大胆的预言被视为形势走向，灵光一现。对于一个说服力很强、有语言天赋的小孩而言，这些至少不难把控。1720年，在塞勒姆村以西三十英里处发现了相同的巫术案例。主角是一名博览群书的十一岁少女，她记性很好，供出忠诚的妹妹、秘密的契约和一架供飞行用的梯子。事实证明，掐自己的额头或将牙齿咬入自己的手臂并非难事。你在镇公所抛出暖手筒——就像你用鞋准确地击中目标那样——你更可能是在惩罚仇人，而非遭遇巫术或瘕症的困扰。激烈的暗示持续不断，有些原告一度曾试图放弃。女孩们承认她们渴望成为焦点。^[26] 她们不止一次不顾主人反对，前去参加审讯，或者尝试前往。在这方面，塞勒姆也打破了常规做法。这是一个反转的警示故事：一个孩子行为不端，她周围的世界反而受到惩罚。

无论是幻想还是交谈，受害者都以侵略的警告、历史预言、圣经意象和本地绯闻的方式提供了他们从成人世界吸收的东西。他们知道莎拉·古德的外套上有一个洞，蒂丽芙伦斯·霍布斯的胳膊上有一个伤口，这些在所谓的小酒馆刺伤之前就已存在。他们知道其他社区的公民的名字，无论是名声显赫的、臭名昭著的，还是相互敌对的，包括那些不服管教的托普斯菲尔德青少年。问题不是他们为何传播荒谬的故事，而是1692年的人们为何会相信这些故事；他们所目击的或真或假的幻象，和其他所有人的谎言相比，还更容易理解些。（“事实上，”现代精神科医生指出，“即便是一个理智的青少年，也一定有点问题。”）提图芭的初步证词基本上都是关于宗教的。同时，供词也含糊不清。成年人美化了青少年的痛苦，将它与要事（帕特南）、信念（哈桑）、迷恋（马瑟和他对瑞典的迷恋）相联系，把青少年群体可能意识不到的力量赋予女孩们。^[27] 谎言也是合作的成果，老妪的故事正是由男人打磨和留存的。哈桑提出主要问题，并提供部分答案，代笔完成了一个熟悉的故事，故事起源于马萨诸塞的布道坛，却与一切神圣的东西相悖。1689年，正是

哈桑记下关于安德罗斯阴谋的宣誓书——安德罗斯密谋毁灭波士顿，赢得马萨诸塞所有镇子的支持，然后再将殖民地人民献给异教敌人——这是不是个巧合？哈桑发现，安德罗斯正好曾经贿赂印第安人，给对方分发钱和金戒指，以及他坚称“比《圣经》更好”的书籍，此事无疑帮了哈桑一把。这个“可怕的阴谋”在塞勒姆的证词中萦绕回响，政治阴谋以宗教形式被重塑。盲目的迷信导致指控。老练的政治——以及紧密、耐心、广泛的观察——导致了起诉。

托马斯·帕特南是幕后策划者，这一点清晰可见。在2月下旬那个泥泞的星期一，他出发镇压巫术指控之前，可能已经认为自己被诅咒了，他此前失去过土地、孩子、两份遗产和一头牛。他只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坐收渔翁之利。他憎恶那些无孔不入的托普斯菲尔德邻居。H. L. 门肯曾打趣道，清教徒的才能是“召唤巨大的法律力量去解决私仇”——这正是帕特南的杰作。与此同时，帕特南家中便多了一个可爱、敏锐、却在绝望抽搐的十二岁孩子。很快，他的妻子也神经错乱了。很难相信他一开始便有长期的策略。当然，他当面陈述和写作时都夸大事实，堆砌大量副词，在写给权威的信中也插入许多感叹号。他责怪至少三十五名嫌疑人，并作证指控十七人，誊写了一百多篇陈述。他还为他的女儿、默茜·刘易斯和玛丽·沃尔科特写证词。他的牧师认同他的世界观，但他的批评者们指责他“相信魔鬼的指控，随时准备翻脸无情”。在抽搐的女孩和讨伐权威的父母之间，很难说谁是谁的代理人。

抽搐证明巫术，但如何解读是法官说了算。一旦出庭，女性便退居其次，在某种程度上，她们开始时可能也是如此；巫术让男人能够借助妻子或女儿攻击其他男人。（有趣的是，没有人指控弗朗西斯·纳斯。）三位法官都遇到财政困境；帕特南2月的抱怨可能令他们有挫败感。哈桑做了很多事情，确保证据符合他的想法，把政治上的执着挂在

学问的晾衣绳上。几周后，不同的证据出现，女孩们开始讲述受折磨的亡妻。这些还魂者是新英格兰的又一首创。人们最害怕的紧跟着而来：野兽，以及狡猾、难对付的女人，她们会杀了他们。魅魔——爬上床来、令人窒息的女性——与时间本身一样古老，可见于不同文化。这一沉重的压力——毕肖普跳上那些男人的床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向我们诠释了何为“梦魇”。

牧师们还加上预示末日的言外之意，支持当时的局势，引出经验教训。在他们手中，巫术提供的是一个关于诱惑和救赎的熟悉故事。明明没有阴谋，他们偏要强加进去，但在人们真正地编织阴谋并利用他人身体时，他们因为无知而毫无作为。马萨诸塞的精英们观察眼前所见的所有东西，有些人观察得太过仔细。正如喜欢逻辑思辨的伊普斯维奇牧师约翰·怀斯所说，与其说这些人是学问的主宰者，倒不如说是受害者。

[28] 他们阅读并重读大量巫术文本。他们解析了法律条文。他们了解这些文本的历史。他们以纯粹理性的名义工作。他们可以沉溺于信息中，却没有能力处理之后的事情，如卡莱夫轻蔑道，“他们被教育毒害了”。

[29]

新英格兰越来越像瑞典，主要是因为科顿·马瑟的推动。 [30] 瑞典的巫术流行始于一个九岁和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它从恶作剧变成异端邪教——经由撒旦契约和女巫集会——到一个颠覆国家的狂热的恶魔阴谋。马瑟漏掉了另一个相似之处：当局塑造了这个故事，将流行的传说和当地的怨恨引入法庭，并携带政治和宗教的因素。马瑟选择不引进瑞典的细节——魔鬼的红胡子，高帽子外的亮色围巾，带性暗示的集会行为，运牛奶桶的猫，金色的女巫黄油——这些从来没有在马萨诸塞出现。不过，描述瑞典疫情时，马瑟确实触及另一种相似点。“这里并没有公共性的灾难，”他从那篇报告中引用道，“但是有些病人会让悲哀的天意为

自己服务，为了私利而利用它，就像小偷会趁着房子或镇子着火时尽情偷窃一样。”

他省略了那句话的其余部分，便肯定了谎言中的真相和谣言的有效性。人们因为有罪而被法庭审判，不管是不是现在犯的罪。如果要求塞勒姆村投票驱逐一人，他们无疑会选择莎拉·古德。很快，他们会将莎拉·奥斯本也赶走。提图芭是如何出现在最初名单上的，这点尚不清楚。她可能对女孩行使了一些不受欢迎的权力。她看起来与社区中几乎所有人都不同，那里还有其他奴隶，但印第安人很少。她的叙述似有魔力。起诉引起恐惧、悲伤和反感，这些是公共生活的软骨。谁还没有与邻居吵过架？1692年，有许多理由指控某人施用巫术，就像在纳粹占领法国的情况下谴责他人一样：嫉妒，不安全，怀有政治敌意，单相思，乃至天然的爱。不守规矩的家庭发现自己遭到针对，那些殴打妻子的人也是如此。有些人受到法庭审判纯粹因为拒绝参与诉讼进程。（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可能是丈夫犯罪的牺牲品。在初审时，她还有好几种方法解释帕里斯的外甥女为何会将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女孩们也没想到要作证指控她。）名声不好的人、爱管闲事的人、敏感易动怒的人，他们的遭遇都很悲惨。社区的支柱——治安官，陪审团成员，围栏检查员和他们的妻子，那些告诉人们他们不喜欢听什么的人也是如此。约翰·奥尔登与缅因的印第安人厮混，行事随心所欲，又从中获利；他在离开埃塞克斯县时便感到十分不安。巫术提供了一种根除所有恶意的手段。人们无法起诉受挫的意志或扭曲的自我。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讲述死去的动物和跳舞的干草来刺激法庭。

虽然人们的侮辱行为趋向一致，但指控几乎没有明显的模式。早在几代人之前，人们就因托普斯菲尔德的边界问题而发火；或在1679年时，帕特南家和布拉德伯里家也早有冲突；又或在1683年，伯勒斯放弃

了他的会众——这些都为1692年塞勒姆发生的事做了铺垫。盯着这些事的时间太长，就像爬下了兔子洞，意味着要向它们索取超出其能力的恶性事件。如果你在17世纪的塞勒姆度过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看到一些原本不一定存在的模式，比如特别惹人注意的暗杀狂，或者是站在翻新的波士顿厨房里的杰出牧师，或者，同样的，一位巫术案法官。

1692年被绞死的女性中，超过一半人有过被指控经历。丽贝卡·纳斯的母亲，玛丽·埃斯蒂的母亲，伊丽莎白·普罗克特的母亲和玛丽·英格利希的母亲都曾被传为女巫。塞缪尔·沃德韦尔的叔叔是贵格会成员；纳斯一家养大的孤儿后来加入了贵格会；奥尔登也和贵格会有关系。阿比盖尔·霍布斯年仅十四岁，却为出卖父母而高兴。尽管家族间的背叛早在1692年之前就出现，但霍布斯激发了这类情况，后来威拉德和怀尔兹一家也参与进来。在菲利普·英格利希和乔治·雅各布斯被指控前数周，两人的姐夫被选为塞勒姆镇行政委员；至于选举时产生的输家，也可能参与了针对两人的指控。随着危机的扩大，指名女巫的理由也越来越多。指控他人比反抗指控安全。在谴责中，内疚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谓乘虚而入。内疚感解释了为什么祈祷——以及“祈祷”这个词——会让人心烦意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害怕自己的影子。内疚感也可能会加重人们在安息日的痛苦，或因你当天下午在家（劳德在家遇见了会飞的猴子），或因你和一个令你不安的人狭路相逢（后来却盛装打扮，出现在你的床上），或因你听到了可怕的东西。

老安·帕特南为何指控丽贝卡·纳斯？是因为边界的土地纷争？因为她的丈夫反对帕里斯和詹姆斯·贝利？因为——虽然此事来得相对较晚——纳斯家族已经设法获得村里的大片土地？因为丽贝卡来自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和谐家庭？因为她在塞勒姆镇领取圣餐，占据了一个曾属于

帕特南家、老安却无法占据的村教堂座位？老安·帕特南因害怕受到传染而未去拜访牧师之女，如果她这么做了，会不会也受到指控？

恶意和诱惑是用无形的墨水写就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们的内心想法。每个人都紧张不安。巫术在一个混乱的时间将焦虑局部化，就像在20世纪50年代，原子弹战争助力了麦卡锡散布的谣言。即使那些知道自己无辜的人，也相信有一个恶魔阴谋正在进行。老安·帕特南之所以指控丽贝卡·纳斯，可能只是因为纳斯家风头正劲，而帕特南家却黯然失色？因为古尔奇小姐拥有镇上一半的财产，埃姆阿姨当着她的面不能表达对她的看法 [\[31\]](#)；然而，巫术容许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好女人说出心声。塞勒姆的男人也在抱怨，他们在床上被迫沉默、窒息、瘫痪——也正是他们，在作证时说出最荒诞的故事。 [\[32\]](#)

如果你把怀疑论者、离经叛道者、女巫之女、施虐者和恶棍、暴发户和过度享受优待的人都排除掉，那就剩下乔治·伯勒斯。 [\[33\]](#) 五名被绞死的男子——狱中的男性都被处死——大多数与女巫有关。伯勒斯走得最远，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家里没有其他成员被指控。在马瑟家和在帕特南的农场，都萦绕着对他特殊的仇恨。伯勒斯牧师的罪行是什么？他没有阻止任何人的财产继承行为。他没有干涉任何人的土地纠纷。他和任何一位女性嫌犯都没有交集。帕特南家长期以来一直怨恨他，因为他取代了他们姐夫在讲坛上的位置。牧师很难与人相处，作为客人时守口如瓶、不拘小节，过错无多却遭到过重的惩罚。作证指控他的人最多。他们的理由各异。马瑟声称他被专门要求在《无形世界的奇迹》一书中提及伯勒斯。他很乐于这么做，笔下充满了厌恶感。休厄尔也不会原谅伯勒斯，因为他侥幸存活，而缅因唯一的任命牧师，即休厄尔的堂兄弟，却没能活下来。

哈桑有理由不喜欢伯勒斯——伯勒斯是他的前姐夫，在另一个层面上也算是个危险人物。正是因为伯勒斯这样的拓荒者，才使得马萨诸塞社区毫无防备。他的英雄事迹曾在法庭被提及，但法官们没有做出任何评价，可能还是把自己的失败算到了伯勒斯的头上。1690年他们从缅因撤出民兵；结果，卡斯科付之一炬。有人建议，在伯勒斯被起诉时，法官借此免除自己的罪责。1691年，伯勒斯曾恳求边防部队和一位司令的援助。在记录之外，他毫无疑问有更多要说。与后安德罗斯政权相比，自治领更好地保护了缅因。在人们叛变的几个星期内，边界被部队舍弃，惨遭印第安人蹂躏；此处的居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给了狼。伯勒斯对待宗教事务似乎很松散，但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反叛因子。他有理由为安德罗斯政权感到惋惜。如果他提出了批评，也会相应做出行动。在他死后，他被说成是可怕的浸礼会成员，这是毫无根据的，就像人们说提图芭是黑人一样。在突然离开教区居民前，他很可能已经表达对他们的不满，教民们自然期待报复。

于所有人而言，有个性的人都很惨。那些挑战法官的人均被绞死，哪怕他们没有蔑视权威。只有一个例外，即那些承认的人。（关于这点，新英格兰不仅与瑞典有区别，也偏离了其他的所有巫术审判。）五十多人错误地认罪，有些人纯粹是为了活命。但是，当你一个眼神便能击倒一个孩子时，你便不难相信你有巨大的力量。某些东西藏在内心的某个地方，即便你从中挖出的并不是巫术。有时候，挖出来的只是沉重感，一种对自己将无法接近信仰的担忧。那便是某人或某事挡了你的信仰之道。“魔鬼的阴谋，”1695年，科顿·马瑟说，“就是吓你，让你把自己想得很坏。”罪恶感和与恶魔勾结之间并无区别。

原告们在流言蜚语中抓住了那些名字：所谓的女巫，牧师的家人，女儿遭到野蛮杀害的妇女。[大人帮助了她们。正如1684年英克里斯·马

瑟所说：“很明显，（女孩们）对某些人的特殊憎恶来源于父母的想象。”]安多弗遭难的部分原因是该镇自身的紧张局势。它正处于一分为二的边缘；在这个过度生长、土地紧张的社会，冲突在几代人间延续。但是，只要城镇里拥有一个支持触摸测试的牧师，那该城镇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当巫术蔓延到安多弗时，法官已经改进了寻找巫术的方法。尽管酷刑更易于产生预想的答案，但供认并不需要酷刑。有人因为无须和伯勒斯共处一个地牢而松了一口气；有人则很高兴能够避免公共审判，因为那无异于羞辱。许多人只是想取悦当局。从之后索取赔偿的语气可以看出，村民们显然相当尊重当局。约翰·黑尔也有同感，就像他所说的：“我对年长、博学和明智的人的尊重，让我对他们的行为准则也深信不疑。”

治安官也可以让你相信关于你自己的假话。有了一个易受他人影响的证人和一位权威人士，记忆被移植和重写也并非什么新鲜事。在“正确”的大人掌控下，一个孩子会发誓保姆屠宰了兔子、大象、长颈鹿，或者“当他飞去看望祖母时将他变成一只老鼠”。在17世纪的监狱里，所有人辗转难眠；缺乏睡眠亦能产生幻觉。安·福斯特是从哪里找到她梦幻般飞行的细节的？对三位善于辞令、衣冠楚楚的男性法官，她反复使用熟悉的意象。即使1692年前，马萨诸塞没有女巫飞过，恶魔洗礼也从未出现，可它们听起来却是那么可信。至于从飞行中坠落的说法，是什么样的恐惧侵扰着飞行者？福斯特甚至可能不知道在瑞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者被告知此事。她不需要伪装腿疼。七十二岁的新英格兰农场女人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分裂塞勒姆的不是指控，而是定罪。在其他时候，胡言乱语的妇女也曾被称为女巫，男人也会梦见魔鬼，但没人当真。为什么在1692年，起诉便如此不留情面呢？马瑟暗示，是格洛弗案发挥了作用，这位洗衣

女工向所有人展示了她的法术。巫术案法院更善于执行命令，而非制定命令；他们很容易屈服于更强大的意志。哈桑，科温和格德尼——主要的鼓动者——为了正统的利益行事，而这恰好与他们的个人想法一致。多年来，他们已经多次被召唤到塞勒姆村居中调停，知道何人热衷于制造麻烦。“无情的表达和不恰当的想法”与“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仇恨”发酵为巫术，而他们支持这种转化。帕里斯、诺伊斯、巴纳德和黑尔都是热切的支持者。所有的迹象表明他们一直受到威廉·斯托顿的支配，后者是大他们一辈的长辈，几乎可以当小马瑟的父亲。

如果理解了斯托顿十多年来在政治上都是墙头草，在巫术方面却立场坚定，我们便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塞勒姆的巫术之谜。没有相关文件存留下来；相比福斯特飞去参加撒旦集会，他的冥顽不灵更难让人理解。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遵循各自的信仰。斯托顿认可幽灵证据，而非法律观点；他脱离了一切先例。在匆忙地重新安排政治上忠诚的人手后，他选择并坚持自己的立场。诸事皆有因果。有了坚实的后盾，斯托顿用紧握的拳头回应质疑。他知道被打入冷宫的滋味。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状态。 [34] 与其他两名巫术案法官一起，斯托顿与“外来梦魇”，即自治领统治阶层，积极合作。 [35] 这是一个让他们恢复名誉的机会，通过消除一个新的入侵者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现在是正义的执法者，提高了“对抗地狱敌人的标准”。斯托顿是唯一能轻易地减缓或扭转塞勒姆事态的人，但他选择不这样做。到了1693年，他还是跟在1692年一样坚信幽灵证据，至少他自己声称如此。他在一个时常缺席、为人软弱的总督手下工作，后者对审判几乎没有兴趣。在菲普斯上任前，斯托顿从哈桑处接手时，局面已经失控，新任总督自己也无意参与。之后——就像5月那篇只读了一半的委任状一样——他摸索着，试图向马萨诸塞证明他的虔诚，向伦敦证明他的能力。

斯托顿不仅努力证明他的坚定，而且也是在证明新政府的合法性。他像其他人一样知道，对于英国王室而言，这个殖民地看起来很松散，无礼且无序。他们偏离英国的法律，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起诉女巫时，他在英国也完成了自赎，将新英格兰的事迹传播海外；殖民地人民可以用旧世界的有序方式来管理自己。毕竟，他们不是不负责任的暴脾气青少年。他们的起诉对象是颠覆分子。他们可以展示给那些英国官员看，后者曾嘲笑马萨诸塞没有法律、法官、法庭，甚至没有政府。危机给许多人——巴纳德，诺伊斯，科顿·马瑟，几个少女，许多马萨诸塞权威人士，殖民地本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高兴地提醒并展现给长辈看，正如国王向新英格兰保证的那样，他们只因别人的恩典和恩惠才存在。^[36] 给予他们的也可以被拿走，这句话钉在青少年脑中的黑板上。

新特许状重新构建了司法制度，安德罗斯曾经将其歪曲，新政府却对其十分依赖。殖民地仍然受到那些“野蛮的习俗”影响。斯托顿可能在着手证明，新英格兰不像被罢免的前总督所嘲笑的那样，是“一个无人理解，也很少有人费心理解（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英国法律或方法的地方”。他们还携带着大量公民不服从的名声，这些必须被甩掉和抹去。大量愤怒的民意还在发挥作用，而曾经推翻专制的男人无意面对暴民。正如1689年一位被驱逐的自治领官员发出的警告，那些推翻安德罗斯的人，“就像年轻的魔法师，激怒了一个无法控制的魔鬼”。事实上，新英格兰神职人员早已宣扬了那个难对付的入侵者的事迹，他身着红衣，怀着邪恶的阴谋，曾有人听到他嘲笑清教徒“是一群只适合从地球表面被斩草除根的人”。神职人员还将魔鬼事迹套用于巫师团体上，意图证实一种“令人厌恶、兴许前无古人的魔鬼崇拜现象”。他们原本无须

虚构这个故事，可他们还亲自参与其中。审判可使他们消除自身的污点。

神职人员可以阻止，但作用不大。众所周知，正是他们大力宣扬针对前任政府的煽动性言论，激发了叛乱。但是，他们这次不能破坏由自己指定的政府，这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为法庭辩护，就是维护新特许状；他们不仅试图向波士顿证明自己，也是在向伦敦证明，马瑟的《无形世界的奇迹》便是以此为目标。三年的无政府状态和五年的自治领统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法官们还是他们的赞助人，支付他们工资。像其他人一样，牧师们就这样钻进了危机的牛角尖。不过，巫术也让他们得以证明上帝是对新英格兰有特殊偏好的。如果撒旦如此破坏，那么此地一定非常重要！这场对塞勒姆的袭击，让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能在大规模混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它也实现了一个预言：在被大肆宣传的千禧年的宁静前，暴风雨即将来临，这是与魔鬼的最后一次摊牌。

在1692年他所有斋戒的日子里，在他所有针对幽灵证据、酷刑和触摸测试的警告中，在他所有束手无策的时候，科顿·马瑟都不觉得这场邪恶天使的袭击会不受欢迎。在一份1693年不应被公开的文件中，他提供了可能是他对这件事情最真实的评价——也是最可恶的评价。马瑟反复斟酌，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这段陈述也被反复涂改。塞勒姆的巫术到底造成了什么？没有重要人物因此而受到损害。“生动的地狱场景”唤醒了许多灵魂——特别是年轻人的灵魂，无论男女。马瑟知道灾难确实影响教会；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这有点像一场地震。“魔鬼没有得到任何东西，”马瑟在考量这场危机时推理道，“但上帝得到赞美，耶稣得到臣民，圣灵得到圣殿，教会得到增援，人的灵魂得到永恒的裨益。”他颠倒了自己在其中的立场，有点洋洋得意：“谦虚地说，我的智慧和美德为恢复秩序做出了贡献，不过我倒不敢说，我没有造成妨

碍。”未能阻止审判的负罪感已经烟消云散。他只谴责一种无法容忍的不公行为：人们对他的声誉的攻击。

《良心之案》、纽约牧师的建议、玛丽·埃斯蒂的请愿书、贾尔斯·科里可怕的死亡，可能都推动了巫术之火的熄灭。但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恐惧还是袭向权威人士的家门。在它到来的那一刻，巫术案便已成往事。（怀疑论者罗伯特·卡莱夫赞颂了那些针对菲普斯夫人的指控者。）过错责任无法归于一人，因为参与者实在太多。人们的困惑让步于屈辱感。很难说有谁真正听了托马斯·布拉特尔明智但不受欢迎的发言；可到了10月份，许多人开始重提（或编造）这位二十五岁年轻人的冒犯言辞，以指责其他人的妄想。自从被坚实地构建起来后，巫术便吸引了每一点闪现的恼火、恐惧、怨恨、怪癖和挑衅；在埃塞克斯县，厌恶和憎恨弥漫在社会中，和肮脏的狗和猎食的猪一样多。社区变成了唱诗班，在空气中挥舞着手杖、轻剑和权杖，共同编造怪事和传说，人们散布谣言、收回言论又无中生有，连飞蛾飞过镇会堂都会为之惊奇。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理由。

讽刺的是，清教徒来到新世界是为躲避那些干预民权的权威，自己却在殖民地丧失目标，纵容对彼此的虐待，忘了这是自己曾经强烈反对的王室成员的行为。同样的还有对信仰的拥护，这本意味着对教会的支持，却将其不可逆转地分裂；奇迹故事被特意收集来证明新英格兰的特殊地位，最终却损害了新英格兰。政治干预超越了其他所有事，促成《显赫的天意》和《难忘的天意》的出版。马瑟对巫术的记录，与他和菲普斯的关系息息相关；权威人士们相信自己保护了一个刚刚起步的政府。他们已经感染了一种自身免疫性紊乱疾病，他们万分恐惧的怒火正是疾病的源头。1692年没有凶手，也没有后果。犯罪现场只留下一个卑鄙的超自然形象。^[37] 此人在塞勒姆确实解决了一个谜：的确，魔鬼需

要与有意识的人类勾结才能行恶。

实际上，巫术促成了堕落而懒散的一代人，尽管这不符合神职人员的预测。当咒语失效时，指责的洪流冲走了信仰的富饶土壤。马萨诸塞的领导者再也不会向教会寻求建议。揭露女巫集会或飞行事故的额外暗示也不再出现。至于幽灵似的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到了1698年，这些精心打扮的入侵者都被视为撒旦的代理人，“恶魔扮成身佩武器的印第安人和法国人”。在埃塞克斯县，哪怕是头脑最聪明的人，仍然相信他们和巫术有某种牵连。他们永远没再出现，不知不觉地消失，就像你孩提时在书中读到的场景，印象深刻却再也无从寻回。

[1] 就其持久性而言，巫术指控类似网络谣言。大多数被处以绞刑的女人之前就被指控过，或者她们的母亲曾出于各种原因被指控过。1692年，那些不可磨灭的污点让原告有了指控她们的理由。

[2] 正常的生活有时以不同寻常的形式出现。伯勒斯牧师被绞死的十一个月后，他的遗孀再婚了。科顿·马瑟主持了仪式，尽管数月前，他赌咒说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伯勒斯的名字。

[3] 除了村民之外，还有人相信销毁文件就能改变历史。1676年，印第安人发动突袭，偷走安多弗的地契，指望这样做就能把英国人赶回家。

[4] 1765年8月26日，一群暴民劫掠了马萨诸塞最后一任王家总督托马斯·哈金森的宅邸，将门一分为二，把他的书丢到街上。据悉，庭审记录就是在那天消失不见的。如果那些记录真的以落入泥淖而消失，那么便是最大的讽刺：正是《印花税法》引发了暴动。为了给驻留美洲的英国部队支付薪水，英格兰决定对官方文件征税，也是为了抵消对法

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开销。殖民地人民对英军的存在持续抵抗；而这并非出于任何外国敌人的影响。他们不需要那些管得太多的父式权威。无论如何，审判记录从此再无踪影。

[5] 在怀孕的最后几周，玛丽亚·马瑟在门廊上撞见一个可怕的鬼影，大大受惊；刚刚折磨波士顿女孩的幽灵应该对此负责。玛丽亚分娩后，英克里斯·马瑟立即收到一封恶毒的来信，信中的女人——可能曾在1692年受到指控——警告科顿“不知道还有什么将会迅速降临到他的子孙后代头上”。总之，写信者又是莎拉·古德。

[6] 这场葬礼远比伯勒斯生前为前妻办的那场还隆重，为此帕里斯花了很多钱。和伯勒斯一样，帕里斯还债很慢。

[7] 莫尔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他的妻子曾作证指控毕肖普，因为他们相信她是女巫。6月，在毕肖普的绞刑中，莫尔宣布狱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巫师。

[8] 自然而然地，1697年，莫尔开始写《新英格兰的迫害者被自己的武器伤害》（New England Persecutors Mauled with Their Own Weapons），内容是他入狱和接受审判的经过。就迫害方式而言，他将马萨诸塞的权威人士与耶稣会教徒、僧侣和修士相比。他们行魔鬼之道，仰仗着劫掠的财产，像帝王一样生活。他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正是由于1692年那样的罪行，后来上帝将新英格兰交给野蛮的印第安人处置。

[9] “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10] 在那一年休厄尔所经历的“一再打击”中，包括十五岁的贝

蒂·休厄尔的精神崩溃。数周之前，自称恶棍的贝蒂泪如泉涌，几乎无法读书。1月14日那天，她刚从塞勒姆返回，坐在过道里的父亲的对面。

[11] 在所有男性受害者中，只有伯勒斯的财产逃过一劫。倒是伯勒斯夫人带走了一部分。

[12] 他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出力。“可是为何，”他后来寻思，“我倾尽心血，忍受持续不断的痛苦，只为将受难者从地狱虎狼的魔爪中救出，我潜心研究，只为挫败恶魔扰乱人心的阴谋，而在此之后，我却必须道歉？”他没有道歉，而是醉心于“筚路蓝缕，艰难翻越蛇鼠遍地的嶙峋高山”，为此他没有得到一句感谢。他只后悔一件事：他不应该邀请那么多观众参观波士顿被折磨的女孩的“闹鬼的房间”。

[13] 他越思虑此事，对抗魔鬼的决心便越坚定。自然而然，他又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为读者列出一份圣约，供他们签名。他计划每周分发此书，以求有所教益。将一本书递给毫不怀疑的读者并要求他们签名——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效仿撒旦。

[14] 仅有的留存之一来自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1699年，他将斯托顿归为“只热衷于个人利益”的人。任何放弃神职转而从事世俗事务的人，温思罗普怒道，都是贪婪、贪心、不可信的。

[15] 按照斯托顿1701年的遗愿，威廉·斯托顿基金会（William Stoughton Fund）每年都会资助几名哈佛学生。

[16] 维格尔斯沃思在整场危机中一直保持沉默，尽管在1693年，叛逃的塞勒姆村民向他表达了对牧师的批评。维格尔斯沃思支持他们的诉求。在帕里斯离任前他签署了一封信，坚持帕里斯离开一整年。

[\[17\]](#) 钱的去向并不清晰。1694年，斯托顿小心地豁免了科温和其继承人的责任，保护他们不受赔偿索求的困扰。科温明显没有让贫穷的副治安官赫里克分一杯羹。

[\[18\]](#) 甚至科顿·马瑟也突然改变态度，他知道这会引起困惑。塞勒姆巫术案过去几年后，他向岳父承认“人们把那些人称为巫师，其实更合适的说法是‘被附身的人’”。因此，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证人。

[\[19\]](#) 弗洛伊德在所作的《梦的解析》引用过维吉尔，这句话特别适合塞勒姆，它出自朱诺口中：“即使我不能震撼神明，我也要搅动冥界。”

[\[20\]](#) 1695年，在那个湿热难耐的下午，塞缪尔·威拉德也在休厄尔家近半被毁的厨房里。十一年后，他为本杰明·富兰克林施洗，后者破解了闪电之谜。

[\[21\]](#) 吸血鬼不仅存在于青少年的想象中。1689年，一名自治领官员向负责贸易的领主汇报恶行时，声称印第安人对殖民者展开血腥的攻击，“杀了五百人，缓慢烧死八十多个可怜的基督教徒，然后喝了他们温暖的血，有时还吃他们的肉，把他们嗷嗷待哺的婴孩留在俘虏冒血的血管边”。

[\[22\]](#) 亨利·杰基尔和爱德华·海德出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分别是一个人的不同人格，前者代表善良，后者则代表邪恶。

[\[23\]](#) 17世纪，一位聪明的英国医生注意到，发疯的病人想象中饮血吃肉的侵略者与巫师所熟悉的事物之间互有关联。他们眼中的邪恶之物都是有翼生物、小鼠、大鼠和狗。马瑟将1693年冲向玛格丽特·鲁尔

枕头的小恶魔与老鼠做了比较。

[24] 指出生于俄国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夏卡尔，他的画作风格迷幻、诡异，充满幻想因素。

[25] 卡莱夫的观点是，当这些塞勒姆女孩的家庭支持她们猎巫时，“其他年轻人开始抽搐，看到幽灵，就再正常不过了”。

[26] “这些祷告会大概是我们唯一的娱乐。”20世纪，一名磨坊工人抱怨道。对他而言，只有宗教——以及宗教狂热——允许表达自我。

[27] “我为人邪恶，但从没想到像你这样的小姑娘可以溶化我，结束我的邪恶行为。”魔法坏女巫冲桃乐茜咆哮道，融化了。（此条注释为《绿野仙踪》的情节——编者注）

[28] 就像人们对马瑟不朽的新英格兰史《玛格诺拉》所评价的那样，如果他的图书馆再小点，这本书就会更好点。

[29] 卡莱夫和马瑟相互攻讦，讥笑对方是那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卡莱夫说马萨诸塞的牧师应该看了太多荷马、维吉尔、霍拉斯和奥维德的寓言故事。布拉特尔批判哈佛课程太过重视希腊和罗马的神话。

[30] 他的父亲帮了忙。在《良心之案》中，英克里斯·马瑟认为“恶魔得以到来，并通过空气，将人从数里外的居所狂暴地掳走，是不寻常的。然而，大约二十年前，经由一群该受天谴的女巫，这样的事在瑞典发生了”。

[31] 古尔奇小姐和埃姆阿姨均为《绿野仙踪》的人物。

[\[32\]](#) 在审判过程中，几项明显的性别差异显现出来。男性编造的故事更加精巧。他们很少看见多数为女性的鬼魂。男性普遍对一长串的古怪事无动于衷。女性则会幻想更多，或至少更加频繁地指出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形象，后者会残暴地把自己的肠子扯出。男性在相互指控时显得更加为难，女性则表现得更加坦率（此处有争议）。玛丽·埃斯蒂请求放其他人一条生路。约翰·普罗克特则没有。女性既没有牵连丈夫，也没有抛弃故友。但是男性获得更多关注。休厄尔在日记中提到了被怀疑或被定罪的男巫；布拉特尔挑了两名男性参与行刑巡游，因为他们高贵的身份。

[\[33\]](#) 最后，只有三名塞勒姆村民被绞死。最初的契约签署人中，无人受到指控。

[\[34\]](#) 他名声狼藉的政治盟友约瑟夫·达德利正是个反例。“他们看待我，”1692年2月，达德利向一名英国通信者解释道，“好像我是森林里的一只奇怪生物。”格德尼也曾因亲英立场，被人投以“强烈的不屑和鄙视”，并被踢出了政府。

[\[35\]](#) 威廉·巴克将他与魔鬼颠倒黑白的契约追溯到政变那年。阿比盖尔·霍布斯暗示了同样的日期，不过她还提供了好几个时间点。魔鬼契约的时间长度——一般是六到八年——和一般契约协议的时间长度之间也有一种奇妙的、也许完全是巧合的相似。

[\[36\]](#) 主要指控者的年龄中位数是十七岁。如果将三十六岁的老安·帕特南包括在内，那么被绞死的十九人中，其中十六人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其余三人的出生日期未知）。

[\[37\]](#) 数年后，在霍桑的书中，我们还能看到魔鬼强人所难的暗

示。正如手执扭曲拐杖的行者对古德曼·布朗说的：“新英格兰这一带
我认识的人可多啦，好多教堂执事跟我共饮过圣餐酒，好多行政委员选
过我当主席。议会和法庭里多数人都坚决支持我的利益，总督和我也
——但这些都是国家机密。” [这里指的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
《年轻的古德曼·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手执扭曲拐杖的
行者指的是魔鬼。——编者注]

第十二章 一连串的悲惨后果

人们追错了兔子。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1\]](#)

差不多一半受害的女孩长大成人、嫁了人、有了孩子，不过有人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贝蒂·帕里斯结婚很晚，在康科德照料家庭。没人知道她的表姐妹阿比盖尔的后续，她可曾是充满激情的女巫猎人。据说，她可能在1697年被“恶魔折磨至死”，死时还保持单身。和安·帕特南一样，苏珊娜·谢尔登也没有结婚，这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非常罕见。她最终在罗得岛被指责为“名声邪恶的人”，这种遭遇较为常见。贝蒂·哈伯德直到三十六岁时才找到丈夫。莎拉·丘吉尔，雅各布斯家的女仆，在四十二岁结婚，早些时候还因通奸被罚款。默茜·刘易斯，帕特南家的女仆，有了一个私生子；她后来结婚，搬到了波士顿。玛丽·沃尔科特、阿比盖尔·霍布斯和小玛丽·莱西皆以传统的方式抚育家庭，其中几个就在当地生活。对于所有离经叛道的行为，至少有一些村里的女孩已经和受折磨的古德温家姑娘一样，在成年后被描述为“非常清醒、品德优良的女人”，而且从未有一刻否认自己曾目睹巫术。

牧师们的遭遇就没有那么好了。曾将老安·帕特南带到塞勒姆村的詹姆斯·贝利，在罗克斯伯里陷入了困境。塞缪尔·休厄尔去拜访过他，带着蛋糕、柴火钱和用处不大的诺伊斯牧师经文。贝利罹患胸膜炎，1707年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德奥达特·罗森曾留下了对塞勒姆的尖叫和牙印的最为深刻的记述，后来回到了英国。他磨蹭了一阵，在1704年重新出版了巫术案记录，以解除人们对他的朋友们的指责，再次坚称

有“黑暗力量的操控”。他是第一个尝试弄清楚巫术灾祸的人，亦是传播其记录的人，1963年幸存的达拉斯特勤处特工还在兜售。不久之后，罗森承认自己的一项不检点行为，并为此向伦敦政府致以郑重歉意。他承认自己以“不公平和不谨慎的言辞”侮辱了他的职业。他斗争了好几年，试图洗刷污名。这项不检点行为可能与哗众取宠的巫术案声明无关；他可能只是饮酒过度。不过，他一向言辞大意，在1692年时便已如此。到1714年，他生活赤贫，家人食不果腹，三个孩子感染天花，妻子也日渐衰弱。他试图通过一系列布道来募资，但遭遇失败，只得栖身于朋友的怜悯下。如果没有救济，他警告说：“我们便会不可避免地死去。”他被铭记为“不快乐的德奥达特·罗森先生”。

塞缪尔·帕里斯再婚，成为第二个家庭的父亲。他始终被任期内的“困难和动乱”困扰，于是云游四方，在十二年里去了六个社区。他在学校教书，饲养牲畜，出售织物和杂物，在马萨诸塞最小的定居点传道，还参与土地投资。在一次交易中，他因雄心太大而失败；1706年因欠债被捕，在坎布里奇监狱里度过几周。帕里斯反复地重写遗嘱，六十七岁时死在萨德伯里，死前还有些资产，尽管他一直认为世界欺骗了他。即便他在“非常严重的谴责和谦卑的天意”上还发表了点什么，也没有存留下来。他的财产不包括他早前卖掉的塞勒姆牧场。

塞勒姆村选择的继任者只有帕里斯一半大，是一位新近就职的牧师。他叫约瑟夫·格林，是坎布里奇本地人，1692年时人在哈佛学院；他很清楚他搬进去的牧师住宅的特别历史，同时他也带着一个印第安奴隶。他的性格更加温和，接手了一群改过自新的教民。他欢迎提出异议的兄弟们回来，并重新安排镇会堂的座位，将纳斯一家和帕特南一家安排在一起，让丽贝卡·纳斯的一个女儿坐在老安·帕特南旁边，她们可能正是在那里一同聆听小安·帕特南于1706年的道歉。虽然很多人反对，

格林还是推翻了将玛莎·科里逐出教会的判决。^[2] 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是让教民们相信，他们新的镇会堂里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他们搬到了中央大街和霍巴特街的交界处，那里也是丹弗斯第一教堂今天所在的位置。老会堂的木材无人照管，随之腐烂，不过不会很快。关闭会堂是种逃避；伯勒斯的孩子到了1750年仍在要求赔偿。在塞勒姆女巫事件的十年后，格林布道反对算命。教区居民仍会在座位上睡觉。帕特南家则仍对塞勒姆村的讲道怨言不断。

1704年，一名游客指出马萨诸塞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人们上床睡觉时”浑然不知，“但是可能会在翌日晨光洒下之前，就被无情的野蛮人夺去生命”。1706年，休厄尔从有关法国人的噩梦中醒来。那一年，马瑟差点在安多弗郊外迎面撞上劫掠的印第安人；差不多同时，他的一个侄女消失，被印第安人囚禁了。当关于邪恶天使的讨论平息时，天启却仍在逼近。马瑟预测它将发生在1715年。休厄尔和诺伊斯仍就《启示录》的文字片段而激烈争辩。科顿·马瑟向伦敦的王家学会发出警示，在康涅狄格布兰福德的岩石上出现了长六英尺、有分叉尾巴的男性人鱼。在18世纪30年代初，波士顿神职人员介入，出手修复在塞勒姆镇教民之中涌现并盛行的“邪恶的、非基督教的分裂和争斗”，他们的牧师像帕里斯一样“难以平静”。

这些审判并没有颠覆教会，但——在新特许状的支撑下，再加上某些力量的运作——确实侵蚀了教会的基础。清教正统尝试证明一件事，反而证明了另一件事。忏悔的想法本身已经受到污染。马瑟曾警告说，上帝差遣恶魔“堵上不忠诚者的嘴巴”；但毫无疑问，罗伯特·卡莱夫指出，那些邪恶天使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无神论者。黑尔不是唯一一个更严格地审视自身原则的人。在塞勒姆女巫事件发生的十年后，新的马萨诸塞总督宣誓就职，他遵循了亲吻《圣经》的英国国教传统仪式。马瑟任

命浸礼会牧师。休厄尔一直活到见证人们庆祝圣诞节。^[3] 1692年以前没有飞行，以后也不会再有。直到18世纪，人们还在相互指控对方施用巫术，但马萨诸塞没有再处死一个女巫。^[4]

所有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无论是道歉还是未道歉。英克里斯·马瑟从研究恶魔转向研究天使。1721年，波士顿天花疫情肆虐。科顿·马瑟面向整个医疗机构，倡导一种看上去和幽灵证据同样可疑的方法：预防接种。他在哈佛学院学过医学，非常了解传染病。从恶魔和巫婆转到细菌和病毒，他终于找到了占据人们呼吸的魔鬼。这场战斗变得非常激烈，迫使塞勒姆无处躲藏，也让马瑟受到两方面的抨击，人们都指责他精神失常。（这也让他有机会把魔鬼拖回到舞台上。鉴于“大量的诅咒声”，撒旦似乎占领了波士顿。）他在巫术问题上模棱两可，在疫苗问题上却坚定不移。某日凌晨3点，一颗自制炸弹飞进了他的窗户。他的名声再未恢复。^[5]

审判造成的伤亡，比当时明确的伤亡更多；魔鬼自己也没能恢复过来。虽然魔鬼仍然存在——1721年，如果你在马萨诸塞与人通奸，便是“被魔鬼煽动的”——以“咆哮的狮子，古老的龙，一切正义的敌人”的形式（正如帕里斯道歉时所说的那样），但邪恶势力还是逐渐消退了。当邪恶收缩到内心时，恶魔变得越来越抽象，不再是阴谋的大师，只不过是错误判断的阴影。贝蒂·帕里斯的一生走到尽头时，恶魔更像是“一个调皮的小妖精，而非地狱大师”，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那样。塞勒姆事件之后，女性的遭遇也颇为多舛，至少是回到了隐身状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她们便一直如此，直到另一场不同的灾难降临，引起她们发声要求选举权和废除禁令。

1728年，马瑟去世，梅德福德的牧师把巫术写成了童话故事。塞勒

姆自身也几乎准备好了变成一个童话，不断被改写和重新讲述。与此同时，休厄尔辞去了首席大法官的职务。之后他又活了两年，一如既往地喜欢鸟鸣和彩虹，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马萨诸塞的特许状，为了达成一致，他最终牺牲了自己的良知。1728年，托普斯菲尔德和塞勒姆解决了边界争端。玛莎·卡里尔的丈夫活到了一百零九岁，在去世前满意地看到，塞勒姆巫术已经成为“假想的巫术”，罪魁祸首不再是他的妻子——地狱王后，甚至不再是她所谓的“同伙”。巫术让步于附身，在18世纪中叶，又被说成了欺诈。仅仅又过了几十年，人们就能理解布拉特尔的言论：女巫更应该成为原告，当局其实处于癫狂状态。

在大量未被当成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中，巫术审判在一两代人之后被重新提及。它们一旦闪现，便拒绝再被埋没。在所有的征兆和预言中——来自于能看见幻象的女孩、自夸的幽灵、马瑟父子和预言第二场巫术风暴的塞勒姆女性——只有托马斯·布拉特尔的话成真了。岁月不会“磨灭耻辱，以及耻辱留在我们土地上的污点”。^[6] 约翰·亚当斯将审判列为“这个国家丑恶的污点”，讽刺了原本旨在净化的诉讼进程。1773年，由三便士茶税引发的暴怒^[7]，对当时一位马萨诸塞的律师来说十分荒谬，“而且此事更加可耻，对美国历史更甚于巫术”。19世纪下半叶，塞勒姆的事情尤其好被利用；当南北方对立的时候，它成了一块有效的弹片。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发出疑问：人们对奴隶制的信仰和对巫术的信仰有何区别？有人辩称，废除奴隶制与塞勒姆巫术一样都是幻觉。1860年的大选，林肯获胜，蓄奴的南方笼罩在恐惧之中，一本流行杂志甚至宣称：“北方，最开始焚烧女巫，也终将焚烧我们！”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如果你想煽动情绪，就提起塞勒姆。

新英格兰的敌人竭尽所能，不让塞勒姆被遗忘，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教会也一直在维持着魔鬼的说法。南方在19世纪开始意识到，梅森

——迪克森线以北“那些偏执、爱搞恶作剧、自诩为启蒙者”、编写教科书的人，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需要对此做点什么，而塞勒姆的失足帮助他们重塑了新英格兰的过去。在内战期间，林肯总统正式创立了感恩节，人们喜欢清教移民的宴席胜过清教徒的斋戒 ^[8]。而在数十年前，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普利茅斯岩发表了演说，他称那些没有迫害女巫的人或留下书面记录的人——或未留下任何痕迹的人——为“纯正的”美国人。清教移民无可指责，哪怕有点乏味，但比那群易怒、心胸狭窄、来自城市上流阶层的女巫猎人更适合成为祖先。过了一个世纪左右，他们取代了狂热的表亲。

事实证明，过去的污点是非常有用的；塞勒姆不仅作为一个隐喻存在，还成了人们的疫苗兼笑柄。当恐惧击溃理智，当我们反应过度或矫枉过正时，当我们抓捕或交出外来者和煽动者时，塞勒姆都会瞪视我们。它存在于教训和言语中。在18世纪80年代，北部联邦主义者被其反对者指责发起“可憎和邪恶的阴谋”，妄图恢复君主制。光明会的反对者发出警告，声称耶稣会教徒图谋不轨，天主教的蛇已经盘绕四周，其政治用心也非常险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他们在1835年警告称，“不然我们会失败。”1951年，法官在对罗森伯格的间谍行为判刑时，称其为“摧毁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的恶魔阴谋”。相互勾连的颠覆分子、日夜不休的警惕、国家的瞭望塔和无情的暴行，在1954年的麦卡锡听证会上统统回归。1998年，人们只花了很少时间，便将琳达·特里普变成了爱管闲事的清教徒邻居，将肯·斯塔尔变成了女巫猎人。 ^[9]

英国君主却继续密谋——或看起来是这样——对付人民。17世纪的马萨诸塞当局经常听起来像开国之父的替身，这并不奇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开始觉得对上帝的顺从并不意味着对君主的忠诚；他们对民族精神的主要贡献是对权威的厌恶，而非对民主的热爱。正如约翰·

亚当斯所见，马萨诸塞接受英克里斯·马瑟1691年的特许状时所做出的妥协，超过了控诉女巫。同样的违抗，同样的忧虑（为了某种神圣目的而感到忧虑，这也造成审判），最终触发了一场革命，这是由地界、税率和非法入侵共同逼迫出来的产物。[\[10\]](#)

宗教教义、反对邪恶的圣战和对正义的狂热，在塞勒姆联合作战，它们在美国政治中也以偏执的风格出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偶尔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国家瘟热描述为“夸张、可疑和阴谋的幻想”，这同样适用于1692年的埃塞克斯县。那种末日即将来临的专制主义压力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马萨诸塞流传着天主教徒的荒谬故事，有些被英国官员记录在案。“在此地和纽约之间找不到两个罗马天主教教徒。”1689年，一名被监禁的安德罗斯部下轻蔑地说道；至于针对新英格兰的其他阴谋，在他看来皆为妄想，“虚假，而格外可笑”。但它们也很可能是真实的。面对异教徒敌人，我们常常会沦为牺牲品；在多事之秋，我们自然而然地寻找叛徒、恐怖分子和秘密间谍。虽然是在我们的想象中，这件事也并不全然是虚构的。一点妄想症甚至可能是有益的，虽然有时候，当你预感会有一场冰雹来临时，它的确会诡异地砸到你头上。

和弗朗西斯·丹恩一样，许多美国人为此感到惊讶：他们发现自己居然与巫师有关。乔治·雅各布斯、苏珊娜·马丁和约翰·普罗克特的后代都当过美国总统。内森·黑尔 [\[11\]](#) 是约翰·黑尔的孙子。“看到他们的眼白之前，不要开枪”的伊斯雷尔·帕特南是约翰·帕特南 [\[12\]](#) 的儿子。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13\]](#) 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14\]](#) 是塞缪尔·休厄尔的后代；克拉尔·巴顿 [\[15\]](#) 来自汤恩家族；华特·迪士尼来自伯勒斯家族。（有个巧妙的反转是，一位创建美国文物协会的殖民地时代印刷工也是伯勒斯

的后裔，科顿·马瑟的书今天便存放在那里。）纳斯家族的后裔还包括露西尔·鲍尔，她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面前作证。

（是的，她注册成为共产党员。不，她不是共产主义者。1953年，她的丈夫曾为她积极辩护。“露西浑身上下唯一红的就是她的头发，”德西·阿纳兹解释道，“那甚至还不是真发。”）

没人能像纳撒尼尔·霍桑一样，后者饱受曾祖父所犯下的罪孽的折磨，对1692年的迫害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再创作。^[16] 霍桑以同样的方法弥补了大部分清教徒的遗存：一书架的文学作品，文字清冷如暮色，介于布道和故事之间。在他写《年轻的古德曼·布朗》《红字》或创作于1851年的畅销书《七角楼》之前，已经有人把塞勒姆用作文学创作的素材，但霍桑证明了此地依然有放射性。内疚和自责在此疯长，吸引了从沃尔特·惠特曼到约翰·厄普代克的作家。在麦卡锡主义的魔咒下，亚瑟·米勒读了塞勒姆的法庭文件。他发现，正如新英格兰本身一样，唯有深刻体会了那些事件，方可建造纪念碑。《坍塌》在1953年并未取得成功。只当其超越了头条新闻，成熟到足以成为寓言时，这部剧才赢得了观众。今天，我们对清教徒的了解大部分来自《红字》和《坍塌》，这都是适合我们在青少年时阅读的作品。

1787年7月10日，正当华盛顿将军在主持制宪会议时，一群抗议者在费城的街道上袭击了一名老妇人。他们指控她施用巫术，把许多东西丢到她身上。她对孩子施了一条致命的咒语；几个星期前，有人“根据古老和难以追溯的习俗”，报纸是这么说的，划伤了她的额头，正如一名塞勒姆的访客试图砍伤布里奇特·毕肖普。这名老妇因伤势过重而死。费城的报纸指出，女巫的地位可能在幽灵和仙女之间，但是她

们并不像后两者容易驱散。19世纪后期，阿拉斯加与一场巫术灾祸展开斗争。190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女子因对一头奶牛施咒而被判入狱。直至今日，零星的袭击仍然存在，尽管当今的美国女巫的危险性大于她们的恶意，她们更有可能散发出火辣的性欲，而非念出滚烫的咒语。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反转，强大、成熟的青少年巫师——崭新的吸血鬼猎人 [\[17\]](#)——已经代替了受害的女孩。

塞勒姆村终于在1752年从塞勒姆镇独立。审判发生六十年后，它更名为丹弗斯，但仍然遗留着令人不快的要素。1895年，一位记者发现，镇上居民不愿谈论过去。出乎他意料的是，一旦提及此事，他们就声称没有烧死过一个女巫。数年后，亚瑟·米勒在为《坩埚》做研究时，遇到了同样的沉默。“你无法让任何人谈论此事。”关于1692年，他如是抱怨。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在此之后就坚决地分道扬镳了。1970年，当丹弗斯的档案管理员理查德·特拉斯克开始挖掘牧师住宅旧址时，两名年长的修女从马路对面向他挥动拳头，如果在另一个时代，这种行为就会引起巫术指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控诉道。与此同时，在塞勒姆，科温法官有山形墙的家宅已经成了“女巫之家”，这种误读类似于将弗兰肯斯坦博士变成怪物。在女巫被恶搞成对着吸尘器快活地抽鼻子的后巫术时代，小镇也选择了疯狂的商业化，这种行为更容易。塞勒姆体育队的吉祥物是骑在扫帚上的女巫。她也出现在当地的报刊头条和警车门边；镇上最好的面包房有一家魔鬼咖啡俱乐部。这一系列转变会让安·福斯特不知所措，作为一个大型巫术崇拜社区，此时在塞勒姆很容易就能买到一把扫帚。人们正在为下一个万圣节预订酒店。

1710年，马萨诸塞宣布塞勒姆受害者无罪，却忽视了六位女性。她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仍然悄然无踪，联邦曾考虑过赦免，但似乎无法在立法上做出决定。一名律师在出席参议院委员会时反对人们“愚

弄历史”。一些立法者害怕赔偿诉讼带来的高昂损失。有人则暗示，赦免可能会让由骑着扫帚飞行的女巫引领的塞勒姆旅游业受到影响。由于马萨诸塞联邦在1692年尚未存在，所以对马萨诸塞湾的判决必然没有管辖权。在2001年的万圣节——当我们再次为看不见的邪恶感到惊讶之后的数周——马萨诸塞赦免了那六名女巫。她们当中包括苏珊娜·马丁和布里奇特·毕肖普，她们曾将自己变成闪亮的焦点，干扰了男人们的睡眠，后来一起在令人窒息的监狱里度过几个星期。她们被帕里斯作证指控，也在马瑟的作品中被谴责。毕肖普不完全确定自己知道何为女巫。抽搐的女孩们让她完全糊涂了。“你认为她们被施巫吗？”哈桑问苏珊娜·马丁。“不，”她在被赦免的三百九十年前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

[1]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1932年生，分别于1975年和2001年两度出任美国国防部部长。

[2] 1712年，塞勒姆镇推翻了对丽贝卡·纳斯和贾尔斯·科里的判决。

[3] 在17世纪，清教徒认为圣诞节在《圣经》上没有相关依据，并通过法律禁止人们在这一天庆祝。该法在1681年被废除，但民间一直保持着对圣诞节的抵制。

[4] 1712年，威斯菲尔德的一个女孩指控其母使用巫术，法庭判这个女孩有罪，因为她触犯了十诫中的第五诫、第六诫和第九诫。

[5] 他虽是罪有应得，却还是娶了第三任妻子。她精神紧张，经常突然发脾气，他认为这说明她“不太可能被魔鬼附身”。实际上，莉迪亚·马瑟制造事端，离家出走，去邻居家诅咒她的丈夫，还一度偷走丈夫的日记，在上面乱涂乱画。

[6] 布拉特尔娶了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的一个女儿，推动建立了更加自由的波士顿教会，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他将计算中的“失误和不完美”归咎于母校哈佛，于是给哈佛捐赠了数学奖学金。

[7] 此处指的是波士顿倾茶事件。

[8] 清教移民和清教徒分别对应Pilgrim和Puritan，即移民至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广义上的清教徒。

[9] 琳达·特里普因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事件中曝光录音证据而为人熟知；肯·斯塔尔则是当年负责调查该案的独立检察官。

[10] 上帝会一直考验殖民地，殖民地则会一直将打击视作磨炼。“我认为我们需要来自天堂的考验。我们饱受历练方得今日繁荣，若非如此，我便要怀疑这份事业是否神圣。”美国精神病学奠基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于1776年9月写道，他将英国人的胜利重塑为上帝赐予殖民地的礼物。

[11] 内森·黑尔（Nathan Hale, 1755-1776），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间谍，被英军俘获后就义。

[12] 伊斯雷尔·帕特南（Israel Putnam, 1718-1790），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将领。

[13]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5），美国著名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14]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小妇人》。

[\[15\]](#) 克拉尔·巴顿 (Clara Barton, 1821-1912), 美国红十字会创建者。

[\[16\]](#) 他改了自己姓氏的写法，加上了一个w，和背负塞勒姆污名的哈桑保持距离，但他并不是非得要这么做：霍桑也算是菲利普·英格利希的后人，后者至死都在诅咒哈桑，谁曾想他的女儿会嫁给哈桑的儿子。

[\[17\]](#) 此处是指上世纪90年代开播的美国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由年轻靓丽的青少年扮演吸血鬼，广受美国青少年的喜爱。

人物表

牧师及其家人

詹姆斯·贝利（James Bayley），1673年至1679年担任塞勒姆村首任牧师。托马斯·帕特南的姐夫；神经紧张、身体抽搐的小安·帕特南的姑父。

乔治·伯勒斯（George Burroughs），四十二岁，贝利的继任者，在讲坛上是位迷人且思想独立的牧师，任期为1679年至1683年。他于某日突然离开塞勒姆，于1692年成为缅因边境的一名牧师。亦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好争论，控制欲强。

德奥达特·罗森（Deodat Lawson），伯勒斯的继任者，彬彬有礼，能说会道，1684年至1688年担任塞勒姆村牧师。

塞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时年三十九岁，塞勒姆牧师，面临被卷入恶魔入侵事件的困境。头两个着魔的女孩分别为他的女儿和外甥女，第一个招供的女巫为他的女仆；1688年至1696年在塞勒姆布道。为人热心、固执、刚直。

帕里斯家族：阿比盖尔·威廉姆斯（Abigail Williams），十一岁，帕里斯的金发外甥女，曾打断布道，在房间之间乱窜乱扑。贝蒂·帕里斯（Betty Parris），九岁，帕里斯家唯一出现着魔症状的孩子，他从未出庭。帕里斯还有另外两个孩子，一个十岁的儿子和一个四岁的女儿，他们未受到任何折磨，生平不详。

提图芭（Tituba），善良的印第安奴隶，第一个瞥见恶魔契约并揭发空中飞行事件的人。约翰·印第安（John Indian），另一个奴隶，屡次着魔，据说是提图芭的丈夫。伊丽莎白（Elizabeth）为牧师之妻，生于波士顿，约四十四岁，在夏末时着魔。

其他塞勒姆村民

以西结·奇弗（Ezekiel Cheever），时年三十七岁，裁缝兼农民，临时当过法庭的书记员和控诉人。

威廉·格里格斯（William Griggs），七十一岁，医生，刚到塞勒姆村，帕特南家的至交。

本杰明·哈钦森（Benjamin Hutchinson），刚二十岁出头，酒馆老板纳撒尼尔·英格索尔的养子。他曾英勇盲目地用干草叉和刺剑戳刺幽灵。

汉娜·英格索尔（Hannah Ingersoll），当时六十岁左右，酒馆老板的妻子，牧师的邻居。

纳撒尼尔·英格索尔（Nathaniel Ingersoll），时年六十岁，民兵指挥官，早期为塞勒姆村的教会执事，拥有一家酒馆；指控、审讯和司法会议就在他家酒馆举行，这里还发生过幽灵伤人事件，见证了诸多猜疑。他和帕特南和帕里斯两家交往甚密。

弗朗西斯·纳斯（Francis Nurse），七十四岁，其妻丽贝卡·纳斯被指控为女巫，为人世故且坚定。在危机爆发前，弗朗西斯对他的牧师积怨已久。

拔书亚·蒲柏（Bathshua Pop），四十岁，着了魔而打断布道的妇人。她曾向被告扔鞋，还在法庭上浮空。

托马斯·帕特南（Thomas Putnam），四十岁，民兵中士，参与过菲利普王战争的老兵。法庭记录员，教区职员，牧师帕里斯的坚定支持者。他与四名巫术受害者一起生活，发起最初以及近半数的指控。爱德华·帕特南（Edward Putnam），三十八岁，托马斯的弟弟，教会执事。两兄弟共同发起前几次的巫术指控。

玛丽·西布莉（Mary Sibley），三十二岁，牧师的邻居，她有孕在身，情绪不安。建议并指导帕里斯家烘焙女巫蛋糕。

乔纳森·沃尔科特（Jonathan Walcott），五十三岁，村里的民兵上尉，帕特南的连襟，玛丽的父亲。

主要原告

莎拉·比伯（Sarah Bibber），时年三十六岁，是一名爱争吵、爱管闲事、两面三刀的乡村主妇。曾在法庭上被针刺伤。

莎拉·丘吉尔（Sarah Churchill），二十岁左右，逃难到雅各布斯家后成为仆人。曾试图撤回证词，但并不成功。她与玛丽·沃尔科特是远亲。

阿比盖尔·霍布斯（Abigail Hobbs），十四岁，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任性少女，此前在缅因当仆人。第二个招供使用巫术的人，后成为原告，将父母送进监狱。

伊丽莎白·哈伯德（Elizabeth Hubbard），十六岁，孤儿，在他叔叔格里格斯医生家当仆人。她是五名最常出现的原告之一。

默茜·刘易斯（Mercy Lewis），十九岁，有过两次前科的难民和孤儿。此前是伯勒斯一家在缅因的仆人；1692年时在塞勒姆的帕特南家当仆人。靠着识别隐形的攻击者，她能提供最详细的证词，被称为“能看见

异象的女孩”。

小安·帕特南（Ann Putnam Jr.），十二岁，家里六兄妹中的大姐。能预测未来，亦能看到出生前的事情。她是唯一一名与父母同住的原告。老安·帕特南（Ann Putnam Sr.），三十岁左右，小安·帕特南之母，怀有身孕，虔诚敬神。她被鬼魂和女巫折磨得失去行动能力，有次因着魔而被带出法庭。

苏珊娜·谢尔顿（Susannah Sheldon），十八岁，有两次前科的缅因难民；曾目睹印第安人的暴行。前不久刚埋葬自己的父亲，意图揭示谋杀。玛丽·沃尔科特（Mary Walcott），十六岁，乡村民兵上尉乔纳森·沃尔科特之女，亦是英格索尔的外甥女，与表亲帕特南一家同住。她至少指控了七十人使用巫术，指控人数远超其他原告。

玛丽·沃伦（Mary Warren），二十岁，孤儿，难民，普罗克特家的仆人。被指控前后均遭到折磨。长相非常漂亮，能忍耐残忍以至于极端的法庭刑讯。

部分被告

约翰·奥尔登（John Alden），六十多岁。精明的波士顿毛皮贸易商，民兵军官，船长。塞勒姆商人巴塞洛缪·格德尼的长期生意伙伴；威拉德所在教区的教民；休厄尔的朋友和邻居。

威廉·巴克（William Barker），四十六岁，一名能言善辩、负债累累的农民。

布里奇特·毕晓普（Bridget Bishop），五十岁出头，塞勒姆镇寡妇；为人好斗，热爱挑衅，自以为是。在审判中，人们常把她与塞勒姆村的莎

拉·毕晓普混淆。

伊丽莎白·卡里（Elizabeth Cary），四十岁出头，丈夫为一位果敢的查尔斯敦（Charlestown）造船工人。她乘船前往塞勒姆洗刷罪名，却戴着镣铐离开。

玛莎·卡里尔（Martha Carrier），年近四十，五个孩子的母亲，性情粗暴；1692年以前似乎是“地狱王后”的候选人。曾嘲笑那些受折磨的人“魂不附体”。她是第一个被捕的安多弗女巫。

理查德·卡里尔（Richard Carrier），十八岁；安德鲁·卡里尔（Andrew Carrier），十六岁。两人身材高大魁梧，同为玛莎之子，均遭受过拷打，此后，相比于其他认罪者，理查德招供出更多同谋。

莎拉·克洛伊斯（Sarah Cloyce），四十四岁。丽贝卡·纳斯的倒霉妹妹。乡村教会成员；因为第一次婚姻而成为戴恩家的亲戚。

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十六岁，勇敢的雷丁女孩；唯一逃避逮捕的女孩，即使只是暂时逃避。

贾尔斯·科里（Giles Corey），七十多岁，无畏好斗的农民。一开始指控自己的妻子，最后公然对抗法庭。

玛莎·科里（Martha Corey），六十多岁，贾尔斯的第三任妻子。为人直接刻薄，固执武断。后被送往马萨诸塞的监狱。

菲利普·英格利希（Philip English），四十二岁，原名菲利普·朗格卢瓦（Philip l'Anglois），直言不讳、不择手段的泽西岛人。极其成功的移民企业家；塞勒姆镇最富有的商人，新当选的行政委员。

玛丽·英格利希（Mary English），四十岁左右，菲利普·英格利希之妻。父亲为一位赫赫有名的塞勒姆商人，母亲早先被指控使用巫术。她和丈夫一起潜逃。

玛丽·埃斯蒂（Mary Esty），五十八岁，七个孩子的母亲，善良热情，居住在托普斯菲尔德，汤家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连狱卒都为她着迷。

安·福斯特（Ann Foster），一个七十多岁的安静寡妇，是一个二十二岁的被害人的母亲，也是一个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岳母。她很早就注意到飞行的迹象，将其与女巫夜半集会联系起来。

莎拉·古德（Sarah Good），三十八岁，当地女乞丐，阴郁、好斗、蓬头垢面的孕妇。第一个因涉嫌巫术而受审问的人，亦是一个四岁被告人的母亲。

多卡斯·霍尔（Dorcas Hoar），一个爱恶作剧、会算命的寡妇，擅长小偷小摸。约五十七岁，长相奇怪，很容易吓到孩子。

伊丽莎白·豪（Elizabeth How），五十岁出头的贤妻，丈夫是一个托普斯菲尔德的盲人农夫。她是戴恩、卡里尔、纳斯家的亲戚，长期被怀疑使用巫术。

乔治·雅各布斯（George Jacobs），七十多岁，农夫，上了年纪，快活，随和，不识字。

玛格丽特·雅各布斯（Margaret Jacobs），十七岁，乔治·雅各布斯的孙女，感情充沛，善于表达。在塞勒姆的地牢中，她曾强烈地忏悔、认错和嚎啕。

小玛丽·莱西（Mary Lacey Jr.），十八岁，自认是个叛逆的女儿。特别

爱说话，言行浮夸做作。

老玛丽·莱西（Mary Lacey Sr.），四十岁，小玛丽·莱西的母亲，安·福斯特的女儿。

苏珊娜·马丁（Susannah Martin），七十一岁，埃姆斯伯里（Amsbury）的寡妇，身材矮小，顽强冷静。曾在1669年被判巫术罪，同年洗清罪名。

丽贝卡·纳斯（Rebecca Nurse），七十一岁，已为曾祖母。身体病弱，几乎听不见，性情敏感。给法庭制造了最大的麻烦。

莎拉·奥斯本（Sarah Osborne），约五十岁，身体很虚弱，是最早的三名嫌疑犯之一。长期陷入与帕特南家亲戚的争端中。

伊丽莎白·普罗克特（Elizabeth Procter），四十一岁，已经生了五个孩子，仍怀着身孕，另外还是六个孩子的继母。喜怒无常，热衷阅读。她也是1669年一名巫术嫌疑犯的孙女。

约翰·普罗克特（John Procter），农夫，酒保，六十岁，比妻子伊丽莎白·普罗克特年长很多。心直口快，喜欢虚张声势，咒骂那些受折磨的人才应该被绞死。他是1692年第一个被判巫术罪的男人。

玛丽·图塞克（Mary Toothaker），四十四岁，一个被定罪的比尔里卡（Billerica）男巫的遗孀。想法多，很坦诚，受到过度惊吓。玛莎·卡里尔的姐姐，戴恩牧师的外甥女。

塞缪尔·沃德韦尔（Samuel Wardwell），四十九岁，信口雌黄的算命先生，木匠，安多弗纳税名单上的底层人物。曾经招供，说得天花乱坠；后来又试图翻供。他是七个孩子的父亲。

莎拉·怀尔兹（Sarah Wilds），六十五岁左右，丈夫是托普斯菲尔德的一个木匠，曾对干草施咒。十七年前也曾被指控过，她是镇治安员（constable）的母亲。

约翰·威拉德（John Willard），约三十岁，村里的助理治安员，曾是帕特南家的农场工人。对妻子施加家庭暴力，遭其亲戚痛斥。

权威人士

达德利·布拉德斯特里特（Dudley Bradstreet），时年四十四岁，殖民地前总督的儿子。安多弗显赫人士；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行政委员，1692年参事会成员。他下令抓捕一大批巫术罪犯，遭指控后潜逃。

乔治·科温（George Corwin），二十六岁，埃塞克斯县高级行政司法官，机会主义者。两名巫术案法官的侄子（外甥），另一名巫术案法官的女婿。

乔纳森·科温（Jonathan Corwin），五十二岁，镇中商人，酒贩。是哈桑的长期同盟，也是经验丰富的治安法官；固定出席审讯。与温思罗普、哈桑、萨金特都有姻亲关系。

托马斯·丹福斯（Thomas Danforth），六十九岁，查尔斯敦地主；曾在早年的巫术案中翻案。主导1692年第一场对男巫的审查；诱导出女巫集会的最初报告；最终反对审判。

巴塞洛缪·格德尼（Bartholomew Gedney），五十二岁。甘冒风险的企业家，拥有一家锯木厂。亦是镇中德高望重的医生、执法官及民兵少校。和科温一家有亲戚关系。

约翰·哈桑（John Hathorne），五十一岁，执法官，富裕、专横、令人生畏。出身于塞勒姆镇的奠基者家庭，亦是帕特南一家的亲戚。

乔治·赫里克（George Herrick），三十五岁左右，塞勒姆镇助理治安员，出身名门，相貌英俊，经营家具生意。1692年一直忙于围捕和运送女巫。

小约翰·希金森（John Higginson Jr.），四十六岁，希金森牧师的大儿子，民兵军官，涉足渔业。新任治安法官，参与女巫审问。

威廉·菲普斯爵士（Sir William Phips），四十一岁，乘风破浪的船长兼冒险家，未受过教育，富有进取心；新任马萨诸塞总督。

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六十七岁。法庭上最年长的成员；和三位同僚有亲属关系；申请司法指导。波士顿商人，哈佛学院司库，马瑟的主要赞助者。

纳撒尼尔·索顿斯托尔（Nathaniel Saltonstall），五十三岁，曾短暂在法庭工作；被认为是马萨诸塞军官中“最受欢迎且最有原则的”。

彼得·萨金特（Peter Sergeant），四十五岁，波士顿商人，极其富有，同时是巫术案法官。曾借贷过资金给马萨诸塞殖民地，坐拥一座宫殿似的房子。他是休厄尔的生意伙伴。

塞缪尔·休厄尔（Samuel Sewall），四十岁，波士顿人，肥胖，亲切，敏感，世故，虔诚。法庭最年轻的成员，书记员的哥哥。

斯蒂芬·休厄尔（Stephen Sewall），三十五岁，法庭书记员，案卷保管员。塞勒姆镇商人，军官；收留了被蛊惑的贝蒂·帕里斯。

威廉·斯托顿（William Stoughton），六十岁，审判法庭（the 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首席法官。身材魁梧，拘泥刻板，有对小眼睛。洞察力敏锐，精通神学，是新英格兰最令人信服的司法权威。土地投机商，终身未婚。

韦特·斯蒂尔·温思罗普（Wait Still Winthrop），五十一岁，波士顿湾殖民地奠基人约翰·温思罗普的孙子。重要军官，大地主；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爱赶时髦，勉为其难接受了公职。同塞缪尔·休厄尔很亲近，亦是马瑟的密友。

其他牧师

托马斯·巴纳德（Thomas Barnard），三十四岁，性情冲动，安多弗正统教派助理牧师。安排了触摸测试（touch test）。

弗朗西斯·戴恩（Francis Dane），七十六岁，安多弗资深牧师，自1648年起就开始布道；对巫术很审慎；官僚主义，态度强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

约翰·黑尔（John Hale），五十六岁，生于查尔斯敦，在贝弗利担任牧师，待人随和，有同情心，着迷于诉讼进程和巫术机制。孩提时代曾目睹马萨诸塞第一次绞死女巫的行动。他是诺伊斯家族的姻亲。

约翰·希金森（John Higginson），七十六岁，已在塞勒姆镇布道三十三年。

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二十九岁，英克里斯·马瑟之子，波士顿第二教堂的助理牧师。十二岁便就读哈佛；十九岁获得神学学士学位。新英格兰神职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聪明，高产，不知疲倦。

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五十三岁，自1664年起担任第二教堂的牧师。新英格兰最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1685年至1701年担任哈佛学院主席。殖民地新特许状的牵线人。

乔舒亚·穆迪（Joshua Moody），五十九岁，波士顿第一教堂牧师，威拉德的学友。极其相信巫术的存在；不大受斯托顿法庭的信任。曾协助犯人逃跑。

尼古拉斯·诺伊斯（Nicholas Noyes），五十五岁，伯勒斯的哈佛同学，希金森的助理牧师。一个肥胖、精力充沛的单身汉，爱写枯燥的打油诗。塞缪尔·休厄尔在塞勒姆镇最亲密的朋友。

塞缪尔·威拉德（Samuel Willard），五十二岁，第三教堂的牧师。与马瑟父子齐名，是波士顿最有声望的神职人员。博学，善外交辞令，头脑清晰，谨慎。

质疑者

托马斯·布拉特尔（Thomas Brattle），颇有建树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倾向于英国国教。刚刚和塞缪尔·休厄尔一起去过英格兰；参加多场塞勒姆审讯。三十四岁，单身汉。

罗伯特·卡莱夫（Robert Calef），四十四岁，波士顿纺织品商人，略微风趣。参加了审判和至少一场绞刑；后来带头反对马瑟父子。托马斯·莫尔（Thomas Maule），四十七岁，塞勒姆镇的商店店主，爱与人争论，天性机敏。指控了毕晓普；后来皈依了贵格会，批评审判，颇得人心。

威廉·米尔本（William Milborne），五十多岁，曾居住于百慕大；浸礼

会牧师，学过法律，爱找麻烦。因煽动叛乱被捕。罗伯特·派克（Robert Pike），七十五岁左右，参事会成员，民兵上尉，萨利斯伯里的显赫人士。心直口快；可能是第一个关心审判的公职人员。

约翰·怀斯（John Wise），四十岁，伊普斯维奇的牧师，和帕里斯是同届的哈佛同学。大胆，有魅力，口才好。被视为当地的英雄；曾因抗议政府滥用职权入狱。

致谢

2008年，David D. Hall指出，17世纪的那几十年使他相信，过去，人们永远对新问题持开放态度；他几乎不认为有人可能把那句话理解为一种鼓励。从初级的问题到疯狂的问题，他屡屡耐心解答，回答鞭辟入里。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能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一如我对他的工作的钦佩。我也要感谢John Demos，他使17世纪变得比一个阳光明媚、空气中满是苹果酒味的下午更加惬意宜人。如果1692年，你乘着杆子飞过树梢，从安多弗向着东南方向飞去，没有多少人会碰巧知道你是否能瞥见远处的大海。我非常感谢丹弗斯镇的档案保管员John Demos，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很多时候，我非常依赖以下专家的帮助：J. M. Beattie、Elizabeth Bouvier、Richard Godbeer、Evan Haefeli、Hendrik Hartog、Richard R. Johnson、David Thomas Konig、Eve LaPlante、Kenneth P. Minkema、John M. Murrin、Daniel C. Richman、Bernard Rosenthal、David Grant Smith、Roger Thompson、Douglas Winiarski和Michael P. Winship。我感谢以下诸位在档案方面的帮助：Kent Bicknell、Robin Briggs、Carolyn Broomhead、Nicholas Cronk、Rebecca Ehrhardt、David Ferriero、Amanda Foreman、Jonathan Galassi、Malcolm Gaskill、Birgitta Lagerlöf-Génétay、Paul LeClerc、Marie Lennersand、Krishnakali Lewis、Maira Liriano、Megan Marshall、Scott McIsaac、Stephen Mitchell、Oliver Morley、Robert J. O'Hara、Eunice Panetta、Caroline Preston、Kathleen Roe、Rob Shapiro和Abby Wolf。对于档案帮助和手稿引用许可，我要特别感谢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的Irene Axelrod、Sidney E. Berger、

Kathy M. Flynn和Catherine Robertson；新英格兰历史宗谱学会的D. Brenton Simons、Bridget Donahue、Timothy Salls和Suzanne M. Stewart；哈佛大学蒲赛图书馆档案馆的Barbara S. Meloni；托普斯菲尔德历史学会的Amy Coffin；北安多弗历史学会的Inga Larson和Carol Majahad；塞勒姆第一教堂的Kris Kobialksa；玛莎葡萄园博物馆的Dana C. Street；皮博迪学院图书馆丹弗斯档案中心的Richard B. Trask；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Peter Drummey、Elaine Grublin、Elaine Heavey和Brenda Lawson；美国古文物研究学会的Elizabeth Watts Pope、Ashley Cataldo和Kimberly Toney Pelkey；康涅狄格州历史学会的Barbara Austen；波士顿学院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的Justine Sundaram和Andrew Isodoro以及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档案负责人Elizabeth Bouvier。

Matthew J. Boylan、Ella Delaney、Kate Foster、孜孜不倦工作的Mary Mann、Rachel Reiderer、David Smith、Tim Wales和Andy Young在研究和事实核查上给予了帮助。Tom Puchniak熟练地追查图像。Anne Eisenberg、Lis Bensley、Ellen Feldman、Patti Foster、Harry G. Frankfurt、Shelley Freedman、Laurie Griffith、Mitch Katz、Charlotte Kingham、Souad Kriska、Mameve Medwed、Howard Medwed、Carmen Marino、Ronald C. Rosbottom、Robin Rue、Andrea Versenyi、Will Swift、Strauss Zelnick和William Zinsser提供了17世纪的各种情况。Elinor Lipman在这些篇章最早成形时就阅读了它们，并对其进行改进。Eric Simonoff和Alicia Gordon是最卓越、最耐心的经纪人。

Michael Pietsch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能再次与他共事是我的荣幸。我对他多有感激之情，尤其感谢他费心使用可擦蓝笔。他本可以用圆珠笔。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的全体成员——尤其是Reagan Arthur、Amanda Brower、Amanda Brown、Victoria Chow、Heather Fain、Liz

Garriga、Jayne Yaffe Kemp、Marie Mundaca、像男巫般有远见的Mario J. Pulice、Tracy Roe和Tracy Williams——继续带给我惊喜。当女性也消失在档案中时，她们的家庭将遭受痛苦；如果有办法感谢Marc de La Bruyère和我们的孩子在我缺席时依然生龙活虎，我现在就想要找到这个办法。

参考书目

Baker, Emerson W., and John G. Reid. *The New England Knight: Sir William Phips, 1651–1695*.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Boyer, Paul, and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Boyer, Paul, and Stephen Nissenbaum. *Salem-Village Witchcraft: A Documentary Record of Local Conflict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Burr, George Lincoln. *Narratives of the New England Witchcraft Cases*. Mineola, NY: Dover, 2002.

Cooper, James. F., Jr., and Kenneth P. Minkema. *The Sermon Notebook of Samuel Parris, 1689–1694*. Boston: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1993.

Demos, John. *Entertaining Salem: 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The Enemy Within: 2,000 Years of Witch-Hun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Viking, 2008.

Dow, George Francis, ed. *The Records and Files of the Quarterly Courts of Essex County*. 9 vols. Essex Institute, 1911–1975.

Felt, James Barlow. *Annals of Salem*. 2 vols. Boston: James Munroe, 1845.

Gragg, Larry. *A Quest for Security: The Life of Samuel Parris*. New York: Greenwood, 1990. Hall, David D. *The Faithful Shepherd: A History of the New England Mini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Ways of Writing: 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Text-Mak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 *Worlds of Wonder, Days of Judgment: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 in Early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nsen, Chadwick. *Witchcraft at Salem*.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9.

Harris, Marguerite L., et al. *John Hale: A Man Beset by Witches*. Beverly, MA: Hale Family Association, 1992.

Karlsen, Carol F. *The Devil in the Shape of a Woman: Witchcraft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98.

Koehler, Lyle. *A Search for Power: The 'Weaker Sex'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Konig, David Thomas.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Mather, Cotton. *Diary of Cotton Mather*. 2 vols.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11.

———.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Hartford, CT: Silas Andrus, 1820.

———. *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 EEBO Editions, n.d.

———. *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 Forgotten Books, 2012.

Mather, Increase. *An Essay for the Recording of Illustrious Providences*. EEBO Editions, n.d.

Norton, Mary Beth. *In the Devil's Snare: The Salem Witchcraft Crisis of 1692*. New York: Vintage, 2003.

Perley, Sidney. *The History of Salem, Massachusetts, 1626–1716*. 3 vols. Salem, MA, 1924. “Perspectives on Witchcraft: Rethinking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Experience,” *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vols. 128 and 129, October 1992 and January 1993.

Phillips, James Duncan. *Sale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3.

Roach, Marilynne K. *The Salem Witch Trials: A Day-by-Day Chronicle of a Community Under Siege*. Lanham, MD: Taylor Trade, 2004.

Rosenthal, Bernard. *Salem Story: Reading the Witch Trials of 169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osenthal, Bernard, et al., eds. *Records of the Salem Witch-Hu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Sewall, Samuel. *The Diary of Samuel Sewall*. 2 vo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3.

Sibley, John Langdon.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Graduat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 Vols. 2 and 3 Cambridge, MA: C. W. Sever, 1873–1885.

Silverman, Kenneth. *The Life and Times of Cotton Mather*. New York: Welcome Rain, 2002.

Silverman, Kenneth, ed. *Selected Letters of Cotton Math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Stout, Harry S. *The New England Soul: Preaching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1986.

Thomas, Keith.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Penguin, 1991.

Thompson, Roger. *The Witches of Salem*. London: Folio Society, 1982.

Trask, Richard B. “The Devil Hath Been Rais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alem Village Witchcraft Outbreak of March 1692. Danvers, MA: Yeoman, 1997.

Upham, Charles W. *Salem Witchcraft*. 1867. Reprint, Mineola, NY: Dover, 2000.

Weisman, Richard. *Witchcraft, Magic,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4.